

目 录

原书第二版序言	1
原书序言	6
第一篇 马克思的学说	9
小引	9
第一章 先知马克思	11
第二章 社会学家马克思	15
第三章 经济学家马克思	30
第四章 教师马克思	60
第二篇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	79
小引	79
第五章 总产量的增加率	80
第六章 言之成理的资本主义	91
第七章 具有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102
第八章 垄断企业的行动	108
第九章 禁猎季节	134
第十章 投资机会的消失	139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的文化	151
第十二章 崩坏中的墙垣	163
I. 企业家职能的陈废	163
II. 保护阶层的毁灭	168
III.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毁灭	175

第十三章 增长着的敌意·····	179
I. 资本主义的社会气氛·····	179
II. 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182
第十四章 解体·····	196
第三篇 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	207
第十五章 战斗准备·····	207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蓝图·····	214
第十七章 几种蓝图的比较·····	233
I. 开场白·····	233
II. 比较效率论·····	235
III. 认为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理由·····	242
第十八章 人的要素·····	249
一个警告·····	249
I. 论点的历史的相对性·····	250
II. 论神人和天使长·····	252
III. 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问题·····	256
IV. 储蓄和纪律·····	263
V. 社会主义下的权威性纪律; 俄国的教训·····	266
第十九章 过渡·····	274
I. 区别两个不同的问题·····	274
II. 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277
III. 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280
IV. 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 英国的事例·····	286
第四篇 社会主义与民主·····	292
第二十章 问题的设定·····	292
I. 无产阶级专政·····	292
II. 社会主义各党的记录·····	295

III. 一次心理实验	299
IV. 定义的探索	303
第二十一章 古典的民主学说	312
I. 共同的幸福和人民的意志	312
II. 人民意志和个人意志	315
III. 人在政治方面的本性	320
IV. 古典学说可以存在下去的理由	331
第二十二章 民主的另一个理论	336
I. 政治领导权的竞争	336
II. 所应用的原则	341
第二十三章 结论	354
I. 上述分析的几点涵义	354
II. 民主方法成功的条件	362
III. 社会主义秩序下的民主	371
第五篇 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	379
小引	379
第二十四章 未成年期	380
第二十五章 马克思面临的形势	388
第二十六章 从 1875 年到 1914 年	398
I. 英国的发展和费边主义精神	398
II. 瑞典和俄罗斯的对比	405
III. 美国的社会主义诸集团	412
IV. 法国的事例：工团主义的分析	420
V. 德国的党和修正主义；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	426
VI. 第二国际	438
第二十七章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440
I. “大叛变”	440
II.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	443

III. 共产主义和它的俄罗斯成分·····	447
IV. 管理资本主义? ·····	454
V. 当前的战争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	466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470
I. 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471
II. 美国的经济潜力·····	476
1. 通过捐税实行的收入重分配·····	476
2. 巨大的潜力·····	476
3. 实现的条件·····	476
4. 过渡问题·····	476
5. 停滞主义者的命题·····	476
6. 结论·····	476
III. 俄罗斯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498
评战后的未来发展·····	508
英国第三版(1949年)序言·····	508
长驱直入社会主义·····	515
译名对照表·····	529

原书第二版序言

这一版，除增加新的一章而外，不作任何更动地重印了 1942 年的版本。我甚至对好些看得清楚该作文字改动的地方也保留了原来的样子，理由是，这本书中所讨论的这种问题，不可能改变措辞而不改变意思，或者至少引起已改变了意思的猜疑。我确实认为下面的事实是具有若干重要性的，过去四年的事变也好，评论中提供的批评也好，都没有影响我的诊断和预测，正相反，在我看来，这些已出现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我的诊断和预测。增加新的一章的唯一目的是，借助于这些新事实，来发展旧版本中，尤其是第 19 章第 4 节和第 27 章第 5 节中所提出的某些论点，并表明现在的形势怎样适合于本书中已略述了其轮廓的历史哲学。在这个序言中，我准备说到某些对本书所作的批评，或者毋宁说是某些批评的范本——并不一定都是在书刊上发表出来的。但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我必须提出的答复也许对读者有些用处，而并不是因为我对本书所受的待遇有什么不满。正相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向它的评论者的不变的亲切和好意，以及它的七种外国语的译者的不辞辛劳的努力表示我的感谢之忱。

首先让我谈一谈两种专门性质的批评。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卓越的经济学家对我的下列命题表示异议：作为本书所叙述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利润有消失的长期趋势。他说销售努力总会得到它的代价。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任何真正的分歧，只是我们以不同的意义使用了“利润”这个名词。为已经安定下来埋头于平稳

的日常业务的一个经济体系所仍然必需的销售努力，和其他每一种企业经营活动一样，无疑应该获得它的报酬。但是我把这些报酬包括在经理部门的工资里了，这是为了单独列出并强调我所信为产业赢利的根本来源，即资本主义秩序给予成功地引入新货物、新生产方法或新组织形式的利润。我看不出怎能否认，产业史已令人信服地证实了的资本主义报酬中这个要素的重要性。我认为，随着产业“进步”的愈来愈机械化（研究部门的协同工作等等），这个要素，以及跟着它，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最重要支柱，早晚必定会崩坏。

可是，我所听到的对本书纯粹经济论证部分的最频繁的批评——它有时提升成为告诫——是针对于许多读者所认为的对垄断企业的行动的辩护那一部分的。是的，我确实相信，大多数流行的关于垄断的谈论，和所有流行的关于储蓄的悲惨后果的谈论一样，不过是激进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全无根据的。我有时以较轻松的心情更强烈地表示我的意见，尤其是对于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实际的或假想的政策表示我的意见。但在这里，并且作为专门家的责任，我仅仅希望指陈，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论及垄断的部分，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我认为没有一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能够否认的下列几个命题。

1. 古典派的垄断价格理论（古尔诺-马歇尔理论）不是全然没有价值的，尤其当它被整理得不仅能处理的垄断赢利的即时的极大值化，也能处理一个时期的垄断赢利的极大值化的时候是如此。但是它的运用要随带若干假定，这些假定又如此具有限制的性质，以致使它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特别是它不能用作它在目前流行学说中被加以利用的那种用途，即，用以比较纯粹竞争经济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包括着垄断的诸重要要素的经济发挥作用的途径。

主要的理由是，这个理论假定了既定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在竞争情况下和在垄断状况下是一样的，可是现代大实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出产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比完全竞争制度下同一产业部门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远为有利，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

2. 流行的经济理论，几乎全部都是某个特定产业体系的经营管理的理论。但是比资本主义如何管理既定产业结构远为重要的，是它怎样创造这些产业结构（见第七及第八章）。而垄断要素必然会进入这个创造过程。这使垄断问题得到一种迥然不同的面貌，也使处理垄断问题的立法和行政方法有所不同。

3. 第三，大声责骂卡特尔和其他产业自治方法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断言，任何事物的本身都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们不考虑必要的附加条件。略去必要的附加条件就不足以表明整个真理。还可指出一些其他事情，但为了转到第二类反对意见上去，我就不谈它们了。

我认为，我已竭力注意让大家弄得十分清楚，本书不是一本政治书，以及我并不想鼓吹什么事情。尽管如此，使我觉得很好笑的，人们把“鼓吹外国的集产主义”这种意向归咎于我——就我所知，这种指责不止一次，虽然不是公开发表的。我指明这件事，不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是为了指出隐藏在这种指责背后的另一种反对意见。如果我不是在鼓吹外国的或是本国的集产主义，或者实实在在的别种东西，究竟我为什么要写作？根据所观察的事实尽心竭力地进行推论却不归结成什么实践上的劝告，这岂不是白费劲？不论在什么时候，当我遇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时，我总觉得十分有趣——这正是大足以说明现代生活中某种态度的一个十分漂亮的朕兆。我们常常计划得太多，想得太少。我们对要我们思考

的请求感到不愉快，我们憎恨不符合我们已经信仰或想要信仰的东西的不熟悉的议论，我们之走向未来和我们之走向战争一样是蒙住了眼睛的。这分明正是我想要服务于读者之处。我真的要他们思考。为了要这样做，要紧的是不要拿以任何既定立场为基础的“应该对它做些什么事”的各种讨论分散他的注意力，因为这样的讨论是会独占了兴趣的。分析有它自己的明晰的任务，我想专心地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我完成懂得，这种决心会使我费去很多精力来回答三两页实际的结论可能引起的反应。

最后，上述情形使人们责我为“失败主义”。我全然否认这个名词能应用到一种分析上去。失败主义是指，只当和行动相关联时才有意义的某种心理状态。事实本身和从事实作出的推论，永远也不能是失败主义的，也不能是失败主义的随便那一种反对方面。说一支船正在沉下去的报告并不是失败主义的。只有接到这个报告时的精神才能够是失败主义的：船员们可以坐下来喝酒。但是他们也可以冲向水泵。如果人们只是不接受这个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已被仔细地加以证实，那末他们是逃跑主义者。此外，纵令我的关于趋势的陈述比原来打算做的更明确地达到了预言的地步，我的陈述也并不带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暗示。哪一个正常的人仅仅因为他深信早晚总要死去而拒绝卫护他的生命？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责难所来自的两个集团：私营企业社会的拥护者和民主社会主义倡导者。如果他们对他们命该在其间行动的社会形势的性质能够看得比他们通常看到的更清楚些，他们两者都会固守岗位以期有所收获。

坦率地陈述一些有不吉之兆的事实再也没有比今天更为必要了，因为我们似乎应该把逃跑主义发展成为思想体系。这正是我写新的一章的动机，也是我写这一章的自辩。那里所提出的事实

和推论诚然是不愉快的，不是令人安慰的。但是它们不是失败主义的。失败主义者是对基督教、对我们的文明的一切其他价值说许多好听话却拒绝起来保卫它们的人——不管他还是把它们失败作为预定的结局接受下来的呢，还是以没有希望的希望欺骗自己的。因为，现在的局势是这样一种局势，在其间，乐观主义不过是背叛的一种形式而已。

约瑟夫·阿·熊彼特

塔科尼克，康涅狄格

1946 年 7 月

— 原 书 序 言

本书是把我四十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所作思考、观察和研究的大部分，集合成为容易读的一本书的努力的结果。民主主义问题是硬挤到它在本书目前所占的位置中来的，因为已经证明，如果不对它作某种广泛的分析，那就不可能陈述我对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政治的民主方法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的工作，结果证明比我原来设想的还要困难。一部分应该加以整理的性质不同的材料，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人的观点和经验：他在他的生活的不同时期中，具有多于非社会主义者通常所有的观察机会，且能不按传统的方法来反应他的所见所闻。我不想抹去这些痕迹：如果我试图排除它们，则本书可能博得的那种兴趣大部分就会跑掉。

此外，这些材料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人的分析的努力：他虽然总是诚恳地试图探查表层底下的事物动态，却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问题列为他的或久或暂的专门研究的主要题目，因此他在特定论题上所要说的，比在其他论题上要多得多。为了避免引起这样的印象，似乎我的目的是要写出一本很好地斟酌过的著作，我认为最好把我的材料归集到五个中心题目下去。它们间的连锁和桥梁当然是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我也已做到了某种表达上的系统的一致性。但是本质上它们几乎是——虽不是彼此独立的——自成起迄的几段分析。

第一篇以非技术性的作法，总结了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

主题上所要说的东西，——事实上也是我已经教了几十年的东西。用一个对福音的说明来作为社会主义诸主要问题的讨论的开端，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当然之事。但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建造的理论的房屋的厅内做这样的说明的目的又是什么？它站在那儿是为了证明，我这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是完全独立于接受或拒绝之外的。但是它弄得很难读。此后各篇没有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虽然此后各篇再三和一位伟大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教义作了比较，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的读者还是可以从第二篇开始。

在第二篇——《资本主义活得下去吗？》——中，我曾试图表明，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同样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浮现而出。许多读者会奇怪，为什么我认为为了确立正在急剧变成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普遍意见的那种结论，必须作那么费劲的复杂的分析。理由是，虽然我们大多数在结论上是一致的，可是说到正在杀死资本主义的过程的本性时，以及说到“不可避免”这个词的正确意义时，我们是不一致的。我相信大多数已提出的论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也好，关于更通俗的诸体系的也好——是错误的，我觉得不怕相当的麻烦，不怕打搅读者，渐渐引导到下述似非而是的结论是我的责任：资本主义正在被它自己的成就所杀害。

由于看到，我想我们将要看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实践的命题，由于现在这次战争它可能立刻变成实践性的命题，所以我们在第三篇——《社会主义行得通吗？》——内将广泛考察一批与社会主义秩序可望在其中成为一种经济上的成就的诸条件有关的问题。这一篇，对它的各个论题作了近乎平衡的处理，包括“过渡”问题在内。爱和憎已大大地污损了迄今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严肃的工作

的成果——这种工作做得不算太多——所以即使仅仅转述广泛地被接受的观点，看来在各处都是有理由的。

第四篇——《社会主义和民主》——是论述已在我国进行了不少时间的论战的一篇文章。但应该注意，在这一篇中，我们只处理了一个原则问题。有关这个题目的事实和评论，散见于全书各处，特别在第三篇和第五篇中。

第五篇，正和它所企图达到的那样是一个概略。在这一篇中，我想比在其他各篇中更甚地把我自己局限在，我根据个人的观察和极不完全的研究所不得不说的话。所以，编入这一篇的材料无疑是极不完全的。但是编入的材料都是很生动的。

本书的任一部分都没有发表过。可是关于第二篇的论点的一个早期的草稿。曾作为 1936 年 1 月 18 日在美国农业部研究院所作讲演的基础，并由该院加以油印，承该院教务委员会主席爱西·爱德华先生允许我将它的增订本包括在本书之内，谨此志谢。

约瑟夫·阿·熊彼特

塔科尼克，康涅狄格

1942 年 3 月

第一篇 马克思的学说

小 引

大多数智力或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痕迹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我们的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结在一起，是没有弊病的。按这个意义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我们用复活来说明伟大，还有额外的好处，因为借此可使它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是光明的源泉，或者在根本宗旨上在细节上必然都是无过失的。正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黑暗的动力；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也可以在不论多少论点不同意它，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毁损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

过去二十年，人们看到了一次饶有兴趣的马克思的复活。这位社会主义信条的大宗师，会在苏维埃俄罗斯获得他的位置是不足惊奇的。只是这种被认为圣典的过程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在马克思道理的真实意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及意识形态之间，横亘着一条至少象在谦卑的加利利人* 的宗教和红衣主教或中世纪好

* 指耶稣基督。——译注

战领主们的实践及其意识形态间的那样大的鸿沟。

另外一次复活就较难解释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活。这一现象之所以饶有兴趣，是因为直到二十年代，不论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或是在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什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调子。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常常不过是肤浅的、不重要的、没有名望的。此外，布尔什维克式的复活，在从前最浸润于马克思学说的国家内，并没有引起类似的迸发。尤其在德国，那是所有国家中具有最强烈的马克思传统的国家，在战后^①的社会主义繁荣中，仍和在先前的萧条中一样，确实还保持了一个不大的正统派。然而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们（不仅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在实际问题上前进得远超过它的慎重的保守主义的人们）在没有显示出什么要回到老教义去的样子，并且，虽然继续礼拜马克思这个神，却很当心地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完全和别的经济学家一样讨论经济问题。因此，俄国以外，美国的现象是特有的。我们不关怀它的原因。但是，粗略地考察一下那么多美国人已经据为已有了的这个道理的轮廓和意义是值得的^②。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下同。——译注

② 本书引证马克思著作的地方将限于最小限度。关于他的生平将不提供什么资料。看来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任何想知道马克思著作名单，或他生平概况的读者，可以随便从任何一本辞典，尤其可从《英国百科全书》或《社会科学百科辞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合乎我们的用途的一切。对马克思的研究，最方便的是从《资本论》第一卷（1886年出版的由摩尔和艾威林翻译，恩格斯校订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开始。传记方面，虽有大量晚近的著作，我还是认为梅林的马克思传是最好的，至少从一般读者立场来说是如此。

第一章 先知马克思

我允许宗教界的比拟闯进本章的标题，不是由于失误。其意义是超乎比拟之上的。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为它的信徒，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的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属于向人们约许在人世间建立天堂那一派。我相信，一个圣典学者作出的这些特征的表述所便于我们进行分类和注释的，可能比单纯的经济学家所能说的任何东西，远为深刻地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和上面所说有关的问题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① 纯粹的科学上的成就，即使比马克思的成就远为完满，也决不会赢得象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赢得了的历史意义的不朽性。他的政党口号的兵工厂也决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成功的一部分，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可归功于他交给他的信徒的在任何讲台上随时可用的许多白热辞句、激情控诉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一方面所可说的是，这些弹药过去曾经、现在也还很好地服务于这个目的，但是它的生产带来不利：为了铸造这类社会斗争舞台上所用的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歪曲，或者偏离本来会从他的

^①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质也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特有的对反对者的态度。对他说来，正象对任何一个信教者说来一样，反对者不仅有错，而且有罪。反对者不仅在智力上受到非难，也在道德上受到非难。一旦道理已经讲清，反对者就不能再有得到宽赦了。

体系中逻辑地推论出来的意见。然而，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寻章摘句的人，那么他现在大概早已湮没无闻了。人类不会感谢这类服务，并很快就忘掉政治剧场的剧作家的姓名。

但是他是一位先知。为了了解他的成就的本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观察它。那是资产阶级的成就达到最高峰、资产阶级的文化落到最低点的时代，是机械唯物主义流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孕育在它的母胎中的讯号，并仍然耽溺于最可厌的平庸陈腐之中。任何真正的信仰，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正急剧地消失，与此相偕的是，唯一的一线光明（除掉或许会从罗奇德尔态度^①和储蓄银行得到的东西面外）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知识分子则宣告自己十分满意于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

现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的道理，对千百万人心来说，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称马克思主义的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信仰的一幅讽刺画——按照这种看法还可说出很多名堂来——但是不要忽视，也不要不服这个成就的伟大性。即使那千百万人几乎全部不能按它的真正意义去了解和赞赏这个道理，也不必介意。这是一切道理的共同命运。重要的是，这个道理已经构想完成了，并且已经以这样一种方法传播开去，它可被当时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们所接受——无疑，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没有什么悖谬之处。这点是这样办到的：一方面，以无可超越的力量，系统地表述了被阻挠和受虐待的感觉，这原是不成功的人们的自我治疗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宣

^① 指消费合作。英国兰开夏的罗奇德尔于1844创立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译者

称社会主义能够使人免于这些苦难，其确实性是可以合理地证明的。

请看，在这里，卓越的艺术如何成功地把下列二者交织在一起：衰微的宗教所造成的徬徨如丧家之犬的超理性的渴望，和当时不可抗拒的不能容忍没有科学内容或伪科学内容的任何信条的合理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宣讲最后目标是无效果的，分析社会过程只会引起一二百个专家的兴趣。但是，穿上分析的外衣讲道，着眼于深切感到的需要进行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能赢得人们的热诚皈依，和这样崇高的犒赏的原因；人们深信，人们所赞成和拥护的东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将最后获得胜利。当然，这并没有详尽说明这个成就。人身力量和先知者的闪光，是独立于信条内容之外而起作用的。没有它们，就不能有效地启示新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意义。可是，在这里，这已和我们无关了。

关于马克思想要证明社会主义目标的不可避免性这一企图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还可以说些话。可是，关于我们在前面称之为他对不成功的人们的感情的表述，说一句话就够了。当然，这种表述并不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实际感情的表述。我们宁肯称它为，一种要用社会进化逻辑的真实的或虚伪的启示来代替实际感情的企图。由于这样做，由于将他自己的行话“阶级意识”加之于——十分不现实地——大众，他无疑歪曲了工人的真实心理（这种心理是以希望变成小资产者，并希望靠政治力量来达到这种身分为中心的），但是只要他的教导发生作用，他也就发展和提高了它。他不曾为社会主义观念这位佳人洒什么感伤的眼泪。这是他自诩为强于他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优点之一。他也不把工人赞美为日常劳作的英雄，资产阶级当害怕得不到红利时倒是爱这样做的。有些他的较弱的追随者，具有十分显著的拍工人马屁的倾向，

这是他从来没有的。他也许清楚地觉察到群众到底是什么，并且，完全超乎他们所想所要的东西之外，他的目光远眺着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各种社会目标。他也从不以他自己所设定的任何理想教导别人。这样的虚荣心对他是完全陌生的。犹如每个真正的先知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他的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也只宣说历史的辩证过程的逻辑。在这一切之中显出了能够补偿许多琐屑和平庸的尊严，在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中，琐屑平庸和这种尊严，形成了十分奇异的结合。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不指出。以马克思本人教养之深，当然不会象庸俗的社会主义教授那样，见了一个庙堂却不认识这个庙堂。他是完全能够了解一个文化及其价值的“相对的绝对”价值的，不管他自己觉得他离开它有多远。就这点来说，他的胸襟广阔的最好证明是《共产党宣言》。这一宣言也曾热烈地赞扬资本主义成就。^①而且，即使在对它宣判未来的死刑时，他也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当然，这种态度，意味着很有些东西是马克思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无疑地强调了它，并且由于认识到他的历史理论予之以一种特殊表述的事物的有机逻辑，他就更易于采取这种态度。对他来说，社会事物是有一定秩序的；尽管他在他的生平的某些关键

^① 看来这可能是夸张。但是让我们摘录一些话：“资产阶级……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阿埃及的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原文如此！）……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注意，上述的所有成就，都只归功于资产阶级，这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多走了一步。这就是上面那段文字中我的意思——而这是显然不同于今天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或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凡勃伦主义的废话的。让我现在就说，我在第二篇所将说到的资本主义成就，不过是这些，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

时机中,可能是一个咖啡店中的密谋者,他的真正的自我却是厌恶这类事情的。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抹煞生命中一切其他色彩,并创造出一种对其他文化的不健康而又愚蠢的憎恨或蔑视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也就是为什么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人们认为由于他的根本见解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的那种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可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因。

第二章 社会学家马克思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信徒们十分反对的事。他们自然不满意人们对他们认为真理本源的东西作任何冷酷的分析。但是,他们恨的事情之一却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切成片段,逐一加以讨论。他们会说,这种作法显示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光辉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是互相补充互为解释的,因此,当它的任何部分、任何方面被孤立起来分别考察的时候,真正的意义就失掉了。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当我违背他们的意见,在议论作为先知的马克思以后又议论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的时候,我既无意否认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社会见解^①的统一性——社会见解的统一性成功地给予他的著作以某种程度的分析的统一性,并更成功地给予他的著作以统一性的外观;我也无意否认它的每一部分,不论实质上如何互相独立,都是由著者使之互相关联起来的。当然,这个辽阔领域的各部分仍保留了足够的独立性,使学者们在拒绝他的劳

① 原文为 Social vision. 意思是对社会作精密的分析前,对社会整体的根本看法。这里的 Vision, 并非指历史发展的预见,不能译为“预见”。又因为不属直觉性质,而是分析的出发点,译为“想象”;“悬想”似也不妥。姑译为“见解”,待高明指正。
——译者

动成果的这一部分时，有可能接受另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信仰的魔力大部分失掉了，可是由于拯救起重要而激励人心的真理，因而也很有收获，这种真理本身的价值，比之如果它被捆绑在没有希望的遭难破船上时要重大得多。

这一点，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很可以干脆把它从我们的议论中排除出去。象他那样受过德国的训练，有思辨的头脑，他对哲学有充分的基础和热烈的兴趣。德国的纯粹哲学，是他的出发点和青年时代的爱好。有一个时期，他认为这是他的真正的天职。他是一个新黑格尔派，这大致是说，在接受这位老师的若干基本态度和方法的同时，他和他的一派拼弃了并且用一大批相反的东西代替了黑格尔其他许多门徒所加于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主义解释。只要有机会，这个背景就表现于他的一切著作之中。德国和俄国的读者，由于思想倾向和所受的训练相类似，都首先抓住这个要素，使之成为理解马克思体系的关键，那是不足为奇的。

我相信这是错误的，也是对马克思科学力量的不公正的看法。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保持了他早年的爱好。他因他的论点和黑格尔的论证间可以找到的某些形式上的类似之处而感到愉快。他喜欢证明他的黑格尔主义，喜欢用黑格尔的术语。但也仅止于此。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把实证科学出卖给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他自己就这样说了，他在那里所说的是真实的，因为分析他的论证时证明其间并无自我欺骗。他的论证到处根据社会事实，他的一切命题的真正源泉，没有一个导源于哲学领域。当然，从哲学这一边出发的诠释家和批评家是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对有关的社会科学所知有限，而且哲学体系的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除了来自哲学原理的解释而外，不喜欢任何其他解释。他们认为哲学是有关经济经验的最实事求是的陈述，因而使

研究方向岔到错误的线路上，贻误了朋友，也贻误了敌人。

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在工作中所依靠的武器，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的和当代的事实。他对当代事实的知识常常有些过时，因为他是“最书呆子气”的人，所以基本资料（不象报纸上的资料那样）到达他那里时常常要晚一些。但是，他那时代的任何具有一般重要性的或具有相当水平的历史著作是很难逃过他的眼睛的，虽然他忽略过许多专门性的文献。我们不能象称颂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博学那样，称颂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同样完备。可是他不仅能够借助于粗线条的历史轮廓，也有能够借助于许多细节——就可靠性而论，其中大部分都高于而不是低于当时其他社会学家的水平——来证明他的社会见解。对这些事物，他是以穿透崎岖的不规则的表层，并且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它们的。这里，不仅有热情，也不仅有分析的冲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他用表述这个逻辑的企图的成果，即所谓**经济史观**，^①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社会学方面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在这个成就面前，诸如究竟这一成就是否完全为马克思所独创，或是否其中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德国与法国的先辈们之类的问题，就成为无关重要的了。

经济史观的意义，并不是指人们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整个地或主要地被经济动机所驱使的。正相反，关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及其机制的解释，和对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在各个人精神上的分析，是这个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各种宗教、哲学、艺术诸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抉择，或者可以还原为经济动机，或者无关重要。他不过试图揭露塑

^① 第一次发表于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毁灭性攻击的著作中，题为《哲学的贫困》，（1847）。另一次的叙述包括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

造它们的、或者造成它们的盛衰兴亡的经济诸条件。马克斯·韦伯的全部事实和论证^①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这些集团和阶级为他们自己解释他们本身的存在、地位、行为的方法，当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他对按表面价值接受这些态度与辞令（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本原），并试图借此解释社会现实的历史家发泄了最暴烈的愤怒。但如果观念或价值对他说来不是社会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也并非仅仅是一缕青烟。如果我可以使用的比拟的话，它们在社会发动机中具有传动带的作用。我们不能谈到这些原理的最有趣味的战后发展，即知识社会学^②，它对解释这一问题能提供最好例证。但是说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这方面被人们误解了。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也认为这一理论确切地意味着个人或集团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解释在若干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其余方面也平庸得可怜。

我们在谈到这点时，同样也可以卫护马克思免遭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也这样称呼它。这个名词在某些人中间大大增加了它的名望，在另外一些人中间则加剧了它的不得人心。但这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唯物主义一些，他的历史理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自由运用经验科学解释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唯物主义一些。应该看清楚，这是和任何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在逻辑上相容的——恰和这

① 这指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收集在他的选集中的有名论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② 德语是 Wissenssoziologie（英语 Sociology of Knowledge——译者）。应该指出，最好的作家是马克斯·舍默尔和卡尔·曼海姆。后者在德文《社会学辞典》上的论文，可作入门文献读。

个世界的任何自然图景一样。中世纪的神学本身，提供了使建立这种相容性成为可能的一些方法。^①

这个理论的真正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社会结构则产生各种态度、行动和文化。马克思用这样的著名的陈述说明了他的意思，即“手推磨”创造封建社会，“蒸气机”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把技术要素强调到危险的程度，但在技术并不就是一切的条件，这是可以接受的。稍为通俗化一些，并认识到由于通俗化我们会丧失不少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形成我们的思想的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决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我们所见的事物的方面——以及决定我们每个人所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的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2）生产方式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这就是说，它们按照它们所固有的必然性而变化，因此只是由于它们本身的作用，就产生了它们的继承者。用上面马克思自己的例子为证：以“手推磨”为特征的制度创造出一个经济和社会形势，在其中，采用机械的磨粉方法成为实际的必然性，各个人各个集团是无力改变它的。“蒸气机”的兴起及其运用，又创造出各种新的社会机能和社会地位，新的集团和观点，它们按这样的途径发展起来，并相互作用，直到生长得胀破它们自己的结构框架为止。于是，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推进器，它首先是经济变革的原因，从而又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原因。这个推进器的动作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推动力。

这两个命题无疑都包括大量的真理，并且，我们在以后将常常看到，它们是无可估价的假设。大多数流行的反对意见，诸如，所

^① 我曾遇见一些天主教激进派，全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其中一位是教士，他们都采取这个看法，而且确实宣称他们自己除宗教事务外，在各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针对着道德影响和宗教因素的反驳，或如伯恩施坦早就以可爱的天真提出的“人有头脑”因而能随心所欲地行动的那种主张，都完全失败了。在说过上面那些之后，几乎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些论点的弱点：诚然，人们所“选择”的行动的途径，并不是直接由周围环境中各种客观根据强迫使然的，但是他们在作这种选择时各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癖好为转移，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并不形成另一组独立的根据，它们本身是由客观形势塑造出来的。

可是，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不是只是一个方便的近似法，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一定会比在另一些情况下运用得略少成效？一个明显的限制条件，一开始就碰到了。社会结构，社会类型和社会态度是不容易溶化的铸币。一旦它们形成了，它们可能存续数世纪之久。由于不同结构和类型表现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我们几乎时常发现，某个集团或民族的实际行为，总与我们根据其生产过程的主要形式推论出来的行为有或多或少的距离。这种情况虽然十分普遍，可是当一个高度耐久的结构，全部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时，就可以看得格外清楚。诺尔曼民族征服西西里亚所创造的社会局势，可以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并未忽视这类事实，但是他没觉察到它们的全部涵义。

与此有关的另一事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深长意义。试考察一下六七世纪间法兰克王国封建类型的土地贵族主义的抬头。确实，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变，它形成了延续很多世纪的社会结构，它也影响了包括社会需要和技术状况在内的生产条件。但是它的最简单的解释该从先前由那些在新领土确实被征服下来之后变成了封建领主（可是继续保持着这种职能）的家族和个人所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去找。这并不完全适合马克思的公式，并且很容易被解释得指向不同的方向。这类事实，无疑可以借助若干辅助假设而

纳入总命题之内。但是插入这类假定的必要性，通常就是一个理论终结的开始。

以马克思的图式为手段作历史解释时所引起的其他许多困难，可因承认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之间的若干相互作用而得到解决。^①但是，在其周围的基本真理的魔力，完全要靠它所断言的单面关系的精确性和简单性而定。如果这点成了疑问，经济史观将会沦落到其他类似命题的同等地位——成为许多局部真理中的一个——或者让路给其他能够说出更多真理的理论。可是，不管怎样，它的作为一种成就的地位，或者作为一种作业假设的方便性，都并不因此受到损害。

当然，在信徒们看来，它简直就是揭开人类历史全部秘密的万能钥匙。倘若我们有时候要嘲笑人们对这种理论的有些天真的应用时，我们应该想到它所代替掉的论点是什么论点。只要我们记住这点，那末甚至经济史观的跛子姊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首先是我们必得记录下来一个重要贡献。经济学家们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方面是出奇地迟缓的。当然，他们常常把各种经济主体区分成各种阶级，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他们所处理的过程。但是这些阶级不过是显示某种共同特性的个人的集合体；例如，某些人被分类为地主或工人，不过是因为他们拥有土地或出卖他们劳力的服务。可是，社会阶级并不是分类学家的产物，而是有生命的现存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必然有各种后果，如果把社会看做是个人或家庭的无定形集合体，那就全然漏掉了这些后果。在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中，社会阶级这种现象到底

^① 恩格斯晚年率直地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具有多大重要性，这样的问题是大有议论余地的。但它在许多实际应用上以及在总的社会过程的一切较广泛方面都十分重要，是无可怀疑的。

粗略地说，我们可以认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认为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名言里，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最初登上了舞台。当然，这是把它抬到最高位置上去了。但是，即使我们压低它成为这样一个命题，即历史事变常常可以借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各个历史时代中的现存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的重要因素，那也还剩下有足够的东西使我们有权说，这是一个和经济史观本身同样有价值的概念。

很清楚，阶级斗争原理所开辟的前进道路的成败，取决于我们所根据的阶级理论是否妥当。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我们关于文化模式和社会变革机制的一切解释，将按我们所选择的阶级理论的不同而各有区别，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象哥宾诺那样将人类历史归结为种族斗争的历史，或者，选择施穆勒或涂尔干式的劳动分工阶级理论，就把阶级对抗归结为职业集团间利益的对抗等等。而且分析中可能有的差别的范围，也不限于阶级的性质的问题。不论我们对阶级的性质的看法如何，只要阶级利益的定义不同^①，对阶级行动是怎样出现的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个问题是当代偏见的温床，迄今尚未进入它的科学阶段。

十分奇怪的是，就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系统地解决过这

① 读者将觉察到，一个人关于阶级是什么、什么东西产生阶级的看法，并不能很好地决定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各个阶级将怎样根据“它”——它的领袖，或它的一般群众——所认为所感觉（长期的或短期的，正确的或错误的）到的利益而行动。集团利益这个问题本身，满身是刺，到处陷坑，完全与研究中的集团的本质无关。

个明明是思想枢钮之一的问题。他之所以把这个工作推迟到太晚的时期,可能是因为他运用阶级概念来思考得那么多,以致他完全不觉得有必要陈述它的定义。同样可能的是,在他心中还有一些有关阶级的问题未曾解决,而且由于他对于现象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他为自己制造了某些困难,阻断了走向成熟的阶级理论的道路。他和他的门徒们,都努力把这个没有充分发展的理论应用于某些特殊事例,其中他自己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①除此而外,没有什么实际的发展可言。他的首要的合作者恩格斯的理论,是分工类型的理论,在其涵义上说本质上是非马克思的。除此而外,我们只有一些傍证和概略——其中有些是有动人的力量的,是杰出的——散布于这位大师的全部著作之中,特别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

连缀这些片断见解是一件伤脑筋的工作,不是这里所能做的。可是,基本观念是够清楚的。划分社会阶级的原则,在于占有或占有生产手段(如厂房、机器、原料)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因此,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并且只有两个阶级,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和被迫出卖劳动的无所有者即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由农场主、手工匠——他们雇用劳动但也做体力工作——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所构成的中间集团的存在,我们当然是不否认的;但他们被当作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消失的变态。两个基本阶级,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必然性,并且完全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之外,本质上是互相对抗的。每个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各小集团间的倾轧是

^① 另一个例子是后面我们将提到的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鲍尔企图以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斗争说明住居于奥匈帝国内诸民族间的对抗(《民族问题》,1905年),这一有趣的企图也应该一提,虽然分析者的技巧只是表明了工具的不适合性。

会发生的，甚至可以具有历史的决定重要性。但归根到底，这些分裂和倾轧不是主要的而是偶然的。唯一不带有偶然性质，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对抗，是建筑在对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性质是斗争——是阶级战争。

不久我们将见到，马克思试图指出，资本家将如何在这个阶级战争中互相毁灭，最后也将毁灭资本主义体系。他也试图指出，资本的所有权，如何会引起进一步的积累。但是这样的论证方法和使所有权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本质特征的定义本身一样，只起了增大“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增大了资产者最初如何成为资产者，或者，为了使他们有可能开始剥削，他们如何取得按马克思学说说来是必要的物资积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很不明确。^①他轻蔑地驳斥了那种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变成、还在每天变成资本家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智慧和过人的工作和储蓄的能力的资产阶级的童话。他嘲笑这种童话是很得策的。因为每个政治家都知道，引起一场哄笑无疑是有利于他收拾掉一个不适意的真理的卓越方法。可是谁若以完全不偏不倚的精神观察历史和当代事实，谁就不会觉察不到：这种童话虽然远不足以说明全部真理，却说出了真理的大部分。过人的智慧和精力，十有八九是产业获得成功，特别是产业阵地得以建立的原因。而且，在资本主义和各个产业的始创阶段，储蓄，虽然不是完全象古典经济学所说明的那样，却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诚然，一个人通常不可能靠从薪水或工资中节省下来的资金装备他的工厂以达到资本家（产业的雇主）的身分。积累多半来自利

^① 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6章〔中译本第24章。——译者〕中《原始积累的秘密》一节。

润，因之得以利润为其先决条件——事实上，这是区别储蓄和积累的**健全理由**。创办一个企业所需的资金，一般是靠借用别人的储蓄来取得的——而象一个个小水坑那样的小额储蓄的存在是容易说明的——或者靠借用银行为供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使用而创设的存款来取得。可是，后者照例都储蓄；他的储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为张罗每天的面包而从事劳苦的工作，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来考察环境，发展计划，取得合作。所以，作为经济理论问题，马克思否认**储蓄具有古典作家归属给它的作用时**，确实涉及问题的核心，虽然他说得有些过份。不过他的结论是推不出的。不论古典理论是否正确^①，那种哄笑很难认为是公平的。

可是哄笑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并帮助另一种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清除道路。但这种理论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明确。对群众的暴力——劫掠——镇压，助长了掠夺，掠夺的结果反过来助长了镇压——这当然顺理成章，也和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所共同具有的观念若合符节——在今天更甚于马克思的时代。但是这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所要求说明的是，某些人怎样取得了镇压和劫掠的权力。通俗的作品不会为此操心。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提给约翰·里德的著作。但是我们是在和马克思打交道。

现在，一个类似答案的东西，至少已由马克思全部主要理论的历史性给提供出来了。对他来说，资本主义萌芽于社会的封建状态之中不仅仅是**事实问题**，它对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不可缺少的**。

^① 我不想停下来强调，但我必须指出，即使古典派理论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么错误**。“储蓄”，按其最严格的字面意义，曾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始积累”的办法，特别在资本主义早期。还有另一种方法和它性质相似，虽然不和它完全相同。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许多工厂，不过是一个人的双手建造得起来的一间棚屋，只要极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工作的。在这种情形下，未来的资本家本人的体力工作，加上很小一笔节省下来的资金，就是所需的全部东西了——当然，还要加上一个好脑筋。

当然在这情形下也发生了关于社会阶层形成的原因和其机构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实质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暴力统治^①，在这种统治下，对群众的镇压和剥削都是既成的事实。主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发明出来的阶级理论，被扩展到它的封建先辈身上去了——正如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概念一样。^②而且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被收拾起来塞到封建混什物中去，而以确定的状态作为论据再现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之中。封建剥削者不过被资本主义剥削者代替了而已。在封建领主确实转为产业家的情况下，这足以解决这样遗留下来的问题。历史事实给这个观点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领主（特别在德国）确曾建立了并经营了工厂，常常从他们的封建地租中抽调资金，从农业人口（并不一定是，但有时是他们的农奴）中抽调劳动力。^③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用以弥补这个罅隙的材料显然就性量很差了。唯一坦率地表明这种局面的方法是，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也就是说不凭借暗示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非马克思主义要素，是无法说明问题的。^④

① 马克思以外，很多社会主义作家对暴力这个要素和对用以实施暴力的物质手段的控制这个要素的说明的价值，表现了无批判的信任态度。例如，拉萨尔在解释政府权力时，除大炮和刺刀而外，没有提出其他的東西。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完全看不到这种社会学的弱点，为什么他们竟看不到说有权力才能控制大炮（和愿意使用大炮的人们），比说控制大炮产生了权力更近于真理。

② 这是马克思学说和洛贝尔图学说类似的一点。

③ 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中试图充分利用这类实例。但是使他租积累完全成为原始积累基础的企图，桑巴特本人最后也承认是毫无希望的。

④ 即使我们承认抢劫的意义到其最高的限度，使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不至于侵犯知识分子的神官野史的领域，这一点依旧是真的。在许多时代许多地方，抢劫确实是商业资本建立中的一个因素。腓尼基人和英国人的财富是大家熟知的例子。但即使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还是不充分的，因为追溯到最后，成功的抢劫必定基于抢劫者的个人优越才能。只要承认这一点，一个很不相同的社会阶层理论就出现了。

然而，这却在这个理论的历史本原与逻辑本原两方面损害了这个理论。既然大多数原始积累方法也说明了后来的积累——原始积累好象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都不断进行着——那就不能说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学说除在说明遥远的过去的过程方面有些困难而外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某种理论即使在最有利的事例中也总接近不了它理应说明的现象的核心，因而不应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的话，那么坚持这个理论的缺点也许是多余的。我们所谓有利的事例，主要可以从以中等规模的、所有主直接经营的商行占优势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进化的时代中找到。在这种类型以外，阶级地位虽在大多数事例中也或多或少反映于相应的经济地位中，却常常是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商业上的成功显然并非到处都是取得社会显要地位的唯一通道，只有在生产手段所有权能够决定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的。可是，即使在这时候，使所有权成为下定义的要素，其合理程度也不过和把碰巧有一支枪的人定义为一个士兵一样。把某些人（连同他们的后裔）一成不变地看做资本家，又把另一些人（连同他们的后裔）一成不变地看做无产者，并在他们之间加以截然的划分，不仅象人们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是绝对不现实的，而且也没有看到社会各阶级的一个特点——个别家族不断升入或退出社会高级阶层。我所提到的事实全是显著而无可争辩的。如果它们没有显示在马克思的画面上，理由只是在于它们的涵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考察一下这个理论在马克思的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并问问我们自己，马克思到底是要它服务于哪种分析目的——不同于它作为鼓动者的武器的用途——并不是多余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不象我们那样，把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当作两种独立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前者以特殊的

方法补足后者，因此限定了——弄得更为明确——生产方式或生产状况的运用方式。这决定着社会结构，并经过社会结构决定一切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的政治历史的全部进程。但在一切非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借社会阶级——两个阶级——来规定的，社会阶级是真正的登场人物，同时也是通过它们影响一切东西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内在逻辑直接产物。这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说成仅仅是经济现象，甚至是意义十分狭隘的经济现象。马克思由此使自己不可能对它们有较深刻的看法，但是就马克思把它们安放在自己的分析图式内的精确位置而言，他除这样做而外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希望按照他给阶级划分下定义的那种特征去给资本主义下定义。略经思考，读者们就会相信这不是必然的或天然该做的事。事实上这是分析战略上的大胆做法，马克思的分析用这种方法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样联结在一起，使得实际上和阶级存在与否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按照定义，成为原始共产体以外唯一可能的那种无阶级的社会。除了马克思所选中的阶级定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根据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作出的定义——而外，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定义能够那么漂亮地实现这个颇具匠心的同义反复的了。因此，只能有所有者与无所有者这二个阶级，因此，其他各种阶级划分原则，即令更能言之成理，也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否认、低估、或者把它还原成为这个原则。

对这种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分界线的明确性和重要性所作的夸张，又被关于它们之间的对抗的夸张所超过了。在没有因数马克思主义念珠而偏了心的人看来，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主要是合作的关系，任何相反的理论多半只能

拉扯上一些病态的事例来作为证明。在社会生活中，除极稀有的一些事例外，对抗与和协两者当然都是无处不在的，事实上也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我不禁想说，在古老的和谐观点中，虽然也满是胡扯，但它的胡扯比马克思在工具所有者和工具使用者之间所构筑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那种绝对的胡扯还要好些。可是这一回马克思还是别无办法，这不是因为他要达到革命的结论——革命的结论完全可从一大堆其他可能图式中推演出来——而是因为他自己分析上的必要。如果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题也是使社会主义曙光降临大地的手段，如果阶级只该有这两个，那么，他们的关系在原则上就只能是对抗的，否则在他的社会动力学体系中就会失掉力量。

现在，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即根据私人控制生产手段的制度来定义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学却是由他的经济理论提供的。这个经济理论是用来表明，具体化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间的交替这类概念中的社会学论据怎样以经济学的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为中介而起作用，以及，它们怎样恰恰产生出结局要破坏自己的制度框架，同时又为另一个社会世界的出现创造条件的那种经济过程。这种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它把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诸概念联结在一起，借以整理一切社会事实，使一切现象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因此，这并不单单是只用来解释个别现象而不涉及其他事物的关于个别现象的理论。它有一种有机体的功能，这种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比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成功手段确实要重要得多。如果我们要了解象马克思这样有能力的分析家怎样会容忍这种理论的缺点，我们必定要看到这种功能。

赞美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虔诚者，现在和过去一向都

有。更可理解的是所有这样一些人的心情，他们赞美这一整个理论的威力和伟大，以致不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多少缺点也概加宽赦。我们自己将试图对这个综合理论作出估计。（第四章）但是我们必须先来看看，马克思的经济机械学怎样执行他的总计划所加于它的任务。

第三章 经济学家马克思

作为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十分博学的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我对我称作天才和先知的一个作家，认为必须对他的这个特点作出如此突出的评价。可是，赞扬这一特点是重要的。天才和先知通常并不长于专门性的学问，如果他们有什么首创性，那恰恰由于他们并不博学。但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归因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训练和知识。他是求知若渴的读者，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漏掉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他读什么消化什么，悉心研究每件事情和每种议论，具有热情，深入细节，这对习惯于着眼在整个文化和长期发展的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不论批判和驳斥，或是接受和同意，他总深入每件事情的底层。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这是具有理论热情的著作。不停止的自学，努力精通应该精通的一切东西，这很有助于他摆脱偏见和放弃超科学目的，虽然他的工作确是为了证明一个确定的见解。对他的极强的智慧来说，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研究的兴趣居于超越一切的首要地位，连他本人的利益都可以不顾；并且，不论他多么醉心于他的最后结论的意义，在工作中他最关怀的还是淬历当代的科学所提供给他的分析工具，矫正清理逻辑上的困难，和在这样的基础上树立起一种在性质和意向上说

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不管有什么缺点。

不难理解，为什么朋友和敌人都会误解他在纯粹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的性质。在朋友们看来，他绝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理论家，因此对他的著作的这一方面作过多的称颂，那简直是亵渎。愤恨他的态度和他的理论论证的背景的敌人们，感到几乎不可能承认，他在著作的某些部分中所做的事，若出于别人之手的话，正是会得到他们的极高评价的那种事情。而且，经济理论这种冰冷的金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浸在大量的火热辞句中的，因而得到了非它自然具有的温度。不论是谁，凡对马克思之有权作为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家表示怀疑的，当然只想到这些措辞，而不是想到他的思想，只是想到热烈的语言和对“剥削”及“贫困化”（这可能是对德文 *verelendung* 一字的最好译法，*verelendung* 不是好德文，正象 *immiseration*〔贫困化〕这个怪字不是好德文一样。这个字在意大利文中的 *immiserimento*。）的强烈的控诉。诚然，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例如他对奥克尼夫人^①的恶意嘲讽或庸俗评论之类，都是演出中的重要部分，对马克思本人是重要的，对信徒们和不信者也都是重要的。它们部分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在马克思的定理中，可以看到有些超过、甚至有些根本不同于他的老师的相似的命题之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有个老师没有？有的。要真正了解他的经济学，首先要认识，作为理论家，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他是他的学生，不仅在于他自己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远为重要的是，他曾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理论分析的艺术。他时常使用李嘉图的

^① 威廉第三的朋友——这位国王，在他生前十分不得人望，这时候已变成英国资产阶级的偶像了。

工具；对他来说，每一个理论问题都是以他对李嘉图进行深刻的研究时碰到的困难，和他从中搜罗到的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启发的形式出现的。这些，马克思自己是大部分承认的，当然他不会承认他对李嘉图的态度，是一个学生对于教授的那种态度——接连听教授反复说明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又是机械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到家里试图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的那种态度。为马克思主义而争论的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影响不是马克思经济学受到的唯一影响，但是除了魁奈的影响之外，其他影响都无须在这样简略的一本小书里提到。马克思从魁奈那儿推衍出了他的关于整个经济过程的基本概念。在1800至1840年间试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英国作家也许已经提供许多意见和细节，但按我们的目的，提到李嘉图主义思潮时，这些都已包括在内了。若干作家，其中离马克思愈近的，马克思对他们愈不客气，还有些人的著作在很多论点上和他是相似的（西斯蒙第，洛贝尔图，约翰·穆勒），都应该略去不计，凡和他的主要论证并无直接关系的一切事情也必须略去不计——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内的成就是显然是薄弱的，在这方面他没有能够赶上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当我们为马克思的论证作一个无可再简的大纲之时，不可避免地许多方面对《资本论》结构要有不公正之处，可是这部分还未完成、部分因成功的攻击而受到损伤的著作，仍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它的宏伟的轮廓！

1. 马克思使价值理论成为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这和他同时代和较晚的理论家们的作法是一致的。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我相信象陶西格教授那样的杰出权威不会同意这点，他常常强调其间的区别。在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涵义方

面，区别是不少的，但在核心定理方面区别是没有的，对今天的理论家来说，关系重大的只是后者。^①李嘉图和马克思两人都说，一切商品的价值（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中）与包含在该商品内的劳动量成比例，如果劳动符合于现有生产效率水平（“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话。两人都以劳动时间衡量这个数量，为了使不同质量的工作还原为单一的标准，两人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这条路的入口处有这种研究所带来的困难，两人以类似的方法和它搏斗。（这就是说，马克思好象按照从李嘉图那儿学来的方法和它搏斗。）关于垄断，或我们现在所称的不完全竞争，两人都没有什么有用的理论。两人以相同的议论回答批评者。不过马克思的论证较欠文雅，更为冗长，更有“哲学气味”——用这个词的最坏的涵义来说的——而已。

谁都知道，这种价值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有关这种理论的卷帙浩繁的讨论中，正确的确不是全在一方，它的反对者曾使用过许多错误的论证。实质上的争执点并非劳动究竟是不是经济价值的真正的“源泉”或真正的“原因”。要从此推论出道德上对产品的要求权的社会哲学家可能对这一点具有首要的兴趣，马克思

① 可是，也可以提出疑问：对马克思本人而言，有重大关系的是否以此为限。他和亚里士多德有同样的谬见，即价值虽是决定相对价格的一个因素，可是还有别于，并独立存在于相对价格或交换关系之外。商品的价值是体现于该商品中的劳动量这个命题，很难有什么别的意思。如果这样，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李嘉图的价值不过是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这一点值得特别指出，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关于价值的观点，那末，他的理论中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或甚至是无意义的东西，就不再是这样的了。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如果我们追随某些马克思的注释学者之后，认为不论马克思的劳动数量价值是不是特定的“实体”，它仅仅被用作显示社会总收入区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工具（这时个别的相对价格理论就成为次要问题了），局面也不会有所改进。因为不久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这个任务上也失败了。（姑认为这个任务可以和个别价格问题分裂开来。）

本人当然也不是不关心问题的这个侧面的。可是，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应该叙述或者解释实际的诸过程，因此远为重要的是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工作得怎样，而它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因为它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而且一切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①如果这二个条件中哪一个不能得到满足，就得引入额外的假定，而分析的困难就会立刻增加到无法收拾的程度。因此按劳动价值理论的路线进行推理，是根据一个没有什么实际重要性的极特殊的事例进行推理，虽然可以说，如果它是在和相对价值的历史趋势相近似的意义上被解释的话，并非全无意义。代替它的那个理论——在其最早的、现在已经过时了的形式下，被称为边际效用理论——可能在很多点上比它优越，但是真正的要点是，这一代理理论更具普遍性，一方面它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除劳动以外有其他生产因素存在以及同时有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存的情况。而且，如果我们将上述限制性的假定引

① 第二个假定的必要性是特别有害的。劳动价值理论也许能够处理由于训练（习得的熟练）而产生的劳动质量上的差别：进入训练过程的工作的相当部分应该加到每小时熟练工作中去，所以我们可以用不着离开原理的范围，使熟练工人所做的一小时工作等于一小时不熟练工作的某个确定的倍数。可是如果工作质量的“天然”差别是由于智力、意志力、体力和敏捷的程度而引起的，这个方法就会无效。于是就得求助于天然的低能者和天然的优秀工人各自所做一小时工作的价值的差别——而这是其本身为劳动数量原理所不能说明的一种价值。事实上李嘉图恰恰这样做了：他简单地，这种质量上的差别将通过市场的机制被设法放到正确的关系中去，结果我们可以说，甲工人所做的一小时工作等于乙工人所做的一小时工作的一定倍数。但是他完全忽略了，当这样论证时他是在求助于另一个价值原理，并且实实在在地放弃了劳动数量原理，于是这个原理在其起步点上就失败在自己的境界之内，并且，由于在它面前出现了劳动以外诸因素，失败的机会还多得很。

入这个理论，随着就会推得价值和所用劳动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①所以，应该看清楚，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们质问——如一开始他们试图做的那样——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是他们面对面碰到的东西）的妥当性是完全荒谬的，而且称劳动价值理论为“错误”，也是不正确的。无论如何它已经死了并且已被埋葬了。

2. 既然李嘉图和马克思似乎都没有充分觉察到由于取了一个出发点而使自己的观点具有的全部弱点，他们却十分清楚地察觉到其中的某几点。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尽力设法解决由于抹煞**自然因素的服务**这个要素而发生的问题：当然，根据一个单单建立在劳动数量上的价值理论，这些自然因素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正当地位被剥夺掉了。有名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本质上是完成这种抹煞工作的一个企图，马克思的理论则是另一个。只要我们所用的分析工具能象它对待工资那样地对待地租，全部困难就不再存在了。所以，关于马克思的、和级差地租有所区别的绝对地租学说的实际功过到底如何，或它和洛贝尔图的学说的关系如何，就用不着再说什么话了。

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放过去，我们仍旧面对着。由于出现了资本——指其本身是被生产出来的一批生产手段而言——而引起的困难。在李嘉图看来，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著名的第四节中，他当作一种事实引入它，接受它，却不打算问一问，商品生产中若使用了资本货物，例如工

^① 事实上，按照边际效用理论，为了达到均衡，每个因素必须这样分配到向它开放的生产用途上去，即配置到任何用途上的最后一个单位所生产的价值，和这个最后单位配置到任一种用途上所生产的价值必须是相同的。如果除了种类和质量都一致的劳动而外没有别种因素，很明显，它的意思就是：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必须和包含在其中的人时数成比例，如果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移动性的话。

厂、机器和原料时，所生产的商品为什么将按能为这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赚得一笔净利润的价格出售。他领会到，这一事实和投下资本到可售商品出现为止所需时间的长短有某种关系，他也领会到当这种时间的长短在各种产业中不一致时，这将迫使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偏离“包含”于其中的工时——包括用于资本货物本身生产中的工时在内。他冷淡地指明这点，好象这是必然会从他的基本价值定理推论出来，而不和这些定理矛盾似的；除此而外，他确实没有前进一步，他把自己局限于由此引起的某些次要问题，显然相信他的理论仍旧说明了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引入，接受并讨论同一事实，也从怀疑它是事实，他也领会到，这似乎和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但是他承认李嘉图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妥当的，并且他在照李嘉图提出的那样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同时，认真地钻研它，在李嘉图花费了几百句话的地方花费了好几百页的篇幅。

3. 马克思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显出了对所涉及问题性质的更敏捷的理解，同时也改进了他接受下来的概念装置。例如，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间的区别代替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间的区别，用严密得多的，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间关系为根据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代替李嘉图关于生产过程持续时间的粗略看法。他还对资本的理论作出很多其他的贡献。虽然如此，现在我们将只说明他对资本净收益的解释，即他的剥削理论。

群众并不总是觉得自己是受损害的和被剥削的。但为他们表述他们观点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对他们说他们是受损害和被剥削的，而不一定需要什么精确的意义存乎其间。如果没有这种现存的用语，马克思即使想做也会做不出什么来的。他的功绩和成就，

在于他觉察到各色各样论点的弱点，在他之前的群众思想的导师们曾试图借这些论点表明剥削怎样发生，即在今天它们还供给平凡的激进派以惯用的武器。一切关于讨价还价的力量和诈欺的老一套口号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要证明的是，剥削并不起源于偶然或意外的个别情况，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的结果，它是无可避免的，并完全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之外。

他的做法如下。劳动者的头脑、肌肉和神经，从来都是潜在劳动(Arbeitskraft, 通常不能令人满意地译为劳动力[labor power])的一笔蕴藏或积蓄。马克思把这份蕴藏或积蓄看作以确定数量存在着的一种实体，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别种东西一样是商品。想想奴隶制度的情形，我们也许可以澄清我们自己的思想。马克思的看法是，在工资契约和奴隶买卖之间虽有不少次要的差别，本质的差别是没有的——“自由”劳动的雇用者所购买的，确实不象在奴隶制度下那样是劳动者本人，而是他们潜在劳动总量中的一个确定的份额。

现在，既然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不是劳动服务或实际的工时）是一种商品，价值规律就一定会应用到它头上。这就是说，在均衡和完全竞争中，它必须取得一笔和它的“生产”中所化费的劳动小时数成比例的工资。但是在“生产”储藏在工人皮肤内的潜在劳动时所耗费的有多少劳动小时呢？那就是以前和现在用来抚育劳动者，并给劳动者以吃穿住的那个劳动小时数。^① 这些构成了这份潜在劳动的价值：如果他卖掉它的若干部分——以日、星期、年等表示——他将收到相当于这些部分的劳动价值的工资，恰如一个奴

① 除了“劳动力”和劳动之间的区别而外，这种说法，贝利《〈关于价值的性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在事先就认为它是荒谬的，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资本论》第1卷第19章〔中译本第17章——译者〕。

求贩子卖掉一个奴隶，在均衡情况下就会收到一笔和这些劳动小时的总数成比例的价格一样。应该再一次注意到，这么一来，马克思就谨慎地避开了一切通俗口号，这些口号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认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上受到了掠夺或诈欺，或者在他的可悲的软弱中，他只是被迫接受强加于他的任何条件。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他得到了他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

但是一旦“资本家”取得了这份潜在劳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工作更多的小时——提供更多的实际劳务——，比生产这分劳动或潜在劳动所费的小时更多的小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勒索到比他们所已支付的为多的实际劳动小时。既然劳动产品也是按与其生产中所耗费的工时的成比例的价格出卖的，那么两个价值间就有一个差额（不是从别的东西中发生，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发生的），它必然会，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机制而为资本家所得。这就是**剩余价值**（*mehrwert*）。①由于侵吞了这分价值，资本家就“剥削”了劳动，虽然他付给劳动者的，不少于他们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从买主那儿收到的，也不多于他出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其次，还得说一说，这里并没有求助于什么不公平的定价，生产的限制，或产品市场上的诈欺之类的说法。马克思当然并不否认这种作风的存在。但是他正确地了解它们，因此从来不把它们当作任何根本结论的基础。

顺便让我们来夸奖一下这儿的教授法：不论剥削这个词现在所取得的意义如何别致，并且离它的平常的意义有多远，不论它得自自然法、经院哲学、启蒙作家的支持如何可疑，它到底被接纳到科学论证的领域之内，从而有助于帮助其门徒进行战斗。

① 剩余价值率（剥削的程度）的定义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工资）之比。

说到这种科学论证的优缺点，我们必须仔细地地区别它的两个侧面，其中之一是始终被批评家们所忽视的。在某种静止经济过程的理论的平常水平上，很容易指出，在马克思自己的假定之下，剩余价值学说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理论，纵令我们承认它对所有其他商品都是妥当的，也决不能适用于劳动这种商品，因为这会意味着工人和机器一样，是在合理的成本计算之下生产出来的。既然他们不是，那就没有根据来假定劳动力的价值将和“生产”它时所耗费的工时数成比例。从逻辑上说，马克思若接受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或干脆象李嘉图那样按马尔萨斯主义路线进行论证，还可以改善一些他的处境。但是因为他很聪明地拒绝这么做，他的剥削理论一开始就失却了它的主要支柱之一。^①

其次，可以表明，完全竞争的均衡，不能存在于所有的资本家雇主都能得到剥削利益的局面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各个人会试图扩大生产，而其总结果会无可疑免地有助于提高工资率，使这类利益减低到零。毫无疑问，借助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竞争中的磨擦和制度上的抑制作用，强调货币信用范围内各种障碍的全部可能性等等，可能改善这种情况。然而，这么做只能描绘出一个中庸之道的案例，而这是马克思所由衷地蔑视的。

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我们只须看一看马克思的分析目的，就不难理解，他无须在容易被人驳倒的地方迎战。只要我们把剩余价值理论看做只是一个关于处在完全均衡中的静止的经济过程的命题，打击他就是十分容易的。他所要分析的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永不能达到这种均衡状态的，正相反，他所要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的不断变化过程，因此循上述路线所作的批评就不是完全决定性的。在完全均衡状态下，

① 我们以后可以看到马克思怎样试图替换这个支柱。

剩余价值也许是不可能产生的,但因为这种均衡永远不可能建立,剩余价值就永远可以出现。它们可以常常趋向于消失,但又总是存在着,因为它们不断地被重新创造着。这个辩护说法救不了劳动价值理论,尤其当应用于劳动本身这种商品,或现在那样的关于剥削的论点的时候。但它将使我们有可能对其结论作出更有利的解释,虽然一个满意的有关剩余的理论,将夺走它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涵义。这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的方面。它也向马克思经济分析工具的其他部分投入了一束新的光线,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针对这个分析工具的基础本身的一些成功的批评并没有更致命地毁伤了它。

4. 然而, 如果我们在平常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水平上继续前进, 我们将愈来愈深地陷入困难, 或者毋宁说, 我们将觉察到信徒们试图按他们老师的途径前进时所陷入的困难。首先, 剩余价值学说并不使上面提到的问题, 即劳动价值理论和经济现实中明明白白的事实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问题更易解决。正相反, 它加深了理论和现实间的矛盾。因为按照剩余价值学说, 不变资本——非工资的资本——的价值转入产品那一部分一点也不比它在学习中所失掉的为多; 增加价值的只有工资资本, 结果, 各企业所赚得的利润将按它们的资本有机构成而有所不同。马克思相信资本家为实现剩余价值“总量”的再分配而作的竞争, 会使每家企业赚得与其总资本成比例的利润, 也就是各个企业的利润率会趋于均等。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困难属于杜撰的问题之列; 杜撰往往是由于企图作出不健全的理论^①, 至于解答则属于对绝望的安慰

① 然而, 其间有一个因素并不是不健全的, 觉察到这一因素, 不论觉察得如何模糊不清, 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 在完全静止的经济中会产出一笔净收入, 这并不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在今天还是深信不疑的那样, 是件无可怀疑的

这一类。然而马克思不仅相信后者能有益于证实划一的利润率的发生，并能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怎样因此而偏离它们以劳动计算的价值，^①而且相信他的理论还为另一个在古典学说中占重要位置的“规律”，即关于利润率具有固有的下降趋势的说法，提供了一种解释。事实上，这是似乎相当有理地从工资货物产业中总资本的不变部分的相对重要性有所增长推论而得的：如果这些产业中工厂和设备的相对重要性增加了——这正是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的通例；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程度保持原状，则总资本的收益率一般地将减低。这个论点博得很多赞美，而且马克思本人可能曾以十分满意的心情看待它，这种心情正是我们在自己的某个理论说明了原未列入这个理论的某种意见时常常感觉到的那种心情。不管马克思在推演中所犯错误如何，来讨论这个论点本身的功绩，会是饶有兴趣的。可是我们用不着停下来这么做，因为这个论点已经受到了它自己的诸前提的充分的谴责。但还有一个为马克思主义动力学提供了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并把剥削理论和马克思分析结构中下一个情节联系起来的、同源的虽非同一的命题，通常称为

事实。如果在实践上它们一般确实似乎会产出净收益，这可能完全因为经济从来不是静止的。马克思关于资本净收益的论点，也许可以解释为承认这件事的迂回办法。

① 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具体化于他的朋友恩格斯据以编成的遗著《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内。所以，我们得不到马克思自己最终要说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批评者毫不犹豫地判定第3卷断然和第1卷的学说相矛盾。从表面上看，这种判决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这种性质的问题，我们有责任这样做——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单位的社会生产过程所生产的“量”，使剩下来的事成为这个“量”的分配问题，是并不荒谬的。假定这并不荒谬，那么更可以认为第3卷所详论的商品相对价格是从第1卷劳动数量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因此象从累克西斯直到柯尔那些作家那样，坚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和他的价格理论脱节，无所贡献于他的价格理论，是不正确的。但是消除了这个矛盾之后，马克思所获仍不多。剩下的控诉还是够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价值和价格如何彼此相关的整个问题最好的作品是鲍尔特凯维兹的《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社会科学及社会政策文汇》1907。鲍尔特凯维兹在那里也引证了一场并不真正诱人的论战中若干较好的文献。

积累理论。

从被剥削的劳动那里榨取来的赃物，其主要部分（照某几个门徒说来，实际上是它的全部）被资本家们转化为资本——生产手段。就事情本身来说，除去马克思的用语所引起的特殊涵义而外，这当然不过是关于人所共知的、通常被用储蓄和投资来描述的这一事实的一种说法。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单纯的事实是不够的；如果要在冷酷的逻辑中阐明资本主义的过程，事实应该是逻辑的一部分，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事实一定应该是必然的。而采取类似马克斯·韦伯那样的方法，认为这种必然性是从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学中成长起来的，也不能令人满意。韦伯使清教徒态度——对一个人的利润不作快乐主义的享受，显然正好适合清教徒态度的模式——成为资本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马克思并不蔑视他觉得能从这方法中推演而得的任何支持。^①但是对于象他所设计那样一个体系，应该有比这更为实质性的能逼迫资本家从事积累的东西，不管资本家对此感觉到什么；这种东西还应该很有力，足以说明那种心理状态本身。很幸运，这种东西是有的。

在说明这种储蓄的强制性时，为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这就是说，我将象他那样假定，资本家阶级进行储蓄这件事意味着实际资本的相应的增加。^②这个运动，最初常发生于总

① 例如，他在一个地方（《资本论》第1卷第654页，人人丛书版）〔中译本第745—746页。——译者〕讨论这个题目时，修辞上的栩栩如生，在他是极异乎寻常的——我想，对经济史观的作者而言，不免走得太远了一些。无论积累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摩西及预言者”（1），又无论这样的通词会不会使我们感到可笑——在马克思，这种类型这种风格的论证，常常暗示有某些弱点必须加以掩饰。

② 对马克思来说，储蓄或积累，和“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是同义的。我并不打算和他争论，虽然个别的储蓄的企图，并不必然地并自动地增加实际资本。我觉得马克思的观点比我的很多同代人所持的相反的观点似乎更近于真理，因此我不认为值得在这里对它挑战。

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中，纵令目标是要增加不变部分，特别是李嘉图所称的固定资本部分——主要是机器。

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已指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剥削所得将诱导资本家扩充生产或企图扩充生产，因为根据他们中每个人的立场，这意味着更多的利润。为了这样做，他们就不得不积累。此外，这件事的总后果会使剩余价值因工资率随着提高而趋向于减少，纵使产品价格不会随着减低，因而减少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所十分珍爱的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很好的实例。这种趋势本身对个别资本家来说也会构成他之所以不得不积累的另一个原因^①，虽然这在终局上又会使事情对资本家整体来说变得更坏。因此，即使在否则是静止的过程中，也会有某种逼迫积累的强制性——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明的，除非积累已经使剩余价值减低到零因而摧毁了资本主义本身，这种静止的过程无法达到稳定均衡。^②

然而，远为重要和远为猛烈地逼人的是些别的东西。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也不是仅仅稳步地扩充

① 一般地说，从一笔较小收入中省下来的钱，当然比从一笔较大收入中节省下来的要少些。但是，一笔一定的收入，如果不能指望持久，或如果预料它会减少下来，从中节省下来的钱，将比从已知其目前数额至少可以稳定下去的同样一笔收入中省下来的钱多些。

② 在某种范围内马克思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认为，如果工资上涨因而妨碍了积累时，积累率将减低，“因为获利的刺激减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本来会把它暂时造出来的障碍物除去”。（《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第1节）（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章第1节第618页）现在，资本主义机构平衡自己的这种趋势确实不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它作任何断言，最低限度也需要仔细指明其条件。有趣的是，我们应该称这种论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我们碰巧在其他经济学家著作中遇见它的话；并且，如果它是站得住脚的，它会大大地削弱马克思论证的主旨。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许多论点上一样，马克思惊人地显出了他自信为已经被他粉碎了的，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束缚。

着的。它是从内部不停止地经历着革命的，革命者是新企业，即随时都有新商品或新生产方法或者是新商业机会侵入现存的产业结构。任何现存的结构，和一切经营业务的条件，总是处在变化过程之中。随便哪一种局面在有时间努力完成它的工作以前就被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进步意味着骚动。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篇中见到的那样，在这种骚动中，竞争起作用的方式和它在静止过程中起作用的方式完全不同，不管竞争是怎样地完全。通过生产新东西或通过更便宜地生产老东西而赚钱的可能性，恒常地体现为新投资并引起新投资。这些新产品新方法和老产品老方法相竞争时不是处在相等的条件下，而是处在意味着后者死亡的决定性的有利地位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为了避免赔本出卖，每个企业结局只为被迫学样，也来投资，而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就要把一部分利润作为投资之用，即从事积累。^①于是，谁都积累。

马克思比他同时代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产业变化的过程，更完全地体会到它的枢纽性质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他正确地了解了它的本性，或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对他来说，这种机制会还原成为仅仅是资本的量的机能。他没有妥当的企业理论，他没有能够把企业家和资本家区别开来，以及他的理论技术有缺点，这些就是造成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许多错误的原因。但是仅仅关于过程的见解，对马克思心目中的许多目标来说也已经足够的。如果根据马克思的论点推不出的东西，可以根据另一

^① 这当然不是为技术改进筹款的唯一方法。但实际上这是马克思所考虑的唯一方法。因为它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这里我们可以听从他，虽然其他的方法，特别是向银行借款即创造存款的方法，会产生出它们自己的后果，而且为了画出一幅资本主义过程的正确图画，把它们插到这里来实在是必要的。

个论点推论出来的话，那么上述不合理的推论也就不再成为致命的缺点；甚至一些明显的错误和错误的解释，也时常会因论证过程中的一般主旨的基本正确性而得到补救——特别是它们可以被视为无害于进一步分析的诸步骤，这种分析对不能赞赏这种似非而是的情况的批评家来说，似乎理该受到判决，不能上诉。

前面我们已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因为资本主义过程确在周而复始地生产暂时的超过成本的剩余所得，虽说这种现象在其他理论可用十分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它解释得十分妥当，马克思论积累的下一步，终究不因他先前的失误而完全归于无效。同样，马克思本人没有令人满意地证实积累的强制性，而这对他的论点说来本是十分不可缺少的。但是他的说明上的缺点并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因为按照上面提示的方法，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说明，在这个说明中，除其他事情外，利润的下降会自动地找到它的正当地位。总产业资本的总利润率在长期间中不一定下降，不论是因为马克思的理由，即不变资本总是和可变资本成比例地加强^①，或者因为其他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个工厂的利润不断地由于来自新商品或新生产方法的实有的或潜在的竞争而受到威胁，这种竞争早晚要使它亏本，知道这些也就够了。这

①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利润当然也可以因别的理由，即因剩余价值率下降而下降。这可以由于提高工资率，也可以由于（例如通过立法）减少每天的劳动时间。即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可以说，这会促使“资本家们”用节省劳动的资本货物来替换劳动，因而也会暂时地增加投资，不管有没有新商品或技术进步的冲击。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但我可以举出一件奇怪的意外事件。1837年西尼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工厂法的信》，他在那里试图表明，建议中的劳动日的缩短，将在棉纺织工业中造成利润消灭的结果。在《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3节中，马克思异常猛烈地谴责这本小册子。西尼尔的论点事实上简直是愚蠢的。但是马克思是最不适于说这种话的人，因为西尼尔的论点是完全吻合于他自己的剥削理论的。

样，我们就得到了所需的推动力量，我们甚至得到了马克思的下列命题的类似物：不变资本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因为决没有一个资本货物的集合体是剩余所得的源泉——而用不着依靠他的论证中的妥当性可疑的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由马克思链子的下一个环节，即他的**集中理论**所提供的。这是他关于资本主义过程中扩大工厂和扩大控制单位的规模这种趋势的理论。他在解释中所要提出的一切东西^①，若是去掉它的比喻，那就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平淡的说法：“竞争战是借商品的廉价化来进行的”，商品的廉价“在其他情形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的生产率，劳动的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的规模；所以大资本打击小资本”。^② 这些很象是当代流行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很深刻，不很值得赞美的。它的特别不妥当之处在于它排它地强调了个别资本的规模，而在其后果的描述中，马克思又因他的分析技术不足以有效地处理垄断或寡头垄断而大受妨碍。

可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教派以外的经济学家宣称对这个理论感到钦佩，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即以预言大企业的降临这件事而论，考虑到马克思当时的条件，它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他所做的还有过于此。他巧妙地把资本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结在一起，或者毋宁说把集中看做积累过程的一部分，不仅是它的实际模型的一部分，也是它的逻辑的一部分。他正确地觉察到某些后果——例如，“个别资本的量的增大，成为生产方式本身的不断革命的物质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第2节。〔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章第2节第688页。译文略有变动。——译者〕

② 这个结论，常被称为剥夺的理论，它在马克思学说中是资本家互相摧毁对方的斗争的唯一纯粹经济的基础。

基础”——还有一些至少有一方面的正确性或略遭歪曲的东西。他借阶级斗争和政治这类发电机给这个现象周围的大气充了电——单单这个，就足够使他的解释提高到有关的干巴巴的经济定理之上，对于那些没有任何自己的想象力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最重要的是，他有力量继续前进，无论是他的构图中的个别笔触的力量不够也好，或者按专门家看来他的论证中缺少严密性也好，几乎都不足以阻碍他的前进。因为归根到底，产业巨头们确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势所必然要创造的那种社会局面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5. 再加上两项，这个概略就完全了。这就是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以及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前者中，分析与见解两者失败得无可挽救，在后者中，两者都处于有利地位。

马克思无疑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化途中，群众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在高工资阶层会下降，在低工资阶层也无法改善，这不是因任何意外的或偶然的境遇而发生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必然趋势。^① 作为一个断言，这当然出奇地不妥当，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曾作过艰苦的努力，企图把他们所面对的显然相反的证据处理得有利于自己。最初，甚至在当代某些事例中，他们以惊人的顽强性试图证明这个规律是工资统计所证实了的实际趋势，借以拯救这个规律。其后想把它解释成为不同的意思，也

^① 这里是第一道防线，马克思主义者们，象多数卫道之士一样，习惯于在这类直截了当的陈述后面设置这么一道防线来抵抗批评。正是马克思本人，并不是完全看不见事情的另一面。他多次“承认”工资增涨之类的情况——确实这是谁也不可能不承认的——事情的涵义是，他完全预见到批评者们必将说些什么。这样罗嗦的时常在他的论证中插入大量历史分析的一位作家，自然会比教会中任何一位长老为这种防御工事留下更多的余地。但是，“承认”顽抗的事实又不允许它们影响结论，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使它所指的不是实际工资率或工人阶级所得的绝对份额,而是国民总收入中劳动收入的相对份额。虽然马克思的若干段文字,事实上可以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可是这种说法显然违反了马克思大多数语句的意义。何况,接受这种解释,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因为马克思的根本结论,以按每人计算的劳动的绝对份额必将下降或至少不会增加为前提;如果他真的曾经想到过相对份额,那只会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最后,这个命题本身仍旧是错误的。因为总收入中工资薪金相对份额,逐年对比,变动不大,若作长期观察,则是显著地不变的——它确实没有透露出任何下降的趋势。

可是逃出困难好象还有另一条路。一种趋势,也许不能表现于统计的时间数列中——在这一情况下,统计数列甚至可以表示出相反的趋势——可是这一趋势却是我们正在考查的体系所固有的趋势,因为它可能受到例外条件的遏制了。事实上这正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路线。他们认为这种例外条件是殖民地扩张,或更一般地说是十九世纪以来新领土的开辟,他们认为这个因素给剥削的受难者带来了一个“禁猎季节”^①。在第二篇内我们将有机会接触这个问题。眼前,让我们注意有许多事实给了这个论证某些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支持,在逻辑上它也是无懈可击的,因而可能解决这个困难,如果本来确有这种趋势的话。

但是,真正的困难是,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这个部分是绝不可以信赖的;这里,分析的基础和见解两者的本源都有待于追寻。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理论,即由生产过程的机械化造成失业的理论。^②而产业后备军的理论,又是基于李嘉图论机械那

① 这个观念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虽然已由新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挥。

② 这种失业,当然必须和别种失业区别开来。特别是,马克思指出的因商业活

一章所提出的学说的。马克思的论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然除价值理论而外——象这样赤裸裸地完全依靠李嘉图的学说了。^①我所提到的，当然以关于这个现象的纯粹理论为限。马克思确实和平常一样，添加了许多次要的补充，譬如把不熟练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列入失业概念那种巧妙的概括；他也添加了无限多的例证和辞藻；最重要的是，他加上了动人的舞台面，即他的社会过程的广阔背景。

李嘉图最初倾向于同意一切时代都有的观点：把机械引进生产过程中，一定会加惠于群众。当他渐渐怀疑这个意见，或者，起码当他怀疑它的普遍妥当性时，他就以他所特有的坦率修正了他的立场。作这样的修正时，他也以他所特有的作风追溯到过去，用他所惯用的“想象极端事例”的方法，作出一个为所有经济学家所熟知的数字的例解，表明事情也能变成另一种结果。他一方面并不想否认他所要证明的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是一种不是不会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想否认，机械化通过它对总产量、价格等等的终极影响，最后得失相抵对劳动有利。

所举的例，在它本身范围内是正确的。^②多少精炼化了的现代方法，支持它的结果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既承认它想要建立的可能

动的周期变化而引起的失业。因为两者并不是独立的，又因为他在论证中时常更多依靠后者而不依靠前者，引起了若干解释上的困难，这似乎并不是所有的批评者都充分觉察到的。

① 任何理论家，若不仅切切实实地研究了《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3、4、5节，特别第6节，（马克思在那里处理了补偿理论，本文中已指明）也研究了第24章和第25章〔中译本章次各推前二章——译者〕的，必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后两章中，同一问题穿上不同的服装，重复出现并经过推敲了。

② 或者，可以改正它而不失却其本意，论证中有少数可疑之点，可能来自它的可悲的技术——许多经济学家却喜爱这种技术，想使之不朽。

性，也承认相反的可能性；在提出决定究竟是这个还是那个后果将随之发生的各种表面条件时，现代方法越出了李嘉图的例子的范围。纯粹理论所能做的当然不外乎此。为了预言实在的后果，必需有进一步的根据。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子显出另一种有趣的性质。他考虑一个拥有定量资本，雇用定数工人的企业，它决定在机械化上更进一步。从而它指定工人中某一群体去建造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装置起来时，将使这家企业可以解雇这批工人中的一部分。利润结局还是一样的（在经过竞争的调整，除去任何暂时的盈利之后），但是总收入将减少一部分，其数额恰和先前付给现在已被“恢复自由”的工人的工资额相等。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代替可变（工资）资本的观念，几乎是这种处理方法的精确的复制品。李嘉图之重视由此引起的人口过剩，酷肖马克思之重视剩余人口，这个名词是他常常用作“产业后备军”的替代词的。李嘉图的教义，真是被他囫圇吞枣地全吞进去了。

在李嘉图设定的有限目标范围内看来是合格的东西，一旦考虑到马克思在脆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筑建时，就变得十分不妥当了——事实是，这时候另一个不合理推断的根源，还没有因最终结果的正确见解得到补救。这样的感觉，看来他自己也是有一些的。因为，他以有些奋不顾身的精神，抓住他老师的有条件的悲观结论，似乎后者的想象的极端事例是唯一可能的情况，他甚至以更为奋不顾身的精神攻击发挥李嘉图的关于补偿的暗示的涵义的作家们，那个暗示认为机器时代必将对劳动有好处，即便采用机器的直接后果带来了损害时也是如此。（补偿理论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最厌恶的东西。）

马克思有一切理由走这条路。因为他非常需要为他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找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理论，除一些次要的目的而外，

应该服务于二个根本性的重要目的。第一，我们知道，由于其本身十分可以理解的他的厌恶，他避免利用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理论，这就从他的剥削理论中夺走了我所称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这个支持是由因经常重新产生^①因而经常存在着的产业后备军所代替了。第二，他所采取的关于机械化过程的特殊的狭隘观点，是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中译本是第二十四章——译者〕的著名文辞所不可缺乏的。这一段文字，不仅是《资本论》这一卷的至上结论，也是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至上结论。我将完整地摘引它们——比我们研究的论点所需要的更完整些——以便让给我的读者看一看马克思的态度，它既足以说明某些人的狂信，也说明了另一些人的鄙视。不管它究竟是一些并非事实的事物的混合品，还是先知真理的神髓，原文就是这样的：

“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剥夺的现象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夺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在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了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进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

^① 加满不断的产生当然是必要的。如果象某些批评者那样，认为马克思的用语，说明他认为机械的应用把人们赶上失业，而且失业者会从此失业到底，那是十分不公平的。他并不否认吸收，因此对马克思的批评，凡以证明任何时候被制造出来的失业将重被吸收为基础的，完全是弄错了目标。

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1—842页。——译者)

6. 马克思在经济周期方面的成就，异乎寻常地难作评价。实在可以评价的部分，是几十个短评和注释，多数是偶然性质的，散见于他的全部著作，包括许多信件中。要把这些断肢残骸组织成为一个从未显现为肉身的、甚至除萌芽形式外在马克思心中也许不存在的整个的本体，容易在不同人手里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且这种努力也会由于崇拜者那种可以理解的归功于马克思的倾向而遭受损害——他们以实际上为他们自己所认可的、全是较晚研究的结果，对马克思的周期理论，作适合他们自己心意的解释。

由于马克思对这个主题的万花筒式的贡献的性质，平庸的朋友和敌人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体会到注释家所面临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性质。由于马克思如此频繁地提到它，而且这又显然十分切合他的根本主题，他们认定，必定有某种简单的直截了当的马克思主义的周期理论，可以从他的资本主义过程的逻辑的其余部分中成长出来，好象剥削理论之从劳动〔价值〕理论中成长出来那样。于是他们就着手来寻找这样一个理论；他们到底碰到了些什么是不难猜测的。

一方面，马克思无疑赞扬——虽然他并未十分适当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能力的惊人威力。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强调群众的日益贫困。那么，如果作出结论说，危机或萧条是由于被剥削的群众不能购买永远扩张着的生产设备制造出来的、或准备制造出来的东西，并且利润率因此和因一些无需在这里重述的别的原因，将降到破产的水平，那岂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这么一来，我们似乎真正可以根据我们要强调哪一方面，而选择最可鄙视的消费不足的理论或生产过剩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事实上是被列入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项下的。^①有两种情况可以支持这种分类。首先，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在一些别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学说和西斯蒙第及洛贝尔图学说的亲密关系是显然可见的。这些人确实采取了消费不足观点。推测马克思可能也会这样做，并不是不自然的。第二，马克思著作中若干篇章，特别是包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危机的简短的叙述，无疑适合于他们作这样的解释，虽然恩格斯的话更是如此。^②但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马克思表现了更卓越的判断力，公开地抛弃了它。^③

事实是，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率直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从他的资本主义过程“诸规律”中，也不能逻辑地推论什么出来。即使我们接受他关于剩余价值的发生的解释，承认积累、机械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和过剩人口（后者冷酷无情地加深着群众的贫困）联结成为一条逻辑的链子，链子的最末环节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① 虽然这样的解释已经是一件时髦的事，我将只指出两个作家，其中一个应对一种修正负责，另一个则是这种解释的坚持者：杜干-巴兰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5年版，他谴责以此为根据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他对这种理论有更多的同情。

② 恩格斯关于这点的多少有些平凡的观点，最好地表现在他的论战著作，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1878年）的现已成为社会主义文献中引证得最频繁的篇章中。他在那里所提出的危机形态学的最生动的说明，作为通俗演讲无疑是够好的了，但是他所说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却正处在人们看来还需要作说明的地方。他也赞许地引用了傅立叶的意义自明的辞汇“充血性的危机”所表达的意见。可是不能否认马克思写了第10章的一部分，因此他分担着全书的责任。

我注意到包括在这个概略中的三几个对恩格斯的评论，具有贬抑他的性质。这是不幸的，也不是出于任何想降低这位杰出人物功绩的意图。可是我确实认为应该坦率承认，在智力上，特别作为一个理论家，他远低于马克思。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总能懂得马克思的真意。他的解释，因此必须用得很当心。

③ 《资本论》第2卷，1907年英译本，第476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7—508页——译者〕也见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3章。

大难临头——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找不出一个因素，会使周期波动必然成为过程的一部分，并足以说明繁荣和萧条的**内在交替**。^①无疑，我们手头尽有充分的意外和偶然事件，可以用来补足现在还欠缺着的根本解释。有计算的错误、预期的错误和其他各种错误，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风波，有过度的投机和过度投机的反作用，还有用之不竭的各式各样的“外在因素”。然而，马克思的积累的机械过程是按均一速度前进的——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按照原则它不应该这样——他描述的过程**可能**也按均一速度前进；就它的逻辑而论，本质上就既无繁荣又无萧条。

当然这不一定是一种不幸。许多其他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简单地认为，只要某些具有足够重要性的东西发生了错误，就会发生危机。这也不完全是一种障碍，因为它曾使马克思从他自己的体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他获得了观察事实的自由，用不着对事实横加曲解。从而，他考虑了一批多多少少与此有关联的要素。例如，他不无肤浅地利用商品交易中有货币作为中介的现象——也就是这些，没有更多的了——来使萨伊的关于普遍过剩不可能性的命题归于无效；他利用低利货币市场，来解释以大量投资于耐用资本货物为特征的行业的不成比例的发展；他利用特别的刺激，例如新市场的开放，新的社会需要的出现等，来解释“积累”的突然的迸发。他不很成功地试图使人口增长成为造成波动的一个因素。^②

① 对外行来说，事情的反面似乎十分显著，以致我们纵有无限多的篇幅，要确立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容易的。读者使自己信服这个真理的最好办法是研究一下李嘉图关于机械的论点。那里所描述的过程，可能引起任何数量的失业，可是它不断地发展下去而不会引起制度本身的最后崩溃以外的一种崩溃。马克思大概会同意这个意见。

② 具有这种看法的也不止他一个人。然而期望他结局会发现这种设想的弱点不是不公平的，还应该指明，他对这个题目的评述见于第三卷，因此不能相信这就必定反映了他最后的观点。

他注意到,虽然他并未真正说明,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突发的痉挛式的”,而这是“它的同样突然收缩的序曲”。他机智地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表现在它把仅仅是产业周期的周期性变化的症状的信用扩张与信用收缩看作是它们的原因”。^①那一连串的偶然和意外事件,他当然是要责成它们作出重大贡献的。

这一切都是常识,实质上也是健全的。我们实际上发现了列入认真的经济周期分析的所有要素,整个说来它们是很少错误的。而且,一定不要忘了,仅仅觉察到周期运动的存在,在当时就是一种伟大的成就。许多在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微微觉察到了一些。可是,他们主要地集中注意于可以认作是“危机”的惊人的崩溃上面。他们无法看清这些危机的真正面貌,这就是说,他们看不见周期的过程,危机不过是这种周期过程的附随品而已。他们没有前后左右都看一看,而把危机当作孤立的灾难,是错误、过度、指导上的毛病,或者信用机构有缺点的结果。我相信,马克思是超过这种传统说法,先于——统计的补充除外——克雷蒙·朱格拉的研究工作的第一个经济学家。正如我们已见到的,他虽然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周期的妥当的解释,可是在他心目中对于这一现象是十分清楚的,对于它的机制他也懂得很多。他和朱格拉一样,毫不犹豫地说到“穿插着一些次要波动的”十年的周期。^②他对这种周期的原因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第3节。(参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章第3节第696页。——译者)紧跟着这一段,他向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方向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学者也是十分熟悉的:“结果反过来成为原因,常常再生产它自己的条件的(媒体是我标的)整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偶然事件采取了周期性的形态”。

② 恩格斯走得更远些。马克思的第三卷内的他的若干脚注,透露出他也怀疑到有一个较长期的摆动。虽然他倾向于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繁荣的比较脆弱性和萧条的比较强烈性,解释为一种结构上的变化,而不解释为一个较长波幅中萧条阶段所引起的影响(恰和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在涉及战后发展,尤其涉及三十年代时所做的完全一样),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康德拉节夫关于长期周期的著作的某些先见

究竟是什么发生很大的兴趣，他考虑，这或者和棉纺织工业机械设备的寿命有些什么关系。此外还有很多征兆，说明他对有别于危机的商业周期问题作过专心致志的研究。这已足够保证他处于现代周期研究的先驱者的高级行列之内了。

还必须提出另外一个方面。在多数情形下，马克思以其寻常的意义使用了危机这个术语，他和别人一样说到1825年的危机，或1847年的危机。但是他也以不同的意义使用它。他相信资本主义进化早晚会上演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框架，他认为，在实际的崩溃到来以前，资本主义的运行就开始带着日益增涨的摩擦，显出致命病症的先兆。马克思也用危机这个名词，称呼被设想为多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这个阶段。他并且显示出把那些周而复始的危机，和这种资本主义秩序的独特危机联结在一起的某种倾向。他甚至暗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最后崩溃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应该看作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线索，所以指出下面这两点是必要的：第一，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应该是最后崩溃原因的诸因素，若没有一批额外的假定，不能成为周而复始的萧条的原因^①，第二，这个线索并不能使我们超越下列浅薄的命题一步：“剥夺剥夺者”在萧条中比在繁荣中也许是更容易解决的事情。

7. 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将胀破——或长得太大，大过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这一观念（关于不可避免的灾变的理论）提供了将一个不合理的推论和有助于救出结论的深刻见解结合在一起的最后例子。

^① 读者要使自己能够确信这一点，只需派读一遍第44页的引文。事实上，马克思虽然那么经常地玩弄这个观念，他却避免专心致志于此。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因为按照他所走的路，原不允许失掉这么一个概括的机会。

因为马克思的“辩证的演绎法”是以激发群众走向革命的贫困和压迫的增长为基础的，而他借以建立贫困必然增长这个命题的论点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因而它受到损害，归于无效。此外，若不是体系使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老早就开始怀疑那种认为产业控制的集中化必然与“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命题的妥当性了。第一个借组织得很好的论证说出这种怀疑的是希法亭。^①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重要集团的领袖之一，他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结论，即认为经过集中化，资本主义必将获得稳定。^②我对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准备推迟到次篇。在这里我想指出，在我看来，希法亭走得太远了，虽然正如下面我们还要见到的，在我国目前趋势下，认为大企业“变成了加于生产方式上的桎梏”那种说法是没有基础的，虽然马克思的结论事实上也是不能从他的前提推论出来的。

然而，即使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在现在看来缺点很多，他的结论，就只断定资本主义发展将毁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而论，仍然不失为真理。我相信这一点。当我称那在1847年把这个真理揭露得明白无疑的见解为深刻的见解之时，我不认为我是在夸大。它现在是口头禅了。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施穆勒。施穆勒

① 《金融资本论》1910年。怀疑的基础是一批次要的情况作者据以表明马克思把他自认为已经确立的趋势弄得太过了，并认为社会发展是比马克思所指明的更为错综，远非一致的过程。怀疑当然早已时常出现。只要举出伯恩斯坦就够了，见本书第26章。但是希法亭的分析，并不乞求于足以减轻这种趋势的情况，而是在原则上并依据马克思自己的理由来攻击这个结论的。

② 这个命题，往往（甚至被它的作者）和认为愈往后去商业波动会变得愈缓和的命题相混同。事情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1929—32年不会反驳这个说法），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较大的稳定性，即我们的价格和经济量的时间数列表示出来的比较规则的行为，和资本主义秩序经得住打击的较大的稳定性，虽互相关联，却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并不必然意味着后者，后者也不决定前者。

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顾问官，普鲁士贵族院议员，并不是了不起的革命派也不热中于宣传鼓动。但是他平静地陈述了这一真理。至于因何和如何，他也搁下未谈。

大概没有什么必要细致地做总结了。我们的概略不管怎样不完整，它已足以证实：第一，没有一个全力关心纯粹经济分析的人能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全力注意大胆构想的人能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在市理理论技术的法庭上，判决必定是不利于马克思的。固守向来是不妥当的，且在马克思生前就很快地变为陈旧的分析武器；一长串不合理的推论或者是彻底错误的结论；校正后可以改变基本论断，有时会变成它们的反对物的错误——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正当地用来责难马克思这位理论的技术家。

然而，即使在这个法庭上，由于两个理由，还必须对于这一判决加以斟酌。

第一，虽然马克思是常常——有时候看来是绝对地——错的，但他的批评者也远非常常是正确的。因为批评者中有一些卓越的经济学家，特别因为其中多数人马克思本人无法亲身与之周旋，所以事情是应该记在他帐上的。

第二，应该记在他的帐上的，还有马克思对许多个别问题的贡献，其间既有批评性的也有建设性的。在这样一个概论内，列举它们是不可能的，这里不评判它们。但在我们研究他对经济周期的论述时，已经约略提到了其中的某些论点。我也已提到某些改进了我们关于物质资本结构的理论的意见。在这个领域内他们设计的图式，虽非毫无缺点，在晚近的著作中——那是处处显得十分马克思主义的——再次证明为有用的。

但是，上诉法庭——即使还是限于理论方面的法庭——可能想全部推翻这个判决。因为这里有一个足以抵消马克思理论上的轻微罪行的真正伟大的成就。通过他的分析中全部有缺点甚至非科学的分析，贯穿着一个既不是错误的也不是非科学的根本观念——它不是仅仅关于无数不相连续的个别模式或关于一般经济数量的逻辑的理论观念，而且也是关于这些模式的或整个经济过程所实在具有的前后相继的次序的根本观念；这些模式或整个经济过程，在历史行程中依靠本身力量推向前进，在每个瞬间产生着本身将决定其下一种状态的状态。因此，有着那么多错误观念的作者，也是擎想出即在今天也还是未来的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为了这个经济理论，我们正在缓慢地、吃力地垒上石头、抹上灰泥、积累统计资料和函数方程式。

他不但想到这种观念，他还试图完成它。贬损了他的著作的价值的全部缺点，由于他的论点所要达到的宏伟目标，即令如在若干情况中所显示的那样，并没有充分地克服，也应另作判断。有一件对经济学的方法论说来具有据本的重要性的事他是的确完成了的。经济学家们或者往往自己编写经济史的著作，或者利用别人的历史著作。但是经济史的事实，已被归入另一种学问的领域。如果它们进入理论领域，那仅仅是为了作为例证，或者可能是为了证实结论。事实只不过是机械地和理论混合在一起罢了。现在马克思的混合是一种化学的结合；这就是说，他将经济史的事实引入产生结论的论证之中了。他是第一个头等经济学家，看出并系统地教导别人，经济理论怎样可以转为历史分析，叙述的历史怎样可以转为理论的历史。^①然而他却不曾解决关于统计学方面的类似

^① 如果虔诚的门徒因此主张，马克思为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设定了目标，这个主张是不能轻易驳回的。虽然施穆勒学派的著作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意見的。但是如

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类问题应包含在另一问题之中。这也回答了如下的一个疑问,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按照前章末所说明的方法完成他的社会学体系方面究竟成功到什么程度。这一工作没有成功,但在失败中,它却建立了一个目标和一种方法。

第四章 教师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整个堂皇的综合体又怎么样呢?这不是多余的疑问。如果它是正确的,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整体比各个部分的总和更正确。其次,这个综合体也许已经变青紫为草芥,或化朽腐为神奇(这几乎已在每一点上表现出来),那么整体比它的任何部分的本身也更为正确或更为错误。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只能来自整体的。可是关于后者我们不愿再说什么话。它对我们的意义究竟何在,必须各人自己解决。

我们的时代反对专门研究的冷酷的必要性,因而高声要求综合,呼声之高,又以非专业成分居于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领域为最甚。^①但马克思的体系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综合可以意味着新的光明,它也意味着新的束缚。

果他们进一步主张,只有马克思才懂得怎样使历史合理化,而历史学派只懂得怎样叙述史实而不去理解史实的意义,他们就把事情弄过头了。因为这些人事实上是懂得怎样分析的。如果他们的概括未能概括一切,他们的叙述不够精炼,这些都还是他们的长处。

① 非专业的成分,在这一部分马克思的崇拜者中表现得最强烈,他们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态度走得更远,仍然按票面价值接受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在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集团中,有训练的经济学家和外行间的比例至少是一比三,甚至这个经济学家照例是一个只是本篇引论所规定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礼拜神像,不过在研究工作中,却背向着神像。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论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如何互相渗透着。在意向上,某种程度内也在具体的实践上,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一件事。因此,一切重大的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在两个平面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如果按我们的立场,我们仍可称之为论证的二个平面的话。例如经济学范畴的“劳动”和社会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原则上至少是全等的,在事实上是同一的。又如,经济学家所说的职能的分配——这就是说,关于收入怎样作为对生产性服务的报酬而出现的说明,不管这样一种报酬的获得者属于什么社会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只采取各社会阶级间分配的形式,因而具有不同的涵义。此外,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资本,不过是特定的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资本。同样的东西,如果在工人手中,就不是资本。

这样的分析所增加的活力是不能有什么怀疑的。经济理论的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了呼吸。无生气的定理下降成为 *agmen, pulverem et clamorem* (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并未失却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关于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了;它是描绘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的笔触。这样的分析不仅传达了比经济分析所描述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它也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把各种阶级行动拉进它的画面,不管这种阶级行动是否符合于日常经济业务的常规。战争、革命、一切类型的立法、政府结构的变化,总之,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简单地当作外部干扰的一切东西,和比如说投资于机械、或在劳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一起,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位置——一切东西都包括在一个简单明了的图式之中。

这样的程序同时有它的缺点。受制于这种束缚的概念装置,虽在生动活泼方面有所收获,但很容易在有效性方面有所丧失。

工人——无产阶级这一组概念，可作为一个显著的即使不免略觉平凡的例子。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们服务的一切报酬全都带有工资的性质，不管这些人是头等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或是扫街工人。因为按所涉及的经济现象的立场来说，所有这些收入具有许多共同之点，所以这个概括不是无益的或无结果的。正相反，它甚至可以显出事物的社会学的方面。可是，由于把劳动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我们把它弄得朦胧不辨了；事实上我们是把它从画面上赶走了。与此相类的是，一个有价值的经济定理，可以由于它的社会学的变形，不仅没有使其涵义更趋丰富，却与错误结上了不解之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所以，一般的综合，特别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作出的综合，在较坏的经济学和较坏的社会学中可能很容易发生。

一般的综合，也就是把不同的前进路线的方法和结果通盘协调起来，是一件少数人才能胜任的难事。结果是人们都不去做它，于是我们从受教只看个别树木的学者们那里听到了对于整个森林的不满的喧嚷。但是他们无法体会困难的一部分正在于材料多得令人无所措手足，他们也无法体会综合的森林也许看来极象知识的集中营。

按马克思的路线综合，也就是希望使一切事物都纳入一个简单目标来协调经济学的分析和社会学的分析，当然特别容易看来象知识的集中营。目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论证——是足够广泛的，但是分析工具却是狭隘的。这里确有政治事实和经济定理之间的密切结合；但是这是被迫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两者都透不过气来。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解答了一切难倒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问题；事情倒也真的是这样的，可惜问题被阉割了。这一点，需要再作一些推敲。

刚才我说过，马克思的综合包括了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惯常视为干涉因素的，或视为论据的（就是说他们不打算予以说明而只打算分析它们的作用方法或其后果的那些历史事变，诸如战争、革命、立法变迁，和那些社会制度，诸如财产、契约关系，政府形式等等。这些因素或论据，当然是限定任何研究计划的对象与范围所必要的。如果这些因素或论据没有常常被鲜明地标志出来，这只是因为预计到谁都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体系独有的特色是，它把这些历史事变和社会制度本身纳入经济分析的说明过程之中，或者用行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把它们当作变数，而不是当作已知的数据。

于是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1914年的世界大战，法国的福隆德党、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一个表现、殖民扩张、制度的变革、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全国政策或政党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之内，而这种经济学是要依据阶级斗争、剥削的企图和反剥削的革命、积累和资本结构的质的变化、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变化来找出它的理论说明的。经济学家们不能再满足于给技术问题作出技术性的答案，他应该把人类斗争的隐秘意义教给人类。“政治”在基本事物的研究中不再是可以而且必须抽掉的独立因素，如果它闯进来时，也不再可以随人所好，或者扮演当工程师转过身去时瞎弄机器的顽皮孩子的角色，或者由于被人尊敬地称作“政治家”的哺乳动物中一个可疑种族的神奇智慧，而扮演事情弄坏时天外飞来的救星的角色。不！——政治本身是被经济过程的结构及状态所决定的，它和任何一次商品买卖一样，在经济理论范围内完全变成了各种影响的一种导体。

再说一次，要理解这个正是为我们作了这件事情的综合命题

的魅力，是再也容易不过的了。青年人，和看来上帝已赐给了永恒青春的我们新闻界中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理解这个综合命题的魅力。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他们的好运气，热切企望从这些那些事情中拯救这个世界，唾弃单调得无法描摹的教科书，在情绪上智能上都感到不满足，又不能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什么综合，他们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他们所乞求的东西。这里正好有打开一切最奥妙秘密的锁钥，有指挥大大小小事变的魔杖。他们看见了说明一切事物的图式，它同时是——如果我可以暂时陷入黑格尔主义中去——最一般的和最具体的。他们在人生的重大事件方面用不着再感觉到徬徨了——他们一下子看透了政治上和实业界的这些傲慢的傀儡，原来这些傀儡们对于周围的一切从来都是一窍不通的。考虑一些其他可取之道，谁能责备他们呢？

是啊，当然是的——但是除此而外，马克思综合的这种用处，到底所值几何？我不知道。叙述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或早期工厂立法成就的平凡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忘掉提到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的结构状况。如果他在纯粹理论的教程或论著中没有那么做，那不过是为了作出更简洁更有效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添加的东西，不过是对原则的坚持和借以补充原则的特殊狭隘的理论。这个理论无疑产生了结论，而且还是十分简单干脆的结论。但是我们只要系统地应用它于个别事例，我们就会对所有主和非所有主之间的阶级斗争那种无穷无尽的唠叨，滋长起非常厌烦之感，并且会感到它是不适当的，或者更坏些，感到它是陈腐平凡的——如果我们不信赖这一作为基础的图式，就感到不适当；如果我们信赖它，就感到陈腐平凡。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洋洋得意地指出，马克思对据说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的趋势的诊断是成功的。我们已经

看到,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家都更清楚地看出了走向大企业的趋势,他所见还不限于这一点,他还认识到随之而来的局势的某些特色。我们也看到,在这件事中,见解帮了分析的忙,因而补救了分析中的若干缺点,使综合的意思,比分析的诸辅助成分本身更为正确。但也只此而已。我们还必须举出关于贫困日益增长的预言的失败来与此成就相对比,这一失败是错误的见解和有缺点的分析的联合结果,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事变未来进程的空论就是以此为根据的。谁要是寄托信任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综合,以期理解当前局势与问题,谁就容易陷入绝顶的错误。^①这一点,现在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已经感觉到了。

特别是没有理由摆出这样一付骄傲的样子。好象马克思的综合说明了最近十年[三十年代——译者]的经验。任何长期的萧条或不能令人满意的复苏,都将证实任何悲观的预测,恰如其将证实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一样。在这种情形下,垂头丧气的资产阶级和得意洋洋的知识分子的谈论,产生出一种恰恰相反的印象,由于他们的恐惧和希望,这种印象自然就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实证实了任何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诊断,更未证实这样一种关于后果的推新,即我们所目击的并不是一次简

^①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会回答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对我们时代简直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所以马克思的门徒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强一些。究竟什么也不说好还是说了些错误的话好呢,这个问题姑且存而不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上面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事实上都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虽然大多数是在个别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主张,绝不可能是基于马克思的学说和奥地利学派、瓦耳拉学派、或马歇尔学派的学说的比较之上。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兴趣全然(在一切情况下主要)专注于经济理论。因此这些成就和马克思的综合是不能比的。能与此相比的只是马克思的理论工具,而在这个领域内,比较的结果,全都对他们有利。

单的萧条，而是马克思预期会发生的资本主义结构变化的预兆。因为，如我们将在下一篇中看到的，所有观察得到的现象，例如超过正常情况的失业、投资机会的缺乏、货币跌价、企业亏蚀等等，都未超过诸如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种严重萧条时期的著名模式范围之外，恩格斯对那次萧条作了克制的评论，这对今天热烈的追随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被视为解决问题的自动机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的功过。

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它的全部根子都可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找到，但已由昌盛于本世纪头二十年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加以发展；这个学派与考茨基那样这一信条的老卫士虽未断绝关系，但对仔细检查这个体系作了很多工作。维也纳是其中心，鲍尔、希法亭、艾德勒是其领袖。在帝国主义问题领域内，他们的工作由其他许多人接下去干，只在强调之点上作了一些不重要的改变，其中知名的是卢森堡和施特恩贝格。其论证如下。

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利润就不能生存，它的经济体系没有利润就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个体系本身的作用使利润恒常地在消失中，所以使利润处于活跃状态就成为资产阶级努力的中心目标。我们知道，引起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的积累，是一种虽暂时是以缓和个别资本家的情况，但结局却使事情变得更坏的补救办法。所以资本由于日益下降的利润率的压力（我们记得，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増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工资趋涨，工作日缩短，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不得不在还有劳动可以任意剥削而其机械化过程还没有走得很远的国家中寻找出路。这样就有了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

出。这种资本输出主要是资本设备的输出，或可以用来购买劳动或换取能购买劳动的东西的消费品的输出。^①但是它也是这个名词的通常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出口商品决不会用进口国家的货物、劳务或货币来支付，至少不会直接用这些东西来支付的。但如果为了保卫投资、抵御当地的敌对的反应——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为抵御它对剥削的反抗——并抵御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使这个不发达国家沦于政治上隶属的地位，则这种资本输出就变成殖民主义。这一般是由武装力量来完成的，武装力量或由殖民资本家自己提供，或由他们的本国政府提供；本国政府这样就符合于《共产党宣言》所规定的定义：“现代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当然，这种武装力量不会只用于防卫的目的。将要有征服，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磨擦，以及敌对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互相残杀的战争。

另一个要素使这个帝国主义理论完备到现在常见的样子。只要殖民地扩张是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益下降的利润率所引起的，它将发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更喜欢说成它的最后阶段。因此它将和资本主义之高度集中地控制产业同时发生，也和作为中小型企业时代特征的那种竞争的衰征同时发生。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很强调由此引起的走向垄断性的产量限制的趋势，和继之而起的为了反对来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越境猎人而在国内采取保护措施。

^① 想想卖给酋长们抵付奴隶价款的，或用以抵付雇用本地劳动所用工资货物的奢侈品。为简略起见，我不顾及这样的事实，即这里所说的这种资本输出，一般将作为两国间总贸易的一部分而发生，这种总贸易也包括和我们所想的过程无关的商品交易在内。这些商品交易当然大大促进了资本输出，但并不影响它的原则。我也不谈其他类型的资本输出。现在所研究的理论原不是、也并不企图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

施的趋势。也许因为他是一个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因而不能过分信赖这种论证方法。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却乐于利用它。于是我们不仅得到了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个刺激因素和帝国主义纠纷的另一种泉源，而且也得到了一种副产品，即关于现代保护主义——它本身并不必然是帝国主义的现象——的理论。

注意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套钩，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明更为困难的问题时是很有帮助的。当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我们所考察的那种资本输出就将减少。于是会开始一个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用制造品交换原料的时期。但是最后当殖民地的竞争在宗主国内显露锋芒时，制成品的出口也一定会衰微下去。阻滞这种事态发生的企图，进一步提供了老资本主义国家和它的殖民地间的磨擦、独立战争等等的其他根源。但是，无论如何殖民地的门户最后一定会对宗主国资本关上的，宗主国资本于是不再可能从国内日益下降的利润率逃到海外的丰饶草原上去了。缺乏出路，生产能力过剩，完全的停滞，最后是国民经济破产的有规则的周而复始，还有其他许多灾难——也许是从资本主义的彻底绝望中产生出来的世界战争——都是可以极有把握地预料到的。历史就这么简单。

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如何企图解答问题，并借此取得权威的一个美妙的例子，也许还是最好的例子。全部事情看来是从牢固地镶嵌在这一体系基础之中的关于级阶的理论和关于积累的理论这两个前提漂亮的推论出来的。我们时代一系列重要的事实似乎完全可以归因于它们。国际政治的整个迷宫，通过一个分析的有力笔触，似乎完全廓清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到本质上总是一样的阶级活动，为何和如何根据只能决定策略方法和术语用法的诸条件的不同，有时采取政治行动有时采取营业活动的形式。假定一群资本家所支配的手段和机会不变，如果进行借贷

更有利，那就会进行借贷；如果进行一次战争更有利，战争就会发生。战争也象贷款一样可以进入经济理论。甚至纯粹的保护主义，现在也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中成长起来了。

而且，这个理论充分表现出一种它和通常被称为应用经济学领域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概念所共有的优点。这就是它和历史的和当代的事实密切结合。也许没有一个读过我这概略的读者，对于支持这一论证每一步的历史证据多得那么俯拾即是，会不感到惊讶。难道他没有听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欧洲人对土著工人的压迫，没有听到过例如中南美洲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手中遭受的苦难，没有听到过奴隶猎捕、奴隶贸易和苦力劳动吗？资本输出不是实际上老是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吗？资本输出不是几乎不变地带来使土著屈服并和别的欧洲强国斗争的军事征服吗？殖民事业即使完全由企业公司如东印度公司或英属南非公司来管理，还不是时常具有颇为显著的军事的一面吗？马克思自己所想望的例证能有比西尔·罗得斯和布尔战争更好的吗？殖民野心至少是欧洲纠纷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从1700年左右以来就是如此，这不是极明显的吗？至于说到现代，谁没有一面听到“原料战略”，另一方面而又听到热带地区土著资本主义的成长对欧洲的反击？如此等等。至于保护主义——啊，那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了。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慎重一些。通过表而上证据确凿但未经详细分析的有利实例所得的证明可能是很靠不住的证明。此外，每个律师和每个政治家都懂得，有力地诉之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大有助于诱导陪审团或议会接受他希望使他们相信的一种推定。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技术。在这个例子中，此举尤为成功，因为有关的事实，同时具有这样两种好处：每个人都肤浅地知道它们，但只有极少数人对它们有透彻的了解。事实上，我们在这里虽

不能作详细的研究，可是即使是匆促地想一想，已足够引起“事情并不如此”的怀疑了。

关于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在下一篇中将作一些评论。现在我们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输出、殖民地和保护主义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它作为一个关于我们在使用[帝国主义]这个不精确而误用的名词时联想到的一切现象的理论是否也正确。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规定帝国主义的意义，使之和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涵义恰恰相同；我们也可以自承深信所有这类现象是必定能够按马克思主义方式说明的。但是，这时，帝国主义问题——假定理论本身是正确的——只能同义反复地加以“解答”。^①但是，究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就这个问题来说，任何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能不能达到并非同义反复的解释，仍然有待于考察。可是，我们在这里用不到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稍加考察，这个命题的基础就崩溃了。

初看起来，这个理论似乎相当适合于某些事例。最重要的例子是英国与荷兰对热带的征服。但是它对于诸如新英格兰的移民

① 这个硬塞给我们的空洞的同义反复的危险性，若千个别事例可作最好的例证。法国用武力征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资本主义势力强制它们这样做。事实上，这种势力的出现是很难成立的托辞，这种势力的随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进行得很不令人满意，而且是在政府压力之下进行的。如果这看来是不很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说，这种行动是在潜在的或预期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压力之下采取的，或者说，归根到底，其主要原因“必然”是某种资本主义势力或客观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可以探求作确证用的证据，这种证据决不会完全缺乏。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势力和其他势力一样，事实上会受任何局势的影响，也会利用这种局势；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机构的特殊条件，总会表现出和这种民族扩张政策联结起来时并不荒谬的某些特色。显然，使我们进行这样一种难搞的工作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信念，而不是别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搞这种工作。我们确实用不到找这种麻烦；我们大可以说一声“事情一定如此”，随后就丢开不管。我所指的同义反复的解释就是如此。

之类的例子就完全不适合。甚至前一类型事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并不描述得令人满意。很明显，只认识到赚钱的诱惑在推动殖民地扩张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够的。^①新马克思主义者并无确认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陈腐平凡之论的意思。如果这些事例对他们有用的话，那么，殖民地扩张也就必需是，按前已指出过的路径，因资本积累对于利润率的压力而发生的，因而它是衰败中的，起码是充分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色。但是殖民地冒险的英雄时代，恰恰是早期的和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积累还才开始，任何这样的压力——特别还有那些对国内劳动的剥削的障碍——显然是不存在的。而垄断因素并不是不存在的。相反，它比今天远为明显。但是，这件事不过增加了那个推断的荒谬性，这个推断原是使垄断与征服两者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

此外，理论的另一条腿，阶级斗争，情形并不好些。一个人必须戴上眼罩才能集中目力于殖民地扩张的这一方面，这一方面原是只起二等角色的作用的；他也必须戴上眼罩才能用阶级斗争去分析提供了若干阶级合作的最动人例子的现象。这是提高利润的运动，同样也是提高工资的运动，而在长时期内，它之加惠于无产阶级（部分由于对土著劳动的剥削），确实比加惠于资本家为多。但是我不想强调它的结果。重要之点是，它的成因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和阶级结构的关系最多也不过是涉及属于、或通过殖民事业而上升到资本家阶级的那些集团或个人的领导权的关系。如果我们甩掉眼罩，不再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单纯的附随品，则在这个问题中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所余无

① 强调每个国家实际上确实“剥削”了它的殖民地这一事实也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被另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所剥削（一个国家的全部阶级剥削另一个国家的全部阶级），这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剥削完全不是一回事。

几了。亚当·斯密关于本问题要说的话说得一样好——事实上是更好一些的。

还没有谈到那个副产品，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保护主义理论。古典文献充满了对于当喧嚷着要求保护时对公共福利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的“有害的帮派”——那时候主要是农业派，但决不完全是农业派——的诟骂。所以古典派是有一个顺理成章的关于保护主义成因的理论的——不仅仅是关于它的后果的理论。如果我们现在加上现代大企业的保护主义派的话，我们已经走到这个理论的合理范围的尽头处了。和马克思主义共鸣的现代经济学家们不会真的愚蠢到说，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同事们即在今天也没有看出保护主义趋势和大企业控制趋势间的关系，虽然这些同事也许并不总是认为有必要强调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并不是说古典派及其今天的继承者关于保护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对此的解释过去是、现在还是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片面的，且不说他们对后果和所涉及的利益的估价往往是错误的。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所懂得的保护主义中的垄断成分他们至少已经懂得了有五十年之久了。考虑到这个发现的平凡性，知道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古典派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优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论他们的经济学的价值的大小——也许是不大的——他们最爱好^①的是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长处。认为许多保护关税的存在，是出于那些想利用它们来使自己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原

^① 他们并不老是使自己局限于他们的经济学。当他们不局限于经济学的时候，其结果决不是令人鼓舞的。詹姆斯·穆勒的纯粹经济学著作虽不特别有价值，却不能简单斥之为极度低水平的。实在胡扯——而且是平凡的胡扯——的，是他论政府和有关主题的论文。

有价格、以便在国外卖得更便宜一些的大企业的压力的那种主张，是一种陈腐的滥调，但很正确，虽然从来没有一种关税，整个地或即使是主要地出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才使它成为不妥当或错误的。如果我们只是想了解现代保护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部原因和涵义，那末它是不妥当的。举例说，美国人只要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总是顽强地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不是由于他们有所爱于大企业或受治于大实业，只是出于建成和保持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并摆脱世界其余部分的盛衰变化的热烈希望而已。忽视这种因素的综合命题，不是一宗资产，只是一笔负债。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现代保护主义的原因和涵义，不管它们是什么，缩小为现代产业中的垄断因素，视其为唯一的主要原因，并从而系统地表述这个命题，那它就是错误的。大企业有力量利用群众的感情，并且也培养了群众感情；但说它创造了群众感情则是荒谬的。产生出——我们应当说，当作当然之理面设定——这种结论的综合，还不如全无综合。

如果我们公然不承认事物和常识，把这种资本输出和殖民的理论捧成国际政治的基本解释，因而国际政治就分解为一方面在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另一方面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则事情就会更糟。这类东西可以成为有用处的宣传文献，否则的话，它不过表明了童话并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品。事实上，大企业——或从福格尔到摩根这一类金融资本家——所施加于外交政策上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而在这种大实业家或银行家们大显身手的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天真幼稚的客串都以失败告终。资本家集团对他们国家政策的态度，主要是适应性的而不是成因性的，今天更甚于往昔。而且，他们的态度在惊人的程度上专注于短期考虑，任何深谋远虑的计划和任何明确

“客观的”的阶级利益，对他们来说是同样遥远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堕落到群众迷信的表述者的水平上去了。^①

在马克思主义结构的各个部分中，还有类似情况的其他事例。其中之一是前面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引的关于政府性质的定义。定义中确有真理成分。在许多事例中，这个真理可以说明政府对于比较明显的阶级对抗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但是，就真实性这一点而论，具体化于定义中的理论却是平庸的。值得为之讨论一番的倒是，这个理论未能符合于事实，或者即使符合，也未能正确地描述这些“管理资产阶级公共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的大量实例是因何和如何发生的，再者，实际上在一切情况中我们都能使理论在用同义语反复地说来时成为正确的。因为除了根本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以外，没有一种政策不能用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某些经济的或超经济的、短期的或长期的利益，至少就它挡住了更坏的事情来说是如此。可是，这并不能使这个理论具有更多价值。但是让我们转向关于马克思主义综合的解答问题的能力第二个例子上去吧。

科学社会主义，按马克思的说法，它的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在于它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不管人们的意志和愿望如何。前面已指出过，这个命题的全部意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由

① 这种迷信，和许多可敬而头脑简单的人所怀抱的另一种迷信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人在向自己解释现代历史时，往往根据这样一个假设，即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由极度聪明但也极为恶毒的犹太人组成的委员会，躲在幕后控制国际政治，也许是一切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种迷信的牺牲者。但是他们的迷信，水平不见得高些。说来好笑，当我面对这两种学说的随便那一种时，我总觉得极难采取能使我自己满意的好方式来应付。这不仅由于对一些事实性质的断言往往难于作出确定的否认。主要的困难还在于，人们不仅缺少关于国际事务及其人物的第一手知识，同时也缺少能够察觉荒谬性的器官。

于其本身逻辑的性质，趋向于毁灭资本主义的事物秩序，并产生出社会主义的事物秩序。^①马克思在证实这些趋势的存在上成功到什么程度呢？

关于自我毁灭趋势这个问题，前面已经答复过了。^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将由于纯粹经济理由而不可避免地崩溃的学说，从未被马克思所证实，希法亭的异议足以表明这一点。一方面，对正统派的论点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关于未来事实的若干命题，尤其是关于贫困和压迫的不可避免的增长的那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即令它们全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也不一定是能从这些命题中推论出来的。但是在资本主义过程趋向于发展的情况中的其他因素，和资本主义的最后结局本身，马克思都是正确地看到了的。后者是我希望加以说明的，可是必须用别种表现方法来代替马克思的表现方法，而“崩溃”这个名词那时候也许会被证明是一个误用的名词，特别如果把它理解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动机破损而形成的崩溃的话；但是这并不影响学说的本质，不论它会使它的公式和某些涵义受到多大影响。

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秩序或任何别种事物的秩序显然可能崩溃——或者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胀破它——但是社会主义的凤凰未必会从它的灰烬中升起。也许会有混乱，并且，除非我们把资本主义的任何无混乱的代替品都解释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可能性。普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起码是布尔什维克出现以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指望的那种社会组织，确实只是许多可能情况中的一种而已。

① 又见第2篇小引。

② 见前，第3章第7节。

马克思本人，虽然很聪明地抑制自己没有详细地去描述社会主义社会，却强调了它出现的条件：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产业控制单位——这当然会大大地便利社会化；另一方面，存在着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但人数众多、有纪律、团结一致、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最后的决战，这是两个阶级间持久战争的剧烈阶段，是双方对峙的最后一次。它也暗示了其必将来到的一些事情：它暗示了这样的看法，即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将“接管”，并经过它的专政，结束“人对人的剥削”，建成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千年至福信条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那末说了这些确已足够了。因为我们当前所涉及的不是事情的这个方面，而是一个科学的预见，显然这是不够的。施穆勒所处的地位显然要安全得多。因为他虽然也拒绝涉及细节，他显然把过程摹想为一个逐渐官僚化和国有化等等的过程，其结局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论我们喜欢它与否，至少它表示了明确的意思。所以，纵令我们承认马克思的整个崩溃理论，他也不能使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转为确实性；如果我们不承认崩溃理论，他的失败更是当然之事。

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我们接受马克思的推理还是接受任何其他推理——社会主义秩序都不会自动地实现；即使资本主义发展按照设想得到的最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为它提供了一切条件，仍然必须有特殊的行动才能够实现它。^①这当然是符合于马克思的教导的。他的革命，不过是他的想象力所喜爱的、加在这种行动身上的特殊服装而已。强调暴力，对一个在其思想定型年代中经历了1848年的一切骚动、而且虽十分有能力蔑视革命的空论，

① 见第3篇第5章。

却从不能摆脱它的桎梏的人说来，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他的大部分听众大概不会愿意听取缺少那种响亮号召的道理。最后，虽然他看出，至少对英国说来，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他也许并不认为真有这种可能性。在他的时代中，这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的，而他所珍爱的关于严阵相对的两个阶级的观念，使他更难于看到这一点。他的朋友恩格斯实际上特意研究战略问题。但是，虽然革命可以被贬黜为非本质的问题，特殊行动的必要性依然还存在着。

这能不能也解答他的门徒何以划分为革命派和进化派的问题？如果我已经领悟了马克思的意思，答案是不难得出的。对他说来，进化是社会主义的生身父母。他受到社会事物固有逻辑这一想法的感染如此强烈，以致不能相信革命可以代替进化所作工作的任何部分。然而，革命仍然是要来的。但是革命的来到只是为了在一整套前提之下写出结论。所以，马克思的革命在其性质的职能上全然有别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密谋者的革命。它本质上是瓜熟蒂落的革命。^①的确，不喜欢这个结论，尤其是不喜欢把它应用于俄国的事例的门徒们，^②可以在圣典上指出很多似乎和它矛盾的章节。但是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本人和他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是矛盾的；《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正确无误地说出了这种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和任何由事物固有逻辑的感觉所启发的思想一样，必将——在可疑的宝石的古怪闪光底下，带

① 应该注意这一点，稍晚我们还要论到它。我们将再三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并且将和其他若干问题在一起，论究这个“瓜熟蒂落”的标准。

② 卡尔·考茨基，在他给《剩余价值学说史》所写的序言中，甚至断言1905年的革命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然十分明显，少数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与此有关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

有显然保守的涵义。再说，到底为什么不该如此？从来没有一种严肃的论证无条件地支持过什么“主义”。^①说马克思在去掉一些废话之后容许对他作出保守意义的解释，这不过是说，他是可以被严肃地对待的。

① 这个论证可以进一步加以引伸。特别是，在劳动价值理论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熟悉这个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人，当然会承认这一点。但是这对剥削理论同样是正确的（当然除去措辞）。我们只要承认，马克思称之为剩余的存在，是——至少过去是——我们包含在文明这个名词中的一切东西的出现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是难于否认的），而我们现在认识到这点。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并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仅仅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够的。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结论可印铸于任何科学的理论之上；没有一种科学的理论必然包含它们。而且，没有一种理论会使我们处在萧伯纳在某个地方所称的社会学热狂之中，除非它的作者逸出他自己的轨道，为的要刺激我们使我们昂扬起来。

第二篇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

小 引

资本主义能活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它能活下去。但是象任何其他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一样，我这个意见本身完全是索然无味的。评价任何社会预测，不应以汇集事实和论证而得出的结论是或否为根据，而应以事实与论证本身为根据。它们包括着一切在最后结论中合乎科学的东西。此外的一切都不是科学，只是先知的预言。分析，不论是经济的或是非经济的，除了关于可以观察的模式中表现出来的趋势的陈述而外，永不会产生更多的结果。分析永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模式将要发生些什么，它只告诉我们，那些趋势如果象在我们所观察的时期中那样继续活动，又如果没有别的因素闯进来时将会发生些什么。“不可避免性”或“必然性”的意义决不会超过这一点。

读后面的论述时必须记住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的结论及其可靠性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社会生活过程是那么多的变数的函数，许多变数是不可量度的，所以，甚至仅仅对一定事物状态所作的诊断也会变成可疑的事，且不说当我们企图作预测时就会暴露出来的各种错误的可怕的来源了。可是这种困难不应被夸大。我们将发现，画面中占统治地位的特色，分明支持某些推断，而这些推断又是如此坚固，以致不论添加什么附加条件，总不能因为它不象欧几里德的命题那样之能证明而予以忽视。

在我们起程之前还有一点要说一说。我努力想确立的命题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现实的与未来的成就大得足以否定认为它将在自己的经济失败重压下崩溃的观念，正相反，正是它的成就破坏了维护它的社会制度，同时“无可避免地”创造了它活不下去的诸条件，这些条件强有力地指定社会主义为第一继承人。所以我的最后结论和大多数社会主义作家，特别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是没有分别的，虽然我的许多论点是和这些作家不同的。但是要接受这个结论，不一定需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预测，并不意味着他喜欢他们断定的事变进程。如果一个医生预告他的病人马上要死，这并不就是说他愿意他死。一个人可以憎恨社会主义，或至少可以用冷酷的批判态度对待它，可是他可以预见它的降临。许多保守主义者过去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为了要合格地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人们也并不必需接受这个结论。一个人可以爱好社会主义，热忱地相信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可是同时仍然可以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蓄有任何趋于自我毁灭的倾向。事实上有一些社会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秩序一直在蓄积力量，掘壕自固，所以希望它崩溃是幻想。

第五章 总产量的增加率*

我们马上要加以说明的资本主义的敌对气氛，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就提出一个合理的意见，比没有这种敌

* 这里所说的“总产量”(Total Output)和本书第28章所说的国民生产毛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显然是一回事，和我因习惯上所称的总产量或总产值截然不同，不能混淆。——译者注

对气氛时要困难得多。现在公众对资本主义已变得如此彻头彻尾不感兴趣，以致把对资本主义和它的全部工作的谴责看做是一种预定的结论，几乎是研究礼仪上的必需了。每个写作者或发言者，不管他的政治偏好如何，谁都忙着遵守这种惯例，强调他的批评态度，强调他的从“满意心情”中摆脱出来，强调他对资本主义成就的不妥当性的信念，强调他对资本家的反感和对反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同情。其他态度，只会被评论为不仅愚蠢，而且反社会，并被视为不道德的奴颜婢膝的一种表示。这当然完全是自然的。新的社会宗教常会有这样的效果。不过这就使分析者的任务不能那么容易完成了；公元 300 年间，向一个热烈的基督教信徒阐明古代文明的成就也不会是容易的事。一方面，最明显的真理从一开始^①就干脆不被理睬，另一方面，最明显的错误陈述却得到宽恕或博得喝采。

经济成就的第一个检验标准是总产量，一个单位时间——一年、一季、一月——内所生产的全部商品及劳务的总额。经济学家们试图利用根据代表个别商品产量的若干组数列编出的指数来量度这个数量的变化。“严格的逻辑是一位严酷的主人，如果谁尊重它，谁就永不会编制或使用任何生产指数”^②。因为不仅编制这种指数的资料和技术，而且按照不断地变化着的比例出产出来的各种不同商品的总产量这个概念也是十分可疑的东西^③。不过我相信，这个工具可以充分可靠地给我们一个一般概念。

① 可是还有另一种处理明显的然而不舒服的真理的办法，那就是嘲笑它平凡琐屑。这样的嘲笑所起的作用可以和反驳一模一样，因为普通听众照例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事实：它往往掩盖了否认的不可能性——社会心里的一个美妙范本。

② 伯恩斯坦：《1870 年以来美国的生产趋势》，第 262 页。

③ 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在下章我们再度碰到它时，将略略说到一些。较详细的论述见我的《商业周期》第九章。

在美国，有内战以来的既多且好的可资利用的各种数列，足以保证编制这样的生产指数。我们从所谓戴伊-珀森斯总产量指数^①中获悉，1870—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3.7%，其中制造业为4.3%。让我们集中注意于前一数字，领会它的意义何在。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先作一个校正：工业的耐用设备往往增加得快些，可用于消费的生产量不能跟总产量按同比例增加。我们必须酌量为此留下余地。但是我相信，留1.7%是够多了^②；因此，“可用产量”得2%（复利）的年增长率。

现在假定，在192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发动机保持这个生产增加率。对于这个假定有各种各样异议，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但决不能根据下列理由而加以反对：在1929—1939这十年中，资本主义已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自1929年末季开始到1932年第三季为止的萧条，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推进机制发生了长期性的障碍，因为这样严酷的萧条曾经一再发生过——粗略地说每五十五年一次——同时因为其中之一（即1873—1877年那一次）的结果已经算到上面那2%的年平均率中去了。1935年的常态以下的复苏，到1937年为止的常态以下的繁荣及其后的暴跌，很容易用适应到新财政政策、新劳工立法，以及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的总的变化时容易发生的困难来说明。所有这些，按后面我们规定的意义，都是可以和生产结构自身所做的工作区别得开的。

因为在这点上的误解是特别非所愿望的，我希望强调：上文末句，本身并不意味着对新政各种政策的非难，也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个命题：这种类型的政策，就长期来说，是与私营企业体系的有效

^① 见珀森斯：《商业周期预测》，第十一章。

^② 留这么些，事实上已多得背理了。密尔教授对1901—1913年估计为3.1%，对1922—1929年估计为3.8%。（建筑业在外；《美国的经济趋势》，1932年）

活动互不相容的——后面这个命题我相信是正确的，但现在我还用不着它。我现在所要指出的是，社会景色如此广泛而急剧的变化，自然会在一个时期内影响生产成就，这么大的影响，最热心的**新政人物**是一定要承认而且也能够承认的。我本人就看不出否则怎能说明这样的事实：即有最好的迅速恢复机会的国家却正就是最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恢复的国家。唯一有些类似的事例，法国的事例，支持这个推断。因此，1929—1939 这十年中的事变的进程，本身并不构成拒绝听取当前论点的强有力理由。当前的论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用以说明过去成就的意义。

那么，假定 1928 年以后可用产量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条件下象过去那样（即长期平均年增加率达 2%）继续发展下去，则五十年后，在 1978 年，将达到 1928 年数字的 2.7 (2.6916) 倍左右。为了把它译成**总人口中每人平均实际收入**，我们首先注意到，我们的总产量增加率，可能粗略地等于可资消费的私人货币收入总和的增加率^①，这个数字是已经按消费者持有货币的购买力变动校正过了的。第二，我们必须形成一个预期的人口增加的观念，我们将选取斯隆的估计，即 1978 年为一亿六千万人。因此在这五十年间每人平均收入将增至略多于 1928 年数额的二倍（1928 年是 650 元）或增至 1928 年购买力水平的 1300 元。^②

① “消费”，包括取得耐用消费者货物，如汽车、冰箱、住宅。我们并不把易耗消费者货物与有时称为“消费者资本”的那些东西区分开来。

② 这就是说，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将按年复利率 1 $\frac{1}{2}$ % 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内，英国的情形也是这样，总人口中每人实际收入几乎完全按这个比率增加。（见斯坦普勋爵：《财富与纳税能力》）不能过分信任两者间的一致。但是我想，这可以表明我们的小小的计算，并不过分荒谬。在《全国产业会议局研究丛书》241 号第 67 页，表 1，我们发现由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整理的“每人实际国民收入”额，及全国产业会议局的生活费指数，1929 年略高于 1829 年数字的四倍。——它的确实性虽然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怀疑，但是结果是相同的。

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关于货币收入总额的分配，还得加上一条但书。直至四十年前，马克思以外的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资本主义过程趋向于变化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以至根据我们的平均数得出的显著的推断可能因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归于无效，至少相对地无效。但是这样的趋势是没有的。不管我们对为此目的而编成的统计测定有什么想法，下面这些大部分是确实的，用货币表示的收入的金金字塔结构，在我们资料所涉及的时期内——在英国包括整个 19 世纪^①——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工资与薪金的相对份额，在这期间实质上始终不变。只要我们在研究的是，如果听其自然，资本主义发动机会做出些什么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收入的分配，或我们的平均数的分布情况 1978 年的会和 1928 年的有重大的区别。

可以这样来说明我们的结论：如果资本主义在 1928 年后的半个世纪中重复它过去的成就，那就可以消灭按现在标准可称为贫困的一切东西，即使在人口的最低层中也会如此，例外的只有病理学的事例。

事情还不止此。不论我们的指数是否适合于其他东西，它确实没有夸大实在的增加率。它的确没有算上可以随意支配的闲暇这种商品。指数中漏掉一些新商品，有些新商品因为指数必须主要以基本产品或中间产品为基础，因而在指数中只能作不充分的表示。由于同一原因，质量上的改进几乎完全无法表示出来，虽然在好些方面它们构成所得的进展的核心部分——没有办法适当

^① 见斯坦普前书，在有足够统计资料的所有国家，可以见到同样的现象——如果我们清除在现有资料所涉及的时期中各种为期限不同的周期的影响的话。帕累托发明的收入分配的测度方法（或收入不平均程度的测度方法）是有异议余地的。但是事实本身和这个方法的缺点是两回事。

地表明 1940 年的汽车和 1900 年的汽车的区别，或表明汽车每单位效用的价格跌落到何种程度。估计定量原料或半成品效用的增加率差不多是完全做得到的——一个钢锭或一吨煤在物理质量上可能无所变更，可是其经济能率已比六十年前增加一倍。但是人们没有在这个方面做什么工作。我无法想象，假如有一种方法能把这种因素或其他类似的因素加入我们的指数并且校正它，我们的指数将改成什么样子。可是，变化的比率会提高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在我们的估计中已有了一笔准备，足使采取的估计经得起任何想得到的下降的修正的影响。此外，即使我们有测定工业品技术能率变化程度的手段，这种测定仍然无法表达关于它对人的尊严，或人生的充实或快乐——老一代经济学家包括在欲望的满足这个题目下面的一切东西——有什么意义这一观念。可是对我们来说，归根到底，正是这些才是我们关心所在，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的“出产品”，是我们何以对生产指数，和进入指数的磅、和加仑发生兴趣的理由，这些磅和加仑本身，本来是不值得这样注意的。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 2% 来。为了正确估计这个数字的价值，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注意。上面我已指出，粗略说来，过去一百年间国民收入中各相对份额实际上恒常不变。可是，只有当我们用货币来衡量时，这才是正确的。因为是用实物来衡量的，所以各种相对份额实质上已经发生有利于低收入集团的变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动机从头到尾是大量生产的发动机，它必然同时意味着为群众的生 产，同时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愈高，耗费在其价格大体上是工资率的函数的人身服务和手工制品上的比例就愈大。

证实它是容易的。毫无疑问，现代工人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

正是路易十四本人极喜欢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东西——现代牙医即为一例。可是，整个说来，这样高水平的个人收入从资本主义成就中获得的好处实在是不多的。即从旅行上的高速度这一点而论，它对一个十分高贵的绅士来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电力照明，在有钱可买大批蜡烛，有钱雇仆人照管它们的人，不是一项重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与人造丝织品、鞋、汽车等等，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的成就，它们照例不是一些对富人生活极有意义的改进。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成就一般不在于为王后们准备更多的丝袜，而在于稳步地减低生产上的耗费，使丝袜成为工厂女工能够买得起的东西。

如果我们概观经济活动的长期周期，这一事实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对经济活动周期的分析，比任何其他东西能更好地透露出资本主义过程的本质及其机制。每个周期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效果的吸收。举例说，我们能够从统计上和历史上看到——现象如此清楚，以致纵使我们的资料极不完备，也足以证实——1780年代末兴起的第一个长期周期，波峰在1800年左右，它的波谷在1840年代初已经过去，接着就开始了复苏。这就是教科书作家心爱的**产业革命**。跟踪而来的是另一次这样的革命，产生了另一次长期周期，来潮于四十年代，登峰造极于1857年之前，退潮于1897年，随着来的是1911年左右达到顶峰的那一次，现在正在退潮之中。^①

这些革命，经过采用新生产方法（机械化的工厂、电气化的工厂、化学合成和类似的东西），新商品（如铁路服务，汽车、电气用具），新组织形式（产业合并运动），新供应来源（拉普拉塔的羊毛，

① 在商业周期文献中，这个长期周期最初是与康德拉节大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美国的棉花，加丹加的铜），新商业路线及销售市场等等，周期地改造现存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变动过程，惹起了决定产业界一般基调的浪潮；当这些事情全发动起来时，就有了活泼的支出，和占优势的“繁荣”——干扰无疑是有的，来源是叠置在这种长期波动上面的短期波动的负的周相——当这些事情完成了，它们的后果都倾注出来了，就会有产业结构中各种古老成分的消失，和占优势的“萧条”。这样，就有了价格、利率、就业等等的上升和下降的诸长期周期，构成了生产结构的周而复始的返老还童过程的机制的各个部分。

每次这样的运动，其结果总形成一次永久加深拓宽实际收入川流的消费者货物的涌流，虽然这种结果首先会带来骚动、亏本和失业。而如果我们观察这些大批涌到的消费者货物时，又会发现每次涌到的总是一些群众消费品，它们增大工资元的购买力，甚于增大其他各种“元”的购买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过程不是由于巧合，而是由于它的机制的本质，逐渐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它是经过一系列兴亡交替来这样做的，其严酷的程度恰与前进的速度成比例。但是它做得很有效率。一个又一个向群众供应商品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能生产这些商品而成功地得到了解决。^① 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住宅问题，由于利用预制构件的建筑方法，也已接近解决。

事情还不止此。评价某种经济秩序，如果停留在相应的经济传送器传送给各个社会集团的产品上，而不考虑这个传送器虽未直接提供但为此而提供了政治手段和政治意志的那些东西，以及由它所产生的精神状态诱导出来的全部文化成就，那么评价就会

^① 这当然也适用于农产商品。农产品的廉价大量生产，完全是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铁路，航运，农业机器，肥料）。

是不完全的——附带说说，这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所说的文化成就，将推迟到后面（第十一章）作考察。现在我们先说说政治的若干方面。

争取社会立法的斗争的技巧及气氛，把下面这一原来很明显的事实弄模糊了：一方面，这种立法的一部分是以先前的资本主义成就为先决条件的（换句话说，是以先前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财富为其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立法产生和展开出来的许多东西，是由资本家阶层本身的行为首创出来的。这两件事，当然都必须加到资本主义成就的总和中去。现在假定资本主义体系再另有一次象 1928 年前的六十年间那样的行程，确实达到**总人口每人 1300 元**的地步，那就很容易看出，任何社会改革家迄今为止曾支持过的各种迫切需要——实际上没有例外，甚至包括大部分幻想在内——或者会自动地得到满足，或者**对资本主义过程不作重要干预**就能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失业者的丰富供应，那时不仅将成为可以容忍的负担，而且也是一笔轻微的负担。不负责任地制造失业，不负责任地在财政上支持失业工人，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会造成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若用寻常的慎重态度进行管理对包括家属在内的平均 1600 万失业者（总人口的 10%），提供一笔 160 亿元的平均年支出，在可用国民收入达 2,000 亿元（按 1928 年购买力计）的情况下，本身不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请读者注意，为什么谁都认为它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任何讨论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的失业问题——有些批评者甚至把这个因素作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控诉的唯一基础——在我的论证中却只起较小的作用？我并不认为失业是一种象贫困那样可由资本主义进化本身加以消灭的罪恶之一。我也并不认为，在长时期中，失业人数的比例有任何增加的趋势。包括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大体上是第一次大战前的，六十年——的唯一的时数列，提出了英国工会失业会员的比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数列，从这里看不出什么长期的趋势也不是一条无波动的水平线）。①既然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理论上的理由可以对证据表示怀疑——那么这两个命题对1913年以前的战前时期来说，似乎就是可以成立的。战后时期，在多数国家内失业多半处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即在1930年以前也是如此。但是这一点，以及三十年代更严重的失业，都能根据一些**和资本主义机制本身所固有的原因**所导致的失业比例增大的长期趋势没有关系的理由加以说明。我在上面已指出过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过程特征的那些产业革命。超乎正常水平的失业，是随着每次革命中的“繁荣阶段”而来的适应性改造时期的特色之一。我们在1820年代和1870年代见到了它，而1920年以后的时期只是另一个这样的时期而已。只要这种现象本质上是暂时性的，就不能推断它的未来情况。但是还有一批其他的因素使它趋于激化——战争的影响，国际贸易的混乱，工资政策，英国和德国财政政策中的某些足以膨胀统计数字的制度上的变化（1935年后的美国也很重要）等等。在这些因素中，无疑有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工作效率递减的“气氛”的征兆。可是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稍晚我们还要加以研究。

但是不论是持续的还是暂时的，越来越坏还是不然，失业无疑是，并且经常是一种灾难。本书第三篇将把失业的可能消失列入认为社会主义秩序有它的优越性的主张之中。可是，我仍然认为真正的悲剧不是失业本身，而是失业加上不能妥善地救济失业工

① 这个数列常被作成图表，加以分析。例如可参阅席古的《工业变动论》和我的《商业周期》。在每个国家，似乎都有一个减少不下去的最低额，还有一个周期波动叠置在这个最低数之上。周期波动中最强的组成部分，是大约九至十年的那种波动。

人而又不损伤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条件：因为如果失业工人的私生活不会因他们的失业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从失业这个词联想起来的困苦与堕落——这是人的价值的毁灭——显然将大部消失，而失业就会在实际上丧失它的一切恐怖，虽然生产资源的浪费还是继续着的。过去——粗略地说，到十九世纪末为止——资本主义秩序不仅不愿意，而且完全无力保证这点，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控诉所持的理由。但因为如果在今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秩序能够保持它过去的成就，它便会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这情形下，这控诉书就会被人们所忘却，正象儿童劳动、十六小时工作日、五人同住一屋等悲惨情况已被人们所忘却一样；如果我们谈到资本主义成就的过去的社会成本，强调这些原是十分正当的，可是在权衡对未来的选择时它们就不一定是适合的了。我们自己的时代处在资本主义进化早期阶段的无能力和这个体系的完全成熟阶段的有能力之间的某一点上。至少在我国，甚至现在就能不使这个体系过度紧张而完成任务的大部分，困难似乎多半不在于缺少能够擦掉画面中最黑暗部分的剩余资金，而是在于：一方面因采用了若干反资本主义政策，使失业人数的增加超过了三十年代所不能不有的数字之上，另一方面，公众舆论当它充分发觉对当前研讨的问题的责任时，立即坚持一些经济上不合理的筹措救济费用的方法，以及一些松弛而靡费的管理它们的方法。

这一论点大部分适用于将来——在很大程度内也适于现在——资本主义进化对照顾老年人、病人、教育与卫生等等所提供的可能性。从各个家庭的立场看来，也可望有越来越多的商品超出经济商品的范围，且实际上可被利用到饱和点。这些事，或者可以通过公共机关和生产企业间的协调，或者通过国有化或市有化而实现，即令不这样，即令资本主义依然保持它未受束缚的状态，

接步就班的进步也将成为它未来发展的特色。

第六章 言之成理的资本主义

上章的论证，显然会得到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的答复。1928年以前的六十年中所获得的可用产量的平均增加率，已被我们用于未来的设想之中。如果这不过是说明过去发展重要性的一种方法，那么在我们的论证中就不会有什么事情足以震撼统计的良心了。可是当我所指的是今后五十年可能实际上显示出同样的平均增加率时，我在统计上显然犯下了罪行；当然，十分明显，一定时期的生产历史记录本身根本不能证明任何外插数值的正当性，^①更不用说涉及半个世纪之久的外插数值了。所以必须再次强调，我的外插数值并不指望预测未来产量的实际情形。除了说明过去成就的意义而外，它仅仅想告诉我们，如果在今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动机能重复过去的成就它将完成些什么的数量——而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能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做到这一点，问题只能完全离开这个外插数值本身来作答复。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得从现在开始作一次漫长而困难的研究。

十分明显，我们必须先设法弄清楚，总产量增加率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真正衡量了过去的成就，然后才能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重复它过去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数据的时期无疑是比较不受

① 按照一般原则，这个命题适用于任何历史的时间数列，因为历史的连贯性这个概念，意味着经济结构中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而这又一定会影响任何既定经济数量的规律。所以，甚至对一个最谨慎的外插数值，都必须作理论上的说明，照例也必须作统计上的处理。可是，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情况由于下列事实而稍稍处于有利的地位，即产量数列所代表的多种因素的混合，使个别项目的特异性质，在某种程度可以互相抵消。

束缚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这种成就与资本主义发动机之间的关系。为了使我们相信这并不只是偶合，我们必须证明：第一，在资本主义秩序及观察到的总产量增加率之间，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第二，如果这种关系已经可以肯定，增加率实际上是来自这种关系而并不是由于和资本主义无关的某些特殊有利条件。

必须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然后才能提出“成就能否重复”的问题。因此，第三点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原因，资本主义发动机在今后四十年间不能象它过去那样运行？

我们将依次分别解决这三个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可以按另一种方法作如下表述。一方面，我们拥有甚至被真正的批判家所赞叹过的、足以描述“进步”率的很可观的一批统计资料。另一方面，我们握有关于这个时期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关于它起作用的途径的一批事实；分析工作已经从这些事实中蒸馏出、技术用语称之为资本主义现实的“模型”，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特征的一幅概括图画。我们要知道的是，这种经济类型对我们所观察的成就而言，到底是有利的、无关系的、抑或是不利的，以及如果是有利的，这些特色是否可以认为已经合理地得到了何以获得成就的适切的解释。尽可能地避免技术性，我们将以常识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

1. 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和封建领主阶级不一样，他们是靠营业成就起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出来的：它的地基、梁、和了望台完全是用经济材料做成的。建筑物面向生活中的经济方面。奖励和惩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上升和下降的意思就是挣钱和赔本。这些当然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我还要加上一句：这种社会制度在它自己的结构范围内是，而且无论

如何是出奇地效率卓著的部分由于它诉之于部分由于它自己创制出来一种动机的图式，按其单纯性和威力而言是无可超越的。它所提出的财富的约许和贫困的威胁，它都以残酷的果断精神加以实行。凡是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现得足以使别种社会世界的指路标朦胧难辨的地方，这些约许就强烈到足以吸引大多数优秀人物，并使成就等同于营业上的成就。这种约许并不是随便提出的，可是这里杂有某种极为诱人的碰运气的因素：这场赌博不象轮盘赌，而更象打扑克。约许是对有才能、精力充沛和有异乎寻常的工作能力的人提出的；但是如果存在着一种衡量一般才干或为获得某项成就所需的个人业绩的方法的话，那末实际上付出的报酬大概不会与这二者中任何一者成比例。比唤起特殊努力所需的多得多的眩目的奖金，是丢给极少数得胜者的，因此它比之更平均更“公平”的分配方法，更能有效地推动大多数生意人的活动，这些生意人所得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偿，有人什么也得不到，有人所得还少于零，可是就因为这笔巨大的奖金在，他们就用尽一切力量干，并高估了好好干所能得到的机会。同样，威胁是针对无能的人的。但是虽然无能的人和陈旧的方法，有时候迅捷地、有时候稍有延迟地的确被消除了，失败也威胁了或的确打垮了很多有才干的人，因此它又比更平均更“公平”的惩罚制度更有效率地鞭策着每一个人。最后，营业上的成功和营业上的失败两者在观念上都清楚明白到理想的程度。两者都是不能靠闲谈来打发掉的。

为了将来的参考，也为了它在当前论证中的重要性，上述事情的一个方面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体现在私人企业制度中的资本主义安排，用前面指明的方法，也用以后还要讨论的其他方法，有效地将资产者阶层束缚在它的任务上。可是它做得还要多。规定了在某一特定时间组成资产者阶层的各个个人或家族的成就的诸条

件的同一装置，事实上也挑选了该上升到这个阶层或该下降离开这个阶层的各个个人及家族。限定条件和选择功能二者的结合，并不是一件当然之事。正相反，大多数社会选择的方法，不象生物学的选择“方法”，并不保证选中的各个人的成就；它们的不能保证这种成就乃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决定性问题之一，在我们研究的另一阶段还要提到这件事。目前只要说一说资本主义体系怎样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大多数事例中，先上升到实业阶级、然后**处身**其中的人，也是一个有才干的实业家，他的能力越强，上升得也越快——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在这种图式中，上升到某种地位，和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很漂亮，一般说来总是同一回事。往往被不成功者想否认它的那种自我解嘲弄模糊了的这一事实，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时，比从资本主义机器的纯理论中苦心搜集得来的任何东西要重要得多。

2. 但是，我们想从“一个最适宜地挑选出来的集团的最大限度成就”这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一切，是不是会由于还存在着下列另一事实而归于无效呢？这一事实是：这种最大限度成就并不是和社会服务——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消费的生产——而是和赚钱紧密相联的，因此它是以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而不是以福利为目的的。在资产者阶层之外，这当然一向是普遍的意见。经济学家们有时反对它，有时拥护它。在反对和赞成声中，他们曾贡献了比他们各个人所达到的最后判断本身有价值得多的某些东西，而这种最后判断在多数事例中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反映了利益，同情或反感。他们缓慢地增加了我们的实际知识，增强了我们的分析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对许多疑问所能作的回答，虽比我们的先辈略欠简洁、较不彻底，却无疑要正确得多。

不作更远的回顾，所谓古典经济学家们^①实际上是意见一致

的。他们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们时代的社会制度中和这些社会制度的工作方法中的许多东西。他们反对地主，赞成并非完全属于自由放任主义路线的各种社会改革——特别是工厂立法。但是他们十分自信，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范围内，工厂主和商人的利己主义为全体的利益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成绩。他们如果碰到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他们会毫不踌躇地把上面所说的总产量增加率归因于相当不受束缚的企业精神和谋利动机——也许他们会把“有益的立法”看作一个条件，但是他们所说的有益的立法大概是指废除束缚，特别是指十九世纪时期俘获关税的撤废或税率的减低而言。

此时此刻要公正评判这些观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些观点当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观点，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在古典作家所写的每一页上都是显然可见的。明显程度不亚于此的是另一种有色眼镜：古典作家依据他们无批判地理想化了的特殊历史情况进行推理，并且无批判地据以作出概括。此外，他们大多数人的论证所根据的看来只限于英国的利益和他们时代的问题而不及其他。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人们不喜欢他们的经济学，甚至常常达到不想理解它们的程度，其原因就在这里。可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不理会他们的教义。有偏见的人还是可能说出真理的。从特殊事例上发展出来的命题也可能是普遍妥当的。古典作家的论敌和继承者同样也有有色眼镜与先入之见，不过性质不同，可是为数也不在少，他们曾经注视过现在也还注视着不同的可是也同样特殊的事例。

从经济分析者的角度来说，古典派的主要功绩在于把下列天

① 古典经济学家在本书中指发表著作于1776—1848年间的占领导地位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其中特别重要的几位。由于最近风行的这个名词的更广泛的应用，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

真观念连同其他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并驱散了，这种天真观念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以谋取利润为目的，单单这件事，就必然要使它和消费者的利益背道而驰；或者换一种说法，要挣钱，就必然会使生产背离其社会目的；或者，私营企业的利润本身，以及因为和通过私营企业利润所引起的经济过程的歪曲这笔利润总是利润获得者以外的所有的人的净损失，因而是可以用社会化办法来获得的净盈余。如果我们注意到任何一个有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不曾想到要为之辩护的这些命题或类似的命题的逻辑，古典派的反驳也许看来是平庸无奇的。可是当我们注意到有意无意地隐含着这种命题，而且今天再度被端到桌而上来的一切理论和口号时，我们就将更加尊敬古典派的成就。让我即刻加上一条，古典作家也很清楚地觉察到——虽然他们可能夸张了一些——储蓄及积累的作用，同时，基本上正确地把储蓄和进步率联结了起来，虽然不过是近似地正确而已。总而言之，古典作家的学说中有实际的智慧，是非分明的长期观点，以及和现代歇斯底里病患者正好相反的果敢的声调。

但是从领悟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和努力达成最大限度生产成就两者并非必然是互不相容，到证明前者必然——或在大多数事例中——意味着后者，其间还存在着一条比古典派所能设想的远为宽阔的鸿沟。而且，他们在鸿沟上面架桥从未成功过。古典派学说的现代研究者一向奇怪他们怎能满足于他们自己的论点，怎能误认这些论点为证据；按照后一种分析，他们的理论看来是一座纸板房子，不论在他们的见解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①

3. 这后一种分析，我们将分两步来讨论——它确能分成两步，

^① 读者可回忆一下，我在马克思的事例中强调过一个人的理论和一个人的见解的区别。不管怎样，记住下面这件事是重要的，一个人尽可以具有正确地透视事物的

为了澄清我们的问题也需要分成两步。从历史上来说，第一步到本世纪最初十年为止，第二步包括科学经济学的战后发展。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这样做对非专业的读者到底有益到什么程度；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随着它的分析装置的改进，必然地会离开一切问题、方法、和结果易为每个有教养却无专门训练的人所理解的那个幸福阶段。可是，我还是要尽我所能。

第一步是可以和直到现在还为无数门徒所尊敬的两个伟大名字联在一起的——至少门徒们认为这不是对他们中许多人所尊敬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表示尊敬的恶劣形式——，这两个伟大名字是马歇尔和魏克赛尔。^① 他们的理论结构和古典派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马歇尔尽其所能地隐蔽这件事——但是他们保留古典派的命题：在完全竞争情形下，生产者对利润的关心会使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它甚至提供了几乎令人满意的证明。不过，在更正确地陈述和证明的过程中，命题却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内容——命题确是从运用中产生出来的，可是它生而憔悴，仅足保命而已。^② 在马歇尔-魏克赛尔分析的一般假定中还可以看出，凡不能靠它们自己的个别行动施加影响于它们产品的价格或它们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的诸厂商——所以虽然事实上生产的任何增加

能力，可是这种能力可以且常常和正确推理的能力相分裂，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家，可是当他面对着诊断一个作为整体的具体历史模式这样的任务时，所说的却纯粹是胡扯。

①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1890年）和魏克赛尔的《讲义》（瑞典文第一版，1901年；英译本1934年）之所以有资格被我列入杰出著作之列，原因在于它们对许多人在其思想形成时期所起的影响，和它们之以彻底实际的精神处理理论问题。按纯粹科学的见地而言，首席席位应给予瓦尔拉的著作。在美国，应提出的名字是克拉克，费希尔和陶西格。

② 为了简略地澄清一下正文中这段话，我在这个脚注中将提前谈到后面的论证（见第八章第六节）。利润经济机制的分析，不仅导致发现，竞争的产业趋向于使生产

都会降低前者而提高后者，它们却没有必要为这一事实悲叹号泣——会扩充它们的产量，直到达到，为了生产产品的另一个微小的增量必须耗费的新加成本（边际成本）恰好等于他们的这个生产增量所能获得的售价那一点为止，也就是说，他们的生产量，将达到不遭受损失所许可的最大限度。我们可以指出这就是说“社会上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用更技术性用语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按个别厂商观点来说，价格不是变数而是参数；只要事情确是如此，就存在着全部产量都达最大限度、全部生产要素全被充分使用的那种均衡状态，这种情形普通称做完全竞争。记住刚才我们对作用于所有厂商及其经理们的这个挑选过程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可望从一个由于利润动机的驱使，被迫为了使生产量达到最大限度成本降到最小限度而紧张他们的每一根神经的严格挑选出来的集团取得的结果，事实上可以抱一种十分乐观的思想。初初看来，符合这种模式的体系，似乎会显示出某些重大社会浪费来源

达到最大限度这个原则的例外，也导致发现，这个原则本身的证明需要若干假定，这些假定能将原则还原为只是一个自明之理。可是，下面二项考虑特别损伤了它的实际价值：

1. 原则，就其可以完全得到证明这一点而言，适用于静态均衡的状态，可是资本主义现实从头到尾是变动的过程。所以在估计竞争性企业的成就时，关于它在经济过程的完全均衡的静止状态下，会不会使生产达到最大限度这个疑问，即使不完全也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2. 魏克赛尔指陈的原则，是在马歇尔的著作中虽表现形式更为精致却仍能看到一个更野心勃勃的一个命题——竞争的产业趋向于产生欲望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状态。但是，这个定理，即使我们不再坚持认真反对谈到无法观察的心理上的广度的意见，也容易被干缩成为这么一种陈腐平凡之谈：不论其根据如何，特别不论一个社会的制度上的安排如何，人类活动，只要是合理的，总会试图在任何既定状况下做出最好的结果。事实上这个理论干缩成为一个合理行动的定义，所以一个类似的定理，比如说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定理，尽可以和它并行不悖。可是最大限度生产原则也能达到这个结论。而这两个原则，哪一个也没有表述出什么私营企业的特别性质。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特色并不存在。可是它确实意味着，特色并非只是竞争的逻辑所固有的。

的惊人的不存在。略经反思，就可以看出实际上这不过是陈述上面判断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4. 让我们谈谈那第二步。马歇尔-魏克赛尔的分析当然没有忽略不符合这种模型的许多事例。就这点而论，古典派也没有忽略。他们承认“垄断”的事例，亚当·斯密本人曾谨慎地提到限制竞争^①的各种措施的盛行，以及由此形成的价格伸缩性方面的全部区别。但是他们视这些事例为例外，而且是早晚必将消灭的一种例外。这种看法，有些也是马歇尔同样具有的。马歇尔虽然发展了古尔诺垄断理论^②，虽然他提醒大家注意，多数厂商各有自己的特殊市场，在这类市场上他们不是仅仅接受给定的价格^③而是自己设定价格——就这点来说他预见了后来的分析——可是他和魏克赛尔一样，根据完全竞争的模式构筑他的一般结论，以致象古典派一样，认为完全竞争是常规。马歇尔和魏克赛尔也好，古典派也好，都没有看到完全竞争是例外，而且纵令完全竞争是常规，也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有那么多理由去祝贺它。

如果我们更精密地观察一下为要产生完全竞争就得满足的诸条件——马歇尔和魏克赛尔并未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条件，甚至也没有清楚地看出所有这些条件——我们可以立即体会到，除了农业的大规模生产而外，找不出太多完全竞争的例子。一个农场主确是根据这些条件供给他的棉花或小麦的：按他的立场来说，棉

① 斯密甚至以一种很能说明时人们的态度的姿态，强调了每种行业和公众利益的矛盾，当他说反对后者的各种阴谋时，他认为这些阴谋必定是在生意人的晚餐会中酝酿出来的。

② 古尔诺：《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版。

③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很可以溯源于马歇尔的原故。虽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理论，他却比多数发现了它的人们更正确地理解这个现象。特别是，他没有夸张它的重要性。

花和小麦市场的支配价格虽然是一个十分可变的数据，然而不是他的个别行动所能影响的数据，他只能使他的产量适应于这个数据；既然所有的农场主做法相同，结局价格和数量将被调整到合于完全竞争理论所需的水平。但是甚至对于许多农产品说来也不是这样的——例如鸭子、灌肠、蔬菜和许多乳制品。实际上就工业和商业的全部制成品和劳务来说，十分明显，每一个什货商、加油站，每一个手套、剃面油膏、手锯的制造者，各有自己的一个小而不稳定的市场，他设法——必须设法——通过价格战略、质量战略（产品差别）及广告，建立并保持自己的市场。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在那里似乎没有理由指望获得完全竞争的结果，却更适合于垄断的图式。在这些情形下，我们谈到**垄断竞争**。垄断竞争理论，是对战后经济学^①的重大贡献之一。

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品种质量实际上齐一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原料及半成品如钢锭、水泥、未染色的棉纺织品之类——出现垄断竞争所必需的条件似乎不会在这些产品领域中取得优势。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一般地说，由于这类产品大部分是由大规模企业生产的，类似的结果也会出现于这些产品领域之中，因为即令产品并无差别，大规模企业有力量或是单独地或是协同地操纵价格——于是出现了**寡头垄断**。垄断的图式经过适当改制之后，看来又比完全竞争的图式更适合于这种类型的行为。

只要我们承认垄断竞争、寡头垄断、或二者的联合占优势，马歇尔-魏克赛尔这一代经济学家以最大的确信用来教导人们的许多命题就会变得或者无法应用，或者极难证明的了。这首先适用于以均衡的基本概念为依据的诸命题。所谓均衡，是指经济机体

^① 特别可参看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乔安·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王 資 本

的一种确定状态,任何给定状态都以此为重心而趋集于它,并显现出某些简单特质的一种状态。可是在寡头垄断的一般事例中,事实上什么决定的均衡状态也没有,它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只是无穷无尽的相继而来的运动和反运动,只是企业间的无限度的斗争状态。当然也有许多特殊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均衡状态在理论上是存在的。第二,即令在这些特殊事例下,达到完全竞争的均衡固然已经很难,保持这种平衡更难,更重要的是,古典派类型的“有利”性质的竞争看来好象必会被“掠夺性”或“扼杀性”的竞争所代替,或者干脆被金融领域内的控制权争夺的斗争所代替。这是巨大社会浪费的根源,还有各种浪费例如广告战的耗费,压制新的生产方法的采用(为了不使用而买入专利权)等等。最重要的是,在所观察到的条件下,纵令借助于极端靡费的办法结局达到了均衡,这种均衡也不再能够保证完全竞争理论意义下的充分就业或最大限度的产量。均衡可以存在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下;均衡似乎也势必存在于低于完全竞争的最大限度产量水平之上,因为在完全竞争状况下本来不可能的利润保持战略,现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还会收到效果。

这样说来,这不正好证明了芸芸众生(除生意人本身而外)所设想于私营企业的吗?现代分析岂不完全驳斥了古典派学说而证明流行的看法是对的吗?认为为利润而生产和为消费者而生产已很难并行不悖,认为私营企业不过是为了勒索当时人们正确地描述为通过税和赎金的利润的一种阻滞生产的方法的这种说法,岂不毕竟是十分正确的么?

第七章 具有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垄断竞争及寡头垄断竞争理论和它们的通俗变种，可以经过两条路服务于资本主义现实不利于最大限度生产的这个观点。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向来如此的，同时尽管经营企业的资本家长期怠工，产量也一直在扩大。拥护这种主张的人应该提出证据来证明所观察到的增加率可以用一系列和私营企业机制没有联系的，且强烈到足以克服私营企业抵抗的有利情况来说明。这正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拥护这个变种的人至少避免了拥护另一种主张的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的麻烦。这证明资本主义现实曾一度倾向于鼓励这种最大限度生产成就，或者起码有利于得到那么大的生产成就，使它成为任何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严肃评价中的一个重大因素；但是较晚时期扼杀竞争的垄断结构的扩大，现在已经将这个倾向倒过来了。

首先，这必然会创造出一个纯属想象的完全竞争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在某个时候不知怎样变形为垄断时代，而事实却十分明白，完全竞争之为一种现实，现在更甚于任何时代。其次，必须指出，生产量的增加率自九十年代以来并未减低，我认为，至少在制造工业方面，大规模企业之占优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也必须指出，总产量的时间数列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说明“趋势的断裂”；最重要的是，群众的现代生活水平在相对不受束缚的“大实业”时代是有所提高的。如果我们列举进入现代工人家庭预算的项目，并从1899年起观察这些项目的价格，不是按货币计算而是按足以购买这些项目的劳动时间计算的价格——即每年的货币价格除以每年的小时工资率——我们将不能不惊讶于进步之迅速，若再考虑

到质量上的惊人的改良，进展的速度看来不是小于从来的数字而是大于从来的数字。如果我们经济学家们过去多费些力气去观察事实，少致力于根据愿望而进行的思考，那末可能对那个引导我们去指望一个迥然不同的结论的现实的现实价值立即要发生怀疑。事情还不止此。只要我们深入事情的细节，追踪进步最惊人的个别项目的进步的由来，那么我们不会追踪到工作于比较自由的竞争条件下的商行门上，却分明会追踪到大企业门上——在农业机器的事例中，竞争性企业所获进步的一大部分同样应该归功于大企业——于是我们不免要吃惊地怀疑，大企业也许和创造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而不是和降低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

前章未提到的诸结论，事实上几乎完完全全是错误的。可是它所根据的观察及定理却几乎完全^①是正确的。经济学家和通俗作家一再囫圇吞枣地接受了他们碰巧掌握的现实中的某些片断。他们对于这些片断本身多半是正确地理解了，它们的形式上的特质也多半被正确地发挥了。但是从这类片断的分析中没有得出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现实的结论。如果我们还是从中作出了结论，我们只能在偶然的场合是正确的。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并没有发生侥幸的偶然。

应该掌握的要点是，当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时，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进化过程。谁都没有能看到这样明显而且很久以前马克思就曾

^① 事实上这些观察和定理并不完全是令人满意的。完全竞争的通常解释，特别没有足够注意到许多重要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纵令按照静态理论，不完全竞争也近似于完全竞争的结果。还存在着另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不完全竞争并不近似于完全竞争的结果，但提供了一些补偿，这些补偿并不进入任何产量指数，可是对产量指数最终企图衡量的东西还是有所贡献的——在这种事例中，一个商行靠改进质量和服务等办法建立信誉因而卫护了它的市场。可是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将不根据这个理论自己的理由来和它争论。

强调过的一个事实，看来也许是一件怪事。可是，产生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情况的大批命题的片断分析，却固执地忽视它。让我们重新说说这个论点，看一看它是怎样关联着我们的问题的。

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特色，不仅是由于这么一事实，即经济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进行的，且通过它的变动又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根据；这件事是重要的，这种变动（战争、革命及其他等等）又时常限定了产业变革的条件，但是它们并不是它的首要的推动者。这种进化的特色，也并不来自人口和资本的准自动的增加或在货币制度方面所要的什么把戏，对于这些把戏，上面所说的那些话也完全适用。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

正如我们在前章中所见到的，工人家庭预算的内容，比如说从1760年到1940年，不是简单按不变路线增长的，它同时也经历了质量上的变化过程。同样，一个典型农场的生产设备的历史，从轮作、犁耕、施肥的合理化开始，直到今天的机械化——和吊谷机与铁路联结起来——是革命的历史。从木炭炉到现代型式高炉的钢铁工业生产设备的历史，从冲击水轮到现代电力厂的动力生产设备的历史，从驿路马车到飞机的运输事业的历史也全都是革命的历史。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手工业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规模企业的组织上的发展，说明了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如果我可以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①，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这

正是资本主义意义所在,也是每个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个事实在两个方面和我们的问题有关系。

第一,因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过程的每一项要素,都必须经历相当时期才能显示其真正特色和最终后果,因此不能按某个瞬间视界所及估计这个成就的价值;正因为成就要经过若干世代若干世纪才能表露出来,我们也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判断它的成就。一个体系——不问它是经济体系或其他体系——凡在每一个给定的时点上充分利用了它的各种可能性直到发挥它的最大利益的,可以在长时期内低劣于任何给定时点上都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个体系,因为后者之未能做到这一点,可能正好是长时期内成就水平或成就速度所需的条件。

其次,因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有机过程,所以对它的任何特殊部分——比如说,个别企业或个别产业部门——所发生的事情的分析,虽确实可以澄清方法上的某些细节,却不能由以推出超过这一点的任何结论。营业战略的每个片断之所以具有它的真正重要性,只不过因为它是以此过程为背景的,因为它是处在过程所创造的形势之内的。必须从它在创造性的毁灭这个不断呼啸的风暴中所起的作用上去了解它;不理睬这个风暴,或者,实际上假定存在着一个风暴过后永续的宁静,那就无法理解它们。

可是,只从时间的某一点来观察事物的经济学家们,当他,譬如说观察一个寡头垄断的产业部门——只有三二家大企业的产业部门——的行为时,注意到其间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一些运动和反运动,似乎其目的只在保持高价和限制生产,这样的经济学家分明

① 严格地说,这些革命并不是不断的;革命表现为多次不连续的冲击,前后两次冲击之间都有比较平静的间隙。可是整个过程按这样的意义说来是不间断的,即过程中总存在着革命或革命后果的吸收,两者合在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商业周期。

正在制作这样的假定。他们采用这种瞬间形势作为他们的论据，好象这种形势既无过去也无未来，他们认为只要借助于和这些论据相关联的最大限度利润原则去解释那些企业的行为时，他们就已经懂得了一切他们所应该懂得的东西了。常见的理论家的文章和常见的政府委员会的报告，实际上决不试图，一方面把这些行为看做过去时期的某一幕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把这些行为看做对付一定会立刻发生变化的形势的一种打算——这些企业正力图在不断从脚底下溜过去的地基上站住脚。换句话说，人们通常着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怎样支配现存结构的，而有关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是怎样创造和毁灭现存机构的。当人们还没有认识这一点时，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只要这一点被认识了，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实践及其社会后果的景色就会大大地改观。^①

首先应该放弃的是关于竞争的作用方法的传统概念。经济学家现在好容易才从所研究的不过是价格竞争这个阶段中挣脱出来。当质量竞争和销售努力被容许进入理论的神圣境界内时，价格变异被逐出了它原来的统治地位。可是不管怎样，实际上独占了人们注意力的还是竞争，不过是处于条件不变的刚硬模式内的竞争，特别是关于生产方法及产业组织形式方面的竞争。但在迥然有别于教科书构图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这种竞争，而是关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新组织类型（例如大规模的控制单位）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的决定性有利

^① 应该了解，能改变的只是我们对经济成就的评价，我们的道德判断是不会变化的。由于道德判断上的自律作用，道德上的赞成或非难是完全独立于我们对社会（或任何其他）后果估价之外的，除非我们恰巧采取例如功利主义那样的伦理学体系，按定义，这种体系是根据社会后果作出道德上的赞成或非难的结论的。

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基础,危及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攻门间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长时期内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强有力的杠杆,无论如何总是用通常竞争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

几乎没有必要指明,我们现在设想的那种竞争不仅在其存在着的时候而且当它不过是一种经常存在着的威胁时也一样在起作用。它在实施攻击之前先训练队伍。实业家总是感觉到他正处在竞争局势之中;即使独处在战场上,四周渺无一人,或者,他虽然不是单独的,可是他所处的地位,使政府的调查专家也不能在他和其他任何同行之间,在同一行业或邻近行业之间看出有什么有效的竞争,致使专家们断定,这个实业家所说的竞争的忧虑,经过检查之后,全系故意捏造。其实,这种竞争在长期内,在许多(即使不是全部)事例中会实行和完全竞争十分类似的行为。

许多理论家采取相反的观点,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最妥当地表达这种观点。让我们假定在一个区域内有一批一定数目的零售商,试图借服务和“气氛”改进他们的相对地位,但相约避免价格竞争,并限于采取合乎地方传统的办法——一幅停滞的常规活动的图画。随着另外一些人插进这行买卖,这个准均衡局面确实被倾复了,但是这种倾复却是不利于他们的顾客的。因为每个店铺周围的经济空间缩小了,老板们将不能维持生活,他们就要设法通过互相默许的抬价来补救局势。抬价将进一步减少销售额,在金字塔不断加高声中,将展开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潜在供给将要经过加价(而非减价),减少销售额(而不是增加销售额)而日益增大。

这类事例确是有的，把它们表述出来是正确而适当的。但是正如一些实际事例通常表明的那样，这是些主要在离开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活动最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得到的非本质性的事例。^①何况，它们的性质是瞬息即逝的。对零售商业而言，真正竞争并非来自相同类型的店铺的增设，却来自早晚一定会毁灭这类金字塔的百货商店、连锁商店、邮购商店和特价市场。^②现在，一个忽略了实例中本质要素的理论结构，不免也忽略了事例中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纵令它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两都正确，还会像一出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剧。

第八章 垄断企业的行动

迄今为止所说过的一切，确实足以使读者能够研究他很可能碰到的大多数情况，并且懂得，直接间接以完全竞争的不存在为依据的对利润经济的大部分批评是不妥当的。可是，因为我们的论证对于这类批评的态度，初初看去也许不那么明显，为了使若干论点更为清晰，还值得再作一些细密的推敲。

1.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新东西——例如新技术——对现有产

^① 我们在解释不完全竞争理论时常碰到的一种定理，也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定理指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企业或商业企业往往会成为小到不合理的小型厂店。因为不完全竞争同时被认为是现代产业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我们不能不奇怪，这些理论家到底生活在那一个世界里，除非他们脑袋中所有的，只是上面说过的那种非本质性的事例。

^② 在小零售商业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和人身条件下，仅仅这种竞争的打击的威胁，起不了它平常所有的训练人的影响。因为小商人的成本结构的弹性不大，无论他在逃避不了的限度内怎样改善他的工作，他决不可能跟着他的竞争对手的方法亦步亦趋。他的竞争对手甚至可以小商人的买价为售价。小商人碰到的障碍既这样大，他在这种竞争面前自然是束手无策的。

业结构的冲击,作为实际存在的事实,也作为潜在的威胁,大大减少了旨在通过限制产量来保存既得地位和使既得地位所产生的利润达到最大限度的这种行动的长期机会和重要性。我们现在还必须进一步承认,这类限制行动,只要行之有效,就能在创造性的毁灭的不断呼啸的风暴中获得新的意义,而在静止状态或缓慢而匀称的增长状态中是不会获得这种意义的。不论在静止状态或缓慢的匀称的增长状态之下,限制战略除了破费买主以增加利润而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生产匀称增长情况下,限制战略仍然是最有效的征集追加投资所需资金的办法。^①然而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限制的做法在稳定体系,缓和暂时困难方面能起不少作用。事实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常常会出现在萧条时期的议论,正如大家所知,这种议论已成为很受政府及其经济顾问们欢迎的议论——全国复兴法可以为证。可惜当它被误用并奉行得造成了许多错误,以致被大多数经济学家由衷地蔑视的时候,对此应负责^②的顾问们却总不能了解它的远为一般的理论根据。

实际上,任何投资,作为企业家活动的必要补充,都得有保险或两面下注之类的投资保护活动。在急剧变动的条件下,尤其在由于新商品新技术的冲击因而任何瞬间都会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进行长期的投资,正如向一个不仅模糊不清而且动荡不定的靶子

① 理论家们往往把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人都看作犯了重大错误的罪人,并且毫不犹豫地证明,向银行或有储蓄的私人借款,或者,在公营企业的情形下,用所得税收入作为投资的财政来源,比依靠经过限制政策而获得的剩余利润来进行投资更为合理。对某些类型的行为而言,他们是十分正确的。就其他方面来说则是十分错误的。我相信资本主义和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都属于后一范畴。可是主要之点是,理论的考虑,尤其是短期性质的理论考虑,并不能解决我们将在下一篇再度遇见的问题,虽然它们对问题的解决也有帮助。

② 特别是,不难指出,以保持“平准价格”为目的的政策是既无意义又多害处的。

射击——痉挛地射击。因此就得采取下列一些保护措施：专利权，生产方法的暂时保密，有时签订预先作了保证的长期合同等等。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作合理经营^①的正常要素的这类保护措施，只不过是总的保护措施中的一些特例，总的保护措施中所包括的为多数经济学家所谴责的另一些办法跟被承认的办法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譬如说，如果战争风险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那就谁也不会反对企业从其产品的买主那里征集保险费。但是这种风险也是长期成本中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保险便利的话，那么旨在达到同一目的的价格战略，似乎就会包括不必要的限制，并能产生超额利润。同样，如果一种专利权无法得到，或者即使得到而不能实现有效保护，也许就该使用别种手段以保障投资。其中有一种就是价格政策，它使原投资有可能比没有这种政策时推销得更快，或者能作追加的投资以便提供只能用于侵略或防御的超额生产能力。同样，长期合同如果不能订立，为了维系预期中的买主，可能必得采用其他手段。

从某个给定时点的见地分析这类营业战略时，做调查工作的经济学家或政府代表看见了在他看来似乎是掠夺性的价格政策，也看见了在他看来似乎是和丧失生产机会同义的产量限制。他不了解，在不断呼啸着的风暴的诸条件下，这种类型的限制是长期扩张过程的附随品，时常还是无法避免的附随品，与其说它们遏制了扩张，毋宁说它们保护了扩张。他不了解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① 可是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些措施也是进步的障碍，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也许是必要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们不会存在。这是有一部分真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下述命题：由专利权及其他办法提供的保障，在利润经济的条件下，总的说来是推进的因素而不是遏制的因素。

恰如说因为汽车安上了制动闸，所以比没有安制动闸时行驶得更快一样。

2. 在正好体现了新东西新方法对现存产业结构的影响的经济部门中，上面所说的情形显示得最为清楚。要生动而如实地了解产业战略，最好办法莫如看一看采用新商品或新生产过程的新生产部门（如铝工业），或者改组一个产业部门的一部或全部的新企业（例如昔日的美孚油公司）的行为。

我们知道，这些企业生来就是侵略者，它们挥舞着竞争这一真正有效的武器。它们的闯入，只在极罕见的事例中才未能在数量上或质量上改进总生产，它们之做到这一点，既通过新方法本身——即使从未充分加以利用——也通过新方法所加于原先存在着的企业的压力。可是这些侵略者的处境，使他们自己在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之外，还需要为了攻击和防御准备几片铠甲，因此它们必须对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一贯地作战略性的操纵，所以从一定的时点看来，似乎它们只在限制产量和保持高价。

一方面，如果一开始不知道，由于沉重的资本需要或由于经验的缺乏，竞争将受到挫折，或者不知道，可以找到使竞争者寒心或足以挫败竞争的手段，来为进一步的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那么大规模生产计划在许多情形下将完全无法实现。甚至用金融控制的方法来在原来无懈可击的各个阵地征服各竞争企业，或者获得直接和公平交易的公众意识相抵触的利益——例如铁路运费的折扣——只要我们所作观察限于总产量的长期效果，就会有另一种色彩，^① 它们可能是消除私有财产制度设置在进步途径中的障碍物的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也同样是必要

^① 我认为，我所附加的条件，可以去掉任何上述命题大概会造成的令人生气的任何正当理由。如果上面所附加的条件还不够明确，那末请原谅我要重复说，在这种

的。它们应由中央负责当局的命令加以保障。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大概会出现特别有利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通过价格、质量及数量的操纵加以利用，将产生足以顺利渡过在同等经营水平下也会出现的特别不利情况的巨额利润，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新企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又需要短期内经常是限制性的战略。在大多数成功的事例中，这种战略运用得正好能够达到它的目标。在有些情形下，成功如此之大，以致所获利润远远超过了诱导相应数量投资所必要的水平。这些事例于是引诱资本投向没有走过的羊肠小道。正是这类情形的存在，部分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竟会有很大部分白干了一阵：在繁荣的二十年代中期，美国营业公司的约半数经营的结果是赔本，或者没有利润，或者获得那么小的利润，如果事前已能预见的，早就不会有人在这里花费开支并辛勤工作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议论扯到新企业、新方法、新产业部门等等以外去了。老企业和现存的产业部门，无论是否直接受到攻击，依然在不断呼啸的风暴中屹立着。一些情况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商行也许必得灭亡，它们如果经得住某一场风暴的话，它们本来是能够健壮而有用地存在下去的。由于没

情形下，事情的道德方面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是完全不受经济理论的影响的。至于其余，希望读者考虑，即使在处理确凿有据的犯罪行为时，每一个文明的法官和文明的陪审团，也要斟酌罪行是因追求什么隐蔽的目标而犯下的，以及这种行为是否也有他们认为对社会说来可取的影响。

另一种反对意见更为干脆。如果一个企业只能靠这样的手段得到成功，这件事本身岂不是已经证明了它决不能体现为社会的利益？为了支持这个观点，只要作很简单的论证就够了。可是这种论证必须加上“当其他一切相同时”的条件。这就是说，它只适用于恰巧等于排除了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资本主义现实——的那些条件。回头想一下，就可以看出，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行动和专利权极为类似一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有这种总的危机或萧条，产生了一些局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创造性毁灭过程的特征的、数据的急剧变化，一时瓦解了一个产业部门，以致引起无功能的损失和可以避免的失业。最后，没有必要试图无定期地保存陈旧的产业；但有必要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垮下来，并设法把可能变成累进萧条影响的中心的溃败转变为有秩序的退却。与此相应，某些产业，经过了纵情任意的青年时代，现在仍然在赢得而不是在丧失阵地的，应该看做有秩序的前进。^①

所有这些，当然都不过是平凡不过的常识。可是人们那么顽固不变地忽视它，以致有时不免要怀疑他们的态度是否诚实。由此可以推论，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理论家们惯于把这个过程中的一切事实都撑到关于商业周期的著作或论文中去——中，同业组织问题也还有一些侧而是理论家们所没有想到的。和仅仅存在于关于价格竞争的默契中的那些东西一样，卡特尔型的“交易限

① 可以说明这个论点——事实上很能说明我们总的论点——的好例子是战后汽车工业和人造丝工业的历史。汽车工业的历史，很恰当地说明了我们应称之为“删改过的”竞争的性质和它的价值。繁荣时期大约结束于1916年左右。可是，此后仍有一大批小企业拥向这个产业部门，到1925年它们大部被消灭了。在这个猛烈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挣扎出来了三个企业，到现在它们占了总销售额的80%以上。尽管它们拥有稳固的地位出色的销售额和服务组织等等有利条件，它们却都处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哪怕是在保持或改进产品质量上有一点点失败也好，随便什么垄断性的合并企图也好，都会招来新的竞争者。三个企业相互间的行为，与其说是竞争，毋宁说是协调；它们抑制某些侵略性的措施（顺便说说，这在完全竞争情形下也是不会有的）；它们力争赶上别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赌注是下在新疆土上的。到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十五年以上，如果理论上的完全竞争的条件在这个期间占了优势，很难说现在会不会向公众提供更好更便宜的汽车，向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更多更稳定的就业。人造丝工业的繁荣时期是在二十年代。它表现出了引入一种新商品到前此被充分占领的阵地内时很容易发生的某些特色，比汽车工业的例子更清楚地表现出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不得不采取的政策。还有许多别的差别。但是情况基本上是类似的。人造丝产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任何一个时刻，限制性战略都支配了这个扩张过程。

制”在萧条时期也可能是有效的救治之方。只要它行之有效，它到头来也许比少不了要遭到各种灾难的全无控制的突进，不但使生产更稳定，而且使产量作更大的扩张。人们也不能争辩说，这类灾难是无论如何都要碰到的。我们知道在每个历史事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足以维持现有产业的手段全不存在，演变的过程将要加快到什么样子，我们对此是有一个很不完全的观念的。

纵使我们的理论已经象现在这样扩大了，它还没有把一切限制战略全都包括进去，其中有许多无疑对产量的长期发展是有害影响的，但是人们竟然无批判地将这种有害影响归结到一切限制战略上去了。而且，即便在我们的理论包括得了的事例中，净效果也是各别产业所处环境的问题和产业在每一个别事例中如何限制自己以及限制自己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确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无所不包的卡特尔体系，既可以实现人们认为完全竞争能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实现的一切进步，也能破坏这一切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论证并不等于一般地反对国家管制的原故。它确实表明了，无区别地一般地要求“粉碎托拉斯”，或者要求取缔一切够得上称做交易限制的东西也是没有理由的。所以，通过政府当局来实行合理的而不是惩罚式的管制，实为一极端伤脑筋的问题，尤其在反对大实业的穷追猛打声中，不是每个政府机关都能得到信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①但是，我们的论证，不过是为了反驳流行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总产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和

^① 很不幸，这种说法，既可以成为取得政策上的一致意见的障碍，又可以成为彻底否认一切可能发生的政府调节的有用论的论据，而且两方面几乎同等有效。事实上这可以使讨论激昂化。政治家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们可以忍受我也许可以文雅地称为“经济保王党人”〔指新政拥护者而言——译注〕的那种一揽子反对态度。可是对他们能力的怀疑，例如，特别当我们看到他们工作中的法律精神时拥集到我们心头来的那种怀疑，对他们说来要难以忍受得多。

由此得出的诸结论，我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得出另一个理论，即，对事实的另一种看法和解释事实的另一种原则。为了我们的目的，这已经够了，至于其余，事实本身有它自己的发言权。

3. 其次，对晚近引起了这么多注意的**刚性价格**问题要说几句话。它实在不过是我们讨论中的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我们关于刚性的定义如下：一个价格，如果在不同供求条件下，比完全竞争占优势时变动得较不敏感，这就是刚性价格。^①

就量的方面说，价格的刚性所达到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资料和测定方法，所以是一种可疑的东西。但是不管根据什么资料和方法，可以肯定，价格并不象它们表面上看来那么刚硬。有许多理由使价格的实际变动不表现在统计图上；换句话说，有许多理由造成非常虚伪的价格刚性。下面我只来指出其中的一类，即和我们的分析所强调的若干事实密切相联的一类。

我已经说到过，新商品的闯入对一般的资本主义过程，特别是对它的竞争机制的重要性。现在，一种新商品可以有效地压低先前存在的价格结构，使之按低得多的每单位服务的价格（例如运输服务）满足一定的欲望，可是在这过程中，任何一个记录下来的价格都无需变动：真正的伸缩性尽可以带来形式上的刚性。还有其他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事例，其间推行新牌商品的唯一动机是减价，而老牌商品还保留着先前的标价——又是一种不表现出来的减价。此外，大多数新消费者货物——特别是现代生活中的各种新

① 这个定义能满足我们的目的，却不能满足别的目的。见汉弗莱在《政治经济杂志》1937年10月号的论文，及梅逊在《经济统计评论》1938年5月号的论文。尤其是梅逊教授，与传播很广的信念相反，他表明了价格的刚性不在增加中，或者，价格刚性无论如何不比四十年前为大。这是足使若干关于刚性的流行学说的含义归于无效的结论。

玩意儿——最初以试验性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引入市场，但是它们永不能以这种形式征服它们的潜在市场。因此产品质量的改进，实际上是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部门发展的普遍特色。不论这种改进是否引起成本的加大，如果不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不应该把改进中商品的每单位的不变价格称作刚性价格。

当然，还剩下大批真正刚性价格的事例——例如，作为营业政策而保持恒常不变的价格，或者，比如说，经过费劲的谈判由卡特尔决定，因为变动困难而保留不变的价格。为便于估计长时期内这种事实对产量增长的影响，首先必须了解到，这种刚性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现象。长期的价格刚性的重大的实例是没有的。不论我们选择哪一种略关重要的制造工业或哪一组工业制品，调查它们一个期间的价格，我们实际上常常发现，在长时间内，价格总能适应于技术上的进步——它们时常因此下降得很惊人^①——除非由于币值变动、货币政策或在有些事例中由于自动改变工资率（工资率的变动确实和产品质量变化一样应该计算进去并作适当的校正的）而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技术发展。^②我们前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事情何以必定如此的理由。

我们所讨论的营业战略的真正目的——总之，它所能达成的全部目的——是为了避免季节性的、不规则的、周期性的价格波

① 它们照例不会象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那样地跌落。可是这个命题只在“其他一切相同”时才是正确的，而这个但书则夺去了命题的一切实际重要性。前面我已经论到这一点，后面还要回到这题目上来。（第五节）

② 按照福利观点，采用和我们不同的定义，用经常必须赚取用以购买工业制造的消费者货物的劳动小时来测量价格的变动是妥当的，同时也应当考虑质量的变化。在前面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这样论证了的。这样的观察，显出真正令人难忘的长期下跌的价格伸缩性。价格水平的变动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价格水平的变动反映了币值的影响，那么在大部分价格刚性的研究中就应该排除这些影响。但如果反映了一切生产部门中多方面的效率不断提高的联合影响，那就不应该排除掉。

动，并使价格变动只反应构成这些波动的基础的各种情况的更根本的变动。因为看清楚这些更根本的变动需要时间，价格就要以不连续的步伐作缓慢的运动——也就是使价格保持不动，直到新的、相对持久的形势看得清楚为止。用术语来说，这种战略的目标是使价格循一条近似于趋势线的阶梯线运动。这正就是多数事例中真正的自愿的价格刚性的意义所在。事实上，多数经济学家确实承认这一点，至少暗中承认这一点。因为虽然他们关于刚性的有些论点，只当他们涉及的现象是长期现象时才是正确的——例如，大多数论点断定价格刚性把技术进步的果实留给自己，不给消费者——实际上他们所测定和讨论的，主要属于周期波动中的价格刚性，尤其是许多价格在衰退或萧条中没有下降或没有敏捷地下降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实在的问题是短期的刚性^①会怎样影响长期总产量的发展。在这问题里，唯一具有实际重要性的问题是，在衰退时期或萧条时期站住不动的价格，无疑影响了周期中这些阶段的营业形势；如果这个影响是具有强烈伤害性的——使事情变得比完全的伸缩性一贯支配着整个过程时坏得多——那么随时都在起作用的破坏工作必定也会影响其后恢复和繁荣时期的产量，即永久地减低总产量增长率，使之低于不存在价格刚性时的水平。人们提出了两种赞成这种观点的议论。

为了更透彻地弄清楚第一种议论的意思，让我们假定一个在衰退中拒绝减价的产业部门，它的销售数量比在减价的情况下所

^① 可是，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短时期其长度比“短时期”这个术语通常所指的要长些——有时是十年，甚至还要长。周期不止一个，有同时发生历时长短不等的许多周期。最重要的一种周期，平均历时约九年半。在若干重要事例中，需要作价格调整的结构变动，发生于和这个时期长短大约相同的时期中。惊人的变动，只能在比这更长的时期中显出自己完整的形相。为了公平判断铝、人造丝、汽车的价格，必须调查大约四十五年这么一段时期。

能销售的数量毫不减少。于是买主为这个产业从刚性价格中所得的利润掏了腰包。如果买主是为了消费可以罄其所有的这一类人，而这个产业或分润到这个产业的净收益的那些人概不化掉他们所得的这分收入增量，或者把它闲置起来，或者用它来偿还银行借款，那么，国民经济中的支出就要相应减少。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其他工厂或商铺可能因此吃到苦头，如果它们因此也实行限制，我们也许会得到萧条效果的积累。换句话说，刚性价格可以大大地影响国民收入的数额及其分配，以致会减少余额或增加闲置余额，或者如果我们采用一个普遍误用的名词的话，增加储蓄。这样一种事例是可以设想的。但是读者不难证明^①，这种事例的实际重要性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小的。

第二种议论，谈到如果在个别产业本身范围内或此外随便什么地方，刚性价格导致生产的额外限制，即比萧条时期中必将发生的更大的生产限制的话，刚性价格可能起使生产脱节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最重要的导体是失业的随而增加——事实上就业的不稳定性是对刚性价格的最通常的控诉——以及相继而来的总支出的减少，到这里，这种议论就跑到第一种议论的老路上去了。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这种影响实际上究竟有多大意见是十分分歧的，可是由于考虑到在最显著的事例中，导致刚性价格的正是需求对短期价格变动的不敏感性，这种影响的实际重要性就大为减低了。在萧条时期中担心自己的将来的人们，即使价格跌了25%也不见得会买一辆新汽车，尤其是当购买可以容易地推迟，以及当跌

^① 证明的最好方法是，不仅在想象得到的极端事例中而且也在实际生活中不象不会发生的较弱的事例中，仔细地验证所涉及的一切假定。此外，不应该忘掉，由于保持价格不动而得到的利润，也许是避免破产的手段，或者至少是避免停工工厂的手段。这两者，大概能够比总支出的可能的减少更有效地促成一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价引起人们希望进一步跌价的时候。

即使完全不管这些，这种论证又由于附加了在讨论我们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时所不允许附加的“当其他一切相同时”的条款而已经失效，所以它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即使承认价格的伸缩性多一些，当其他一切相同时可以卖得更多些确是事实，也不能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出如下的推论：所讨论的商品的产量或总产量实际上会大些，从而就业实际上也会增加。因为既然我们可以认为，拒绝减价会增加收入，或者至少可以避免市场的混乱——这就是说，只要这种政策至少算不得是失策——因而加强了采取这种政策的产业的地位，那么拒绝减价也许会使原来会成为被蹂躏地区的地区成为堡垒。前面已经说过，按照更一般的立场来说，总产量和就业很可能因为这种限制措施而保持在比萧条大肆破坏价格结构时更高的水平上。^①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进化所造成的条件下，在萧条时期，价格的完全的和普遍的伸缩性，不是像在普通理论所描绘的诸条件下它无疑会办到的那样使这个体系稳定化，而却会使这个体系进一步不稳定化。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学家同情直接有关的利益集团的事例中如在劳工和农业的事例中又是被承认了的；在这种事例中他十分容易承认为看来象是刚性的东西，也许不过是有管制的适应而已。

读者也许会感到惊奇，晚近几年中一种学说提出了的那么多东西，现在却只剩下那么一点儿了。对有些人来说，价格的刚性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动机的突出的缺点，同时它又几乎是关于萧条的说明中的根本因素。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地方。某些人和某些集团，对于凡是可以被称誉为发明，可以用来支持当时

^① 理论家说明这个论点的方法是，如果一切钉住价格的钉子都拔掉了，萧条时期需求曲线必将下降得猛烈得多。

政治倾向的任何东西总是碰到就抓的。价格刚性的理论，至少还提出了些许真理，决不是这类事情中最坏的案例。

4. 另一种学说已经结晶成为下列这样一个口号：在大实业时代，维持现存投资的价值——资本保存——往往成为企业活动的首要目的，并有希望停止一切降低成本的改进措施。从而，资本主义秩序变得和进步不相容了。

进步，如我们所知，必然会造成新商品或新生产方法与之竞争的那些层次的资本价值的毁灭。在完全竞争下，老的投资必须作出牺牲接受改编或被摒弃；但如无完全竞争，如果少数大企业或者控制了每个产业领域则这些投资能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对抗对于它们资本结构的威胁性的攻击，并设法避免它们资本帐目上的损失；这就是说，他们能够而且将和进步本身斗争。

由于这种学说不过表述了限制性营业战略的一个特殊方面，所以用不到在本章已经约略叙述过的论点上添什么东西。关于这种战略的限度，关于这种战略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只要重复一下上面说过的话就行了。如果我们注意到，保存资本价值和保持利润是一回事，事情就变得更为明显。现代理论事实上趋向于用资产的净现值（等于资本价值）概念代替利润的概念。但是资产价值和利润二者，当然都不是单单要加以保存的，而是要加以极大值化的。

可是，关于对减低成本的改进措施实行怠工的这个论点，仍然需要顺便加以评论。略经反思，就可以看出，这只要考虑一下一个控制了某种技术方案——例如，一种专利权——而其应用必将使工厂设备的一部或全部归于废弃的公司的情况就够了。如果，一个不受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束缚的经理，例如一个社会主义经理，能够利用这个技术方案来为全民谋福利，为了要保存旧设备的资本

价值，他会不会不用这个技术方案呢？

提出事实问题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代企业，只要它觉得它花得起，它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个研究部门，其间每个成员都懂得他的面包和黄油取决于他所发明的改进方法的成功。这种做法，显然并不意味着对技术进步的厌恶。我们也不能根据营业企业占有了专利权却不迅速应用，或全然不曾应用这类事例来答复问题。因为也许有完全正当的不使用的理由，例如，专利了的生产方法证明是不好的，或者至少它还不能在商业上加以应用。发明者本人也好，调查的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也好，都不是这件事情的公正无私的裁判员，我们也许很容易从他们的抗议书或报告书中得到一幅极度歪曲了的图画。^①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理论问题。谁都同意，私营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当新生产方法的产品每单位总成本，可望低于现用方法的每单位产品主要成本时，都会改用改进了的方法。如果这种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私营企业的经理只有在现存的工厂和设备已经摊销完了的时候才会采用降低成本的方法，而社会主义经理则只要用得上就会为了社会利益而使用任何新的降低成本的方法，这就是说，无须顾到资本价值。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②。

① 应该附带指出，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我们现在讨论的那种限制实施范围很广泛，它对社会福利并不是毫无补偿效果的。事实上谈到对进步怠工的这个批评家，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所带来的社会损失，特别是这种发展速度所造成并使这种发展速度降低的失业可能会缓和到某种程度。那末，技术进步对他们来说到底是太快了还是太慢了？他们最好还是下个决心。

② 应该注意，即使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它还不足以支持在当前条件下资本主义“与技术进步不相容”的命题。这个论点所能证明的，不过是在某种情况下，引入新方法照例会有一个一般并不太长的延迟时间而已。

如果私营企业经理是受利润动机驱使的，那么他在维持某种建筑物或机器的价值方面也一定和社会主义经理一样感到兴趣。私营企业经理所试图做的，不过是使等于预期净收益的贴现价值的总资产净现值达到极大值。这就等于说，私营企业经理总会采用，它认为会从每单位未来支出中得到比使用现用方法时所得到的为大的收入——收支双方都折为现值——的新生产方法。过去投资的价值，不论是否已经抵押出去因而有和投资相平行的应该摊提的一笔抵押债务，除非也要以同样的意义同样的规模进入社会主义经理据以决策的计算，否则就全不列入上述计算。只要使用旧机器比起立刻采用新生产方法来可以节省未来成本，旧机器使用价值的剩余部分当然是资本主义经理和社会主义经理两者都应考虑的一个决策因素；除此而外，他们二者都应该往者不计，除此而外，任何保存过去投资的企图，既会跟由利润动机推演出来的规律发生冲突，也会跟为社会主义经理的行动规定好了的规则发生冲突。

可是如果认为拥有某项设备，其价值受到自己也控制的——如果控制不了也就不会有控诉了——新方法的威胁的私营企业，只有在新方法的总单位成本小于旧方法的主要单位成本时，或如果老投资已经按照新方法出现前决定的计划摊销完了时才会采用新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新机器安装起来时，它的使用期限指望要比旧机器原定使用期限的未经过部分为长，旧机器在这一天的余剩价值的贴现价值，才是所要考虑的另一项资产。由于与此类似的原因，认为一个行动合理的社会主义经理每当一种新方法预示着可以用较小的总单位生产成本进行生产，或当他认为新方法对社会有利时，总会，并且立即会采用任何新方法，也是不正确的。

可是还有一个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在这方面的行动的因素却始终被忽视了。^①这一因素可以叫做因预料工厂设备将有进一步的改良而在事前进行的资本保存。一个继续经营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常常——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情形下的话——不光是该不该采用最好的，并可望以立即可以找到的形式在一个时期内保持那种地位的新生产方法之类的问题。一般说来，一种机器的新形式，不过是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环节，它是可以马上变为陈旧的。在这种情形下，一环一环地跟着这根链子走，而不顾随时都会受到的资本损失，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在哪一个环节上采取行动。答案必定具有各种考虑的折衷的性质，考虑则多半根据猜测。可是，这照例这必得有某种等待，以便明白这根链子到底是怎样运动的。在局外人看来，这很像是为了保存现存的资本价值而试图窒息改进。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经理如果愚蠢到竟会遵从理论家的忠告而继续年复一年地废弃工厂和设备，那么最有耐心的同志们也会造反的。

5. 我所以把本章标题定为垄断企业的行动，因为本章的大部分篇幅是讨论那些在通常的谈论中常常和垄断企业或垄断企业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和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尽可能少用这些名词，为的是为单独一节，留下关于特别与此有关的若干问题的评述。可是，这并不是说，以下所论，都是前而未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接触过的问题。

(甲)一开始，我们要讨论名词本身。垄断者就是**独家卖主**的意思。所以，按字义，任何人都是垄断者，因为他所出卖的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方面——包括包装、位置和服务——都并不和其他人

^①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要素，希望读者了解，当处理有关原则的一些问题时，企图对所接触到的任何问题都能作出充分的公平处理是不可能的。

出卖的东西一模一样：每一个杂货商、每一个服饰用品新货商、每一个在并非只有出卖一个牌子冰激凌的代销店的那条马路上出卖“好脾气”的商人，都是垄断者。可是，当我们在谈到垄断者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人。我们所指的只是那些独家卖主，他的市场并不是打开大门听任同一商品的可能的生产者、或邻近商品的真正的生产者随便闯进来的，或者说得略为技术性一些，垄断者只是面对着一定的需求表的独家卖主，而需求高低既绝对不受垄断者们自己行动的影响，也不受其他企业对垄断者们的行动的反行动的影响的。经过晚近作家们扩大与修正过的、传统的古诺-马歇尔的垄断理论认为，只有像我们这样定义的东西才是垄断，所以似乎没有理由把不适用这个理论的任何事情称为垄断。

可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这样来给垄断下定义，那末事情就立刻变得很清楚，纯粹的长期垄断的事例必定极为罕见，甚至相当近似于这个概念的必要条件的事例，还比完全竞争的事例罕见得多。可以无忧无虑利用一个需求的一定模式——或者其变动不受垄断者行动的影响，也不受垄断者行动所惹起的反行动影响的需求模式——的权力，在未经触动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能存在的时期很难长到足以影响总产量的分析，除非垄断是由政府当局做后台老板的国库垄断。得不到这样保障的——也就是说，即使是由进口关税或禁止进口措施保护着的——现代营业企业而能取得这样的权力的例子（除非是暂时性的）是不容易找得出来，甚至也是不容易想像的。纵令铁路、动力及照明企业，也得首先创造出它们服务的需求来，做到了这点以后，它们还得抵抗竞争来保卫他们的市场。在公用事业领域以外，一个独家卖主的地位，一般只能在他行动得不象一个垄断者时，才能够争取到，并在几十年内保持它。至于短期垄断，下面就要谈到。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在谈垄断？研究政治辩论的心理学的学者对这个疑问的答案不是没有兴趣的。当然，垄断这个概念，象任何其他概念一样被使用得很不严格。甚至所讨论的产业是高度竞争性的产业的时候，人们也会说到一个国家对这样或那样东西实行了垄断^①。事情还不止此。由于垄断这个名词，已成为足以引起公众对被贴上垄断标签的任何利益集团的敌对情绪的诋毁名词，所以我国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新闻记者、政治家显然都喜爱这个名词。在英美世界内，垄断从来就是被诅咒的，从来就是和无功能的剥削联在一起的，在十六及十七世纪的时候，正是英国的行政当局授与了很多垄断特权，它们一方面很美妙地证明了垄断行为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充分证明了愤怒的浪潮是正当的，甚至伟大的伊丽莎白在这怒涛面前也不能无动于衷。

一个民族的记忆比什么都保持得久远。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民族对几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的反作用的另一些更重要的例子。前述英国当局的行为，使英语世界的公众对垄断如此敏感，以致造成这样一种习惯，即他们实际上把自己不喜欢的商业上的任何东西都归于垄断这种恶势力。尤其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看来，垄断几乎已成为一切弊病的始祖——事实上，垄断已成为它所秘藏的妖魔。亚当·斯密^②最初想到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类

① 近来这种所谓垄断，跟禁运若干种原料到某些侵略国家去的建议联在一起而一下子时髦起来了。这类讨论中所要解决的课题，当作比拟，和我们的问题也有若干相关之处。一开始人们认为这种武器有许多可能性。接着更仔细地加以观察之后，人们发现禁运单中的原料项目应该缩减，因为愈来愈清楚，只有极少数东西是禁运区域内既不能生产也找不到代用品的。最后，怀疑使人渐渐明白，即使短期内可以借禁运施加某些压力，长期的发展，最后必将使剩下来的禁运项目实际上全部无效。

② 对亚当·斯密和一般古典派这种非批判的态度，应比对他们的后继者加以更多的原谅，因为我们所指的大实业当时尚未出现。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走得太远了。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没有令人满意的垄断理论，这使他们不但把这个术语用得

型的垄断，他以可怕的威严对之蹙眉蹙额。庇尔爵士——他象多数保守党人一样，有时也懂得怎样向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的武器库借用武器——在他的任职末期的著名的、大大冒犯了他的同僚的离任演说中说到了面包或小麦的垄断，虽然当时英国的谷物生产尽管有保护措施，却当然是完全竞争的^①在我国，垄断实际上被弄成任何大规模营业的同义语。

(乙)简单和差别垄断理论教导我们，除极端事例而外，垄断价格比竞争价格高，垄断产量比竞争产量小。假如两者的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以及此外的一切东西——完全一样，这么说是对的。可是，实际上垄断者可以利用一群竞争者或是完全无法利用、或是不能那么容易利用的较为优越的方法；因为有一些好处，虽非竞争性水平的企业所绝对达不到，事实上只有垄断水平的企业才能得到的，例如，因为垄断化能够扩大才能高的人的势力范围^②，缩小低能者的势力范围，或者因为垄断企业享有不依比例的财政上的优越性等。当事情是这样的时候，这么说就不正确了。换句话说，因为垄断价格并不必然比竞争价格高，垄断产量并不必然比竞争产量少，产量会保持在、和竞争的假设并不矛盾的那种类型的

点混乱(例如斯密，甚至西尼尔，将地租解释为垄断赢利)，而且也将垄断者的剥削权看成是实际上无限的，当然，就是在最极端的事例中，这也是错误的。

① 这个例子，说明了垄断这个术语是怎样渐渐被不正当地应用的。保护农业和农产品的垄断完全是两回事。斗争是针对保护的，不是针对并不存在的。不论是地主的或是农场主的垄断的。但在向保护作斗争中，这也是为了博得喝采。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再没有比把保护称做垄断派更简单的手段了。

② 读者必须注意，虽然按照通例，这种特殊类型的优越性完全是无可辩驳的，低能者，尤其当他们全然被撵出来了的时候，是不愿意承认这样事情的，而公众和做公众的传声筒的经济学家则站出来为它决斗，却决不会心向别人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目前有一种趋势，认为那些准垄断的联营组织倡议人的典型的计划书和声明书夸张了联营所能得到的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好处，认为他们所宣告的好处都应该打个折扣。

企业所能达到的生产和组织的效率水平上面，所以竞争赞成论中的这个要素也许是完全无用的。

没有理由怀疑，在我们时代诸条件下，这种优越性，事实上是典型的大规模控制单位突出的特征，虽然仅仅规模宏大既不是优越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足条件。这些控制单位不仅兴起于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之中，不仅按截然不同于静态图式的方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许多有决定的重要性的情形下，为获得成就提供了必要的形式。它们所剥削到手的东西，多半是它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即使它们是就垄断组织这个名词的技术意义来说的真正的垄断组织，关于它们对长期产量的影响的通常的结论也会是无效的。

动机如何，在这里全不相干。即使其唯一目的是取得机会来定下垄断价格，使用改进了的方法，或者庞大的装置的压力，一般地会使垄断者的最适度价格降低到近于或低于上述意义下的竞争的成本价格；这样，它就做着竞争机制本来会做的工作^①——部分地、完全地，或有甚于完全地——即使在采取了限制措施而超额生产能力显著地一贯存在著的时候亦然。当然，如果生产方法、生产组织等等并没有象在寻常的卡特尔中那样由于垄断化而得到改

^① 美国铝业公司不是上面所规定的技术意义上的垄断，最大的理由是它曾须自己来建立起它的需求表，这件事，足够把它排除在符合古诺-马歇尔图式的行为之外。可是多数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垄断，又因为真正事例的极端缺乏，我们为了这个脚注的目的，也来模仿一下。从1890年到1929年，这个独家卖主的基本产品的价格约跌落了12%，或按价格水平（劳工统计局批发价格指数）校正，大约跌落了8.8%。产品从30公吨提高到103,400公吨。专利权保护于1909年撤消对这个“垄断组织”的成本和利润的批评议论，首先要认定，一大批互相竞争的厂商在减低成本的研究工作，生产设备的经济的扩充，教给产品的新用途，避免浪费性的崩溃等方面，会得到程度和它大约相等的成功。事实上这类批评也都假定了这一点，可惜这等于同时把现代资本主义的推进因素假定掉了。

进，古典派关于垄断价格和垄断产量的定理，以及垄断化有催眠作用的通俗观念，就会再次获得地位。^①有利于这些定理的例子也是不难找到的。但不能在这上面建立起一般理论来。因为，尤其在制造业中，一般说来，哪一种垄断地位都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垄断地位只能借机敏和精力赢得，也只有机敏和精力才能保持。现代企业中的催眠作用别有原因，稍晚我们就要指出这一点。

（丙）在短期间中，真正的垄断地位或近似垄断的地位更为频见。俄亥俄河边村庄中的食品商在洪水期间的几小时甚至几天中可以成为真正的垄断者。每一次成功的囤积居奇行为在那瞬间可以称做垄断。一个长于印制啤酒瓶纸标签的商行，也许能够得到这样的有利环境，即一切潜在的竞争者都懂得他们如果挤进来的话，现在看来很能赚钱的买卖会立即垮台，因而能够自由自在地按照需求曲线的中等的但仍然有限的限度进行活动，至少延续到金属标签将这个需求曲线打得粉碎时为止。

新生产方法或新商品，尤其后者即使只有一家商行使用它们或生产它们，本身并不构成垄断。新方法的产品必须和旧方法的产品相竞争，而新商品还得有人采用，就是说，它的需求表还有待于创建。无论专利权也好，垄断企业的行动也好，照例都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新技术措施具有惊人的优越性，尤其是如果它象制鞋机器那样可以出租时，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在新商品的情形下，永久的需求表在专利权期限届满之前已经建立起来时也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认为在这类企业家利润中包含或可能包含一分真正的垄断赢利成分在内，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颁给成功的革新者的奖金，

① 还请参考前面第一节。

这是对的。但是这个成分的量的重要性，它的转瞬即逝的性质，以及它在由以出现的过程中的功能，使这成分本身成为一个新的范畴。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由专利权或垄断战略保障的独家卖主的地位的主要价值，与其说在于它暂时具有按垄断者的图式行事的机会，不如说在于它所提供的防止市场的暂时的解体的保障和它为长期计划赢得的空间。可是，我们的论证到此已并入前面申述过的分析之内了。

6. 回顾一下，我们领会到，本章涉及的大部分事实和论证，趋向于使一度围绕在完全竞争周围的神圣光轮暗淡下去，正如它们提出了一个更有利于垄断的观点一样。我现在将从这个角度简略地再度申述我们的论证。

传统理论本身，甚至在它所爱好的静止经济或稳定增长的经济领域之内，自马歇尔和埃季沃思时代以来，已经发现了愈来愈多的关于完全竞争、附带地也关于自由贸易这些老命题的例外，因而动摇了对李嘉图至马歇尔这一代——粗略地说，就是英国的约翰·穆勒的世代，大陆上的范拉拉的世代——所怀抱的无条件的信仰。尤其是这样一些老命题，即认为一个完全竞争体系是最理想的节约资源的体系，是一个最适当地按照一定的收入分布状态。配置资源的体系——即和产量变化极有关系的诸命题——现在再也不能以旧时的信任心继续确认下去了。^①

远为严重的是由动态理论领域内更晚近的著作（弗里希、廷柏根、鲁斯、希克斯及其他人）所造成的缺口。动态分析是对前后相继的时序的分析。在解释何以某个经济量，例如价格，就在一定的时刻是我们所见到的那个样子的东西时，它所考虑的不是象静态

^① 因为我们不能深入地讨论这个题目，读者可参考康恩的，题为《关于理想产量的一些意见》的论文，载《经济》季刊 1935 年 4 月号，该文谈到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

理论那样只限于同一时刻的其他经济量的状态，而同时也考虑到它们在以前各个时候的状态，以及预期的它们的未来价值。现在，当我们努力解决和属于各不同时刻的诸量有关的命题时^①，我们首先发现，一旦均衡已被某种干扰破坏，建立新均衡的过程，并不象老的完全竞争理论所证明的那样确定、敏捷、经济；而这样的可能性，即调整的斗争本身，必将引导这样一个体系离新均衡更远，而不是更接近于新均衡。除非干扰不大，这种情形会发生于大多数事例中。在许多情形下，迟延的调整足以产生这样的结果。

这里，我所能做的只是用那最古老、最简单、最熟悉的例子来说明它。假定在小麦的完全竞争市场上，需求和有意提供的供给是平衡的，但是坏天气使收成低于农场主原定的供给量。如果价格相应地提高了，农场主们因而生产了那么多的小麦，即假定新价格为均衡价格时他们感到值得来生产的那么多小麦，那末次年小麦市场上将随着发生价格暴跌。现在如果农场主们又相应地限制了生产，也许会造成比第一年更高的价格，从而诱导生产作比第二年更大的扩充。如此下去，永无尽期——这是完全就过程的必然趋势而说的。读者从有关的假定来看，将不难看出，我们用不着害怕不断提高的价格和不断增多的产量相互交替出现，直到世界末日。可是，即使我们把它缩减到恰当的比例，这种现象也足以暴露完全竞争机制的刺目的弱点。当我们领会这一点的时候，用以美化这种机制的乐观主义，就会走出象牙之门了。

但是，按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走得还要远些。^②如果我们试

① 动态这个名词，用得很不严格，带来了许多不同的意义。上述定义，是由弗里希作出的。

② 应该注意，按定义所示的动态理论的特色，和它所应用的经济现实的性质不发生什么关系。与其说它是对特殊过程的研究，毋宁说它是一种一般分析方法。我们

图摹想完全竞争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怎样起作用，或会做出些什么来，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更令人丧气的结论。考虑到这个过程中一切重要事实，本来并不存在于完全竞争的传统命题所由以得出的经济生活的一般图式之中，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我将不怕重复地再次说明这个论点。

完全竞争意味着自由进入任何产业。在这个一般理论的范围之内，认为自由进入任何产业是资源的最适度的配置，从而也是使生产达到极大值的一个条件，那是十分正确的。如果我们的经济世界是由一批用既定的基本上不变的方法生产一些熟悉的商品的已经成立的产业部门组成的，又如果除了新增的人力新增的储蓄联合起来以便设立现存类型的新商行而外什么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么，阻止它们进入它们希望进入的任何产业，就会是社会的损失。但是，完全自由进入一个新领域，也许就会使进入新领域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很难设想完全竞争——而且是完全敏捷的竞争——一开始就会采用新生产方法和新商品。这就是说，我们所称经济进步的东西，大部分和完全竞争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即使在原来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只要采用了任何新东西，完全竞争也会而且常常会被暂时废止——自动废止，或者通过为此目的想出来的某些措施加以废止。

同样，在传统体系的范围之内，通常对刚性价格的控诉完全站

可以用它来分析一个静止的经济，恰如一个进化中的经济可以用静力学的方法（“比较静力学”）来分析一样。因此动态理论用不着很好地认识到，事实上也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我们视之为资本主义的精髓的东西。在处理分析这个过程中引起的、关于它的机制的许多问题中，动态理论无疑具备比静态理论更好的条件。但是它并非对过程本身的分析，而且它之对待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对诸一定状态和结构的个别干扰，又恰和对待其他干扰一样。所以，从资本主义进化的立场去判断完全竞争的功能，和从动态理论的立场去判断它，并不是一回事。

得住脚。价格的刚性是对适应的一种抵抗，而这是完全而敏捷的竞争所排斥的。就那种适应性改造和传统理论所处理的那些条件而言，认为抵抗意味着损失，意味着减少产量，也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创造性毁灭过程的进发和盛衰变化之中，相反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价格的完全和即时的伸缩性，甚至会造成没有作用的灾难。一般的动态理论当然也能确认这一点，因为这个理论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指出，适应的企图往往使不均衡更紧张起来。

再说，按照它自己的假定，传统理论的下列主张是正确的：利润如超过各个个别事例中为引起生产手段的均衡数额——包括企业家的才能在内——所必需的数量，不但表明有社会的净损失，而且它本身也意味着社会的净损失，同时认为以保持这种利润为目的的营业战略，是有害于总产量的增长的。完全竞争会阻止或会立即消灭这种剩余利润，并使这种战略无存在余地。但是因为是在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利润取得了新的有机的功能——我不想重复地指出它们是些什么功能——就总产量的长期的增长率而言，决不能再把这个事实无条件地记入完全竞争模型的帐户的贷方。

最后，我们的确可以指出，根据这些等于排斥资本主义现实中最突出的特色的假设，完全竞争经济比较地可以避免浪费，尤其能够避免那种我们最容易把它和垄断联系在一起的浪费。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所设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帐户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一方面，许多未考虑到这些条件而显得无可挽救的浪费，若充分联系这些条件时，就会不再不被认为是浪费了。例如，由于“赶在需求之前进行建设”的做法或者由于为需求的周期性高举提供生产能力的做法而得以存在的那种超额生产能力，在完全竞争占

统治时期是会大为减少的。可是，如果考虑了所有的事实，那就不再能认为完全竞争因此而可以完成。因为虽然一个只能接受价格而不能设定价格的企业，事实上往往会动用它的能按现行价格所弥补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的全部生产能力，可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它会始终拥有大实业恰恰因为能够在战略上使用它们而已经创造出来，并且也能够创造出来的那种数量和那种质量的生产能力。这种类型的超额生产能力可以——在若干事例中确实可以，但在其他事例中却不能——构成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的理由。可是不应该不附条件地把它列为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竞争这个类型比“垄断本位”类型优越的理由。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进化诸条件下起作用的完全竞争制度，显出它自己也有浪费。和完全竞争并非不相容的那种类型的工厂，在很多事例中就其内部效率尤其是就其技术效率而言是低劣的。如果情形确是如此，那么它浪费了机会。又因为它在发展和判断新的可能性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它也可以在努力改进生产方法中浪费资本。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在进步或外来干扰的冲击下，比大企业更易被击溃——因而更易散布萧条的细菌。归根到底，美国农业，英国煤矿，英国纺织工业如果各被一打好脑袋所控制，将比现在那样的情况更少破费消费者，也不会象现在那样严重地损害总产量。

所以，认为因为完全竞争在现代产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因为它一向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规模设备或大规模控制单位必须当作和经济进步分不开的不可避免的祸害接受下来，经济进步却因大企业生产结构固有力量的怠工而受到了阻碍，这样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它已经成为经济进步

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尤其已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张的最有力的发动机，总产量的长期扩张不仅不管这种在个别事例中或按个别时点看来那么富于限制性的战略而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实现的。就这点来说，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因此，把政府管理产业的学说置于下列原则的基础上是错误的：应该让大企业象各个完全竞争类型的企业在完全竞争制度下面那样工作。至于社会主义者，与其以竞争模型经济的优点作为他们批评的根据，宁肯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点作为他们批评的根据。

第九章 禁猎季节

前面的分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只好由读者去决定。经济学不过是一种观察和解释的科学，这意味着在我们讨论的这类问题中，意见分歧可以缩小，但不能减少为零。由于同一个理由，我们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只引导到另一个在实验科学中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的门口。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明白，在各种分析“模型”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结构特色，和以总产量指数来描绘的未经触动的或相对地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成就之间，究竟有没有象我在第72页上所說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我对这个问题的肯定的答复，是以这样一种分析为基础的，这个分析，直到通常认为是垄断控制的现代趋势登上舞台为止，始终遵循着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路线。此后，我的分析离开了通常的路线，其目的是表明，任何人在实际上许给了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管是理论上的推定还是某一个时代的历史现实）必定也要，甚至在更大

程度上许给大实业的资本主义。可是因为我们不能把驱动力和动机放到实验站里面，让它们在仔细控制了条件下工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无疑余地地证明它们适于产生出正好是那样的结果，即前面观察过的产量的发展。我们所能说的一切是，过去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成就，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利于达成这样的成就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不能停留在我们的结论上，而还得继续追究另一问题的原因。

演绎地说，人们大概仍然能够将观察到的成就，归因于在任何制度模式中都会表现出来的例外情况。对付这种可能性的唯一办法是，检查有关时期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并探讨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的这样一些例外情况。我们将通过考虑那些由经济学家或历史家所提出的、担当不是资本主义营业过程所面有的例外情况的角色的候选人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样的候选人有五个。

第一是政府的作为。虽然我十分同意马克思所主张的，政治和政策不是独立的因素，而是我们正在分析的社会过程中的某些要素，可是为了这个论证，我们还是可以把政府的作为当作处在营业世界之外的一个因素。1870年左右到1914年这段期间的情形几乎是理想的。很难找出另一个时期，在其中从社会过程的政治方面来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两者都这样微不足道。企业活动和工商业的束缚的解除一般已在这段时期以前完成。新的和不同的束缚及负担——社会立法等等——正在加上去，但在1914年以前，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经济局势中的重大要素。战争是有的。但没有一次战争，在经济上重要得足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挥重大的影响。以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为其结局的德法战争，可能使人怀疑上述说法。但是经济上有关系的重大事件，归根到底只是关税同盟的建立。也有军备开支。但是按军备开支实际达到了真正

宏大规模的 1914 年前十年的情况来说，与其说它是一种刺激，毋宁说它是一种障碍。

第二个候选人是黄金。很幸运，我们用不着去研究围绕着 1890 年左右开始进发的黄金过剩症的作用方法的大堆问题。因为既然在这时期的最初二十年中，黄金实际上还很稀少，而总产量的增加率那时又不比此后时期为小，那么黄金的生产就决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成就的重大因素，不论它对繁荣或萧条曾起过怎样的作用。那时的货币管理还不是进攻性的，宁肯说是适应性的，因此我对黄金问题的推断也适用于货币管理问题。

第三，人口增长。不论它到底是经济进展的原因还是结果，确实是当时经济局势中的一个统治因素。除非我们准备断定它完全是结果性质的，并假定产量的任何变化总会惹起相应的人口变化，同时拒绝承认相逆的联系，而这一切当然都是荒谬的，所以这个因素必须列为一个合格候选人。按当前目的，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澄清局势。

较大数量的能赚钱的就业人员，不论社会组织如何，一般地将比数量较小的就业人员生产得更多。因此，这一段时期中人口实际增长率的部分，如果可以假定为——当时是可以的——和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出来的结果无关，也就是认为在任何其他制度下这样的人口增长也会发生，在这限度内，人口必须列为外部因素。在同一限度内，我们所观察到的总产量的增加并不足以衡量资本主义的成就，而是夸大了它。

可是，若其他情形相同，较大数量的能挣钱的就业人员生产出来的产量，按每个就业人员或按每个人口计算，一般地将小于较小数量的就业人员所生产的产量，不论社会组织如何。它所根据的事实是，工人数目愈多，和每个工人联在一起的其他生产因素的数

额愈小。^①因此，如果选用按总人口每人生产量来衡量资本主义的成就，我们所观察到的产量增加是容易低估实际成就的，因为这个成就的一部分已被吸收去补偿按每人计算的产量的下降；如果没有这部分成就，这种产量的下降就会已经出现了的。问题的其他方面，以后再来考察。

第四第五个候选人得到更多经济学家的支持，但只要我们所论述的是过去的成就，可以很容易置之不理。其一是新土地。从经济上说，在这期间里进入了欧美领域的广漠无垠的土地；从此倾泻出来的大量的食品 and 农业与非农业原料；以及在它们所提供的的基础上到处长成起来的所有的城市和产业——这岂不是产量发展的一个十分例外的因素，事实上还是一个独特的因素吗？不论它所冲击的经济体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体系，这不是一种会开辟出宽广的通向财富的道路的天惠吗？确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学派采取了这种观点，并事实上据此来说明马克思关于日益贫困化的预言所以未能应验的原因。他们认为未开发地区的开发是我们过去所以没有见到更多的对劳工剥削的原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无产阶级才得以享受到一个禁猎季节。

新地域的存在所提供的机会的重要性是没有疑问的。当然这种机会是无与伦比的、绝妙的。但是“客观的机会”——这就是说，和任何社会制度毫无关系的那种机会——总是进步的先决条件，每一个这样的机会都是历史上绝妙的机会。煤与铁矿石在英国的发现，或石油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现，也是同样重要的，并且也同样是一种绝妙的机会。整个资本主义过程，和所有一切进

^① 这种说法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对我们的目的而言似乎也够了。这个世界的资本主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发展到，超过相反倾向起作用的限度之外了。

化的经济过程一样，它的意义正在于开发利用进入实业家视域的这类机会，因此，试图突出其中之一，加以讨论，把它解释成为外部因素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也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新地区的开发是一步一步地由营业企业来完成的，而且营业企业准备了如此所需的一切条件（铁路、电力厂的建设、航运、农业机器等等）。所以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成就的一部分，和其他因素的价值是相等的。所以它们的结果有权进入我们的2%。我们可以再次祈求《共产党宣言》来支持我们。

最后一个候选人是技术进步。我们所观察到的成就，要说它来自生意人的利润猎取，是不是不如说它来自使生产技术革命化的大批发明更为妥当？答复是否定的。使技术革新发生作用是这种狩猎的精义所在。甚至发明本身，如不久以后我们即将充分加以说明的，也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才是产生发明的精神习惯的原因。所以，如果象许多经济学家那样，说资本主义企业和技术进步是观察到的产量发展的两个各不相关的因素，那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们本质上是同一回事，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前者为后者的推动力。

但是新土地和技术进步两者，在我们着手应用外插法时是会产生一些麻烦的。虽然资本主义成就也许可以设想得到地是一些不可能重复发生的成就。而且，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时代所达到的每人产量不是一种偶然事物，而是可以用来粗略测定资本主义成就的，我们仍然面对着另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发动机将——或者，如允许它那么做的话，它会——在不远的未来，比如说今后四十年中，也象过去那样，成功地工作下去，这句话究竟合理到多大程度？

第十章 投资机会的消失

投资机会消失问题如以当代的讨论为背景来加以考察时，则其性质最容易看清楚。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不仅目击了一次遍布全世界的严酷而持久的不平常的萧条，也目击了随后一段时期的停滞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恢复。我已经提出了我自己对这些现象的解释^①，并说明了我何以不认为它们必然表明了资本主义进化趋势的中断的理由。但是我的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经济学家同行之会采取另一种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他们恰恰和他们的某些先辈在 1873 至 1896 年间一样——虽然当时这个意见主要限于欧洲——感觉到一种根本的变化临到了资本主义过程头上。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目击着的并非仅仅是一次萧条和一次也许因反资本主义政策而加深了的不如人意的恢复，而且也是某种活力的永久丧失的征兆，这种活力必须指望它继续下去，以提供资本主义交响乐未奏乐章的主题；所以，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发动机现在正在发挥的作用，不能根据它的过去的成就来为未来作出什么推断。

许多不以主观愿望为思想根底的人们正在坚持这种看法。但是我们将会了解，为什么正是以主观愿望为思想根底的社会主义者们特别踊跃地利用这种意外的好机会——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把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主张的基础完全转移到这上面来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由于可以再次投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得到额外的利益，前面已经指出过，这种传统是他们中间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已愈来愈觉得不得不放弃的。因为，按照第一章中说明过的意

① 见本书第 5 章第 83 页。

思，马克思曾预言过这样一种事态：资本主义在真正崩溃以前，会进入到一个因微弱的上升或偶然的有利机会而暂时中断的永续危机阶段。事情还不止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说明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强调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对利润率的影响，以及经过利润率对投资机会的影响。既然资本主义过程总得靠大量现时投资才能转动，那么甚至投资机会的部分丧失，也就足以使预言这个过程正在垮下来的说法言之成理。这一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议论，看来不仅正好符合于过去十年间某些突出的事实——失业、超额储备、货币市场的供给过剩、不能令人满意的利润额、私人投资的停滞等等——，而且也正好符合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之间确实不存在象马克思和马歇尔或魏克塞尔之间那种鸿沟。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两者，都可以用我们将要用的，投资机会日益消失这一不言而喻的理论^①来很好地说明。

必须注意，这个理论实际上提出了三个互不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跟本篇的标题类似的。既然这个社会世界中从来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永续存在，既然资本主义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社会变革的过程的制度，那么，问题的答案本来也不会有什么出入。第二个问题是，由投资机会消失理论所提供的力量和机制，是不是我们应该加以强调的力量和机制。在下面几章中，我将提出另一个关于将在最后杀死资本主义的东西的理论，但是有些类似的东西将留在这章内说到。可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即使投资机会消失理论所强调的力量和机制本身，足以宜于用来证实资本主义过程存在着最后走上一条死路的长期趋势，并

^① 见我的《商业周期》第15章。

不必然可以据此推定，过去十年的盛衰变化正是由于这种趋势的存在——为了我们的目的，加上这一点是重要的——也不能据此推定，因此之故，今后四十年间，相似的盛衰变化一定会持续下去。

眼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第三个问题。但是我要说的话中有许多也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人们据以证明关于最近将来资本主义成就的悲观预测是正确的，以及据以否定过去成就可能再现的观念的那些因素，可以分为下列三组。

首先是环境的因素。我已经指正过，不久还得来证明，资本主义过程产生了一种敌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一种社会心理状态——它表现在相应的政策里——并且可望积聚起力量来，最后会阻止资本主义发动机的运转。这种现象，我准备暂时搁下放在后面加以考察。读以下各段必须同时读一读这个但书。但是，必须注意，这种心理状态以及和它相连的诸因素，也影响到资产阶级利润经济本身的推动力，因此这个但书的有效范围，不限于初初看去的时候所会想到的东西——至少不限于“政治”。

其次是资本主义发动机本身。投资机会消失论并不必然包括下面所说的另一种理论，但是它往往和这种理论结合在一起，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大规模企业代表资本主义的某种僵化了的形式，限制生产的各种措施，价格的刚性、专门注意现存资本价值的保存等等是它所固有的性质。这些我们早已评论过了。

最后是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发动机靠着它过日子的“材料”，即新企业新投资所能有的机会。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种理论十分强调这个要素，这证明我们给它贴上〔投资机会消失的理论〕这个标签是合适的。这种理论坚决认为私人企业和私人投资的机会正在消失的主要理由是：投资的饱和、人口、新土地、技术可能性，以及现有的投资机会与其说属于私人投资范围，毋宁说属于公共范

围的那种情况。

1. 对人类欲望和技术学（以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每一种给定状态来说，当然每一种实际工资率都有意味着饱和状态的一定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如果欲望和生产方法完全冻结在1800年的状态，这样的饱和点很久以前就已达到了。但是说欲望也许会在某一天完全得到满足，以致从此以后冻结起来不动的了，这样的话岂不是不可设想的吗？不久我们就要阐发其中的某些含义，但是只要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四十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显然用不到为这种可能性而操心。

如果饱和点居然达到了，那么当时的出生率的降低，尤其是人口总数的实际减少，就真正会成为设备更新以外的投资机会减少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每个人的欲望已经满足或近乎满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按假定，将是追加需求的唯一重要来源。但是，人口增加率的减低这件事本身，可以完全不受这种可能性的影响，因而不会危害投资机会或每人总产量的增加率。^① 简略考察一下通常的相反的论点，就能很容易证明这一点。

一方面，有人认为，因为总人口增长率的减低限制了需求的扩张，因此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总产量增加率的减低，从而也意味着减少了投资的增加率。事情并不必然如此。欲望和有效需求不

^① 这对如不久大不列颠可能发生的人口绝对数的微小的减少也是正确的（见查尔斯·伦敦及剑桥经济服务所第四十号特别报告）。人口绝对数的大量减少会引起另外一些问题。可是，因为不能指望它也会发生于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所以我们将略而不论。另外还有一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和社会心理的问题，当总人口平均年龄提高时就会出现。虽然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出来了——确实有“老年人的院外集团”这样的事——我们却不能在这里讨论它们。可是，应该注意，只要退休年龄不变，得在没有捐款的条件下去以赡养的人的百分比不一定会因十五岁以下的人口的比例的减少，而受到影响。

是一回事。如果是一回事，最穷的国家就会表现出最活泼的需求的国家了。正因为不是一件事，所以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所解放出来的收入可以转入别的渠道，当不生孩子的真正动机是渴求扩大其他方面需求的时候，它们也特别容易转入别的渠道。强调日益增长的人口所特有的各种需求方向特别容易计算，因此能够提供特别可靠的投资机会这一事实，确实可以作出一种中庸之论。但是，在一定的欲望满足状态下，为其他的投资提供了机会的欲望，也不见得怎样不可靠。当然，某些产业部门，特别是农业，前景确不光明。可是这不能和总产量的前景混为一谈。^①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可以争辩说，人口增加率的不断降低，会造成从供给方面限制生产量的趋势。过去，急剧的人口增加常常是生产发展的条件之一，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推论，劳动力的日趋稀缺可以指望成为一个限制的因素。可是，这样的议论我们听到的不多，也看不出这样的议论中有很好的理由。1940年初美国制造业产量约为1923—1925年平均数的120%，面工厂的就业人数约为同期平均数的100%，这种观察为可以预想的未来提供了合适的答案。经常性的失业；随着生育率的减低妇女日益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性的工作，以及递减的死亡率意味着生命中有用期间的延长；节省劳力措施的永不枯竭的川流；人口急剧增加时日益增加的防止生产低质量产品的辅助性因素的可能性（部分阻止收益递减律发生作用）——所有这些，充分支持了科林·克拉克的预

^① 似乎许多经济学家都有一种印象，认为人口增加本身就为投资需求提供了另一种来源。为什么——不是所有这些新工人都得给他们用工具装备起来，还得给他们补上一分原料吗？可是这决不是显然如此的。除非允许借人口增加以压低工资，说人口增加提供了新投资机会这种含意还缺少推动力，而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得缩减减少每个就业人口的平均投资额。

期，每人每工时产量在下一代中会提高的预期。^①

当然，通过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政策、以及通过政治干涉劳工的纪律可以人为地造成劳动力的稀缺。把美国和法国 1933—1940 年的经济成就和德国及日本同期间的经济成就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早已发生了。可是这是属于环境因素之列的。

因为我不久还要好好地说明我的论点，所以我现在的确还远未说明所讨论着的现象。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我们将知道，即使从纯粹经济的立场来说，这件事作为一种征兆也好，作为变动着的动机的成因也好，都是极端重要的。可是这是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而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只是人口增加率递减的机械的后果，这对今后四十年间的每人产量的发展来说，确实不支持任何悲观的预测。在这个范围内，断言资本主义正在颓废地走上死路的经济学家们，不过做了经济学家们不幸常常喜欢做的事：正象他们从前根据十分不充分的理由使公众担心由待哺的人口过多所引起的经济危机^②一样，现在他们又以同样不充分的理由使公众担心由人口不足所引起的经济危机。

2. 其次是新土地的开放——这是一个今后永不再有的绝妙

① 《国民收入和支出》，第 21 页。

② 从十七世纪以来，对未来人口的预测实际上总是错的。可是这还有几分可原谅之处。甚至对马尔萨斯的学说也可以原谅。但我看不出残存到今天的这个学说有什么可以原谅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任何人应该已经弄清楚，马尔萨斯人口规律唯一有价值之处是它的附加的诸条件。本世纪的头十年确定地表明它不过是一个吓唬人的妖怪。可是象凯恩斯先生那样一位不愧为权威的人，竟企图在战后时期重赋以生命力！而迟至 1925 年，赖特先生在他论人口的书中还谈到“浪费文明的成就于仅仅（人口）数量的增加之中”。难道经济学永远不会长大成人了吗？

的投资机会。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姑且承认人类的地理边疆已完全封闭——只要考虑到现在有许多沙漠曾经有过田野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地理边疆的封闭就不是十分显著的——即使我们进一步承认，从今以后决不会再有象过去来自新土地的食品和原料对人类的福利作了如此大的贡献的那样的事情——这更为言之成理——我们也不能由此推定，今后半个世纪内按每人计算的总产量因此必会下降，或者以较低的速度增长。如果在十九世纪里进入资本主义领域的土地已经开发到那样的程度，以致收益递减律现在必将发生作用，我们确实应该预期到这一点。可是情形并不如此，而且正如刚才指出过的，人口增长率的递减，使得认为自然对人类努力的报答或者已经，或者马上就要不如从前那么慷慨大度的观念被排除在实际考虑之外。技术进步已经扭转了任何这类趋势，而且，说在可以预想得到的将来，我们若以我们所将知道的一切方法任令总产量的扩张奔驰向前，我们将生活在食物和原料的令人发愁的丰饶之中，这种断言是绝对不会出什么毛病的。这同样适用于矿物资源。

还剩下另一种可能性。虽然按人口计算的食物和原料的经常产量不一定会受到损害，甚至还会增加，可是因为新地区的开发任务已经完全，因此开发任务为企业和投资提供的浩瀚机会看来已经消失，而人们正在根据由此形成的储蓄出路的减少，断言各式各样的困难。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再假定这些地区实在已经再无发展余地，而储蓄却未能适应这种出路减少的局面，所以，除非找到另外的出路，麻烦和浪费大概是不可免的。两个假定确实都是最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研究它们，因为关于产量的未来发展的结论，是依据第三个毫无根据的假定，即没有其他出路这一假定作出的。

第三个假定，完全由于缺乏想象力，它可以作为一种常常歪曲历史解释的错误的例证。某种历史过程的特殊面貌使分析者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总是急急忙忙想把它当做事变的根本原因，不管它有没有权利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例如，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粗略地符合于波托西诸矿的白银流入的时期，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君王们习惯于挥霍，常常弄得入不敷出，只好不断借债。这两件事显然都经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和当时的经济发展发生关联——甚至把农民叛乱，宗教骚动和这两件事联在一起也是并不背谬的。分析者于是巧妙地跃进到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秩序的兴起和它们是因果相联的，而且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极少数的同类型的因素）那时候的封建世界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世界。但这实在是另一个命题，从表面上判断，这还是一个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的命题。我们所能肯定的不过是，历史事变是经过这条路走过来的。不能由此推定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顺便说说，在这种情形下，甚至不能认为这些因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虽然确实是有利的，在某些方面显然也阻挠了它的发展。

同样，正如我们在前章中说过的，有待开发的新地区为企业提供的机会。肯定是极好的但这只是就这样一个意义说的，即所有的机会都是极好的。不仅认为“边疆的封闭”将形成真空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认为任何进入空白地区的步骤必然是较不重要的也是毫无根据的，不论我们愿意赋予“重要”这个词以什么意义。空中的征服很可能比印度的征服更为重要——我们决不可以把地理的边疆和经济的边疆混为一谈。

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地位，在一种类型的投资机会代另一种机会而兴起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这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或

地区愈小，它的命运愈是密切结合于某个特殊的生产要素，则这个要素不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未来所怀的信心愈小。所以，农业国家或地区也许会因为化学合成产品（例如人造丝，染料，合成橡胶）的竞争而长期受到损失，如果把生产过程看作一个整体，总产量也许有净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也许不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安慰。说这种事态，在经济世界划分为若干互相敌对的国家的势力范围时可能造成更紧张的后果也是正确的。最后，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能断定，由于新国家的发展而引起的投资机会的消失——如果它们早已在消失中——不一定形成某种必然要影响产量增加率的经济空白，这也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断定，减少了的投资机会，确实会被另一些至少相等的机会所代替。可是，我们却可以指出：〔新国家的〕发展自然要在同一国内或在其他国内引起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多少可以信任资本主义发动机发现或创造新机会的能力，因为这是和它的真正目的紧紧扣在一起的。这些考察并未完全否定我们的消极结论，但是回忆一下我们所以涉及这个题目的理由，这也已经足够了。

3. 有一种类似的论点可应用于被广泛地接受的下列观点，人们在技术进步方面已迈出了大步子，但只有一些不重要的成就。就这种看法不仅仅表白了世界危机和危机以后时期所获印象——那时头等重要的新奇事情的明显的阙如是任何大萧条的大家熟知的模式的一部分——而言，它比“人类边疆封闭论”更好地例证了经济学家们容易犯的解释上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处在创造了电力厂、电器工业、电化农场、电化家庭和汽车的企业活动的一次周期的下坡路上。我们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看不出重要性可与比拟的机会将从什么地方再度来到。可是，事实上仅以化学工业所作约许而论，就要比，譬如说 1880 年

所能预想的机会大得多，更不必说光是利用电气时代的成就，以及为大众生产现代住宅，已经足够为将要到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提供投资的机会了。

技术上的可能性是未经测绘的海洋。我们可以测量某个地理区域，估定各个地块的相对肥沃程度，虽然只能按照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来估定它们。给定这样的技术水平，不考虑未来技术上可能有的发展，这时我们也许认为（虽然历史地说这是错误的）最好的地块应首先开垦，接着开垦较次的，依次类推。在过程的某个时间上，留待将来开垦的只有相对低劣的地块。但是我们不能按这种方式推论技术进步的将来可能性。不能因为有些技术利用得早，就推定它比别的技术生产力高。还在诸神怀抱中的技术，既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迄今我们看到的技术的生产力。当然这种说法又只能得出一个消极的结论，即使研究工作和经营管理的系统化和合理化使技术进步倾向于变得更有效，脚步更踏实，也没有力量把它转成积极的结论。但是消极的结论我们已经听够了。没有理由预期产量增加率会由于技术可能性的耗竭而放慢下来。

4. 投资机会消失理论还有两个变种有待考察。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总得在某个时候用必要的设备把它们装备起来。他们说，这一工作大体上已在十九世纪完成了。当这一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它不断创造出对资本货物的新需求，可是自此以后，除追加而外，剩下的需求只有设备更新。于是，资本主义武装自己的时代，结果证明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万分紧张地为自己生产必要补充的机器工具为特征的一个绝妙的插曲，因而资本主义装备自己的目的，变成了为此后的生产以现在不可能保持的速度进行生产。这真是一幅惊人的经济过程的图画。难道十八世纪时，或我们祖先住在洞窟里的时候，事实上没有生产设

备?如果有生产设备,为什么十九世纪追加的生产设备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达到了饱和点?而且资本主义每当添加铠甲的时候,新添的铠甲照例和先前存在的铠甲相竞争。它们摧毁后者的经济有用性。因此,提供设备的任务永不能一劳永逸地一次解决。更新设备的准备金足以解决该项任务的事例——象在没有技术变化时它们通常所能解决的那样——是例外。当新生产方法具体体现于新产业部门的时候,事情特别看得清楚;汽车工厂所需资金显然不是由铁路的折旧准备金支付的。

读者无疑会注意到,即使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论点的诸前提,也并不必然能够据以推论出关于总产量扩张率的悲观预测。相反,他尽可以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因为不断更新而可以永久维持其经济生命的大批资本货物的积蓄,若说会起什么作用的话,那也应该是便利总产量的进一步增加。他如果这样推断,他就是完全对的。论证全然依据于和资本生产密切相联的一个经济体系,面临资本货物需求增加率下降时所会引起的骚动。但是这种骚动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很容易被夸大。以钢铁工业为例,它们从几乎专门生产资本货物的工业转变为主要生产耐用消费者货物或供生产耐用消费者货物用的半成品的工业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重大的困难。虽然在每一个生产资本货物的现存产业部门内不见得都能得到转变中的补偿,可是一切事例所牵涉到的原则却是相同的。

另一个变种是这样的。把繁荣的信号传播到整个经济机体去的一阵一阵的经济活动,当然总是和生产者开支的扩大联系在一起,这种开支则又和工厂设备的新建扩建联在一起。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发现了或者认为发现了,现时新技术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所需的固定资本比起过去所需的来,尤其比起铁路建筑时代所需的来有减少的趋势。于是由此推论,基本建设的耗费,今后在相对

重要性上将有所减少。既然它反过来会影响和所述及的总产量增加率显然很有关系的一阵阵间歇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可以推定，这个增加率势必会下降，尤其如果储蓄按老比例继续下去的话。

新技术变得愈来愈节省资本的这一趋势，迄今为止还未得到充分的证实。截至 1929 年为止的统计证据——此后的证据是不适用的——指向另一个方向。这个理论的创始者们提供的是一批孤立的、不足以反对其他例子的例子。但是让我们姑且承认这样的倾向是存在着的。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过去曾使那么多经济学家在节省劳力措施这个问题上发愁的同样的表面性问题。节省劳力措施也许有利于劳工也许不利于劳工，但是没有人怀疑，整个说来它们有利于产量的扩大。节约**每单位最终产品**所需资本货物的支出的措施——不考虑储蓄——投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骚动。夸大这一点现在已经是一件时髦事情——同样有利于产量的扩大。实事上说几乎一切经济上行得通的新生产过程既节省了劳力也节约了资本，是离真理不远的说法。铁路同客运量和货运量相同的驿路马车和货车来比在运费上节省了资本。同样，利用桑树和蚕来生产丝比生产相同数量的人造丝也许——我不知道——更费资本。这对早已被淘汰了的资本所有者而言也许是很悲惨的。但是它不一定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更不一定意味着产量增加率的减低。谁若单单因为每单位资本的生产效率继续不断比前提高，希望从这里看到资本主义的崩溃，那就真得等待很久。

5. 最后，既然有些经济学家不断告诉公众说政府赤字支出是必要的，他们决不会不搬出他们老在主张的论点，即剩下的投资机会更适合于公共企业而不适合于私人企业。在某种程度内这是对的。首先，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大，按其性质不会进入任何成本—利润计算之内的开支，例如美化城市、公共卫生等等支出会愈来愈增

加。第二，产业活动中不断扩大着的一部分，例如交通手段、海港、电力生产、保险等等，仅仅因为它们愈来愈适于公营而会变成公营企业。所以，正如在别种公共计划形态内可以指望国家和市的投资作绝对的和相对的扩大一样，甚至在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内也可以指望这一点。

但事情也仅止于此。为了承认这件事，用不到对私营产业活动的进程作任何假设。此外，对当前的目的来说，在未来的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产量的扩大中，究竟大部分还是小部分应由公共机构而不由私营机构出资经营的问题，是无关重要的，除非另外有一种主张，认为公共财政应当担当起这个任务来，因为私营企业无力负担未来时期任何投资会发生的亏损。可是，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的文化

离开纯粹经济考察的领域，现在我们转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补足部分——如果我们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是转到它的社会心里学的上层建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尤其是资产阶级特有的精神状态方面。可以极端的简略，把突出的事实叙述如下。

五千年前，人们对待他环境中的危险与机会的方法，某些“史前史家”、社会学家、人种学家一致认为跟现代原始人的态度约略相同。^①这种态度的两个要素对我们特别重要：初民心理过程中的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不过我相信，由李维-勃罗尔的著作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特别可参看他的《低级社会中的心理机能》（1909年），和《原始人心理中的超自然和自然》（1931年）。第一本著作所持观点和第二本著作所持观点区别很

“集团的”和“感情的”性质，以及部分与此相一致的、我在这里不十分正确地称之为巫术的这种东西的作用。第一种要素我用来专指这样的事实：在小的、尚未分化的、或分化不严重的社会集团中，集团观念之强加于个人心灵，比在大的错综结合的集团要严厉得多；以及得出结论作出决定的方法，为了我们的目的，可以下列否定的规范为其特征：不理睬我们所称的逻辑，特别不理睬排除矛盾的规则。第二个要素，我专指使用一组信仰，这种信仰确实并不完全和经验分离——没有一种巫术能经得住不中断的一系列失败而能存在下去——而是在一系列观察到的现象中插入了来自非经验本源的诸实体或诸势力。^① 这种类型的心理过程，和神经病患者的心理过程的相似性，已被德罗马尔（1911年，他的术语“解释的精神错乱”，[*délire d'interprétation*] 特别有启发性）和弗洛伊德（《图腾及禁忌》，1913年）指出。但不能由此推定，我们自己时代中的正常人的心灵和这种心理过程全无关系。正相反，任何政治问题的讨论，都将使读者深信，我们自己的心理过程的很大和最重要的——决定行为的——一部分，恰恰属于同一性质。

所以，合理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合理主义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上面指出的否定的规范的不存在。它不过是指社会生活中下述那个部分的缓慢的虽然是不停止的扩展，在这个部分中，个人或集团打算这样来对付给定的局势：第一，试图或多或少——决不完全

大，在《原始人的心理》（1921年）和《原始人的心灵》（1927年）两书中可以辨认出其间转变的痕迹。李维-勃罗尔是对我们特别有用的权威，因为他的下述命题——事实上他的著作是从这个命题出发的——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人类的思维及其精神结构的“执行”功能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人类由以发展的社会结构。对于李维-勃罗尔说来，这个原则并不来自马克思却来自孔德，但这是无关重要的。

① 上段文字的一位友好的批评者劝告我，本文中这一段话可能不是我本来的意思，因为照那么说法，我将称物理学家的“力”为一种巫术手段。我的意思倒确实是那样的，除非人们同意“力”这个名词，不过指常数乘位移的二次导数。见本文中第二句话。

——按他们自己的见识最好地利用这种局势；第二，这样做，是按照我们所称为逻辑的那些首尾一贯的规则；第三，这样做，是根据能够满足下列二个条件的一些假定的：假定的数目应为最小的数目，每个假定必须用潜在经验来表现。^①

这一切当然都很不充分，但它可以满足我们的目的。可是，为了将来参考，我还要在这里指出关于合理主义文化的概念的另一个问题。当关于生活中日常工作的合理分析和合理行为的习惯已经走得够远的时候，也往往就要转过身来面向许多集团观念，批评它们，并在某种范围内“合理化”它们，所用的办法是质问，为什么该有国王、教皇、臣服关系，什一税和财产。附带说说，注意到下面的事情是重要的：尽管我们多数人会承认这种态度为精神发展“较高阶段”的征象，这种价值判断却并不必然是，也不是在每种意义上被它的结果所证明了的。合理主义的态度可以经过如此不充分的情报和不成熟的技术而发挥它的作用，以致它所诱发的行动——尤其是普遍的外科手术的癖好——在后代的观察家，即使站在纯粹知识的立场上看来，也都比当时多数人觉得应评为低智力商数的行动和反外科手术癖好的态度更为低劣。十七、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政治思想证实了这种永被遗忘的真理。较晚的“保守主义”的反批评，不仅就其社会见解的深刻性而言，即在逻辑分析中也显然较为优越，虽然在启蒙作家看来，保守主义的反批评是大可一笑置之的。

但是，合理的态度大体上首先是由于经济必要性而强加于人类心灵的。正是日常经济任务，才使我们作为一个族类得到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我毫不犹豫地说，所有逻辑导

① 我用这个康德主义的词句，是为了防止一个显著的反对意见。

源于经济决定的模式，或者，用我的得意的词句来说，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由于下述原因，看来这是言之成理的。假定某个“原始”人所使用的一切机械中最初等的，我们的猩猩老表早已赞赏的一根棍子在他手里断成了两截。如果他试图借背诵一个巫术咒语——比如他可以念念有词地说**供给与需求**或**计划与控制**，指望背到第九遍时两段断棍会重新接上——来挽救这个损失，那么他就处在合理思想的领域之内。如果他摸索接上断棍或再取得一根棍子的最好办法，那么按我们的意义说他就是合理的。两种态度当然都是可能的。但是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这种经济行为或其他多数经济行为中巫术咒语的失败，比可以使我们在格斗中得胜，在恋爱中幸福，从良心上消除犯罪重荷的巫术咒语的任何失败要明显得多。正是经济行为中的铁面无情的明确性，以及在多数事例中的量的特征，才使它有别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也许经济欲望及其满足的无尽旋律的非感情的灰暗色调也形成了这样的区别。合理的习惯一旦确定下来以后，由于有利经验的熏陶就散播到经济以外诸领域，在那里人们也睁开眼睛看那令人吃惊的东西——**事实**。

这个过程和任何经济活动的特定样式完全无关，从而也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样式，和利润动机及利己主义完全无关，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贪婪，事实上并不亚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以农奴或骑士领主为例，他们各以其全部兽性的精力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资本主义用两种相互联结的方法发展了合理性，并给它加上了一条新刃口。

第一，它将货币单位——它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创作——提升为计算的单位。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转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式簿记^①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用

不着深论，我们可以指出，本来是经济合理性进化的产物的成本-利润计算体系倒过来反作用于这种合理性；它借具体化和数字上的精确化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逻辑。经济领域这样精确化和数量化了以后，这种类型的逻辑、态度、方法从此开始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压服——合理化——人类的诸工具和哲学，其医药方法，宇宙观，人生观事实上包括其审美观念，正义观念及精神抱负等的一切东西。

从这一点上看，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是，现代的数学-实验科学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发展，不仅和通常称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个社会过程共同前进，也是在经院哲学思想的堡垒之外，在它的傲慢的敌意下前进的。十五世纪的数学所关心的主要是商业算术的问题和建筑学上的问题。由工匠这一类人所发明的功利主义的力学方法是现代物理学的本源。伽利略的倔强的个人主义是勃兴中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外科医生开始超越了产婆和理发匠的圈子。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同时是工程师和企业家——不朽的典型如芬奇，埃耳伯提，栖林尼；甚至杜勒也忙于筑城计划——最适当地证实了我的一切意思。意大利各大学中的经院哲学教授们诅咒这一切，这比我们所给他们的光荣表明了更多的意义。麻烦不在于个别非正统的命题。可以相信任何一个庄重的经院哲学家都会曲解圣经上的文字来适合哥白尼的体系。但是教授们完全正确地懂得这类勋绩背后的精神——合理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兴起中

① 桑巴特曾强调过，而且是出色地过分强调过这个要素。复式簿记是一条漫长而曲折道路的末一步。它的最直接的先辈是不时盘点存货和计算盈亏的做法。参看萨坡里在《托斯卡纳历史丛书》1932年版第7卷中所说的话。巴栖奥里关于簿记的论文（1949）的发表日期供给了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历史和社会学说来，一件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是，直到十八世纪，合理的簿记为公共基金的管理所使用，甚至在十八世纪时，也使用得十分不完全，不脱“官房”簿记的原始形式。

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精神。

第二，兴起中的资本主义不仅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态度，即提出某些疑问，并设法用某种方法回答这些疑问的那种精神态度，而且也产生了人和手段。由于破坏了封建环境和扰乱了采邑和村落公社的智识上的和平（虽然修道院中总也不会缺少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东西）尤其是，由于为屹立在经济领域的个人成就上的一个新阶级开拓了社会空间，它反过来又把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力的人吸引到了这个领域之中。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没有为能够超越阶级界限的成就留下什么活动余地，换一种说法，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不足以争得足与当时统治阶级的成员相比拟的社会地位。并不是说它一般地阻塞了上升之路。^①但是，广义地说，营业活动本质上是低人一等的，工匠行会范围内的成功即使达到绝顶还是一样。要使这种成功超出行会范围之外是绝难的。主要的飞黄腾达的道路是教会——几乎整个中世纪和现在一样，这是一般人可得其门而入的——还可以加上大的地区贵族的衡平。法院和骑士领主的教阶政治——这是肉体上和精神上合格的任何人在十二世纪中期以前都进得去，其后也还并不是完全进不去的门路。直到资本主义企业——最初商业及金融业，然后矿业，最后是工业——展开了它的可能性之后，具有超乎寻常的才干和抱负的人们才开始转向营业活动这一第三条通道。成功是迅速而眩目的，但是按其所带来的社会权势来说最初是夸张过甚的。如果我们检查一下雅各布·福格尔或阿古斯梯诺·契其的经历，就不难明白，他们在指导查理五世或教皇利奥十世的政策方面没有做出

① 我们过于偏向于视中世纪社会结构为静止的或死板而不动的。事实上中世纪“贵族的循环”——用帕累托的术语——是川流不息的。公元900年左右的最高阶层的组成成分，公元1500年左右实际上完全消失不见了。

什么来，他们为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①但是企业家的成功对于除封建社会的最高阶层以外的任何人都是富于诱惑力的，它拉走了大多数头等人才，这样它就取得进一步的成功，为合理主义的发动机创造了额外的蒸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到底是使人类行为合理化的推进力。

现在我们好容易跟我们的复杂而不充分的议论所要导致的直接目的^②见面了。不仅现代机械化的工厂和由此倾吐出来的大量产品，不仅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组织，而且现代文化的一切特色和成就，也直接或间接地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它们必须包括在它的任何资产负债表和任何关于它的功过的判决书内。

这里有合理的科学的成长和它的应用的一张长长的清单。人们毫不犹豫地承认飞机、电气冰箱、电视机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利润经济的结果。但是，虽然现代医院通例不为利润而经营，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仅因为——让我重复一下——资本主义过程提供了手段和意志，更为根本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产生用在这些医院里的方法的思想习惯。对癌症、梅毒、结核病的胜利——虽然还未完全赢得，但已离胜利不远了——正如汽车、输油管、贝塞麦钢一样是资本主义的成就。在医药的事例中，

① 美迪奇家族实际上并非例外。因为虽然他们的财富帮助他们取得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统治权，可是是这个统治权本身而不是他们的财富使这个家族扮演了他们的角色。无论如何他们是唯一曾经上升到与封建世界中最高阶层平等的地位的商人家庭。我们所找到的真正的例外，只是资本主义进化已经创造出一个环境或完全摧毁了封建阶层的地方——例如威尼斯或尼德兰。

② 我说直接目的，是因为前而几页的分析对其他目的的分析也是十分有用的。事实上，这对于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的任何严肃的讨论说来，是根本性的。

在技术方法背后有一种资本主义的专门职业，它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营业精神工作，也因为它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混合物。即使事情并非如此，现代医药和卫生仍和现代教育一样，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副产品。

这里有资本主义的艺术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只举绘画作为一个例子，一方面为了简略，也因为这个领域内我的无知略逊于其他方面，如果（我认为是错的）我们同意从基奥多的圆剧场壁画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接着沿着这样一条线（虽然这种“线性”议论完全是可咒诅的）基奥多——马萨栖奥——芬奇——密开兰基罗——格雷科，那么随你怎样强调格雷科的神秘的热情，也不能抹煞我的理由，因为谁都长着看东西的眼睛。芬奇的经历是贡献给那些似乎希望用他们的指头去摸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怀疑者的。这条线如果再延伸下去（是的，我懂得）就可以把我们带到特拉克罗和英格雷斯之间的对比的彼岸去（虽然也许喘息着上岸）。啊，我们到了；塞尚耐、凡·哥、毕加索或马蒂斯等。表现主义者对客体的清算形成一个可敬的逻辑结论。资本主义小说（登峰造极于龚古尔的《写成了的文件》）的故事更妥当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进化可以容易地——也许是最有效果地——用现代交际场中西服的起源来叙述。

最后还有可以集合在葛莱斯东自由主义这个象征性的中心的周围的一切东西。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义这个名词是一样妥当的——事实上还要好些，因为我们所要包括在这个名词之下的东西，有些是葛莱斯东不会赞成，而我们所指的那种道德面貌和精神态度，是坚持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葛莱斯东所真正憎恶的。如果不是因为激进主义者的祷告书多半以对于我们要表达的意思的栩栩如生的否认为其内容，我倒不打算在这里多谈这个问题。激进派

可以坚持说，大众正在要求从无法忍受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他们正在黑暗和绝望中使他们的锁链铿锵作响，但是当然过去从来没有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多的个人身心两方面的自由，从未那么欣然容忍甚至资助领导阶级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来没有这么对实在的或幻想的苦难寄与积极的同情并且欣然接受负担；而且不管到底是怎么样的民主主义，历史地说，它总是在农民社会之外，在现代和古代的资本主义的激发下发展起来的。当然，可以援引来作反驳的过去时代的事实是丰富的，反驳也可以是有效的，但是这却和关于现在的情势和未来的另一种情况的讨论不相干的。^① 如果我们的确下决心从事历史的探究，那么即使在激进派的批评家看来最适合于他们目的的事实，如果拿来和前资本主义的经验中相应的事实作比较，也总会看出另一种情形。不能回答说：“这是不同的时代”。因为造成了这种区别的，分明正是资本主义过程。

必须特别指出两点。我前而已经指出过，社会立法，或更一般地说，为了加惠大众而实行的法制改革，并不仅仅是缓和贫民的日益深化的贫困的不可抗拒的，必要性强加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过程除了通过它的自动效果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之外，也为社会立法提供了手段“和意志”。引号中的字所需的进一步解释，可以从合理性的不断散播这个原理中找到。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自

^① 这类控诉在马克思的时代还不象今天这么荒谬，可是，甚至马克思显然也认为最好通过详细研究，当时已成过去或看得出来正在成为过去的情况来加强他的理由。

由思想”，在它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地接受尘世天堂的意义上说来，确实不是借逻辑的必然性从这里推论出来的，但它仍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我们父祖相传的义务观念已被剥夺了它的传统的基础，变为以人类进步的功利主义观念为其焦点，它诚然是不合逻辑的，可是它比，譬如说对上帝的敬畏看来更挡得住合理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这种灵魂的合理化，消蚀各种阶级权利曾有过的超经验制裁的一切魅力。于是，它跟对效率和服务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热忱——和古代典型骑士已把它和那些名词联在一起的思想体系迥然不同——在一起，在资产阶级本身范围内培养了这种“意志”。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它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论点。读者会明白这些趋势，必定要“客观地”予以了解，因此，任何反女权主义或反改革主义的谈论，或者甚至是暂时性的对任何特定措施的反对，都不能够证明相反于我们的分析的任何东西。这些事情才是它们假装着要和它斗争的那种趋势的真正的征兆。关于这点，还有很多话留在后面几章去说。

资本主义文化又是合理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两者当然是并步前进的。工业和商业上的成功需要大量精力，但是在骑士看来工商业活动本质上是非英雄主义的——没有刀剑的挥舞，用不着肉体上的勇敢，没有机会骤马冲入敌阵，毋宁说这是一种异端或异教——赞美为战斗而战斗，为胜利而胜利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得到会在公事房里、在表格的数字栏中渐渐枯萎。所以，拥有吸引强盗或税吏注意的资产，不沾有甚至讨厌与它的“合理”的功利主义相冲突的骑士意识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根本上是和平主义者，倾向于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用私生活的道德戒律。诚然，和平主义和国际道德不象资本主义文化的大多数特色，而象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其他特色一样也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之中受到非

资本主义机构的袒护，例如在中世纪时曾受到罗马教会的袒护。可是现代和平主义和现代国际道德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鉴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新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不少非社会主义的意见——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篇中所见的，强烈地反对这个命题，^①有必要指出我们的命题既不想否认很多资产者曾为他们的家园作过出色的战斗，也不想否认几乎所有的纯粹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机有利时常常是侵略性的——象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没有一个资产者不曾喜欢过战争利润，‘不想利用征服的机会取得贸易上的利益，或者拒绝过它的封建主人、封建领袖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的训练，拒绝过某些特别利益集团的战争宣传的训练。我所主张的不过是，首先，这些资本主义好战性的例子，不能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完全或主要地——以经常酿成资本主义征服战争的阶级利益或阶级状况为依据来解释；第二，在做一件你认为你生活中正常的事业，为此你一年到头准备着，并用它来决定你的成败的事，和做一件不是你的本行，不适合于你的正常工作和精神状态，其成功将增加最非资产阶级性质的专门职业的威望的事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三，由于这样一种差别，它坚定地——在国际事务中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反对使用武力，赞成和平安排，即令在金钱利益的计较分明有利于战争的时候，而在现代条件下这种情形一般是很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结构和态度愈完全资本主义化，我们就愈可以发现其为和平主义的——并且愈偏向于计较战争的成本。由于各个个别模式的性质都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只有经过细密的历史分析，才能完满地得出上述结论。但是资产阶级对军队（常备军）的态度，资产阶级社会

^① 见第1篇第4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讨论。

进行战争的精神及其方法，以及他们在任何长期战争情形下容易降服于非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事实本身就是结论性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化最后阶段的理论，即使完全不问纯粹经济学上的反对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不象读者大概希望我做的那样准备作出总结。这就是说，我不准备在他决心信赖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所鼓吹的未经实验的另一条道路之前，邀请他再次看一看资本主义秩序令人难忘的经济成就和更令人难忘的文化成就，以及上述两者所提出的巨大的希望。我不准备争辩说，这种成就和这种希望本身就是以支持这样的论点：承认资本主义过程将继续发挥作用；并且不难说明资本主义将从人类身上卸除贫困的重荷。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纵令人类能象一个实业家在两台竞卖的机器之间自由选择那样进行自由的选择，也不能从我试图表明的事实和事实间的关系中推论出什么决定性的价值判断。拿经济成就来说，不能由此推论，人们在今天的产业社会中比他们在中世纪的某个采邑或村落公社中“更快乐些”，甚至也不能说“处境更好些”。拿文化成就来说，人们可以接受我所写的每一个字，可是从心底里憎恶它——憎恶它的功利主义，憎恶它全盘毁坏了随功利主义以俱来的意义。此外，正象我将在社会主义这个代替者的讨论中必得强调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更少关心资本主义过程在产生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中的效率，却更多关心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种人类，于是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他们的生活弄成一团污糟。有一种激进派的资本主义文化否定论所依据的就只有愚蠢、无知和不负责任，除此而外再无其他，他们不能或不愿掌握最昭著的事实，且不说它的更广阔的含义了。但是完全的否定论也一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

可是，关于资本主义成就的价值判断，不管是赞成的或反对的，都没有什么兴趣可言。因为人类不能够自由选择。这不仅因为人民群众不能理智地比较各种可以选择的途径，而总是接受人们现在正在对他们说的话。这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由。被自己的动能所推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事物和由此形成的局势，迫使个人和集团按某些方法做他们也许想要做的一切事情——确实不是通过破坏他们选择的自由，而是通过塑造他们进行选择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缩小他们据以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表。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那么我们大家都得是马克思主义者。结果，资本主义成就甚至是不适合于作出什么预测的。大多数文明，在它们有时间完成它们约许要做的事情之前就消失了。因此我不准备依据这种成就的强度来论证资本主义这个插曲似乎会延长下去，事实上，我现在准备作截然相反的结论。

第十二章 崩坏中的墙垣

1. 企业家职能的陈废

我们在关于投资机会消失理论的讨论中，曾作了有利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保留：人类的经济欲望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得到充分满足，以致推动生产继续前进的动力将所剩无多。即使我们保持在现有的欲望范围内，达到这样的满足状态也无疑是遥远的未来的事；如果我们估量到，当较高的生活水平达到了的时候，欲望又自动地扩大了，新欲望抬起了或被创造出来了^①，满足又成了翱翔

^① 威廉·冯特称之为目的的变种生殖(Heterogonie der Zwecke)[英语: Heterogony of Aims.——译注]

空中的目标，尤其如果我们将闲逸包括在消费者货物中去的话。可是，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可能性，并且，更不现实地假定，生产方法已经达到了无可改进的完善状态。

于是跟着就会发生一种多多少少静止的状态。本质上是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要萎缩下去。企业家将无事可做。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处境很象在完全保证了永久和平的社会中的将军们的处境。利润，还有亦步亦趋的利率，将收敛到趋于零。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工业和商业的经营管理会变成日常事务的管理，工商业中的人物将不可避免地取得官僚主义的特征。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人类精力将离开营业事务。经济以外的事业将吸引人们的心思才力，并提供冒险〔的机会〕。

就可以计及的将来来看，这种悬想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但是，确有某种较大的重要性附着在下面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期望于近似完全的欲望的满足或技术的绝对完善对于社会结构和生产过程的组织的诸效果，也可以指望它发生于早已清楚地观察得到的某种发展之中。进步本身也象一个静止经济的经营管理一样可以机械化，而这种进步的机械化又可使企业家精神及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和经济进步停止时一样大的影响。为了看清楚这一点，只要再说一说下列二个问题就够了：第一，企业家的职能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二，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秩序的生存说来，企业家的职能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的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用过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早期的铁路建

设，第一次大战前的电力生产，蒸气和钢铁，汽车，殖民地冒险，是一些眩人眼目的大类的例子，其间还包括了数不清的较为卑微的类别——往下数一直可以数到比如在制成特种灌肠、牙膏等方面取得成功之类的事情。正是这种活动，造成了使经济机体革命化的周而复始的“繁荣”，以及由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扰乱均衡的冲击而引起的周而复始的“衰退”。着手进行这些新事务是困难的，而且构成一种特定的经济职能，第一，因为它们处于谁都懂得的例行事务之外，第二，因为周围环境也通过各种办法来抵抗它们，这些办法因社会情况而异，从简单的拒绝提供资金或拒绝购买新东西，直到对试图生产新东西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在一向熟悉的信号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满怀信心地办事，以及努力克服这些抵抗，需要一种仅见于极少数人身上的足以说明企业家风格或企业家职能那种特别资质。这种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些东西或创制出企业得以开发利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把事情付诸实行。

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度地丧失下去，即使以企业家精神为其主要推动者的这个经济过程本身仍然毫不减退地在继续行进。因为一方而，做一些熟悉的例行事务之外的事情，在现在比过去容易得多了——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技术进步愈来愈成为一伙有训练的专家的业务，他们作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使它按照可以预测的方法进行工作。早期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在急剧地磨灭，因为可以精确计算的东西已愈来愈多，而在过去，只有在天才的闪光下才能摹想它们。

另一方面，周围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最好的例子是，新的消费者货物和生产者货物滚滚而来——它不但不抵抗这种经济变化，而且还把它看作当然之事；在这种环境中，人格和

意志力量必然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存在下去，受到生产过程的革新的威胁的利益集团的抵抗不见得会死得一口气都不剩。例如，在走向大量制造便宜住宅的道路上，上述抵抗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物，因为这种大量制造是以彻底机械化和通盘消灭建筑工地上效率不高的工作方法为先决条件的。但是一切其他性质的抵抗——尤其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只因为新东西是新的而对它进行的那种抵抗——早已几乎完全消失了。

这样，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参照军事的比拟，将再次帮助我们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在旧时代，粗略地说，在拿破仑战争以前（也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将才意味着领导才能，成功就是统帅个人的成功，他赚到以社会威望为内容的相应的“利润”。在那个时代的战争技术和军队结构情形下，领导人物的个人决定和驱动力量——甚至他的骑上一匹高头大马身临战场——是战略和战术形势的本质要素。拿破仑的在场是，而且不得不是他的战场确实感觉到的事情。自此以后，事情就不是这样的了。合理化的和专门化的参谋工作，最后将抹煞人格性，可以计算的结果最后将抹煞“想象力”。指挥官不再有机会投身于战场的骚动。他正在变成也不过是一个参谋人员，——而且是不难代替的一个参谋人员。

或者采取另一种军事比拟。中世纪的战争是十分人身性的事业。身披甲冑的骑士施展一种需要终生训练的武艺，所有骑士都因个人技能和勇武精神而被算在数内。不难理解，为什么这行手艺居然变成了一个社会阶级——按这个名词最充分最丰富的意义来说——的基础。但是，社会变革和技术变化挖毁了它的基础，结局既毁灭了这个阶级的职能，也毁灭了这个阶级的地位。战争本

身没有因之而停止。只是它变得愈来愈机械化了——变化得那么厉害，结局使战争不过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它的成功不再带有不仅会使这个人，也会使他的集团上升到持久的社会领导地位上去的那种个人成就的内容。

现在，一种类似的社会过程——归根到底就是这同一种社会进程——挖毁了资本主义企业家这种角色的基础，同时也挖毁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的基础。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个角色，就其魅力而言虽然略逊于中世纪好战领主这个角色，他好好歹歹也是或也曾是借人身力量和个人责任来取得成功的另一种形式的个人领导权。当社会过程中的这种职能丧失了它的重要性时，他的地位和武士阶级的地位一样立即会受到威胁，而这种职能之所以丧失重要性，既由于它所服务的社会需要已经没有。也由于那些需要现在正在由别种更非个人性质的方法来满足。

但是这件事影响到全部资产者阶层的地位。虽然企业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必然是甚至典型地是资产者阶层的成员，但他们在成功的时候就会进入这个阶层。因此，虽然企业家本身并不形成一个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却吸收了他们、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亲族，从而经常地补充了并活跃了资产阶级自己的队伍，同时，凡是切断了他们与“业务”之间的积极的关系的家庭，往往在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脱离了这个阶级。在这二者之间，有一大批我们称之为工业家、商业家、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人物；他们处在企业家的冒险和一片继承领地的单纯的日常管理工作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阶级生活所依的收入是由它的比较活跃的部分的成就生产出来的，它的社会也是建筑在这个部分的成就上的。这个部分当然可以象在我国那样，形成资产者阶层——以及正在上升为资产阶级的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按照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来说，

资产阶级是直接间接地依赖于企业家的，它作为一个阶级是和企业家同生共死的，虽然很可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最后，它也许觉得这是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一段时期——正如在封建文明中事实上确曾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样。

总括一下这部分的论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终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除了可望稽延一些时日的准地租和垄断利润的残屑而外，终将被贬为日常管理工作的工资。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作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完全官僚机关化了的巨型产业单位，不仅会赶走小型中型的厂家，“剥夺”它的所有主，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过程中不仅会坐视它的收入的丧失，并且更重要的是会坐视它的职能的丧失。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们，卡内奇们和洛克菲勒们。不论从那方面说，这个结论也许不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们的口味，更不合更为通俗的（马克思大概会说：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口味。但就预测的结果而言，这和他们的口味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II. 保护阶层的毁灭

到此为止，我们考察了资本主义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阶层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到保护他们的整个制度。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将在其最广泛地被承认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以致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也包括公众的态度和政府的政策。

1. 资本主义进化，首先毁灭了封建世界在制度方面的安排——采邑、村落公社、行会，或者大大促进了它们的毁灭。这个过程的事实和它的机制，我们都十分熟悉，所以不准备在这里多说了。毁灭是沿着三条路进行的。工匠世界主要是通过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竞争的自动效果而毁灭的；在这里，政治行动只表明已经萎缩了的机关和它的规章的撤废。领主和农民世界的毁灭，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在有些情况下是通过革命行动——实现的，而资本主义仅仅指挥了适应性的转变，比如使日尔曼采邑组织转变为大规模农业生产单位。但是和这些工业革命农业革命齐步前进的还有立法机构和舆论态度的同样革命性的变化。在旧的经济机构中起领导作用的诸阶级或集团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特权，随古老的特别是土地贵族，乡村缙绅、教士阶级的免税特权和政治特权，经济组织的消失一起消失了。

在经济上说，对资产阶级而言这一切意味着敲断了一大堆镣铐，撤废了一大批壁垒。从政治上说，它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其中是卑微臣民的秩序，被另一种更投合他的合理主义精神、更符合于他的直接利益的新秩序所代替。但是，按照今天的立场检讨这个过程时，观察家很可以奇怪，这样完全的解放到底是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世界。因为这些镣铐不仅束缚了它们同时也庇护了他们。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澄清并估价这一点。

2.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两个互相联系的过程，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产生了在我们看来是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虽然它的两栖性或过渡性并不更甚于其他过程。想想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政体所提供的突出例子吧。王权压服了土地贵族，同时，通过录用他们或颁给年金，通过有条件地承认他们有资格充当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的社会地位来和他们和解。王

权也压服了教士阶级，^①并与之结成联盟。它最后加强了它对资产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原是它在跟大地地区贵族们斗争中的老同盟军，它保护并推进它的企业，为的是要反过来得以更有效地剥削它。农民及产业无产阶级（那时还是人数不多的阶级）也同样由政府当局加以管理、剥削、保护——虽然在这个法兰西旧政制下的保护，比起例如玛丽亚·铁丽萨或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的保护来，要不显著得多——而且保护是由领主或产业家代替执行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政府，即为行使少数有限的职能而存在的、要由一笔极少的国库收入来资助的社会机构。原则上，这个君主专制政体从宗教信仰起到里昂丝织品的花色为止什么事都管，而在财政上则以最大限度的收入为目标。虽然国王决不是真正绝对的政府却是通晓一切的。

对于这个模式的正确的诊断对我们的题目来说有至上的重要性。国王、宫廷、军队、教会和官僚系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靠着由资本主义过程创造出来的日益增加的国库收入过日子，甚至纯粹封建的收入来源也因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膨胀了。国内政策、对外政策和法制的改变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为了适合和推动这种发展而制订和进行的。就事情的发展情况来说，所谓绝对君主制结构中的封建成分只能在返祖遗传的题目下潜入，事实上这是我们在初看之下自然而然会采取的诊断。

可是，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成分的意义是有过于此的。这个结构的钢框架仍然是用封建社会的人的材料构成的，而这些材料仍在按前资本主义模式办事。它充斥在国家机关里，充当军官、制订政策——它作为统治阶级而活跃着，并且，虽然

① 法国教(Gallicanism)不过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已。

它考虑到资产阶级利益，但它总小心地跟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位居中心的国王，是上帝恩宠的国王，他的地位的根基是封建的，不仅在历史上如此，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不管他如何为自己广泛利用了资本主义所贡献的经济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不光是返祖遗传。这是两个社会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了另一个阶层，但在政治上反过来受到另一个阶层的支持。不管我们认为这种制度有些什么成就和缺点，不管资产阶级自己在当时或其后对它有些什么看法——也不管他们对贵族中的酒囊饭袋和游手好闲之流有什么看法——这却是对那个社会的实质的看法。

3. 只是对那个社会的看法吗？事情的随后进程，由英国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的，事物的随后的发展提示了答案。贵族成分继续称雄，直到完整无损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末期。这个贵族成分无疑经常吸收——虽然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象在英国那样有效——从其他阶层滴到政治界来的人物；它使它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为资产阶级出力作战；它必得放弃它的最后几项法律特权；但是它以这样的资格，并且为了不再是它自己的目的，继续去为政治发动机配备人力，去管理国家，去进行统治。

资产者阶层的在经济上起作用的部分对此没有提出很多抗议。整个来说这样的分工是他们所称心的，他们喜欢这种分工。不论在那里，凡资产者阶层确曾反叛过这种状态，或者用不着反叛就爬上了政治舞台的，他们在统治方面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功，也不足以证明他们能守得住阵地。于是发生了疑问：说这些失败完全由于缺乏机会来取得经验，以及由于缺乏经验以致缺乏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气派，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正没有毛病？

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失败有更根本的理由，法国和德国的

资产阶级觊觎统治权的经验可以为例——对比一下工业家或商人和中世纪领主的形象，就能最好地阐明这个理由。后者的“专长”不仅使他有资格可敬地保卫本阶级的利益——他不仅在肉体上能为此而战斗——也使他得到极大的光荣，使他成为人的统治者。“专长”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却是那神秘魅力和贵族气派——正是这种支配人和使人服从的能力和习惯，使它在社会的所有各阶级中和各行业中都保有威势。这种威势那么大，这种气派如此有用，以致阶级地位的寿命比造成了它的阶级地位的社会的和技术的状况的寿命更长，并且证明了这种阶级地位可以通过阶级职能的转变而适应于迥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贵族和骑士们都大模大样地摇身一变而成为廷臣、行政官吏、外交家、政治家，并变成了和中世纪骑士毫无关系的军队中的军官。这种古老的威势还有些许残余一直幸存到现在，不仅见于我们时代的淑女身上——一想到这一点，不禁令人觉得这是一种最惊人的现象。

就工业家和商人而言，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他们身上确实找不出什么神秘的魅力，为了统治人，这正是少不了的东西。股票交易所是圣盘的可怜的代用品。我们知道，工业家和商人就他们是企业家这一点说，他们也起着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这种类型的经济领导权不象中世纪贵族的军事领导权那样容易扩张为国家领导权。正相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局限了他们的发展。总帐和成本计算。

我曾称资产阶级为合理主义的和非英雄主义的。他只能用合理主义的和非英雄主义的手段去保卫他的地位或使国家屈从他的意志。他能借人们也许指望于他的经济成绩之处来感铭人，他能声辩自己的立场，他能答应给钱，或者拿不给钱来吓唬人；他能收买一个庸兵队长、政治家或新闻记者为其进行欺诈性的工作。但

也技止于此，而所有这一切的政治价值都被大大地高估了。他那种经验和生活习惯也不可能发生人身的蛊惑力量。在营业公事房里他也许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天才，但他绝对没有本领在公事房外面吆喝一群鹅——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讲台上。他懂得这点，所以他喜欢人们把他丢在一边，他自己则把政治丢在一边。

读者当然又会碰到例外。但是例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市政管理方面的才能、兴趣和成就，是欧洲的唯一重要的例外，但是这种例外不足以削弱我们的理由，反而加强了我们的理由。在现代都市——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家务了——出现以前，市政管理和营业管理的性质差不多。于是，对市政问题的掌握和这个领域内的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制造家和商人们手里，而且制造业和商业的地方利益构成了城市政治的主要内容，因此，城市政治就被用营业所的方法和营业所的精神去处理了。在格外有利的条件下，从这些根子上也滋长过一些例外的情况，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低地国家*的情况属于相同的性质，但是由于下列事实而特别有启发性，这事实是：所有的商人共和国在国际政治的大竞赛中无例外地都失败了，同时在实际上的每一次紧急关头它都不得不将领导权交给有封建气质的好战领主。至于说到美国，不难列举它的独特的有利环境——但也在急剧减少中——来说明它的情况。^①

4. 结论是明显的。除去这类例外情况，资产阶级的装备，低劣到不足以应付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任何国家通常必得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资产阶级自己感觉到这一点，虽然资产者和群众在口头上似乎都否定这件事。在不是由资产阶级材料制成的保护体

* 指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译者

① 这一条推理的线索，将在第四篇内再度提起来。

制内，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防御战中，且在政治攻势战中也可以干得很成功，尤其作为反对党。有一个时候它觉得它的地位已经稳固到有余力来攻击保护体制本身了，象在帝国时代的德意志存在过的那种资产阶级反对党，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但如果没有某一非资产阶级集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孤立无助的，它不仅不能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这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

但是资本主义过程，由于它的经济机制，也由于它的心理学社会学的影响，抛弃了这个保护它的主人，或者，象在我国那样，从来没有给保护它的主人或其替身以发展的机会。这件事的含义还由同一过程的另一个结果而强化了。资本主义进化不仅消灭了上帝保佑的国王，也消灭了只要证明守得住、就会由村落公社和工匠行会来开挖的政治壕堑。当然，没有一种组织是能按照资本主义发现它的时候的确切型式固守下去的。但是资本主义政策所摧毁的东西远远超过免不了要摧毁的限度。它们攻击保留地内的工匠，工匠本来可以在这里多活上几天。它们从农民那里抢走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切祝愿——自由的却无人庇护的保有地他需要用来吊死自己的一切个人主义套索。

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也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这个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和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们的过程，和他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发现被那么多的口号弄得模糊难辨的这一事实之后，我们很可能发生这样的疑问，视资本主义为能够独立自成一类的社会形式到底是否十分正确，还是在事实上把它看作仅仅是我们所称

的封建主义的解体过程的最后阶段。整个来说，我倾向于相信，它的特质足够构成一个类型，并接受这样的看法：几个阶级的共生，其存在应归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过程，与其说这是例外，不如说这是常规——至少在这六千年，即自原始的掘土人变成骑马的游牧民的臣民以来的六千年中，这已经是常规。但是，对于所提到的反对观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异议。

III.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毁灭

我们已叙述了许多不祥的事实，现在要言归正传了。这一堆事实虽还不十分够，却几乎已足以证实我们的下一个论点：资本主义过程正在用同它用以破坏封建社会体制的几乎同样的方法，损毁自己的体制。

前面已经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成功的本身，自相矛盾地倾向于损伤早先同它联合的阶级的社会威望和它的社会权势，以及，巨型控制单位趋向于将资产阶级借以获得社会权势的职能中驱逐出去。资产阶级世界的制度和它的典型的态度的相应的变化，以及随这种变化以俱来的活力的丧失，其踪迹是易于追寻的。

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不可避免地打击了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经济立脚点。它对前资本主义阶层所做的一切，经过同样的竞争手段，也如法施行于资本主义产业的较低阶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当然赢得了分数。说产业的集中，事实上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教给公众去接受的那些观念所描绘的水平，这是对的（见第19章）。过程的行进比一个人会从许多通俗解释中汇集起来的要慢些，后退和补偿也要多些。特别是大规模企业不仅绝灭的小生产者和小商店，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小生产者尤其是小商店创造了生存空间。在农民和农场主的问题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最终证明了

它既愿意也能够执行一种磨费的但整个说来有效的保存政策。可是在长期间中，很难怀疑我们正在观察的事实及其后果。何况，在农业世界之外，资产阶级对这个有关资本主义秩序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或者对它的重要性表现的警觉性很不够。^①通过使生产组织合理化，特别通过使从工厂到最终消费者的艰难修阻的路程中所耗费用趋于便宜而取得的利润，是一般的实业家的头脑所无法拒绝的。

现在，明确地领会这些后果的意义所在是重要的。我们早已反驳过的一种极普通的社会批评，把美德归于竞争邪恶归于现代产业“垄断”，由此哀悼“竞争的衰微”，并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衰微。在这种解释的图式中，垄断扮演了动脉硬化症的角色，它经由愈来愈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成就，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命运起了反作用。我们已经知道驳回这种观点的理由。在经济上说，赞成竞争的理由也好，反对集中的经济控制的理由也好，都不及这个论点所说的那样强烈。而且无论是强是弱，它弄错了突出之点。纵令巨型企业全都经营管理得那么完善，以致可以博得天使们的喝采，集中化的政治后果仍将跟现在一样。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深刻地受到一批小型中型商行消失的影响，它们的兼任经理的老板，连同他们的家属、心腹、亲戚等其数量在投票站上是数得上的，他们还掌握着任何大型单位的经理部门从来也得不到的、一批我们称之为工头阶级的人；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的真正基础在一个国家中消磨掉了，于是这个国家的最有活力的、最具体的、最有意义的典范，也从人民的道德视界中消失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也在大单位的领域内打击它自己的

^① 虽然某些政府是警觉的：德意志帝国政府为了抵抗这种特殊性质的合理化做了很多事，现在我国也有这样做的强烈的倾向。

体制——让我们继续把“财产”和“自由契约”妄想为构成整体的一切部分。除了在若干仍具相当重要性的事例中，实质上由单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的公司而外，资本主义的连同各种有产者的形象都从画面上消失了。画面上有领薪水的董事和总经理，有一切领薪水的经理和低级经理。有大股东。然后是小股东。第一个集团倾向于采取雇员的态度，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也很少（即使有）把自己同一于股东的利益，即将自己照旧与企业的利益等同起来。第二个集团，即使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和企业的结合是永久性的，即使他们的行为真正象金融理论所描绘的股东的行为，也都既无所有主的职能又无所有主的态度了。至于第三个集团即小股东，往往不太注意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不过占本人收入中小部分的这类事情，而且，不管他们注意了没有，除非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些代表出来利用他们的讨厌的东西的价值，他们难得为那么些股票费心思；由于他们常常很受薄遇，尤其是常常认为自己受到了薄遇，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采取一种对“他们”的公司、对一般的大企业敌对的态度，尤其当事情恶化的时候，会采取一种对整个资本主义秩序敌对的态度。在我把典型情况无条件地加以图式化的所有这三个集团中没有人采取作为这种珍奇现象的特色的态度，意义如此丰富，就这样，财产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实质急剧地消逝了。

契约自由的情况亦是如此。当契约自由还充满着活力的时候，它意味着在无限的可能性中经过个人的选择签订个别的契约。现今的那种铅印的，非个别性的，非人身性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契约——这种契约应用的范围普遍得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它贴到劳工契约上去——只表现为有限的选择自由，且多半转成为这是一个抓住或放手的问题(*c'est prendre ou à laisser*)它的古老的特色却一点也没有了，特色中的最重要部分，对那些同

其他巨型企业、非个人的工人群众或消费者打交道的巨型企业说来已变得不可能了。这个空白区域已被急剧成长的新法律结构所填满——略经反思，就看得出事情很难是别种样子的。

于是资本主义过程把所有这类制度，尤其是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都推至幕后去，财产和自由契约表现了真正的“私人”经济活动的要求和方法。在还未废除它们的地方，通过变更现存法律形式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关于合伙或独资商行的法律形式之转变为关于公司企业的法律形式——或者通过变更法律内容及其含义的办法，也和它早已废除劳工市场的自由契约一样，它达到了这一目的。资本主义过程用仅仅一包股票代替了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了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它松开了一度抓得那么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对自己有的财物要怎样做就怎样做的法律权利和实际才能；也就是，所有权的保有者丧失了他在经济上、物质上、政治上为“他”的厂，和他对他的厂的控制权而战斗的意志，如果必要，为它战斗到死的意志。我们可以称之为财产的物质实体——财产的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现实性——的东西的蒸发，不仅影响了产权所有者的态度，也影响了工人的和一般公众的态度。非物质化了的、无功能的、不在地主式的所有权，不象财产的重要形式那样足以感动人，足以唤起道德上的忠诚。结局，剩不下一个真心愿意为之挺身而出的人——在大企业领域之内剩不下一个，在大企业领域之外也剩不下一个。

第十三章 增长着的敌意

I. 资本主义的社会气氛

从前面两章的分析，不难理解资本主义过程怎样产生了我在本篇小引中所说的，对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几乎是普遍的敌对气氛。这种现象如此惊人，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通俗的解释又都如此不充分，因此最好把这方面的理论再略为阐明一下。

1.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过程最后降低了资本家阶级赖以生活的职能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知道，它倾向于消蚀掉它的保护阶层，弄垮自己的防线，驱散警卫它的堡垒的警卫部队。最后，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思想批判气氛，它在毁灭了那么多别种制度的道德威信之后，最后回过头来反对自己的道德威信；资产阶级惊讶地发现，合理主义态度不以打击国王和教皇的符玺为满足，还进而打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图式。

这样，资产阶级的堡垒在政治上就变成无防御的了。无防御的堡垒招致侵略，尤其如果那里有丰富的战利品可得的话。侵略者将苦心孤诣地合理化他的敌对行为^①——侵略者总是这样做的。暂时用收买方法消弭侵略无疑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侵略者发现他们能得到全部东西的时候，这种最后手段就会失败。这一点部分地说明了我们所努力想说明的东西。在我们理论中的这个要

① 希望不要因我用“合理化”这个动词于两种不同的意义而引起误会。一个工厂当它的每单位支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时，它就被合理化了。当我们为我们的一种行为提出各种能够满足我们价值标准的理由，（不管我们真正的冲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合理化”了这种行为。

素并不适用于全部进程，就目前情况说（当然，情况决不会永远如此的）资产阶级的无防御和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敌意这两者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的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却证实了我们理论中的这一点：只要资产阶级的地位稳固，原则上就不会有多大敌意，虽然当时敌对的理由很多；敌意的散播和防护墙垣的崩坏是并步前进的。

2. 但是，人们就很可能要问——事实上，那些确信他自己和其他一切社会阶级并肩地尽了他的责任的许多实业家，的确以天真的张惶失措的神态问过——为什么资本主义秩序需要非资本主义势力或超合理主义的保王党人的什么保护？资本主义秩序难道不能高举着自己的飘扬的旗帜通过这场考验？我们自己的先前的论证不已充分表明，我们本来拿得出很多功利主义的凭据？难道不能从这里提出理由十足的资本主义赞成论？这些实业家确实能够指出，一个通情达理的工人，在衡量他的合同——比如说，他和一个大钢铁企业或大汽车企业签订的合同——中的几要几不要时，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切方面，他做得都不那么坏，并且这笔买卖的好处不是全归一方的。是的——一点不错，可惜这一切全是不相干的。

因为第一，相信政治上的攻击主要来自抱怨，相信辩解可以避得开打击，这是错误的。政治的批评是合理的辩论所对付不了的。不能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来自某种精神上的批判态度，即根本不理睬对于超理性价值的忠诚的那种态度，因而据以推定理性的反驳会被接受。这样的反驳可以撕破攻击的合理主义外衣，却决不能达到总是潜伏在这种外衣里面的超理性的驱动力量。资本主义合理性并不能消除次理性或超理性的冲动。它只能通过撤除神圣的或半神圣的传统的约束，而使它们摆脱控制。在缺乏惩戒它

们指导它们的手段，甚至也缺乏惩戒和指导它们的意志的一个文化中，它们要造反。一旦它们起来造反了，在合理主义的文化中它们的辞令一般地也多多少少要合理化一番，但这是无关重要的。正如人们从来不曾怀着认为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的公平们正直的心情，把要取得功利主义的凭据的要求提到国王、领主和教皇那里去一样，资本主义是在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们面前受审。不管法官会听到些什么辩护，他们总是要通过这个死刑判决的；唯一能够赢得这场诉讼的成功的辩护，只能是起诉书的改动。功利主义的根据，无论怎么说都萎弱得不足以成为集团行动的原动力。它决不是超理性行为的决定因素的对手。

第二，只要我们懂得接受资本主义拥护论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就完全能够理解反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何以能够成功。资本主义拥护论即令比它真正具有的理由说得更为有力，也总是没法用简单的话说清楚它的道理的。一般人民为了理解它，就得拥有他们全然无法拥有的见识和分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专门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曾经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关于资本主义一切胡扯作过辩护的理由。即使丢开这一点，理智地承认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和它对未来的希望，也需要一无所有的人需要掌握几乎不可能有的道德上的技艺。资本主义的成就，只有当我们采取长期观点时才能突出，任何拥护资本主义的论点必须依据长期的考察。在短期间中，支配了画面的只是利润和无效率。昔日的平等派或宪章派为要甘心承受他的命运，他就得把希望寄托在他的玄孙身上来安慰自己。为了使自己和资本主义体系一致，今天的失业工人就应该完全忘掉他个人的厄运，今天的政治家则应该忘掉他个人的抱负。社会的长期利益完全和资产者社会的高级阶层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人民把这种利益看做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

是完全自然的。对群众来说，重要的是短期观点。象路易十五一样，他们觉得不管我们后面有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而且，按照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立场，他们的这种心情当然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在任何社会体系中，都有每个人必得对之斗争的日常的麻烦和关于麻烦的预想——磨擦和失望，大大小小的苦痛、烦恼、失败的不愉快事件。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把困难归咎于和自己完全无关的那部分现实的习惯，为了克服那种我们据以反作用于它们的敌意冲动，**感情上**对社会秩序的依恋——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在制度说来所无法产生的东西——是必需的。如果没有感情上的依恋，敌意冲动就会一意孤行，并且成长为我们的心理态度中持久不变的组成分子。

第四，现代资本主义为全时间就业工人提供了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特别为他们提供了日益增大的闲暇……啊哟，没有必要由我来完成这个判决，或者推论出一切论点中最平凡、最古老、最腻人的一个论点，不幸这个论点是太正确了。永续不断的改进已被看做理所当然，却配上一分人们刻毒怨恨的个人的无保障，为了哺育社会骚动，这个食谱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II. 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但是，无论是打击的机会或者是真实的或幻想的抱怨，两者本身都不足以产生出反对社会秩序的积极的敌对状态，不管它们怎样强烈地赞助了它。为了要培养出这样一种气氛，必需有这么一些集团来刺激愤恨、组织愤恨，抚育它、用言辞表达它、领导它，而这一切正好是符合他这些集团的利益的。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篇说明的，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自己主动地发表过什么明确的意见。它

更不能用言语说出这些意见并使之转变成为一贯的态度和行动。他们只能追随或是拒绝追随这种自己出现的集团的领导。所以，除非我们已经发现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的社会集团，我们关于敌视资本主义的气氛的理论就是不完整的。

广泛地说，有利于形成反对一个社会体系的普遍敌意，或有利于形成对它的攻击的那些条件总会召唤出来利用这些条件的集团。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资本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不一样，它不可避免地、并且由于它的文化的必然的性质，一定会创造、教育、并资助一个对社会骚动很感兴趣的既得利益集团。^①对于这种既珍奇而又重要的现象的解释可从我们第十一章的论点推论而得，但是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学**，那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有效的说明。

1. 知识分子这种类型是不容易下定义的。事实上困难是在这个物种的特征上面。知识分子不象农民或产业工人那样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来自社会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在于自相斗争，以及充当不是他们自己阶级的诸阶级利益的矛头。可是他们发展形成了集团态度和集团利益，这种态度和利益强烈到足以使他们中的一大批人按照通常和社会阶级这个概念联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办事。其次，他们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们的总和；这会模糊这个类型的最重要的特色。但是，谁只要受过较高的教育——除非例外情况，谁都受过这种教育——谁就是

^① 每一个社会体系对革命都是敏感的，在每一个社会体系内，把革命鼓动起来如果成功的话，是一笔值得做的生意经，因此总是既吸引着知识分子也吸引着体力劳动者。在封建时代确是如此——完全如此。但是反叛他们的上司的武士贵族所攻击的是个别的人或个别的职位。他们并不因此而攻击封建制度。整个说来，封建社会并不显示出鼓励——故意地或非故意地——人们攻击它本身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倾向。

潜在的知识分子；又由于他们的心灵差不多全是一样装备的，这就便利了他们相互间的了解，并且构成了一种结合力。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与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共同存在，对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有用的；例如医生或律师，如按切合当前论题的意义而言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除非他们除他们专门职业所胜任的而外，对其他问题也有所谈论或写作，无疑他们常常是这样的——尤其是律师。可是在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因为某些专门职业——尤其如果我们把报刊杂志文章编写工作计算在内的话——实际上的确几乎全部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类型的领域之内；所有的专门职业者都有机会变成知识分子；同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以某项专门职业为生。最后，若采取相反于手工劳动的一种意义为定义，又嫌过分广泛。^①可是威灵顿公爵的“拿笔杆的人”（Scubbling set）似乎又太狭隘了。^②“文士”（Hommes de lettres）的含义也嫌狭隘。

但是如果我们不跟铁公爵〔即威灵顿——译者〕走，我们也许会弄得更糟。知识分子事实上是支配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力量的人们，使他们有别于也这样做的人的气质之一，是对实际事务不负直接责任。这一气质一般地又能说明另一种气质——缺乏只有从实际经验中才能得到的第一手知识。批判的态度来自知识分子的作为旁观者的处境——在大多数情形下还作为局外人——正如他的出头露而的主要机会，在于他的实在的或潜在的给人们制造

① 很遗憾，我发现《牛津英文辞典》没有列出我愿意加于这个名词的意义。它列上了转义的“知识分子的宴会”（a dinner of intellectuals）这个短语，但和这个字有关的“超等的智力”（superior powers of intellect）的解释则指向十分不同的方向。我感到相当为难，可是我未能发现另一个能够同样妥当地为我的目的效劳的名词。

② 公爵的辞句见于《克洛克文集》，詹宁斯编，1884。（按约翰·克洛克是威灵顿公爵的知交，英国的政治家和散文家。——译者）

麻烦的价值一样。这应该列为第三种气质。没有专长的专门家？半瓶醋的专门家？是因为什么也不懂所以什么也谈论的人？是萧伯纳的《医生的两难处境》中的报刊记者？不，不。我没有这么说，我也没有这种意思。这样的事情是会冒犯人的，而且这实在也是不真实的。让我们放弃试图用文字作出定义，而代之以象征性的定义：在希腊博物院里我们能发现贴着很漂亮的标签的目标。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诡辩学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不管他们强烈地反对被扔到一起，他们总还是属于同一种族的——理想地表明了我要指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全是教师，这并没有毁坏例证的价值。

2. 我在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主义性质(第11章)时指出，合理思想的发展当然先行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兴起达数千年之久，资本主义所做的，不过给了这个过程以新的冲动和响往这个过程的特殊倾向。同样——不考虑希腊罗马世界——我们在彻底的前资本主义状况下看到了知识分子，例如在法兰克王国，在法兰克王国分解而成的诸国。但是他们人数极少；他们是教士，多数是修道士；他们写成的东西，只有总人口中极小的部分才能看到。无疑，强有力的个人偶然也有机会发展非正统的观点，甚至传达给平民的听众。可是，这一般总意味着对抗十分严峻组织起来的环境——而要从这里逃亡是困难的——也冒着异端命运的危险。即令如此，若没有某些大领主或大首领的支持或默许，如传教师们的策略所充分表明了的那样，事情还是很少有可能的。所以，整个地说，知识分子是好掌握的，不听驾驭不是开玩笑的事，即在非常紊乱放纵的时代例如黑死病时代(1348年及以后)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修道院产生了中世纪世界的知识分子，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却放纵了它，并把印刷所奉送给了它。俗界知识分子的

缓慢进化仅仅是这个过程的一个侧面，人道主义的抬头和资本主义的抬头二者的若合符节是十分惊人的。人道主义者原来是语文学家——绝妙地证明了上面所提的一个论点——他们很快地扩张到礼仪、政治、宗教和哲学的领域。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把它和他们的文法一起解释的古典著作的内容——从一段文字的批判到一个社会的批判，其间的距离比外表上看来是要短一些的。虽然如此，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不嗜好火刑柱的观念，而火刑柱却还在等待着异端。照例，荣誉和安乐更大大投合他们的心意。而且，这些东西归根到底还只能来自神界和俗界的王公，虽然人道主义者是拥有现代意义的群众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批判的姿态一天比一天强烈。但是社会的批判——超乎对天主教会尤其是它的首脑的某些攻击以外的社会批判——在这些条件下并没有繁荣起来。

可是荣誉和报酬总不是只能从一条路取得的。阿谀奉迎和奴颜婢膝的报酬往往比它们的对方要小些。这倒不是阿里蒂诺^①的发明，但是从来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利用这个发明。查理五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但是在使他有时离家达几个月之久的历次战役中，他却过着他的时代他的阶级的绅士们的生活。很好，公众——而和查理特别有关的是他的皇后——决不需要知道这件事，如果在一些正确而有价值的论点上对这位政治和道德的大批评家认输了的话。查理付清了帐。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件事并不是通常只使一方面得到实惠另一方却受到无可补偿的损失的单纯的敲诈。查理知道他为什么应该付帐，虽然用更便宜更彻底的方法无疑是能够保证缄默的。他并不表现出怨恨情绪。相反，他甚至还破例对这个人表示尊敬。他所要的显然有甚于缄默。事实上他从他的

^① 比特罗·阿里蒂诺(1492—1556年)。

馈赠中收到了充分的代价。

3. 所以,按某种意义说来,阿里蒂诺的笔确实比剑强。但是也许由于我的无知,我不知道在随后的一百五十年中发生的可相比拟的这种类型的例子。^①那个时期,知识分子似乎不曾在当时已规定的职业——主要是法律和教会——之外,起过什么重大的作用,现在,这种挫折和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在这个多难时期中发生过的那种在资本主义进行过程中的挫折大体上相一致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随后的复兴,知识分子同样也分享了一分。更便宜的书,更便宜的报纸或小册子,和这在一起的还有公众范围的扩大(这部分是更便宜的书籍、报纸、小册子的产品,部分也由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接近财富和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匿名的公众舆论的政治重要性的增加所引起的一种独立现象)——所有这些思想,正如愈来愈增长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同样都是资本主义发动机的副产品。

十八世纪的前七十五年,个人保护人逐渐丧失了他起初在知识分子生涯中曾经保存过的至上重要性。但是至少在知识分子成功的顶峰中,我们清楚地辨认得出新要素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新要素就是集体保护人即资产阶级公众的支持。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提供了一个无可估价的例子。恰巧是他的肤浅,使他有可能涉猎从宗教至牛顿光学间的一切东西,同时他又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和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完全没有什么禁忌,并能准确无误地直觉到并通盘接受他的时代的气息,所有这些,都使这个不吹毛求疵的批判家,平庸的诗人兼历史家能够出来蛊惑人心——也能够出卖他那套东西。他也投机、欺骗、接受馈赠和官职,但他总还是有建立在他对公众中的

① 可是,在英国,小册子发行的范围及其重要性,在十七世纪中大为增加了。

成就这个坚实基础之上的独立性。卢梭的情况和风格虽然和他的完全不同，对它探讨一番却可得到更多的教益。

在十八世纪的后数十年，一个动人的插话，显示出了保持自由立场的、除了叫做**舆论**的社会心理学机制而外什么都不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性质。事情发生在英国，即当时在资本主义进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约翰·威尔克斯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攻击的确是在最有利环境下发动的，此外，也不能说他真的恢复了布德伯爵的政府，这个政府从未有过什么为运气，而且由于许多别的理由是势必要倒台了；但是威尔克斯的《北不列颠》仍然是压断了……布德伯爵政治脊骨的最后一根干草。《北不列颠》第四十五期是保证了通用搜查证的废除，向出版自由和选举自由大进了一步的那次战役中的第一枪。这不等于制造了历史，也不等于为社会制度的变革创造了条件，但它确等于起了，比如说产婆的帮忙作用。^① 威尔克斯的敌人之没有本领阻挠它，是全部事变中最意味深长的事情。他们分明掌握着有组织的政府的全部权力。但是某些东西把他们挡回去了。

在法国，在大革命前的几年和大革命时代，象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许多小报（《马拉》、《德莫林》），它们短小精悍不象我们时代的报纸那样〔体积庞大到〕可以做压舱货，而且文法通顺。但是我们要赶紧向前走。恐怖结束了这些小报，第一帝国更系统地结束了它们。接着来了另一个相当坚决镇压的时期，“资产阶级的国王”

^① 我并不担心任何政治史家会觉得我夸张了威尔克斯的成就。但我的确担心有人会反对我称他为一个保持自由立场的知识分子，反对我隐含的这样的意思，即他把一切都归功于集体的保护人，而毫不归功于个人保护人。在开头的时候，他无疑受到了圈子里的人的怂恿。可是经过检查以后，我想应该承认这并不具有决定的重要性，还应该承认他以后所得到的一切支持，一切金钱和荣誉，不过是他先前的成功，和独立地和群众在一起所获得的地位的结果和由此得到的贡品。

的统治中断了这个过程，直到第二帝国被迫放松缰绳时——大约六十年代中叶——这个时期才结束。在中欧和南欧，这个时期延续的长度大致相同，在英国，从美国独立战争到坎宁执政，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4. 在这个期间中，实际上所有欧洲各国政府的使知识分子跟着走的企图——其中有几次延续时间很长，而且还很决坚——的失败，证明了要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抵抗这个浪潮是如何不可能。他们的历史，不过是威尔克斯的开发利用的各式各样的翻版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或在资本主义因素有决定重要性的社会中——任何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必将很快扩大成为对资产阶级私人营业的堡垒的打击，这些堡垒，或其中的某些堡垒，将庇护捕猎对象。何况，这样的打击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立法作用和行政作风的原则进行，这些原则无疑是可以伸缩的，但总将阻止迫害，使之不能超过某种限度。当资产者阶层认真惹发了脾气，或认真受到了威胁时，他们会接受非法暴行，甚至会向非法暴行喝采，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在路易·菲力普那样的纯粹资产阶级政体下，军队可以向罢工者开枪，但警察不能兜捕知识分子或者必须立即释放他们，否则资产者阶层不管如何强烈地不赞成他们的若干做法，将重新结集在他们背后，因为若不是同时捣碎它所赞成的自由，他所不赞成的自由是捣碎不了的。

请注意，我不是想把一服不现实的慷慨大度或理想主义的药剂归功于资产阶级。我也不想过度强调人们所思索、感觉要求的东西——说到它的重要性，我虽不完全，却几乎是和马克思一致的。资产阶级在保卫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当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知识分子——时也保卫了他们自己，保卫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有非资产阶级性质和不奉行资产阶级信条的政府——在现代环

境下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或法西斯主义政府——才坚强到足以制驭知识分子。为了这样做，就该改变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制，急剧地减少国内一切阶层的个人自由。而这样一个政府不象是会——即使它做得到，它也不会——猝然禁止私营企业的。

可以由此推论，资本主义秩序是既不愿意又没有本领有效地控制它的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的。所谓不愿意，是指不愿意一贯地使用和资本主义过程塑造的精神状态不相契合的方法；所谓没有本领，是指没有本领在不屈服于非资产阶级的规则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过程铸造的制度范围之内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方面公开讨论的自由，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的自由，在长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集团又不得不吹毛求疵，因为他依靠批判为主，它的整个地位有赖于整人的批判；而对人物和时事的评论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局势之下，必然会在对阶级和制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

5. 再抹几笔就可以完成这幅现代图画了。手段还在不断增加之中。生活水平和大众闲暇时间都有所增加，这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集体保护人的构成情况，知识分子正该迎合他们的口味。书籍报纸一步一步便宜了，还要进一步便宜下去，报纸和大规模报业企业^①也一样。现在还有无线电广播。过去有，现在还有的完全

① 大规模报业企业的出现，及其到目前为止的经历，证明我急于要强调的两点：第一，社会模式的每一个具体要素都有多种方面、多种关系和多种影响，因此不能由此建立简单的、单面的命题；第二，区别短期现象和长期现象是很重要的，因此，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命题可以是正确的。大规模报业企业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营业企业。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护资本家或其他阶级的利益。它可以这样做，但只能由于下列动机中的一个或几个，其重要性显然是有限的：第一，因为某个资本家集团为了维护它自己的利益或观点而给了他津贴——报业企业的规模及其发行量愈大，这个要素的重要性愈小，因为它总想卖给有资产阶级口味的公众——这在1914年以前虽很重要，但现在愈来愈和其他道路发生了冲突；第二，因为刊登广告的客户喜欢利用他

撤除限制的趋势，正在稳步地打破短期间中抵抗它的企图，资产阶级社会借此证明它自己是一个十分无能，有时还是十分稚气的一个教练员。

可是还有另一个因素。资本主义文化后期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教育机构的猛烈扩大，特别是高等学府的扩大。这种发展的不可避免性，过去和现在都不亚于大规模产业单位的发展，^①但是，不象后者，它一向是，现在还是受到舆论和政府的鼓励的，因此它比在它本身推动力推动下发展得更快。不管我们从别的立场出发，考虑它的意义何在，也不管它的确切的成因究竟何在，有若干结果是和知识分子集团的规模及其态度有关系的。

第一，只要高等教育继续这样增加专门性的或准专门性的劳务的供给，最后使全部“白领子”行业的劳务供给，超过成本-收益

所合意的报纸——但他们多半采取一种极其生意经式的观点；因为报馆老板〔要迁就广告的顾主，就要〕坚持某种不顾发行利益的方针——到某种程度，他们确能这样做，过去尤其能这样做，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如果和发行上的金钱利益冲突太严重，这种方针是不能维持下去的。换句话说，大规模报业企业在抬高知识分子集团的地位和增大他们的影响方面是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直到现在为止，知识分子对报纸的控制是不完全的。它意味着职业地位；意味着广大公众〔中的影响〕，但它也意味着木偶身上的牵线。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主要是在短期中；个别新闻记者在争取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的更大的自由时也许很容易遭到失败。但是，这种短期光景——以及这个集团对过去情况的追忆——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并且决定了他为公众描绘的这幅奴役和殉道图画中的色彩的东西。实际上它应该是一幅征服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也如在其他许多事例中一样，征服和胜利，是由失败镶嵌而成的一幅镶嵌细工。

① 现在多数人有一种理想，希望一切能够接受劝导来利用各类学校的人都能进入各类学校去学习，他们据此理想期待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十分强烈地抱着这种理想，以致任何对它的怀疑都被视为有失体统，但这种情况还没有因反对者的评论（多半是一些轻率的评论）而有所改善。的确，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是一批极端错综复杂的关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理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在这篇短文里是无法仔细加以探讨的。这就是我之所以将上面这一节局限于我们目前所需讨论的两个无可争辩的没有重大意义的琐事上的原因。但是，它们当然不能解决一些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留在一旁，用以证明我的说明的不完全。

考虑所决定的需求点之上，它就可以制造出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局部失业状态。

第二，它和这类失业在一起，或者代替这类失业创造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就业状况——就业于低标准的工作，或低于工资较高的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工作。

第三，它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令人丧气的无力就业性。大学或专门学院毕业的人容易在心理上变得不能干体力劳动的职业，同时却并不必然获得了比如说做专门工作的职业能力。其所以如此，或者因为他缺乏天然的才干——这和通过学院考试是完全不矛盾的——或者由于不适当的教学；而这两种情况，将绝对地和相对地发生得更频繁，因为淌到高等学校里的人愈来愈多，需要教学的数量日益增加，不管自然界想要产生的教师和学者究竟有多少。忽略这一点和按照学校、学院和大学只是金钱问题这个理论办事的结果是如此明显，简直用不到再为它说什么话了。在很多事例中，一打人申请一个工作，大家都有正式资格，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满意地胜任这个职务，这是和人员考选多少有点关系的人谁都知道的事实——谁都知道，这就是说，凡自己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

所有失业的，或对所就的业不满意的，或无力就业的人，都淌到标准最不明确，各种不同等级的资质和学识都可以算数的职业中去了。他们扩大了按严格意义解释的知识分子队伍；因此这个队伍不相称地增大了。他们以通体不满意的心情进入这个队伍。不满意酝酿怨恨。怨恨常常把自己合理化为这样一种社会评论，这种评论正如那样，无论如何总是知识分子旁观者的典型的特别在一个合理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文化中对待人物、阶级和制度的态度。好啦，我们有了人了；有了一个很好地下了定义的、具有曾

经过过绝妙定义无产阶级色彩的集团形势了；集团利益铸造了集团态度，这种集团态度比下面这个理论——它本身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更现实主义地说明了它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敌意：知识分子关于资本主义所犯各种错误的正义的愤怒不过代表了从暴虐的事实中推论出来的逻辑结论，实则这种理论不比情人们认为他们的锺情不过是从所锺爱的人的美德中得出的逻辑结论的那种理论高明一些。^①除此而外，我们的理论还说明了，随着资本主义进化中每一个新成就的出现，何以这种敌意不是减少而总是增加。

当然，知识分子集团的敌意——等于对资本主义秩序的道德上的否认——是一回事，围绕在资本主义发动机周围的总的敌对气氛又是一回事。后者是一种真正有重要意义的现象；而且它并不单单是前者的产物，而是部分地也来自独立的来源，其中有些已在前面指出过；就其目前情况而论，它是知识分子集团据以进行工作的原料。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我没有篇幅来阐明它。可是象这样一次分析所描绘的总的轮廓是够明显的了，同时我认为还需要重新申述一下，知识分子集团的作用首先在于刺激、打气、表述、组织这种原料，给它添加点什么东西，不过是第二义的事情。某些特殊的形势将证明这个原则。

6. 资本主义进化产生出劳工运动，这显然不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创作。但是这样一种机会和知识分子这位造物主会互相碰头是

^① 读者会注意到，纵令资本主义的事实或者爱人的美德，实际上和社会批评家或情人所相信的完全一样，任何这样的理论仍然会是不现实的。指出这样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在压倒多数的事例中，批评家和情人们显然两皆诚实；心理社会学的机制也好，心理生理学的机制也好，除非戴上使人变得庄严的面具，照例都不会进入自我的水银灯下的。

并不令人惊奇的。劳工从不恳求知识分子的领导，知识分子侵入了劳工的政治。他们必须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们要用语言表达这个运动，要供给它以理论和口号——阶级战争是一个卓越的例子——要使它自觉起来，并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改变运动的意义。在按他们自己的立场解决这个任务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使它激进化，最后把一种革命的倾向注入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工会作风中去多数非知识分子的工会领袖，最初原是极其愤恨这种倾向的。但是这样做还有另一理由。工人们在倾听知识分子的讲话时，即使不感到直截了当的不信任，几乎总会意识到一种无法越过的深渊。为了要掌握它们，为了要跟非知识分子的领袖们竞争，知识分子被迫走入一条能够向他皱眉头的后者所不必要的道路。由于没有真正的威信，由于觉得他经常处在人们会毫无礼貌地告诉他记住他自己的本行这种危险之中，他必须阿谀、约许和煽动，抚慰左翼和绷起脸的少数派，制作可疑的或不着边际的理由，乞援于渺茫的目的，宣告他自己决心服从——总而言之，他在群众面前的行动，正和他的先辈最初对教会里的上司稍晚对君王和其他个人保护人，再晚在具有资产阶级气质的集体主人面前的行为一模一样。^①这样，虽然知识分子没有创造劳工运动，可是他们却使劳工运动达到本质上不同于没有他们时所会成就的那个样子。

社会气氛(为了它的理论我们曾垒过石头抹过灰浆)说明了为什么政府对待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策含有愈来愈多的敌意，敌意最后多到要在原则上拒绝考虑资本主义发动机的需要，变成它发挥功能的严重障碍。可是知识分子集团的活动和反资本主义政策之间有一种比仅仅用言语来表述它们更为直接的关系。知识分子少

① 所有这些，将在第五篇加以例证，并作进一步的说明。

有进入职业政治活动的，更少争得过负责的职位。但是他们做政治机关的参谋，写党派的小册子和演讲辞，做秘书和顾问的工作，使个别政治家的报纸获得声名，这些虽然什么也不是，却不是谁都能够置之不理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把他们的精神状态铭刻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情上去了。

知识分子真正发挥了的影响，小到仅仅表述，大到制订政治上可能或不可能的法案，多半随政治竞赛当时的状态而定。但是他的活动余地总是很大的。当我们说，个别政治家和个别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我们最多不过强调了真理的一半。那另外的一半，重要性即使不更大至少也是相等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扩展自己的利益的职业时，我们就懂得那另一半是什么了——政治的利益，和一个人或一个党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①既可以一致，也可以冲突。个人或政党的意见，对于政治形势中直接影响各个人或政党的前途或地位的那些因素，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敏感。这些因素有的是知识分子集团控制着的，它就象一个时代的道德法典一样，既可以把某些利益集团的事业抬得很高，也可以悄悄地把他利益集团的事业不放在眼里。

最后，这种社会气氛或价值法典不仅影响政策——立法的灵魂——也影响行政措施。但是，在知识分子集团和机关官僚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直接的关系。欧洲的官僚集团的血统是前资本主义和超资本主义的。可是不管他们的成分随若干世纪的逝去而大有变动，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把自己同一于资产阶级，同一于它的利益和它的价值图式，他们从来不过把资产阶级当作了君王或民

^① 这一点，在考虑到知识分子和他们所自来及他们所归属的阶级——经济上和文化上所隶属的阶级——的关系时，当然也是正确的。这个题目，第23章还要谈到。

族的利益应加管理的一宗资产。所以，除了由于专门训练或职业经验所造成的阻碍而外，他们容易接受知识分子的劝导而改宗，他们和知识分子受了相同的教育，他们间的共同之点很多^①，而在许多情形下往往会树起壁垒来的缙绅气味，在最近若干世代的现代公职人员身上也已经凋谢殆尽了。何况，在公共行政的业务范围急剧扩张的时代中，所需的新增人员中有许多是直接从事于知识分子集团中取得的——我国的情况可以为证。

第十四章 解体

1. 而面临着周围日益增大的敌意，面临着渊源于这种敌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企业家和资本家——事实上是接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整个阶层——最后将停止起作用。他们的典型目标正在急剧地变成无法达到的目标，他们的努力正在变为白费的努力。最有魅力的资产阶级目标，即建立一个产业王朝，在多数国家内早已变为无法达到的目标，甚至最谨慎的目标也如此难于达成，以致当这种情况的永续化愈来愈为人们所懂得的时候，人们就不再认为值得为之奋斗了。

考虑一下资产阶级这种推动力量在解释过去两三个世纪的经济史中所起的作用，考虑一下，它的被社会的不利的反作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情况，或者它的因搁置不用而日趋萎弱的情况，无疑会构成一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某种挫折——即使我们一向把它看做永久性的现象——的因素，而且是比投资机会消失理论所提出的诸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重要得多的因素。所以，看

^① 例子见第26章。

到这种推动力不仅受到存在于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诸力量的威胁，而且这种推动力也会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内部的原因而渐渐消亡，是饶有兴趣的。两者之间当然有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除非我们设法把两者之间的纠结解开，我们是得不出真实的诊断的。

“内部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已经碰到过了。我命名它为**财产实体的蒸发**。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的实业家，不管是企业家或仅仅是日常经营的营业管理人，一般是董事长总经理身分的人。按照他的地位的必然性，他取得了官僚机构内领薪水的雇员的某些心理状态。不论他是不是股东，他的战斗的意志或是抓住不放的意志，不是，也不能是懂得所有权和所有权的责任这两个名词的真正意义的人的意志。他的价值体系和他的责任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光是当股东的人当然已经是完全数不上的了——而这和一个管制和收税的国家正在蚕食他们的股分又是完全无关的。这样，现代公司虽然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却使资产阶级的思想社会化了；它残酷无情地缩小了资本主义推动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最后还要从根到底地杀死它。^①

2. 可是，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内部原因”，即资产阶级家庭的瓦解，我们援引的事实是大家太熟悉的事实，甚至明白陈述它都是不必要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看来，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的意义大大小于从前，所以它作为行为规范的力量大不如前了；公然蔑视“维多利亚”准则的叛逆儿女表明了一个无可

^① 很多人会否认这点。这是因为他们所获印象来自过去的历史和过去历史中发生的口号，而在这段过去历史时期内，大公司引起的制度变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也可以想到公司组织用来取得非法地满足资本主义动机的能力。但是这正好通到我所要说的意思的路上了：在公司组织的营业内，董事长和总经理要在薪水和分红之外取得个人盈利，非采取非法或半非法手段不可，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公司的结构观念是蔑视这类事情的。

否认的真理，不管它表现得怎样不准确。这些事实的分量，并不因我们无法用统计方法测定而有所减低。结婚率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婚姻这个名词和财产这个名词一样，可以包含多种多样社会学意义，而婚姻契约所形成的那种结合，即使婚姻契约的法律结构没有任何变化，即使结婚率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可以完全绝灭的。离婚率并不比这更重要些。法庭上解决了的离婚案件究竟有多少也和事情无关——有关系的只是作为旧模式的本质内容到底短缺了多少。如果读者在我们这个统计时代中坚持统计测定，那么，没有孩子，或只有一个孩子的婚姻的比例，虽还不适宜于从量上说明我所指的现象，但是大体上能够说明我们希望要说明的事情的数字上的重要性。这种现象现在或多或少地扩大及于一切阶级。但它首先出现于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按我们的目的，事情的征兆性和因果关系的价值全在这里了。它可以整个地归因于生活中一切事情的合理化，我们已经知道这是资本主义进化影响的一种。事实上这不过是合理化传播到私生活领域的结果之一而已。在解释中通常引证的其他一切因素，都容易归结到它上面去。

只要男人和女人学会了功利主义这一课，并且不把他们的社会环境为他们作出的传统安排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他们取得了瞻望任何行为的前途并且衡量其中有利不利之处的习惯——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只要他们在私生活中用上了一种不清楚的成本会计体系——他们就不能不警觉到现代条件下的家庭束缚，特别是亲子关系所造成的沉重的个人牺牲，他们也不能不警觉到，除非是农场主或农民，孩子已经不再是经济上的资产。这些牺牲，并不仅仅包括可用金钱衡量的项目，而且还包括无限量的生活舒适上的损失，不再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的损失，以及享受另外一

些种类繁多吸引力愈来愈大的，代替品的机会——这些代替品可以和正在受到日益严酷的批判的分析所做父母的乐趣比美，下面的事实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它的含义，这事实是：这分平衡表似乎还不完全，也许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最大的一项资产即生儿育女对肉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所作的贡献——也可以称为对“正常性”的贡献（尤其对妇女说来是如此）几乎总是现代人的合理主义目光所不愿理睬的，他们在私人生活中也象在公共生活中一样倾向于集中注意于可以探查得出的与功利主义直接有关的细节，并鄙夷人性或社会机体的隐蔽的必要性的观念。我们要表达的观点，我认为是清楚的，用不到进一步推敲。它可以用许多未来的父母们心中十分清晰的一个问题来加以概括：“为什么我们应该遏制我们的抱负，困乏我们的生活，以便年老时受人侮辱、被人轻视？”

当资本主义过程由于它所创造的精神态度而逐渐地使家庭生活的价值失去光芒，并撤除古老的道德传统所要在走向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道路上设置的良心上的障碍时，它同时为新的爱好提供了工具。说到不要孩子，资本主义的发明产生了效率日增的避孕方法，克服了人类最强烈冲动本来会作出的抵抗。说到生活方式，资本主义进化使资产阶级家庭住宅不那么称心了，并提供了它的代替品。我以前论到过**产业财产的蒸发**，我现在应该说说**消费财产的蒸发**。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不论在那里，市区住宅和乡间别墅不但是高收入阶层私生活的愉快而方便的窝巢，同时也是生活上的必需。不仅各种规模各种方式的招待客人，而且家庭的舒适、庄严、安静、精致，都决定于这个家庭之拥有它自己的宽敞的、妥善配备了人员的住宅。用“住宅”这个名词总括了的这种安排，就被普通资产阶

级身分的普通男女当作当然之事接受下来，恰如他们把婚姻和孩子——“组织家庭”——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

现在，资产阶级住宅的舒适排场已经不如它的负担来得明显了。在好议人非的时代中的吹毛求疵的眼光看来，它似乎主要显得是麻烦和破费的根源，而这是它们常常无法为自己辩护的。看来的确如此，即使不谈现代捐税和工资以及现代家庭仆人的态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典型的结果，并且当然会大大加强反对那种在最近将来几乎会普遍地被认为是过时的、不经济的生活方式的事物的立场。从这方面说，也和别方面一样，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过渡阶段中。普通的资产阶级身分的家庭，倾向于用小而机械化的住宅，加上最大限度的家庭外的服务和家庭外的生活来代替大住宅和大乡村别墅，以便减少生活管理上的困难——尤其是招待客人的工作，已愈来愈转到饭店和俱乐部里去了。

另一方面，老式住宅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舒适而优雅的生活的不可少的必需品了。公寓住宅和公寓旅馆乃是寓所的一种合理化的典范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当它充分发展起来时，无疑地会满足新的局势，并提供一切真正的舒适和精致。的确，现时这种生活方式及其外形在任何地方也还没有完满地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当我们把维持一个现代住宅的麻烦和懊恼都计算在内时才看得出它们在成本上所提供的好处。但是它们早已提供了别种好处——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享受的便利，旅行、和搬家的便利、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的负担卸给高度专门化组织的强有力的肩膀上去的便利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变化又怎样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高级阶层的孩子问题。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宽敞的家宅消逝了——丰裕的多子女家庭的家庭生活，只有在这样的房子里才施展

得开^①——由此引起的日益增大的磨擦，造成了另一种不愿照管孩子的动机；但是慈爱心的式微，又转过来降低了宽敞住宅的价值。

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的新生活方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显出什么决定性的成本上的好处。但是这只指在满足私生活欲望中的日常成本或主要成本而言。若考虑它的间接费用，那么纯粹金钱上的好处早已是明显的了。我们知道，一个住宅所使用的最耐久的项目的开支——尤其是房子、图画、家具——本来主要是用过去的收入来支付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新生活方式急剧地减少了积累“消费者资本”的必要性。这当然不是指现时“消费者资本”的需求即使相对地说已小于从前；小的和中等收入家庭对耐用的消费者货物的需求足以抵消这种影响而有余。但这确是指，就占有动机模式中的快乐主义成分而言，收入超过某种水平的情况不再象从前那样惬如人意了。要证明这一点，读者只须想象某种彻底实际主义精神的思想状况就够了：一个成功的人或一对这样的夫妇，或者一个“社交界”人物或一对这样的夫妇，有力支付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旅馆、轮船、火车的服务，有力支付他能取得的最高质量的个人消费品或个人用品——这种高质量商品正在用大量生产方法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②——既然情况如此，照例他们会得到他们自己有点儿想望的一切东西。不难理解，根据这样的生活方式编成的预算，将远低于“领主”风格的生活所必需的数字。

3. 为了领会这一切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动机的效率的全部意

① 现代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部分当然以家庭生活的这种稳定体制的崩坏为其条件的。

② 大量生产物品和相应的专门定制品之间的差价加大了，因为专门定制品的工资随着其质量的降低而上涨了。这种差价的加大，使质量日益精美的大量生产物品对消费者预算的影响增加了；因此，资本主义过程使消费民主化了。

义，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家庭和住宅过去曾是那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利润动机的主要动力。经济学家对这一点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当我们更密切地观察经济学家们的关于企业家资本家的利己的观念时，我们不会不发现指望从这些观念中推论出来的结论，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指望于，再也不是透过家庭住宅的窗户眺望这个世界的单身汉或没有孩子的夫妇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那种结论了。有意识或无意识间，经济学家所分析的人的行为，是这样一个人所塑造了他的观点和他的动机的人的行为，这个人之所以要工作要节省，主要是为了妻子和儿女。一当这些东西退出了生意人的道德视界，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关心另一些事情、遵循另一些途径而活动的另一种性质的经济人。对他来说，从他的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立场来看，那种旧型式的行为事实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他丧失了非浪漫主义非英雄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中仅存的一种浪漫精神和英雄主义——*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necesse est*^①的那种英雄主义。他丧失了资本主义的那种伦理观念：要为未来工作，不管轮不轮到自己来收割庄稼。

最后一点说起来也许更为动听。在前一章里，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秩序将长期社会利益信托给资产阶级的高级阶层。实际上，这是信托给在这个阶层内起作用的家庭动机。资产阶级主要是为投资而工作，资产阶级为之斗争，并试图为之而抵抗持短期观点的政府的^②目标中，消费水平的意义不如积累水平的意义大，当家庭动机提供的驱动力衰微了，实业家眼界中的时间范围就缩短到大体上相当于他的有生之年。现在即使他不必害怕他多赚的

① “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不必要的”。不来梅一所老房子上的题铭。

② 有人说，在经济事务中“国家能够采取较长期的观点”。但是除某些同政党政治无关的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等而外，它从来难得这样做。

钱只会胀大纳税通知单，他大概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乐于行使他的挣钱、储蓄和投资的职能了。他滚到一种反储蓄的心理状态中去，他愈来愈甘心接受表现了某种短期观点的各种反储蓄理论。

但是他所接受的还不止反储蓄理论。他对他所服务的企业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他具有另一种私人生活方式，于是会获得资本主义秩序对各事物的另一种关于价值和标准的观点。也许这幅图画中最动人的特色是，资产阶级在教育了自己的敌人以后，反过来允许敌人教育他自己竟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吸收了流行的激进主义的口号，似乎十分自愿地经历一次改宗过程，来信仰敌视他自己的生存的信条。蹒跚地，勉强地，他承认这个信条的部分含义。要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在急剧地丧失对自己的信条的信仰这一事实，这将是惊人的事情，并且的确是很难解释的事情。可是只要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信条由以出现的社会条件正在消逝中，这又变得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当特殊的资本家利益集团或整个资产阶级面临直接攻击时表现在他们行为中的特征，能够证实上面的说法。他们谈论，他们抗辩——或者雇人代他们谈论和抗辩；他们抓住每一个和解的机会；他们随时准备让步；他们从来不曾在他们自己的理想和利益的旗帜下挺身而出——在我国，对于过去十年所征课的压扁人的财政负担和不相容于产业有效经营的劳工立法，都不曾碰到过真正的抵抗。现在，正如读者已经确实知道的，我决未过高估计大实业的或是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我倒是准备对他们的懦怯估计得更大一些。但是，防卫的手段迄今还不全然缺乏，历史上也充满了对他们事业满怀信心的小集团决心荷枪守卫他们的阵地并且得到成功的例子。我们看见了温顺的唯一解释是，资产阶级秩序对资产阶级本身不再有任何意义，同时，如果他们什么都说了却什么

也不做，他们实际上是毫不介意的。

因此，通过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的重要性，通过破坏保护阶层和保护制度，通过创造一种敌对的气氛，破坏了资产阶级地位的同一经济过程，也从内部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那么妥当地表明，资本主义秩序不仅依靠非资本主义材料制成的支柱，也从非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获得它的精力，可是所有这些却都是资本主义本身势必要加以毁灭的。

我们已经重新发现了已被从不同立场并且我相信，根据充分的理由已被屡次发现过的东西：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中，它很可以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

我不想重复指出，那些为了硬要取得一致而互相加强的客观的、主观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因素，怎样促进了那个结果。我也不想在这里指出那已经很明显而且在下面各章中将变得更为明显的一点，即这些因素不仅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毁灭，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出现。一切因素都指向这个方向。资本主义过程不仅毁灭了它自己的体制，同时也为另一个体制创造了条件。毁灭也许毕竟不是正确的用语。也许我应该说变形。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单单是可以由碰巧碰到的随便那种东西来填充的一片空白；事物和灵魂正在沿着愈来愈顺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这样一条道路转变。钉住资本主义结构的钉子拔掉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的不可能性就消失一分。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马克思的见解是正确的。马克思将人们看不见的这种社会转变跟经济过程这个转变的主要推动力联结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同意。我们的分析如果是对的，那么我们所驳斥的毕竟不过是次要的东西，不论这在社会主义者的信条中所起的作用是如何重要。说到最后，在认为资本主

义的凋谢是由于它的成功和认为是由于它的失败之间，并不存在着普通人所想的那样大的分歧。

但是我们在回答作为本篇标题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所布置的问题远比它解答的问题为多。鉴于后面要说到的许多事情，请读者记住下列各点：

第一，到现在为止，关于将来会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还一无所知。在马克思和他的许多追随者看来——过去、现在这都是他们学说中最严重的缺点之一——社会主义只指一件明确的事情。但是这种明确性实际上不外乎是比产业国有化而已，而我们将看到，不确定的各式各样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可能性是与此并不相矛盾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会究竟可望沿着哪一条道路到来，我们也和前面那个问题一样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有许多可能性，从逐渐官僚主义化，直到最生动的革命。严格说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否确已成为定局。重复说一次，觉察到一种趋势，摹想这种趋势的目标是一回事，而断定这个目标是确实可以达到的，断定作为它的结局的事态是行得通的——且不说会不会永久存在下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人性窒息（或沐恩）于社会主义地狱（或天堂）之前，社会主义很可能在帝国主义战争^①的恐怖（或荣光）中全部化为灰烬。

第三，我们曾试图描述的趋势的各种成分虽然到处清晰可辨，然而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在一个地方充分地使自己显露出来。在不同国家中已经经过的路程长短不同，但没有一个国家已进展到那么远，允许我们以任何信心清楚地说出他们究要走多远，或者断言

① 写于1935年夏。

它们的“潜伏趋势”已经增长得那么强烈，以致任何事情都挡它不住，任何逆流都只能是暂时的逆流。产业一体化还远未完成。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在任何营业形势中还是重大因素。企业还是活跃的，资产阶级集团的领导仍是经济过程的主要动力。中等阶级仍然是一个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准则和资产阶级的动机虽愈来愈受到损伤，但仍然很有生气。残存的传统——以及家族拥有的控制性股权——还使许多企业的当局按旧时所有主——经理人的做法进行他们的工作。资产阶级家庭还没有死亡；事实上，它如此执着他的生命，以致任何负责的政治家除捐税而外迄今还不敢用任何方法去触动它。按即时行动的立场也好，按短期预测的目的也好——而在这些事情中，一个世纪是“短时期”^①——所有这些表面现象，可能比缓慢地在表层下而深处工作的，走向另一种文化的趋势更为重要。

① 这就是为什么本章和第二章所提出的事实和论证，并不能使我关于今后五十年间资本主义进步的可能的经济结果的推论归于无效的理由。三十年代很可能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挣扎，其可能性当然因这次战争而大为增加了。但可能不这样。至少并没有什么纯粹经济的理由，可以据以断定资本主义不会获得另一次成功，而我所要证明的不过是这一点。

第三篇 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

第十五章 战斗准备

社会主义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一旦我们假定：第一，所要求的产业发展阶段已经达到，第二，过渡问题能够成功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无疑是行得通的。当然，一个人可以对这些假定本身感到很担心，或者对于社会主义形式或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能不能指望它是民主的，或者不论它是不是民主的，它大概将怎样很好地行使它的职能等问题觉得担心。所有这一切，下面都将加以讨论。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假定，祛除这些疑虑，那么对于剩下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清脆的是。

在我试图证明这一点之前，我乐于清除掉我们路上的某此障碍。迄今为止，我们对某些定义颇不注意，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弥补这个缺点。我们将简单地考察两种社会类型，而对其他类型只附带地提一提。这两种类型，我们将称之为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所谓商业社会，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关于这种制度模式我们只须指出二个要素：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和经过私人契约（或私人经营或私人创意）调节生产过程。可是这种类型的社会并不照例是纯粹资产阶级的社会。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二篇里已经看到的那样，工业或商业资产阶级除非和非资产阶级阶层共生在一起，一般是无法生存的。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东西。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特例，其特点是有创造信用这种额外现

象——足以说明现代经济生活中那么多显著特征的那种靠银行信用，即为此目的而制造出来的货币（票据或存款）来筹措企业资金的做法。但是，既然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商业社会实际上总以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出现，所以如果读者喜欢保留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对照，也不会有什么多大出入。

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用来专指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社会主义一直被称为知识上的普罗丢斯*。有许多给它下定义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接受的方法，这就是说，那些愚蠢的例如说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面包之类的定义是不在其内的——而我们的定义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有些关系到它的问题，指出一下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尽管有被指责为炫学的危险。

我们的定义排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可以称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我看来那么清楚地表明了问题的本质，因此用不到浪费篇幅再涉及别种形式了。但是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名词是为了指明我们所要考察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留心避免一种误解。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只想用来排除许多控制单位的一种多元性的存在，以致每个单位在原则上都代表自己的不同利益尤其是要排除一直会走到重新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的多数地区的自治局面的存在。局部利益的排除很可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可是这仍然是本质性的。

但是我们的名词既不是指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即我们有时称

* proteus 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喻变幻无定的东西。——译注

之为中央局或生产部的中央当局必然是专制而独断独行的，也不是指，凡总经理董事长才配提出的一切创议只能来自这个中央当局的那种中央集权制。关于第一点，中央局或生产部也许必须把它的计划提交议会或国会审议。也可能有某种监察或检查的权力机关，一种可以设想为甚至有权否决某种决议的审计局（Cour des comptes）。关于第二点，必须把某些行动自由留给“现场负责人”，比如各个产业或工厂的经理们。眼前我大胆假定，合理的自由是从经验中发现并且真正给了他们，有了这样合理的自由，工作效率既不致因下属的不受狂妄野心，也不致因为部长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报告和没有答复的问题而受到损害——也不会因为足以说明马克·吐温的收获土豆的规律的部长命令而受到损害。

我没有分别为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下定义。我将完全不用集产主义这个名词，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也只偶然用于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集团。但如果我不得不用这两个名词的话，我将只把它们用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在分析历史上的用法时，多数作家曾试图给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诚然，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几乎一贯用来指比其他各种社会主义者更彻底更急进的人。但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文件之一，题名却是“共产党”宣言。原则的区别从来也不是根本性的——在社会主义营垒内部公开宣布了的分歧，并不比社会主义营垒和共产主义营垒之间公开宣布了的分歧更小。布尔什维克称他们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同时又称自己为真正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不是真正的、唯一的，他们确实是社会主义者。

我避免了自然资源、工厂和设备的国家所有权或财产权的名词。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有些概念，无疑通用于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社会世界，例如欲望、选择、或经济财货。有些概念，虽在其日常意义上保有这种关系，但分析者

的加工已达到了使它们丧失这种关系的程度。价格和成本可以为例。^①但是还有一些名词，按它们性质的特点而言是不能移植的，它总带着某一体制的气味。因此，在它们所属的社会世界或文化领域之外使用它们，事实上等于历史叙述上的歪曲，所以是极端危险的。所有权、财产权——我相信赋税也一样——是属于商业社会世界的这类名词，恰和骑士、采邑是属于封建世界的名词一样。

但是国家也是这样的。我们当然可以用主权这个规范来给国家下定义，从而说到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果这个概念不单是法律的或哲学的气体而且还有实质的话，就不应该允许国家闯入不论是封建的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中去，因为这二者中任何一个都没有、或不会表现出这个名词意义的较好部分所指的、私人 and 公共范围间的分界线。为了把这种意思和它的作用、方法、态度的全部财富保留在一起，最好的说法似乎是：国家是封建主和资产阶级间一系列冲突与妥协的产品，它将要形成社会主义凤凰由以兴起的灰烬的一部分。所以我不把它使用在我的社会主义定义之中。当然，社会主义可以借国家的某一次立法行为而来到。但是说国家在这次立法行为中死亡了，象马克思指出过，列宁重复过的那样，我也看不出这种说法有什么不方便处。

最后，我们的定义就其完全在一个经济的观点上打转这一点而言，和我曾经碰到过的一切其他定义是一致的。每个社会主义者都希望从经济角度来使社会革命化，他所希望的一切祝愿都来自经济制度的变革。这种看法当然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即认为经济模式是我们称为社会的这种现象的总和和真正起作用的要素的理论。可是，我想到了二点意见。

① 价格，在现代理论中，定义为仅仅是形态变换的系数。成本，在机遇成本的意义下，是一个一般的逻辑范畴。但我们很快就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前篇谈到资本主义时已经指出，现在谈到社会主义时还必须指出，无论是我们观察家或者是准备信任社会主义的人们，经济的考虑都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我虽然象上面那样定义了社会主义，我的意图却并不想否认这一点。为了公正对待我曾与之会面过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一切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指出，这一点也适用于他们；他们虽因经济要素对他们的信条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因而强调了它，他们并不想暗示，除牛排和收音机面外，再也没有值得为之斗争的东西。的确也有些非常顽固保守的叫人受不了的人正是作此想法的。有许多人虽非顽固保守分子，可是为了在猎取选票中能够直接迎合群众，强调了经济方面的希望。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歪曲了贬低了他们的信条。我们决不要这样做。相反，我们要记住，社会主义的目的比填饱肚子要高，恰如基督教的意义比某种天堂地狱的快乐主义的价值为多。首先而且首要的是，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为此，一个人即令他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按其经济成就来说可能较差，仍然可以设想他是一个热烈的社会主义者。^①因此，任何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赞成论或反对论，不管它本身如何成功，从来都不能是决定性的。

但是第二，怎么样的文化世界？我们可以审察一下一些受到信任的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职业以便了解是否有一种典范已从这些职业中浮现出来，借此设法答复这个问题。初初看来材料似乎是丰富的。有些社会主义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摊开双手，面带幸福的笑容，唱起一套赞美诗，其中有关于正义、平等的，有关于一般自由的，特别是关于免于“人对人的剥削”的自由，关于和平和爱

^① 当然，逆命题也是正确的：一个人可以承认社会主义有经济上的好处，但根据文化上的理由而憎恶社会主义。

的，关于打破各种镣铐和不受限制的文化精力，还有关于新视野的开放，新尊严的启示的颂歌。但是这是在卢骚里面搀上了一点儿边沁。另外有些人只简单声述了工会运动激进派的利益和欲求。可是还有一些人却出奇地缄默。是因为他们蔑视廉价的口号而又想不出别的东西吗？是因为他们想到了一些东西却怀疑它的号召力量吗？是因为他们知道和自己的同志的意见分歧是无可挽救的吗？

所以，这条路是走不得的。相反，我们必得正视我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上的不决定性**。事实上，按我们的定义也好，按大多数其他定义也好，一个社会可以是完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在一个绝对的统治者统率之下，或者是按照一切方法中最民主的方法组织的；它可以是贵族的或无产阶级的；它可以是神权政治和教阶政治的，也可以是无神论的，或者是对宗教很淡漠的；它可以比现代军队更严格地纪律化，也可以完全是纪律松弛的；它可以是具有禁欲主义精神的或者是具有幸福主义精神的；是精力充沛或萎靡不振的；是只想未来的或只想到今天的；是好战而民族主义的或是和平而国际主义的；是平均主义的或正好相反；它可以具有领主的伦理观念或奴隶的伦理观念；它的艺术可以是主观主义的或客观主义的；^① 其生活方式是个人主义的或标准化的；还有——对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其本身就足以博得我们的忠诚或激发我们的蔑视的东西——它既可以萌发于社会的优秀分子根干之上，也可以萌发于它的低能者根干之上，因而相应地产生出来优秀人物或产生出来低能人物。

① 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是对立的。这么说既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可靠的。人们可以争辩说，社会主义的组成形式，将保证个性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地实现。事实上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读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可以说马克思错了，经济模式并不决定文化；他也可以说，完整的经济模式会决定文化，但若没有进一步的根据和假定，构成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要素却做不到这一点。顺便说说，倘若我们只根据体现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定义中的事实，试图按同样的方法重新建资本主义的文化世界，我们不见得会使资本主义发展得好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决定性无疑已经有了一种印象，并且觉得可能根据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趋势进行推论。但这只是因为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历史的现实，它供给我们所需的一切额外的材资，并且根据事实排除了无限多的其他可能性之故。

但是，我们用决定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它的比较严格比较技术的意义，此外，我们之使用这个词，是就整个的文化世界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不决定性不是绝对的障碍，它不能阻止我们去发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比其他制度更容易产生出来的若干特色或趋势，尤其是文化有机体的某些特殊部位上特色和趋势。构想某些合理的额外的假定也不是不可能的。从上而对各种可能性所作的探索中，这一点看得极为明显。例如，如果我们象许多社会主义者那样，相信——我认为这是错的——战争不过是资本主义诸利益集团间冲突的一种形式，由此可以容易作出推论说社会主义是和平主义的，不好战的。或者，如果我们假定社会主义和某种类型的合理主义是在一起演化而成，并且也和它不可分离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即使不是反宗教的，大概也是非宗教的。在宗教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这里试试那里试试，虽然大体说来，我们最好还是把讲台让给这领域内唯一真正伟大的名师柏拉图。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否定这么一件事实，社会主义真正是文化上的普劳丢斯，社会主义文化的可能性，只当我们说到社会主

义族类中某些特定问题时，我们才能说得更为明确一些——所有的特定问题中的每一个，对坚持它的人说来肯定是唯一真实的，但是对我们说来无论其中哪一个都不过是我们的备用品而已。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蓝图

首先我们必须看看，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粹逻辑中究竟有没有错误的东西。因为虽然从来没有一个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粹逻辑的健全性的证据，能使任何人改宗社会主义，或在事实上更多地证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实际可行的命题，可是，只要证明它在逻辑上是不健全的，或者，甚至不能证明它在逻辑上是健全的，也足以判定它本身是荒谬的。

更精确地说，我们的问题可表述如下：给予假定有一个前面所规定的那种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能不能根据它的根据，并根据合理行为的规律，推得很好地决定了关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决策呢；或者把它说成道地的经济学的口号，这些根据和规则，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环境中，能不能产生出在数目上足以出色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所面临的问题的诸未知数的，独立的、相容的——即互不矛盾的方程式？

1. 回答是肯定的。在社会主义的纯粹逻辑中不存在什么错误的东西。并且，事情十分明显，若不是人们曾经否认过这一点，面更稀奇的是，正统社会主义者如不向具有强烈资产阶级观点并和资产阶级共鸣的经济学家领教，便得不出能够满足科学要求的答案，我甚至不会想到要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的。

我们需要特别指明的唯一挺身出来否认这件事的权威是密塞

斯教授。^①他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先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因此必须先有成本因素的价格和标定它们价格的市场。由此他作出结论说，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这样的市场，因而不存在合理生产的信号，所以，当这个体系完全实现了的时候，它就得无目的地行使它的职能。正统社会主义者中间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对这样的批评或类似这样的批评，也许还对他们自己的某些怀疑，最初并不怎么准备反驳，只是辩论说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能够从它的资本主义先辈所演化出来的价格体系上起步——这无疑切合于实际困难的讨论，但完全不切合于原则性的疑问——或者从一首对他们的天国的奇迹式的荣光的赞歌起步，在这天国里，不难把一切资本主义的欺诈（象成本的合理性之类）一概免除，同时同志们会通过自由利用社会主义店铺中倾泻出来的丰富物资解决全部问题。这等于把这个批评接受了下来，有些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似乎确实还在接受这个批评。

除一些次要问题需作推敲和澄清而外，几乎不留下什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巴隆纳，凡要求精密的说明的读者，我希望去读一读他的论证。^②这里作一个简略的概述就够了。

从各经济学家的立场看来，生产——包括运输和一切随上市出售以供来的一切作业——不过是现存“诸要素”在技术条件约束

① 他的论文发表于1920年，已译成英文，见《集产主义经济计划工作》（哈耶克编，1935年版），又见他的《共同经济》，英译本题为《社会主义》（1937年）。

② 在巴隆纳以前，已有一打以上的经济学家暗示了答案。其间有这样的权威如维塞尔（在他的《自然价值》一书的1893年版中，德文原本是1889年版）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概要》第二卷，1897年版）。他们两人都觉察到，经济行为的基本逻辑在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样的，答案是从此推出来的。但是帕累托的弟子巴隆纳，是第一个完成答案的人，见他的题为《集产主义国家的生产部》的论文，《经济学杂志》，1908年。英译文包括在《集产主义经济的计划》一书中，见上面的一个脚注。

不可能也不必要公平地评判晚近的著作中极丰富的收获。我只想提一提在某些

的范围内所作的合理的结合。在商业社会中，结合诸要素这一项工作涉及购买或雇用这些要素，而这样一个社会所特有的那些个人收入，就出现于购买租赁或雇用过程之中。这就是说，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过是同时影响了两者的这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现在，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间最重要的逻辑上的——或纯粹理论上的——区别是，在后者中，这已不再是这样的了。因为初看来，生产手段并没有什么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不允许使它们成为分配的准则，即使它们确实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缺乏商业社会的这种分配的自动机制。这个空白点应该由一种政治法案去填充，比方说，由社会共同体的宪法去填充。这样，分配就变成一种特殊的操作，并且，至少在逻辑上完全和生产分离开来了。政治法案或政治决议当然应根据社会的经济特点和文化特点，它的行为、目标和成就来决定，反过来又大有助于决定它们；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完全是荒谬的。如前面已指出过的那样，共同体可以采用平均主义规则——这种规则又可以具有和平等理想联得起来的许多意义中的任何一种意义——或者容许不平等达到所要求的任何程度。它甚至可以抱着按照人们所想望的任何方向上生产最大限度成就的目的来进行分配——这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情况。它可以调查各个同志的各种愿望，或者决定只把某个权力机关认为对他们说来是最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按需分配”这个口号可以具有以上两种意思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必须规定一些规则。为了我们的目

方面特别重要的文献：泰勒：《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针》，《美国经济评论》1929年3月号；蒂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内的经济计算和分配》1932年；查森豪斯：《计划经济理论》，《国民经济学杂志》，1934年；特别是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7月号，论文收集在兰格和泰勒合著的1938年出版的同名的书内；勒纳的各种著作将在后面的脚注中提到。

的，只要考察一个很特殊的事例就够了。

2. 现在假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道德信念是彻底的平均主义，但同时规定同志们在生产部能够生产并且愿意生产的全部消费者货物中可自由选择——这个共同体当然可以拒绝生产某些商品，例如含酒精饮料。我们再来进一步假定，所采用的平均主义理想的实行方法，是发给每个人——儿童，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人，称做一个人的几分之几，可由有资格当局加以决定——一张券，代表他或她对一定量消费者货物的要求权，这分要求权等于当期可用的社会产品除以全部要求权后所得的数值，全部分配券到期末一律无效。这些券可以想象为对全部食品、服装、家庭用品、住宅、汽车、电影等当期已经生产或正在生产出来供消费用的（即为了发交消费者而生产的）物资的 x 分之一的要求权。只不过为了避免错综复杂的，不必要的，否则就会发生于同志们之间的大量交换行为，所以我们不以实物数量表明这些要求权，而以便于选择，而它本身又是没有意义的相等数额的单位去表明它们——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单位，或称之为月亮、太阳，甚至也可以称为元——并且规定，每个单位的货物，将在交出一定数目单位以后让渡给对方。诸社会商店所索“价格”，按我们的假定，总得满足这样的条件：各种商品的“价格”乘他们的现存数量，加起来达到在不用这办法时任意决定的，同志们分别对各种商品要求权的总数。但是生产部除提示最初暂定价格而外，用不到决定各别商品的“价格”。如果口味和无变化的“货币收入”是已知的，同志们将通过他们对暂定价格的反应透露出，他们准备按什么价格取得除谁也不要的东西之外的全部社会产品，而那时生产部就得接受这些价格，如果它愿意把仓底出清的话。这样一来，事情就会完成，平均分配的原则将在一种表面上非常讲得通的意义，并用一种出色地决

定了的办法加以贯彻。

但是，这当然要以一定量的各种货物早已生产出来为其必需条件。真正的问题，即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恰恰是，怎样才能合理地生产，也就是说，按照什么方法才能在可用资源、技术可能性、以及其余各种环境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造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①的结果。很清楚，如果生产计划是，比如说由同志们多数票决定的话，就会全然无法满足这个^②必要条件，因为在这情形下，一定有些人，也可能所有的人都得不到它们所要的东西，得不到那些用不着减低别人的满足面仍然可能给他们的东西。可是，同样清楚的是，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合理性可以用别种方法来达到。对理论家来说，这可以从这么一个初步命题推论而得：消费者在估价（“所需的”）消费者货物时，事实上同时也在对参加这些物货的生产的生产手段进行估价。对普通人而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证明合理的生产计划的可能性的证据，可以象下面这样得到供给。

3. 为简化问题起见，假定生产手段的量是既定的，并且暂时它的量是不可变的。现在让中央局把自己分解为特定产业的委员会，或者更妥当地，让我们为每个产业设定一个经营管理它的权力机关，和控制协调所有这些产业的经理或经理局的中央局合作。中央局按照某些规则来进行生产资源的配置——全部生产资源是在它控制之下的——它借此来实行它的控制和协调的任务。假

① 如果现代理论家们反对这样的措辞的话，我恳求他们考虑一下，如果用更正确的辞句而不为这一议论的目的提供任何补偿性的利益的话，将引起多少全然不必要的赘语。

② 并不是说，它不会根据另一种合理性的定义的立场来满足诸必要条件。关于当前讨论中的安排，怎样跟别种安排作比较，这里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不久就要说到这一点。

定，中央局规定产业经理们可以按照三个条件取得他们所要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者货物和劳务。第一，他们必须生产得尽可能地经济。第二，他们必须为所要求的每种生产者货物和业务的每个单位转移他们先前在让渡消费者货物时所取得的消费者货币中一定的数目给中央局。这么说可能也是完全合适的：中央局宣布它准备按规定的“价格”“出卖”给任何产业经理以不限量的生产者货物和劳务。第三，经理们必须要求和使用他们在按最经济的方法进行生产时他们能够无须为了少于他们为了相应数量的生产资料而必须转移给中央局的“货币”而“出售”任何部分的产品而使用的同样多的数量（且不得少于此数）。用更技术性的用语，这个条件的意思是：各部门的生产，应该做到使“价格”等于（不仅仅是比例于）边际成本。^①

① 这个原则，是从选择的一般逻辑推论出来的，在勒纳许多注释和论文中强调它和为之辩护以前，未被普遍接受。这些注释和论文多半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又见《经济》季刊，1937，九月号）。它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原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愿乘这个机会提起读者的注意。作为这个选择的逻辑的一个命题，说本文内所指出的条件，在它和价格等于每单位总成本这个规则发生矛盾的任何时候，会要取代这个规则也是正确的。但是二者间的关系，因某些不同的事情的扰乱弄得多少有些模糊，因此要作某些澄清。

边际成本的概念，即指生产作小数额增加时必将发生的总成本的增量，若不使它和给定的一段时间发生关系是决定不了的。所以，假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即无论如何也得开走的一列列车，应不应该加运一批旅客，当时的边际成本可考虑为零，即有也总是极小的。这一点也可以这样来表达，从一个极短时期——一小时，一天，甚至一星期——的立场来说，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是间接费用，甚至润滑油和煤也是，而间接费用是不进入边际成本的。但是所观察的时间愈长，进入边际成本的成本要素愈多，首先是通常包括在主要成本概念内的一切东西，随后是愈来愈多的，实业家所称为间接费用的项目，直到从很长期间的立场来说，或从计划一个现在还不存在的产业单位的立场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或者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留在间接费用范畴之内，甚至包括折旧在内的一切项目都得列入边际成本的计算之内，只要这个原则不受下列情况的修正：若干因素，例如铁路航线，在技术上只有成为一个极大单位时才有利用价值或才可交付使用（“不可分割性”）。因此，我们一定不要把边际成本和（边际）主要成本

每一个产业经理局的任务，就这样出色地被决定了。恰如今天的完全竞争产业中的每个商行，只要技术可能性、消费者的反作用（他们的口味和收入）、生产手段的价格为已知的，就懂得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一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产业经理们，只要生产局公布了生产手段的“价格”，只要消费者已经透露了他们的“需求”时，就会懂得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向中央局“购买”多大数量的各种生产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价格”与消费者货物的“价格”不同，是互相混淆。

但是我们常常把刚才讨论的条件下列规则联系在一起，即：社会主义——正和资本主义一样——经理在任何时点，如果他们准备合理地行动的话，就该不计往者，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政策中，不该计较现存投资的帐面价值。但是这不过是在给定局势下的短期行为规则。这并不是说，他们应该忽略事前能预见的这些将要结晶化为固定成本或间接费用的要素。忽略这些要素，意味着只要参加间接项目的生产的劳动时间和自然资源有其他用途时就会用不合理行为对待这些劳动时间和自然资源。但是，重视它们，一般就意味着，只要事情是按计划发展的，价格应该等于每单位产品总成本，又因为例外情形主要是由于不可分割性所代表的对合理性的技术上的障碍，或者是由于事情的实际进程乖离了计划，所以这些计划的逻辑，用价格等于每单位产品总成本的原则来表述，到底还并不是不妥当的。虽然在短期局势下这可能是该做的最合理的事，可是按计划亏损来运转一个产业决不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为了下列两个理由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

第一，人们曾经否认这一点。甚至有人暗示过，如果价格经常等于不包括折旧在内的短期边际成本，福利将会（即在长期间内）增加，同时，象建设一座桥梁之类的开支，应该由赋税来负担。我们的规则，即正文内提出的规则，并不是这种意思，而且那样作也不是合理的。

第二，1936年三月，俄国中央当局公布的法令，宣布取消法令公布前有效的一批产业的补助金制度，规定价格应该调整得等于平均单位总成本加上一个为积累所需的增加额。这个规定的前一部分，可以说它虽非严格正确，但比之后一部分的不正确表述所会引导人们去假设的，更接近于正确的规则。关于后一部分，只要我们考虑到急剧发展的条件或急剧发展的必要性，最明显的反对意见也会大为减弱——读者可回忆第二篇对资本主义发展所提出的论证——并且完全可以设想，苏维埃政府采取等于在亏损情形下资助投资的补助金政策，和1936年的部分取消补助金制度，两者都是做得对的。

由中央局片面规定的。可是我们也可以说，产业经理们恰恰和消费者对消费者货物的“需求”一样，显示出出色地决定的生产者货物的“需求”。为了完成我们的证明，还需要补充的只是，符合最大限度标准的、关于中央局定价行为的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中央局只要简单地对每种品目和质量的生产者货物设定单一价格——如果中央局采取差别价格，即对不同的经理部门为同种同质生产者货物规定不同价格，这就一般地^①应该根据非经济的理由判断其当否——第二，要留心使这些“价格”恰巧能够“出清市场”，即手中不剩下未使用的生产者货物，同时也没有唤起追加的对于生产者货物的需求。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规则将足以保证合理的成本会计，因此也足以保证生产资源的经济合理的分配——因为前者不过是保证和验证后者的办法——因而也就足以象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计划的合理性。考虑到只要大家遵守这个规则，就不会有一分生产资源能够不引起和它所加在它的新用途上的一样多(或更多)的、以消费者货币表现的消费者价值的毁灭，而转用到任何其他生产部门中去，就推论出我们所需要的证明。这等于说，生产是在社会环境的一般条件所可自由选择的一切方向中进行着的，它进行得尽可能合理，并且不超过合理性所许可的限度，这就完成了我们的静止的经济生活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计划——其间一切事情都是正确预见了的，一切事情是不断重复进行的，不会发生任何推翻计划的事情的——的合理性的辩护论。

4. 但是，如果我们走出静止过程理论的领域，承认随产业变动以俱来的现象，也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困难。只要所涉及的是经济的逻辑，不能认为，既然我们设想的这类社会主义，虽然理论上

^① 这一点，有很重要的例外，但并不影响我们论证的要旨。

对付得了管理静止经济中反复发生的任务，却必然会在解决“进步”所提出的问题时遭到失败。稍晚，我们将看到，为什么下面这一点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来说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即：它不仅必须在开始它的生涯时尽可能从它的资本主义先辈那里取得丰富的遗产——丰富的经验、技术和资源，而且在资本主义过完了它的纵情任意的青年时代之后，完成它的工作，走近一种静止状态。但是，这么说，理由倒不在于我们没有能力为社会主义社会想出一种，当它的产业装置显出有改进机会时应该采取的合理而出色地决定的措施。

假定，已为产业的生产过程设计出来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机器。为了排除随筹集投资而来的问题——马上就要加以考察——，为了隔离一组特殊的现象，我们假定，新机器可以由历来生产效率较低的机器的那个工厂生产，而按生产资源计算的成本则恰好完全相同。 x 产业的经理部分，遵照给它的指令的第一条——即尽可能经济地生产——会采用新机器，这样，它就能以小于迄今为止的生产手段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结果，自此以后，它能移转给生产部或中央局一笔数目小于它从消费者那里收到的消费者货币。随你怎样称呼这笔差额，可以称它为丁，铲子、或“利润”。经理如果实现了这笔“利润”，确实会违反指令第三条所规定的条件，如果他服从这个条款，立即生产出为满足这个条件所必需的较大量的产品，利润就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利润潜在地存在于经理部门计算中这一事实，就已经充分足以使他们履行按我们假定的它们应该能够履行的唯一职能，即，以一种出色地决定了的模样，指出现在可以实现的、资源重配置的方向和范围的这种职能。

如果，当社会可用资源已完全用于供给一定的消费水平的任务的时候，出现了一项需要使用追加生产因素的，或者也可以说，

需要一笔追加投资的改进工程，例如——一座新桥或一条新铁路，同志们就得超过我们假定为由法律规定的时间做超时的工作，或者就得限制他们的消费，或者就得两者兼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前此为了按照最简单的可能的办法来解决根本问题而作的假定就预先排除了“自动”解决的可能性，即排除了作出中央局和产业经理只能通过三条规则范围内被动地追随客观指示器的指导而达到的那种决定的可能性。但是这当然是我们图式的无能，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无能。如果我们愿意有这样一种自动的解答，我们所必须做的事就是把那条规定对期末未使用的消费者货物的一切要求权都归无效的法律废除掉，放弃收入绝对平均的原则，和授权中央局对超时工作和——我们怎样称它？啊哟，还是让我们说——储蓄实行奖励了。使可能的改进或投资付之实施的条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最少诱惑力的改进或投资，会得到一笔和引诱它所需超时工作、储蓄或两者的奖金相等的“利润”，于是，我们的问题引入的一切新变数，即假定超时工作和储蓄是该时期的奖金的单值函数这个问题内的全部新变数^①就独特地被决定了。为开支超时工作和储蓄而拿出去的“货币”，可以很方便地假定为前此发出去的个人收入的“货币”的附加部分。由此引起的各个方面应作的调整就用不到再耗费我们的时间了。

但是以上关于投资的论点，更清楚地阐明了，看来最适合于我们的特殊目的的这个图式，既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唯一可能的蓝图，

^① 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只因新投资而引起。为使静止过程继续运行而需要的经常投资，可以，并且也会和其他一切成本开支完全一样地供给。尤其是，投资不会有利息。乘这个机会让我指出，社会主义者对利息这种现象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圣西门几乎当作当然之事承认它。马克思将它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某些现代社会主义者又承认它。俄国的实践是承认利息的。

也并非必然可以自我推荐给社会主义社会的图式。社会主义不必一定是平均主义的，但是我们能够有理由期望，社会主义社会所会容忍的**收入的不平等**，大概不会产生出资本主义在它的周期诸阶段的平均中产生出来的那种投资率。甚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不足以产生出这样的投资率，并且它们须依靠公司的积累或银行信用的“创设”予以加强，这些方法并不特别自动，且都不是出色地决定的。所以，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渴望达到同样的甚至较大的投资率——当然它用不到——就应该依靠储蓄以外的办法。从可以容许实现的“利润”中提取积累，而不是使它仅仅处在潜在状态，或者象上面所提示过的，采取类似信用创设的办法，都是实际可行的。可是，将这件事交给中央局和能够把投资作为社会预算的一部分来解决的国会或议会更为自然的，因为虽然社会经济运营的“自动化”部分的表决，纯粹是形式的，也许是监督性质的，投资项目的表决——至少它的数额——却会牵涉到一种真正的决策，就重要性而论它和军事预算及其他预算的表决处于同等地位，使这种决策和关于个别消费者货物的数量和质量“自动化”的决策相协调之后，就不会出现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要接受这个解答，我们必须在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上离弃我们图式中的基本原则。

我们蓝图中的其他特色，即使在它的总框架内也是可以改变的。例如，除了对超时工作有一个有条件的例外而外，我没有让各个同志自己决定他们将做多少工作，虽然作为投票人，或者通过其他方法，他们对于这个决定，可以发生和他们之对于收入分配之类的决定所发生的同样大的影响。我也没有允许他们的摆业自由大于中央局按它的总计划需要可能或愿意给予的自由。用义务兵役制度做比喻，也许容易摹想这样的制度。这样一个计划，相当接近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口号——或者至少稍加修改以后就

能符合于这个口号。但是我们也可以让各个同志自己决定他们该做多少工作,做什么性质的工作。这样,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就得通过一种诱导制度才能办到——也给奖金,但不仅对超时工作,对一切工作都发给,以便保证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劳动力的“供给”在任何地方都能适合于消费者需求的结构和投资计划。这类奖金必须和每种工作的引人入胜和令人厌烦的性质明显地联系起来,也得和担任这种工作所必需学习的技术的熟练程度明显地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说,它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等级制发生了联系。虽然后者和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奖金制度间的类似之处不能过于强调,我们还是可以说到一个“劳动力市场”。把这种机制插入蓝图之内,当然会使这个蓝图和我们的蓝图发生很大的差别。但是它不会影响决定社会主义体系的根本之点。它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事实上会突出得更强烈些。

5. 这样一来,商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间的这种同族相似性便是如此,这一点读者们一定是始终注意到的。看来这种相似之处会使非社会主义者和某些社会主义者高兴,又会使另外一些社会主义者烦恼,所以,还是重新明白指出它的寓意何在,它的原因是什么较为妥当。说清楚这点以后,就可以明白,高兴和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理由。我们在试图构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图式的时候,使用了我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和问题中我们熟悉的名词曾按照传统加以仔细说明的那些结构和概念。我们描述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只要我们说出“市场”、“购买和出卖”、“竞争”等名词的时候,立刻就能为人所理解。我们似乎必须使用,或者免不了要使用有资本主义气味的名词,如价格、成本、收入,以至利润,而地租、利息、工资等等,尤其是货币,我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看来似乎肯定是最坏的问题之一，即地租问题吧，在这里地租的意思，是指的生产性地使用自然力——让我们说“土地”——的报酬。我们的图式分明没有隐含着土地地租会付给任何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意思。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只是说，在可以计算的将来不是丰饶到能满足一切必需而有余的任何种类的土地，必须被经济地使用和合理地配置，恰如劳动力或任何别种类型的生产资源一样，同时说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接受一种具有经济重要性的指标，任何新出现的用途，必须用这个指标来加以比较，并且，通过这个指标，使土地进入社会簿记体系之内。如果不这样做，社会共同体的运营就会是不合理的。但这样做，并不含有任何对资本主义或对资本主义精神让步的意思。地租中一切商业的或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论在它的经济学意义上，或社会学意义上，和一切可能同情私有财产辩护士的东西（私人收入、地主之类），已经被完全消除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赋予同志们的“收入”并不是工资。事实上，经过分析之后就可以明白，工资是各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经济要素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人们只能把它拿来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联结在一起。我们在稍晚引入的奖金，和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的关系要多一些。但是工资的替身，除表现于中央局的账簿上而外，实在是哪里也不存在的，表现在账簿上的工资又不过是一种指标，这种指标为了合理分配的目的，已和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劳动力联系起来——这种指标，已经丧失了只有资本主义世界才有的全部意义。顺便说说，我们可以注意，既然我们可以随我们高兴，把代表同志们对消费者货物要求权利的券劈成的单位称做任何东西，那么这些单位也可以称做劳动时间。又既然这些单位的总数——不能超过方便的限度——是可以任意设置的，我们也可以使它们和

实际总劳动时间相等，并且按照李嘉图-马克思的方法，调整各种各等级劳动为某个标准的质量。最后，我们的共同体满可以和采用其他原则一样采用这样一种原则，“收入”应和每个同志所贡献的标准工作的时间成比例。于是我们就有了某种劳动券制度。有趣的是，除现在我们不必理会的技术上的困难而外，完全可以证明这种制度是行得通的。但是不难看出，为什么即使那样，这些收入也不是工资。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制度的行得通，丝毫也没有证明劳动价值理论。

大概用不着在利润、价格、成本这些方面再来表演这套把戏了。不这样做，同族相似性的原因也已清楚可辨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从资本主义借用什么东西，而是资本主义向完全的一般的选择的逻辑借用了很多东西。任何合理的行为，必定理所当然地显出和其他合理行为的某些形式上的相似性，这在济经行为的领域内也碰到了，在这里，不过是纯粹的合理性在铸造相同的行为模型，至少在纯理论方面是如此，表明了行为主义模式的诸概念，于是浸透了某个历史时代的一切特殊意义，并趋向于使外行人老是记住这个历史时代的色彩。如果我们对经济现象的历史的熟悉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形成的，我们现在来分析资本主义过程的时候，看起来竟是在借用社会主义的诸概念。

到现在为止，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因为发现社会主义毕竟只能使用资本主义的机制和范畴而感到庆幸。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什么反对这件事的理由。因为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因为社会主义奇迹没有创造出它自己的逻辑而感到失望，只有社会主义信条的最粗野最愚蠢的变种才会因这种影响的为人所知而感觉到危险——按照这些变种的意见，资本主义过程不过是既无任何逻辑又无任何秩序的一团混乱。具有这两种截然不同信念的

有理性的人，能够同意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却不仍旧跟从来一样相隔很远，但是，还可以剩下一个名词学上的异议：也许有人会抗辩说，这些名词身上背着外来的可是十分重要的意义，又无法信任谁都能丢掉这些意义，所以使用这些名词是不方便的。此外，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一个人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生产和商业生产的经济逻辑的本质上一致的结论，却反对我们由以达到这个结论的特殊的图式或模型（见后）。

可是，事情还不止此。某些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不仅愿意，而且热衷于承认，我们所摹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类型和完全竞争类型的商业经济间的特殊强烈的同族相似性。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说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整整一个学派，他们倾向于赞美完全竞争，他们倾向于依据这样的理由来鼓吹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提供了在现代世界上达到完全竞争结果的唯一办法。把自己放在这种立场上所能得到的策略上的利益确实十分明显，足以说明为什么初初看来他们的胸襟如此惊人地广阔。一个和任何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清楚了马克思的议论和通俗的议论一切缺点的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就这样承认了他认为应该承认的东西，却用不到损害他所确信的东西，因为这种承认关系到一个已太太平平地死去了（就算它曾经存在过）并埋掉了的历史阶段；同时，由于明智地把他的控诉局限于非竞争情况，他于是就能对某些控诉，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的生产而不是为人民消费的生产，别种看法不过是愚蠢之类给予有条件的支持；他也能够这样来迷惑善良的资产者，即告诉他们社会主义不过要做他们真正一贯想做的事，要做他们自己的经济学的贤哲总在教给他们去做的事。但是强调这种同族相似性的分析上的好处却并不是同样大的。^①

^① 见第八章。

我们早已知道经济学理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构成的完全竞争这个苍白的概念，把决定自己理论的根本之点寄托在个别商行能不能借它们的独立行动影响它们的产品的和产品的成本因素的价格。如果不能——这就是，如果每个商行都不过是苍海中的一粟，所以它们只好接受当时统治市场的价格——理论家就把这称为完全竞争。还可以表明，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个别商行的被动的反作用对市场价格和产品总量所形成的结果，就其形式上的特质而言，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中具有经济重要性的诸指标和产品总量看来是互相类似的。可是，按照我们的蓝图中构成了和完全竞争资本主义外貌上相似之处的一切真正的内容——决定收入的形成、工业领袖的推选、倡议和责任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成功和失败的定义等等的各项原则——我们的蓝图恰巧是完全竞争的反面，它和完全竞争间的距离，比它和大实业类型的资本主义间的距离要远得多得多。

虽然我并不因而认为，人们有理由指责我们的蓝图向商业社会借用的东西太多，或者指责它浪费了社会主义的圣油把它涂到这个非神圣东西头上，但是对于根据其他理由反对它的社会主义者我倒具有根多同感。确实，我自己曾指出，组织一个消费者货物的“市场”，根据市场价格这种指示器来规定生产的方向这种方法，会比任何其他方法，例如多数票表决之类，能够使得给同志们的东西更接近于同志们所要的东西——比市场更为民主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以及在这种意义上，这种方法会达到“最大限度满足”的结果。但这种最大限度不过是短期中的最大限度^①，而且，这还是

^① 可是，这是一个可以证明的最大限度，正是这种最大限度证实了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恰如竞争的最大限度证实了竞争经济的经济合理性一样。不论在哪一种情形下，这种证明的意义都不太大。

相对于同志们在各个瞬间的实际愿望而言的最大限度。只有老实不客气的牛排社会主义才能够满足于这样的目标。我不能非难任何社会主义者看不起这种牛排社会主义，不能非难他们关于人类的新文化形式的梦想，也许干脆是关于一种新的人类的梦想；如果社会主义真有什么希望的话，真正的希望就寄托在这里面。具有这种信念的社会主义者也许仍旧容许他们的社会按照不外是快乐主义性质的同志们的实际的嗜好办事。但是他们所将采纳的国家计划，将不仅按照我们所附的条件来规定它的投资政策，还要按照表现了事情其他侧面的一切日的来规定它的投资政策。他们也许仍然让同志们在大豆和豌豆之间任意挑选。但是，他们却很可以犹豫，在牛奶和威士忌之间，或者在咖啡馆和住宅之间应不应该自由选择。至于同志们在游荡和礼拜堂——如果人们允许礼拜堂代表日尔曼人不太优雅却很动听地称之为客观的文化（文化的表现）的话——之间的选择，他们是不会允许的。

6. 所以，有必要问一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市场”投入了大海，合理性和决定性是不是同时也落了水。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有一个权力机关来作出价值判断，即为一切实消费者货物决定它们的重要性的指标。如果它的价值体系是已知的，那这个权力机关就可以象鲁滨逊那样以完全决定的姿态来做这件事。^①计划过程的剩下来的事情，就可以象我们蓝图原本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分配券、价格、抽象单位等等，仍旧会为控制和成本计算效劳，虽然它们会丧失它和可用收入及它的单位间的亲缘性。从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中推演出来的一切概念，全都会再次出现。

所以，任何性质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都能成功地清除第一道

① 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所以显得对鲁滨逊经济很感兴趣的原因。

障壁——社会主义计划逻辑上的明确性和首尾一贯性——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立即跳过第二道。第二道障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上的不可能性”，这是多数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在纯粹逻辑的争论中承认失败之后现在想要退守的阵地。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央局会面临无法管理的错综复杂的任务^①，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加上一条，那就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行使它的职能，就会要以灵魂或行为——随我们喜欢用那一种方法称呼它——的一次全面改造为其必要条件，而历史经验和常识却证明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后面那个论点，推迟到后面去来考察，眼前我们来解决很容易解决的前面的论点。

首先，读者只要粗略看看我们的理论问题的解答，就能证明它实行得出奇地漂亮；这就是说，它不仅证实了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在证明中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在实际行动中如何实现的诸步骤。为了要规矩矩地面对问题，我们要求生产计划必需从头做起，就是说，任何关于数量、价值的先前的经验是没有的，除了可用的资源、技术状况的一般调查，和关于同志们是些怎么样的人的一般知识而外，没有其他赖以出发的基础。即使这样，〔上面的证明〕还是有效的。何况，我们还必须记住，在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是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存在，或者至少以有利于它的出现和执行职能的社会条件的存在为其必要条件的这个必要条件乃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若不联系一定的社会环境状态或历史形势就决不能加以讨论的理由之一。无论这样的管理机构应不应该受到我们中某些人惯于用来批评官僚主义的全部破坏性评论——不久我们就将对它作出我们自己的评论——现在我也不

^① 这是承认了社会主义的逻辑上的依据的多数非社会主义作家所采取的路线，罗宾斯和哈耶克两教授可列为采取这个观点的主要权威。

必讨论它是否可望完成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好还是坏);全部问题是,只要它终究存在了,那就没有理由相信它会被这个任务压垮台。

在任何正常局势下,它会得到足够的情报,使它有可能第一下子就十分接近各个重要生产部类的正确产量,其余将是通过有知识的试试改改作调整的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不论作为表明一个经济体系,按照满足某种极大值化的意义怎样能够达到“合理的”或“最适度”的状态时理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或者作为经理们在实际业务中必得面临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和商业经济之间并无十分根本的区别^①如果我们象多数社会主义者那样,尤其象过去考茨基常常做的那样,承认应该以先前的经验为出发点,任务当然更加大为简化,尤其如果这种经验是大实业类型的经验的话。

但是第二,若从另一方面检查我们的蓝图,还可以推论出另外一些东西:解答社会主义经理们所面对的诸问题,实际上不仅和解答商业社会经理们面对的诸问题一样容易,而且还要更容易一些。只要观察一下,经营一个企业的最重要的困难——消耗了一个成功的企业领袖最大部分精力的困难——是在于围绕在每一次决策周围的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对此就会深信不疑。不确定性中最重要的一类,又在于它的实在的或潜在的竞争者的反作用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一般营业局势是什么样的局势的不确定性。虽然其他各种不确定性无疑会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共同体之中,这两类,完全有理由指望它几乎全部消失。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们能够确切知道别人准备做什么,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能

^① 若干作家,似乎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均衡由以达到的过程,将是完全竞争状态下达到均衡的同一过程。可是事情并不如此。光是按价格变动的反应逐步进行调整很容易完全迷失目标。所以,我在本文中说“有知识的做做试试”。

够阻止他们集合起来作协同的动作。^①中央局可以，在某个范围内也不可避免地会象一个情报交换所和决议协调机构那样工作——至少会象一个全面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这就会不可计量地减少工厂经理大脑作坊的工作量，于是运行这个体系所必需的聪敏才智也就会大大少于一个略具重要性的企业的舵手，航行于波涛万顷的资本主义大海中所需的聪敏才智。为了证明我们的命题，这已经足够了。

第十七章 几种蓝图的比较

I. 开场白

至此，读者们一定会期望我对社会主义计划作一比较的评价。也许让这种期望落空是得策的。因为，任何人，除非完全缺乏责任感，一定会看出要在我们生活其间的体系和迄今不过是想象中的——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承认俄国的经验是社会主义的不折不扣的实现——之间作一比较，一定是极端冒险的。但是我们是要冒这次险，同时要时刻记住，在我们要去涉猎的论据和论点的王国之外，还有我们到不了的个人的偏好、确信、价值判断的王国。我们还将严格限制我们的目标，坦率承认困难和陷阱，以期增进我们成功的机会。

我们尤其不打算比较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世界。仅就我所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决定性而言，它本身已经足够阻止这样的企图。但是，也还有别的理由要求我们避免做这件事。

^① 就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完成这件事来说，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事实上，它逐步减少着过渡的困难，它本身也是过渡阶段降临的征兆。无条件地反对这种趋势，等于反对社会主义。

纵令社会主义文化只指一种明确的模式，比较评价仍然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有那么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偏执狂者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困难，无所顾虑地采用某种准则来比较某些特色，而这些特色恰好是他们尊重到要排斥此外的任何东西的，也是他们指望他们的社会主义拿出来展览于世的。但是如果我们决心要比他们做得好些，决心尽我们视力所及，用同这种文化生死与共的精神来看一看这种文化的各个侧面，我们一定会立刻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是自成一个体系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和任何其他文化不可比较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和实际的和可能的文化成就的比较有关系，同时又可列入我们这类分析范围之内。人们时常声称，社会主义计划由于从人们身上解除了经济的顾虑，将把现在浪费在张罗每天的面包中的无法计算的文化精力解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正确的——任何“有计划的”社会可以做到这点，可是由于其他理由，并且就事情的其他方面看来，它同样也能够窒息文化的发展前途。人们大概会这样提出异议，即我们知道，政府当局是很难负起责任来发现人才，抚育人才使其达到成熟阶段的，并且没有什么健全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它会比过去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赏识凡·哥那样的人物的。但是这种反对论没打中要点。因为政府当局用不到走得那么远。只要凡·哥能和任何人一样获得他的“收入”，不致工作过度，这就是万事齐备了；在任何正常情形下，只要给人以充分发挥创造才能的必要的机会，这就足够了——虽然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再能够肯定，这样做对凡·哥是不是已经够了。

但是另一种反对论更为意味深长。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似乎忽视了——他们常常热情地决心不承认——他的某些理想在现代世界满足到了什么程度。资

本主义比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更大范围内准备了给人才向上爬的梯子。在许多可敬的人对之十分愤怒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口号“凡不能靠这些梯子爬上去的人是不值得为他们操心的人”之中，是包含了某些真理的成分的。也许梯子不合我们所要的标准，但是不能说没有梯子。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有系统地在任何性质的人才的早期发展阶段为他提供了庇护和抚育的手段——所贡献的手段如此之多，以致在某些部门，困难不在于为人才去找手段，倒是怎样才能找出勉强称得上人才的人以便贡献手段给他——而且，由于它的结构本身的规律，还趋向于把手段奉献给有才干的个人，以及更有效地奉献给有才干的家族。这样，虽然可能有些社会损失^①，尤其在半病态天才这个等级中，但损失不见得是很大的。

II. 比较效率论

虽然我希望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不认为经济这个领域有超过第二位以上的重要性，可是还是让我们的讨论停留在经济领域之内。

1. 我们讨论的范围的限度是最显著的。讨论的第一步除蓝图而外不涉其他，所以陷入陷阱的危险最小。我们还得把关于过渡的困难的讨论推迟到后面单独加以处理，暂时假定已经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为了了解相信社会主义经济有很高的效率是有强有力的理由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对社会主义图式的可能性和实际可行性的证明的含义究竟如何也就行了。

只需证明它对大实业的或“垄断”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够

^① 有些例子被推论得言过其实，即令经过调查，也不象常例那样能够全部否定推论的结果。此外，这类损失的发生，有些是和它由以发生的特殊的组织毫无关系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发生的这种损失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损失。

了，因为得到了这样的证明之后，推定它对“竞争”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当然的了。按照第八章的分析，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许多经济学家凭信在完全不现实的条件下，可以建立起奉承竞争资本主义的各式各样命题，已习惯于以它的继承者即“垄断的”资本主义为牺牲来歌颂它。所以我希望重复一下，纵令可以判定这类颂词完全是正当的——其实并不如此——纵令理论家的完全竞争曾经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实现过——其实决没有实现过——最后，即使针对大实业的诅咒完全是公正的——远非如此——事实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动机在大规模单位时代的实际效率远大于先前的小规模中等规模的时代。这是一个统计记录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忆这一事实的理论说明，我们就会进一步领会，控制单位的规模的不断增大，和与之俱来的全部营业战略，不仅是统计记录所反映的成就的不可避免的附随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换句话说，在可以认为近似于完全竞争类型的商行面前展开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诸可能性，决不能产生同样的结果。从而，要向现代资本主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会工作得怎样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除了偶然提到“竞争的”资本主义而外原则上不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这和社会主义将要继承的是“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完全无关。

一个体系的经济效率，我们将把它归结为它的生产效率。即使是生产效率，也决不是容易作出定义的。要对两个体系作比较，当然必须①参照同一时点——过去、现在或未来——作比较。但

① 这个规则应该是自明之理，但它却常常被破坏。例如，苏联现时的经济成就常与第一次大战前不久的沙皇统治时期相比较，但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这种比较的一切意义都失去了。唯一可能有意义的比较应该是，比如说，把以 1890—1914 年的数值为基础的趋势线延长，并和这个延长线的诸外插数值作比较。

是这还不够。因为，有关的问题并不是从某一个时间来看，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对那个时点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机构能够做些什么——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比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对一笔消费者货物做什么事更有兴趣——而是假定社会主义经理代替资本主义经理领导了这个生产机构的建设工作的话，将要存在怎样的生产机构，或者已经存在着怎样的生产机构。所以，过去二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关于我们实有的和潜在的生产资源的大量知识，不管对其他目的如何宝贵，却一点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困难。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列举我们仍然可以觉察的社会主义和商业社会二者的生产发动机机制上的差别，然后尽我们所能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性。

让我们假定，在作比较的时点上，两个体系的人口、数量、嗜好和年龄的构成是相同的。于是，我们把我们有理由指望在长时期中以每一个相同的时间单位生产出更多的消费者货物的那个体系称做较有效率的体系。^①

① 既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际收入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商品种类构成上的差别，也会有品种相同而比例多少不同的商品构成——虽然没有加进可耗用收入的分布状态的变化这个假设，要估计这种差别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比较会引起伤脑筋的理论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较多的酒和较少的面包，那一个社会的收入量大些？在同一个社会结构中比较某年和次年收入（就是编制一个总产量指数）时往往会发生的困难，现在在回答这个问题中又碰到了，可是规模却大为扩大了。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下面的定义足够应付这个理论问题：只要一个社会的收入能产生出比另一个社会的收入大的货币总额时，就可以说它比另一个为大。用以评价两个收入的，是两个价格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一个川流，当我们用资本主义价格体系计算二者时得到较大的数值，但用社会主义价格体系计算二者时，得到一个较小的数值，那时我们将说二者是相等的，恰如它们二者用两个价格体系的任一个计算所得的总和恰巧相等一样——这不过是指，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形下，差额一般不会很大。统计问题当然并没有因这个定义而获得解决，因为我们不能在同一时期内得到两个收入数字。

为什么本文“在长时期中”这几个字加了着重号，从我们在第七章中所作的分析来看，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2. 这个定义还需要评注。看得出来它并没有把经济效率同一于经济福利，也没有把它同一于欲望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即使**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按我们的意义的效率）确实低于**任何**可以设想的商业经济的效率，大多数人民——事实上也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所关怀的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下面也许还是可以“过得好些”或“更快乐”“更满意”。我[对这种说法]的首先而主要的回答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的效率依旧保有独立的意义，在一切情形下它也不失为重要的考虑之点。但是，其次我又认为，如果我们采用某种忽略了这些侧面的规范，也不会有很大的损失。可是这总是一个大可争论的问题，把它弄得明白些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具有深刻信念的社会主义者会仅仅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感到满足。^①他们觉得社会主义的面包仅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所以吃起来比资本主义的面包香，即使发现里面有老鼠也是如此。如果所采用的特定的社会主义体系恰好采用了和一个人所信奉的一致的道德原则，譬如象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原则相一致，那么这样一件事和一个人由此形成的正义感上面的满足，当然会被列为这个体系的优越性之一。这种道德上的忠诚对这个体系的行不行得通决不是无关重要的；它对我们意义上的效率的重要性，甚至在以后还不得不特别提到。但是除此而外，最好我们大家还是承认，我们关于正义等等的名词，多半可归结为我们是不是喜欢某种社会形式。

可是，看来总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纯粹经济上的主张，它赞成平

^① 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就是为了得到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的特权，才被弄得看不见社会主义计划的公认的缺点的。所以，这个坦率地表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感情的论点，决不是象初初看去那样不合理的。它实际上使所有其他论点都成为多余的了。

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赞成在结构上容许收入的较大的平等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至少那些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可以测定的数量、把不同人们的满足看做可以比较和合计的数量，并且不因此觉得后悔的经济学家们有权主张：一定数量的消费者货物若作平均分配，一般地将产生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一个平均主义的体系若和相应的商业社会效率一样高，它就要比后者产生出更高的福利水平。甚至效率多少低一些的平均主义的体系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大多数现代理论家会根据满足是不可测定的以及不同人们的满足的比较和合计是无意义的这两个理由而抛弃这种主张。我们用不着走得这样远。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平均主义的主张，特别免不了要受到我们在垄断企业的行动的分析中提出来的反对批评：问题并不是怎样不顾收入分配的原则而去分配一个一定的数量。在一个容许无限制不平等的商业社会中，工资收入很可以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平均收入为高。只要人们不能有根据地证实社会主义生产发动机的效率至少近似于商业社会发动机现在的、过去的或可望在比较时期中出现的效率，关于分配的议论仍然不是结论性的——事实上是论据还有待于证明——即使我们想要接受它。^①反过来，只要生产效率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多数情形下关于分配的论证就是不必要的；除非这种论证排它地以道德理想为基础，它只能在两可的事例中倒转天平。

3. 相同的生产效率水平为什么可以和不同的福利水平联系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多数社会主义者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对一定的一笔国民收入可以作更经济的使用，所以社会主义社

^① 我们这样抛弃了的论点，可以读成：如果其他一切相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大限度，大于竞争的社会的最大限度。可是由于两个最大限度的纯粹形式上的性质，他们之间没有可比较之点，这一层从前面的考察中应该看得很明白。

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快。这种使用上的经济，是由于某些类型的社会由于其组织上的特性，也许会不关心或者反对其他社会类型也是由于其组织上的特性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投入的那些用途。例如，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会节省军备费用，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会节省教会费用，以及两者大概都会因此而有更多的医院。当然，事情确是如此。但是，因为它涉及到估价问题（我们不能确有信心地把估价问题归因于一般的社会主义，虽于许多社会主义者个人认为可以把它归因于一般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几乎任何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包括柏拉图型的社会主义——都一定会实现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即从消灭有闲阶级，“富有的游惰者”中所实现的经济。既然从社会主义立场说来，忽视这个集团内的各个人的满足，并把它文化职能估定为零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文明的社会主义者总还要加上“在今天的世界中”这么一句话来保全他们的面子——因此，社会主义政体显然会由此得到一笔净赢余。那么我们的效率测验把这一点忽略不计，我们由此会受到多大的损失？

当然，即使不理睬这次战争中的财政措施，现代所得税和遗产税也正在急剧地把这个问题缩小到数量上无足轻重的程度。但是这种赋税本身是某种反资本主义姿态的表现，它可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收入的阶层完全消失的前驱。所以，我们应该比照还没有从它的经济根底上受到打击的资本主义社会来提出我们的问题。在我国，选用1929年^①的数据看来是合理的。

^① 美国是最有资格作这种测验的国家。在多数欧洲国家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至少在十九世纪，甚至直到1914年为止，还有一部分高收入来自前资本主义的根源，但已因资本主义进化而胀大了。

让我们把富有者的定义规定为年收入达到及超过五万元的人们。1929年他们的收入大约是130亿元，当时的国民总收入约为930亿元。^①从这个130亿元中我们必得减去赋税、储蓄、对公共用途的捐赠，因为这些项目的消失，不会构成社会主义政体的节约^②；只有富有者为自己消费的开支，按“节约”这个字的正当意义才是被“节约”下来的部分。这笔开支是无法作出什么确切估计的。我们所能希望得到的，只是这笔开支大概数额的一个概念。既然愿意担当这分风险的多数经济学家推测其为130亿的三分之一，所以说这笔开支不超过43¹/₃亿元，或大约是总国民收入的4.6%是相当可靠的。现在这个4.6%包括全部高级实业家和专门职业人士的消费开支，所以，其间富有的游惰者的耗费最多不能超过1%或2%。而且，就家庭动机仍然活泼而言，甚至不能认为这分开支全部无助于经济发动机效率的增进。

某些读者无疑会觉得五万元这个限度高得过分了。当然很清楚，还有许多可省，可以把不论是贫是富的经济上的游惰者的收入消灭到或减低到仅足以维持生活的水平。^③人们还可以认为，借助

① 见莫尔顿、列文和沃伯顿：《美国的消费能力》，（1934）第206页。数字公认是极端粗略的。它们包括从职业和投资所得的收入，出卖财产的收入和从自有住宅转来的报酬。

② 社会主义的权力机关大抵会使用这些储蓄和捐赠于不同的目的，可是看得出来这一事实并不影响我们的论点。

③ 可是应该注意，一笔只包括投资报酬的收入，并不就说明收入者是经济上的游惰者，因为他的工作可能是体现在他的投资上的。课堂上的例证，可以和一个较长的论证一样妥当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一个人，靠他自己的双手开垦了一块土地，他以后由此所获的收入是“由人制造出来的生产工具所获的报酬”，或如经济学家所称的是一项准地租。如果土地改进的效果是永续性的，它和真正的地租是无法区别的，从而看来象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化身，实际上却是工资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定义工资为由个人的生产性的劳动所获的报酬的话。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为取得收入而作的努力所获报酬，可以采取工资的形式，但不一定采取工资的形式。

于一切较高收入者分配的合理化，使收入更切近于相应的工作成绩，还可以节省一些。但是我们将在下节提出的论证，暗示了在这方面抱的希望太高是要遭到失望的。

可是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什么话了。因为如果读者要把更大的重要性寄托在我觉得公正的减省之外的进一步减省，那么我们就要达到的结论就更加用得上的。

III. 认为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理由

这样，我们判断优越性或低劣性的规范，毕竟比表面上看来的要涉及到更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它，我们能找到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我前面说过的社会主义蓝图的优越性？

细读了第八章所作分析的读者很可能会感到奇怪。通常用以支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多数论点，正如我们知道的，一当我们恰当地考虑到急剧的进展速度为企业创造出来的一些条件时马上都站不住脚了。有些这样的论点，在仔细检查下，结果证明甚至可以打开通向其他方向的道路。许多认为病态的现象被看成了生理的现象——可以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执行重要职能的生理现象。许多浪费带来了补偿，这些补偿有时是全部地，有时是部分地使推论归于无效。资源的社会配置的不合理，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频繁，那样重要。何况，有些情形不见得不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超额生产能力在社会主义经济下部分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常常可以从反驳批评的意义上解释。甚至无可补救的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大得足够抵消一大堆罪恶的成就的附赠品。

[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何在的]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前章末段推论而得。当资本主义进化还在鼎盛时期，答案的妥当性还是可疑的，一到它永久地松弛下来的时候，不论就它的经济机制的内在理

由或外部理由而言,就都是决定性的。

有那么些事例,在其间,资本主义产业处于在理论上无法决定价格和产量的环境之下。这在有寡头垄断的地方可以发生,虽然不总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一件事——除开没有实际重要性的极端事例而外——都是出色地决定的。但是,即使存在着理论上的决定状态,资本主义要达到这种状态,也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更多,耗费更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必得在会使行动迟钝化的不确定的气氛中作出,而这样的战略和这样的不确定性却不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一点之所以不仅适用于“垄断”性的资本主义,而且更适用于——虽然还有其他理由——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由小麦周期的例子^①* 来表明,也可由多少是完全竞争的产业在总萧条中或在它们自己的盛衰起伏中的行为来表明。

但是它的意义比初初看来要深刻一些。凡是从给定的基准的立场出发得出的合理的或最适度的生产问题的决定性的解决,以及凡足以缩短、通畅或保证导向这种解决的道路的任何安全措施,势必会节省人的精力和物质资源,并降低取得一定成果的成本。除非这样节省下来的资源完全被浪费掉,按我们意义的效率是必然会提高的。

以这一点而论,前面曾作概略考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网打尽的控诉书中,有些起诉条目取得了合格的裁定。这可以超额生产能力为例。的确,说超额生产能力在社会主义下会全然不存

① 见第八章。

* 这里原文为 Hog Cycle Case, 后面(第 245 页)也提到“反作用于猪和饲料价格的农场主作出了猪的周期”,但本书第八章所举的例是因小麦价格波动而产生的小麦生产的周期,故译文作“小麦周期”。——译注

在是不正确的；对中央局说来，坚持要充分利用一条通过尚未开发地区的铁路是荒谬的。同时，说超额生产能力在一切情况下都意味着损失也是不正确的。但确有一些社会主义经理所能避免的超额生产能力，它们主要是为经济战争而保留的超额生产能力，这种超额生产能力的确是损失。不管这个特殊事例的重要性如何——我不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它把事情的性质揭露到足以表明我早已说到的一个论点：有些事情在资本主义进化条件范围内是，或者可以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所以按照资本主义秩序的眼光看来，它们完全不构成什么缺点；又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就是竞争的资本主义所达不到的，如果把这一点当作条件，它也不一定足以构成“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相对于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弱点；但是纵令事情确实如此，相对于社会主义蓝图而言，它们却可以构成为弱点。

这一点，对于构成了商业周期机制的大多数现象而言，尤其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缺少调整器，有些调整器很可以在生产部的实践中再度遇见。但是进步的计划，尤其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新冒险时的系统的协调和有秩序的分配，在防止某些时候的迸发，另一些时候的萧条的反作用上，和任何自动的或操纵性质的利率高低及信用膨胀或收缩相比，其效率之高是不可比拟的。事实上它会消灭周期式的上升下降的成因，而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却只能缓和它们而不能消灭它们。至于废弃陈旧设备的过程，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竞争的资本主义——说来意味着暂时的瘫痪和部分无功能的损失，在社会主义经济下，这可以归结为恰恰符合于外行人心目中从“拆除废品”这几个字所得到的印象，它的意义不会超过人人懂得的，其间包括预先把陈旧设备中尚不陈旧的部件或单项设备移作别用在内的一个拆除废旧的计划。举一个具体例

子,以棉纺织业为中心而发生的一次危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可以使住宅建筑停止;在社会主义秩序下,如果因为疏忽,当然也可以发生一次棉货不得不急剧减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似乎不大会发生;但是这种危机会成为加速住宅建筑的理由,而不会成为停止住宅建筑的理由。

不管哪一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人所希望的经济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够以较少的乱子和损失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并不必然会蒙受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企图达到计划中的进步时随着发生的各种损害。也可以这样来说明这件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可以走一条近似于生产量长期趋势线的道路,这样就发展了我们见到过的,对于大实业的政策而言并不陌生的那种趋势。总之,我们的全部论证可以归结成为这样的说法,即社会主义化的意思就是超出大实业的范围走大实业标志出来的路,这也等于说,可以设想得到,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将自己证明优于大企业资本主义,犹如大企业资本主义证明自己优于一百年前的英国产业所代表的那种竞争的资本主义一样。未来几代之对待社会主义计划没有优越性的论点,十分可能和我们的看待亚当·斯密关于论股分公司的论点一样,当然这些论点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迄今为止我所说的只指蓝图的逻辑而言,从而也只指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许是全然不能实现的“客观的”可能性而言。但是就蓝图逻辑本身而论,不能否认,这分蓝图是根据较高合理性水平画出来的。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指明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什么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问题。反作用于猪和饲料价格的农场主们制造出了猪的周期,就各个农场主而言,以及按照那个瞬间的观点说来,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合理的。一个企业的经理在寡头垄断地位

上运筹帷幄，一个商行在繁荣时期扩充业务而在衰退时期限制业务，他们的行为都是合理的。造成了全部区别的是合理性的性质和范围。

要举出可以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之点，确实不限于上面所说的一点。但就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粹逻辑而言，多数不能证明为错误的论点，事实上都包含在上面的论点中了。

第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失业问题。我们在第二篇已经知道，就失业者本身的利益而言，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前进到足够使社会主义化有成功机会的时候，必须并且大概不会留下太多的人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任其所之，无法解决]。但是说到失业所形成的社会损失，先前的论证包含这样的意思，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由于萧条的消灭，失业将要减少，而且，即使主要因技术进步发生了失业，生产部也能指导人们向别处就业——不论它实际上把这件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如果计划工作已经达到利用它的一切可能性的水平，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就业机会也许正在等着他们。

包含在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的合理性之内的一个小小的好处是从下面的事实推论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秩序下，改进照例发生于个别企业之内，改进的传布需要时间，而且会碰到抵抗。如果进步的步子很急，常常会有大批商行固守老旧的方法或者效率低于水平的方法。在社会主义秩序下，理论上说每一种改进都能够借法令加以推广，水平线下的做法能够马上消灭掉。我把这种利益叫做小小的利益，是因为资本主义之对付无效率照例是很有效率的。当然，不论这种特殊利益是大是小，它似乎会由一个官僚机构予以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信赖一个庄重的官僚机构总会教育它的成员达到它自己的标准，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明这种标准是怎么样的标准。可能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可能变成实际的低

劣性，这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的。

其次，小型或中型企业的经理或所有主-经理们，照例基本上不是工程师，便是推销员、或组织者，可是，即使有本领的人也极难把样样事情做得一样妥贴。我们时常发现，那怕是成功的企业在这些那些方面也是无人负责的——效率专家们的报告可以为证——这就是说，它们的领袖们部分地是被放错了位置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象现代大规模企业那样，把他们专门任用在确实内行的地方，充分发挥他们之所长。但是有一些用不着在这里多说的明显的考虑，不容许我们对这件事抱过大的希望。

可是还有一种在我们前此所画的蓝图中看不出来的极重要的好处。商业社会的突出的特色是公私领域间的划分——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说在商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私人领域，它所包括的内容比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派给私人领域的要大得多。私人领域截然不同于公共领域之处，不仅是概念的而且是实际的。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配备着不同的人员——只有地方自治政府的历史提供了最显著的例外——它们的组织原则和运行原则互不相同，时常互相冲突，因此它们容易产生出不同的、时常互不相容的准则。

按照这种安排，磨擦的不存在只能是暂时的，如果不是我们早就那么习惯于这种安排，它的自相矛盾之处真会引起我们的诧异。事实上，远在公共领域内的人们在他们的资产阶级领土征服战中得到日益增大的成功从而使磨擦发展成为对抗以前，磨擦早就存在了。对抗惹起斗争。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大部分活动，表现出古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用语政府干预妥当地标志出来了的特征。这些活动，事实上确实按照这个词的每一种意义干预了私人生产发动机，尤其是按照这个词的束缚和瘫痪的意义干预了私人

生产发动机。不能认为这种干预，甚至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也常常是成功的。就干预的成功而言，社会主义的中央局应该有更大的成功的机会，因为在社会主义情形下，随这种斗争以俱来的耗费和损失是会完全避免的。所有这一切损失，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因不断的追查、起诉而引起的一切苦恼，以及它们对事业的推进力的沮丧影响的时候，不能不说是相当大的。

应该特别指明这类成本中的一个要素。这就是专心致志于纯属保护活动的才干。律师所做的全部工作，很大部分属于企业对国家和国家机关所作的斗争。我们称它为邪恶对共同的善的阻碍也好，称它为共同的善反对邪恶的阻碍也好，这是无关重要的。事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如何不会有这一部分法律活动的需要，也不会有它的活动余地。由此形成的节省，用节省下来的律师费数目来衡量是得不出满意结论的。律师费并不值得考虑。并非不值得考虑的倒是许多最好的人才的不生产的使用所造成的社会损失。考虑到好人才稀缺到可怕的程度，他们之移向其他用途，大概不是无关重要的事情。

公私两个领域间的磨擦或对抗的紧张化的原因，首先是，自从君王的封建收入不再具有头等重要性以来，国家一直依靠私人领域内为私人目的而生产出来的收入为生，这部分收入必得要用政治力量才能从私人目的中强夺出来。^①一方面，赋税是商业社会的一项本质属性——如果我们接受本篇首章所提到的国家的概念，就该说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它几乎不可避免地^②具有伤害生产过程的性质。大约 1914 年以前——如果我们同意只

① 以俱乐部会费或以购买例如一个医生的服务的比拟来解释赋税的理论，不过证明了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已怎样远远离开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② 有些例外，但是这些例外和实际目的无关。

考虑现代——这种伤害还局限在狭隘的界限之内。自此以后，赋税逐步增长，成为企业家和家庭预算的占统治地位的项目，也成为解释经济成就何以未能令人满意的重大因素。何况，为了从不自愿的机体中榨出不断递增的数额，出现了专门为它的每一元收入而和资产阶级搏斗的一个庞大的行政装置。这个机体相应地发展了它的防御机构，做了大量的自卫工作。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么充分地表现出一个社会机体结构原则上的矛盾所形成的浪费的了。现代资本主义靠利润原则来解决它每天的面包问题，却不容许利润原则占优势。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存在这样的冲突，从而也不会存在这样的浪费。既然它控制着全部收入来源，赋税将和国家一起消失，如果人们不赞成我的国家概念，那么可以说和资产阶级国家一起消失。因为，让中央局先付出收入，然后追逐在得到收入的人后面讨回所付出的一部分，常识上说来明明是背谬之举。如果激进派不那么爱好捉弄资产阶级，以致说他们认为现在的赋税除了还嫌太低而外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错误，那就得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抓住了可以提出来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性的最重要的题目之一了。

第十八章 人的要素

一个警告

许多社会主义反对论者很可能会接受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但是他们的同意大抵会采取下面的形式：“啊，好哟，当然，如果你有神人去指导社会主义发动机，还有天使长去配备这个发动机所需要的人员，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就是如此。但问题是你没有，而且人的本性还是同现在一样，资本主义这种代替品，连同它的推动的

方式，它关于责任和报酬的分配方式，毕竟提供了虽然不是设想得到的最好的安排，却是实际可行的最好的安排”。

为了回答这种说法，是有些话可说的。一方面，现在我们不仅应该警惕总想把一定的现实和某种观念作比较的危险，也得警惕把一定的现实和某种理想作任何比较中固有的错误和奸计。^①另一方面，虽然我认为我已经说得充分清楚，按照事物的本性，决不能有离开一定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的一般地支持社会主义的理由，只能有以一定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为根据的支持社会主义的理由，而这种相对性，当我们的观察不再局限于蓝图范围的时候，就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

I. 论点的历史的相对性

用一个比拟来说明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现在我们大家（私有财产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包括在内）看做只属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大部分职能是借这样一种制度来管理的，这种制度中的公共职能在我们今天看来，好象被弄成私人所有权的对象和私人所得的来

① 一个观念、图式、模型或蓝图也体现了一种思想，但只在逻辑意义上是如此；但是这样的理想，只指非本质的东西的阙如——也可以说，那是指未经掺杂的设计而言。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即，究竟何者应包括在这种构想之中，哪些事情应该看做理想的偏离。虽然这应该是一个分析技术的问题，爱和憎仍然可以挤进来：社会主义者将倾向于把尽可能多的他们觉得可鄙的特性包括到资本主义蓝图中去；反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的蓝图也将如此；而且两方面都将尽可能把“缺点”列入非本质的范围，也就是含蓄地把缺点列为避免得了的偏离，借此试图“粉刷”他们的蓝图。甚至即使他们在任何给定事例中同意列某些现象为偏离，他们对自己的制度和对方的制度所造成的偏离的程度还是会有分歧的。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倾向于把他们不喜欢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归诸“政治干预”，社会主义者则将坚持说这种政治是资本主义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动机借以运行的方法所创造出来的局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我承认所有这些困难，我不认为它们会影响我的解释，有专业修养的读者会注意到，我已经把我的解释安排得避免这些困难。

源了，在某个教阶政治的封建隶属关系下的每个骑士或领主，不是作为他管理他的采邑的报酬而领有他的采邑，而是为了谋利而保有他的采邑的。联结在这上面的现在所称的公共职能，不过是效劳某个封建长上的报酬而已。这么说，其实还没有真正表明事情的实质，因为，一个骑士或领主之所以保有他的采邑是因为他作为骑士或领主赋有保有采邑的权利，不论他究竟效劳了他的封建长上没有。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容易把这种事物状态错认为“积弊”的杂凑。但是这么说是毫无道理的。在它自己的时代的环境下——和每一种制度结构一样，封建主义在它“自己的”时代消逝之后还活着——这种制度是唯一行得通的制度，它体现了当时能够行使这种公共职能的唯一的办法。如果马克思出现在，比如说十四世纪，如果他那么愚蠢，竟出来鼓吹另一种公共行政的方法，他就不免得到下面的答复，这种制度是一种大可钦佩的措施，正是这种措施才使没有它的时候根本办不成的一切事情可以办得通，特别是，“只要人性还是人性”，利润动机对于公共行政职能的行使是不可少的；消灭利润动机事实上意味着混乱，从而很可能被描述为不切实际的梦想。

同样，在英国的棉纺织业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峰的时代——比如说，到1850年为止的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还不是一个实践的命题，也没有哪个明达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或者在那个时代会认为它是实际可行的。使牛变肥，点沙成金的术士的眼睛和下巴金蛋的鹅之类的天真的传说，当时无非是单纯而鲁钝的人们说的，或者是说给他们听的一种无可否认的真理的表现方式而已。我向社会主义朋友们贡献这么一点意见，有一种比嘲笑——嘲笑对方，希望对方，跟自己一样是一个自负而易怒的知识分子的对方，当他察觉他要遭到嘲笑时就不争辩了——更好的迎击它们的方法。

法：最好还是承认这些鹅在它们自己固有的历史背景上的合法权利，而把否认局限在此外的历史背景之上。于是我们至少可以面对那并不离题的问题——这就是说，现在那些鹅应有的权利有多大——同时依然为我们的分歧意见留下广阔的地盘。

既然要使资本主义的现实和社会主义的成功机会作比较能有多少意义，必须设想某个确定的资本主义模式，那么让我们选取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即受束缚的大实业的资本主义。让我们注意，第一，虽然它规定了一个时代和一种模式，但它并不规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以十年为单位的约计日期也不规定，因为要说清楚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某种特定日期（比如说现在）已经展开并稳定它的特色到什么程度，仍然有待于作事实的调查；第二，对我们这一部分论证而言，追问这些束缚（不管是些什么束缚）是不是资本主义过程本身演化出来的，或是可以看作资本主义过程以外的某个机构强加于它的，对问题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第三，虽然我们现在要讨论比前此多少实际一些的问题——明白地说，这就是我们所能指望于社会主义去收割它的蓝图中隐然在望的庄稼的把握到底有多大——我们将要说到的还不过是一些机会，又因为要补救我们对于命中注定要碰到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无知，我们还免不了要加上一些补充假定进去。

II. 论神人和天使长

当我们回过头来答复那些谈论什么神人和天使长的资产阶级诸君的时候，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神人对付过去；用不着什么神人去指导社会主义发动机，因为我知道，有待于解决的任务——一旦把过渡时期的困难对付过去之后——将不仅不会比现代世界中产业领导者的任务困难，而且还将更为容易。天使长们则坚持那

个众所周知的命题，即社会主义的生存方式要以人的高度道德水平为其必要条件，只要人还是现在这样的人，指望他们达到这样的道德水平是不可能的。^①

如果这类议论也曾增大了社会主义反对论者的声势的话，应该责备的还是社会主义者自己。他们说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恐怖，为了立即显现出人的本性的全部美德，或者，起码为了开始一个改造人的灵魂把它提高到所要求的道德水平的教育过程，必需首先除去这些压迫和剥削。这样，他们就不仅要使自己被指控为阿谀群众到荒谬可笑的程度，也使他们要被指控为拥护迄今应该已被体无完肤地驳倒了卢骚主义。但是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不这样作，也尽可以提出一个健全常识性质的辩解。

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采用一种证明为有用的称号，虽然心理学家对此也许会有异议。首先是某些已知的感觉习性和行动习性，这些习性可以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作为这些习性的根底的基本模式（“人的本性”）则可以照旧不变。我们把这称为**条件改变的改造**。第二，仍旧在这种基本模式范围内，**条件改变的改造**可以和感觉习性和行动习性发生抵触，这些习性虽然最终可以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如果环境的变化是合理地实现的——却要抵抗一个时候，在抵抗期中会制造麻烦。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把它称做**习惯**。第三，在这种人的材料内部，或者通过消灭人的材料中的某些倔强顽固的成分，基本模式本身也可以改变；

①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主要的罪人*是马克斯·艾德勒（不要和另外二个维也纳的艾德勒相混，那二个艾德勒，在奥地利社会主义历史中具有卓越的地位。维克托·艾德勒，党的伟大的组织者和领袖，他的儿子，弗里茨·艾德勒，首相斯图尔格伯爵的杀害者）。

* 原文 Sinner，宗教意义上的有罪的人。这里是用滑稽口吻说艾德勒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中这种说法的主要主张者。——译注

人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确是有可展性的，尤其在组成成分可以改变的诸集团内。这种可展性能达到怎样程度是一个有待于认真研究的问题，谁都不能以讲台上的风度，借轻率的肯定或轻率的否定对它作什么有用的讨论。但是我们既不必作轻率的肯定，也不必作轻率的否定，因为现在要使社会主义行得通，人的灵魂的这样的根本改造是并不必要的。

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把预期会引起最严重困难的农业部门排除出去。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导机关把自己在农业方面的计划方法限制为和早在发展中的计划方法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的方法，我们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确定一个生产计划；使区划（土地使用）合理化；以机器、种籽、种畜、肥料等等供给农场主；确定农产品价格，按这些价格向农场主收购农产品——这就是必需做的一切事情，在实质上这却毫未触动农业界和它的态度。还有其他可能的途径。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采用的方法要磨擦很小，同时，可无限期地采用它，而不致损害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工人和职员的世界。什么灵魂的改造和痛苦的适应对他们都是不必要的。他们的工作实质上还是原来的老样子——除了后面要加上的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面外，结果还是同样的态度和同样的习惯。工人和职员下班以后还是会回家去做一些家常活动，社会主义空想可以任意称呼这些家常活动——譬如说，他可以踢无产阶级的足球，而现在他踢的是资产阶级的足球——但是家还是那一类家，活动也还是那一类活动。在这个领域内不应该发生什么重大的困难。

第三，就是并非不自然地预料到要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牺牲品的那些集团的问题——大致说来就是高级阶层或领导阶层的问

题。这个问题,按照那个神圣的教义(它已经成为远远超出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的信条)是解决不了的。按照这个教义,构成这些阶层的不过是些大嚼猎获品吃得过饱的野兽,他们之侥幸取得他们现在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分明不过是靠运气和残忍,他们除了从劳动大众那里——或者说从消费者那里,可按情况而异——强占一部分他们的勤劳果实而外,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何况这些食肉野兽还由于他们的无能,(这儿加上了一些现代气味)由于他们惯于窖藏他们的大部分猎获物而产生了萧条,这就把他们自己的把戏耍坏了;所以社会主义共同体除了眼看他们从原有地位上被很快地撵走,防止他们采取怠工行动而外,用不着为他们操什么心。不管这种教义的政治效果如何,也不管对付低能者的这种心理治疗法的效果如何,这甚至不是为社会主义。因为随便那个文明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善自检点并指望能够被严肃的人们所严肃地对待,他就会承认许多关于和这种教义不相容的资产者阶层的品质和成就的事实,他还会进一步主张,这类高级阶层根本不应该作为牺牲,正相反,也应该把他们从道德上压迫他们不亚于经济上压迫大众的那个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这个符合于马克思遗教的立场出发,所走的路不会离下面的结论太远:资产阶级成分的合作,也许和社会主义秩序的成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这里有一个阶级,由于它借以形成的选择过程,积蓄了具有优秀品质^①的人材,因而它这是一项民族

^① 见第六章。更确切地说,资产者阶层的典范人物,在智力和意志上优于产业社会中其他一切阶层的典范人物。这在统计上从未证实过,此后也很难从统计上得到证实,但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选择过程的分析中推论出来的。这个选择过程的性质也决定了优越性这个名词的意义应该怎样了解。按照对其他社会的同样的分析,可以表明,这对我们之有历史知识的一切统治阶级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在一切事例中都可以表明,第一,人类社会中的诸分子,在他们由以诞生的阶级范围内

资产，任何社会组织使用这项资产都是合理的。仅此一点就含有，至少不应该绝灭这个阶层的意思。何况，这个阶级正在执行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也应该执行的职能。我们知道，这些职能一直被人们而且现在实际上还被人们把它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文化成就，以及不是由于劳动人口增长而造成的全部经济成就——也就是和全部通常称为劳动生产力（每一个工时的生产力）的增量^①，因果相联地联结在一起。然而，这种成就也是一直被和社会主义势必要加以废止的，具有独特的效率的奖惩制度因果相联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能不能利用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来为社会主义社会效劳，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必须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过来的各种职能，能不能由另外一些执行者来执行，或者用各种非资产者的方法来执行，或者两者兼施。

III. 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问题

毫无疑问，合理利用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是社会主义政体感到最困难的问题，而断言这个问题将顺利地得到解决是要有一些

的上升和下降符合于这样的假定，即他们的上升和下降各按他们相对的才能而定；还可以表明，第二，他们的上升到另一个阶级或下降到另一个阶级，情形也完全相同。象这样的升入较高阶层或降至较低阶层，照例需要一代以上的时间。所以，运动的分子单位，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是家族。这就说明了，为何集中注意于各个个人的观察家往往找不出才能和阶级地位间的关系，而老是愿意走得那么远，以致正好会走到相反的路上去。因为个人的起步点，除非在非凡的个人成就的事例中，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以致如果我们忽略而不去探索由每个人组成的整条链子的话，这种关系就会表现得很不清楚，何况人们还认为这种关系只涉及一个式样，还留下许多例外的余地。指出这些情况，当然不足以证实我的论点，不过暗示了如果在本书范围内能做到的话，我将会怎样去证实这个观点。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读者参读我的《在单一民族环境下的社会阶级理论》，载1927年《社会科学文汇》。

① 第一篇中已指出过，马克思本人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有名的文句中承认这一点。

乐观主义精神的。可是，这主要不是由于问题所固有的困难，而毋宁是由于社会主义者们在认识它的重要性上以及以合理主义精神来面对这个问题时所感到的困难。前而提到过的关于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及其职能的那种教义，本身就是强烈地厌恶这样做的某种征兆，也可以看做拒绝这么做的某种心理技术上的准备。这也没有什么可惊之处。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不论他是一个不参加政党的人，是党的领导者或是民事官员，都会天真地但自然地把社会主义的降临看做权力降临到他身上的同义语。社会化，对他来说，意味着“我们”要去接管。罢黜现有经理人员是这一出戏的重要场面也许还是最重要的场面。我自承，我在和战斗的社会主义者的谈话中，常常觉得有些怀疑，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是多数人，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品格如何完善，如果要由别人来掌管社会主义政体的话，他们是不是会关心这样一个政体。我必须立刻补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无可责备的。^①

问题的成功的解决，首先，要允许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做按照他的才能和传统有资格做的工作，因此要采用某种以胜任为原则，并且不歧视前资产者的选择经理人员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设想的，其中有些方法，甚至比在大实业时代起作用的资本主义方法更为可取。可是，允许一个人做他的工作，并不止于任命他到适当的位置。一个人在接受任命的时候，也还必须赋予他以独立负责地行动的自由。这就引起了构成那么多反社会主义说教的主题的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化的问题。

我这个人就不能设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会采取任何一种并非庞大而支配一切的官僚主义结构的形式。我所能设

^① 关于这点，见对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所作审慎讨论的评论，本书第二十三章，第300页。

想的任何其他可能性，都会带来失败和崩溃。这吓不倒那些已觉察到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化——甚至是一般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并且懂得怎样从这个题目周围的词令的灌木林中砍出一条路来的人。正如“垄断”这个词一样，这些名词之所以深入人心，大部分是由于它的历史上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资产阶级主要是通过他的反对以君主主义官僚政治为代表、并通过官僚政治而行动的地方势力的斗争而显露头角的。凡商人和制造家认为是恼人的或愚蠢的干预行为，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头脑中多数是和这个官僚机构或民事机构相联结在一起的。这样一类的联想是极端持久的；而这种特殊的联想又证明是那么经久不衰，以致社会主义者们也害怕这个妖怪，时常以不同于平素的态度向我们保证，官僚政治这种观念已经从他们的计划中消除了，而且比什么都消除得彻底。^①

我们将在次篇见到，官僚主义不是民主政治的障碍，而是它的不可避免的补足部分。它同样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补足部分，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它将比过去更具有本质的重要性。但是光是认识广泛的官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并没有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指陈其含义吧。

我们时常特别强调的利润和损失动机的消灭并不是这个问题中的要点。何况，谁犯错误就该由谁掏自己的腰包来付帐这种意义上的责任，现在无论如何已在消逝之中（虽然并不消失得象一相情愿的想法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快），而存在于大规模公司中的那种

① 在俄国（人们所以要作）这样的宣告还有一个额外的理由。这个妖怪变成一个替罪羊，所有的领袖，尤其是托洛茨基，懂得怎样利用这替罪羊。由于他们懂得怎样在国内国外公众的轻信上面正确地筑堤自保，他们干脆把俄国一切他们认为不值得赞许的东西一概扔在官僚主义的门口。

责任，无疑能够再现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见下）。官僚机构或文官制度特有的选择领导者的方法，并不必然象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无效率。文官制度中的任命和升迁规则并不是没有相当多的合理性的。这种规则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有时候也比纸面上所表现的要好：尤其是，机关里面对某个人的共同意见，如果得到适当的重视的话，往往很有助于提拔有才干的人——至少某一类型有才干的人。^①

远为重要的是另外一点。官僚主义的办理企业的方法和它所散布的道德气氛无疑常常对最积极的人发生令人消沉的影响。这主要由于官僚主义机器所固有的把个人主动性和使它运行的动力调和起来的困难。这部机器给予个人主动性的活动余地常常很小，给予窒息个人主动性的邪恶企图的活动余地却很大。从这里可以造成某种沮丧和万事皆空的感觉，反过来这又会酿成某种喜欢对别人的努力作摧残性批评的心理习惯。事情固然并不一定如此；许多官吏由于更加熟悉他们的工作而得到了进步。但是避免这些缺点是困难的，没有简单的药方可以克服这些缺点。

可是，把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安插到这部机器的恰当位置上，并且重新塑造他们的工作习惯是并不困难的。稍晚我们将看到，至少在瓜熟蒂落的社会主义化的情形下，道德上接受社会主义秩序，并将效忠的对象转移到它身上去的条件大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这时候就用不到政治委员来遇事掣肘和动辄申斥了。这时候，为了保证从前资产阶级分子那里取得最大限度的工作成绩，需要对他们有合理的待遇，但是除了和任何其他出身的经理人员一视同仁而外，其他都是不必要的。这种合理待遇的涵义何在，曾由若干

① 参看下面，第24章。

社会主义的权威极为理智，极心平气和地说明过，因此在这里只要就几个重要的论点作极简略的考察就够了。

最好我们还是一开始就承认，无条件地信赖纯粹利他主义的责任感，和全盘否认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两者都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们充分估计各种和责任感有亲缘关系的要素，例如从工作和指导中获得的满足，某些报酬制度，至少是采取社会表彰和社会威望形式的报酬制度大概仍然可以证明为有许多好处。一方面，通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找出一个男人或女人，无论他或她的心地如何高尚，他们的利他主义或责任感能够完全离开上面说过的那种利己主义——至少，离开（如果你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他或她的虚荣心或出风头的愿望的那种利己主义——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十分明白，成为这种十分明显的事实的基础的态度，其根基之深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制度，它是属于任何社会集团的生活逻辑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关于感染了人类的灵魂，歪曲了它们的“天然”本性的资本主义瘟疫之类的话来加以处理的。可是，妥善对待这类个人主义的自我主义，以便利用它为社会服务，却又十分容易。社会主义共同体要做到这点，还有特别有利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对成就或社会威望的承认，带有强烈的经济涵义，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金钱利益是成功的典型的标志也因为社会威望的许多行头——特别是，一切经济货物中最微妙的一种，即**社会距离**——是必得用钱去购买的。私人财富的这种威望或特殊价值，经济学家当然是一向承认的。并非先见或洞察的巫师的约翰·穆勒懂得它。很清楚，在各种超等成就的刺激物之中，这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本书第二篇指出了，资本主义进化本身，在削弱其他一切动机的同时，趋向于削弱这种渴望财富的动机。从而，社会主义对于现

在形成了最高阶层的人们生命价值，用不到作象它一百年前所作的那么大的重估价。何况，威望的动机比任何其他动机更能用简单的改变条件的方法来加以塑造。有重大成绩的人如果给以得在裤子上钉上一枚小钱证章的特权（如果给得相当节约的话），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几乎会象每年收入一百万元那样感到满足。而这也并不是不合理的。因为假定这个小钱证章能深深地感动周围的人使他们对带章的人另眼相看，那它一定会使带章的人得到许多好处，而取得这种好处正是他珍视每年一百万元收入的原因。这种做法诚然不过恢复了过去一直使用得极有成效的一种方法，但这不会贬低我们论证的价值。为什么不该这样做？托洛茨基本人就接受过红旗勋章。

至于说到实际收入方面的优待，首先应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合理对待现有社会资源的问题，而这和刺激的一面完全没有关系的。正如赛跑的马和得奖的牛之受到人们衷心满意的注意，而这种注意如果每匹马每头牛都同样得到那是既不合理又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经济合理性的规则占着统治地位的话，建立了非凡功绩的人理当得到应有的优待。当然他们不一定要这样作。社会共同体也许会选择和设法实现排除这种优待的理想，并反对用对待机器的方法来对待人。而一个经济学者对这种办法有权说的话，无非是社会共同体不应该无知到不懂得实行这种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之类。这一点相当要紧。许多足以惹起非难的高额收入，并没有给这种收入的收受者带来高于足以使他们和他们所做的工作相称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包括社会距离和免除许多零星的麻烦在内。

只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我们就能够同时解决提供纯粹经济刺激的问题，至少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也是合理

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把经济刺激实行得远超过赛跑的马和机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获的。它的理由，也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来自对人的行为的观察，第二，来自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是不能支持那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优待而加以利用的刺激是资本主义条件的产物的那种观点的。这种刺激是有价值的社会性质的努力的推进器。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所有的满足机会和成果总会多少小于本来可能有的数量——虽然不可能说出小多少，虽然一旦社会主义接管之后经济过程愈平稳，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就愈小。

上面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为了要使这种性质的刺激能够恰当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就得使名义收入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现在的收入，包括了捐税，储蓄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光是这些项目的消灭，就足以把冒犯我们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心情的数字急剧减低下来。此外，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的，高收入阶层因为愈来愈受到朴素谦虚思想的训练，事实上正在丧失他们渴望获得——威望动机以外的——用来维持领主规模〔生活〕开支的那种收入水平的动机；当社会主义可望成功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将更趋朴素。

经济学界的法利赛人自然还是会因为神圣的恐怖而举起他们的双手的。为他们打算，请允许我指出，祛除他们的疑虑的办法早就有了。办法出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但盛行于俄国。这种办法基本上是使报酬的主要部分由实物组成，加上假定作为缴纳某些捐税用的数目很克己的一笔现款。在大多数国家内，民事高级官员的报酬无疑都很微薄，常常微薄得不合理，重要的政治职务多半支领一笔微薄得只象装饰品一样的货币工资。但是，这种低额薪水在大多数情形下部分地得到了补偿，在某些情形下还得到丰盛的补偿，不仅通过荣誉，而且也通过公费配置官邸，“公事”招待客人

的津贴，旗舰或别种快艇的使用，给担任国际任务的人或在军队司令部供职的人的特别津贴等来补偿。

IV. 储蓄和纪律

最后，社会主义政体势必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过来，而现在由资产阶级行使着的那些职能，以后将怎么样？在这一节中，我们只讨论储蓄和纪律的问题。

关于储蓄——几乎完全由资产阶级，尤其由资产阶级高级阶层行使的一种职能——我不想说它是不必要的或反社会的。我也不想要求读者去依靠各个同志的储蓄习惯。用不着忽视他们的贡献，而且，除非把社会主义经济看做是静止的，忽视这种储蓄也是不适当的。更为有效的是，我们知道，中央当局可以通过直接配置国民经济资源的一部分于生产新工厂或新设备，就可以完成现在通过私人储蓄完成的全部工作。俄国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可以肯定的。俄国强制实施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从来都不能实施的刻苦和“忍欲”。在一个比较先进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了取得资本主义那样快的发展速度，没有必要强制实施近似于此的办法。如果资本主义先辈已经达到了准静止阶段，也许甚至自愿的储蓄就够了。这个问题虽然总是可以找到解答的，却再次表明不同的局势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义，也表明了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只有当经济进步被视为无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规范已不再是适合的了）的时候，或者只当经济进步虽然对过去来说极为重要，但被认为已有长足的发展，所以对将来已不重要的时候才能成功。

关于纪律：在经济发动机的效率和商业社会借助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授予雇主的支配雇员的权威之间，是存在着某

种明显关系的。这种权威，并不只是授予**有产者**以便使他们能够来剥削**无产者**的那种特权。在直接有关的私人利益的背后，还存在着使生产装置得以顺畅运行的社会利益。在一定的局面之下，私人利益为社会利益所作的实际服务到底有多大；利用这种把社会利益信托给雇主个人利益的方法横加于倒霉蛋身上的不起作用的辛劳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意见也许是大有分歧的。但是，无论是关于这种社会利益的存在，或是关于在原封未动的资本主义时代显然是唯一可行的那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历史地说，都不能有任何意见分歧。这样，我们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社会利益是否将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环境之中？第二，如果是的，社会主义计划能不能提供所需数量的权威，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威？

权威这个名词，用它的补足语权威性的纪律来代替是方便的，所谓权威性的纪律是指，并不是由被训练教育的各个人，而是由某些权威人士的反复教导而形成的服从命令、接受检查，接受批评的习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区别自我纪律——注意，自我纪律至少部分是由于先前甚至是祖辈受到权威的训练的**影响**而形成的——和集团纪律，集团纪律是集团舆论对集团中每个成员的压力的结果，同样，它也部分地由于过去所受到的权威性的训练而形成的。

现在我们可望有两种事实来支持社会主义秩序下会有更严格的自我纪律和集团纪律的论点。可是这个论点也象许许多多其他论点一样差一点被愚蠢的理想化破坏了——有那么一幅图画，图画中的工人们刚从愉快的娱乐中回来，他们经过一场才智焕发的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愉快的竞赛中贯彻了这个决定。但是这类事情应该不致于让我们闭起眼睛，不去考虑一些事实和根据那些足以支持更为合理的有利的预期的事实推论出来的结论。

第一，社会主义秩序大概能博得现在资本主义愈来愈得不到的人们对它的忠诚。几乎用不到强调，这会使工人采取比他工作于他所不赞成的制度下更健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责任。何况他的不赞成，多半是人们施加影响的结果。他不赞成，因为人们教他不赞成。他的忠诚、他对工作成绩的自豪感，由于不断的劝告而消失殆尽。他的整个人生观被阶级斗争的变态心理弄歪曲了。但是，前面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上曾称之为社会骚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将和其他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一起消失——或者象我们马上可以看见的那样，可以使之消失。当然，由个人自负经济命运责任这件事所施加的惩戒性影响的不再存在，一定会部分抵消这种好处。

其次，社会主义秩序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它以明白无误的明朗性表明经济现象的本性，而在资本主义秩序下面，它们的面目是被利润这种利益的面具遮盖着的。虽然我们可以任意看待社会主义者认定是在这个面具背后犯下的无数罪行和蠢事，但我们总不能否认面具本身的重要性。例如，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人能够怀疑，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所得的是进口品，出口品则是为获得进口品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而在商业社会中，这种常识的观点对普通人说来却照例是完全看不见的，因此他会高高兴兴支持对他不利的各种政策。又如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不论工作得如何拙劣，总不会公开地为了劝诱任何人不要生产而发给他奖金。此外，决不会竟有人要喝令储蓄滚蛋。经济政策将〔高瞻远瞩地〕远远超过眼前的问题而予以合理化，某些最糟糕的浪费的根源将能够避免，所有这一切，都不过因为在每个同志看来，各种法案各种过程的经济重要性都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格外重要的是，每个同志都会懂得磨洋工的真正的意义，特别会懂得罢工的真正的意义。

他懂得这一点，可是他绝对不会因此而事后谴责资本主义时期的罢工，如果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的罢工只不过是民族福利的反社会的打击，此外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果他竟然还是罢工，他自己会觉得内疚，也会受到公众的非难。尤其是再也不会有好心肠的男女资产者觉得向罢工工人和罢工领袖喝采是极度刺激性的了。

V. 社会主义下的权威性纪律：俄国的教训

但是，我们从以上两项论据推论出来的结论，决不止于指明，在这两项论据有效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大概会有更多的自我纪律和集团纪律，从而它只要比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少一些的权威性纪律就够了。它们同时也提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必要，权威性的纪律强制将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①在提出使人相信这件事情的理由以前，我必须先提出使人相信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威性的纪律不可省的理由。

首先，正是因为自我纪律和集团纪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先前的，可能是祖辈相传的权威性纪律训练的结果，所以如果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中止了这种训练，它们就会消蚀完的，完全不管社会主义秩序是否会为了保持可以使各个人各个集团作合理的考虑或激发出道德上的忠诚来的那种类型的行为提供额外的理由。这类理由和它们的被接受、与其说是促使人们自觉地迎头赶上、不甘落

^① 如果能够证明，至少对某些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它是一种合理的期望，那么它的重要性是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的。这种纪律，不仅能改进劳动日的质量，如果必要也能延长劳动日。即使不考虑这点，纪律也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经济因素。它润滑经济发动机的运转，大大减低浪费，减低每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计划工作的效率，尤其是日常的管理的效率，都能提高到超过目前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

后的重要因素不如说它是诱导人们服从训练、服从某种制裁制度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考虑的是在日常生活的灰黯的例行活动中的纪律——我们的狂热信仰使它失却了荣光，它在若干细节上，即令不在全部细节上是令人厌烦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大地推动了自我纪律的要活下去的那种动机的压力，在社会主义秩序下起码也会去除一部分，那么上面所说的事情，也就显出它的分量来了。

第二，和正常的人的不间断的训练的必要性密切相联系着的，还有对付低能者的必要性。所谓低能者不是指孤立的病态事例，它也许涉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那么一个宽阔的范围。就低能是由于道德上的缺陷和意志力上的缺陷一点面言，指望他会跟资本主义一起消失是完全不现实的。作为人类的最大问题和最大敌人的低能者，在那个时候还将和现在一样多。光是靠**没有外来帮助**的集团纪律是难以对付得了他的——虽然权威性纪律这部机器，完全可以制作得，至少部分是通过低能者所属的集团来发挥作用的。

第三，虽然社会骚动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可望部分消失，却有理由可以相信它不会全部消失。鼓动骚动，放一个螺丝旋到机器里去，仍然是一种事业，或一种事业的突然终止，这种活动不会比现在不满意他自己的处境、或者不满意总的环境的理想主义者或自私自利者的自然的反作用为少。何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抗争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可以消灭的足以引起争论的重大根源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地区的局部利益和产业部门的局部利益显然很可能还要部分地残存下去，除此而外，也许还有意见冲突，例如关于眼前享受与未来几代的福利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那时候，拥护后面那条路线的当局所面临的公众的态度，大概不会完全不象今天

的劳工和一般公众对待大实业和它们的积累政策的态度。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回忆一下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文化的非决定性这个题目下面所说过的话，我们一定会明白，国民生活中许多重大争论点还将照样争论不决，而且很少理由可以指望人们将不再为它们而互相斗争。

现在，在估计社会主义当局和上面三类可能发生的困难作斗争的能力时，我们必定要记住，和它作比较的是今天这样的资本主义，甚至还是在一个进一步的分离析阶段中可望起作用的资本主义。我们在讨论从边沁时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完全忽视的个别商行内部的无条件服从^①的重要性时发现，资本主义进行正在使它的社会心理学的基础趋于泯灭。工人的欣然服从命令，决不是由于理智上确信资本主义的美德，或者由于理智上觉察到正在落到他个人头上的什么好处。服从来自他的资产阶级主人的封建先辈反复训诫面成的纪律。无产者把他们的祖辈在一切正常情况下对封建主表示的尊敬的一部分——决不是全部——转移给了这个资产阶级主人，而封建主的后辈们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继续掌握政治权力，又使资产阶级的事情大为好办。

资产阶级由于反对保护阶层，他们在承认政治领域内的平等，和告诉劳工说，他们是和任何人一样是有价值的公民，因而被罚掉了这分利益。有一个时候，还有足够的权威，势必要瓦解工厂内纪律缓慢而不断地发生的变革蒙上一层面幕。现在，维持纪律的手段大部分已经完蛋了。更严重的是使用手段的权力也完蛋了。完蛋了的是社会对雇主向违反纪律作斗争的道德上的支持。最后，完蛋了的是——大半是撤消支持的结果——旧时政府机关的

① 见本书第159—160页。

态度；我们如果一步一步追寻变化的踪迹，看得清楚，最初是从支持雇主到局外中立，经过形形色色的、色调逐渐变化的中立到支持工人、承认工人是讨价还价中的平等伙伴的权利，再从这里走向支持工会，既反对雇主又反对个别工人。^①完成这幅图画的是雇员性质的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态度，他知道如果他要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话，他甚至不会激起愤怒而会激起狂欢，他由此作出结论说，被人家恭维为进步是更令人心旷神怡的——或者去休假也好——用不着因为做谁也没有承认是他的责任的事情而遭受到耻辱或危险。

考虑到这种事态，用不到把固有的趋势推想多远，就能摹想出社会主义成为恢复社会纪律的唯一手段的某些局势。但是，不管怎样，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在这方面所能获得的好处是相当可观的，以致在生产效率的天平上会清楚地显出它的分量来。

第一，社会主义经理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威性纪律的工具将比资本主义经理从来能得到的要多得多。资本主义经理实际剩下的工具——符合于边沁主义的由社会地位平等的双方理智地签订契约或废止契约这个观念的工具——只有开除，可是这种工具的把手是这样构造的，谁企图使用它，它就会砍掉谁的手。社会主义经理的开除威胁，却意味着换一个职业所保障不了的扣留生活手段

^① 等于鼓励罢工纠察那样的做法的容忍，可以当作一个迂回行进的过程的有用界标。我国的立法实践，尤其行政实践是特别有趣的，有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时冷时热的，因为经过长期迁延，变革就拥集到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中来了。从来不曾觉到政府在它对待劳工问题的态度中，除关怀工人阶级的短期利益而外，也许还有其他社会利益有待于照顾，这件事和半心半意却意味深长地采取阶级战争的策略同样具有特征性。事情大部分可由一种独特的政治构造和美国的不可能用任何别的方法把无产阶级赶到一个有效的组织里去来解释。但是美国劳工形势的例证价值，不因此而受到实质上的损害。

的威胁。何况，资本主义社会内照例是或则开除或则什么事也没有——因为舆论在原则上不赞成契约的一方惩戒契约的另一方的观念——，而社会主义经理则既有力量把这种威胁使用到看来是合理的任何程度，同时也可以应用其他制裁方法。其他制裁方法中比较不太激烈的那些方法，又是资本主义经理部门由于缺乏道德上的威信而无法使用的。在新的社会气氛下面，仅仅劝告也许就能产生现在不可能产生的效果。

第二，社会主义经理会发现，它很容易使用它所有的一切权威性纪律的工具。不会有政府的干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不再是敌对的，那些依旧信仰自己准则的个别知识分子将会被社会约束起来。这样一个社会在指导青年方面将特别坚定。重复一下，舆论也不会再鼓励人们认为是准犯罪性质的行为。一次罢工就是叛变。

第三，社会主义的领导集团将比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有多得多的维持自己的权威的动机。现时政府对企业的态度，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用来和反对派联系在一起的态度是一样的：它是批评的、牵制的、基本上不负责任的态度。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办。生产部对发动机的功能负有责任。这种责任诚然只能是政治责任，漂亮的演讲也很可能遮盖住许多罪恶。可是，政府的反对派必然会被消灭，代替它的是赞助成功经营的强烈动机。经济的必要性不再是嘲笑的对象。瘫痪生产运转和使人们反对自己的工作的企图等于攻击政府。不难预期这些攻击会引起怎么样的回击。

俄国经验的概括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异议，若考虑到更成熟的或近乎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困难不会更多而只会更少，那又和储蓄问题上的异议一样，并不会损害它的经验教训的价值。正相反，我们很难希望上述论证中的主要论点，能获得比它更好的例

证。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完成了俄国的小而高度集中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瓦解过程。群众全都放下了工作，举行无数次自动放假式的罢工，占领工厂，借此来实行他们的新秩序的概念。^①由工厂委员会或工会来管理工厂是当时的时髦事儿，且被许多领袖视为当然之事。经过1918年初达成的妥协，勉强强为工程师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保证了最低限度的权势，这一妥协的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作用是1921年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动因之一。有一个时期工会的职能和态度重新陷入了它们在严格受到束缚的资本主义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把这一切全都变过来了，到1932年，产业无产阶级比在最后一个沙皇统治下更有力量。布尔什维克在其他什么地方也许是失败了，但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得到了从来未有的成功。做到这一点所用的办法是有高度启发性的。

工会没有受到压制。相反，它们却受到了政府的扶助；会员人数作跳跃式的增加，早在1932年，就将近达到一千七百万人。但是他们从集团利益的代表者，纪律和工作成绩的障碍物，发展成为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和纪律和工作成绩的工具，它所采取的态度如此迥然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以致若干西方的工会工作者全然拒绝承认它们是工会。他们不再反对随工业化以俱来的刻苦。他们欣然挺身为不取附加报酬的劳动日的延长而奋斗。他们扔掉了平均工资的原则，拥护一种奖金制度，拥护其他诱导工作努力的措施，拥护斯达哈诺夫运动和其他等等。他们承认——或屈服于——经理的任意开除工人的权利，阻止了“民主大会运动”

^① 这种纪律的崩溃，迄今为止已发生于多数历史事例中。举一个例，这是1848年革命中在巴黎尝试的准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的直接原因。

——工人讨论所收到的工作令只有经批准后才予以执行的一种做法——和“同去法庭”“清党委员会”合作，采取了颇为强硬的对付懒汉和低能者的手段。再也听不到什么罢工权和工人管理权了。

而在意识形态上说，这是什么困难也没有的。我们尽可以嘲笑那些把一切在充分利用劳动力方面并不十分符合政府利益的事情称为反革命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古怪的说法。但是，在这种事情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在内：随着阶级战争的消灭，妨碍议事进行的做法会消逝，集体协议的性质会变更，这原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果。批评者忽视社会主义体系所能解放出来的自我纪律和集团纪律的效果是错误的，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充分证实了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预期的东西。同时，批评者同样错误地忽视了权威性纪律在这个成就中所起的作用，权威性纪律不仅有力地支持了这个成就，它补足别种纪律的力量也是同样大的。

个别工会和它们的中央机构总理事会都已在政府和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被称作工人反对派的那一派已经受到压制，坚持承认工人的特殊利益的工人领袖已被革职。因此，自1921年政府改组以来，更确切地说自1929年以来，工会要是违反统治集团的愿望，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什么事也做不成。已不能说违反统治集团的话，做违反统治集团的事了。它们变成了权威性纪律的工具——这一事实，正好证明了上面所提出的一个论点。

其次，只要现代工人对待他的工作的不健康态度是由于他所受到的影响，就得注意在不断向他灌输责任感和工作成绩自豪感同不断地使他不重视这些东西这两者间的巨大差别。俄罗斯国家，不象资本主义国家，她在青年的教育和指导方面，能强使青年同她的目的和结构的观念相符合。这一事实不可计量地增大了它

的创造有利于工厂纪律的气氛的能力。知识分子显然没有干预这件事的自由。也不存在什么鼓励违背纪律的舆论。

最后,开除就意味着贫困,调动等于充军,突击队的“访问”,以及偶然由红军同志所作的“访问”,不管它们的法律解释如何,实际上都是政府手上用以保证成绩的各种独立手段。使用它们的动机是存在着的,而且,如众所周知,这些手段是无所顾虑地被使用的。任何一个资本家雇主即使他有权力也没有想到要应用的各种制裁方法,使一切比较文雅的心理技术都自愧不如。

所有这一切的邪恶的涵义,对我们的论点来说并不是极为重要的。在我所试图说明的东西中没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对个人和对整个集团的残忍,大部分应归之于局势的不成熟,归之于国家的环境,归之于她的统治人物的个人品格。在别种环境里,在其他发展阶段中,在另一些统治人物下面,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如果事实证明任何制裁都不必要,那当然好得很。问题在于,至少一个社会主义政体真正有能力来培养集团纪律并强制实施权威性纪律。重要的是原则,而不是原则转为实践时采取的个别形式。

这样,即使离开蓝图的是非曲直,把社会主义这个代替者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相比较,结论并非不利于后者。应该再次强调,我们所谈到的只是可能性,虽然这种谈论其意义是和我们关于蓝图的讨论不相同的。为了将可能性转变为确实性,必须有许多假定,甚至把可能性转为实际上的似真性也必须有许多假定。这无疑是正当的,正如采用会得出不同结论的另外一些假定也是正当的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使我们自己相信完全的失败甚至可笑的失败都是可能的,只要假定构成我称之为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将会流行就行了。这甚至还不是可能有的最坏的结果。明显到可笑程度的失败是可以补救的。更危险而又更可能发生的失败

倒是政治的心理技术可以使得人民相信其为成功的一种不太完全的失败。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之偏离发动机的蓝图和制度赖以实施的原则，当然不会少于商业社会中会发生的这类偏离，但是它们可能更为严重更少自动校正的可能。但是，如果读者再次看看我们论证的步骤，我想他定能证实，以这类考虑为基础的反反对意见不能在实质上损害我们的论证——更确切地说，它们不是对我们所定义的那种社会主义本身的反对意见，而是对某些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也许会表现出来的特色的反对意见。从这些反对意见不能得出结论说为社会主义奋斗是无聊的或是不道德的。只能由此推定，除非配上关于所要的是哪一类社会主义的清楚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奋斗意味着一件没有确定意义的事情。至于这样的社会主义和我们通常用民主主义所指的意思能否相容，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第十九章 过渡

I. 区别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相信，从资本主义秩序过渡到社会主义秩序，不管当时情况如何，总会引起一些本身独有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全部正统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但是在那时候，预想中的困难的性质和程度，因资本主义进化所处的阶段和实行社会主义的集团能够使用和愿意使用的方法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区别，因此比较方便的办法是，构想两种不同的情况，把二组不同的环境典型化起来。这种办法是一切办法中应用起来比较容易的一个，因为它在何时和如何之间存在着一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可是两种情况的讨论仍然都只参照充分发展的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来处理——我不想浪

费篇幅在任何较早阶段上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上面。记住这一点，我将称它们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化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化。

第二篇论点的大部分都可以用马克思下列命题加以总括：经济过程倾向于使它自己社会主义化——同时也使人的灵魂社会主义化。我们用这个命题来指这样的意思，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技术、组织、商业、管理和心理上的诸先决条件趋向于愈来愈得到满足。让我们再次摹想一下把这种趋势具体化浮现于未来时期的事物状态。各类营业，除农业而外，已为一小批官僚主义化的公司所控制。进步松弛了，变得机械化和计划化了。利率收敛到趋于零，这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政府压力所造成的，而是长期的，因投资机会减缩了。产业的财产和它的经营管理变得非人身化了——所有权退化为股票和债券的持有，董事长或总经理带上了类似机关公务人员的心灵习惯。资本主义的动机和准则全都凋谢了。在这种瓜熟蒂落的时候，结论显然是向社会主义政体的过渡。但是还有两点应加指明。

第一，不同的人们——甚至不同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所能认为满意的接近这种状态的程度，以及对在一定时期实际上达到的接近程度的诊断都会彼此不同。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固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是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慢得看不清楚，同时又决不会通过什么大家都看得清楚且无怀疑余地的，确切指明道路开放的交通信号灯光的。又因为获得成功的诸必要条件并不必然并步演进，诚实的意见分歧的可能性也因面大为增大。例如，人们可以颇具理由地主张，1913年美国的产业结构，按其本身情形来说，比当时的德国更近于“成熟”。可是，很少人会怀疑，假如在两个国家做一次实验，那么当时由世界

上从未见过的最好的官僚政治和她的卓越的工会组织所领导着的，受过国家生活训练的德国人的成功机会是比美国大得不可计量的。但是在诚实的意见分歧之外——包括因气质的不同而引起的分歧，诸如几个有同等能力的正直的医生，对一次手术是否得当的看法上的分歧一样——也常常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相互猜疑，即一方认为对方并不真正要社会主义，因此他不承认成熟，也永不会承认成熟；他方又可以认为这一方在随便什么环境下不管有没有最理想的理由作为基础，都是可以假定成熟的。

第二，即使假定，一种误解不了的成熟状态已经达到，转变仍旧要求特别的行动，仍旧会出现一连串问题。

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事物和灵魂。在极少的情形下，事情可以完成得如此完整，以致最后的步骤不过是个形式。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秩序还是不会自力转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最后步骤，即正式采用社会主义为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法则，仍旧必得采取例如宪法修正这样的形式。可是在实践上人民不会等待这种极少有的情形自动出现。等待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成熟状态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的态度还没有从各个角落和一切隙缝中消失干净的时候就已达到。那时，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就不仅仅是形式。还有某些抵抗和困难有待于克服。在考察这些事情之前，让我们介绍另一特征。

从根本上说，事物和灵魂是自动地把自己塑造成为赞成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这种转变是和每个人的意志和用以贯彻意志的手段方法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过程本身也格外地产生了这类意志，从而也产生了手段和方法——立法的，行政的，其他的手段。这些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是社会化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把社会化政策的实施时期设想为必须延续根长的一段时

期，起码会有几十年。但是它的历史自然而然划分为二截，其间的界限是采用并组织社会主义政体的立法行为。变法前的社会化政策——不论是故意的还是非故意的——是准备性的，变法后则是构成性的。前面那一截，我们将只在章末作简短的讨论。现在我们来集中讨论后面那一截。

II. 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在成熟的社会主义化情形下，有待于“变法后的社会主义化”作为首要任务来对付的困难不仅不是克服不了的，甚至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抵抗将是微弱的，合作将来自一切阶级的大部分人——其征兆之一，恰好是通过宪法修正案采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通过某种无须破坏法统的和平途径。按照假定，人民将了解这种步骤的性质，甚至多数不赞成的人也会忍耐地容忍它。没有人会张皇失措，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塌下来。

当然，即使这样，牌还没有出完，不能说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危险并不太大。不仅一方的有组织抵抗和另一方的狂暴激愤的全不存在或近乎不存在将缩小革命爆发的机会，同时也会有一批有经验而负责任的人下定决心出来掌舵，他们既能够也愿意维持纪律，并且使用合理的方法，把震动减到最小限度。帮助他们的，还将有训练良好的，习惯于接受任何合法当局的命令、且并非总是偏袒资本主义利益的政府官僚和企业官僚。

让我们首先把新的生产部或中央局所面临的过渡问题加以简化，办法和简化它们的长期问题一样，这就是说，假定它们实质上 will 把农场主的问题搁在一边不加触动。这不仅可以消灭一个大概可以证为致命的困难——因为在农场主或农民那里，财产利益的强烈关心是哪里也无法比拟的；农业世界里并不到处都住着俄罗斯

农民——而且还将获得额外的支持，因为农场主之憎恨大规模企业和憎恨他们所特别称之为资本主义利益的，又是谁也比不上的。也可以指望中央局会安抚其他各种类型的小人物：可以允许围绕在社会化产业周围的小工匠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继续为谋取利润而干他的本行，可以允许小的独立的零售商象今天国家垄断生产烟草和烟草制品诸国内的纸烟店那样做它们的买卖。天秤的另一端，凡对他的工作作个别估价的——让我们说，董事长总经理类型的——人们的个人利益，容易按照前面指明的方法加以照顾，以便避免在经济发动机的运动中出现什么严重的故障。激烈主张平均主义理想，当然是会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的。

资本家的利益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在瓜熟蒂落的时候，我们可以粗略地把这种利益等同于股票和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后者也适用于抵押债权和保险单持有者。对于除了圣经而外一无所知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对于认为这个集团是由一小批财富无限的富有游惰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要准备受一次惊吓：在成熟时期，这个集团很可能包括选民的多数，不管各个人在这方面的利益怎样小，那时候他们对于没收他们的这种权利的提议是不会赞成的。但是，用不着操心社会主义政体能不能够或“应不应该”无偿剥夺这些权利。和我们有关系的问题是，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经济必要性，以及，如果决定没收，这也会是社会共同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比如说，遵守它大概会采纳的道德原则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支付当时个人持有的债券利息和抵押债权利息，加上根据保险合同应付的款项，加上中央局换发给前股票持有人的债券——这样股东在失掉他们的投票权时，仍能保持约略等于过去的适当决定的年限内股利的平均额——利息，粗略观察一下有关统计，就会表明这不足以构成一笔负担不了的开支。就社

会主义共同体要继续利用私人储蓄这一点而言，把这笔开支担当下来显然是得策的。时间的限制是做得到的，或者将所有这些支付转为限期年金，或者利用剥夺性的所得税或遗产税，这样，这些税制在永远消失之前大概还可以作最后一次的效劳。

我认为，这充分标明了“变法后的社会化”的一种实际可行的方法的特征，在我们所观察的环境下，可以指望这些方法坚定的、安全地、文雅地完成过渡任务，并把精力的损失和对文化、经济价值的损害减少到最小限度。大规模企业的首脑人员，只当有特殊的撤换理由时才予以撤换。如果过渡的当时，在应该社会化的企业中还有私人合伙企业，应该首先把它们转为公司组织，然后按同样方法加以社会化。新商行的创立当然要禁止。公司之间的联系结构——尤其是控股公司——要予以合理化，即把这种关系缩小到以有益管理效率为限。一切银行要全部转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种形式上银行可以仍然保持某些机械性质的职能——至少一部分社会簿记的职能是几乎必须委托给它们的——也还可能有权如允许给企业经理部门“贷款”或拒绝给企业经理部门“贷款”这样的权力，如果这样，中央银行大概会独立于生产部之外，变成一种总监察局性质的机构。

这样，中央局开始走得很慢，逐渐收紧缰绳而不突然猛拉缰绳，于是经济体系就会有时间扎下根去，有时间辨别自己的方位，逐个解决随过渡以俱来的较小的问题。生产的微小调整开始时是必要的——至多涉及总产量的5%。因为除非平均主义观念的显露头角比我假定的强烈得多，需求结构实质上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人的转移，例如律师的转移到别的行业，规模确实不怎么太小，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产业中所起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用不着了。但是这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困难。较大的问题如

消灭不合标准的生产单位，向最好的机会的进一步集中化，地区配置的合理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的再分布，消费者货物和生产者货物的标准化等问题，一时不会出现，至少在社会主义体系融化机体上的变革并按旧有路线平稳地继续运行下去以前；不需过早出现。可以毫不荒谬地期望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可能的卓越成就性。

III. 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1. 对于第二种情形，即未成熟时采用社会主义原则的情形，不可能作上面那样的预测。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可以定义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秩序的过渡，发生于社会主义者可能赢得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机构的控制权的时候，当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尚无准备。让我重复一下，我们不是在讨论不成熟到那样程度的局势，当时成功的希望对任何神志清明的人看来是狂想，觊觎政权不能不以一次可笑的起义告终。因此我不是在主张，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化必定不可避免地以完全失败告终，或者它所造成的制度势必会崩溃。我所设想的还是现时类型的受束缚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局势下，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至少是合理的。甚至也可以说，在这种背景下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长期局势愈来愈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也会发生短期的有利形势——德国 1918 年和 1919 年的形势是一个好例子；有人也会指出美国 1932 年的局面——那时候，资本家阶层和他们的机构的暂时瘫痪提供了诱人的机会。

2. 物质和精神上的无准备或不成熟倒底是什么意思，读者细察前面几页描绘的那幅成熟情况的图画，就不难领会这一点。我想对我国 1932 年的特殊形势加上几笔。

在一个精力充沛的——尤其是，按变化率来说并不是不正常的——产业活动时期之后来了一次萧条，萧条的十分激烈证明了“进步”结果所需要的调整的规模。在若干主要方面进步显然还未完成——只要指出农业电气化，家务电气化，化学方面的全部新东西，建筑业所面临的诸可能性就够了。因此，可以有信心地预言，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化将在企业精神、生产效率、群众未来福利等方面形成很大的损失。很有趣的是，在萧条时期的歌斯底里中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能够告诉给公众的意见则恰恰相反。可是这种情形，若从社会心理学方面来作诊断，是要比经济学的解释剖切得多的。

不成熟也表现在工业和商业组织中。不仅中小型商行仍然为数众多，他们在同业公会中的合作还远不完备，而且大实业本身的发展虽已成为许多无批判的惊讶和敌意的主题，却还远未达到能够安全而容易地应用我们的社会化方法的程度。如果我们把拥有五千万以上的资产的企业划作大规模企业，那么只有全国总资产的 53.3% 为大公司所有，若除去金融和公用事业则只有 36.2%，在制造业中占 46.3%。^① 规模比这小的公司，一般不易社会化，也不能指望它们能以现存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下面照常工作。如果我们把标准减低为一千万元，则百分比就是 67.5, 52.7, 和 64.5。光是“接管”一个这样构成的机体就是一项可怕的任务。事情还不止此。当时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官僚机构，劳工力量的组织又如此不完善，其中一部分的领导又如此成问题，以致看来它们是无法控制的。要使这样的产业机构在这种情形下行使它的职能，并继续获得改进，对中央局或生产部说来是更为可怕的任务。

① 见克腊姆：《公司控制的集中》，《营业杂志》第八卷，第 275 页。

精神上无准备更甚于物质上无准备。尽管有萧条的震动，不仅生意人，而且很大部分工人和农场主思想和心情都以资产阶级秩序为其准则，他们实在没有任何关于某种资本主义代替品的清楚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化概念，甚至远低于社会主义化的概念，仍然是“非美”的。当时没有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除了具有斯大林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而外，任何正式的社会主义集团都得不到数量上重要的支持。农场主不喜欢社会主义，尽管举出他们所遭受的每一种灾难再三向他们保证，只是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程度比他们的不喜欢大实业，特别不喜欢铁路的程度要淡些。支持是微弱的，大部分支持要不是吵吵嚷嚷的关心就是不痛不痒的，抵抗却会来得很强烈。这种抵抗来自这样一种人，他们确信他们做的事谁也（更不必说国家了）不能做得那样好，确信他自己不仅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也是在为共同的利益而战——为绝对的光明反对绝对的黑暗而战。美国的资产阶级的活力当时正在丧失，但没有丧失完。他们将以一种明确的自觉进行抵抗，他们既拒绝同意又拒绝合作。这种局势的征兆之一就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集团和阶级，而不是反对孤立的个人，但用来反对各集团和各阶级；另一种征兆是，不可能通过修改宪法的途径，也就是说不能不破坏法统来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新秩序必须通过革命，尤其可能是必须通过血腥的革命来建立。也许有人指责这个不成熟局面的特殊例子，说它是属于荒唐而绝望的一类。但是这幅图画结合了并且说明了每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化的主要特色，因此，它对一般讨论还是有用的。

这种情形，当然是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情形，大多数正统社会主义者是无法忍受、荡人心魄略逊于无产阶级圣乔治诛灭资产阶级毒龙的壮举的任何事情的。可是，我们倒不是因为这种早

期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不幸的流风余韵才在这里探索政治上的有机会和经济上的无准备两者结合在一起所能得到的后果，而是因为通常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化的行动所特有的问题。只在这种情形下才会出现。

3. 那么，假定**革命的人民**——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已变成了象**最信基督的国王**那样的正式称号——已经征服了政府的各中央机构、非社会主义诸政党、非社会主义的出版机构等等，还配备了他们的自己人。这些机关中的人员，和工商企业中的人员，一部分被赶上了——按假定——不自愿的合作，一部分被劳工领袖以及从咖啡店冲向这些职务的知识分子所取代。我们将在两样东西上对这个新的中央局让步：一支强大到足够镇压公开抵抗和压制各种过火行为——特别是野蛮的社会主义化^①——的红军，他们无所偏袒地向右开枪也向左开枪，并按照前面指出过的方法，把农民或农场主搁下不动。不能假定会用怎样合理主义和人道主义态度对待曾经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下，除了最残忍的待遇而外很难有别种可能的方法。人们只要懂得自己的行为在对方看来只是邪恶的侵犯，懂得自己随时有遭受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厄运的危险，就会立刻陷于超乎原来意向的狂暴道路。他们只能以罪犯的凶猛来对付在他们看来是凶猛的罪犯——那些仍然挺身为旧秩序奋斗的人以及那些形成没法不出现的新的左派政党的反对派。可是犯暴也好，虐杀狂也好，都解决不了问题。中央局除了谴责怠工，要求额外的权力来对付阴谋分子和破坏分子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① 野蛮的社会主义化——一个已经取得了正式身分的名词——指每个工厂的工人，企图代替经理部门，把一切事情抓到他们自己手里的打算。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的梦魇。

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实行通货膨胀。必须夺取银行，合并它们，或者把它们和国库协调起来。中央局或生产部必须用传统的方法尽可能多地创造存款，发行银行券。我相信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还得答复那些否认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至少会暂时瘫痪经济过程，或者否认当时的国库和金融中心会短少随时可用的支付手段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簿记体系和收入单位体系反正不能继续保持现在所起的作用，大可以放心照抄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当时及其后，或法国 1789 年革命及其后的政策，虽然在这些事例中，正是由于人们不愿意和私有财产体系及商业社会方法分手，才使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厉行通货膨胀；但是，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日子”本来什么都没有定型，那么这种争论也就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还应该加上一条，除客观上的必要而外，也还有另一种动机要走通货膨胀的道路。通货膨胀本身是消除某些过渡的困难和执行不公平的剥夺的卓越手段。说是前者，例如，十分明显，货币工资率的剧烈增加可以在一个时期中防止因实际工资率跌落而可能引起的愤怒的爆发，实际工资率的减低则至少暂时是必得实施的。说到后者，通货膨胀以令人高兴的简单办法剥夺了按货币计算的各种给付要求权的持有人。中央局甚至还可以用内定不久就会变得毫无价值的纸币付给所有主，作为他们的任何数量的——工厂之类——实际资本的赔偿，这样事情就可以弄得办一些。最后，决不要忘掉，通货膨胀会有力地锤击暂时必得任其存在的私人企业这种障碍物。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什么也不能比通货膨胀更起瓦解作用：“为了毁灭资产阶级社会，你必须败坏它的货币”。

4. 要做的第二件事当然是社会化。过渡问题的讨论，开始于

社会主义者本身之间——更明确地说，开始于社会主义者和现在更恰当地称为的工党分子之间——的古老的争论，全面的或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化与部分的或渐进的社会主义化的争论。许多社会主义者似乎由于信仰的纯洁性，由于对社会主义荣光的效力的真正信念，认为在任何环境下都得守获前者，都得蔑视软骨头的工党分子，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拖着那根极不方便的的责任感的辮子，总是把自己弄得缚手缚脚。但是我倒赞成真正的信仰者们。^①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过渡政策；这是马上就要接触到的另一个问题，那时我们将发现，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次政治革命已把一个社会主义政体建立起来以后所要实行的迥然不同的过渡时期政策。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不过发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最小限度的过火行为，即使一只强有力的手已经强制实施了比较有秩序的办事程序，还是难于设想有这么一个阶段，其间某些大产业已经社会化了，而其他一些产业却可望照常工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在一个至少得根据它在不负责的日子里所传播的若干观念来办事的革命政府下面，任何剩下的私人企业很可能无法行使其职能。我所想到的主要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来自企业家和一般资本主义势力的障碍。他们的力量现在被夸大了，且在政治委员们的监视下多半不会再存在。拒绝履行日常的责任不是资产阶级的道路，资产阶级的道路是紧紧抓住日常的责任不放手。抵抗是会有有的，但它是在政治领域内的抵抗和厂外进行的抵抗，而不是

^① 可是，经上例不是含糊地支持他们的。如果读者们看看《共产党宣言》，他会找到一个最令人为难的“一步一步地”，恰好排在最有关的一段中。

在厂内进行的抵抗。未经社会化的产业之所以无法行使职能，只是因为做监督工作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人和公众二方面的气氛，不让它们照它们的方法行使它们的职能。按自己的办法办事却正是资本主义产业得以行使其职能的唯一方法。

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就大规模产业，和容易归并到大规模控制单位里去的产业而言。它并不完全包括，从我们已予排除了的农业领域起直到大产业的全部范围。在这范围内的主要是中小型商行，中央局大概能够按照便宜行事的原则曲尽操纵，特别可以按照情况的变化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按我们对这个字所理解的意义来说，这仍然是完全的社会化。

还剩下一点应该加上。应该看得很清楚，在任何不成熟到不仅需要使法统中断的革命，也需要意味着接着来一个恐怖统治的革命的成熟局势下的社会化，无论在短期中或在长期中，都不能加惠于发动社会化的人以外的任何人。激励革命的热情，表扬敢于冒革命中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的人也许是职业煽动家的较少启迪意义的责任之一。至于说到学院中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够反映出加于他的荣誉的勇气，却是批判、警告、抑制的勇敢。

IV. 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的事例

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这样的结论，说现在或今后五十年或一百年内，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除宣扬和等待而外已丝毫不能有所作为？诚然，这是不能期望于想要保持几个党员的任何政党的，可是我们不应该由于这一点，同时还存在着许多来自这种太合乎人情的来源的议论——和嘲笑——而就抹煞这样的事实，即这个结论是以一个极有分量的论点为其支持的。甚至可以十分合乎逻辑地说，社会主义者与其愈来愈厉害地束缚资本主义，倒不如不

要去束缚它，因为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对社会主义者是有利的。

可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说至少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者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虽然现在对多数大国和许多小国来说，建立社会主义无疑等于自招失败——也许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肯定是该对这种冒险行动负责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失败，而另外一些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下的社会主义的集团，那时大概会拐上他们的法衣，悄悄地溜之大吉。——虽然结果是变法后的社会化政策或许是一件十分可疑的事，而变法前的社会化政策却贡献了大好机会。社会主义者可以比其他政党更认清社会主义的目标，还用不到危害最终的成功，却可以和其他政党一样在这里插上一手。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说的一切，如果穿上一个特殊例子的外衣，便能最妥善地表达出来。

我希望我的例子展示出来的全部特色，都能在现代英国找到。一方面她的工业和商业结构，对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化的成功而言显然是不成熟的，特别因为公司控制的集中化走得还不够远。与此相对应的是，无论经理人也好，资本家也好，工人也好，都还没有决心接受社会主义——那里还剩有大量有生命力的“个人主义”左派，不管怎样都足以策划一次战斗并拒绝合作。另一方面，大约自本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一种觉察得出来的企业家精神的松弛，这种企业家精神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国家并对若干重要产业例如对电力生产的领导和控制，不仅为一切政党所认可，而且也是他们所一致需要的。说资本主义在那里已经做完了它的绝大部分的工作，这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为恰当。此外，英国人民整个说来现在已成为保有国家生活的锻炼的了。英国工人组织得很好，照例得到负责任的领导。她有一个文化和道德水平绝高的有经验的官僚机构体系，可以信任它会吸收同化国家活动领域扩张时所

需的新成分。英国政治家的无可匹敌的廉洁，和极端能干极有教养的统治阶级的仪容，能够把别处不可能的许多事情弄得容易办成。特别是，这个统治集团按照最适于工作的比例团结在一起，坚持正式的传统，却极端能够适应新原则，新局势和新人物。它想要统治，但完全有决心代表变动不居的利益集团去统治。它治理着工业的英国也治理过农业的英国，治理着保护主义的英国，也治理过自由贸易的英国。它不仅持有盖世无双的盗用反对党的纲领的才能，也持有盖世无双的盗用反对党的人材的才能。它同化了在任何别的地方必定会变成另一个拉萨尔的狄斯累利。如果必要，它也能同化托洛茨基本人，或者象在那个场合他一定会变成的嘉德勋位爵士普尔基波伯爵。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社会化政策，即借助于实行一个广泛的国有化纲领，一方面可以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跨出一大步，另一方面，也使得有可能在不定期内把凡是不包括在这个纲领内的一切利益和活动保留下去不去触动不加干扰。事实上可以使它们从财政的或其他方面的许多束缚和负担下面解放出来。

下列各营业部门的社会化，可以不致严重损害效率，或严重地影响留归私人经营的产业部门。补偿问题可以按照我们在讨论成熟的社会化时提出来的方法予以解决，加上现代税率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它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首先，英国的银行结构无疑已经成熟到可以社会化的地步。英格兰银行不过是一个财政部，事实上它并不拥有多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希望于它的金融结构的独立性。商业银行的集中化和官僚机构化，看来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可以让大银行尽可能吸收还有待吸收的独立银行，然后和英格兰银行合并成为国

家银行总管理处，总管理处可以吸收储蓄银行，建筑协会等等，它们的所有的顾客，除了从报纸上得知而外，可以完全觉察不到这个变动。业务上的合理协调所获得的利益大概是主要的。从社会主义观点来说，由于政府对非国有化部门的影响的增大，还存在着另一种好处。

第二，保险业是国有化的老候选人，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机械化了。和某些社会保险机构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也许是实际可行的，保单的销售成本可以有很大的降低，社会主义者大概也会因国家获得了对保险公司基金的控制权，使他们掌握了权力而再次欢欣鼓舞起来。

第三，很少人想要使铁路，甚至汽车货运业的国有化遇到重大的困难。事实上，内陆运输业是国家经营最能获得成功的领域。

第四，矿业，尤其煤矿的国有化，以及到苯为止也包括苯的生产在内的煤、沥青产品的生产，并包括煤和煤制品商业在内的国有化，甚至可能造成效率上的直接利益，并证明是一大成功，如果劳工问题能够解决得令人满意的话。从技术和商业观点看来，理由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同样看得清楚的是，在化学工业方面私人企业现在是很活跃的，因此如果国有化的范围超过上面指明的界限，人们就不能以同样的信心指望得到同样的成功。

第五，电的生产、输送、分配的国有化实际上早已全部完成，在这个题目下面剩下可说的是，电工工业是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私人企业的典型例子——这件事表明了，无论主张全盘社会化或是完全反对社会化，在经济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电力生产的实例同时也表明了，为谋利而经营一个社会化的产业部门是有困难的，可是获得利润，仍然是国家在吸收了国民经济生活中这么大的部分以后，同时还要完成现代国家的一切任务的根本条件。

第六，钢铁工业的社会化，人们会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有争论的一个命题。但是这个产业确实已经过完了它的纵情任意的青年时代，此后是可以“管理”的了——当然，一个庞大的研究部门是要包括在总管理处内的。协调会得到某些好处。在这里，不会有什么丧失企业家冲动所已经造成的成果的危险。

第七，除建筑师加入股份的以外，我相信建筑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可以由合适的公共机构来成功地经营。这个产业部门中那么大部分早已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加以管理津贴和控制，所以国有化后在效率方面大概会得到足以补偿可能发生的一切损失而有余的利益。

不能说上而列举各项一定是完全的。但是超过这个纲领之外的任何步骤，都得根据特殊的，多数是非经济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军备工业或关键工业、电影、造船、食品商业都是可能的例子。无论如何，这七个项目已经很够未来的一段时期去消化的了，如果负责任的社会主义者能做成功那么多，这也很够他以此自豪，也很够他拿来使国有化以外产业作某些合理让步的了。如果他坚持土地国有化——我假定农场主的地位照旧不变——即把一切地租和土地使用费的残存部分全部转归国家，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异议。^①

当前这次战争当然会改变我们问题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据。许多从来不可能的事将变为可能的，许多可能的事将变为不可能的。这本书的最后几页将简略地处理这个题目。但是对我来说，为了澄清政治思想，必须把问题弄清楚，不管战争的后果如何。

^① 这里不适宜于吐露个人的偏好。可是，我仍然希望人们了解，上面的陈述，是作为一种专门家的义务而作出的，却并不含有我爱好这个提议的意思。如果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将尽我的全力反对这个建议。

否则的话，它的性质就决不能照它应有的样子突出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让这一章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丝毫不加更动地保留我在1938年夏季写它时候的原样。

第四篇 社会主义与民主

第二十章 问题的设定

I. 无产阶级专政

越是明显的事情越不可靠。过去二十至二十五年中发生的事变，教会我们看清楚潜藏在本篇标题后面的问题。在1916年左右以前，社会主义和民主间的关系，在多数人看来是十分明显的，被大家信任的正统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更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感到这一点。谁都没有想到要否认社会主义者加入民主俱乐部的权利。当然，社会主义者们自己——除极少数工团主义集团而外——甚至还自以为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决不可以和资产阶级的冒牌货相混的真货的独家卖主。

对他们来说，不仅设法用民主的价值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是很自然的，他们还自以为满意地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两者是不可分解地结合在一起的。按照这种理论，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是资产阶级所以有力量剥削劳动，有力量将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命令强加于社会共同体的政治事务的管理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看来只是它的经济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只要这种力量存在，就决不会有民主——单纯的政治民主必然是冒牌货——另一方面，消灭了这种权力，就会同时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并实现“人民的统治”。

当然，这种论点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正因为它是根

据马克思主义图式的诸名词的定义逻辑地——事实上是同义反复地——推论出来的，它不得不分享后者的命运，特别不得不分享“人剥削人”的学说的命运。^①不久我就要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更现实的关于社会主义集团和民主信条间的关系的分析。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更为现实的关于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和民主本身间的关系的理论，即关于可能独立于愿望和口号之外的，存在于我们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秩序和民主政府的作用方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探索民主的本性。可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求立即加以澄清。

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的理想。但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那么讲究使它实现的方法的。革命和专政这些字眼屹然呈现在圣书的纸面上使我们感到刺目，许多现代社会主义者更直言不讳地证实，他们不反对用暴力和恐怖去打开社会主义天堂的大门，暴力和恐怖有助于较民主的改变信仰的手段。马克思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无疑可以被解释得使他在民主主义者眼中是清白无辜的。本书第一篇已经表明了，他的关于革命和进化的观点怎样可以调和起来。革命不一定意味着少数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顽抗的人民的企图；革命也许不过是指，通过废制那些热中于保存旧制度的集团所控制的旧制度的方法来撤除那些违反人民意志的障碍物。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作相同的解释。为了辩护，我还可再次指出《共产党宣言》有关段落中的措词，在那里马克思讲到“一步一步”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东西，讲到阶级差别在“发展过程中”的消失——这些词句虽然也强调了“暴力”，看来仍然是指

^① 个人的和集团的权力是不能用纯粹经济名词来下定义的——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此所作的定义那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论点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理由。

一个通常所了解的民主的意义所包含的程序而言的^①。

但是这种解释的根据并非完全没有怀疑余地的，因为这简直把著名的社会革命和同样著名的专政，归结为打算点燃人们的想象之火的花言巧语的宣传词令。许多曾是马克思及门弟子和自称为马克思门徒的社会主义者抱着与此不同的看法。根据比我更懂得法律的真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见和我诵读多少卷《新时代》所得的印象，我必须承认，如果马克思不得不作出选择，他大概会把社会主义放在遵守民主程序之上。

在这情况下，无疑他会和他身后那么多人所做的一样，宣布他实际上并没有乖离真正的民主道路，因为为使真正的民主主义复活，清除窒息民主的资本主义乌烟瘴气是必要的。现在对民主的信仰者来说，遵守民主程序一事的重要性显然随着这里争论的问题的重要性而增加了。因此，民主程序的遵守决不需要用一切的保证来作比社会根本改造时期更为谨慎的守护和更为小心的捍卫了。谁要是放松了这种必要性，谁要是接受坦率的非民主的程序，或某种用非民主的手段保证形式上的民主决定的方法，由此就可以作出结论，证明他把别的东西评价得高于民主。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不论他根据其他理由可以怎样赞成任何这类社会重建，他还是可以认为这是从根败坏了的社会重建。试图强迫人民接受据信为美好灿烂但是他们并不真正要求的事物——即使我们可以预料当他们体验到它的结果以后，他们会喜欢它的——这就是反民主主义信仰的真正标志。如果不民主的行为是实现真正民主的唯一手段，那末为了实现真正民主这个独一无二的目的而犯下的不民主的行为，能不能算作例外，这是要由诡辩学家来决定的。即使

① 在第二十五章中我将回过头来谈马克思本人是怎样看民主问题的。

承认了这样的例外，这还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案例，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大概可以采用民主的方法获得成功的时候，正是它实际上可望成功的时候。

可是，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任何主张在过渡时期内搁置民主的议论，都为规避一切责任提供了大好机会。这种暂时的安排，很可能延长到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对于在胜利的革命中确立他们地位的统治集团来说，尽有一切手段，可以无限期地延长它们，或者采用毫无民主的实质的民主形式。

II. 社会主义各党的记录

当我们检查一下社会主义各党的记录时，对于他们所说的他们始终拥护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

首先，存在着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由一个居于少数地位且不给任何政党以任何机会的党统治着。这个党的代表们，集合在他们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恭听很告，不经过任何我们所说的讨论就全场一致地通过了各种决议。他们以下述建议结束了会议（一如官方所说）：“俄罗斯人民〔？〕以对列宁斯大林的党和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我们时代最崇高的文件所概括了的伟大计划，并将毫不动摇地完成它”，还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在伟大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这类东西，加上单一候选人的选举，辅之以威吓性质的审讯、葛杯乌*的方法，无疑可以构成“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如果指

① 我不懂俄文。上引文字是从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报纸忠实地翻译过来的，谁要是根据俄文版提出异议，概所欢迎，虽然这份德文报纸当然是不能发表未经当局完全批准的任何东西的。

* GPU，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缩写。——译注

派一个相当的意义给这个名词的话——但是这恰恰是大多数美国人从民主这个名词所理解不了的意义。

可是，至少在本质上和原则上，这个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巴伐利亚尤其是以匈牙利为其舞台的这种类型的短命创作也是如此。无疑，现在还存在着一些社会主义集团，它们直到今天还一贯地保持着我国所谓的**民主主义理想**，它们包括，例如，英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多数，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由诺尔曼·托马斯先生领导的美国党和流亡中的德国诸集团。根据他们的立场也和根据观察家的立场一样，不禁要否认俄国的体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至少就民主主义问题而言，认为这是一种失常状态。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除了是“我们所喜欢的社会主义”而外，它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因此，这种说法除承认事实上存在着一些不能得到一切社会主义者（其间也包括着非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忠诚拥护的社会主义形式而外，还会有什么意义？社会主义政体可以是非民主主义的，这确实是无可否认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已知道的，社会主义的可以列入定义的特色，根据纯粹逻辑面言并不包含任何关于政治程序的东西在内。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唯一的疑问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是民主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是民主的。

其次，那些一贯拥护民主信仰的社会主义集团，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去改宗任何其他信仰。他们生活在强烈愤恨不民主的言论和作风的环境之中，事实上也总是厌恶工团主义者的环境之中。在某些场合中，他们有一切理由赞助庇护了他们和他们的活动的民主主义原则。在另一些场合中，他们的大多数满足于民主主义在其前进途中所许诺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结果。不难想象，比如说英国或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表现出严重的反民主主义

倾向的征兆时，他们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同时也觉得，他们的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负责任的职位，正在缓慢地自动地落到他们头上。当职位来到时，职位也满足了他们。这样看来，他们之声称忠实于民主主义，不过是做了始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他们的政策诚然没有使列宁高兴，但这不足以证明假使列宁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在德国，党发展得更好，但是直到1918年为止，社会主义者当政的道路似乎是封闭着的，他们当时面对着一个强大而敌对的国家，曾不得不托庇于资产阶级同情者和最多不过是半社会主义的工会之下，那时他们乖离民主信条的自由更少，因为他们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等于把自己交到敌人手里去。^①对他们来说，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种应有的慎重态度。

但是，第三，得出了有利结论的考验的事例，为数极少，说服力也不强。^②按某种意义来说，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机会作选择，它决定赞成民主主义，并且（好象这是民主主义信仰的证据）残忍而有力地镇压了共产主义者，但是，党因此分裂了。党从它的左翼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脱党者比留在党内者更有权利而不是更少权利要求社会主义的肩章。何况，留在党内的人中有许多人虽屈服于党的纪律之下，却是不赞成党的。而许多赞成的人之所以赞成，不过因为，至少自1919年夏季开始，采取更激进的（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就是反民主）路线时成功的机会已经很少，尤其是，当时柏林的左倾政策，即使不会立刻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也意味着来因兰和迈因以南地区严重的脱党的危险。最后，对多数派说来，起码对

① 这些局势，在第五篇中将作更充分的讨论。

② 这里的讨论，局限于社会主义各党在国内政治方面的态度。他们和工会关于非社会主义者或非会员工人的实际作法，当然更少说服力。

党内的工会成员说来，民主给了他们真正关心的一切东西，包括官职在内。他们无疑得和天主教中央党分赃。但是这笔买卖是双方满意的。不久，社会主义者真的变成吵吵嚷嚷的民主主义者了。可是，这是一个赞同反民主主义信条的反对派起来反对他们的时候的事情。

我不打算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出来的责任感，或者甚至谴责他们坐在阁部的舒适的安乐椅上的那种怡然自得之感。后者是共同的人性上的弱点，前者则完全应归功于他们，本书末篇我还要设法表明这一点。但是要引用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程序的不可动摇的忠诚的证据那就不免有些乐观了。我也想不到任何更好的考验的事例——除非我们真的同意接受俄国和匈牙利的事例，两者都呈现出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采取民主主义手段去夺取政权的不可能性的严酷的结合。奥地利的事例可以作为我们的困难的绝妙证明，由于奥地利党领导集团（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常的威望，所以这个事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之上。在1918年和1919年，那时事情还没有象不久以后变成的那样成为自卫的问题，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确实是坚持民主主义的。但是在独占政权似乎做得到的那几个月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的立场并不是毫不暧昧的。这时，弗里茨·艾德勒称多数决定原则为“算术上的偶然”（Zufall der Arithmetik）的拜物教，还有许多人对民主主义的程序规则耸耸肩膀。可是这些人是正规的党员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当布尔什维主义统治着匈牙利的时候，选择哪一条路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任何人如果不明白党的意向并不是由下列公式拙劣地表现出来的：“我们并不特别嗜好必得向左转〔等于采用苏维埃方法〕的前途，但是如果我们非向左转不可，那么我们将全体向左转”，^①那么他就不能研究那个时代。这种对国家的

一般局势和对党的危险的估计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结论也是如此。可是不论在估计和结论中，都看不出什么显著的对民主原则的热烈的效忠。他们最后改宗了。但改宗并不来自忏悔，而是匈牙利反革命的结果。

请不要认为我在控诉社会主义者不诚实，或者认为我想把他们提出来并把他们嘲笑为恶劣的民主主义者或无原则的权谋家或机会主义者。我完全相信，尽管他们的先知中的某些人耽溺于幼稚的马基维利主义，他们的大多数基本上一直是和别人一样忠实于他们的职务的。此外，我不相信社会斗争中有什么不诚实可言，因为人们最后总会去思考他们不得不思考的东西，思考他们在不断表白的东西的。至于说到民主主义，那么大概社会主义诸党不会比任何其他政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者；事情不过是，如果、当时、以及不论什么时候民主主义能为自己的理想和利益效劳的时候，他们就拥护民主主义，否则就不拥护而已。为了免得读者吃惊，为了免得读者认为只有老奸巨滑的政治谋士才配有那么不道德的观点起见，我们将立即做一次心理实验，做一次同时会产生出我们探索民主主义本质的出发点的一次实验。

III. 一次心理实验

假定一个社会，按照能够满足读者的民主主义准则的办法，作出决议，迫害宗教异端。这不是一个幻想的例子。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欣然承认的各个民主主义社会共同体，曾在火刑柱上焚死异端——日内瓦共和国在加尔文时代这样做了——或者用我们的道

① 用平易的英语来说，这位杰出领袖之一的话的意思是，他们完全体会到在一个全然依赖资本主义强国供应食物，以及法意军队实际上屯兵于她的国门的国家内，上演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冒着怎样的风险，但是，如果来自俄国（经由匈牙利）的压力变得太大的时候，他们不会分裂他们的党，而会带领整个牧群投向布尔什维克的营垒。

德准则所不能同情的方法迫害他们——殖民地时代的马萨诸塞人可以为例。这种类型的事例，如果发生于非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失为妥当的事例。因为相信在专制政体下面民主主义程序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相信专制君主决不愿意按照人民的意志行动，或决不会容纳人民的意志，这是天真烂漫的想法。只要专制君主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制度，人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例如，至少早期的对基督徒的迫害确实是为罗马的舆论所认可的，可以推测，当时的罗马如果是纯粹民主主义的罗马，迫害大概也不会缓和一些。^①

猎捕巫女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是从群众的灵魂本身之中成长出来的，决不是教士和君主的穷凶极恶的发明，正相反，只要教士和君主觉得力量足够就立刻会镇压它。天主教会确实曾经惩办过巫术。可是我们如果把实际上采用过的惩办巫术的手段和对付异端——在罗马这是它的本行业务——的手段比较一下，我们立即会发生这样的印象，在巫术这件事上面，与其说教皇煽动了舆论，不如说他是屈从了舆论。耶稣会士反对巫女猎捕的斗争，最初并不成功。到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这就是说，大陆上君主专制制度完全确立起来的时候——政府的禁令才最后占了上风。象玛丽亚·铁里萨女皇那样强有力的统治者所用来禁止巫女猎捕

① 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塞当纽斯在他的《尼禄传》（《凯撒传》第六篇）中，首先谈到尼禄在位时的那些行为，他，塞当纽斯认为，一部分是无可非难的，一部分甚至是值得赞赏的（*partim nulla reprehensione, partim etiam non mediocri lauda digni*）然后谈到他的非行（*probra ac scelera*）。他不把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列在第二个题目下面而是列在第一个题目下面，列在一系列毋宁说是有功的行政措施之中（*afflicti supplicii christiani, genus hominum superstitionis novae ac malefice*）。没有理由认为塞当纽斯不是表达了人民的意见（并且，可以推论为人民的意志）。事实上，猜猜尼禄的动机是要取悦人民，并不是远离事实的。

的罕见的谨慎办法，清楚地表明了，她懂得她是在和她的人民的意志作战。

最后，我们来选择一个与现代的问题有些关系的例子，反闪族主义，在相对于总人口而言犹太人占可观比例的大多数国家中，这是所有群众态度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在现代，这种倾向在资本主义进化的合理化影响之下的一部分已经垮台了，但是还剩下足够的分量，足以保证任何一个想救助于这种倾向的政治家大得入望。在我们时代中，除直率的社会主义以外的大多数反资本主义运动，事实上已经学会了这一手。可是在中世纪，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是由于教会和君主们的保护是并不过分的，教会和君主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庇护了犹太人，最后还解放了他们。^①

现在来做我们的实验。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流放到用民主方法实行基督徒迫害，焚烧巫女和屠杀犹太人的一个假想国家内。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这些行为是按民主程序的规则决定的而赞成它们。但是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赞成产生这些结果的民主宪法本身，而不赞成可以避免这些结果的不民主宪法？如果我们不，我们就和，认为资本主义比巫女猎捕更坏，为了镇压它不惜接受不民主的方法的热烈的社会主义者们做得恰恰一样。就这一点而论，我们是和他们在同一条船上的最热烈的民主主义者把这么一些最终的理想和利益放在民主主义之上，他之所以宣告自己对民主的不可调和的忠诚，正是因为他深信民主会保证诸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正义，正派的府政等理想和利益。

① 教皇们的保护态度，可以教皇通谕《虽然犹太人》(1120)为例，加里克土司二世的继任者们之再三重申这个通谕，既证明了这种政策的继续，也证明了它所遭到的抵抗。至于君主们的保护态度，只要指出放逐或屠杀犹太人意味着失掉他们必不可少的收入，我们就不难理解君主们为什么要采取保护犹太人的态度了。

为什么？理由用不着到远处去找。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本身是不足以成为目的，不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主会产生出怎么样的决定。谁想要为民主主义下定义，这一点必须成为出发点。

不论民主的方法具有什么特异的色彩，我们刚才粗略看过的诸历史实例教给我们关于民主方法的几件事情，这些事情极关重要，有必要再次清楚地加以说明。

第一，这些例子足以排除向刚才陈述的命题——民主既是一种政治方法，那它就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决不是目的——挑战的何任企图。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异议，即作为一个逻辑问题，这样的方法可以成为绝对的理想或终极的价值。可以。无疑地可以设想，有人会认为，不管民主程序在一定历史制度中力争要完成的事情怎样罪大恶极和愚不可及，人民的意志一定会占上风，或者，除非按照民主原则所批准的方法，人民的意志无论如何是不能反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把他们说成人民而说成暴民，用某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向它的罪恶和愚蠢作战，似乎要自然得多。

其次，如果我们同意，无条件地忠诚于民主只能来自无条件地忠诚于指望民主为之效劳的某些利益或理想，那么我们的例子也就排除了这样的反对论调：虽然民主也许不是一种天生的绝对理想，可是由于它必然、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为我们要无条件为之奋斗和殉身的某些利益或理想效劳，因此它还是绝对理想的一个替身。这显然是不正确的。^①民主总是和任何其他政治方法一样，产生出同样的结果，或者促进同样的利益或同样的理想。这样，理

^① 认为民主主义总会比专制主义更好地保卫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特别不确实的。请从一切审讯中最有名的那次为证。按照犹太人的立场来说，彼拉多确实是专制

智地效忠于民主不仅以某种超理性的价值图式为其必要条件，也要以能够指望民主在其间按照我们认可的方法起作用的某些社会状态为其必要条件。不考虑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局势^①而作出的关于民主的作用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当然也是反民主的论点。

这些，毕竟是十分明显的道理。任何人决不会感到惊异，更不会为之而震动。因为它和任何既定局势下民主信念的热诚或尊严毫无关系。懂得自己的信念只有相对的妥当性，却依旧毫不畏缩地坚持这种信念，这正是文明人有别于野蛮人之处。

IV. 定义的探索

我们有了一个开始考察的出发点。但是，我们还望不见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民主和社会主义间的关系的定义。有几个发端性质的困难，仍然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查阅亚里士多德的书对我们不会有多大帮助；他是用民主这个词，来指他的关于秩序井然的共和国的理想的一个分支的。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赋予**政治方法**这个名词的意义，我们的困难也许会有一线解决希望。它指一个国家用以作出决定的方法。我们借助于指出这些决定是由谁作出和怎样作出的，应能说明这种方法的特征。如果把“作出决定”的意思和“统治”的意思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把民主的定义规定为**由人民来统治**。难道这还不够明确么？

不够明确，因为它所包含的意义，多得和“人民”（demos，罗马

政体的代表者。但是他试图保卫自由。他屈服在民主主义之下了。（典出圣经新约，耶稣受难的故事。——译注）

① 见下第23章。

的 *populus*) 这个概念的一切可能的定义以及“治统”(kratein) 这个概念的一切可能的定义间的诸组合数目一样多, 因为这些定义并不是离开关于民主主义的论证而独立存在的。说到第一个概念, 宪法意义上的 *populus* 的可以全部排除奴隶, 部分地排除其他居民; 法律可以承认从奴隶到完全公民甚至到特权公民之间的各式各样的身分。尽管有法律上的歧视, 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时代认为他们自己是人民^①。

我们当然可以说, 民主社会是没有这种歧视的社会, 至少是在公共事务诸如参政权方面没有这种歧视的社会。但是, 第一, 确实有些国家实行了我们提到过的这类歧视, 却仍然显示出通常和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特征。第二, 这样的歧视决不会完全没有。例如,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怎样民主, 都不把投票权扩大到规定的年龄以下。可是, 如果追究这种限制的理论根据, 我们发现它也适用于不定数量的规定年龄以上的居民。如果低于选举年令的人不许投票, 我们也不能把因为同样原因或类似原因而不许另外一些人投票的国家称做不民主的国家。注意, 我们观察家是否承认把总人口中一部分人排斥在外的理由或规则是妥当的, 和当前的问题毫不相干; 在这里有关系的只是, 这个社会承认它们。也不能反对这样的说法: 虽然这可以适用于因个人条件不够(例如“成年年令”)而作出的不让人投票的规定, 但不适用于因与理智地使用投票权的能力毫无关系的原因。而作出的不让大批人投票的规

^① 例如参看伏尔泰在他的《关于英吉利民族的信》(1733年出版于英国, 重印第一版, 彼得·戴维斯书局出版, 1926年, 49页)中所作的定义: “人数最多的, 最有用的, 甚至最善良的, 因而是人类中最可尊敬的部分, 包括研究法律和科学的人, 商人、工匠, 一句话, 一切并非暴君的人; 这就是, 那些被称为人民的人。”现时“人民”大概是指“群众”的意思, 但是伏尔泰的概念, 差不多和我国宪法关于人民的规定完全一致。

定。因为合格与否是一个意见和程度的问题。什么叫做合格，必须由某种规章加以规定。人们可以并不糊涂也毫不伪善地认为合格与否，应当以一个人能否自食其力为标准。在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社会内，可以认为——又是并不糊涂也毫不伪善地认为——背教者是不合格的，在反女权的社会内也可以对女性采取同样的态度。有种族意识的民族可以把合格与否和种族考虑^①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重复说一次，突出之点不在于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各式各样不合格或其中任何一种怎样想法。突出之点是，只要我们对这些或类似的问题的看法是妥当的，那末根据经济地位、宗教、性别等理由而规定关于无资格投票的条文就可以和我们大家认为和民主并不矛盾的关于无资格投票的规定处于同等地位。我们诚然可以驳斥它们。但是，如果我们要驳斥它们，我们应该按照健全的逻辑，来驳斥那些关于财产、宗教、性别、种族等的重要性的理论，而不应该把这些社会叫做不民主的社会。举例来说，不论我们怎样给民主下定义，宗教热诚确实和民主是不矛盾的。但是有一种类型的宗教态度把异端看得比疯子还坏。那么，是否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应该把异端和疯子一样看待，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决定呢？^②难道我们必须让每一个人民（populus）自己来作出定义吗？

这个无法逃避的结论，常常由于把额外的一些假定引进民主过程的理论而被躲闪过去了，有几个这样的假定将在下两章中加

① 因此美国人不许东方人，德国人不许犹太人取得公民权；在美国南部，黑人也往往被剥夺投票权。

② 对布尔什维克说来，每一个非布尔什维克属于同一范畴。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统治这件事本身，不足以使我们有权称苏维埃共和国为不民主的国家。只当布尔什维克党本身被不民主地统率着的时候，很明显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才有权这样称它。

以讨论。当前,我们只要注意这一点,即这个结论已经把我们的道路上的尘雾清除了不少。尤其是,它透露出来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和自由的关系,必然比我们平素相信的要错综复杂得多。

讨论到民主概念的第二个要素即**统治** (kratein)的时候,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困难。任何“统治”的本质及其作用方法总是难于说明的。法律上的权力决不能保证使用这种权力的能力,但是它们是重要的支持,同时也是束缚。传统的威望常能起不少作用,但决不是万能的;个人的成功,和部分独立于个人成功之外的个人权势,作用于制度模式中的法律成分和传统成分并受到它们的反作用。从来没有一个君主、独裁者、或寡头集团是专制的。他们的统治不仅被国家局势中各种情况所支配,也受到和某部分人民一起行动和某一部分融洽相处中立另一部分压伏其余部分的必要性的支配。而且,这样做时可以采取的方法几乎是无限多的,每一种方法将决定,对实施这种方法的国家而言,或对科学的观察家而言,一定的正式的制度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把君主政治说成仿佛是指一种明确的事物,那就是半瓶醋式的知识。但如果进行统治的是人民,那么不论对人民下什么样的定义,总还要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从技术上说,“人民”怎么能够统治?

有一类事例不发生这个问题,至少这个问题并不尖锐。在结构简单的小而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内^①,不会有大的不一致的事情,可以设想凡是组成了宪法上规定的人民的一切个人实际上全都参予了立法和行政的一切事务。即在这类事例中,仍旧会剩下某些困难,以致集体行为心理学家仍然要说到领导权,广告术和偏离通俗的民主理想的其他来源等等。但是即令有这些情形,在说到社会

^① 人数的少和人民在地域上的集中是主要的。文化上的原始和结构上的简单较为次要,但它们大大便利了民主主义行使它的职能。

共同体或人民的意志或行为，——说到民治——时，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如果人民全体肉体地出席于例如希腊的城邦（polis）会议或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进行辩论因而达到政治决定的话。后者，有时称为“直接民主”，事实上是许多政治理论家用作理论出发点的例子。

在其他一切情况下，我们的问题确会发生，但是假如我们准备丢掉民治而代之以人民认可的统治，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处理。为了要这么做，要说的话就多了。我们通常在民主这个问题所主张的许多命题，对于获得了人民大多数，或者说得更妥当一些，获得了它们人民的一切阶级的大多数的普遍的效忠的政府来说，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这尤其适用于通常和民主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优点：人的尊严，由于觉得政治事务大体上符合于他们自己认为的事情该怎样办的观念而来的满足之感，政策和舆论的协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态度和合作态度，政府信赖一般群众对它的尊敬和支持——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对我们许多人说来似乎是民主的真正精义的东西，都能十分满意地被人民认可的政府这个概念所包括无遗。而且，既然十分明显，除“直接民主”的事例外，作为人民的人民实际上决不能统治或管理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下这个定义的理由似乎是完备的了。

我们依然不能接受它。例子有的是——也许它们是历史事例中的多数——有受命于天的独裁的专制君主政体，有各种非专制类型的君主政体，有贵族的和财阀的寡头统治，按正常情形而言，它们获得了一切阶级人民的压倒多数的无疑问的常常是热烈的拥护，而且，考虑到他们的环境条件，它们很漂亮地保障了我们大多数人所信为民主方法所应保障的东西。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有必要承认进入这些事例的大量民主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的——要

素。为纯粹的形式崇拜，尤其为纯粹的口头词令找到这样一付解毒剂也确实令人快意之举。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接受了这种说法我们就会损失掉我们要验明的现象。因为，这种说法把民主政治并到了某种更广泛的，包括了分明具有非民主主义色彩的各种政治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里面去。

可是我们的失败教会了我们一件事。这就是，在“直接”民主之外，还存在着人民之参加到管理、影响、控制真正在统治着的人们的这项业务中去的无限多的可能的形式。在这中间，没有一种形式，尤其是没有一种行得通的形式，具有任何明显的，或排它的，可以描述为民治的权利，如果这个字眼用于它的本来意义的话。如果要把其间的任何一种形式称为民政，那只是因为一种武断的习俗把这种意义规定为具有“统治”这个词的意义的缘故。当然，这样的习俗当然总是可能的：人民从未真正统治过，但是他们总是可以被定义弄得他们象是在统治。

演进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确实打算提供这种可以把某种实在的或理想的统治形式和民政的意识形态联结起来的定义。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会给人以有力的印象是不难理解的。那时候，至少在西欧各国，受命于天的权威的盛装正在从王权身上急剧地脱落下来^①——过程的开始当然早得多——作为一个道德原则，也作为一个解释得通的原则的人民的意志或人民的主权就显然成了已经准备要丢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这种特殊的天赐恩惠，却不打算什么也没有的那种心理状态的最容易接受的代用品。

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法律学家为了找出一种可以把这个至

^① 费尔默爵士的《君权论》(1680年出版)可以看作英国政治哲学中君权神授学说的最后一个重要解释。

上公理和现存政治制度协调起来的工具，搜遍了理论工地上的杂物库。这个杂物库实质上提供了的东西，就是臣属于君主的虚构的契约，据说有主权的人民通过这项契约已把自己的自由和主权廉价出卖掉了、并把自己隶属于君主的虚构的契约，^①或者虚构成分不亚于此的那些契约，通过这种契约，有主权的人民把权力或权力的某些部分交给挑选出来的代表。不管这种办法对某些实际目的多么有用，但对我们来说它是绝对没有价值的。甚至从法律立场来说，它们也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为要使委任和代表这些名词具有意义，就必须不是指个别公民——这是中世纪采邑的学说——而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必须这样来设想，即整体的人民把它们的权力托交给，比如说某个有资格代表它的议会。但是，在法律上说来，可以委托代表或被代表的，只有（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各个个人。例如，派遣代表出席 1774 年起在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所谓的“独立国会”——的美洲诸殖民地或州，事实上是由它们的代表代表着的。但是这些殖民地或州的人民却未被代表，因为作为人民的人民没有法律上的人格：说，它把权力委托给一个议会，或它让一个议会来代表它，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意义的。^②那么一个议会到底是什么东西？答案不需要到遥远的地方去找：它是一个国家机构，和政府、法庭一模一样。如果议会完全代表人民，那它必须在另一种意义上做这件事，意义何在，还有待发现。

① 这些契约是纯粹法律上的虚构。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六至十二世纪时广泛实行的，自由业主自愿地或通过契约使自己隶属于中世纪的领主。自由业主承认领主的管辖权，并担负某些经济上的义务。他抛弃了他作为一个完全自由人的身分。他所换到的是领主的保护和其他的好处。

② 同样，描述一个公诉案为“人民对某某人”的案件是没有法律意义的。起诉的法人是国家。

可是,这些关于人民主权和委托、代表的“理论”,反映着超乎意识形态上的假设和法律技术之上的某些东西。它们补足了关于国家的社会学或社会哲学,这一社会学或社会哲学是在十八世纪末,部分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希腊理论的复活的影响下,部分在当时事变的影响^①下形成并达到了它的最高峰,并确实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虽然下面这样的一般说法决不是妥当的,或严格正确的,我想按照通常的方法冒险地把它描述为在根本上是合理主义、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于这个目的和适当的手段具有明晰的理解能力的——或能够接受那可以使人得到明晰的理解能力的教育的——一个人的幸福,(用快乐主义的名词下定义的)被人设想为生活的意义,私人行动和政治行动的崇高原则。这种早期资本主义产物的社会学或社会哲学,也可以用约翰·穆勒引入的名词,功利主义来称呼它。按照这种社会学,符合于这个原则的行为不仅是唯一合理唯一正当的,事实上也是唯一“自然”的。这个命题,是本来很不相同的边沁的理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桥梁——边沁和卢梭这两个名字,对我们在这里只好留下不谈的一些问题而言,是可以用做指路标的。

如果,这样极端的简略,并不妨碍读者了解我的论点,这种哲学和民主主义这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很清楚的了。首先,这种哲学显然产生出了关于国家的性质和国家所以要存在的目的

^① 在英国,这一点特别明显,尤以对洛克为然。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完全是在一般论证为伪装下反对詹姆士二世,而为负责“光荣革命”的他的辉格党朋友们辩护。这说明了一种推理方式成功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实践上的涵义,它本来是毫不足取的。政府的目的是人民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意义在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又是人们“进入社会”的目的。为了这种目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订出一份服从共同权威的“原始契约”。契约被破坏了,财产和自由受到了威胁,抵抗就是正当的——坦率地说,如果辉格党贵族和伦敦商人们认为如此时,抵抗就是正当的。

的理论。其次，由于它强调了合理主义和快乐主义的个人和他的道德上的自律，看来它能够教给人们治理国家并达到这些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政治方法——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它为对**人民的意志**（一般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的信仰，和对那总结了为后来以**哲学激进派**^①著名于世的那批作家认为的民主的全部意义的下列劝告的信仰提供了看来象是一个合理的基础。这个劝告是：教育人民并让他们自由地投票。

反对这种解释的批评，作为开始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反对十八世纪唯理主义的总的反动的一部分，几乎立即就发生了。不论我们对通常所称的**浪漫主义**的功过评价如何，它确实表达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总的历史进化过程的较深刻的了解，因而揭示了功利主义，和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的某些根本错误。较晚的历史、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对两者实际上都是毁灭性的，到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一个研究社会过程的学者会推荐两者中的任何一种的了。但是看来虽然很奇怪，人们在这个理论已被粉碎之后，却还老是继续按照这个理论行事。理论愈证明为站不住脚，它却更完整地支配着官场的词藻和政治家的辩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下一章中对我们所称的**民主的古典学说**作一次讨论的原因。

但是没有一种制度、作风、或信仰，是与在任何时候为了支持它而被提出来的理论共存亡的。民主也不例外。事实上，要建立一种考虑到群众性行动和公众精神的一切现实性的关于民主程序的理论是并不困难的。这个理论将在第二十二章中提出，那时，我们终将能够说民主可望在社会主义秩序下变成怎么一个样子。

① 要知道大体的方向，可特别参考肯特：《哲学上的激进派》；瓦拉斯：《弗兰西斯·普莱斯的生平》，斯蒂芬：《英国的功利主义者》。

第二十一章 古典的民主学说

1. 共同的幸福和人民的意志

十八世纪的民主哲学可用下述定义来说明：民主方法是这样一种达到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民通过选举将集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的幸福。让我们来阐明这种哲学的涵义。

那时有人认为既然如此，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幸福**，这是政策的指路明灯，规定它的意义总是简而易行的，每个正常的人通过合理的论证都能看见它。因此看不见它是不能原谅的，而且事实上如果除了无知——这是可以消除的——愚蠢和反社会利益而外，还存在着不明白它的人的话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此外，这种共同的幸福意味着对于一切疑问的明确的回答，所以，每一件社会事实和所采取的方法或应采取的方法，可以毫不含糊地分为“好”“坏”二类。所以，全部人民至少在原则上必须同意，也存在着人民的**共同的意志**（等于一切有理性的人的意志），这是确切无误地和共同的幸福，或共同的利益，或福利，或快乐结合在一起的。除去愚蠢和邪恶的利益而外，可能产生意见的不一致或反对意见的存在的唯一事情是，达到那几乎所有的人都共同的目标的速度的意见上的分歧。社会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意识到这个目的，知道他或她自己的意向，辨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积极负责地为促进前者 and 反对后者而采取行动，就这样，社会的全部成员共同在一起管理着他们的公共事务。

某些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特别的资质和技术，这是确实的，因

此该把这些事务委托给具有这种资质和技术的专家们。可是这并不影响原则，因为这些专家的行动，恰恰和一个医生为了实现他的病人要治好病的意志一样，只不过在实现人民的意志。在任何规模的社会内，尤其在出现了分工的社会内，为了要使每个公民在管理或统治上尽他的一分责任，要求他在每个问题上和别的公民们接触是很不方便的，这也是确实的。因此，只为各个公民保留最重要的决定，让他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比如说经由公民投票——其余的事，由他们指定的一个委员会来处理——一个代表会议或议会，其成员经由普遍投票选举，这样应该更为方便。我们知道这个委员会或代表会议不能代表法律意义上的人民，但在某种较少技术性的意义上可以代表它——它将表达、反映或代表选民的意志。这个委员会很大，还是为了方便起见，它可以分为若干较小的委员会，分别负责公共事务的不同部门。最后，在这些较小的委员会中还有一个总委员会，主要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称为内阁或政府，可能有一个总书记或替罪羊为其首脑，这就是所谓总理。^①

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政治理论所作的——或它所隐含的——一切假定，民主就真的取得了某种毫不含糊的意义，除了怎样付之实行而外，应该是什么问题也没有的了。此外，只要忘掉几个逻辑上的疑惧，我们就有可能补上一句话：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制度不仅是一切设想得到的制度中最好的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去考虑别种制度。可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假定是那么多的事实的陈述，如果我们要得出结论，每一项陈述都应该得到证明。反驳倒是十分容易的。

① 关于一个内阁部长的职能的官方理论，事实上认为部长的任务是做到在他的部内人民的意志得以贯彻。

首先，不存在什么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通过理性论证的力量能够同意的被出色地决定的共同的幸福那样的东西。这主要不是因为某些人也许要求共同的幸福以外的东西，而是由于，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的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样一个更为根本性的事实。这一事实，功利主义者由于对人的价值标准的眼界的狭隘性，所以是看不见它的，可是它使许多原则性的问题发生了裂缝而且是理性的论证无法予以弥合的裂缝，因为终极的价值——我们关于生命和社会应该是些什么的概念——是超乎纯粹逻辑的范围之外的。裂缝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妥协而弥合起来，在有些情况下却不行。说“我们要求这个国家武装到它的牙齿，为我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战斗，不惜打遍全球”的美国人，和说“我们要求这个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服务人类的唯一途径”的美国人，面对着终极价值的无法克服的分歧，妥协只能是双方的残废和堕落。

其次，即使假定存在着充分明确的共同的幸福——例如功利主义者的经济上的最大限度的满足^①——并且证明为能被全体所接受，这也并不意味着各种问题都能得到同等明确的解答。这些争论中各种意见分歧，也许会扩大到足以产生出关于终极目的本身的“根本”冲突本来会产生出来的大多数结果。例如，以当前的满足和未来的满足之间的争论为中心的诸问题而言，甚至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为中心的诸问题而言，即使每个公民都改宗了功利主义之后，仍旧只能悬而不决。“健康”大概是一切

^① “最大的快乐”的意义本身就值得严重怀疑。但是，即使这种怀疑可以除去，即使某个人民集团的经济满足的总和可以具有明确的意义，它的极大值仍会相对于一定的境遇和价值标准而有所不同，按照民主主义的方法，它们也许是不易变更和不能调和的。

人都渴望的，但是人们仍然会不同意种牛痘和结扎输精管。如此等等。

民主学说的功利主义祖师们之所以未能见到这件事情的全部重要性，完全因为他们谁也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资产阶级社会习惯的任何本质上的变化。他们看得见的，只是十八世纪铁器贩子的世界。

但是，第三，根据前面二个命题，功利主义者据为己有的人民意志或一般意志这个特殊概念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概念是以谁都辨认得出来的，被独特决定的共同的幸福为其前提条件的功利主义者不象浪漫主义者，他们完全不懂那个赋有它自己的意志的半神秘的实体——法律学中的历史学派曾大大利用过的“人民的灵魂”的。他们坦率地从个人意志推演出他们的人民意志。而除非存在着一个中心，存在着至少在长期间中所有的个人意志都被吸引到这个重心上去的共同的幸福这样的重心，我们将得不到这个特殊类型的“天然的”一般意志。功利主义者的重心，一方面把个人意志一致化，又想借理智的讨论把个人意志锻制成人民意志，另一方面，授予人民意志以古典民主信条所要求的排它的道德上的尊严。这个信条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崇拜作为人民意志的人民意志，而是以这种意志的“天然”目的——这也是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据所批准了的——的某个假定为基础的。当关于共同幸福的观念对我们说来已无法理解时，这种性质的一般意志的存在和它的尊严也就完蛋了。于是，古典学说的两根台柱都不可避免地会碎成片片。

II. 人民意志和个人意志

当然，不管以上论点对于人民意志这个特殊概念的反驳如何

具有决定性，它并不阻止我们试图建立起另一个更现实的概念。我不想怀疑，当我们说到民族意志时浮现在我们心中的这种社会心理学事实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分析它们，确是解决民主问题所必须的。可是不执着这个名词总要好些，因为这个名词会使我们看不清楚，只要我们把人民意志和它的功利主义涵义切断了关系我们就不是在建立同一切东西的另一种理论，而是在建立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的理论。我们有一切理由提高警惕，注意民主保卫者——这些民主的保卫者虽在愈积愈多的证据压力之下，接受民主过程中各种事实，一面却试图用从十八世纪的瓶中取来的圣油涂到这个过程产生出来的结果上面去——路上横亘着的各种陷阱。

虽然人们还可以说，某种共同意志或舆论是从“民主过程”中个人和集团的境遇，意志，影响力量，作用和反作用的无限错综中浮现出来的，但是这个结论不仅缺乏理性的一致，也得不到理性的批准。所谓缺乏理性的一致，意思是，虽然从分析的立场看来，民主过程并不仅仅是混乱——对分析者来说凡是解释得通的原则所得到的结果都不是混乱——可是除非出于偶然，结论本身会是无意义的——举例说，它不能有实现任何明确目的或明确理想时所会有的那种意义。所谓得不到理性的批准，意思是，这种意志既然不再全等于任何“幸福”，所以为了使结论具有道德上的尊严，就必须退而据守无条件地信任民主政府这种政府形式，而这种信任，在原则上是与〔这种政府形式所得一切〕结果是否合乎我们心意完全无关的。正如我们所已知道的，把这种立场当做自己的立场是不容易的。但是，即使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抛弃掉了功利主义的共同的幸福，仍然会在我们手里留下一大堆困难。

特别是，我们实际上还必须把完全不现实的独立性和理智的

品格归属于个人的意志。如果我们要主张公民的意志本身是理当尊重的政治因素,首先必须要存在着这种意志。这就是说,必须要有某些超乎漫不关心地徘徊于道听途说的口号和错误印象之间的含混的冲动以上的东西。每个人应该明确地知道他所要挺身为之奋斗的是些什么东西。这种明确的意志,应该以正确地观察、解释每个人能够直接得知的事实,和批判地取舍选择他不能直接知道的事实的情报的才能为它的工具。最后,还应该能够从这种明确的意志和已经证实的事实中,按照逻辑推论的规则得出足以解决特殊问题的清楚的、敏捷的结论——此外,除了要有这么高的一般效率水平而外,每个人的意见,还应该大体上被认为和任何人的意见一样,没有触目的荒诞悖谬之处。^①所有这一切,是这个模范公民必须不受诸压力集团和宣传^②的影响而身体力行的,因为强加

^① 这说明了古典的民主学说和通俗的民主信念两皆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特质。稍晚,我们将要指出,平等怎样才能取得道德的基本要求的身分。这个基本要求不管按照什么可以设想的意义,作为人的本性的事实的陈述而言不可能是正确的。人们认识到这点之后常常把这个基本要求本身重行表述为“机会平等”的意思。但是即使机会这个词所固有的困难可以置之不顾,这种表述对我们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如果每个人的投票权在问题的决定上应该具有同样的重量,在政治行为中所需要的就是实在的而不是潜在的实践能力的平等。

应该顺便指出,民主词令一向是培育人们把任何性质的不平等和“非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工具,而非正义则是不成功的人们的心理模式中的重要要素,也是利用不成功的人的政治家的武器库中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最奇妙的表现之一是雅典的贝壳放逐法,或者宁肯说是贝壳放逐法有时候的实际用法。贝壳放逐的意思是用公民投票的方法放逐某个人,不一定有什么特定的理由;它有时候用作驱逐某个人们觉得“作用超过一个人”的令人不安的杰出的公民的方法。

^② 宣传这个词,这里是按它的最初的意义使用的,而不是按照现时正在急剧取得的,暗示着这样定义的意义使用的;宣传是从任何我们不喜欢的某种来源中发出来的陈述。我推测这个名词的起源,应该追溯到讨论布天主教信仰的红衣主教委员会的名称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传教事务主教会议——译注〕因此这个名词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堕落的意义,特别是,它并不隐含着任何对于事实的歪曲。例

于选民头上的各种意志和结论，对民主过程的终极根据而言显然是不适宜的。这样的疑问，即，为了使民主主义得以运行，这些条件究竟能否满足到所需的程度，不应该以卤莽的肯定或同样卤莽的否定来回答，而只能在吃力地鉴别一大堆互相矛盾的证据中作出回答。

可是在着手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希望能够弄明白读者对于前面早已提出过的另一个论点是否完全赞成。为此，我要重复指出，即使各个公民的意见和要求是完全明确完全独立的，即使这些明确而独立的意志是民主过程赖以运行的根据，即使每个人以理想的理性和敏捷性表示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也并不必然能够推定，以个别人的意志为原料的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政治决定，代表了按照任何有说服力的意义，可以称为人民的意志的那种东西。我们不仅可以设想，当各个人的意志分歧多端的时候，由个人意志产生出来的政治决定不会符合于“人民实在所要求的東西”，而且实际上也很可能就是如此。也不能说，这些决定虽然不是他们恰好要求的决定，至少也能得到某种“公平的折衷”。可以有公平的折衷。碰巧得到公平折衷的最大机会是，争论的性质属于容许分成等级的数量问题，例如当谁都赞成开支若干款项用作失业救济费的时候，失业救济费应该开支多少这一类的问题。但是质量性质的争论，例如要不要迫害异端，要不要进行一次战争之类，全体人民虽持不同理由，却很可能同等厌恶达到的结论，而一个非民主主义机构强加的决定，却可以证明为人民更能接受的决定。

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按照我的理解，我可以把拿破仑当首席执行官时期的统治描述为军事独裁统治。当时最紧迫的政治上

如，一个人可以为某种科学方法作宣传。它不过指，按某种观点提示论据和论证，用以影响人们的行动和意见，使之趋向某个明确的方向的意思。

的需要是，可以肃清大革命和执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并把和平带给千万人灵魂的一种宗教上的和解。他以几次神妙的动作做成了这件事，其顶点是和教皇的协议（1801）和“体制法令”*（1802），借此他和解了和解不了的各方，给宗教礼拜以恰当的自由，同时强固地确保了国家的权威。他也重新组织并在财政上支援了法国天主教会，解决了“宪法”教士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在以极小的磨擦使新体制走上轨道方面得到了极度的成功。如果认为人民的确要求某种明确的东西的那种主张是正确的话，这个安排提供了历史上最好的例子。谁若知道当时法国阶级结构的话，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明显的，下面的事实也使它获得了充分的证据：这个教会政策对执政官统治所享有的几乎是绝对的威望作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很难看出，用民主方法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反教会的感情还没有完全死灭，这种感情也决不限于被击溃了的雅各宾党人。具有这种信念的人民或他们的领袖，不可能和解到这种程度。^①天平的另一端，愤怒的天主教情绪的强烈浪潮，正在稳步地获得力量。怀有这种情绪的人，以及依靠这些人的好意的领袖们，不可能停止在拿破仑的限度内；特别是，当时他们还正在注意事情的发展动向，还没有什么退让的动机，因而他们不可能如此坚定地 and 教皇办交涉。比谁都迫切地需要他们的教士，教堂和教仪的农民，又因十分自然地害怕一旦教士——尤其主教们——再次上了马，必将威胁到革命时期的土地问题的解决而被完全吓倒了。如果企图民主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能的结果是解不开的死结，或酿成不断增长的愤怒的无止境的斗争。但是拿破仑之所以有力量合理地解决了它，分

* 关于法国天主教会新体制的法令。——译注

① 立法机构虽然害怕，事实上完全没有能在这个政策上支持拿破仑。他的几个最亲信的将军反对这种政策。

明因为所有不能自愿放弃他们自己论点的集团，同时是能够也愿意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安排的。

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①如果作出了在长期内证明能满足一般人民的成果的话，那末古典的民主学说所设想的**民事政府**和**民治政府**的检验标准往往是不够用的。

III. 人在政治方面的本性

还有几点有待答复，即关于投票人意志的明确性和独立性，他的观察事实的能力和解释事实的能力，他之从以上两者清楚而敏捷地作出合理推论的能力的问题。这个题目属于社会心理学中可题为政治中人的本性^②的一章，

在上世纪的后半，作为某种同质单位的人的个性的观念，和作为行动的主要动力的明确意志的观念，已在不断凋谢之中——甚至在里博和弗洛伊德时代之前就已如此。这些观念特别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受重视，因为我们行为中的超理性和非理性的要素的重要性在那里得到愈来愈大的注意，帕累托的《心灵与社会》可以

① 其他的例子，事实上也可以从拿破仑的实践中引证而得。他是一个专制君主，只要不涉及到他的皇朝利益和国外政策，不论在什么时候他努力去做的只是他没想为人民所渴望和所需要的事。这就是他给欧根·波哈耐的信中给后者提出的关于治理北意大利问题的忠告的意思。

② 这是瓦拉斯，最可爱的英国急进派人士之一所著的坦率而有魅力的书的目标。不管在他以后人们关于这个题目所写的一切，尤其是所有那些详细的实例研究使现在的问题能够远为清晰易见，这本书还是可以推荐为政治心理学最好的入门书。可是作者以可敬的诚实说明了反对无批判地接受古典学说的理由之后，他没有能够得出来已经很显著的结论。他正确地坚持一种精神上的科学态度的必要性，同时因为他责备布赖斯勋爵在他的关于美洲联邦的书中自己承认“严峻地”决定从幻灭的事实云雾中看到一些蓝天，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瓦提斯似乎是在主张，一个气象学家一开始就坚持他看到了某些蓝天。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们对这些应该怎么说？可是，在这本书的建设性部分中，他多半仍然采取这样的立场。

为证。在积累起来的反对理性的假设的许多证据的来源中，我只要指出下列二种。

一种是——尽管有更精细的晚近的著作——仍然可以和勒·蓬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他是群集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foules*)^①的奠基人，起码是这门学科的第一个有效的解释者。由于表明了，虽然过分强调了，在群集影响下人类行为的现实——特别是在激动状态下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婴儿病和犯罪倾向的勃发——他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这样他就在人的本性这幅图画上捶下了狠狠的一拳，埋葬了古典的民主学说，埋葬了关于革命的民主的传说。关于勒·蓬的结论的事实根据的狭隘性无疑是有许多话可说的，例如，它并不完全适合于英国的或英美的群集群众的正常行为。批评者们，尤其是社会心理学这个分支的涵义不合他们心意的批评者们，并非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脆弱的论点。但在另一方面，必定不要忘掉，群集心理现象决不限于拉丁市镇狭隘街道上骚动的暴民。哪一个议会，哪一个委员会，由一打六十岁以上的将军们组成的哪一次军事会议，不论其表现形态如何和缓，都呈现出某些群集暴民情况下如此触目的特色，特别是，减低了的责任感，较低水平的思考力，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大的敏感性。此外，这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限于许多人民的自然结合。报纸读者，广播听众，政党党员，即使并不肉体上集结在一起，也都是可怕地容易把他们激成心理学上的群众，进入某

① 德文名词，*massenpsychologie* 暗示了一个警告，群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rowds*)一定不能和群众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masses*)相混。前者并不一定带有任何阶级色彩，它本身和，比如说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觉的研究毫无关系。

种颠狂状态，企图在这种状态下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

我要谈到的另一种正在幻灭中的证据来源要卑贱得多——它淌不出什么血，它能淌出来的只有无聊。凡努力去更仔细地观察事实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发现，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凡的过程中，消费者是不能完全遵从经济学教科书所表达的观念的。一方面他们的欲望毫不明确，他们根据这些欲望作出的行动毫不合理也毫不敏捷。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屈服于广告术和其他劝说方法的影响，生产者常常好象是在指挥他们而不是在受他们的指挥。成功的广告技术特别具有启发性。确实也经常有向理性的呼吁。但是不断反复的纯粹的直陈比理性的论述收效更大；收效同样大的是，采取足以唤起一种全然超理性的，并且往往是性的性质的愉快的联想，并使这种联想结晶化的袭击形式的向下意识的直接攻击。

结论虽然是明显的，作出结论却必须小心。因为在再三反复的例行事务的决定过程中，个人总是服从于有利的和不利的经验的健康面合理的影响。他也处于不成问题的相对简单的动机和利益影响之下，这些动机和利益不过偶然受到刺激的干扰。从历史上来说，消费者之要得到靴子的愿望，至少部分地，是由于生产者提供吸引人的靴样并为之宣传而形成的；但是在任何一定时刻上，这是一种真正的欲望，它的明确性超乎“一般靴子”之上，它的漫长的实验过程，清除了本来可能围绕在它周围的大部分非理性。^①何

^① 在上面的文字中，非理性的意义是，未能合理根据某一愿望而行动。这和观察家意见中的愿望本身的合理性无关。指出这点是重要的，因为经济学家在估计消费者的非理性的程度时，有时候因混淆了两者而夸张了它。所以，一个工厂女工的漂亮衣服，在教授看来似乎是非理性行为的表示，对此，除广告员的艺术而外，没有其他的解释。实际上，这也许正是她所全心全意渴望得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她为服装所支付的钱，在上述意义上也许是非常合理的。

况消费者处于这些简单动机的刺激之下，也学会了依据某些不偏不倚的专家们的劝告而行动(住宅、汽车)，而在其他问题上他们自己也变成了专家。说主妇们在食物、熟悉的家庭用品、衣服等方面很容易受愚弄的，那完全是不正确的。而且，正如每个推销员从经验中所知道的，大部分主妇具有坚持她们所需东西的确切品种的一套办法。

在生产者方面说，这一点当然更为明显。无疑，一个制造家也许是个懒汉，是一个蹩脚的机会判断者，或者才不胜任，但是有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改造他或消灭他的。泰勒主义所根据的事实就是：人可以在几千年间从事简单的手工操作，可是操作得没有效率。但是在我们挑选出来观察的随便哪种水平的工业或商业活动中^①，尽可能合理地行动的意向，或是对合理性的不断施加的压力，都不能成为严重的疑问。

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决定中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小圈子里，各个公民的心灵周围围绕着充分的现实感。粗略地说，它包括直接与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商业来往，他的嗜好，他的朋友和敌人，他的市镇或选区，他的阶级，教会，工会或他是其活动分子的其他社会集团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他能够亲身观察得到的，在报纸所告诉他的事情以外他所熟悉的事情，他所能够直接影响直接管理的一切事情，就是由于一系列的活动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的直接关系诱导他对之发展出来了某种责任感的那些事情。

再说一遍，思想和行动上的明确性和合理性^②不能由这种对

① 这种水准，当然不仅因时代和地点而有所区别，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以及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和阶级间也有区别。合理性的普遍的模式是不存在的。

② 思想的合理性和行动的合理性是截然不相同的。思想的合理性，并不总能保

人对事的熟悉,或由这种现实感或责任感来保证。为此,还需要相当多的常常未能满足的条件。例如,一代又一代的人,也许因为卫生上的不合理行为而受苦受难,可是依然不能把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有害习惯联系起来。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无论客观的后果怎样有规则,当然不能产生出主观上的经验。因此,事实证明人类是极难懂得感染和传染病之间的关系的:在我们看来事实所指明的这种关系似乎清楚到误解不了的程度;但是直到十八世纪末,医生们在隔离病人,不使人民受到麻疹和天花之类传染病的折磨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不论什么时候,当不仅因为无能,还要加上不愿承认因果关系,或当某些利益集团奋力反对承认它们的时候,可以想象事情一定会比这更坏。

尽管如此,并且尽管所有一切无可避免的限制,就每个人来说,在他的远较宽广的视野范围内,也还有一个较为狭隘的领域——范围的大小在不同集团和不同个人间是十分不一样的,其间的界限与其说是一条线,毋宁说是一条宽阔的地带——两者间的区别在于现实感、熟悉感和责任感的不同。正是在这较为狭隘的领域内,寄泊着相对明确的个人意志。这里足以引起我们惊讶的地方,也许是这种意志的非理性、狭隘和自私;也许不是谁都看得明白,为什么当事情涉及政治决定时我们应该向这样一些神龛叩头礼拜,更不明白我们何以非得让他们一个顶一个,不许其中任何一个顶几个。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叩头礼拜,我们至少不会看到神

证行动的合理性。行动的合理性,在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情形下,也不管一个人正确表述他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的本领如何,还是可以表现出来的。观察家,尤其是使用会谈方法和质问方法的观察家,常常忽略这一点,因此对行动的非理性的重要程度,常常持有某种夸大了的观念。这是我们那么频繁地遇到的过高估计的另一种来源。

是空的。^①

但是，当我们离开教育我们训练我们的家庭和业务上的日常生活的关怀时，这种比较明确的意志和比较合理的行为并不突然消失。在公共事务领域内，比起其他部分来，有些部分是公民心灵更易到达的。首先，在地方行政方面这是确实的。可是，甚至在这里，我们看出辨别事实的能力、行动的准备程度和责任感都减弱了。我们大家都认得那位先生——他常常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他说地方行政他不在行，他对他该办的事情冷淡地耸耸肩膀，他说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这些事情受罪还不如死了的好。凡宣传个别投票人或纳税人的责任心怀着劝告的心情的崇高的公民，总会发现这个投票人并不觉得对地方政治家所做的事负有责任感。应该知道，在一个并不太大，人身接触并不感觉困难的社会共同体内，乡土观念可以是“使民主”起作用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而市镇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和制造厂的问题又具有类似的性质。懂得后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懂得前者。制造家、食品商或职工，用不着跨出他的世界就能对街道清洁或市政厅等具有某种合理的可以说得通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

第二，有许多全国性问题，如此直接而又如此明白地关涉到各个人和集团，以致可以唤起十分真实而明确的意志。最重要的例

^① 应该注意，当我说到明确的真正的意志时，我并不想把它们提升为一切种类社会分析的终极根据的高度。当然，它们本身是社会过程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我所指的不过是，它们在某种特定目的的分析中可以用为根据，譬如说，经济学家从任何瞬间为“既定”的，不需要每次作进一步分析的口味、欲望推演出价格来的时候，存在心中的那样的根据。同样，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到任何瞬间都是既定的，无关于制造它们的企图的那种真正的明确的意志，虽然我们承认，这些真正的意志是过去环境影响的结果，包括宣传的影响的结果在内。真正的意志和制造出来的意志（见后段）间的界线是一条困难的界线，不能应用于一切事例和一切目的。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指出对我们目的有用的显著的常识性质的事例，也就足够了。

子是涉及个别投票人或诸投票人集团的眼前的和个人的金钱利益的问题,例如直接税、保护关税、白银政策等等。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全部投票人对任何这类机会的反应总是敏捷而合理的。但是古典的民主学说显然不能从这类合理性的表现上得到什么好处。投票人证明自己是这类问题的不高明的并且实际上是腐化的裁判员^①,他们甚至常常证明自己是他们本身的长期利益的不高明的裁判员,因为政治上说得响亮的约许只能是短期的约许,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理性只是短期的合理性。

可是,当我们离开家庭和营业公事房的私人关怀更远,走进和私人关怀缺少直接的明白无误的联系的全国和国际事务领域之内时,个人的意志,情况的掌握,推论的方法,就都无法满足古典学说的需要了。最打动了我,在我看来似乎是困难的核心所在的是现实感^②的完全丧失。大的政治问题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在正常状态下是和业余时间的各种兴趣(还够不上称为嗜好)和不负责任的闲扯相等的。这些事情似乎那么遥远,到底它们和一笔买卖不一样;危险也许不见得会成为事实,即使免不了也不见得会那么严重;人们觉得自己活动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之中。

这种现实感的减弱,不仅由于责任感的减弱,也由于有效意志的不存在。当然,谁都有自己的座右铭,谁都有自己的希望、梦想和牢骚,尤其是谁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

① 为什么边沁主义者那么完全看不到这一点,理由在于他们不考虑现代资本主义下面群众腐化的可能性。他们在政治理论中犯下了他们在经济理论中同样的错误,他们设定“人民”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最好的裁判员,个人利益又必然会和总起来的全民利益相一致——他们并不为作出这样的假设而感到后悔。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当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所哲学化了的,实际上虽不是在意向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从省俭的国家所得的利益,超过任何从直接贿赂取得的利益。

② 威廉·詹姆斯的“辛辣的现实感”。这个论点的中肯,瓦拉斯曾特别强调过。

并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志——有目的的、负责任的行为的心理上的对应物。事实上，对于考虑国家事务的公民来说，这样的意志并无活动余地，也不能从这样的意志中发展出什么工作任务来。他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委员会——〔由〕全国〔投票人组成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这就是为什么他打桥牌所费的精力，多于为熟谙某个政治问题所费的精力的原因。^①

责任感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又说明了普通公民在国内和国外政策上的无知和判断力的缺乏，这样的事情如果也引起了我们的震惊的话，那么受过教育和在非政治性质的事业生涯中得到过成功的人的情形，又甚于在卑微处境中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情形。情报是丰富的，是俯拾即是的。但是看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应该惊讶。我们只要比较一个律师对待他经办案件的案情的态度，和他对待报上关于政治事实的陈述的态度，就可以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在一种情形下，这位律师由于他在明确的专门职业利益的刺激下付出了长年的有目的的劳动，所以有资格来评价他的论据的价值；在某种不亚于这种刺激的刺激之下，他于是集中他的知识、智慧和意志于他所经办案件的内容之中。在另一种情形下，他并不辛辛苦苦地去养成这种能力；他不注意吸收情报，不注意把他的得心应手的批判的大炮应用在情报上；他对冗长复杂的论证觉得不耐烦。这一切表明了，如果没有直接责任产生出来的主动精神，在大量情报面前（不论它如何完整正

^① 如果我们问问自己为什么在桥牌桌上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和清醒头脑比非政治家间的政治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这样问一下将有助于澄清问题的。在桥牌桌上我们有明确的任务：有大家必须遵守的规则；成功和失败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在桥牌桌上之所以不能有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因为每一次错误不仅立刻看得出来，而且立刻要自食其果。这些条件由于在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中是无法满足的，从而表明了他所以对政治缺乏他在职业中表现出来的一切机敏和判断力的原因。

确),无知还将公然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值得赞美的努力,即在提供情报之外,经过讲座、训练班、讨论会等方法,教导人们如何利用情报的这种努力面前,无知还是公然存在着。结果并不等于零。但是结果是不大的。人民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这样,那位典型公民一旦踏进政治领域,就会跌落到某种精神活动的低水平上去了。如果按照他的实际利益范围内的标准来衡量,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论证方法和分析方法是幼稚的。他又成了原始人了。他的思想变成联想式的和感情用事的了。^①而这又必然带来二种极关重要的后果。

第一,即使没有什么政治集团试图影响他,这位典型公民在政治事务上还会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他在政治上应用的推理过程的软弱性,和对所得结论的有效逻辑控制的不存在,本身就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何况,光是因为他“精神不好”,他也可以松弛他的通常的道德水准,偶然也可以向黑暗的冲动让让步,私生活的条件本来是有助于他抑制这些冲动的。说到他的推论和结论的智慧和理性,那能拙劣得和他在一次暴怒的迸发中所表现的一样。这些,使他更难于按照正确的比例看待事物,甚至难得在一个时间看到事物的一个以上的方面。从而,如果一旦他不再和他平常一样地漠不关心,表现出古典的民主学说所设定的明确意志来的话,他说不定会变得比平常更为非理性,更不负责任。在某些危急存亡时期,这对于他的国家也许是致命的。^②

① 见第12章。

② 这种迸发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怀疑它们的真诚性是可能的。分析将表明,在很多例子中它们是被某个集团的行动所诱导的,而不是从人民中天然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进入我们即将讨论的(第二级)现象。由于我自己的体会,我相信这种真诚性的例子是有的。但是我不能肯定,更彻底的分析不会在它的底层透露出某些心理技术的影响。

可是，其次，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愈弱，理性批判和个人经验、个人责任的理智影响愈不存在，趁水混摸鱼的诸集团的机会愈多。这些集团也许是由职业政治家、某些经济利益的代表者、这种那种理想主义者、或者只对控制政治戏剧或在这场戏剧中买空卖空有兴趣的人们所组成的。这些集团的社会学对当前的论证是不重要的。唯一有关之点是，只要政治中人的本性还是象现在那种样子，它们就可以塑造出，甚至可以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创造出人民的意志来。在政治过程的分析中我们面临着的多半不是真诚的意志而是制造出来的意志。这种人工制造出来的事实，在现实中常常符合于古典学说中的一般意志的。在事情正是如此的范围内来说，人民意志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它的推动力。

制造争端的方法，以及制造人民对于争端的意志的方法，完全和商业广告方法相类似。我们找到了要接触下意识的这种同样的企图。我们找到了创造有利与不利联想的，理性成分愈少愈为有效的这种同样的技术。我们找到了这种同样的通词和缄默，同样的借反复主张来制造舆论的那种把戏，它的成功，完全以它在多大程度上回避了理性的论证，回避了惊醒人民的批判能力的危险而定。如此等等。不同之处不过是，所有这些技术在公共事务方面比在私人生活或职业生活中更无限广阔的活动余地。一个绝代佳人的画像在长期内将证明不足以维持一种坏纸烟的销路。在政治决定方面是没有什么同等有效的保障的。许多决定命运的重要决策，就其性质而言是公众不可能在其闲暇时间中以最低廉的成本来作实验的。就算这是可能的，照例判断是不象在纸烟这个事例中那么容易作出，因为它们的效果是更不容易解释的。

但是这类技术，也使自称向理性求爱的政治广告术的这类形式，败坏到商业广告术领域所完全不懂得的程度。对观察家说来，

当反理性的，或者起码是超理性的呼吁和牺牲者的无防御被重重包裹在论据和论证之中的时候，这种败坏影响可以看得格外清楚。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把有关政治问题的公正的情报以及从中推论出来的逻辑上正确结论传达给公众为什么如此困难，以及为什么这些政治事务的情报和论证只当它们和公民的先入为主的诸观念联得起来时才算“挂上了号”。可是，照例这些观念又都不够明确到足以决定特殊结论的程度。而且，既然它们本身是可以制造的，有效的政治论证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把现存意志的前提歪曲成为特殊形状的企图，而不仅仅是执行现存的意志，或帮助公民下决心的那种企图。

这样，凡真正被弄明白了的情报和论点，大概可以成为政治意图的奴仆了。既然人们为了他的理想或利益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说谎，我们可以指望，而且事实上我们发现，有效的情报几乎是搀了假的或者是经过了选择的^①，有效的政治推理，主要在于把某些命题提升为自明的公理并把其他命题打入冷宫；于是事情就归结为上而所指出过的心理技术了。读者如果认为我过于悲观，那么我想请他问问自己，他是不是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说过——或者他自己说过——这件那件讨厌的事情，一定不要公开去讲，或者，某种推理方向虽然是有根据的，却是要不得的。如果按照任何流行的准则来说完全是可敬的甚至是情操高尚的人们尚且要把自己调节到适合于这种作法，他们岂不由此表明了，他们所认为的人民意志的价值，或者甚至人民意志的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么？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②杰斐逊的人民毕竟比随便哪个

① 经过选择的情报，即使本身是正确的，也是打算用说真话的方法来说谎。

② 如果政治问题更频繁地由公民投票来决定，那就可能清楚表明出这种限度来。可以推测，政治家们是懂得为什么他们几乎老是要敌视这种制度的。

个人更聪敏这一格言，或者林肯的不可能“永久愚弄所有的人民”这一格言中是有真理的。但是这二种格言都以十分意味深长的方法强调事情的长期方面。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说，如有一定的时间，集体心理将演化出常常以其高度合理甚至以其精明刻薄打动我们的意见来。可是历史是由一连串可以完全改变事变进程的短期形势组成的。如果所有的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地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又如果这不是我们想要忘却就能忘却的例外事例，那么，事后诸葛亮式的常识就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事实，即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既未提出问题也未决定问题，正相反，决定他们命运的政治决策，在正常状态下是由别人为他们提出来并且为他们决定的。爱民主的人们比别人更有理由接受这种事实，更有理由洗雪他们的信条所受到的说他们的信条靠装假过日子的那种诽谤。

IV. 古典学说可以存在下去的理由

但是，如此明白违背事实的一种学说怎么能存在到现在，并且继续在人民心中和政府的正式用语中保持它的地位？反驳的论据是人所共知的，谁都以完全的坦率，甚至还常常以嘲笑式的坦率承认这些论据。理论的基础，功利主义的合理主义已经死灭了；没有人再把它当作一种正确的国家理论来接受它。虽然如此，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首先，虽然关于集体活动的古典学说可以得不到经验分析的结论的支持，它却有力地得到我们早已说到过的宗教信仰的联想的支持。这件事，乍看起来也许不太明显。功利主义的领袖们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领袖。事实上，他们相信自己是反宗教的，人们也几乎普遍地这样估量他们的。他们以他们思想中的不

含糊的非形而上学态度而自豪，他们对他们时代的宗教制度和宗教运动是十分不同情的。但是只要把他们所描绘的社会过程的图画再看一次，就可以发现它体现了新教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要素，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从这种信仰中推演出来的。对于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宗教的知识分子来说，功利主义信条提供了宗教的代用品。对于保持着他们宗教信仰的许多人来说，古典学说成为宗教的政治补足物。^①

这个学说当它转变成为宗教范畴的时候，它的性质完全变了——以它为基础的民主信念的性质也完全变了。再也用不着关于**共同幸福**和**终极价值**的逻辑上的顾虑了。所有这一切，都根据造物主（他的目的规定一切事物、制裁一切事物）的计划而为我们安排好了。从前看来不明确的东西或者没有推动力的东西，突然变得十分明确，十分有说服力了。以人民的呼声为例，它就是上帝的旨意。或以**平等**为例。它的真正的意义是拿不稳的，只要我们的思考限制在经验分析范围之内，那就很难找到什么合理的证据能把它提升为一个公理。但是在基督教教义内却含有某种强烈的平等要素。**救主**虽然死了，他并不歧视不同社会身分的一切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证实了各个人的灵魂的内在价值，这是不容许什么等级的一种价值。这岂不批准了——在我看来，这还是唯一的批准^②——“每个人顶一个，不准一个人顶几个”，这岂不是倾注了超尘世的意义到民主信条之中的一种批准，而且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到别种批准了么？这样的解释诚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

① 注意它和社会主义信仰的类似性。社会主义信仰对有些人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代用品，对另外一些人是补足物。

② 人们可以这样来反对：要给平等这个词附上某个普遍的意义也许是困难的，可是在多数事例中，如果不是在所有事例中，可以根据它的上下文的意义加以阐明。例如，我们也许可以根据葛底斯堡演说环境推定，林肯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而平

可是，在它解释得了的范围内，它似乎足以说明许多否则是解释不了的事实上也是无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它说明了信仰者对待批评的态度：这又和社会主义事例一样，根本不信，不仅被看作错误，也被认为有罪；它不仅惹起逻辑上的反驳，也惹起道德上的愤怒。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说明我们的问题，这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来推动民主时，民主就不再是象一架蒸气机或一种杀菌剂那样可以理智地加以讨论的某种纯粹的方法了。它确实变成了我从另一个角度曾认为不可能变成的东西，即某种理想，或者毋宁说事物的某种理想图式的一部分。民主这个词在可以变成一个人觉得亲切的一切东西的旗帜或象征，变成一个人所爱的关于他的国家的一切东西——不管这种感情是不是合理——的一面旗帜或一种象征。一方面，民主信仰中隐含的各式各样命题和政治中各种事实的关系到底怎样，对他来说就是不相干的，正如对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亚历山大六世的所作所为，怎么能和围绕在教皇宫殿周围的超自然的光轮对得起头来这样的疑问是不存在的一样。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民主主义者，当他们接受了带有大量平等友爱涵义的假设的时候，将也能以全部诚意接受几乎任何数额的、他自己的行为和地位也许也会牵连进去的偏离这些假设的东西上。这甚至不是不合逻辑的。光是和事实之间的距离，并不足以形成对于某种道德格言或神秘希望的反驳。

第二，有这样的事实，即古典民主的形式和格言，对许多国家

等的”这个命题不过是指同承认奴隶制度的法律中所隐含的不平等正好相对立的法律身分上的平等。这个意义应该是足够明确的了。但是，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个命题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有约束力的，又如果我们拒绝回答“因为每个人天生下来就和别的每一个人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只能乞援于基督教信仰所提供的神的旨意。可以设想，这个解答是隐含在“创造”这个词中间的。

说来是和他们的历史中的事变和发展相联系着的，这些事变和发展是最大多数人民热烈赞成的。凡是想要反对现存政体的人，不管这种反对的他们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基础如何，大概都会想要利用这种形式和格言的。^① 如果它得势了，又如果此后的发展证明它是令人满意的，那末这些形式就要在这个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扎下根去。

美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和反对君主的和贵族政治的英国的一次斗争密切关联着的。除去少数效忠派，美国人在格林维尔当政的时代，大概已经不再把英国君主看做他们的国王，把英国的贵族社会看做他们的贵族社会了。在独立战争中，他们曾对在他们的感情上和在事实上两方面都已变成干涉自己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的外国君主和外国贵族政治作战。但是从纷争的早期阶段起，他们就把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纷争的问题，以不可侵犯的人权的名义，按照古典民主主义一般原则，当作“人民”反对他们的“统治者”的问题了。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措词采用了这些原则。此后的巨大发展，吸引了也满足了大多数人民，从而似乎证实了这个国家的神圣文件所标榜的学说。

反抗者在执政集团的权力和成功的全盛时期是难得能得到胜利的。十九世纪前半期，宣扬民主的古典信条的反抗者兴起了，结局战胜了好些政府，其中有些——尤其在意大利——很明显处于衰败状态，并且已经变成了无能、残忍、和腐化的笑柄。这就自然而然地，虽然不是十分逻辑地增加了这种信条的信誉，何况比起这

^① 也许有人会认为，凡是公开要走上专制统治的反对党，大概是一个例外。但是，历史事实证明，甚至大多数专制统治也是使用民主方法崛起，并把它们的统治基础放在人民的承认之上的。凯撒不是被平民杀死的。但是杀死凯撒的贵族寡头们也使用民主主义的词令。

些政府所支持的蒙昧的迷信来，这种信条格外显出了它的好处。在这种环境下，民主革命就意味着自由和宽容的降临，民主信条意味着理性和改良的福音。肯定说，这种好处是势必要失掉的，民主学说和实践间的鸿沟是势必要暴露出来的。但是曙光的魅力消逝得很缓慢。

第三，一定不要忘记，在有些社会模式内，古典学说之适合于事实确实达到了充分近似的程度。前面已经指出过，许多小而原始的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它们，事实上是这个学说的作家们用来作为标本的。属于同样情形的，还有不是原始的，但是内部分化不严重，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的社会。瑞士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一个除了旅馆和银行之外，没有什么大的资本主义产业的农民世界中，可以争吵的事情太少了，公共政策的问题是那么简单而稳定，可以期望压倒的多数了解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如果我们作出结论说，在这些事例中古典学说近似于现实，那么我们还应该立刻加上一条：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古典的民主学说描述了作出有效的政治决定的方法，不过因为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有待决定而已。最后，我们可以再次用美国的事例，来表明，即使在一个大而高度分化，并且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决定的社会内，争执问题的毒刺如果由于有利的条件而被拔掉了的时候，古典学说有时看来也似乎适合于事实的。美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众心理所关心的主要是开发利用她的环境所提供的各种经济可能性。只要这项业务没有受到严重的干扰，对于以和霭的轻蔑对待政治家滑稽戏的普通公民来说，就没有什么根本上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可言。若干党派可以因为关税，白银、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善，或偶然和英国的争吵而兴奋起来。大部分人民不大注意那些事，除了那一次，即事实上带来了民族灾祸，即内战的那

次严重的^①不一致而外。

还有第四，政治家们当然赞赏能够阿谀人民且能为逃避责任，为以人民的名义压碎对方提供卓越机会的某种政治词令。

第二十二章 民主的另一个理论

1. 政治领导权的竞争

我认为大多数政治学者现在终于不得不接受前章中针对古典的民主学说所作的批评了。我也认为，他们中多数人已经同意或不久会同意接受另一种理论，它更忠实于生活，同时它拯救了民主方法的支持者用这个名词时所指的真正意义。这个理论可以和古典理论一样纳入一个简短的定义之中。

我们要记得，关于古典理论我们的主要困难集中在这样一个命题上：“人民”对于每个问题持有某种明确而合理的意见，他们——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通过选择将保证这种意见得到贯彻的“代表”使这个意见付诸实施。这样，代表的选择，对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言就是第二位的，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则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假定我们把这二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使选民对问题的决定退居第二位，而把选举出应该做决定的人作为它的首要的意义。换一种说法，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观点，即人民的作用是产生政府，或者产生出将要产生国务执行委员会^②

^① “执行”这个不诚实的词，实在指向了错误的方向。可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说营业公司的“执行者”时所指的意义使用这个词，它就不是错误的了，因为营业公司的执行者们所做的事，大部分是超乎“执行”股东意志之上的。

* 美国通例，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常务董事(managing director)等实际上的首脑都称为“执行者”(executive)。——译注

或政府的某种中介体。由此规定：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

对于这种观念的辩护和说明将要迅速表明，它在假设的似乎言之成理，和命题的站得住脚这二方面，都大大改进了民主过程的理论。

首先，我们得到了相当有效的一个规范，借此可以使民主政府区别于其他政府。我们已经知道，古典理论之所以在这一点上碰到困难，是因为凡是不能被说成是民主的——按照这个词的任何已被接受的用法——政府可以，而且在许多历史实例中已经同样漂亮地，或更漂亮地为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幸福效劳。现在我们处在稍为好一点的地位上了，因为我们决心强调一种**程序方法**，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容易证实的。^①

举一个例，象英国那样的议会君主政体可以满足民主方法的必要条件，因为君主实际上被约束为只能任命议会所要选举的人担任内阁官职。一个“立宪”君主政体没有资格被称为民主政体，因为选民和议会虽然具有议会君主政体下所能具有的一切其他权利，却缺乏强使他们所选的人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内阁部长们实质上 and 名义上都是君主的仆人，原则上君主可以撤消他们的任命，恰如他可以任命他们一样。这样的安排可以满足人民。选民可以经过投票反对任何更换内阁的建议，从而重新肯定这一事实。君主也许拥有那么高的威望，以致使他有力量击败对于最高职位的任何竞争。但是既然没有准备好使这种竞争发生效果的机器，所以这种事例不合于我们定义。

^① 可是，可以参看下面第四点。

其次，体现在这个定义中的理论，为恰当地承认领导权这一生动的事实，留下了我们所希望保留的全部余地。古典理论没有那么多做，但正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这等于抹煞了领导权。但是各个集体几乎完全是通过接受领导而行动的——这是实际上任何集体行动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比反射作用略胜一筹。凡是考虑了这一点的关于民主方法的运用及其结果的命题，就其更现实主义而言，势必比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命题无限地更富于现实性，这些命题决不会停止在执行一般意志上面，而将向表明这种一般意志怎样出头露面、或者怎样被替代或被捏造出来这个方面多走几步。我们前此所称为的**制造出来的意志**不再是我们虔诚地为它的不存在而祷告的一种越轨行为，从而只能是被关在理论门外的东西，它将登堂入室，而这原是它应有的权利。

可是，第三，就还存在全然是真正的集团意志而言——例如失业者要求得到失业救济的意志，或其他集团救助失业者的意志——我们的理论并不忽略它们。相反，正是现在，我们才有可能把它们真正扮演的角色规规矩矩地写上戏报。这些意志照例并不直接坚持自己的权利。纵令这些意志是强烈的明确的，它们常常在几十年中处于潜伏状态，直到某个政治领袖把它们唤醒过来，把它们变为政治因素，为止。政治家或者政治家的代理人借助于组织这些意志，激励它们，以及最后把适当的条款包括在他的竞争的纲领中来做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局部利益和舆论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产生出我们称之为政治形势的模式的方法，就用某种新而远为清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前面。

第四，在我们的理论当然并不比竞争领导权这个概念更为明确。这个概念显现出和经济学领域中的竞争概念相类似的困难，

把它和经济学中的竞争概念作比较也许是有用的。在经济生活中，竞争从来不缺乏，但是它又从来难得是完全的^①。同样，在政治生活中，总有某些争取人民忠诚的竞争，虽然也许不过是一种潜在的竞争。为了简化问题，我们把我们用来给民主下定义的这种对领导权的竞争，局限于为自由投票的自由竞争。我们所以认为这个定义是正确的，是因为民主主义看来意味着某种指导竞争性斗争的公认的方法，以及选举方法实际上是对任何规模的社会都适用的唯一方法。但是虽然这个定义排除了应该排除的^②其他保障领导权的方法，诸如经由军事暴动的竞争等，它却并不排除和经济现象中我们给贴上了“不公平”，“欺诈”之类的标签的竞争或竞争的限制惊人地相类似的事例。我们不能排除它们，因为如果这样作的话，我们就会落到某种全然非现实主义的理想中去。^③在这种并不存在的理想情况，以及一切和站住了脚的领袖的竞争都受到暴力阻止的情况之间，还有一连串变种，在其间，民主的统治方法渐次以无法觉察的步伐渐渐演变成为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而不希望哲学化，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规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伤。

第五，我们的理论，似乎足以澄清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所说的个人自由是指存在着一个其界限在历史上是变动不居的个人自治领域的话——没有哪个社会容忍绝对的自

① 在第二篇中，我们举了一些肇因于此的问题的例子。

② 它也排除了不应该排除的方法，例如，通过人民的缄默的接受，或者通过差不多是受命于天的选举而取得政治领导权。后者和投票选举间的区别不过是技术上的区别。但是前者，即使在现代政治中也并不十分重要；一个政党头领在他党内所掌握的权势，常常以缄默地接受他的领导权为基础。可是比较说来这是细节，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概略说明中是可以略而不谈的。

③ 和在经济领域中一样，某些限制是隐含在共同体的法律和道德原则中的。

由,即使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哪个社会把这个领域减缩为零——那么很清楚,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我们知道,民主方法并不一定比类似环境下别种政治方法能保证更大的个人自由。它很可以和周围的其他方法一样。但是两者间还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至少在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介绍自己给选民,因而具有竞争政治领导权的自由^①,在多数事例中,虽然不是在一切事例中,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讨论一切事情的自由。特别是,在正常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大量的出版自由。民主和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绝对严格而是可以窜改的。但是就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这种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同时,就两者的关系而论,也不过是这些。

第六,应该注意,我在使产生政府(直接产生,或经过一个中介体产生)成为选民的根本职能时,我意图把赶走这个政府的职能也包括在这句话里面。前者只意味着接受一个领袖或一群领袖,后者只意味着这种接受的撤消。这考虑到了读者可能忽视的一个要素。读者可能认为选民和选任政府一样也控制政府。但是既然在正常情况下选民除拒绝再选他们或再度选出支持他们的议会多数外不能以任何方法控制他们的政治领袖,那么把我们关于控制的观念按照我们定义中所指示的方法加以缩小,看来是适当的。偶然也有自发的、直接倾复政府或赶掉个别部长的剧变,或者逼迫他们作出某种方向的行动,但是这不仅是例外情况,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知道的,它是违背民主精神的。

第七,我们的理论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争论的老问题。谁接受古典的民主学说,从而相信民主主义方法能保证按照人民的意志

^① 这里所说的自由,和每个人有开办另一家纱厂的自由的意思是一样的。

去决定问题、制订政策，谁就必定会因下面的事实而觉得惊讶：纵使这种意志是无可否认地真实而明确，由简单多数作出的决定，在许多情况中歪曲了这种意志，而会不是贯彻了这种意志。多数人的意志显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人民”的意志。后者是一种镶嵌品，前者完全不能“代表”它。用定义把两者等同起来并没有解决问题。可是，比例代表制的各式各样计划的作者，却企图以此来真正的解决问题。

关于比例代表制的各种计划遭到了以实践理由为根据的反批评。事实很明显，比例代表制不仅给各种稀奇古怪的党派以出风头的机会，还可以阻扰民主产生有效的政府，从而证明了它在紧急时期是一种危险^①。但在我们作出结论说，民主原则如果被首尾一贯地贯彻下去，民主就会行不通之前，最好问问我们自己，民主原则是不是真正意味着比例代表制。事实上它并不如此。如果领导权的接受是选民投票的真正职能，比例代表制的赞成论就会由于它的前提不再有约束力而归于瓦解。因此，民主原则仅仅意味着，政府的统制手段应交给获得了比任何一个竞争的个人或集团更多的支持的那些人。这一点，反过来似乎又在民主方法的逻辑范围之内保证了多数决定的原则，虽然我们大概仍然可以根据这个逻辑范围之外的理由加以谴责。

II. 所应用的原则

我们现在来把上节列示了大纲的理论，根据各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动机的结构和运行的几个较为重要的特征来加以验证。

1. 如前所述，民主政体下选民投票的首要作用是产生政府。

^① 反对比例代表制的论点，已由希尔门教授在《民主政治的特洛伊木马》中巧妙地加以说明，该文载《社会研究季刊》，1938年，11月号。

这可以是选举一整套官员的意思。可是这种做法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特色，此后将略去不论。^①若只考虑全国性的政府，我们可以说，所谓产生政府，实践上就等于决定谁该是政府的领导者。^②和前面一样，我们将称他为总理。

只有一个民主政体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理的，这就是美国。^③

① 我之所以这样做，不过为了简化。这种现象完全适合我们的图式。

② 这不过是近似地正确而已。选民的投票在一切正常情形下确实会使承认一个人为领袖的某个集团掌握政权，但是这个集团照例也有携带本人自有的政治武器因而使领袖不得不给他安置适当位置的第二流、第三流领袖。这是应该马上承认的事实。

还有一点也决不可以忘掉。虽然有理由期望上升为最高指挥者的人一般应该是具有相当人身力量的人物，不管除此而外他还有什么本领——稍晚我们还要回到这点上来——不能由此推定事情一定如此。所以，“领袖”或“领导人”这个名词，不能用来表示被称做领袖的人必然拥有领袖才能，或者认为他们的确总能发挥个人领导作用。有一些政治形势有利于缺乏领袖才能（或其他资格）的人的上升，不利于强有力的个人树立起他的政治地位。从而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时可能是群龙无首的。但是谁都承认，这是一种病理状态，也是失败的典型的原因之一。

③ 我认为，我们可以不考虑选举人团。我所以称美国总统为总理。是因为我希望强调他的地位和其他民主政体中总理地位的根本上是类似的。但是我并不希望缩小其间的差别，虽然有些差别与其说是真的差别倒不如说是形式上的差别。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总统也履行了如法国总统的多半是礼仪上的职能。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不能解散议会——但是法国总理也不能。另一方面，他的地位比英国总理强固，因为他的领导权是和他任在议会中是否拥有多数毫无关系的——至少在法律上如此，因为事实上如果他没有这种多数他就会被击败。还有，他能够（几乎）任意任命和撤消内阁部长。后者很难称为部长（按这个词的英国意义），实际上并不超过“秘书”^{*}这个词的寻常所说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总统不仅是首席部长而且是唯一部长，除非我们能在英国内阁部长的职能和美国国会的行政权力的管理人的职能之间找出类似性来。

要解释和说明我国和任何其他使用民主方法的国家的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的特点是不难的。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将主要想到英国的模式，而把所有其他事例当作理论上重要程度不等的诸“偏离”看待，因为到现在为止，民主政府的逻辑，在英国实践中最完整地完成了它自己，虽然在它的法律形式上并不如此。

* 美国部长称 secretary，直译为秘书。——译注

在所有其他事例中，选民的投票并不直接产生政府，而是产生一个负有产生政府的任务的此后将称为议会^①的中介机构。从历史发展和运行上的便宜来说明这种制度的采用，或者不如说这种制度的演进，以及说明它在各种不同社会模式中所采取的各式各样的形式，大概是并不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是某种逻辑上的构想；它是自然成长的结果，它的微妙的意义和结果完全是公式化的学说所不能理解的，更不必说法律学说了。

那么，一个议会怎样产生政府呢？最简单明了的方法是选举政府，或者更现实地说，选举出总理，然后表决总理所提出的部长名单。这种方法用者极少。^②但它比任何其他方法更能显出程序的性质。此外，所有别种方法又都能还原为这种方法，因为成为总理的人在一切正常情形下，是议会当然会选出来的人。至于他在实际上接受任命的途径，如英国之由君主，在法国之由总统，在魏玛时期的普鲁士自由邦之由一个特别机构或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形式问题。

传统的英国做法是这样的。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通常都支配着下院的多数席位，因而能够对本党领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投不信任票，通过这种反面的方法，该党领袖就“被下院”指定为国务领导人。他从君主那里接受任命——“吻手”——向君主提出他的部长名单，内阁阁员名单是这个名单中的一部分。他列在名单中的，首先是几个党的元勋，他们得到应称为礼仪性质的职位；其次，几位二等领袖，总理打算要他们在下院作经常战斗的人，他们之所以

^① 请注意，前面我把议会的意义规定为国家的一个机构。虽然前面这样做只是由于形式（法律）逻辑上的理由，这个定义却特别适合于我们的民主方法的概念。因此议会议员是一种官职。

^② 例如，奥地利在1918年崩溃后就采用过这种方法。

获得垂青,半由于他们的积极的政治价值,半由于他们的可能搞麻烦事儿的价值;第三,某些新进人物,他延揽他们到迷人的官职圈子里去是为了“要下院普通议员一起来想办法”;有时还有第四,少数几个他认为对某些职务具有特别能力的人。^①但是,即使这样,这种做法在一切正常情形下也会产生出下院直接选举政府时所得到的同样的结果。读者也将看到,在象英国那样总理(在英国称为首相)实际上拥有解散议会(“诉诸全国”)权力的地方,只要选民支持他,即使由选民直接选举内阁,在某种程度上所得结果会接近于这种结果。^②这一点,可以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

2.1879年,当比肯斐尔德(狄斯累利)政府经过了以柏林会议的辉煌成功^③为其顶峰的恰当的六年执政之后,按照一切通常的打算,有资格期望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时,可是葛莱斯东突然以其

① 象有些人那样,悲叹于这种制度多么不重视对职务的胜任与否,这对当前的叙述所涉及的问题而言是不相干的;政治价值应作优先考虑,胜任与否只是附带的事,这是民主政府的本质,见下第二十三章。

② 如果象在法国那样总理没有这样的权力,议会里面的小党派就具有非常多的独立性,因此议会所接受的某个人也就是选民所接受的这种对应并行局面就会被削弱或破坏。这是议会政治这种客厅里的运动会搅成一团混乱的由来。从我们的立场来说,这是对于民主这架机器的原设计的偏离。普恩加兹具有相同的看法。

当然,这种局势英国也会发生。因为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精确地说,他“建议”君主解散下院的权力——如果碰上他的党的内层掀起反对他,或者大选的结果不会有机会加强他掌握议会的地位,这种权力就行使不了。这就是说,他在议会中的地位,也许比他在全国的地位更坚固(虽然他在议会中还是弱的)。当一个政府当权若干年之后,就会以某种有规则性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但在英国制度下,这种偏离原设计的状态不能延续很长的时间。

③ 我并不是指俄土战争所提出的问题的暂时解决,以及取得完全无用的塞浦路斯岛这二件事本身就是这类国务活动家风度的杰作。但我确是指,从国内政治的立场来说,正是这类炫目的成功,通常会满足普通公民的虚荣心,并会在好战的爱国主义气氛中大大加强政府未来的地位。事实上,一般意见都认为,如果狄斯累利从柏林一回国立即就解散议会,他本来是会取得胜利的。

一连串力量无可超越的演讲(米德洛锡要竞选)使国人惊醒过来,因为演讲那么成功地渲染了土耳其人的残暴,以致把他自己捧到了对他个人的普遍狂信的浪涛顶峰上去了。那个正式的政党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若干领袖事实上是不赞成的。葛莱斯东已经在几年前辞去了领袖职务而在单枪匹马地承担国家的重任。但当自由党趁这股势得到了压倒的胜利以后,谁都看得明白,他得重新被接受为党的领袖——不,应该说他的国家领导者的身分已经使他变成党的领袖,任何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他在荣华中执掌了政权。

现在,这个例子教给我们许多关于运用民主方法的课题。一开头,我们必须懂得,这个例子的独特之处只在于它的戏剧性质,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这是一个正常品种的长得特别大的标本。庇特父子,庇尔,帕麦斯顿,狄斯累利,坎贝尔·班纳曼和其他人的例子,和它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首先是总理的政治领导权问题。^①我们的例子表明了,它是由三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三者一定不能加以混淆,三者在每个事例中都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混合的情况决定了每一位总理的统治的性格。表面上,他是作为议会内的他的党的领导人而当了总理的。可是,一当他就任之后,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议会的领袖,直接地作为其成员的那一院的领袖,间接地也作为另一院的领

^① 这是英国办事方法的特点,即总理职务的存在,一直延迟到1907年,总理的名义出现于宫廷的官阶的前列时才正式承认。其实它和民主政府一样早已存在。可是,既然民主政治绝不是经过某个特殊的法令而实行的,而是作为广泛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缓慢演进而成的,所以即使要指出一个近似的生日或诞生的时期都是不容易的。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出现萌芽形态的事例。有人想要把这个制度定为始自威廉三世在位之时(他的地位,比本地统治者弱得多),似乎使这种观念生色不少。反对意见倒不那么强调当时英国还没有那样的“民主”——读者可以回忆到,我们并不是用参政程度的高下来给民主下定义的——而是认为,一方面萌芽性质的邓贝事例已在查

袖。这超过了官方的委婉措辞，也超过了他掌握住他自己的党的涵义。他能够影响别的党，也一样能影响别的党的个别成员，他也能惹起他们的反感，这对他成功的机会造成了很大的区别。在极端事例中，庇尔爵士的实践可作为最好的例证，他可以利用别的党逼迫他自己的党。最后，虽然在一切正常事例中他也是国家中的他的党的首脑，总理这个职务如果得到很好的发展的话，他在国家范围内所处的地位，将迥然不同于他作为党组织的首脑而自动取得的地位。他可以创造性地领导党的舆论——塑造它——最后上升为超越政党界线的舆论所造成的领导，上升为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党派舆论之外的全国领导。没有必要说明这种成功如何真正是个人性质的，这种政党外和议会外的立足点的重要性又怎样大。它把一根鞭子交到领袖手里，这根鞭子的挥舞可以把不自愿的和心怀贰志的追随者赶上队伍，虽然用得不得当时，鞭上的刺也会狠狠地刺伤挥舞鞭子的那支手。

理二世时代发生过，另一方面，威廉三世从未屈从于这种制度，而总是成功地把某些事情抓在自己手里。当然我们决不可以把总理和单纯的顾问混淆在一起，不管顾问们对他们的君主怎样有势力，不管他们如何有力地固守着这个国家权力中心——象蒙希留，马查林，或斯特拉福这样的人都是例子。安娜女王治下的高多芬和哈素，很清楚地是转变性质的事例。当时的人和以后的政治史家普遍承认的第一个首相是华尔波尔爵士。但是他和纽喀塞尔公爵（或他的兄弟丕尔汉，或二者联在一起），实际上直到歇尔本勋爵为止的所有一切领袖人物（包括老庇特，他即使在当外交大臣的时候，实质上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总理的定义〕的必要条件了）都缺少某种特点。第一个羽毛齐全的本本是小庇特。

指出这样一件事是饶有兴味的，当时人对华尔波尔爵士（以及在稍晚对卡迪蒙勋爵〔格林维尔伯爵〕），〔所任总理这个职务〕的看法和这里认为它是从豪门的组织中长出来的，但对民主政治极为重要的一个机构的看法是不同的。正相反，当时的舆论觉得这是一个最有害的肿瘤，它的成长是对全国福利和民主政治的威胁——“唯一部长”或“第一部长”是华尔波尔的敌人给华尔波尔起的骂人称号。这件事是意味深长的。这不仅说明了新制度通常会碰到的抵抗。它也说明了，这个制度被认为和古典的民主学说互不相容，因为我们意义上的政治领导权在古典学说中事实上是没有地位，从而一个总理的地位这种现实在古典学说中也是没有地位的。

这暗示了,给我们的命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在议会制度下产生一个政府的职能应交给议会。在正常情况下,议会确实决定谁该当总理,但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并不完全是自由的。它的决定,与其说是创议,毋宁说是接受。除去病态事例,如法国众议院,议员的愿望并不照例就是政府由以产生的那个过程的终极根据。议员们并不只受党员义务的约束。他们也被他们“选举”出来的那个人的驱策——被赶去完成“选举”的行为,恰如他们一旦将他“选举”出来之后还要受他的驱策一样。每匹马当然有脱缰的自由,它也并不总是高兴带上它的嚼口的。但是反叛或消极抵制领袖的领导,只能暴露正常关系。而这种正常关系正是民主方法的精义所在。葛莱斯东 1880 的个人成功,是对认为唯有议会才能创制政府和罢免政府的官方理论的答复。^①

3. 其次是内阁的性质和作用。^② 内阁是一个奇妙的两面性的

^① 葛莱斯东本人强烈地主张这种理论。1874,当他在选举中被击败时,他仍旧主张召集议会,因为他认为通过罢免政府的判决是议会责任。这当然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他以同样的方法倾心地表白对王权的无限敬意。一个又一个的传记作者对这位伟大的民主派领袖的这种谦恭态度感到惊讶。但是维多利亚女王确实比这些传记作家有更好的识别力,如果我们根据她在 1879 年以后对葛莱斯东表示的强烈的厌恶之情加以判断的话,传记家们把这种厌恶之情简单地归之于狄斯累利的有害影响。难道真的有必要指出,敬意的表白可以意味着不同的两件事吗?以苦心做作的谦恭态度对待他的妻子的人,并不照例就是以平等态度接受两性间友谊的人。事实上,谦恭态度正好是规避这种关系的手段。

^② 内阁的演化比总理职务的演化,更容易被可以掩盖一个制度的性质的变化的历史的连续性弄得暧昧不清。直到现在,英国内阁在法律上是枢密院的作业部分,枢密院在民主以前当然是时代政府的一个工具。但在这样的表层下面已发展出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机构。只要我们领会这一点,确定内阁出现日期,比找出总理职位出现的日期就要容易一些。虽然萌芽形态的内阁存在于查理二世时代(外交委员会部是一个,和邓波尔的实验联在一起的四人委员会又是一个),威廉三世时代辉格党的“秘密会议”是首揆的一个好候选人。从安娜女王在位时起,剩下来可以有不一致意见的,只有关于成员、成职能方面的一些不关重要的问题了。

东西，是议会和总理的联合产品。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总理选定内阁成员请求任命，议会接受名单，但是议会也影响总理的选择。从党的立场看，它是多多少少反映了党本身的结构的二级领袖们的集合物。从总理的立场看，它不仅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的集合物，也是各有自己利益和前途打算的党人的集合物——议会的一幅缩图。为了使这种结合能够形成并能够工作，将要变成内阁部长的人们必须下定决心——不一定出于热烈的爱——在X先生领导下服务，拥护X先生制订他的政纲，以便X先生的内阁同僚们不致于太频繁地感到要象官方辞令所说的“重新考虑他们的地位”，或者想来进行一次静坐罢工。这样，内阁——也适用于也包括不参加内阁的政治官员在内的较大的部——在民主过程中就有一种不同于总理、党、议会和选民的职能。这种中间领导体的职能是和——但决不是以此为基础——若干个部里的各内阁阁员所执行的日常业务相联系着的，他们之所以被任命到这些部里去，是为了使官僚主义发动机掌握在领导集团的手里。这和“竭力使人民意志在每个部里得到贯彻”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也不过是遥远的关系。恰恰在最好的例子中，提交人民的是人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结论，是事先他们不会认可的结论。

4. 再次说到议会。前面我对于我所认为的议会的首要职能作出了定义，又对这个定义加上了限制条件。但人们可能会这样提出异议，说我的定义不能公平处理议会的其他职能。议会在建立政府和拖下政府以外显然还做许多别的事情。它立法。它甚至还行政。因为虽然议会的每一个行动，除政策决议和政策宣言之外不过是制订正式的“法律”，但有许多法案必须认为是行政措施。预算案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制订预算案是一种行政职能，可是在我国，预算案是由国会起草的。即使象在英国，预算案由财政

部长起草经内阁批准，议会也得为它表决，通过这种表决，它才成为议会的法案。这岂不是驳倒了我的理论？

当两军对战之际，两方面的人的运动，往往是以他们的战略战术形势所决定的特殊目标为中心的。他们可以争夺特定的一片田野或一个山头。但是否想夺得这块田野或这个山头，必须从战略和战术的目的方面去推究，而这个目的就是打击敌人。要想从这块田野或这个山头也许有的任何超军事的性质上去探究，那显然是荒谬的。同样，每一个政党的首先而且主要的目标是要压倒别的政党，以便执掌政权和保持政权。象夺取那块田野或那个山头一样，从政治家的立场来说，政治争论的决定本身并非目的，不过是议会活动的素材。既然政治家们不发射子弹而发射言词，既然这些言词不可避免地要由辩论中的问题来提供，事情就不象军事斗争那么清楚。但是战胜敌方，仍然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的精义所在。^①

因此，议会之不断产生关于国务问题的决议，根本上就是议会同意或拒绝让政府保持政权，或者是议会接受或拒绝接受总理的领导的那种方法。^②除我们应立即指出的例外情况而外，任何一次

^① 有时候，政治家也真从言词的迷雾中透露出真意。我举出一个谁也不能因为它是儿戏而对它提出的异议的例子。庇尔爵士那样一位并非不伟大的政治家，当他在议会中在辉格党政府的牙买加政策争论中战胜了后者时说，“牙买加是一匹上路的好马”，他说这句话真是道出了他这一行手艺的性质的特点了。读者应对此作一番深思。

^② 这当然适用于维希政府时代以前的法国和法西斯执政以前的意大利的做法恰如它适用于英国的做法一样。可是，在美国这个事例中就会产生疑问，因为美国总统用不着为行政方面的一次重大失败而辞职。但是这只是因为，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宪法不允许议会的做法按照议会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逻辑并不全然不能使自己得到贯彻。在重大问题上失败，虽然不能更换总统，可是一般说他的威望将如此削弱，以至他的领导地位会被倾复。这暂时会造成一种不正常的局势。但是不论他在下次总统选举中胜败如何，那时候选举会解决磨擦，这种消除磨擦的方法，在根本上也类似于英国总理解散议会时对付同样的局势的方法。

表决都是一次信任投票或不信任投票，而技术上这样称呼的投票仅仅抽象地表明了一切投票所共有的根本要素而已。要证实这一点，只要注意，主动提出问题要求议会作出决定的照例总是政府或反对党的影子内阁，而不是个别的议员。

正是总理本人而不是别人，从大量的日常问题中挑选出若干他准备提请议会作出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挑选出他的政府想提出法案的若干问题或者，如果他的理由还不够充分，至少请议会作出决议的若干问题。当然，每届政府都从它的前任那里继承一批有议论余地而无法搁置的问题；其他是些可以当作例行公事办的；只有在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的情况下，总理才能够把他自己所想出来的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政策措施强加于议会。可是无论如何，政府的选择或领导，不管它是不是自由的，总是支配议会活动的因素。如果一个法案是由反对党提入议程的，这就是说反对党在挑起一次战斗；这样的动议就是攻击，政府要不是把争端延搁一下从而挫败它，就得被击败。如果一项重大议案，未被列入政府议程而被执政党的某个集团提出，这就是反叛，部长们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额外的战术上的功绩看待它的。这种原则甚至扩展到辩论的发起上面。不是由政府建议或经政府批准的一次辩论就是政府力量削弱的征兆。最后，如果一个法案是经过政党间的协议而提出的，这就意味着因为胜负难分，或因战略原因而避免的战斗。^①

① 另一种十分重要的英国议会技术，也许可以和这联在一起来加以叙述。如果某个重大议案在二读时只获得很低的多数票，这个议案通常就不再继续审议下去，这是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办的。这种做法的最重要之点是，它承认在管理良好的民主政体中多数通过的原则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限度；说少数党总是只能被迫屈服是不正确的。但还有第二点。虽然少数党在正在辩论着的特殊问题上并不总是被迫向多数党屈服，可是在实践上它总是——即使在这情况下也有例外——在内阁究竟能不能继续执政的问题上被迫屈服。一个重大政府法案在二读时所作出的这种性质的表决，可以

5. 上述“代表制”议会中政府领导权原则的例外，只表明这个原则是十分现实的。它们有两种性质。

第一，没有哪一个领导权是绝对的。按照民主方法行使的政治领导权，其绝对性甚至比别种方法要少，因为竞争的要素构成了民主主义的本质。既然在理论上每个追随者都有更换它的领袖的权利，既然几乎总有某些追随者实际上有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个别议员和内阁这个内层圈子以外的部长们——如果他觉得他由此可以戴上一顶较大的帽子的话——所遵循的道路，是介乎对领袖的旗帜的无条件忠诚和无条件渲染自己的旗帜之间的中间道路，有时候还以大可钦佩的巧妙性平衡风险和机会。^①对此，领袖也以坚持纪律和默许叛变这二者间的中间道路为报。他以相当明智的让步来缓和压力；他用礼仪来熨平绉起的眉头，以恩惠来缓和惩罚。这种竞赛的结局，随各个人的相对的实力和地位不同而大有不同，但在大多数事例中，造成了大量的自由。特别是，那些强大到足以使人们感觉得到他们的怨恨，却还不足以使把他们的领袖和他们的纲领纳入政府的安排中去成为有利的事的集团，一般将在次要问题上，起码在总理觉得是次要的或只有局部重要性的问题上得到允许自由行动。因此，各追随者集团，或者甚至个别的议员，偶然也有机会提出他们自己的议案，在单纯的批评中当然还可

说是结合了信任投票和搁置议案表决二者在一起的——如果真正成为问题的确实是法案的内容，那么除非不想把这个法案补入法令大全，这种表决方法很难说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当时议会首要关心的是维持内阁的存在，那么，这样的战术立刻就是可以理解的。

① 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例证的，最有启发性的例子之一，是张伯伦 1880 年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态度。他最后出奇制胜地挫败了葛莱斯顿，但开始时在公众面前他是葛莱斯顿的热诚的依附者。除了张伯伦本人的威力和才气焕发而外，这个事例算不上什么例外。正如每个政治头子都懂得的，只有庸才才数得上效忠。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头子中若干最伟大人物，举例说象狄斯累利，周围左右的亲信尽是些彻底的二流脚色。

以更加放肆一些，也可以不为所有政府议案作机械式的投票。但是只要我们以多少实际的精神来看待这类事情，我们就可以从使用这种自由方面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就可以了解它所体现的不是议会运行原则，而是原则的偏离。

其次，有时候因为政府和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者不赞赏某些问题的政治价值，或者因为它们的政治价值确实是可疑的^①，于是这架政治发动机就不能吸收这类问题。这时候，这些问题也许就会被喜欢它的外人捡去，独立为它乞求支援，使它成为为其他现存政党效劳的武器之一。这当然完全是正常的政治。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性。一个人也许十分强烈地关心某个问题，因而使他觉得他之要进入政治舞台，只不过为了按照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却不寄任何希望于借此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涯。可是这是十分不平常的事，因此很难找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这类实例。也许科布登是一个。的确，具有第二等重要性的例子比较常见，尤其是十字军型的事例更是这样，但是谁都不会认为，它们不过是标准的做法的偏离。

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总括。我们在观察人类各社会时，方法，往往并不感到难于逐一说明，（至少作粗略的常识性的说明是不难的）我们所研究的各社会所要争取达到的各种目的。也许可以说，这些目的是为相应的个人活动提供理论根据或意义。但是不能由此推定，某种类型的活动的社会意义必然提供了推动力，从而也提供了推动力的解释。如果不能，那么某种以社会目的或有待于满足的社会需要的分析自满的理论，就不能认为是这种活动的充分

^① 从未彻底试验过的问题，是第一类问题的典型例子。政府和反对党的影子内，尽管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潜在力量，但是还是可以缄默地同意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其典型的理由是，在技术上说处理它是困难的，以及害怕它会引起局部的困难。

说明而予以接受。举例说，为什么有经济活动这样的东西，当然是因为人们要吃要穿等等。为满足这些欲望而提供手段是生产的社会目的或社会意义。可是我们大家同意，这个命题，只能成为商业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理论的最不现实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从利润命题出发，情形就会好得多。同样，议会活动的社会意义或社会职能，无疑是制定法律，也制定一部分行政措施。但是为了了解民主政治如何服务于这种社会目的，我们必须从争夺权力和官职的斗争出发，并且必须了解，社会职能仿佛是附带地被完成的——恰和生产对于谋利说来是附带的事一样。

6. 最后，关于选民的作用，只要再提到一点就够了。我们已经知道，议会中议员们的愿望，不是产生政府这个过程的终极根据，同样的说法必然适用于选民。选民的选择——在意识形态上它被颂为**人民的召唤**——并非来自选民的创议性。选民的选择是被塑造造成的，塑造它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选民并不决定问题。但是**选民也并不完全率直地从及龄公民中挑出他们的议会议员来的**。在一切正常情形下，创议性来自觊觎议员职位和包含在其间的**地方领导权〔而进行竞选〕的候选人**。投票人所能做的，局限于接受他所喜欢的人——比别人更喜欢——的开价或者拒绝这种开价。甚至在当选人由选举人亲自选拔出来的例外情况中，多数也属于上述范畴，其原因不外下列二者之一：第一，一个人若早已取得了领导权，他自然用不到再去觊觎领导权；第二，或者碰巧一个能够控制或影响投票的地方领袖，无力或不愿自己来竞争这次选举，因而指定了另一个人，看起来这另一个人就象是由根据自己的主动性行事的选举人找出来似的。

但是，即使选民的创议性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可以把他们之接受候选人之一这么一件事全部归结为这种创议性，政党的

存在还可以成为这种创议性的进一步的限制。政党并不是象古典学说(或埃德蒙·柏克)所要求我们相信的那样,意图“按照全体党员一致同意的某项原则”增进公众福利的一个集体。这种合理化,正因为其十分诱人,所以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切政党在任何一定时刻当然要为他们自己准备好一套原则一套政纲,这些原则和政纲也许是采用这套原则和政纲的政党所特有的,它们对于这个政党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正如一家百货商店的各种货物的商标是这些货物本身所特有的,并对于这个商店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一样。但是我们不能用百货商店的商标来说明百货商店的意义,不能用政党的原则来说明政党的意义一样。政党是它的成员打算在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协同动作的一个集团。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东西,那么不同政党提出完全相同的或几乎相同的政纲就是不可能的了。可是大家知道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政党和制订政策的政治家是因选民群众除一窝蜂而外不能有所作为这一事实而应运产生的,政治家乃是一种规划政治竞争的力量,恰如同业公会是一种规划商业竞争的力量一样。政党经营和政党广告的心理技术、口号和进行曲之类并不是附件。它们是政治的精义所在。〔操纵选区的〕政治老板也是如此。

第二十三章 结论

I. 上述分析的几点涵义

竞争领导权的理论,已经证明为民主过程中诸事实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我们自然会用它来阐明民主和社会主义秩序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者不仅断言两者是互不矛盾的,

他们还断言民主意味着社会主义,而且,除非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另一方面,读者必须熟悉过去几年中我国出版的无数小册子,至少熟悉其中的一部分,才能够证明民主和计划经济——羽毛丰满的社会主义当然更不必说了——是完全互不相容的。从论战的心理学背景和论战双方自然都希望得到绝大多数是热烈的民主主义者的我国人民的支持而言,两种立场当然都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让我们来问一问,真理到底在那一方面?

根据我们在这一篇和先前各篇中所作的分析不难作出回答。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同时,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

但是请注意,这种简单的说法是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看法为基础的。所以,这些说法不仅少于论战双方意识到的内容,而且也和他们意识到的内容有若干区别。因为这一点,又因为在单纯的是否互不相容这一疑问的背后,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到底民主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用时的效率高,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时的效率高,所以我们还得作许多说明。特别是,我们必需试图简要地说明民主方法可望使它们满足的诸条件。这一说明将在本章第二节中进行。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关于民主过程的分析的几点涵义。

首先,按照我们采取的观点,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二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但是既然要来统治人民的人也很可能用完全不民主的方法来决定这件事,我们就得加上另外一条与民主方法一致的准则

来缩小我们的定义,这条准则是:自称的领袖们之间为争取选民投票而进行的自由竞争。于是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彻底弄清楚这种说法的涵义所在是绝顶重要的。

许多民主学说的代表人物曾经作过艰苦的努力要从政治活动身上剥掉一切专门职业的色彩。他们强烈地,有时候热狂地主张政治不应该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认为一旦政治变成专门职业以后,民主就要蜕化。但是这种说法实在是空论。的确,实业家和律师可以被选入议会,但同时也偶然跑跑他的业务办公室,而根本上还是实业家和律师。有许多人,当他基本上变成政治家以后,还依靠其他活动为生^①,这也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在政治上的成功,尤其如果不是偶然一次当上内阁阁员的话,就意味着职业性质的精力专注,并把这个人的别种活动贬低为副业和必要的打杂。如果我们想规规矩矩地正视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在瑞士以外的任何类型的现代民主政体中,政治不可避免是一种事业生涯。而这又意味着承认各个政治家具有特定的职业利益,承认政治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特定的集团利益。把这个因素插进我们的理论中去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我们把这种因素估计进去,许多哑谜就解决了。^②尤其是,我们立即可以不再感到奇怪,为什么政治家们老是不能为他们本人有联系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效劳。谁要是还没有认真体会某个最成功的政治家所说的:“实业家

① 例子当然是丰富的。特别有教益的例子是法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律师们。有几位突出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大律师,想想瓦尔得克-卢梭和普恩加莱就行了。但是,照例律师业务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成功是不可得兼的(但把下面的情况略去不计,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各位合伙人中,如有一个是有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他兴致勃勃地担任一任又一任的官职,则其他的合伙人会把这个事务所经营得奇迹一般地发达)。

② 必须注意,这个论点和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行为的分析怎样联系起来(见第13章第2节)。

所不了解的是，我看待选票，正和他们看待钱财一样”这句话的意思，直到决不忘掉这句话的程度，谁就是在政治上还没有脱离幼稚园阶段。^①

我们要注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形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想以他作为医生和工程师的成就来满足他的抱负的医生和工程师将仍然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并且具有不同型式的利益；想运用或改造他的国家的制度的医生或工程师，仍然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具有另一种型式的利益。

其次，研究政治组织的学者们总是怀疑大而复杂的社会中的民主政治的行政效率。人们尤其力陈，由于议会中和议会外的无休止的战斗强加于领导人物头上的精力上的惊人损失，民主政府的效率若和别种制度相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损害。又由于同一原因，政策不得不迁就政治斗争的紧迫要求，以致效率进一步受到了损害。两个命题都无怀疑余地。因为两者都不过是我们前面提出的，认为民主方法产生出了立法和行政这两个争夺政治官职的斗争的副产品这种说法的必然结果。

譬如，让我们设想下一位总理的处境。那边的政府象在法国从1871年至1940年崩溃为止的那段时期那样不稳定，总理的注意力必得几乎专注于好象试图用柏球修造一座金字塔那样的一

① 这样一种观点，有时被斥责为轻薄或嘲讽。正相反，我认为把政治口号弄成不想身体力行的空话才是轻薄和嘲讽，私生活中的这种空话，不外是占卜者的一笑而已。但是同样也可以指出，对政治家来说，这种观点也不象人们一般看来那么下流。它并不排除理想或责任感。实业家的比拟又能帮助澄清问题。正如我在别处已经说过的，任何略通商业中实际生活的经济学家决不会认为责任感和关于服务与效率的理想，对于实业家行为的形成不起一点作用。可是这位经济学家仍然完全有权把以利润动机为基础的图式来说明这种行为。

种任务上面。只有精力十分过人的人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面耗费一点力气在议案法令等等日常行政工作上面；也只有这样的非常人物才能在他属下的行政官吏中获得一点威信，那些行政官吏和所有的人一样懂得他们的首长是不久就要下台的。英国的情形当然决不比这更坏。〔在英国〕不稳定的联合政府是例外，在正常情形下，一个政府可以指望有大约五至六年的寿命。部长们尽可安于其位，在议会中摔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不是说他们能免于战斗。日常的接触总是有的，如果说政府不是经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不过是因为照例他们能够把经常的攻击抑制到不致发展到危险点而已。总理要始终看住他的对手，不懈怠地领导自己的班子作好战斗准备以便对付任何瞬间都会发生的袭击，沉着对待辩论中的法案，控制好他的内阁——所有这一切，等于是说，议会开会期内，他每天早上若能留下二三个小时通盘考虑问题，处理实际工作，已经算是运气好的了。整个政府的个别失策或失败，往往是由于领导人物或领导集团精力上的耗竭。^①所以，人们很应该问一下，他怎么可能承担起领导和监督一个、必得把全部经济生活问题通盘包下来的行政机构？

但是，政府精力的这种浪费还不止此。为了要取得职位或者保持职位而进行的无休止的竞争，使每一个关于政策或法案的考

① 举一个最不吉利的例子。随便哪一个研究 1914—1918 年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学者，对于从大公被刺起到宣战为止这一段时间中英国政府的冷静态度都不会不感到吃惊。倒不是说为了避免这一场灾难没有作过任何努力。但是这些努力都出奇地无效，而且远远落后于当时可以做到的程度。要说这是因为阿斯葵士政府并不真正希望避免战争当然是办得到的。但是如果真象我所认为的，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要被迫想到另一种解释：完全可能，议会中政府委员席上的绅士们当时如此专心致志于他们的政治角斗，以致并不警觉到国际形势中的危险，等到醒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虑都带上了各种偏见，这些偏见可以用“在票数上做买卖”这句话来出色地加以表达。一个民主政府，必须首先照顾到政策法案或行政法令的政治价值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坚持政府要依靠议会或选民的投票的民主原则这件事本身——大概就会歪曲一切赞成论或反对论。特别是，它强迫掌握枢要或参予枢要的人采取短期观点，并使他们为有关全国长期利益的、也许需要为之作坚持不渝的工作的某些远大目的而服务变得极端困难；举例来说，外交政策就有贬低为国内政治的危险。采用合理的对症下药的方策，困难也不见得少些。一个政府按照它自己政治命运的目光所决定的药方，并不必然是会产生出对国家说来最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药方。

这样，民主政体中的总理，大概会象一个一心想骑稳别让摔下来，以致无法计划他的骑程的骑手，或者象一个全部精力都放在保证他的军队接受命令，以致必须离开战略需要来注意自身安全的将军。不管也有下面所说那些可以减轻事情严重性的论据，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的。（在例如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必须坦率地承认，这是反民主情绪所以传播开来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先来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后果的例子，可以用社会模式还未达到运行民主制度的程度的理由来说明它。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例子表明了，这种后果在文明程度远高于其他民主政体得到成功运行的国家的国家内也能发生。但是，批评的重要性因此减低到这样一种说法的程度，即民主方法能否满意地实行，视能否满足某些条件而定——这是一个我们马上就要涉及的题目。

接着，有一个二者择一的问题。这些弱点，在非民主的模式中显然并不阙如。比如说在某个宫廷中要铺平一个人的走向领导地位的道路所要消耗的精力，可以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多得一模一样，

也会和民主的斗争中完全一样地严重歪曲一个人对问题的看法，虽然这种浪费或歪曲并不那么突出，这就等于说，如果我们企图对不同种类的政府发动机作比较评价的话，除了所涉及的制度原则而外，还必须考虑到许多其他因素。

其次，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将回答批评者说，政府的效率水平较低也许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确实不愿做独裁的效率的对象，不愿意只成为计谋深沉的政治角斗的物质材料。象国家计划这样一类东西，现在在美国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岂不是恰恰证明了，在我国，某种俄罗斯国家计划的类似体也会破坏联邦的精神和联邦的有机结构吗？

最后，还可以经过适当的法制措施做些事情来减轻领导人物所受的压力。以美国制度为例，它在这一点上表明了它是很有好处的。美国的“总理”无疑也必须老是盯住他的政治棋盘。但是他用不着为每个法案负责。并且，因为他不坐在国会里面，他至少免去了由此引起的肉体上的紧张。他有一切他所需要的体养精力的机会。

第三，我们在前章所作的分析，突出了民主方法挑选出来担任领导职位的人的品质的问题。我们无须回忆关于这方面的著名论点：民主方法创造出职业政治家，然后民主方法又把职业政治家转变为业余的行政长官和“政客”。他们因为本人缺乏为处理他们面临的任務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便任命麦考莱勋爵的“不懂法律的法官和不懂法文的外交官”，搅乱了文官制度，把其间一切最好的分子弄得灰心丧气。更糟糕的是，还有另一个和任何专门能力专门经验迥然有别的问题，使一个人成为候选人的智慧和品格，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好行政长官所必需的智慧 and 品格，通过投票站上的胜利来挑选人的这种办法，往往是不利于在领导工作方面将会成功

的人。而且，即使这种挑选过程的产物是政府工作方面的好成就，但对全国来说很可能是失败。原是高明的权谋家的政治家不管有多少失策，还是可以成功地搪塞得过去的。

可以承认所有这些说法都包含真理的成分，但是也得承认有许多事情是可以被人掩饰过去的。特别是，民主一定要从这么一种两者择一的考虑中得到好处的话：不论在什么社会领域中，没有哪一种选择制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可能是例外——完全检验实践的才能，并且按照挑选得锦标的名马那样的方法来选择人的。所有的制度，虽在程度上有所出入，同样也鼓励实践能力以外的且往往有害于实践能力的品质。但是我们也许还可以走得远些。在通常情形下，说政治上的成功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任何长处，或者说政治家只是一个清谈家，都不是十分正确的。他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专长：掌握人。而且，至少在颇为广阔的范围內，赢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才能照例总是和某种程度的人身力量结合在一起，也和做一个总理用得着的某些特质结合在一起的。把政治家带上国家中枢地位的那条溪流中到底有不少礁石，它们在阻碍白痴和牛皮家的进展方面并不是完全起不了作用的。

我们原该预料到，一般的空泛议论在这样的问题上上是得不出什么明确结论的。更珍奇更意味深长的是，事实的证据，至少初初看来，也并不更具结论性。再也没有比罗列一张动人听闻的民主方法失败事例的清单更容易的事了，尤其如果我们不仅把真正的崩溃或民族败亡的事例包括进去，而且也把民族生活虽然健康而繁荣，但政治领域内的成就分明相对地低于其他领域内成绩水平的事例也包括进去的话。但是要把几乎同样动人的证据分配给政治家也是不难的。让我们来引一个突出的例子。古代战争的技术性确实不象后来的战争那么高。但是人们还是会认为，即使在那

时候，军事上得到成功的才能和使自己被选为政治上负责人的才能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共和国时代的全部罗马将军都是政治家，他们全都直接通过他们所担任的或原先已经担任的官职而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有些最悲惨的灾难都起因于此。但是整个说来，这些政治家兼将军们都干得出奇地漂亮。

事情何以致此？回答只能有一个。

II. 民主方法成功的条件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观察到，同一个机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运行得不一样，他会推定，这种机制的作用取决于外在于这种机制的诸条件。我们只能得出同一结论。要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并不困难，这和了解古典的民主学说可望适合现实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所需的条件，一样容易。

这个结论，肯定会使我们带上我们一贯指出的严格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没有不问时间地点的笼统的社会主义赞成论或反对论一样，也决不会有一般的绝对的民主主义赞成论或反对论。同时，也正和我们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一样，这使我们不能用“其他一切相同”这样的附加条件来论证，因为“其他一切”决不是象民主在其间是行得通的或唯一行得通的制度的局势和民主在其间是行不通的制度的局势那样相同的。民主在显出某种特征的社会模式中会兴旺起来，所以下面这样的疑问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大可怀疑的：民主怎样能生活在缺乏这些特征的社会模式中，或者这类模式中的人民，怎样能和民主一块儿生活下去。我将把我认为为了民主主义方法得到成功^①——在它已经有可能行得通的诸社会中——所必须首先满足的诸条件分列在四个标题下面；同时我还要把我们的讨论局限在现代类型的大工业国家范围之内。

第一个条件是，政治人物——即配置政党机器以人员，被选入议会并在议会内服务，上升为内阁部长的那些人——的品质必须是很高的。这里所说的意思，不是光指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充分能力和道德品质的人。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民主方法不是简单地从全民中挑选人，却只是从能担任政治职业的这类人中间挑选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从把自己贡献出来供人选举的这类人中挑选人。当然，一切挑选方法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一切挑选方法，各按某一行职业对于干练的才能和高尚的品质的吸引力的强弱，产生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作成绩。但是竞争当政的职位的斗争，一方面在人力和精力上是浪费的。另一方面，民主过程也许容易在政治领域内创造出一些条件，一旦这些条件确立了，它就会把能够在政治以外的任何方面取得成功的人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因为这二个原因，人的材料是否适合，对民主政治的成功特别重要。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总会具有他们所愿望的或者他们值得为夸耀的那种性质和品格的政府，那是不确实的。

也许有许多方法可以保证有品质极为良好的政治家。虽然如此，直到现在为止经验似乎提示我们，唯一有效的保证是，客观上存在着把政治当作自己天职的。同时本身又是某种严峻的选择过程产物的一个社会阶层。如果这样的一个阶层对门外人既不过分排斥，又不太容易进得去，如果它强大到足以同化它经常吸收进去的成分的大部分，则它不仅将把已在其他领域成功地通过了许多

① 所谓“成功”，我所指的不过是，民主过程稳定地再生产它自己，而无须造成被迫依靠非民主的方法的局势，它还善于运用政治上有地位的各个集团认为在长期内可以接受的方法，处理一切经常性的问题。我的意思，不是指每个观察者按照他自己的立场必须认可所有这类结果。

考验的产品奉献给政治生涯——仿佛在私人事业中当学徒——而且它也将把体现着经验的传统、连同某一行专门职业的行规和对于事情的共同看法授予他们，因而增大了他们胜任政治家的程度。

唯一能够完整地满足我们条件的国家，英国，也是具有这种意义的政治社会的唯一国家，这很难说是偶合。更有启发性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1918—1933）的德国的事例。正如我希望在第五篇内表明的，这个时期德国政治家身上倒也找不出什么通常认为是刺目缺点的东西。一般的议员、总理和阁员是诚恳的，理智的，耿直的。这适用于一切政党。可是，我们一方面尊敬这里那里的星星点点的才能，虽说最高指挥人物或近似于最高指挥人物身上这样的才能极为罕见，我们必定要补充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低于标准，若干情形下还低得可怜。显然这决不是由于整个民族缺少才干和精力。而是才干和精力冷眼拒绝了政治事业。没有哪个阶级或集团的成员把政治事业看做他们命中注定的事业。这个政治体系之所以打了瞎火，原因很多。但是它之所以最后在一个反民主的领袖手中遭到了粉碎性的失败，无论如何如实地说明了淬厉奋发的民主的领袖才能的缺乏。

民主得到成功的第二个条件是，政治决定的有效射程不能扩展得太远。它到底能扩展到多远，不仅取决于从前节分析推论出来的民主方法的一般限度，也取决于各个个别事例的特殊环境。说得更具体一些：射程不仅仅取决于，举例说，一个不得不紧张地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不断斗争的政府能够成功地对付得了的问题的性质和数量，而且，不论在什么特定时间和地点下，也取决于组成政府的人们的品质，政治机器的类型，和他们必得加以影响塑造的舆论的模式。从我们的民主理论的立场来说，不象古典理论那样必需这样的条件，即政治机构应该只处置多数人民能够完全理

解，并对之具有严重的意见的那些事情。但是性质相同，必要程度较低的条件还是少不了的。这要作一些补充解释。

当然，一个由总理领导的议会，如果必要通过宪法修正案使自己服从自己的决议，这在法律上是决不会有什么限制的。但是，正如埃德蒙·柏克在讨论英国政府和议会为了很好地起作用而对美洲殖民地采取的行动时曾经主张，权力无限的议会必须对自己的行动加上一些限制。同样我们也可以主张，即使在必须由议会表决的事情范围内，议会或政府也常常必需通过一些法案，根据这种法案，它们的决议纯粹是形式上的决定，最多也纯粹是监督性的。否则的话，民主方法也许会制作出立法上的非非之想。以异常笨重而又富于技术性的刑法法典为例。民主方法可以用于解决，某个国家究竟应不应该有那么一部法典。它也可以在某种“争论”问题上作出不光是形式性质的政治决定——例如工会或雇主联合会的某些行动应不应该认为是犯罪。但是除此而外，不论政府和议会自己的看法如何，他们必须接受专家们的劝告。因为犯罪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犯罪这个名词，事实上包括了许多极少共同性的现象。有关犯罪的通俗口号几乎总是错的。要合理地处理犯罪，必须使刑事立法既避免报复主义的发作，又避免感伤主义的发作，政府或议会里而的外行人，总是交替地一时犯此病，一时又犯另一种病。我强调政治决定的有效射程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些——这就是说，它既适用于政治家关于实质问题的决定，也适用于关于形式问题的决定。

其次，对国家活动的范围加上上面所说的限制，确实也可以满足我们所讨论的条件。但是如果读者认为这样的限制是必然要加上的，那就是严重的误解。民主政治并不要求国家的每种职能都服从它的政治方法。例如，大多数民主国家给予司法系统以大量

的不依赖于政治机关的独立性。另一个例子是英格兰银行1914年前所保有的地位。它的某些职能事实上是国家的职能。可是这些职能授给了充分独立于政府领域之外的，因而可以有它自己的政策的，在法律上不过是营业公司的一个机构。我国的某些联邦机构是另一些适例。州际商业委员会体现了扩展公共权力的范围但并不扩展政治决定范围的某种企图。或者，再提出另一个例子，我国有些州，“没有任何条件”地资助某些州立大学的经费，这就是说，这种资助不以干预有时候实际上等于大学完全自治的情况为条件。

因此，几乎任何类型的人类事务都可以设想为属于国家范围内的职务，除了在通过授予权力，设置管辖它的机关，和建立政府的总监督作用中所包含的那种接触的法案时所包含的那些职务而外不致于成为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斗争的素材的一部分。这种监督权当然也许会堕落成为腐化的影响力量。政治家任命非政治的公共机关人员的权力，如被滥用，则这种权力本身就足以腐化这些机关。但是这对我们所讨论的原则是没有影响的。

第三个条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政府，为了公共活动领域所应包括的一切目的——不管公共活动的领域大小如何——必须能够支配一个训练有素的由好出身，具有良好传统，赋有强烈责任感和同样强烈的集体精神的人组成的官僚机构的服务。这样一个官僚机构可以作为对于政府是清谈馆那种议论的主要答复。这可能也是对于在我国老是能够听到的下述疑问的唯一答复^①：已经

① 读者若参照第18章对官僚政治所作的若干评述，他会相信，不论按照什么意义，不能认为官僚政治所提供的答案在所有三个方面都是理想的。但是读者切不要过分受到通俗语调中官僚政治这个名词引起的联想的影响。这个答案起码是唯一现实的答案。

证明民主无力产生象样的市政府；如果国家什么事也要管，最后连整个生产过程都得由它来掌握，那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国家存在下去呢？最后这也是对于公共管辖领域扩张时怎能满足我们的第二个条件这个疑问的主要答复。

官僚机构如果只在日常行政工作上有效率以及有资格做顾问是不够的。它必须强大到能够带路，如果必要，还要教导当部首长的政治家们。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能够引伸自己的原则，充分独立地主张这些原则。它必须是拥有某种公认的权利的一种力量。这等于说，在事实上，虽不是在形式上，职务的任命、任期和官阶的升迁，必须多半取决于——在政治家们不能随便蹂躏的文官制度规章的范围内——它自己的集体意见，不管政治家们或公众发觉自己受到了这种制度阻碍时（他们一定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确实会掀起的一切喧嚷。

此外，正和上面谈到的政治人物问题一样，可用的人材是最关键的。训练是要紧的，和这比起来却只有第二位的意义。因为只有当存在着具有适当的能力，相应的威望，可以由此招募新人的一个社会阶层——它不太富也不太穷，不太深闭固拒也不那么容易进得去——才能最容易保证这种性质的官僚阶级所必需的材料和使它行使职能所必需的传统法规。欧洲的官僚阶级，不管它曾引起过足以弄脏它的记录的敌意批评，却极妙地例证了我试图表达的意思。他们是从中世纪诸侯的管家（原来是为了行政和军事目的挑选出来的农奴，他们由此取得小贵族的身分）开头，经过若干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强有力的机器出现为止的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它不是一下子创造得出来的。它不是出钱能“雇佣”到的。但是它成长于一切地方，不管这个国家采取什么政治方法。它在我们的未来时期的扩张是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

第四组条件，可以用**民主的自制**这句话来概括。当然，谁都会同意，除非某个国家内一切数得上的集团，都乐于接受任何立法法案，只要它是载在法令汇编上的同时也乐于接受法律上有资格的当局所颁布的行政命令，民主方法是不能顺利运行的。但是民主的自制所包含的意义还大大超过这一点。

首先重要的是，选民和议员一定要具有高度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使他们不为歹徒和狂人的献纳，或者虽然现在还不是，却会被驱迫到这二者道路上去的人们的献纳所动。此外，如果所通过的法案，不考虑别人的主张或国家的形势，也会发生使民主政治信誉扫地并从根动摇人们对它的忠诚的各种失策。各个关于立法改革或行政措施的动议，应该仿佛站面包队那样秩序井然地挨次提出而不应争先恐后破坏秩序。读者若回忆一下我们在前章讨论民主的作用方法时所说的话，就会懂得，这涉及许多自愿的服从。

尤其是，议会中的政治家一定要抑制自己，不要在看来做得到的时候就打算推翻政府或者找政府的麻烦。如果他们这样做，任何一个成功的政策都会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政府的支持者一定要接受政府的领导，要允许政府制订一个施政计划并且按照计划行动；反对党应该接受它的“影子内阁”的领导，允许它把政治斗争约束在某种规则范围之内。可以看得清楚，这些必要条件的满足——对它的习惯性的违反就是民主政体的完蛋的开端——要求恰如其分的，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传统主义。保护这种传统主义，事实上就是议会程序规则之所以应该存在的理由。

议会外面的选民，一定要尊重他们和他们选出来的政治家间的分工。他们一定不要在两次选举之间太随便撤回他们的信任，他们一定要了解，一旦他们选出一个人来，政治行动就是这个人的业务而不是他们的业务了。这就是说，他们必须约束自己不要指

令他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这是爱·伯克时代以来的宪法和政治理论所确实普遍承认了的一条原则。但是它的含义并没有被普遍了解。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这条原则和古典的民主学说是冲突的，它还确实意味着这种学说已被废弃。因为如果人民应该按照决定个别问题那种意义来实行统治，那末，象法国投票人在1789年和1789年以前所做的那样对他们的代表发生指示，对他们说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另一方面，人们懂得更少的是，如果接受了这种原则，那么不仅当时法国选民会议议事录那样的正式指令，就连比较非正式的，企图限制议会议员行动自由的一切东西——例如用信件和电报袭击他们的做法——都应归入这一禁令。

我们不能详细论及、这所引起的关于我们所规定的民主的真正性质的诸微妙问题。和我们有关的是，在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成功的民主的实践无例外地敌视政治上的幕后活动的——直到不许依靠秘密外交或散播关于意图和约许的事的谣言——在公民这方面，要禁止这种做法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行。

最后，有效地争得领导权，就需要对不同的意见作大度的宽容。前面已经指出过，这种宽容决不是、也决不能是绝对的。但是宽容必须达到这种程度，使每个自认的领袖，只要他不是在法律上被排斥的，都能够提出他的问题不造成骚乱。这种说法也可以就是这样的意思，当某个人在打击人们最致命的利益或者冒犯他们最珍爱的理想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地站在旁边——或者反过来说，采取这些观点的自认的领袖能够相应地克制自己。若没有对邻人意见的、等于自愿把自己意见处于从属地位的那种由衷的尊重，以上两者就都是不可能的。

每种体系都经得住某种程度的实践上的偏离。但是，民主的

自制即使减到必要的最小限度，某种类型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习惯显然还是必需的；而这种东西还不是到处都有机会演化出来，也不是依靠民主方法本身能够产生出来的。这种自制在哪里也经不起超过某种限度的严酷考验。事实上读者只要重新检查一遍我们列举过的诸条件，就能证明，只当有关的一切利益集团不仅对国家的忠诚实际上是全体一致的，而且对现存社会的结构原则的忠诚实际上也是全体一致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发挥其全部长处。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原则引起了疑问，发生了使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的争论，民主就会得到不利的结果。而且只要争论所涉及的各项利益和理想是人民拒绝与之妥协的利益和理想，民主主义也许就会变得完全行不通。

这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民主方法在动乱时代是处于某种不利地位的。事实上一切类型的民主政体都以实质上的一致承认，在某种局势下废弃竞争的领导权，采用垄断的领导权是合理的。在古罗马，宪法规定，紧急时期要授予某个非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以这种垄断的领导权。担任这种公职的人称为 *magister populi* 或 *dictator**。大家知道，实质上所有的宪法，包括我国的宪法在内都有这样的条款：美国总统在某种状况下可取得一种权利，使他实际上成为一个罗马式的独裁官，不论在法律解释上和在实际细节上，有多大的差别。如果垄断有效地限制在一定时期内，（象原来罗马那样）或限制在明确的短期紧急状态延续时期中，竞争领导权的民主原则不过暂时中止而已。如果这种垄断，不论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都没有时间限制——而倘若时间上是无限制的，它当然会倾向于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无限制的——民主原则就被废除

* 人民执政官，或独裁官。

了,我们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独裁制度了。^①

III. 社会主义秩序下的民主

1. 在作出我们的结论时,我们最好还是从民主和资本主义秩序间的关系开始。

反映在古典学说中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是以人类行为和生命价值的合理主义图式为基础的。按照本书第11章的论证,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这种民主的血统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分明符合这样的提示:现代民主在历史上是和资本主义一同兴起的,并且和资本主义是因果相联的。从民主的实践上看,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我们的竞争领导权原理意义上的民主主义,主持了给资产阶级以新面貌的政治和法制的变革过程,并且按照它自己的观点合理化了嗣后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民主方法是这种社会重建的政治工具。我们知道,民主方法在某些非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运用得特别好。但是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

民主是不是将和资本主义一起死亡的一种资本主义产物,当然是另一个问题。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能够胜任它自己演化出来的民主方法的运行的任务,则更是另外一个问题。

说到后面那个问题,很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方面是很能胜任的。资产阶级对于政治决定的领域怎样能够缩减到可以用竞争领导权的方法加以管理的比例,有一个它所特有的解决办法。

^① 在古罗马(我们习惯于误用它的名词)发展出来了一种独裁政治,它在几个世纪内显出某些并非不与现代独裁相似的特质,虽然这里比拟不能推得太远。但是除一个事例,即凯撒的事例而外,这里独裁政治不利用共和国时代的独裁官的职位。苏拉的独裁,不过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宪法改革)创建起来的临时的行政大权。除此面外,只有极为“正规”的事例,并无其他事例。

资产阶级的物图式，通过公共权力领域的限制来限制政治的领域；它的解决办法存在于节俭国家的理想之中，这种理想，主要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并为一切领域内自治性质的个人努力提供坚实的体制。此外，如果估计到前此我们所发现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和平的——至少也是反军事主义的——和自由贸易的倾向，可以看得出，资产阶级国家内的政治决定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可以，至少原则上可以缩小到政治部门的无能所需要的任何程度。

现在，这种性质的国家无疑已经不合我们的心意了。资产阶级民主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事例，任何可以为它辩护的主张，分明决定于是否接受不再是我们的各种准则。但是否认我们所不喜欢的解决办法是一个解决办法，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是民主都是荒谬的。正相反，当它褪色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承认它活跃时期曾是怎样鲜艳；它曾贡献给那些家族（如果不说贡献给那些个人的话）以怎样广阔而平等的机会；它曾给予通过了它的考验的人们（或给他们的孩子们）以怎样大的人身自由，也相当重要的是，承认它至少在几十年间怎样漂亮地毅然应付了由于不协调的条件而引起的紧张，承认它当它面对着非资产阶级利益的和敌视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时，它怎样漂亮地发挥了它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极盛时代，也十分胜任使民主获得成功的任务。一个任令它自己实行民主的自制因而最好地照顾了它自己利益的阶级，比一个天然试图靠国家生活的阶级，容易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以其主要精力专注于他的私人事业的资产阶级，一般说来——只要这些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比别种类型的人们更能对政治分歧表示宽容，并且尊重他自己不赞成的意见。此外，只要资产阶级的准则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

这种态度便会扩展到别的阶级中去。英国地主以相对的好意接受了1845年的败北；英国劳工为解除自己的无能状态而战斗，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才能缓和下来要求得到一些权利。的确，在其他国家里，这类自制显然要少得多，这种原则的偏离并不总是严重的，也并不总是只和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相并联着的。但是在若干情形下，一切政治生活都还原为诸压力集团间的斗争，在很多情形下，未能符合民主方法的精神的各种行动，已重要到足以使它的作用方式变样了。可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决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显然是一种过火的说法。^①

可是，资本主义在以上两个方面，都正在急剧丧失它素来保持的优点。与国家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行得愈来愈不灵活已经有些时候了。这种情形，部分地是由于，正如我们以前已知道的那样，民主方法决不能在全国在社会结构这种根本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作最良好的运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显然无法满足使民主方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条件，这种困难又被证明是特别严重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的个人进入到了非资产阶级血统的政治阶级之内，在政治领导权方面得到了某种成功，但是资产阶级并未生产出一个本阶级的成功的政治阶层，虽然人们认为，实业家家庭的第三代有一切机会形成这样一个阶层。原因何在，第二篇曾作了充分的说明。把所有这些事实汇合在一起，似乎可以为这种类型的民主提出一个悲观的预测。这些事实也说

^① 应该这样说，存在着某些和民主原则的偏离，这种偏离是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关系的。但是，这么校正了之后，不论按照古典学说或是按照我们的民主理论，这种说法就都是正确的。按照第一种立场得到的结论是，私人利益集团得以任意使用的工具，常被用来挫败人民的意志。按照第二种立场所得的结论是，私人工具常被用来干扰争取领导权的竞争这种机制的运行。

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在某些情形下那样满不在乎地屈服于独裁。

2. 古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后裔。尤其是，它完全分享了后者的合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背景，和许多包含在古典的民主学说中的观念和理想。就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什么困难也没有就侵占了资产阶级遗产的这一部分，并为下列命题找出了理由：社会主义无法吸收的古典学说的要素——例如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实在是违反民主的根本原则的。这类信条，即在全然非民主的社会主义形式下也是能够活得下去的，我们可以相信文士们和法利赛人们会用合适的词句，填平信条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但是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实践——正是竞争领导权学说所理解的民主实践的命运。于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非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又不免是，假使社会主义打算担负起使民主方法发挥作用这个任务，它胜任这个任务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胜任这个任务到什么程度。

应该掌握的根本性要点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能够以泰然自若的态度，观察民主方法的扩张的后果，也就是“政治”领域扩张到全部经济事务上去的后果。如果这个人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恰巧就是这个意思，他自然会作出结论说，民主社会主义必定失败。但是这不是必然的结论。如前面已经指出了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扩展，并不意味着政治管理领域的相应的扩展。可以设想，前者可以扩展到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事务全部吸收进去，同时后者仍旧保持在民主方法的限制所设置的界线之内。

可是，确能由此推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这些限制会引起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资产阶级对事物的处理方式所强加于政治领域的自动性限制。何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再也不可能从认为政治程序上的无效率毕竟是自由的保证人

这种思想中找到什么安慰。缺乏有效的经营管理就意味着缺乏面包。可是，准备去运转经济机器的机关——我们在第三篇中碰到的中央局和所属的受托管理各个产业或企业的机关——可以这样组织和配备，使它们能在执行他们日常任务中不受政治家们的干扰，或者，也使他们免受大惊小怪的公民们的委员会或他们的工人們的干扰。这就是说，他们可以远离政治争吵的气氛，而不显出和**官僚主义**这个名词联在一起的无效率之外的无效率。由于责任适当地集中于个人，由于采用恰当的奖惩制度——其间最重要部分是任命和升迁的方法——无效率能够大为减少。

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当他们离开讲台采取负责任的语调时，经常警觉到这个问题，也警觉到民主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德国社会化委员会(Sozialisierungs Kommission)的郑重讨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1919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断然绷起脸来反对布尔塞维克主义时，它的成员中的激进派仍然相信某些社会化政策是实际上迫切需要的，因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规定目的和推荐方法。成员不限于社会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占统治地位。考茨基是主席。只为煤业提出了明确了方案。甚至这个方案，也是在愈来愈浓厚的反社会主义情绪下达到的，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兴趣。有兴趣的倒是，当更具奢望的想法还占优势的时候出现在讨论中的各种观点。认为工厂的经理应由本厂工人选举的想法，受到了坦率的全体一致的谴责。在普遍崩溃的几个月中成长起来的工厂委员会，是厌恶和猜疑的对象。这个委员会，设法尽可能躲开**产业民主**^①这个通俗观念，尽其所能地把它塑造成为无害的模型，毫

① 产业民主或经济民主，是那么多准乌托邦派想象出来的一个词句，它只保有很少一点确切的含义。我认为，它主要指二件事：第一，工会统治产业关系；第二，通过工人代表参加管理机构，或其他足以保证他们对采用技术改进、一般营业政策、当然特

不去发挥它的作用。它所更为注意的是，强化权威，保卫经理人员的独立性。很多思想都被投到怎样不使经理们失掉资本主义的活力而沦入官僚主义的老套文章中去。事实上——如果还能谈到很快就会失掉实际重要性的讨论的结论的话——这些社会主义经理们不会和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先辈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而在很多事例中，得到重新任命的还是原来那一个人。这样，我们就从另一条路达到了第三篇中早已达到了的结论。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把这个结论和社会主义下的民主的问题的答案联结起来的时候了。当然，按某种意义说，民主程序的现代形式和现代机构，正象民主本身的基本原则一样，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构和问题的自然结果。但是这不能成为为什么它们应该和资本主义的消失一起消失的理由。大选，政党，议会，内阁和总理仍然可以证明是处理社会主义秩序可能保留下来以便作出政治决定的议事日程的最方便的工具。这种议事日程中将免除所有现时因私人利益冲突和调节私人利益的必要性而引起的项目。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些新项目。将有那么一些问题要解决，例如投资规模应该多大，社会产品分配的现有规则应该怎样修正等等。关于效率的一般辩论，以及英国王家委员会类型的调查委员会，会继续执行它们现时的职能。

这样，内阁里的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生产部首脑的政治家，无疑将通过他们关于管理经济发动机的一般原则的立法法案，以及通过他们任命一些必不可少，也并非徒具形式的职位的权力，来发挥政治要素的影响。但是他们不必做到和效率不相容的程度。生财是工厂纪律（包括雇用和解雇在内）起作用的各种措施，使这个元首制的工厂民主化。职工分红是一批次要方案中的万应灵丹，说这种经济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将烟消云散是错不了的。这样说是根据的，正如这样说不算那么冒犯一样。因为这种民主所想保卫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有许多将不再存在。

产部长用不到比英国卫生部长或国防部长干预他们的部内工作更甚地干预各个产业的内部工作。

3. 不消说得,除非第三篇中所列举的“成熟”的必需条件特别是按照民主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能力,和一个具有充分的能力和经验的官僚机构体系的存在,等条件都能得满足,按照指出过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工作。但是一个确能满足这些必需条件的社会——我不想讨论其他条件了——首先必须拥有一种可能具有决定重要性的优点。

我曾强调过,除非各阶级人民的最大多数决心遵守民主生活的规则,同时这又意味着他们真正同意他们制度结构的根本原则,否则就不能期望民主能令人满意地发挥其作用。目前,后面那个条件就不能得到满足。许多人已经拒绝,还有许多人行将拒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准则表示忠诚,仅就这点而论,民主政治运行中的摩擦势必不断增长。可是,在可以望得见的未来时代,社会主义可以弥合这个裂缝。它会重建社会建筑的结构原则上的一致。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那末,剩下的对抗,恰恰正是民主善于应付的那些对抗。

第三篇中也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利害冲突的消失,剩下的对抗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将进一步减少。农业和工业,大规模工业和小规模工业,钢铁生产工业和钢铁消费工业,保护主义和出口工业之间的关系,不再——也许不再——是要靠各个压力集团的相对重量来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会变成技术专家们够能提出冷静的,并不模棱两可的解决办法的技术问题。指望不再存在不同的经济利益,指望不同的经济利益之间不会有冲突也许是空想,指望不会有意见不一致的非经济问题也许更是空想,但是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指望争执问题的总量,即使比原封未动的资本主义时代也

少得多。比如说，不会再有白银派。政治生活会单纯化。

由外表上看来，社会主义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由于出现了一个具有稳定传统的政治阶级而解决了的问题，似乎拿不出什么明白的解决办法。前面我说过将会有一种政治的专门职业。也许会从这里发展出一个政治界来，可是关于它的品质，推测和空论都是没有用的。

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可能还会有人说，这个成功可以很容易地被可能有的各种偏差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所抵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此已通过经济上的成熟的坚持而有所准备，所谓经济上的成熟，特别意味着上一代人不必为下一代人的福利作出什么重大的牺牲。但是即使没有必要经过国家计划来残酷地役使人民，维持民主事业这一项任务也许仍然证明是极端伤脑筋的任务。人们也许不容易想象出某些情况，在其中，掌握枢要的人们能够正常地成功地解决维持民主事业的任务，而比较容易想象的情况倒是，而面临着某种瘫痪的惨状从政治部门传遍全部国民经济，他们可能被迫走上一条，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组织中固有的支配人民的可怕力量时往往必然有些跃跃欲试的行动路线。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经营管理，意味着在工厂内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不是在厂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在工厂内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在选举中是主权者。但是正如他们可以使用这种主权去松弛工厂的纪律一样，政府——只有政府才是把国家的未来放在心上的——也可以利用纪律去限制这种主权。这是实践上的必然，最后会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虚伪的东西。

这种民主至少并不意味着人身自由的增加。再说一遍，它并不意味着更密切地接近于古典学说所祀奉的诸理想。

第五篇 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

小 引

由我来写一部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是不适宜的。它们兴亡的背景和它们尽力设法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方法，都要求比我所有的更大的一幅画布和更有力的一支画笔。作这种尝试的时机也未到来：虽然过去二十年中已经产生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弄清楚了我们必须知道的某些特殊局势或某些方面，但是还得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写出一部能满足学术界需要的现代社会主义实际活动史。可是，为了补足本书以前各篇，为了把本书以前各篇说过的东西纳入恰当的背景中去，陈述某些史实是必要的。还有一些观点是我在研究或亲身观察中^①想到的，因为它们本身看来还饶有兴趣，所以我也愿意把它们呈献出来。为了这双重目的，我把下面那些片断集合了起来，所希望的是，即使是片断，也许可以说明整体的轮廓。

并不是每个读者——甚至不是每个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者的读者都会赞成这个断片所给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中心地位。我欣然承认对这个问题我有个人的偏见。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政策之所以有魅惑力量——它之所以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具有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地方和完全特有的尊严——在于它和某种学

^① 其中之一，在别处已说到过，见第20章。

说基础保有清楚而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理论之能否通过行动来实行决定于对历史必然性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见第一篇）甚至每种权宜手段或纯粹策略上的考虑，也带有这种不能消除的性质，而且也总是按照这种原则的精神来进行讨论的。但是所有这些，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才确实如此；就资产阶级混合物范围而言，适用这种说法的当然首推被意味深长地称做“哲学”激进派的边沁主义激进派。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集团或多或少象其他集团或其他政党，只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一贯地按照在他们看来包含着对所有问题的全部答案的一种学说行事。读者将能看出，我并无条件地赞赏这种态度。这很可以称做狭隘，甚至可以叫做天真。但是一切类型的空论家，不管他们实践上的无能达到什么程度，都具有足以把他们提升到高于普通的政治实践家的某种风雅的品格。他们也拥有力量的源泉，这种力量的源泉是单纯的实践家所决不能理解的。

第二十四章 未成年期

社会主义学说，它的某些根子大抵和说得清楚的思想同样古老，原是些美丽的或可恨的梦——从和社会现实的接触中产生出来的虚弱的渴望——如果它无法使任何人相信社会过程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的话。社会主义的努力，如果它和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没有确实可靠的接触的话，只等于旷野中的说教——等于柏拉图式的说教，没有一个政治家必需为之操心，没有一个社会过程的观察家必需把它列入有效的因素之内。

这就是马克思对先于他的，或和他同时的，提出了竞争性的教义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批评的要旨，这也是他为什么称他们为空

想社会主义者的理由。马克思所以这样称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方案都是些非非之想，设或不是因为它们智力上是低于水平的，却是因为这些方案根本是未完成的和无法实行的。几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一点，并能代替用大量文字写成的一篇概论。这些例子也足以表明马克思的判断是多么错误。

托马斯·摩尔爵士(1478—1535)的《乌托邦》，被阅读，敬佩，甚至被照本抄录下来传阅直到十九世纪——那时已有卡贝和培拉米的成就——展开了一幅朴素，道义和平等的社会的图画，这个社会恰恰是摩尔当时英国社会的对立面。这种理想，也许不过是文学形式的社会批评。也许我们用不着把它看作摩尔关于实际社会计划目标的意见的表示。可是，如果人们按后一意义了解它——过去正是这样的——困难倒不在于它的不实际性。在某些方面，其不实际性还比若干当代的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少些。譬如，它不回避权威问题，它坦率地接受朴素的生活水平的前景——无疑还把它提升为一种德行。真正的困难是，他并不企图指出社会怎样才能演进到这种理想状态(除了可能通过信仰上的改宗)，或者能起作用以便产生出这种理想状态的现实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喜欢或厌恶这种理想。可是我们不能为它做什么事情。把实际生活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人们是无法据此来组织政党草拟政纲的。

另一种类型可以欧文(1771—1825)的社会主义为例。欧文是一个制造家和实际的改革家，他不满足于仅仅怀抱——或采用——小而自足的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这个词的最明显的意义生产和消费他们的生活手段的那种自足自给的小社会的思想。他确实着手去实现这个观念。开始时他希望政府出面来做，后来他试图做出一个例子来影响社会。因此，看来这个计划比摩尔的大概更

为实际可行；这里不仅有理想，还有通向这种理想的桥梁。可是事实上这座桥梁只起了更清楚地证明它的乌托邦主义性质的作用。因为不论是政府的行动或是个人的努力，都是作为天外飞来的救星而引入的——事情之所以必须做成，正好因为某一个人认为它是值得做的。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有什么社会力量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起作用。没有为玫瑰树找到土壤——只好听令丽质凋零^①。

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普鲁东(1809—1865)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在他那里，比大多数其他蔑视经济论证的无政府主义经典作者那里具有更为显著而明确的经济学错误，并且，不论在强调个人之间自由而无政府的合作时，或者在强调为了开辟道路必须完成的破坏工作时，多半因为避免推理，才避免了推理上的错误。象“诗人，疯子和空想家等一伙人”，除了打乱社会主义计划，和为革命骚动局势增加混乱而外，他们生来就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马克思对巴枯宁的作法的唾弃有时并非不掺有绝望在内，马克思的这种心情是不难体会的。

但是无政府主义是带有复仇心情的乌托邦主义。我们提到这种病态的社会主义，只不过为了弄清楚一而这一点，即，不应该把这种十四世纪心理状态的复活和圣西门(1760—1825)的著作表现

^① 对于傅立叶(1772—1837)的类似的计划来说，这样说法也是正确的；可是他的计划不是谁都会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因为劳工只能得到社会产品的5/12，其余都得作为资本和管理费用。虽然就这种计划本身来说，是一种估计到现实情况的可以称赞的企图，但指出劳工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比它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过得还要坏，也是有趣味的事情。以战前英国为例(见鲍莱，《工业生产的分配》，1921年版，第37页)，一百六十镑以下的工资和薪金，在制造业和矿业占净产值的62%，或者计入一百六十镑以上的薪金时，68%。当然傅立叶的理想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但是就其也是经济理想来说，却也极漂亮地说明了，在这位改革家的信条中，包含了多大一分对于资本主义事实的无知。

得最为充分的真牌空想社会主义相混淆。在圣西门的著作中，我们感到思虑和责任与可观的分析力结合起来了。所注视的目标不是荒唐的，也不是幻想的。缺少的是方法，建议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的行动——由当时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来采取行动。

人们如果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结束社会主义未成年期的伟大突变，事实上必得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联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把突变的时间——就这类事情的日期究竟还可能予以规定而言——定在《共产党宣言》出版时(1848)，或者定在第一国际成立(1864)时；正是在这个时期，严肃的学说上的规范和政治上的规范两者都得到了满足。但是一方面，这个成就不过总结了多少世纪未成年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以某种特殊方法表述了它们，这也许是实际上唯一可能的表述，但确实不是逻辑上唯一可能的表述。所以，正统社会主义对未成年期的人们作出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是必得加以修正的。

首先，如果这些世纪中的社会主义方案都是梦想，那么，其中大多数是合理化了的梦想。各个思想家或多或少在合理化上完全成功了，并不仅仅是他们个别人的梦想而是各非统治阶级的梦想。这样，这些思想家并不是全然生活在云端里的；他们也帮忙把在底下打瞌睡但准备觉醒过来的人提升到表面上来了。就这点来说，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回溯到活跃于许多修道院中，以及更活跃于圣芳济修道会这个第三级教士集团中的他们的中世纪先辈，也取得了马克思通常并不给予他们的重要性。不管他们的信仰在正统社会主义者看来如何不足齿，大多数社会主义的推进力却来自(即在今日亦然)他们为之作代言人的饥饿的——不是贪吃的——灵魂的非理性的渴望。^①

① 这就是为什么有训练的社会主义者，企图甩掉他自己承认为粗野的信仰者信

其次，未成年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准备下了不少砖块和工具，后来证明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观念本身是他们的创作，正因为有他们的努力，马克思和他的同代人才有可能作为任何人所熟悉的一件事来讨论它们。但是许多空想社会主义比这走得远得多。他们拟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的细节，或是计划的某些变体，由此表述了问题——不论如何不妥当——清理了好多场地。甚至他们对纯粹经济分析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它为否则就会粘滞得无法下咽的布丁准备好了十分必需的酵粉。何况其中不少东西简直是改进了现有理论的专门著作，帮了马克思很大的忙。精心推敲了劳动价值理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或准社会主义者——象汤普逊这样的人——可算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并不是马克思包括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里面的所有的人，都缺乏与群众运动的接触。有些接触是由这样一事实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即凡促使知识分子的笔动作起来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正也是促使人民的某个集团或阶级——农民、工匠、农业工人，或者干脆就是流浪者或暴民——动作起来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但是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群众运动建立了远为密切的接触。十六世纪革命时期农民的要求早已由知识分子为它们表述出来了，协作和合作，随着世纪的前进，稳定地愈趋密切。“革拉古”·巴贝尔，法国大革命时期内唯一纯粹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上的领导者，被认为具有十足重要性的人物，因为政府郑重其事地在1797年处决了他。英国又一次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发展。我们只要从这个角度来

条中的无意义的或幻想式的东西决不能完全成功的原因。通俗的社会主义的呼吁，并来自能够理智地证实的东西，却分明来自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一致加以谴责的神秘的异端。社会主义者在试图和它保持一定距离中，并不老是忘恩负义地对待把他带上岸来的波浪的，他也向那其力量必可甲冑上阵用于别种用途的危险乞求爱情。

比较十七世纪平等派运动和十九世纪的宪章运动就行了。在平等派运动中，温斯坦莱单枪匹马地参加和领导了运动，在宪章运动中，知识分子诸集团成为一个团体来进行反抗，虽然他们的合作逐渐尖锐化而变成基督教社会主义，这并不仅仅是和当代群众运动完全脱离的学者们的秘密小组的问题。在法国，最好的例子是路易·勃朗 1848 年的活动。所以，就这个方面，和就其他方面一样，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之处，与其说是性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未成年期的社会主义者和阶级运动间的关系是偶然的，照例不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来说，这种关系就变成了根本原则性的问题，并且类似于一个政府和它的常备军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之点——我希望它不至于成为一种障碍物——还有待于说明。我曾说过，断定存在着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①，同时这种趋势又和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间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两者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严重的政治因素的必需条件——的这种学说肯定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建立起来的，其所采取的办法，逻辑上说来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办法。马克思和他的大多数同代人坚持工人阶级是唯一积极参与这种倾向有积极的联系的阶级，从而也是社会主义者应该登门拜访的唯一的力量来源，由此赋予他们的学说以一个特殊的见地。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首要的意义是把劳动从剥削中解放出来，而“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

① 要知道这句话的确切的意义，读者可回过头去看我们在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所作的讨论。这里，它指下列两件事：第一，社会的诸现实力量，不管它是合意的还是不合意的，正在支持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将愈来愈取得某种实践命题的性质。第二，既然如此，采取社会主义路线的请政党就有了现成的活动地盘。后一点，将在第 25 章加以讨论。

阶级自身的任务”。

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劳工利益的彻底胜利，作为实践上的命题，比任何其他事业更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以及他的学说为什么这样形成的原因。但是这个观念的根子，即在某些非社会主义思想中也扎得如此牢固，甚至要全然抹煞一些事实要费很大劲才能巧辩过去的这样一些事实，即：劳工运动虽然时常和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直到今天依然是和社会主义迥然有别的另一回事，而且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者要在他们的信条被认为当然之事的工人的势力范围内巩固地立定脚跟也决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事实，应该看清楚，劳工运动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恰如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是劳工的或无产阶级的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可怪之处。因为我们已在第二篇中看到，资本主义过程虽然缓慢地社会化了经济生活和经济生活以外的许多东西，这个过程却是整个社会机构的转变，它的一切部分受到同等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和它的社会权势在这过程中都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愈来愈变得无力处理劳工的麻烦问题了。但这是马克思的，劳工因日益愈来愈难以忍受的苦难而被赶进伟大革命中去的这幅图画的蹩脚的代用品。如果我们丢开这幅图画，领会到实在增加了的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的分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瞧不起那用进化的逻辑向工人提出的特殊的召唤了。更不能令人信服的是马克思给无产阶级在社会悲剧的最后灾变中派定的角色。如果转变是渐进的，工人阶级可做的事情就不多。如果真有一次伟大的革命，无产阶级不过是被威吓而不得不赞成这次革命而已。矛头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助手是半刑事犯的暴民。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不过是“空论”——正如任何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一样只是一种空想。

因此,虽然下面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即马克思不象他的大多数先辈,他意图加以合理化的只是个现存的运动而不是某种梦想,还有,他和他的后继者也确实赢得了这个运动的部分的控制权。但他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比马克思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的为小。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有更多的现实主义,而马克思思想中却有比他们所承认的为多的非现实主义的梦想。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会看重未成年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排它地着重无产阶级这个方面。特别是,他们向政府或向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发出的呼吁,在我们看来,要比在马克思看来少些幻想的成分,多些现实的成分。因为国家,国家的官僚体系,和为政治发动机配备人力的诸集团,对寻求他的社会力量来源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是前途极有希望的。正如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看得明白了的,他们大概也会以并不略逊于群众的“辩证的”必然性走向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方向。而且,我们称之为费边社会主义^①的那种资产者阶层身上的赘疣也是大有参考价值的。这样,马克思对社会推动力量的选择产生出一个特例,虽然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例,可是在逻辑上却处于和正统派认为是骗子和异端等的这些人的同等水平上。

^① 见第26章。马克思主义者天然会回答说,这些现象不过是真的派生品,不过是无产阶级大行进影响下的产品。如果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后者是产生和继续产生前者的局势中的因素之一,这是正确的。但采取这个意思以后,这个命题不能构成一个反对论。如果它的意思是指,在无产阶级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单面的或纯粹的因果关系,这个命题确实构成一个反对论,但是它是错误的。第二篇所描述的社会心理过程,用不到任何自下而上的压力就会产生出、甚至有助于产生这种压力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不久我们就要看到,假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开路人的话,社会主义究竟会在那里,那末这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问题。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领袖,社会主义(和工会类型的劳工运动不同的社会主义)还是会在乌有之乡。

第二十五章 马克思面临的形势

1.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1847年采用了“共产主义”这个名词,而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因为这时候社会主义带上了某种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风味。不论事情真相如何,也不论如果这是事实我们怎样来解释这一事实——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知道,尽有良好的理由把社会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产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毫无怀疑余地的。资产阶级血统和资产阶级传统的亡命者——这个公式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和他推荐的政策和政治策略的好多问题。使人们大为吃惊的是他的思想流行的广度。

首先,这位被扫地出门的知识分子,带着1848年的、形成了他的人格、永远铭刻在他整个灵魂上的经历,抛弃了他自己的阶级,他的阶级也抛弃了他。从此以后,他所能接近的和不得不加以信任的,就只是同样被扫地出门的知识分子,以及,隔得远一些的无产阶级大众。这说明了我们在前章见到的,确实有待于说明的他的学说,即工人将“解放他们自己”的那种学说。

第二,这位被扫地出门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在心情上变成了国际主义者。这件事情的意义,超过了任何特定国家——甚至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它们的盛衰兴亡不是他首先关心的所在,以及它们总是他的兴趣所不及的意思。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要创造出超国家的社会主义宗教,要设想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其组成部分至少在原则上是更密切地互相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和他们的异阶级的同国人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这样做,对他来说是容易得多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冷酷的逻辑构成这种显然不

现实的概念，可以构成意味着过去历史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诸政党外交政策上的观点的全部东西。但是，那时这些概念就得和民族环境的全部感情上的影响相抗争，而且它也决不能被一个千丝万缕地和某个国家结合在一起的人所热烈信奉。对马克思来说，这些羁绊是概不存在的。他自己没有祖国，所以他容易使自己深信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不久，我们将明白，为什么这种教义能够继续存在，还能存在多久，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它被弄成了什么意思。马克思本人无疑是接受它的不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涵义的。他确实认为，不仅“资本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不相干，而且也认为它们是更完备地征服无产阶级的手段。也许他不能不作出下面这样的让步，即一个人当自己的国家受到攻击时，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和忠于信仰的人的责任并不是不相容的，这种让步显然只不过是一种十分必要的策略措施而已。

第三，不管他的学说是什么^①，这位被扫地出门的资产阶级分子身上的血液里而有民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价值图式中以民主为中心的这一部分信念，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对他的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社会模式特具的诸条件的理性认知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策略问题。真的，如果不是在当时人们理解的民主主义原则的环境下，而是在任何别种流行的信仰环境下，社会主义活动（以及他本人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起码是得不到一点点安慰的。除去极少数例外，哪一个反对派都得挺身为自由奋斗——对他来说这就是民主——并把自己交给“人民”摆布。当然，这个要素过去是，在某些国家内现在还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这恰恰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政党之宣布民主信念是没有什么意义

^① 见第20章及第23章。

的，除非他们的政治权力大到足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以及为什么，对于在社会主义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之间建立任何根本关系，这种信念的宣布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但是若说对马克思而言，民主是用不着作什么讨论的东西，民主是高出任何其他政治模式的，这种说法看来仍然是不会错的。这一点，当然十分适用于 1848 型的革命。^①当然，要他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接受这样重要的一宗资产阶级信仰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会暴露出最不方便的广阔浩渺的一致点来。但在前篇内我们已经看到，他懂得怎样解决他的困难；他大胆地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根本不是民主。

2. 这些就是马克思的政治上的先验的前提^②。用不着强调，这是和他的时代的，也是和任何时代的一般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先验前提完全不同的——区别之大，几乎使相互同情，甚至相互间的充分了解都不可能，而且这和黑格尔主义或其他教义上的壁垒完全无关。如果我们拿马克思和另一个具有十分类似背景的德国知识分子拉萨尔（1825—1864）相比，这种区别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极相类似的文化传统模型中铸造出来的同一种族的苗裔，同一阶层的产物，两个人都受到 1848 年经验和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形态的同样的影响，拉萨尔却和马克思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是人身条件的方程式所不能整个地予以说明的。比这远为紧要的是，马克思是流亡者而拉萨尔却不是。拉萨尔从来没有把他自己跟他的国家或

① 他在 1848 年的激动的态度，也使他不可能了解流放了他的非民主的制度，真说公平处理它了。冷静的分析，一定能够弄明白它的成就和前途，但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分析是他所做不到的。

② 我所学的语言中，没有哪一种正式承认这个词是一个名词。可是用作名词，却是很方便的语法背反。〔作者在这里把 *a priori* 变成 *apriori*，即把“先验地”用作“先验的前提”——译者〕

者跟无产阶级以外诸阶级脱离关系。他从来不是马克思那样的国际主义者。他用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无产阶级。他不反对和当时的国家合作。他并不反对和俾斯麦或和巴伐利亚国王作亲身的接触。这些事情是重要的，也许比最奥妙的学说上的分歧更为重要，重要到足以产生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和无法调和的对抗。

让我们现在也采取马克思的先验前提的立场探索一下他所面临的^①政治条件。

首先，马克思所写所想的庞大的产业群众，除英国而外，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即在英国，宪章运动正在他找到他的方位的那段时间中渐渐消失，工人阶级变得愈来愈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了。人们在早期激进活动的失败中受到了挫折，现在转过身去不理睬昙花一现的政纲和他们对总产品权利的歌曲。他们清醒地参预到提高他们在总产品中份额的某种努力中去了。领袖们小心谨慎地试图在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范围内，确立、撑持并增大工会的法律身分和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和在明显的策略考虑上，他们势必要把革命观念和革命活动看做有害的事情，看做对于劳工的严肃业务的愚蠢而轻狂的怠工。同时，他们所关心的是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低级阶层则怀着近乎蔑视的心情。

总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以他们当时的风格，决不可能想到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去组织产业无产阶级或产业无产阶级的任何特殊集团。他们所能希望的不过是和领袖们、以及和工会官僚接触。一方面看到“体面”工人的那种态度，另一方面看到大城市内（当时）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暴民的态度^①

^① 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十分喜欢说到无产阶级暴民（流氓无产阶级 Lumpen proletariat）的。

(后者是他们几乎不愿意去组织的)，他们面临了一种令人厌烦的两难局面。他们不能不承认，当时快要逐步完成的把群众组织成为有些象一个明确的阶级的巨大任务——这就是说，解决他们自己觉得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工会运动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他们完全处身于运动之外，并且领会到这个阶级大概要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采取某种资产阶级的态度，他们势必要厌恶并不信任那些工会，恰如他们自己会被那些工会所厌恶和不信任——如果他们究竟被注意到了的话——一样。这样，他们就被赶回到作为古典社会主义特征的那种地位上，这种地位直到今天，(虽然已经大大减低了其重要性)还表示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劳工间的根本对抗(在一些重要事例中，可以约略等同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间的对抗)。对他们来说，工会运动是应该改宗阶级战争教义的某种东西：作为一种劝诱改宗的手段，当劳工纠纷使群众激进化了，并充分窘住了或使工会职员不得不去诱导群众来听讲福音的时候，不时和工会的合作，对信徒们说来是正当的。但是只要改宗还未完成，特别是只要工会的意见原则上还反对革命行动，或者干脆反对政治行动的时候，运动就不受上帝的恩宠，相反是错误的，是误解了它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以比琐屑更坏的陈腐平庸欺骗了自己的，从而除了为要从里面钻孔打眼而外，信徒们只该敬而远之。

这种局势，即在马克思生前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恩格斯生前，变得更多。终于也在大陆上成为一种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和随这时期的萧条以俱来的失业，增加了他们对于劳工领袖的影响，虽然他们从来也没有对群众发生过什么直接的影响。归根到底，供给他们以工作材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虽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成功是可观的，知识分子给他们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比

工人对他们的冷淡，偶然还是敌意式的冷淡所给予他们的麻烦更多。有那么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既不反对和工会合作，也不反对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以至保守主义类型的社会改革相提携。这些，当然会实行一种十分不同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由于约许了即刻到手的好处，因而是危险的竞争者。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其间占首位的是拉萨尔，他已经在群众中赢得了地位，这些知识分子更是直接的竞争者。最后，还有一批在革命热情方面走得够远的知识分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正确的把他们当作严肃的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象布朗基那样的“起义者”以及梦想家，无政府主义者等等，无论出于教义上的考虑或是策略上的考虑，都使得他必须用一个断然的“不”来对付所有这一切集团。

3. 这种教义的背景和策略的形势，使马克思很难为两个重要的问题找到答案，这两个问题是每个追随者和自认的追随者一定会提出的：即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各政党的态度，以及现下的政纲如何规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决不能劝社会主义政党不声不响地监视着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的明显的任务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暴露阶级利益的假面具，指出在社会主义天堂里面每件事会怎样好法，以及打起鼓来征募新成员；总而言之是批评和组织。可是，任何略具政治重要性的政党都不可能长期保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虽然它作为原则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和有组织劳工真正痛感需要之处发生冲突，并且，如果坚持稍久就会使追随者的人数减少为一小撮政治上的苦行僧。考虑到马克思的教导在1914年以前对伟大的德国党和许多小集团所发挥的影响，看看他怎样对付这个困难是很有趣的事。

只要他觉得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就采取逻辑上唯一的无可

指摘的立场。社会主义者必须拒绝参预资产阶级试图借以欺骗无产阶级的假改良。这种参预——后来被人们叫做“改良主义”——意味着对信仰的背叛，对真正目标的出卖，缀补理该毁灭的东西的阴险企图。象在一度误入歧途之后就去参拜圣地朝山进香的门徒倍倍尔就得到了正确的评价。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曾在1847年的共产党时代打算过和左翼资产阶级集团合作。《共产党宣言》也承认偶然的妥协和联盟的必要性，恰如它容许策略可按时间和地点的环境而有所不同一样。责成信徒们利用不同国家资产阶级间和每个国家内部各资产阶级集团间的对抗的箴言，也隐含了同样的意思——因为若没有和它们中某些部分的合作，要利用对抗是做不到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等于给原则附加上一些条款，以便更有效地支持原则。在每个事例中，例外情形都得经过严格的审查，因为推测臆断往往是违反原则的。此外，应重视的合作是在某种明确的紧急状态下的——最可取的是革命中的——合作，而不是比较持久的、包括正常政治生活中的谅解的联盟，因为后者可能会危及信条的纯洁性的。

当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他的资产阶级敌人的看得清楚会加惠于无产阶级的特殊政策时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从大师本人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实例中设定的范例推论而得。自由贸易是英国自由主义纲领中的主要政纲之一。马克思这样一位高明的经济学家，决不会看不到当时环境下这会赐给工人阶级以何等重大的恩典。恩典可以被缩小，资产阶级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动机可以被痛骂。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社会主义者确实必须支持自由贸易，尤其是食品的自由贸易。那么，他们就得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当然不是因为便宜的面包是一宗恩典——啊，不！——只是因为自由贸易会加速社会进化的步伐，从而也会加速社会革命的降临。这种策

略把戏是大可赞叹的。何况，这样的论点还十分合于真理，可以适用于好多事例。可是神谕并没有说到，社会主义者对有利于无产阶级却并不助长资本主义进化的政策——例如大多数社会改良社会保险之类的法案——或者虽助长资本主义进化却并不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策，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一旦资产阶级营垒因这些问题分裂了，道路就肃清了，因为有那样的格言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倾轧。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也会处理资产阶级以外的成分例如土地贵族和缙绅们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发起的改革，虽然在他的事物图式中没有为这类现象留下什么独立的位置。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难于解决。任何政党，若不提出约许眼前利益的政纲就不能存在。但是按照严格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不能提出这么一个政纲。在污浊的资本主义空气中所作成的或行将作成的任何积极性的事情，事实上就一定是被污染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担心这一点，并且总是劝人放弃涉及在资本主义秩序范围内的建设性政策的，因而不可避免具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气味的政纲。可是，当他们本人而临 1847 年的问题时，他们断然地用快刀斩了乱麻。《共产党宣言》十分不合逻辑地列举了社会主义政策的一批当下的目的，干脆把社会主义驳船傍在自由主义战舰旁边了。

免费教育，普选权，禁止童工，累进所得税，土地、银行、交通运输事业的国有化，国营企业的扩张，开垦荒地，普遍的义务劳动，散布工业中心于全国各地——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候)允许自己成为机会主义者到何等程度，虽然他们倾向于否认其他社会主义者具有这种特权。因为这个纲领的惊人之处是，如果我们在另外一些社会主义者那里碰见它的话发现不出什么我们会认为典型的或排他的社会主义的纲目，纲领的每一

条都可以列入非社会主义政纲——甚至土地国有化也曾被其他情况下的资产阶级作家们以其他理由鼓吹过——而且其间大多数干脆是从激进派的锅里取出来的。当然这是唯一能做的通情达理的事。但是它仍然是道地的权宜之计，显然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令人为难的实践上的弱点。设若马克思对这些项目本身的目的有兴趣，他应该别无选择地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激进派结合在一起。历史说明这些纲目和马克思无关，他对它们不感到有为之作出任何牺牲的义务；假令资产阶级激进派全部实现了它们，可以推定，这对马克思会是一件十分不称心的意外之事。

4. 同样的原则，同样的策略，同样的政治条件，产生了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上的就任演说。后者的成立，确实是从1847年德国劳动教育协会，或同一年的小国际集团跨出了一大步。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诸党的组织——虽然例如有两个德国党参加了，其中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很快就退出了——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但是许多国家的各种类型的劳工集团确实派了代表，甚至英国的工会也表现出足以使他们忍受一个时期的兴趣，不过态度不免有些暧昧，目光所及的是可能有的眼前利益，并且带着某种意气不那么相投的联盟关系。乔治·奥杰尔列名为发起人。^①协会本身和协会的某些历史家所提出的关于协会在革命运动和当代重大劳工纠纷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法，这是要打折扣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影响不大，决没有领导过什么或者控制过什么，那么至少也应该说它贡献了划一化的词藻。它建立了最后可能会把它提升到——在愚蠢得为它做广告的资产阶级好意帮助之

^① 他甚至作为协会的总委员会主席而活动过。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因为他曾是工会联盟和工会合并的最卓越的发起人之一，“伦敦各业评议会”的组织者，城市工人参政运动改革联盟的领导人之一。

下——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地位的多方面的接触。一开始事情很顺利，最初的四次大会特别成功，某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小事情，例如投票拥护遗产税原则，被正统派的成员们机巧地放过去了。可是巴枯宁的闯进来(1869)和被开除(1872)是对协会的一次打击，事实证明，协会在这次打击之后一直未能恢复过来，虽然它奄奄一息地勉强存在到1874年。

马克思一开始就警觉到，这个收容了工人又收容了立场可疑的知识分子的大杂院所必定会有的各种可能性和危险，这些知识分子显然决心看情况或是利用协会或是和它脱离关系。他们正是马克思经常要争取的可能性和经常要反对的危险。第一个任务是保持组织不要散掉，第二个任务是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两者都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即他自己的追随者总是少数，而他对其他成员的影响，比他之被请出来(或者毋宁说是被容许)作政纲演说这件事中可以推定的要小得多。结果，这次演说包括了对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让步，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让步和马克思本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1875)中吃惊地看到的观点极相类似。此后，还有不少明显的同样明智的权谋和妥协——这类事情使马克思有一次以半带滑稽的绝望口吻声明：“Je ne suis pas Marxiste”^{*}。但是妥协的意义决定于妥协的对方和作出妥协的精神。专门注意趋势的人往往可以扑灭许多偏差。很明显，马克思总是使自己经常注意自己的趋势能够在心中，并在每次发生偏差之后就能回到正轨上来。但是当他看到别人在玩同样的把戏时，他会感到不安，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因此，在他的策略性的转变路线的言行中，和在他对别人的转变路线的言行所作的刻毒指责中，都

* “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译者

存在着超乎单纯的自我主义的某种东西。

当然，此后一直成为正统社会主义政策典范的策略和原则都是有批评余地的。马克思设下的策略的例子，使追随者有可能借大师的某一行动或某一格言，实事求是地自由辩解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的行动路线。原则，已被指责为指向一条通向乌有之乡的道路。所有更重要的事情是领会它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他也相信——虽然他自己的学说本会使他怀疑这点——革命来到的时刻并不太远，恰如多数早期基督徒相信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一样。所以，他的政治方法确实是以错误的诊断为基础的。颂扬他的政治敏锐性的知识分子们^①，完全无法看出他的实际判断中有多少根据愿望作出的考虑。但是，他的视野范围内的事实和他由此所作的推断如被认为当然，他的政治方法，正如他对眼前结果的主体，对他和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桌上的交情等等的看法，就都是必然的结论。按照这种观点说来，组成一个以一切国家的组织起来了的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将一直向着目标前进而不丧失它的革命信念、不会在半路上弄湿它的火药的、成分纯洁的政党，确实是具有至上重要性的任务，与此比较起来，其他一切都是全无价值的了。

第二十六章 从1875年到1914年

I. 英国的发展和费边主义精神

这两个年头有某种象征的意义。1875这一年，是它的势力够

^① 例如，参看克罗采：《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梅莱狄斯译，1914年版。

得上作为政治上的一个因素的第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党诞生的一年。这个重大事件是经过两个德国集团——拉萨尔的集团和培培尔、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建立的集团——合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而出现的，这个党在当时（哥达纲领）虽对拉萨尔的信条作了可观的让步^①，最后却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埃尔福特纲领，1891年），并坚定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争取到了1914年它所持有的可以夸耀的地位，可是就在1914年，它和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一样，遭到了它命中注定的危机。^②在评述这种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无须作出必得要牺牲原则的妥协，而快要取得议会领导权的惊人发展之前，我们将先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事变进程，首先看看这个时期的英国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在外表上对德国党说来乃是一个十分动人、十分富于启发性的对照。

在表层底下，当然有实质上类似的各种社会过程作为这种过程的一部分，还有实质上类似的劳工运动。英国和德国在情调、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差别是容易说明的。自欧文的全国各业统一总工会在1834年崩溃以来，或自宪章运动衰亡以来，英国劳工运动已不再能激起任何决定性的敌意。它的经济目标，有些得到自由党的赞助，另外一些则得到保守党^③的赞助。例如，1871、1875和1876诸年的工会法没有发生足以刺激劳工进入好战状态的任何

① 拉萨尔的主要秘方，是把工人组织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中去，这种生产合作的目的是和私营企业竞争，最终消灭私营企业。它的乌托邦主义气味如此明显，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反感。

② 它当时在帝国议会拥有总数397个席位中的110个席位，又由于资产阶级诸集团无能组成大的内部一致的政党，所以这件事的意义甚至比数字本身所提示的意义还要大。

③ 保守营垒中出现某种赞助劳工的态度是特别引人注意的。可引为例证的，一方面有艾希利勋爵领导的集团，另一方面是青年英格兰集团（狄斯累利的托莱民主党）。

事情而平稳地通过了。何况，参政权这一仗是由非社会主义集团打出了结果的，群众除了喝采和喝倒采而外，没有什么他们该做的事。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英国劳工群众的优秀品质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英国政治社会的优秀品质也一样，它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和避免法国大革命的一次再版，和消灭面包涨价所形成的危险局面之后，进而它懂得了怎样管理愈来愈困难的社会形势，以及怎样在取得某种光荣的条件下屈服——1906年的劳工争议法^①可以为证。其结果是，英国无产阶级在变得“阶级自觉”，或在进到凯尔·哈第得以组成独立工党(1893)这个阶段之前，费去了较长的时间。但是新工会运动^②的兴起，最后预告了一种事态，其间除用语而外，本质上和德国的工会运动并无二致。

两者间的差别的性质和程度，如果我们略费时间，看看那充分表明了它的目标和方法的集团即费边协会的话，就能看得更为清

① 现时已经很难体会，仍旧相信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中心的国家 and 法律体系的人民，何以必定会被这个法案所惊动。因为在缓和了涉及和平性质的罢工纠察的阴谋法——实质上这等于意味着暴力威胁的工会行动的合法化——和在免除工会基金对非法行为的损害赔偿——实质上这等于在法律上规定工会决不会做错事——的同时，这个法案事实上把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给了工会，并给了它们以一种特权地位，这种地位是雇主协会豁免权的形式上的扩大所无力冒充的。可是这个法案是1903年设立的一个王家委员会报告的结果，当时正是保守党执政。保守党领袖(巴尔福尔)，在三读的一次演说中，并不显出什么不舒服而接受了它。1906年的政治形势无疑很可以说明这种态度。但这不足以使我的论点失败。

② 新工会主义的意思是，把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实质上局限于技术行业的，而且是已经培养起职业的自豪感和资产阶级式的体面感的正规而稳定的组织(八十年代某些领袖如克劳福特，老是强调把工会中可敬的人们和无产大众分隔开来的鸿沟)扩大到他们下面或多或少非技术的阶层。这些阶层对于他们的讨价还价力量感到很没有把握，从而更易接受社会主义宣传，更易接受、单纯的罢工是不可靠的武器、应该由政治活动来补足它的主张。这样，在工会运动的向下扩展，和工会态度转向政治行动和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之间，是存在着重要的连带关系的。从这时——即1889年的船坞工人大罢工后二三年——起，工会全国大会开始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决议。

楚。马克思主义者将以轻蔑的微笑对待这种做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必然是对一小撮从来不想成为任何其他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显著的夸张。实际上，费边主义者之在英国，或者他们所体现的态度，正和马克思主义者之在德国一样地重要。

费边主义者出头露面于1883年，在本章涉及的时期内，一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小集团。^①他们来自边沁和密尔，并继承他们的传统。他们和他们之前的哲学激进派一样，对人性抱着极大的希望。他们按照这种的实事求是的进步主义，致力于合理的社会重建和社会改良工作。

他们谨慎小心地对待他们的论据，他们中间有些人不辞无尽的劳苦，通过范围宽广的研究，通过对各种论点和政策法案的批判来搜集论据。但是他们之对待他们的目标的文化和经济上的根本原则的态度是十分无批判的。这些，他们都认为是当然之事，这不过等于用另一种方法表明，他们象一般善良的英国人一样，把自己的见解看做是当然之事。他们不能理解贫民窟和贵族院之间的分歧。为什么这两者显然都是坏东西？这是常识，不是么？较高级度的经济平等，印度的自治，工会或自由贸易，显然都是好东西，谁能怀疑它？必需思考的，不过是怎样清除掉坏东西，怎样保证好东西；除此而外，一切都是激怒人的无用的事情。诚心诚意地献身于公众服务的精神正和他们对于个人的和全国的价值判断的其他观点的不容忍态度——所采取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样僵硬——以及对于包括审美观点在内的任何贵族性质事物的小资产

^① 这个集团，它的成员从未超过3000至4000人，实际上比会员人数所表示出来还要小些。因为它的活动核心，大抵不超过会员的10%或20%。这个核心在背景上和传统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在别方面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成员的大多数，按他们至少有勉强强足以过活的家产这一点而言，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阶级的愤慨一样都是十分显著的。

最初，谁也没有支持费边主义者。谁愿意听，他们就劝导谁，他们就由此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向工人阶级和资产者群众讲课。他们能干并且广泛地写作并发行小册子。他们推荐某些政策、计划和法案并为此而斗争。可是，他们影响别人的最重要道路是和个别“关键人物”的接触，或者无宁是和政治界、产业界、工会领袖的左右人物的接触。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在这个国家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提供了建立和利用这些接触的极好的机会。

英国政治社会并不总是接受外人的劝告的，但是，它比起任何其他社会来要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得多。有些费边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的局外人。有几个人善于利用他们在牛津、剑桥的学生联合会和学校谈话室内形成的关系。他们在精神上说来并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他们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全都强调愿意合作，而很不愿意采取敌对态度。他们不准备出来组织政党，他们很不喜欢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词藻。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愿意使自己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而不愿成为别人所厌恶的人。他们对议会活动家或行政当局经常提出意见，而后者也往往欢迎他们关于应做什么和怎样做的建议。

一个现代的内阁部长，一般都能在自己的部内找到大部分他所需要的情报和建议。特别是，他决忍受不了统计资料的缺乏。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却不是这样。除了极罕见的例外，各级文官只懂例行公事，此外就所知很少了。除了原有的政策而外，当权的议会活动家，特别是在野的议会活动家，常常感到，尤其在“新”社会问题领域内缺乏论据和观念。这么一个集团，它拥有一批论据

和观念，又总经常乐于把他们端上来，安排得很妥贴，随时可供议会中的政府席或其他座位上的人们使用，当然该有门路可进，尤其是从后门。文官系统接受了这批货色。事情还不止此，由于他们至少同情费边主义者的眼前目标到某种可观的程度，他们乐于向他们请教。费边主义者反过来也接受了这种非正式的公仆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角色完全适合于他们。他们个人并无什么野心。他们喜欢做幕后的服务。他们经过他们预见了其人数和权力要不断增长的官僚机构体系来活动，他们认为这十分适合于他们的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总图式。

但是——马克思也许会这样质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小集团（兴得曼的民主联盟，诞生于 1881 年）也确实这样质问过——若不说这等于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的共谋，这种成就还能算是什么东西？它毕竟怎么能称为社会主义，如果能，这岂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版本（按前面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难设想，费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彻底地互相憎恶，由衷地蔑视对方的幻想，虽然费边主义者的作风是避开根本原则和策略问题的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喜欢进行这种讨论，且以一种轻微的保护者的同情态度对待对方的。但是对独立的观察家来说，答复这些问题是并无困难的。

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努力，在任何别的时候是会一文不值的。但是在 1914 年前的三个十年中却有不少价值，因为那个时期的事物和灵魂正适合于这种道理，激进成分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是不适合的。当时所需要的，正好是为了使可能性转变为明确的政策的现有舆论的表述和组织，而费边主义者所提供的“有组织的表述”，就是最工人风格的一种表述。他们是改良主义者。时代精神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目的

是要帮助社会的根本重建，其结局是使经济事务成为公共事务。他们是志愿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在任何早期阶段中他们就会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尽管如此，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果实等着他们去采摘，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涵义就不适合他们。从他们的立场来说，用谈论革命和阶级战争使资产阶级这个狩猎目标警觉到危险，无异于发疯。阶级意识的觉醒，正是他们所要避免的，至少开始时应该如此，因为这将使和平地但是有效地传播他们的原则到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中去成为不可能。当时机已臻于成熟时，他们毫不踌躇地去帮助独立工党成立，去和1900年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合作，使工会开始走上它们的政治生涯，制定进步党在伦敦郡会议中的路线，开始宣扬市政社会主义然后是总的社会主义——最后是宣扬苏维埃制度的优点。

无疑，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偏向，即容易把主题理解为恶评。但是，归根到底，如果说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更马克思主义的响亮的战书，从来没有告诉狩猎对象他们准备用什么来对待它，那么，他们也从来没有要去保护它。还有另外一种的从相反的立场加予费边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们的程序方法，故意冒着被绊住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围保卫战上的危险，而这可能不会导致对阵战，这种批评未能考虑到他们所采取的特殊态度。可以代表他们作这样的回答，如果说他们尽一切可能攻击了资本主义，却充分成功地改造了它而没有杀害它，那么，这正是值得庆祝的事。至于说到对阵战，他们用以答复从革命方面来的批评的，是进一步以非凡的巧妙采用了那位罗马将军的名字*，这位将军由于他的谨慎小心，在把汉

* 费边(法比优斯)，公元前三世纪末罗马共和国的将军。——译者

尼拔从意大利赶走的战争中，比他的任何一个鲁莽的前任起了更多的作用。

这样，虽然说费边主义在阶级战争问题上和在别的问题上一样正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大概是说出了真理，但是认为费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比马克思本人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也是不错的。集中注意于实际政治范围内的问题，步调一致地和社会事物的进化一起前进，让终极目的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确实比马克思本人嫁接其上的革命意识形态更符合于马克思的基本学说。对资本主义的迫近的灾变不抱任何幻想，懂得社会主义化是缓慢的过程，这种过程会把社会的一切阶级的态度转变过来，仅此一点，甚至还表明了基本学说上的优越性。

II. 瑞典和俄罗斯的对比

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它们对人类文化价值宝库所作贡献惊人地和它们的规模不相称的大陆国家——尤其是尼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情形和英国的范例出入不大。以瑞典为例。象它的艺术、科学、政治、社会制度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它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迥然有别于其他国家，不是由于原则或意向上的任何特色，而是由于形成瑞典这个国家的材料，和它的例外地匀称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别的国家若试图抄袭瑞典的例子是荒谬的；唯一有效的抄袭办法是把瑞典人搬进来，并要他们负起当家的责任。

只要瑞典人是瑞典人，瑞典的社会结构是瑞典的社会结构，我们在了解它的社会主义的两个突出的特征方面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几乎总是得到巧妙而谨慎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十分正常的社会过程合拍地缓慢地成长着，不作任何超越正常发展的推

进的打算，不为了对抗而进行对抗。因此它的取得政权并没有产生任何混乱。负责任的职位自然而然归于它的领袖，取得职位的领袖能以平等关系，而且多半在共同的基础上和其他政党的领袖相接触：到现在，虽然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当然已经形成，但日常政治上的分歧已降低为例如在大家接受的某一社会用途上，到底应多花费还是应少花费几百万克朗之类的问题。而在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间的对抗，只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因为，按照两者的水平，他们间不存在什么巨大的文化上的鸿沟，又因为瑞典的社会机构比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出相对少量的无法就业的知识分子，所以被触怒了，和怀有愤慨情绪的知识分子比其他任何地方要少。这就是有时候被描述为工会对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尤其是对党的“削弱性控制”。对于沉浸于流行的激进主义词藻中的观察家来说，这似乎是确有其事的。但是这种诊断，对瑞典的社会和民族的环境来说，全然有失公平，因为在那里，不仅工人，而且知识分子都是这种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阻止他们二者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提升为宗教。虽然这种模式在马克思的教导中大概也能找到它的位置，当然不能期望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用某种好意来看待瑞典典型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甚至承认它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努力的一个并非冒充的例子。瑞典社会主义者所带的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是很轻微的，虽然他们频繁地使用符合于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礼仪的用语，尤其是在他们和其他社会主义集团的国际交往中。

在天平的另一端，在俄罗斯，我们看到一个几乎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充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的，但是同样容易从它的环境方而去理解它的社会主义。沙皇俄国是前资本主义特色极浓厚的一个农业国家。产业无产阶级，就职业的社会主义者所能接近的来说，不过是一亿五千万左右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①商业

和工业资产阶级，数量上也相应地微弱，他们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不更有本领，虽然国家培养的资本主义进化正在急剧地集合它的力量。插入到这个结构中的是一个知识阶层，他们的思想，对这块地方来说，恰如俄国社交界妇女的巴黎时装一样，是十分陌生的。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盛行的政治形式——统辖着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专制君主，和它联盟的是土地贵族和教会——当然是可恨的。全世界的舆论接受了他们对历史的解释。甚至最敌视那继承沙皇政权的那个政权的作家，也总要匆匆忙忙地向他们的读者保证，他们对沙皇制度这个怪物是很厌恶的。这样一来，简单的真理就在标语口号的迷宫之中被弄得糊里糊涂了。事实上，这个政府形式之适合于产生了它的社会模式，并不亚于英国的议会君主政体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官僚政治的业绩，考虑到它必得在其中工作的环境条件，远比人们要世人相信的为大；它的农业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它的走向稀薄的宪政的踌躇的步伐，按它的环境而言，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了。同民族精神冲突的是外来的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而不是沙皇君主政体，因为后者对一切阶级的最大多数人有极强的理解力。

两个结论可从上述这一点推论而得，初初看去，这两个结论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虽然没有一个严肃的史学家会认为如此。一方面，循着组成了卡捷特党（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的律师、医生、教授、官吏们所渴望的方向大踏步地或突然地向前行进是不可能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政纲为君主所无法接受，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力量太弱。容许他们执政，就意味着容许一个比实行沙

① 1905年工厂就业工人，约为一百五十万人。

皇主义的集团拥有更少而不是更多群众支持的集团执政，也意味着容许一个对于群众的感情和利益怀有更少的同情而不是更多同情的集团执政。资产阶级政体在俄国是没有发挥作用的机 会的，更不必说社会主义政体了。也不能把法国 1789 年的形势和俄国 1905 年的局势相比拟。1789 年摇摇欲坠的社会结构是过时了的，它挡住了这个国家的几乎一切有生气的东西的前进道路，无力应付迫切的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可是俄国 1905 年的情形并非如此。由于从日本人手里吃了败仗，威望受到了损失，结果是产生了不满和骚动。但是这个国家证明它自己是对付得了它的任务的，它不仅能够镇压骚乱，并且也能解决骚乱背后的各项问题。在法国，结果是罗伯斯庇尔，在俄国，结果是斯托雷平。如果说沙皇制度的生命象法兰西旧政体那样已经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认为，若不是世界大战加于这个社会组织上的过度紧张，俄国的君主政治就无法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平地改变自己。^①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社会结构根本上是稳定的，所以没有希望通过正常的方法取得胜利的知识分子才被迫采取绝望的激进手

① 这个分析，当然惹起一些大有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我们习惯上所称的历史必然性的性质，另一方面涉及个别领袖人物的品质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我认为，很难说俄国是被冷酷的必然性赶上战场的。至少，和塞尔维亚争吵有关的利益并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914 年的国内局势，还没有到非以军事侵略为最后手段不可的程度。前者无疑激动了民族主义者，后者则激动了某些（并非全部）极端反动派，两者都是一批打算趁水混摸鱼的个人和集团。但是，那位末代沙皇只要有一点点应有的小心和坚定性，无疑就会避免参战。高立斯战役之后，当局势已十分明显，取得军事成功的希望已成泡影的时候，要挽救这场惨祸当然比较困难，但还不能说是办不到的事。甚至在君主政体倒台以后，认为克伦斯基政府如果谨慎地节省它的资源，拒绝屈从于协约国的再三再四的要求，不下令作那次绝望的最后进击，仍也挽救不了局面，也决不是正确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沙皇社会，和革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竟以

段，走上犯罪的暴力的道路。他们的激进主义是激进程度和它的实际可能性成反比的那种激进主义，也就是萎弱无能的激进主义。暗杀也许是无谓的，它只会惹起镇压，但是除此而外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太多。而兽性的镇压方法又产生了复仇主义，于是悲剧展开了，凶暴和犯罪的悲剧不断地互相加强，这正是全世界看到了和感觉到了的，也是我们可望作出的诊断。

可是马克思决不是起义主义者。对于若干俄国革命的小丑，尤其是巴枯宁型的小丑，他瞧不起他们，并对他们怀着憎恨的感情。此外，他应该知道——也许他真的知道——俄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能满足按照他自己的学说说来是使他的那种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甚至出现所必需任何一个条件的。但是，如果说逻辑上这该会阻止俄国知识分子信奉他的教义，那末我们也不难了解，为什么事实恰恰相反，他的教义在他们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是——严肃程度不等的——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的目的却是模糊的。这里正好有一个威力无可超越的革命福音。马克思的灼热的词句和千年至福的先知式的预言，恰恰是他们为了越出虚无主义的旷野所需要的东西。何况，这个经济理论、哲学和历史的混合物，适合俄国人的口味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至于这个福音十分不

一种瘫痪状态眼看着日益逼近的灭亡，这既是千真万确的，也是难于解释的。现在，一个营垒中的集体性的萎弱无能，和另一个营垒中的精明练达和生气蓬勃，当然都不能委之于偶然的机会。但是在这个事例中，老政体的萎弱已能不过等于它无力对付一种完全瓦解的局势而已，而这种局势原是无耻地可以避免的。

读者大概不会料到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和它的环境条件的分析会跟托洛茨基的分析（《俄国革命史》，伊斯脱曼的英译本，1934年）相一致。最为意味深长的是，两者间并无极大的差别，尤其是，托洛茨基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即如果革命所冲击的是“另一个沙皇”，事情将变成什么样子。他诚然驳回了从这种考察中显然会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强迫我们忽略个人因素，虽然看来他不会承认个人因素在俄国革命的诊断中的全部重要性。

适用于他们的情况，也实在对他们提不出什么诺言，那又有什么关系。信仰者听到的总是他所要听的，不管先知实在说了些什么话。愈是实际形势远离马克思所设想的成熟状态，俄国知识分子——不仅其中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就愈容易到他那里去寻找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

这样，早在1883年，一个马克思主义集团就出现了，而到1898年它就发展成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以及开始时的成员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虽然“群众”中地下组织活动所获成功，足以使同情的观察家说到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的各工人集团的一个联合组织。这说明了在俄国并没有碰到有着强大工会的诸国的马克思主义集团所碰到的困难。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参加组织的工人之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是极度驯顺的，甚至很难得妄想为他们自己决定什么事情。结果，教义上和行动上的发展，都循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并具高度水平。这自然而然引起了德国卫教者们的祝福，当他们看到〔工人们的这种〕拱手旁观的美德，显然觉得马克思的、认为严肃的社会主义只能从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中脱颖而出的命题必有例外情况。可是普列汉诺夫这位1883年小组的奠基人和党的最初二十年的领导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才气横溢而渊博的贡献曾博得举世的尊敬）却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命题，因此他是决不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的。当他在英勇地为反对改良主义和反对威胁着教义纯洁性的同时代其他一切异端而打那次漂亮仗的时候，当他支持对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的信仰的时候，这位真马克思主义者必定也曾经对党内倾向于在不久将来作直接行动的一个集团的兴起感到担心，虽然他对这个集团和它的领袖列宁是同情的。

使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次不可避免的冲突

(1903)，它的意义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两个集团的名字所暗示的纯粹策略问题上的不一致。当时，任何一个观察家，不论他如何富有经验，都不能完全懂得这次分裂的性质。现在，诊断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两个集团都保持着的马克思主义辞令，把其中之一已经无可挽回地背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件事弄得蒙眛不可辨了。

列宁对俄国局势显然不抱任何幻想。他看出除非沙皇政体因军事失败而暂时削弱，是不能成功地打击它的，他看出，在继军事失败而来的瓦解中，一个坚决的纪律严明的集团借助于无情的恐怖，可以推翻任何一个企图取代沙皇政权的其他政权，他对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可能，看来比随便什么人都认得更清楚，他决心为它准备一种合适的工具。农民的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俄国，这当然构成了有关的社会问题——对他没有什么用处的，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必须等待工人自动起来这样的理论，对他的用处更少。他所需要的是，除了他的话而外谁的话也不听，任何禁忌也没有，对理性和人道的呼声完全麻木的一支训练精良的革命近卫军式的亲卫队。在这样的环境下而，按所要求的品质而言，这样一支军队只能从知识阶层中招募，所可利用的最优良的材料，应在党内寻找。所以，他之觊觎党的控制权，等于打算毁灭它的灵魂。多数派和他们的领袖马尔托夫必定感觉到了这点。他并不批评马克思或者鼓吹什么新方案。他用马克思的名义抵抗列宁，并挺身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群众党的学说而奋斗。这分新奇的乐调是列宁谱出来的。

从无法记忆的时代开始，异端派总是宣称他们出来不是要毁灭现在通行着的福音，正相反，他们是为了试图恢复它的原来的纯洁性。列宁也采用了这种历来受到尊重的手法，他不背弃他的忠诚，却高举了马克思，并把马克思提高得超过了马克思。他最多不

过作出了这样一个榜样，其含义包含在大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欢迎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里。读者容易看到，列宁不难在某种严格范围内，采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实质。可是，同样不难看出，他确从这个堡垒出击占领了本质上非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是仅仅指在显然不成熟的局势下用檄文来实现社会化的观念；更多的是指，“解放”不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说的，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工作，而是统率着暴民的一伙知识分子的工作。^①这一点所指的意义，超过了关于鼓动的办法和关于妥协的不同观点，超过了对马克思主义次要观点上的不同看法。这意味着乖离它的最核心的意义^②。

III. 美国的社会主义诸集团

美国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证明了它和俄国一样不利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成长。这样，二个事例显出了一些类似点，它的饶有兴趣，并不亚于其区别点。如果说俄国的农业世界，

① 事实上，和刑事犯罪分子已有联系，虽然不是由列宁本人而是由亲临现场的副官们联系。这就导致了在俄国本部和波兰发生的“剥夺者”(“ex's”)，(从事于实际“剥夺”，即拦路抢劫的突击小组)的活动。这是纯粹的匪徒行为，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囫圇吞下了关于它的一种辩解“理论”。

② 为了我们的目的，不必进一步评述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的细节。下面这些摘要也就够了。列宁征服俄国社会主义党的工作并未成功，相反，它们的领袖们嗣后抽身离开了他；他们处境的困难，是由于他们希望保持有点象统一战线局面而又不能抛弃他们的原则，普列汉诺夫的摇摆可以作为最好的证明。但是列宁在保持他的集团的团结，抑勒它使它听话，调整它的路线使之适合1905年革命及其余波所引起的问题，包括一个列宁主义分子出现于杜马之内等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同时他也成功地和第二国际保持了接触，保持了他在第二国际内的地位(见后)，他出席了三次大会，有一个时候，他代表俄国党参加了它的国际局。如果说他的观点和行动象给俄国社会主义者多数派以深刻印象一样也给其他国家的代表以深刻的印象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第二国际和一般西方的社会主义舆论，都不过把他看作正统社会主义左翼

虽然俄国农村结构中原来就有共产主义的气味，但它实际上是不会感受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影响的，那么美国的农业世界，提供了某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它准备消灭一切重要到足以引起它的注意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活动。如果说，俄国的工业部门未能产生出重要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是因为资本主义进化实在太慢，那么美国工业部门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资本主义进化是以令人晕眩的步伐向前冲进的。^①

最重要的区别存在于两者的知识分子集团之间。美国和俄国不一样，直到十九世纪末，它并未产生出一批就业不如意并饱受挫折的知识分子。从开发国家经济潜力这个全民任务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价值分类表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人去做生意，并把生意人的态度铭刻在民族灵魂之中。除纽约以外，我们的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屈指可数的。何况他们的大多数还都接受了这种价值分类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大街就不听他们的话，并且本能地向他们皱眉头，这在训诫他们方面要比俄国政治警察所采用的方法有用得多。

的突出人物，厌烦他和他的不屈的极端主义，在某些方面赞美他，但在其他方面却并不把他看得太了不起。这样，在他的政治领域内，他扮演了双重的角色，这和沙皇政体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可说无独有偶，沙皇政权的国际态度（例如它的发起国际仲裁和国际安全）也是和它在国内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这些成就也好，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也好——其中大多数实在平庸（顺便说，和托洛茨基的一样平庸）——都不会保证他处于社会主义者的前列。伟大之加到他的头上，是俄国在世界大战中崩溃以后的事情，它既是使他的武器够用的各种情况的微妙结合的结果，也是他使用这种武器的特出才干的结果。拉斯基教授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见条目《乌里扬诺夫》），在这方面（虽然不是在其他方面）对他的拜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还要作这样一个假定，即知识分子是必然会屈膝在他们时代的偶像之前的。

①“边疆区”的存在，当然大大减低了磨擦的可能性。这个要素的重要性虽然是大，可是好象估计得过高了。工业进步的步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业边疆，而这件事比收拾行李包到西部去的机会要重要得多。

中等阶级对铁路、公用事业和一般大企业的敌视，几乎消耗了当时的全部“革命”精力。

具有通常才能的体面的工人是一个生意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他成功地致力于利用个人机会爬上去，或者，起码也得尽可能有利地出卖自己的劳动。他谅解，而且大大地沾染了他的雇主的思想方法。当他发觉和同一个商行内的同事们结盟是有用的时候，他就用这种精神这么做。大约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种做法愈益采取雇员委员会的形式，雇员委员会是战后在公司市镇中取得了充分的经济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的公司工会的前驱者。^①

除此以外，对工人说来，和他本行手艺的伙伴们作全国规模的结合，以便进一步直接地改善他对雇主讨价还价的地位，间接地改善对别行手艺的地位，常常是一宗好买卖。这种利益，塑造了很多典型的美国工会，有力地说明了所以采用在摒除自认的新参加者方面比其他原则远为有效的行会原则的原因，并真正产生了工人的卡特尔。这种卡特尔天然足以表现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国内外社会主义者和同路人所浩然叹息的。激进主义的缺乏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工资率和工作小时；在此外的一切事情中，特别在他们的措辞中，他们十分愿意研究公众的愿望，甚至研究雇主的愿望。

① 这种制度的平凡的意义及其特别适合于美国的条件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它之成为后期类型的工会和激进知识分子的眼中钉一样。因此，我们的时代的口号——最近才正式化的——给公司工会打上了雇主阻挠有效地代表工人利益的努力的恶毒企图的产物这样一个烙印。从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应该具有道德原则的性质这一观点——以及从（劳资）合作状态正在我们面前成长这一观点——出发，这种看法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它损害了历史的解释。雇主们为这种类型的组织提供了方便，常常采取主动并设法影响它让它跟自己走，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排斥或反驳另外一种事实，即公司工会和它们的先驱者也完成了某种迫切需要的功能，而且一般说来，它们为群众服务得很漂亮。

这一点，已被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各个工会的领袖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的风格和行为所完整无缺地证明了，也已被工会官僚想把工会基金投资到他们原来十分合意的工业和金融企业中去的企业所完整无缺地证明了。^①

信条和口号——即意识形态——十分不革命，十分厌恶阶级战争的，肯定是什么都没有重要性的。美国的工会运动者不很热衷于理论工作。如果他们是那样的话，他们大概是会对他们的做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可是，他们在讨价还价时，仍然不认为自己是站在一切事情上站在对方一边的，他们还认为和雇主合作——我们中间不喜欢这件事的人，将称之为共谋串骗——不仅符合于他们的原则，也符合于他们处境的逻辑。对他们来说，越过各种问题的狭隘视界，而进入政治行动，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意思的。但激进知识分子是能够起作用的，所以他还不如设法去劝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董事会改变主意。

但是在美国劳工世界内部也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全部移民中，和品质优秀的人一起进来的，一开始就有一些低于标准的人，内战以后，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这种人都有所增加。他们的数量，由于虽然在体力、智力、精力的适应性上并不那么低于标准，可是因为过去的倒霉的遭遇，或者因为他们由以诞生的不利环境的影响继续在起作用，或者干脆因为不肯安分守己、不适应的脾

^① 机车司机兄弟会的华伦·桑福德·斯东的形象，为最后一个方面，也为其他各个方面提供了卓越的（虽然晚一些）例证。龚柏尔时代以来的另外一些例子，读者一定会想到，所以用不到一一列举了。但是上文所说的，不能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即入会费昂贵，等着入会的人数多，看来很稀奇的象警察所开设的独卖商店那样的工会，是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唯一的一类工会。正相反，移民输入了欧洲的各种新花样，还有与此无关的和欧洲工会类似的工会也发展于条件有利的地方，尤其在相当古老而巩固的产业地区和产业部门中。

气、犯罪的倾向而被吸引到这个集团中来的人相当多而大为膨胀。由于道德约束的阙如，使所有这些类型的人物易于成为剥削行为的猎获品，于是其中有些人被容易结晶化为犯罪行为的盲目的和一时的冲动造成的憎恨所激动。在许多新而急剧成长的工业城镇中，出身成分庞杂，倾向各殊的大批人集合在一起，那里如果有什么法律和秩序的话，也只能由法外行动来保持，于是粗暴的人们被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弄得更为粗暴。正是这些人面对着他们的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而雇主及其代理人在这时候还没有发展出什么责任感，他们不仅由于对自己财产的恐惧，也由于对自己生命的恐惧而常常被驱迫到兽性的残忍行径上去。

于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就会说，这些正是毫不走样的阶级战争——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真刀真枪的阶级战争。事实上这和这类事情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种条件比这更不利于政治的劳工运动或严肃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了，并且，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着，以上二者的任何一种都是出现不了的。

“劳动骑士团”，这个具有现实重要性的、全国规模的、由各种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行业不同的工人组成——事实上谁愿意参加都是可以参加的——工人组织，它的历史约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1878—1889年）中，它拥有很大威力，并作了一些重要的活动。1886年，劳动骑士团中的“义侠骑士团”成员几达七十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产业——主要是不熟练的——工人，他们精力充沛地参加了，简直可以说发起了随当时的萧条以俱来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纲领和宣言作一次详细的检查，就可以明白它们原是各种社会主义，合作主义，偶然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种多少是支离破碎的大杂烩，要追踪的话，还可以追究出它的各色各样的起源——其中有欧文、英国农业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费边

主义者。纲领中的政治观点是显然可见的，关于全面计划和社会重建的观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所以可以发现这种目标上的明确性，实在是因为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时代的观点去观察过去所致。实际上，明确的目标是没有的，而正是**好生活**这种意识形态——奠基人是尤里亚·斯蒂芬斯，那时已经受到牧师职务的训练——和美国宪法这两者的包罗万象的性质引起了包括农场主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那么多人的注意。这样，义侠骑士团是各式各样改革计划的某种交易所。就这点而言，它确实完成了它的领袖们强调它的活动的教育意义时早已注意到的职能。但是由这么些不同的粘土捏成的一个组织，在构成上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当明确的社会主义信仰的坚持不懈地宣扬下去的时候，它倒台了。类似的运动，（人民党，亨利·乔治的和其他的运动）重复了同样的故事。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在这个时代的美国环境下，没有，也不能有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所必要的物质材料和推动力量。查察一下从**劳动骑士团**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条线索，就能证实这一点。这条线索体现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里昂的生涯之中，因此对信徒们说来，他应该具有相当可观的特殊的分量。^①1893年，正是在他的支配下，**劳动骑士团**内部的社会主义者起来反对他的老领袖包特莱，事情的结果是，这一下子致命地打击了这个组织。这个主意是要创造一个或多或少马克思路线的政治行动的工具。阶级战争，革命，打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等等，应该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但是社会主义劳动党（1890）也好，里昂的社会主义职工同盟（1895）也好，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新生命。不但跟着走的工人阶级人数极少——这件事本身还不一定是决定性的甚至

^① 因为列宁本人曾异乎寻常地向德·里昂的工作和思想表示敬意，这对他来说是不平常的事，所以事情显得更是如此了。

俄国式的成功，即赢得一个知识分子的控制核心也没有做到。社会主义劳动党先是分裂了，然后，剩下的地盘大部分丧失给新的社会党了。

新起的社会党在这个国家内比任何集团更接近于正统派式的成功。首先，它的血统是正统派的。它诞生于1892—1894年间的劳工斗争中，当时的罢工被武力破坏了，联邦政府和司法当局给雇主以坚决的支持。^①这些，使许多先前曾是“保守的”行业工会主义者转了向。起码它使尤·台勃斯先是转向产业工会主义，然后转向了政治行动的原则。第二，社会党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是正统派的。它试图做工会工作，并试图在工会“内部穿孔打眼”。它使自己成为正规的政治组织。它在原则上是革命的，革命的意义和欧洲的大社会主义政党是一样的。它的教义并不是十分正统派的。事实上它并不把教义这个方面强调到什么重要的程度——不管在台勃斯领导下，或在别人领导下——它也容许在它的队伍范围内作相当程度的教义上的教学活动。但是虽然它在吸收全国各地不断萌发的小的地方劳工党方面决没有成功，它却发展得十分漂亮，一直到战后时期共产主义者的竞争出头露面为止。我想，一大批社会主义者会同意称它为我国的唯一真正社会主义政党。它的投票力量，虽然和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一样，由于非社会主义的同情

^① 应该注意，这是在多数欧洲政府急剧地采取别种态度时所作的事。可是，这不能干脆认为是大西洋这边的“落后性”。确实的，这里实业家的社会威望和政治威望比任何其他地方为大，因而美国的民主政体，比之，譬如说普鲁士的容克政府对劳工问题持有更为狭隘的观点，但是，人们可以承认这种说法，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道德准则或人道主义准则来判断这件事，同时也承认，部分由于公共行政的未发展状态，部分由于存在着比较文雅的方法对它不起作用的一些成分，部分地也由于这个国家决心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快步突进，因此，问题只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即使一个完全不戴资产阶级眼镜的政府机构，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

者而膨胀了，却足以测定严肃的社会主义努力的活动余地。

可是里昂还有别的机会，机会来自西部矿工联合会——也随着它一同消逝——它的激进主义和任何教义上的背景全不相干，它不过是粗野的人民对于粗暴的环境的反作用的产品。这个工会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05年)提供了奠基石。里昂和他的伙伴们把他们自己的破摊子和其他一些失败了的组织加到了这个组织中去，除此而外，也把还有一些性质可疑——知识分子的或无产阶级的或两者皆有的——来自各处，也来自乌有之乡的破片加了进去。但是领袖人物——结果是，它的词藻也——是强有力的。除里昂本人外，有海伍德，特劳特曼，福斯特和另外一些人。

不懂得什么禁忌的突击战术，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说明了一系列不相连续的成功；除革命词令和突击战术而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说明了它的最后的失败；和共产主义者的争吵，和共产主义者相比之下的缺点，以及不断的内部倾轧，加速了失败的来临。但是我用不着复述一个曾经根据各种可以设想得到的立场不断被反复讲过的故事。它和我们有重要关系的是这么些事情。这个组织曾被称为工团主义的——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此后，有几个州制订的工团主义惩治条例，是用来对付它的。在现场采取“直接”行动的原则，对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教义上的让步，这个让步，给诸产业工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派定了一个基本任务，——这是里昂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或偏离——，无疑地说明了它是工团主义的组织。但是，看来把这当作工团主义要素插入到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根干之上，因而变成成为马克思主义根干的一个分支，似乎比全然诊断它为工团主义要更为正确一些。

因此，那位伟大的社会学者，那个普通人，这一次又说对了。他说，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不是美国的。如果我理会他的真

正的意思，这等于一语道破了我比较罗嗦地试图说出来的意思。美国实际上跳过了，目击未经掺杂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历程的那个社会主义的阶段。人们很难了解它们的本质性的诸问题。人们之对待当时存在着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不过像对待海外传来的特发疫病那样的态度。美国的问题和态度偶然借用了这种进口品，但是事情也只到此为止。下一个阶段的事变还是冲击了没有毕业于马克思主义学校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

IV. 法国的事例：工团主义的分析

工团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法国这幅图画中^①可以看得最清楚。在打算这样做之前，让我们先来扼要地说一下关于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几件事。

首先，法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回溯得更远，也许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更为著名。但是它从来没有结晶出像费边型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样完全，且获得如此广泛拥护的一种社会主义。费边型社会主义需要英国的政治社会，但在法国，那样的政治社会从未有过。大革命，及其后贵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间的联合的失败使法国未能形成那样的政治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广泛而团结一致劳工运动；或者作为某种纠集知识分子的信条，需要和法兰西的明彻性十分格格不入的某种文化传统。但是当时已经出现的所有其他社会主义信条，只投合了特殊的精神状态和特殊的社会角落的心意，而且它们在本质上是宗派主义的。

^①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中几乎可以看得一样清楚。只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人数和文盲的人数比较起来增加得多得多，以致歪曲了我所认为的真正的特色。无政府主义分子有其一定重要性。但是不应该过分加以强调。

其次，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匠、职员和小食利者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是持重而适度的，大规模产业局限于屈指可数的一些中心。不管使法国分成这样一些阶级的问题是什么，它们在经济上首先是保守主义的——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保守主义得以依托这样广阔的基础的了——后来，人们愈来愈支持主张中等阶级本位的改良的诸集团，其间有一个激进社会党，一个最好这样来描述它的政党，即它既不激进也不社会主义。许多工人，属于相同的社会学的类型，具有相同的心情。许多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使自己适应于它，这证明了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的事实虽然存在，却不象我们本来预料的那样突出。骚动是有的。但在不满分子中，反对第三共和国时期各式各样的环境所形成的反教士倾向的天主教徒们，比不喜欢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们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他们，而不是由于反资本主义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时代引起了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危险。

第三，因此，虽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在法国，严肃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比在俄国或美国更多的活动余地。从而它有各式各样并不严肃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寄托希望“于少数果断的人”的行动之上的布朗基主义可以为例：一小撮热衷于密谋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加上巴黎和两三个大城市的暴民，这就是那样的集团所看到的一切。可是，不管怎样，一个具有阶级斗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到底由盖德和拉法格建立起来了（1883），它曾得到马克思本人的批准。它循着正统路线发展，它在一条战线上对海尔维型的起义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战，在另一条战线上和若累斯的改良主义作战，和它的德国兄弟所做的很为相象。但是它从没有取得过德国党那样的重要性，不论在群众中或在知识分子中，它的意义也从象德国党那么大，尽管有1893年众议院中社会主

义诸集团的合并，(占 48 个席位，执政的共和党人占 300 个席位)并且最后导致统一社会党的形成(1905)。

第四，我将只指出这样的事实，不想讨论它的背景，这就是上面概述了的社会模式，阻止了大的纪律严明的英国型政党的出现。谁都知道，法国的议会政治变成了一种小而不稳定诸集团间的八人舞，这些集团时而联合时而分解，各按当时形势及各别的利益和密谋而定，他们象我前面所说的，遵照某种客厅里的游戏的规则，时而建立一个内阁时而拖下一个内阁。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是政府的无效率。另一个后果是，对于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诸集团来说，内阁官职比在多少按照合理的方法运行政治的别的国家内的更有势力的社会民主党较易到手。盖德和他的集团直到 1914 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止对这种诱惑证明是无动于衷的，他们一贯地以最好的正统派风格拒绝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是起码在渐渐变得接近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并且其原则——不经过革命的改良——并不谴责这种合作的那个改良主义集团，实在没有理由那样做。因而若累斯在德雷福斯危机(1898)当时，不觉得应该为他为了保卫共和国而支持资产阶级的做法而忏悔。这样，在英国和瑞典本来完全不成问题，但在任何其他地方会成为根本问题的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的老问题，突然以某种最实际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爆发了。由于某种额外的环境上的原因更加加大了它的刺激性；虽然按照严格的正统观点来说，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已够坏的了，这终究是一回事，但是实在参加政府从而分担它的责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密勒兰正好做了这么一件事情。1899 年他进入瓦尔得克-卢梭内阁——和他同时进入内阁的有保守主义将军加利弗，他曾精神饱满地参加 1871 年对巴黎公社的镇压而闻名于世。

两个爱国者为了在某一次国家紧急事态中联合力量而牺牲个人观点——这算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这正好表达了我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我也用不着向他们保证，就我个人来说，我毫不认为这二位绅士让自己丢了脸。其次，确也很可以问一问，从此以后，密勒兰究竟还应不应该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①。最后，法国工人阶级有一切理由以感激的心情记住他在内阁任期中为他们在立法上和行政上所做之事。

同时，我们必须设法理解何以“密勒兰主义”势必要打击法国的盖德主义者和全欧洲的正统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这是堕落和罪恶，是对目标的背弃，对信仰的玷污。这是很自然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大会（1904）对他投掷的诅咒同样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超乎教义上的诅咒之外以及在教义上的诅咒的背面，还有一点儿简单的常识在。如果无产阶级不把它的背脊借给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用来爬上权力的高峰，就得小心地防止对批准了的做法的任何乖离。当事情适合于野心家们标价买进权力的时候，谈论国家的紧急状态——归根到底，曾否有过政治家们并不认为紧急状态的局势？——这种把戏，是谁都熟悉，太无信用，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深刻印象，尤其对于已经学会按照它们的真实的价值来估价政治词令的法国无产阶级为然。群众之会转过身去，以蔑视的态度离开政治的社会主义，这种危险是存在着的。^②

① 真的，他因保卫罢工领袖而在“左翼分子”中声名卓著，当他进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时，他在当时所称的“社会主义左翼”的六十个议员中是首要人物。可是他确实不过做了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同样做得好的事情。因此，后来在他当公共工程部长（1909）和国防部长（1912）时的态度，不能算是他的敌人所理解的那么大的一个失策。1920年以后，他在总统任期中与民族集团的联合，和左翼联盟的冲突已具不同性质，可是它们也容许各种言之成理的辩解。

②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确实三次（1903年，1906年，1911年）拒绝了乔里蒂要求他们参加内阁的邀请。

事实上事情决不仅仅限于危险。群众确实转过身去离开了它。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看到了政治上的无效率、萎靡无能和轻薄的可悲现象——这种现象是前面不完全地概述过的社会学模型的产品——，于是他们不再信任国家、政治世界和粗制滥造的文人，不再尊敬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人，而且，除了过去时代几个伟大人物的记忆而外，确实也不再尊敬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了。工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保持着天主教信仰。其他是漂浮不定的。对于克服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工人来说，工团主义就比任何一种现成的率直社会主义——它们的主持人有希望如法泡制资产阶级政党把戏，不过规模较小而已——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法国类型的革命传统，当然大大促成了这种情况，因为工团主义正是这种传统的第一继承人。

因为工团主义并不仅仅是革命的工会主义。工团主义可以指和革命的工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的许多事情。工团主义是参加政治的，又是反对政治的，这意思是说，它蔑视一般的传统政治机构的行动特别是议会的行动，或者通过这些机构所作的行动。它是反知识分子的，意思是说它既蔑视以理论为背景的建设性的政纲，同时又蔑视知识分子的领导。它确实投合了工人的本性——而不是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投合了知识分子心目中认为工人应有的那种本性——因为它约许了工人以他所能理解的东西，即用肉体上的暴力，最后经过总罢工来赢得他在那里作工的工厂。

但是工团主义不象马克思主义或费边主义，它不能为任何苦心探索经济学或社会学的人所拥护。工团主义没有理论根据。根据任何事物必须服从理性这一假定办事的作家，若试图为工团主义建立一种理论，就不可避免要阉割它。有些人把它和无政府主义联结起来，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在其根底、目的、和

意识形态方面都和工团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不管在我们看来，巴枯宁的工人阶级追随者的行为（1872—1876年）可以和工团主义怎样相似。另外有些人企图把工团主义包摄在马克思主义下面，把它当作以特殊的策略上的决心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特例，可是这不免会丢掉两者原来具有的最本质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构想了某个新品种的社会主义，使之起工团主义的柏拉图式观念的作用——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工团主义运动交给最终价值的某种明确的方案，而没有这种方案正是工团主义的突出的特色之一。在劳工总同盟的工团主义阶段（1895—1914年）组织了和领导了这个同盟的人们，大多数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或工会职员，或兼两种身分的人。他们满腔愤怒，并有战斗的意志。他们对于有朝一日他们成功了的时候，面对那支破船，他们该干些什么的问题并不焦虑。这还不够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承认生活每天教导我们的真理——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抽象的好斗性，它既不需要也不注意任何议论，并且除了为胜利而争取胜利而外，不关心一切事物。

但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按照适合他口味的方法来填补这个残酷的暴力背后的空白。而这种暴力本身，连同它的反知性主义和反民主倾向，若以某种正在土崩瓦解中的文化——很多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憎恨这种文化——为背景在观察它，就会取得意味深长的涵义。当时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憎恨又不如对它的民主主义合理主义的憎恨那样深的人就不可能投靠正统社会主义，因为它约许了更多的合理主义。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反知性主义——不论是尼采式的或柏格森式的——来说，崇尚暴力的工团主义反知性主义，作为他们自己的信条的——群众世界中的——补足物，也许正好投合他们的心意。

因此，一种十分离奇的同盟确实出现了，而工团主义到底把乔治·索列尔看做自己的哲学家。

当然同时并存于任何时代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意识形态总是有许多共同之点的。它们是同一个社会过程的产物，必定要在许多方面以同样的方法反作用于同样的必然性。它们也不免就在它们的争吵中互相借用对方的色彩或者溅污对方的色彩。最后，个人也好，集团也好，常常不知道他是那里人——如果他们也有什么出生地的话——，并且，有时由于无知，有时由于正确地觉察到了利益之所在，他们把互相矛盾的原则混合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些混血儿式的信条。所有这一切，把观察者的头脑搞得混乱不堪，也说明了流行的解释何以有那么多的种类。对于只盛行了一个短时期，不久就被它的知识分子代表所丢弃的工团主义，人们特别感到头脑混乱。可是，虽然如此，我们可以评价索列尔所认为的工团主义和工团主义心目中的索列尔，他的《暴力论》和《进步的幻想》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诊断。说他的经济学和他的社会学迥然有别于马克思，这种说法本身的意义也许是不大的。但是迄今还屹立在反知性主义急流的中心的索列尔的社会哲学，很好地说明了某一种过去是、现在还是革命的——按照这种革命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革命的——社会力量的初次的实际表现。

V. 德国的党和修正主义；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为什么英国的方法和策略不能在德国占优势？为什么加重了对抗并把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得到了成功？如果那里并没有超社会主义的集团为社会重建而工作，或者如果统治阶层对他们的建议充耳不闻的话，事情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当我们了解，德国当局比英国政治社会对于那个时代的

社会危机是更为敏感而不是比较迟钝，以及费边主义者的工作，在德国曾由一个十分类似的集团更有效地而不是较差地完成了，这就成了一个哑谜了。

德国没有落后，直到主要和劳合-乔治的名字相联的社会保障立法通过为止，德国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一直是领先的。同时，正是由于政府的倡议，而不是经过令人生气的斗争自下而上施加的压力，使这些社会改良的法案列入了法令大全的。俾斯麦倡议了社会保险立法。发展它们并加上了其他社会改良路线的是执行威廉二世的命令的保守主义的文官（冯·贝勒普希，包萨道夫斯基伯爵）所创设的制度确是大可钦佩的成就，这是举世都承认的。同时，工会活动是不受拘束的，而在政府当局对待罢工的态度方面，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

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披上了君主政体的长袍而这一点无疑是和英国的程序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造成了更大的而不是更小的成就。德国君主在向经济自由主义（它的批评者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让步了一个时期之后，由于为工人作了——有一些必要的变更——他先前为农民所作的事，干脆回到了他的老传统。比英国发展得远为充分远为有力的文官系统提供了卓越的行政机器，也提供了卓越的立法思想和起草技术。而且这个文官系统，至少和英国的文官系统一样愿意接受社会改良的建议。它多半由穷容克——其中许多人，除了他们的真正斯巴达式的薪水而外，别无其他生活手段——组成，他们全然献身于他们的责任，教育良好，知识丰富，对资产阶级很有批判的眼力，他们担当起这个任务，恰如鱼之得水。

主意和建议通常是从官僚们的大学里的老师，“讲台社会主义者”那儿来到官僚机关的。不管我们对那些组成“社会政策协

会”^①的教授们的成就有些什么看法，也不管他们的著作常常缺乏科学的精炼，他们对社会改良怀着灼热的热诚，并在传播社会改良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不仅对拟订实际改革的个别方案，而且也对宣传改良精神表示的不快情绪。他们和费边主义者一样，他们所主要关心的是当前的工作，同时他们想要消弭阶级战争和革命。但是，他们也和费边主义者一样懂得他们正在走向那里——他们懂得，而且他们并不害怕蒙脱出现在他们道路尽头处的社会主义。当然，他们所设想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民族的并且是保守主义的。但是这既非骗局也非空想。

全世界从不理解这个社会模式和它所产生出来的立宪君主政体的性质。至少，它已经忘掉了有一个时候它曾经知道的任何事物。但是我们一看到真实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要理解在这个非财阀政治的环境中，那个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大的政党如何可能靠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假装要和残酷无情的剥削和成为是奴隶使用者的奴隶的国家奋斗的极端刻毒的马克思主义词句而成长起来，就更为困难了。当然，“客观社会形势的逻辑”是说明不了这一点的。

那么，我想我们必须再次承认，在短时期内——在这类问题上，四十年是短时期——方法和错误，个人或集团的缺乏才干，比逻辑的作用要大得多。除此而外我能指出的每件事情，都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在各个邦的议会里有为扩大选举权的斗争。但是，对工业群众说来最重要的多半是有权进入帝国议会（Reichstag），

① 我希望我能够诱导读者细读一下那本具体说明了德意志帝国真实情形的，这个独特的组织的简史，虽然它还没有译出来，或许永远不会译出来。它的作者好几十年中一直是协会的秘书，他的故事正因为讲得毫不虚饰，所以更能令人发生深刻的印象。（弗兰兹·鲍斯：《社会政策协会史》，柏林，1939年版）

为此，俾斯麦一开始就实行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更重要的是对农业的保护——高价粮食。这在毒化气氛上无疑起了不少作用，尤其因为农业保护政策的首要受益人是东普鲁士的大地产和中等规模的地产而不是农民。可是，至少说到它所施加的真正压力，那么到1900年左右外移移民实际上已经停止一事也是确实的。不——这条路上是找不出解释来的。

啊，这种才干的缺乏加上日尔曼的风格！我们也许可以借德国在国际关系上的行为这种鲜明的比拟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1914年以前，德国的殖民野心和其他对外野心决不是——隔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这样说看来是对的——过分的，尤其如果我们把它们和那时候英国和法国借以扩大它们帝国的那种干净利落而有效的发展加以比较的话。德国实际做了的或表示了某种意向要做的没有一件事可以比得上，譬如帖尔-艾尔-凯比尔，布尔战争，突尼斯的征服，或法属交趾支那的征服的。所有的较不谨慎或更有侵略性的倒是，说德国耽溺于不可容忍的侵略的那种谈论，以及甚至其中存在着合理的要求的虚张声势的姿态。比这更坏的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路线，总是按照老在变更着的方针，一会儿横冲直撞一会儿愤怒地退却；一会儿作有失尊严的妥协，一会儿又唐突的拒绝；直到所有这些因素使全世界的舆论大哗，彻底厌恶为止。^①在国内事务上，事情也丝毫没有不同。

^① 我要把它弄得十分清楚，上文所述，并不是想把这种政策全部或主要地归之于威廉二世。他不是一个不足道的统治者。他完全有资格当得起彪罗亲王对他所作的评论，那是议会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君主的一次最不平常的辩护：“你愿意怎么说都行，反正他不是市侩。”如果说他曾经和可能把他那一行手艺的技术教给他的人争吵过，批评他对俾斯麦的行为的人们不该忘掉，争吵主要是关于迫害社会主义者——那是皇帝想要停止的一一的问题，和关于开始巨大的社会立法计划问题。谁若丢开言词，只是简单地追溯年复一年的实际作为借以探索他的意向，谁就不能不达到这样的结论，即凡是他的有关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的观点常常是对的。

致命的错误实在是俾斯麦的错误。他的错误，只当我们假定他完全误解了问题的性质，才是解释得了的。他企图用高压手段压止社会主义活动，其顶峰是一个特别法令（社会主义者镇压法，Sozialistengesetz）实行于1878年，直到1890年为止（当威廉二世坚持废除它的时候）一直有效，这就是说，法令有效期限之长，足以教育那个党，足以把1890年后的全部战前时期的党的领导权交给懂得监狱和流放，取得了囚犯和流放者的精神状态的人们。经过各种不幸的环境的结合，这一件事正好弄坏了嗣后整个事变的进程。因为在流放中定型的人们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是军国主义和军事光荣的意识形态。而君主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一方面却对合理的社会主义者认作目前的实际目标的大部分表示同情——却是鄙夷军队，鄙夷1870年的光荣。对双方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严重的是，为把敌人定义为和单纯的反对派不同的人。加上一方面党的会议上马克思主义的辞藻——不管它是非常学究式的——，另一方面加上前面说过的那种咆哮，你就会看到这幅图画的全貌。不管有多少果实累累的社会立法，不管行为上怎样遵守法律，都不足以抵消这种相互的 non possumus，*双方隔着一道纸糊的壁垒互相辱骂，向对方摆出一付最可怕的脸孔，在原则上把对方一口吞掉——实际上却毫不打算作任何严重的伤害。

从这种状态下发展出来的形势，无疑有它的危险——巨大的没有责任感的权力总是危险的——但是决不象它看来大概会有的那么令人不安。帝国政府和邦政府——或者擢升到内阁一级，组成政府的老文官们——主要关心的是正直而有效的行政，有益的和整个说来进步的立法，陆军和海军的预算。所有这些目标都未

* “我不能”，汉语中语气坚决的“不行”——译注

受到社会主义者反对票的危害，特别是陆海军预算的通过，在这段时间内多次因全民极大多数的支持而获得了保证。反过来，社会民主党组织良好，在培培尔辉煌的领导下专心致志于巩固和扩大它的选票，而它所得到的选票事实上也不断在跃进。这也没有受到政府的严重干扰，官僚机构谨严地遵守法律的文字，法律确也给了党的活动以实际上必需的一切行动自由。^①并且，行政当局的官僚机构和党这两方面都有理由感谢对方，尤其在彪罗亲王当政的年代中，因为大家都为对方的演说的超额生产能力提供了出路，而这种出路正是两方面都迫切需要的。

这样，党不仅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而且也安定下来了。发展起来了党的官僚机构，党报，由年长的政治家组成的参谋部，全都有充足的经费，他们的地位照例是稳固的，而且，整个说来全是十分体面的，不管按照这个词的哪一种意义——也可以按照这个词的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一个工人阶级成员的核心成长起来了。对他们来说，加入党不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当然的事情。人们愈来愈“生来就是党员”，养成了无条件接受它的领导和它的教义问答的习惯。党的教义问答，对某些党员来说，和基督教的教义问题之于今天的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有同样大的意义。

所有这一切，因非社会主义诸党无力有效地竞争劳工的选票而大受促进。有一个例外。天主教中央党一方面因为得到了一个品质非常高的教士集团的支持，所以拥有竞选票所必需的本钱，另一方面，它也准备在社会改良方面，在不冒犯党的右翼的条件

^① 行政迫害无疑不是没有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也尽一切可能地把随便什么事都扩大解释为行政迫害。但是这类事情历时并不太久，事实上自1890至第一次大战为止社会主义活动本身的历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何况，这类迫害对于“被迫害的”政党来说，确实也有某种为它效劳的性质。

下，尽可能走得远些，并站在两次教皇通谕《不朽的上帝》，（1885）和《新事物》（1891）的教义立场上，以便为劳工选票付出一笔高价。^①但是所有其他的政党，虽成因不同，程度各殊，却和产业无产阶级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如果不算互相敌对的）立场，并且从来不会想到要把他们自己出卖给任何有重要意义的劳工投票。于是，工人们除非是积极的天主教徒，很难找到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可以转向的党。按照英美经验看来，愚蠢到这样程度似乎是不可信的，可是社会主义这支军队就这样在它引起了可怕的危险的一切吵吵嚷嚷声中，被容许向政治上无防备的领土大举行进却是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表面上似乎那么不可解的一件事，即德国社会主义者何以如此固执地缠住马克思主义信条不放的理由了。一个可以提出一个有特色的信条但不仅被完全排除在政治责任之外，而且也被排除在任何即时可以当政的前景之外的政党，一旦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然会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纯洁性。对非社会主义的改良和资产阶级国家一切行为所采取的纯粹否定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这是马克思所推荐的，除例外情况而外适用于一切的策略原则——实在是硬塞给它的。领袖们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人，也不是不顾死活的人。但是他们领会到，在当前局势下，除了批评，除了让旗帜一直飞扬在空中而外，党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革命原则的任何牺牲会是全无报酬的。这只会瓦解他们的队伍却不会给予无产阶级以比它在过去任何情况下，根据

① 顺便让我们说明一种有趣的（几乎美国式的）现象：天主教中央党是这样一个政党，党内包含了关于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从最僵硬的保守主义到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一切可能有的各种色调的意见，可是仍然不失为最有力的一架政治机器。属于最不相同的各种类型，出身、兴趣的人，极端的民主主义者和极端的权威主义者。合作无闻得大概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嫉妒，所依靠的却只是他们对天主教会的忠诚的力量。

君主政体的官僚机构创议而不是根据别的政党的创议而获得的为多的东西。也许能够得到的微小的额外成功，也几乎不值得党为此去冒风险。因此，严肃的、爱国的、守法的人们继续背诵革命和谋叛的不负责任的口号——这种血腥气的口号出自许多平和而带眼镜的人们之口是十分离奇的现象——好在大家幸福地意识到，他们必得按口号办事的可能性，看来是极少的。

可是不久，疑虑开始在他们中少数人身上消释，他们认识到有朝一日革命的谈论大概会要碰到政治争论的最致命武器——嘲笑的。也许正是这种理解，或者干脆因为觉察到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和这时候的社会现实间的可笑矛盾，结局提醒了老恩格斯这样一位显要人物出面来宣告赦免——这就是说，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新版本所作序言中^①——〔出而来指出〕巷战到底有某些不合适之处，信徒们用不到觉得必须委身于此了（1895）。

这次及时而谨慎的调整惹起了一小批彻底急性子人的愤怒，卢森堡夫人在她对老人的燃烧般的指责中，尤其显得超乎寻常的激动。但是党默认了这个赦免——可能还有一声宽慰的叹息——也许还机敏地在相同方向上跨出了谨慎小心的几步。可是当伯恩施坦冷酷地更向前进，“修正”党的信条的全部结构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争吵。在我对局势已经说了上面那么些话以后，对此不该再有什么惊奇之感。

甚至最汲汲于名利的党，也警觉到它的任何较重要的政纲的改变所会陷入的危险。一个政党，如果它的纲领和它本身的生存，

^① 梁赞诺夫说过，这本书的编辑任意改动了恩格斯的原文。但是，即使我们对篡改程度作最大可能的估计，也不会影响上面的论证。见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库尼兹英译本，1927年）

其所依据的信条的每一细节都是以神学的热情拟订出来的，那末这个政党的从头到尾的改革，势必意味着一次猛烈的震动。这个信条是准宗教虔信的对象。它被高高举起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党在它的旗帜下曾长驱走向成功。这是党必得陈列出来的全部东西。而现在心爱的革命——这对他们来说，犹如主的再度降临之于早期基督徒——要不经任何仪式地丢开手走了。再也没有阶级战争了。没有令人战栗的战争的呼喊了。有的却是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所有这一切来自一个老卫士的成员，一个从前的流放者，而且，碰巧，这还是党的最可爱的成员之一！

但是伯恩斯坦^①还要向前走。他把他的褻渎的手搁到教义的神圣基础上去了。他攻击黑格尔主义的背景，劳动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也遭到了非难。他怀疑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把它降低为软骨头的“合意性”。他斜着眼睛瞟经济史观。危机不会杀死资本主义这条毒龙，正相反，假以时日，资本主义将赢得稳定性。日益增长的贫困当然是胡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产生了永存的价值，而这是值得设法加以保存的。他甚至说无产阶级并不是最重要的。这还得了！

这当然是党所受不了的。纵令伯恩斯坦在每一点上都正确得毫无争辩余地，这也是党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体现在一个组织中的信条是不能借大破坏来改革的。而且伯恩斯坦并不完全正确。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但在知力上不足以匹敌马克思。我们在第一篇见到，他在经济史观问题上走得太远，很难说他全部理解了经济史观。他断言农业领域内的发展反驳了马克思的经济控制集中的理论，在这一点上他也走得太远了。还有其他一些论点，招来了有效

^① 最适合我们目的的他的两本书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哈尔维英译本，1909年，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1901年。

的回答，以致正统派的战士卡尔·考茨基^①发觉坚持他的主张——或其一部分——并不太难。人们也不会看得那么清楚，如果伯恩斯坦所推荐的策略得胜了，对党会是有利的。一个派别确实已经变弱。党的威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如前所述，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可得。因此，还有许多话可以为“保守”观点辩护。

在这环境下，培培尔所采取的路线是，既不那么显著地不聪明，也不象一些同路人和其他批评者当时所理解的那么显著地专横。他有力地斥责了修正主义，那么有力以致他能继续控制住左派。他曾经在汉诺威大会（1899）和德累斯顿大会（1903）上诅咒它。但是他竭力使再次确认阶级斗争的决议和其他有关信仰的文件构造得易于使“修正主义者”就范。事情就这样办了，也没有对修正主义者采取其他手段，虽然我相信鞭子还是响了几下的。伯恩斯坦本人被允许在党的支持下进入帝国议会。冯·伏尔马还留在牧群内。

工会领袖耸他们的肩膀，并且对这次对教义的反复细细体会窃窃私议。他们早就是一贯的修正主义者了。但是只要党不干扰他们眼前的事务，只要党不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实在不喜欢的事，他们是不很介意这些的。他们给有些修正主义者以保护，也保护了他们的某些文字机关。他们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态度，不管党的哲学如何，事业总是事业。但也到此为止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教义并不是可以不关

^① 从这时候起，考茨基，《新时代》的奠基人编辑，和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著的作者，坚持一种只能以教会术语来描述的立场，他高举“革命”的教义反对修正主义，犹如后来他高举正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异端。他是最教授气质的人，大不如伯恩斯坦那么可爱。可是，整个说来，党的二派都必定会既庆幸他们的战士的道德水平，又庆幸他的知识水平。

心的事)和非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其中有些人喜欢参加一个并不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然有不同的想法。正是他们在谈论党的危机,并对党的未来摇头。他们有种种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在这个党内的和在这个党的周围的他们的未来确实受到了危害。培培尔本人实在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和客厅里的有些左倾的人交朋友,但他马上警告他们丢掉这种想法。党员群众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上却只略受一些打扰。他们跟着他们的领袖,重复他们的口号,一直到,不管马克思怎么说,或者培培尔在这件事上会怎样说,毫不后悔地冲向武器保卫他们的国家为止。

奥地利^①的平行的可是不同的发展,相当有趣地说明了我们刚才在探索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从它的很慢的资本主义发展步调中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费去二十多年时间才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缓慢地从小而不甚有声誉的起源开始发展,最后到1888年(海恩费尔德代表大会)在维克托·艾德勒的领导下才使自己巩固起来。维克托·艾德勒在把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结合在一起这件几近绝望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功,并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以绝顶的干练领导了他们。

现在这个党也是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组成他的知识分子核心的是一个漂亮的犹太人的小圈子^②,即我们在第一篇内说到过的曾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沿着正统派的路线前进,他们在作出贡献的过程中无疑改变了

① 我所指的奥地利,是奥匈帝国的西半部,它从1866年开始有它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但无外交部和国防部),它们是和东半部——匈牙利,或者用官方语言,“圣·斯蒂芬神圣皇帝的国土”——的议会和政府处于平等的对等的地位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以奥地利的党为样本,但是党员人数一直不多。

② 托洛茨基,当时还用勃伦斯泰因的名字,不时出现在他们中间,似乎受到过他们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对此外凡想改变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人作了凶狠而巧妙的战斗，并且总是以最不妥协的形式保持着革命意识形态。和德国党的关系是密切而诚挚的。同时，谁都知道，艾德勒受不了胡闹。由于文化和种族上的原因，他对他的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比培培尔对自己手下的知识分子有更高的权威，因此他能把他们咖啡馆里需要的全部马克思主义交给他们，同时在他觉得用得上时就使用它们，可是不让他们干涉真正和他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即组织、党报、普选、进步立法，真的，也包括国家的真正的运转在内。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和改良主义的措施的结合收到了极好的成效。奥地利政府马上发现，这是一个其重要性不亚于教会和军队的因素，它从它本身的利益出发，在政府对妨碍议事进行的民族反对派（尤其是日尔曼人和捷克人）的长期斗争中势必要支持中央当局的。历届政府——大部分是德国式的文官内阁，虽然朝廷不断地企图插进一些政治家，至少做不管部大臣——于是进而向它表示好意，这种好意也得到了充分的报答。^①而当一个政府（高茨男爵为首的文官内阁）开始实行普选时，艾德勒，没有碰到他的追随者的任何异议，居然有本领公开宣布，从此以后社会主义者是政府党（Regierungspartei）了，虽然内阁职位既未派给他们，也不是他们所会接受的。^②

① 社会主义者屡次用来帮助政府的措施是这样的。每当民族反对派的阻碍议事进行分子瘫痪了议会，使一切事务搁浅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动议进入预算“紧急”议程。当紧急动议正式通过了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意味着宣布为紧急的议案只要有多数赞成就算是通过了（这种办法常用于预算案），不管议会的正式程序规则如何，而正式的议事规则，正是阻碍议事进行分子使它不可能得到遵守的。

② 我想，主要的困难是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本身的顾虑，在重要性上居次位。奥地利官僚机构体系或老皇帝的厌恶，即使有，也是使好事不谐的诸因素中的蹩脚的第三者。

VI. 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诸党纲领中的国际主义纲目，要求一个象死去了的第一国际一样的国际组织。其他社会主义和劳工集团不是马克思信条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但是部分由于继承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部分由于厌恶各自国内上层阶级的政府，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大家都取得了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或对它们的同情，因此他们很容易想到国际合作。第二国际的成立(1889)因此体现了真正企图把实在无法调和的事物调和起来的一种妥协，但是它一直工作到1914年。在这个题目上只要说几句话就够了。

有一个国际局，还有大会和大会上关于策略和原则的盛大的辩论。若以实质的成就为衡量标准，第二国际的重要性很可能等于零。而革命的活动家和工党党员确实也都评了它一个零分。可是，事实上这个时代预定了不能作任何性质的直接国际行动，行动，不论是革命的或修正主义的，在那个时期都只能是国家范围的。那就是组织参加进来的诸政党和集团间的接触，统一观点，协调行进的路线，限制不负责任的行动，催促迟缓的步伐，以及尽可能地造成一种国际社会主义的舆论。所有这一切，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说来，都是极端需要而重要的，虽然按事情的本质说来，积极的结果要费好几十年才能成熟。

因而，国际局的首脑及其成员，决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指导部。用不着他们制订什么类似第一国际中所曾有过的政策和纲领。各国的党和劳工集团各有完全的自治权，也可随意参加适合它们特殊目标的其他国际组织。工会——还有合作社和教育团体——是受欢迎的，甚至受到了奉承，但是它们并不起领导作用。各国党仍然保持了共同的观点，但其范围宽阔到足以使斯当宁和勃兰汀

这一头和列宁和盖德这一头继续前进。这个国际组织中的某些成员，无疑在嘲笑别人的胆小鬼式的谨慎，后者则反对前者的头脑发热的激进主义。有的时候，事情来得很可怕，甚至近乎摊牌。可是整个说来，他们都从对方的手里上了社会主义外交手腕这一课。既然这种和解方式——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承认对方有保持己见的大量自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一个伟大成就。

很奇怪，但是也很合乎道理，负主要责任的是德国人——得到俄国人和盖德派的支持。他们是一个大的马克思主义党，他们给了共同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是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到，代表德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说来，签署三十九条的时候，就同时保留了解释的无限制自由。十分自然，这就使比较热烈的信徒们为之震动，他们都说信仰已被贬低到徒具形式毫无实质的地步。可是德国领袖还是对这些议论默不作声。他们甚至容忍了率直的异端，在国内他们本来会狂暴地攻击它的。培培尔懂得他能走多远，他懂得他直接面临着的是那个时候的英国人的忍耐，所以他的忍耐到头来是会得到报酬的，而如果不发生战争的话，报酬确是会得到的。因此，他抱着及时地使它生气旺盛起来的目的施展手腕使这个无产阶级阵线团结巩固起来，他在这样做时表现出一种才干，如果德国的外交当局也曾有这种才干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能已被阻止住。

有些结果确已成熟了。第一个十年左右时间内所作的有些不明确的讨论，终于集中到了外交政策方面，某些好象共同观点的东西开始出现了。这是和时间的赛跑。这次赛跑失败了。每一个现在翻阅这个时代历史的新闻记者，觉得有权以他所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在灾变爆发时的失败来谴责第二国际。但是这是最肤浅的看法。巴塞尔非常会议（1912），和它之呼吁各国工人为和平竭尽他

们的全力，确实是这种环境下所能做的一切。向那个除了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形象之中而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国际无产阶级颁发总罢工的号召决不会更加有效，却只会得到更小的效果。完成可能完成的事情并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不管结局证明成就是如何的不充分。如果说事实上它确实失败了，失败是发生在各个国家党的国内战线上的。

第二十七章 从第一次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大叛变”

社会主义诸党，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已尽了他们的全力来防止战争。可是当战争终于爆发了的时候，他们为他们国家的事业而重新集结起来是如此迅速，那确实是令人惊异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比英国工党党员更少犹豫。^①当然必须记住，哪每一个交战国都深信它正在进行的战争是纯粹防御的战争——在交战国看来，战争总是防御性的，至少是预防性的。^②而且，如果我们想到，社会主义诸党拥有确实无疑的宪法上的权利投票反对战争预算，以及，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般道德标准的范围内，谁都没有使自己同一于国家政策的义务——事实上一切交国内许多和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隔得很远的人都指责战争——，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似乎不可能通过可疑地引证马克思，引证培培尔和冯·

^① 英国工党1914年在确定严肃的拥护和平的立场时，事实上是孤独的，虽然后来它参加了战时联合政府。

^② 这就是为什么，胜利者企图借强加于和约上的一句话来决定道德上的问题，不仅很不公平，而且也是十分愚蠢的。

伏尔马先前的宣言，即他们将在他们的国家受到攻击时起来保卫它的宣言，而获得解决。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这个题目上的真正的教导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何况，保卫一个人的祖国，不过是参加军队尽自己责任的意思；它并不意味着投票拥护政府，和参加“神圣同盟”。^① 盖德和尚巴在法国和王德凡尔德在比利时之参加战时内阁，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并不比当时的共同了解格外效忠于他们的国家的需要。^②

这个难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不论社会主义政治家中的多数派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也许，这时候这种信念已经分享了它的宗亲即对大革命的信念的厄运了——他们确实领会到，任何信奉这个福音的立场，会使他们付出丧失部属的代价。群众开始会盯着眼看他们，接着他们将弃绝忠诚，随后用行动来反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无祖国；阶级战争是他们唯一关怀的战争的教义。在这个意义上，还附上一个但书，大意是说：如果战争的冲击是在资产阶级体制范围内的进化经历了更长的时期之后发生的，那末一切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结构的一个生命攸关的支柱，在1914年八月断裂下来了。^③

事实上这是被广泛地感觉到了的。保守主义营垒内感觉到了这一点：德国保守主义突然开始用极度殷勤的语言说到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营垒内仍以旧有的热情对待它们信仰的那一部分也感到了这一点。英国，麦唐纳甚至宁愿参加战时联合政府，因而失

① 要说谁若没有这样做，谁就削弱了国家的事业，也是不正确的。摩莱勋爵的辞职，分明没有伤害英国。

② 现时，我们中许多人想法和这不一样。但这仅仅表明了我们的离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老的抛锚的地方已经有多远了。把举国一致提升为一个道德箴言，等于是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③ 在某种程度上，这必定也是由于非社会主义改良的成功。

掉了它在工党中的领导地位，最后还失掉了它的议席。在德国，考茨基和海斯离开了多数派（1916年三月），在1917年组织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虽然它的大多数重要成员在1919年五月^①回到了牧群。列宁宣称，第二国际死亡了，社会主义事业被出卖了。

这里是有一部分真理的。就马克思主义各党的多数而言，十字路口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没有经得住考验。它并没有选取马克思的道路。所有的信条，口号，终极目的，组织，机关，领袖都没有变。大叛变前夕怎样，大叛变翌晨一切照旧。但是他们所打算的，他们挺身为之奋斗的一切，已经变得不象样子了。经过这次十字架上的考验之后，社会主义者也好，非社会主义者也好，都不再能象从前那样看待那些党了。这些党本身也不能再继续他们的旧日的滑稽戏了。好也罢，歹也罢，反正他们已经跨出了他们的象牙之塔。事实证明了，对他们来说，他们祖国的命运，比社会主义目标所值更多。

可是，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那样从未深处于象牙之塔之内的，其情形就有所不同的。而在从未严肃对待那种革命滑稽戏的观察家看来，甚至其他诸党的情形看来也并不一样。如果我们特别说到德国党，那么说这个“社会叛徒”——按照人们给它的雅号——不过是从非现实主义的云端下降到地面，说国家的危急教会了他们用脚站在地上，不再用头站在地上，是很接近真理的。我们中有些人还会加上一句，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他们，完

^① 值得指出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决不是排它地从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征集党员的。考茨基和海斯属于不妥协这一派，但参加独立党的许多人却不是。例如，伯恩施坦参加了，还有几个修正主义者也参加了，他们的动机不可能是尊敬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这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要斥责多数派路线的唯一的理由，这些修正主义者不过分享了麦唐纳的信念而已。

全不是什么叛变。但是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观点，新的负责任的态度，毫无疑问，急剧地缩短了1914年前似乎横亘在他们和每个政党的天然目标——官职——之间的漫长距离。我的确不是要把任何这种打算委之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我也决不想怀疑他们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做官的决心的诚意。但是事情是昭然若揭的，由于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所采的立场，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占到了好位置”。他们不象别的政党那样因为拼命追逐而有失自己的体面。但是他们也没有在危险的时刻遗弃他们的国家。

II.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

1. 任何以失败告终的大战都会动摇社会结构并威胁统治阶级的地位；军事上的失败所造成的威望的丧失，是一个政体活不活得下去的最大难关。我不知道这条规则有任何例外。但是逆命题却不那么正确。除非胜利来得很快，或至少胜利和统治阶层的业绩动人而清楚地联在一起——例如，1870年德国的胜利——即使战胜了，经济上、肉体上和心理上的消耗也会影响各阶级集团和政党的相对地位，本质上和败战并无二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战争的紧张为期不久，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这一点。即在这里，对战争负责的行政当局，在投票箱上也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在所有其他一切战胜国内，统治阶层的威望，和他们对人民的控制力量，是损伤了而不是加强了。可是这使德国和英国社会主义政党交上了好运气，这意味着政权，起码意味着官职落到他们头上。在德国，人们把社会的中央诸机构的控制权硬推给党：虽然为了保全教义上的面子，有些社会主义者和有些反社会主义者一样，喋喋不休地说这

是一次革命，事实是他们被恳求承担——而这确是一次谦卑的恳求——当政的责任。在英国，工党在1910年正月得票五十万多一点，1918年不足二百二十五万，^①1922年，提高到4,236,733，1924年增加到5,487,620（1929年增加到8,362,594）。麦唐纳恢复了领袖地位，1924年，党进入了内阁，如果不算真正执政的话。在法国，政治世界的结构阻止了事情发展到这样圆满的程度，但是总的轮廓是一样的：战后工团主义者立刻又活跃起来，但是劳工总同盟离开了新成立的工团主义劳工总同盟和共产主义的统一劳工总同盟去吸收不能改造的分子，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挫折，缓慢地为它自己的统治性的政治作用作着准备。

此外，那时担负起落到他们头上的责任的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诸党，很可能觉得他们几乎垄断了使他们的冒险事业获得成功所必需的许多资格。他们比其他集团更能对付因不满而愤激的群众。正如德国例子所表明的，他们这时甚至比任何其他政党更能坚决地对付——如果必要，使用暴力——革命的爆发。总而言之，他们正是配制社会改良的对症药方，一方面付之实施，一方面使群众接受它的人。最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立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正是医治“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恢复国际关系，整顿全是资产阶级政府在缔和时弄成的，他们在其间毫无过失的混乱局面的人。在这些方面，他们犯下了；和相信集体安全、国际联盟、恢复金本位、撤除贸易壁垒的、他们的资产阶级竞争者从不同立场犯下的相同性质的错误。但是一旦我们承认了错误的前提，我们也必得承认，社会主义者之希望成功，尤其在对外政策领域内希望成功是对的。

^① 从1910到1918年间票数的增加，完全是妇女参政和选举资格的简化所致。

2. 两届麦唐纳政府的成就——麦唐纳和汉德森是外交大臣——足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德国的事例更是意味深长的。首先，只有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能接受和约并支持旨在满足和约条款的某种政策。他们当然悲叹国家的灾难和和约所强加的负担。但是由于感到军事上很光荣，所以败战本身也好，缔和也好，都不是难堪的耻辱。他们中的某些人，几乎同意了英-法的战争理论。他们大多数人很少注意重整军备。虽然其他的德国人都对重整军备抱着伤心的厌恶态度，他们却以一种完全和激昂的憎恨无缘的（如果也还不免有些怨恨的精神的话），精神和胜利者在一起为协议媾和而工作。至于在别人看来是一种强加的民主政体这个问题上，他们甚至和西方国家持有相同的意见：在收拾掉1918—1919年共产主义者叛乱，并以明智的妥协取得了国内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之后，他们当时的语调是最为民主主义的。

其次，他们对群众的控制有力到足以使这种态度在政治上有效。当时，人民中的一大部分是以同样的看法看待事情的。他们对局势和处理事情的正确途径的看法暂时成了官方的观点，不管当政政府的政治成分如何。他们对于谈判道威斯计划和罗加诺公约的联合政府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这些联合政府是决定组织不起来，或者，即使组成了，也决不会采取这样路线的。斯特拉斯曼不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政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正是在十年中他们因此而获得了极大声誉，而在另一个十年中因此遭到了极大的指责的政策。

第三，他们在和国外的政治舆论的关系中也处于某种有利地位。世界对德国所知很少。但是它理解两件事：一方面，它领会到，有那么一个党，永远欣然接受许多战后的安排，事实上也十分赞同其中若干项，并且是英国和法国曾深信为自己的敌人的敌人

的一个党；另一方面，它领会到在其他考虑中是不必害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论一个政府怎样保守，它用不到象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那样去反对德国社会主义。长期来看，这是一种弱点。多半由于这种弱点，才使对于德国的怨望处理得很拖沓，因为它诱使英法外交部相信，德国会无定期地甘愿做一个恭顺的请愿者，只要保证有朝一日它会被擢升到高等国家的平等地位，它就会觉得幸福的。可是，短期来看，尤其在鲁尔占领的黑暗的日子里，这是一项资产：党——或者毋宁说是依靠党的支持的政府——拥有某种别人无法取得的入场权。

第四是社会民主党从第二国际时代起和其他国家相应政党的旧有的接触。战争没有完全隔断这种接触。第二国际毕竟没有正式解散，许多国际内的个人和集团——尤其是，但决不仅限于中立国家的个人和集团——还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他们的国际主义信念。总书记（胡斯曼）还在继续活动，1917年，他甚至还根据挪威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的建议，试图召开一次大会，只是由于协约国这时候决心粉碎它们的敌手，拒绝发给护照^①才没有成功。因此，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复活国际是理所当然的，也就并不奇怪了。

3. 国际复活了，但是并非没有困难。为这个目的在1919年和1920年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只得到了不大的成功。就在那时候，共产（第三）国际（见下）出现了，它所具有的吸引力，证明为世界上工党和社会主义诸党团结一致的严重的障碍。几个重要的集团，无意于和共产党共命运，却要求某些比第二国际更时新一些的东西。这种局势，被一种机敏的策略措施所成功地满足了。在奥

^① 在此之前，确实在瑞士召开过两次会议——齐墨瓦尔得（1915）和昆塔尔（1916）会议——我认为和原意相反地，取得了一种不同的色彩，原因是，到会者不是正式的党的代表。后面我将简略地说到这件事。

地利社会主义者的倡议，和德国独立党人和英国独立工党的参加下，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政党联盟”（所谓维也纳国际），目的是使复活了的第二国际内的诸集团，激进化，抑制过分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诸集团，并使它们二者通过明智地说明各自的目的而一致起来。^①

这次侥幸事件的意义，被共产主义者当下找到的外号“第二国际”精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它能满足当时的需要的原因。在汉堡大会（1923）上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联合起来组成了劳工及社会主义者国际，给和平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并号召为建立一个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这无论如何听起来是十分响亮的——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社会立法而奋斗。一年以前（1922年法兰克福会议决议）宣布必须减低德国战争赔款到一个确定而合理的数额，取消协约国间的债务，从德国领土上的撤兵。根据此后发生的事变看来，我们不能不体会到这是多么伟大的一项成就和工作。

III. 共产主义和它的俄罗斯成分

1. 这时候，各国共产党正在急剧发展之中。这件事情本来是在意料之中的。也没有什么危险。任何一个体验了重大责任所产生的令人的清醒冷静的影响的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要为更向左转（或向右转）的集团的留下发展的余地，而这样的发展余地大概也不会长此空着不被占领的。假如能够使脱党人数不超过一定限

^① 这些说明中，有些是会使十八世纪的任何外交家获得声誉的。大障碍是阶级战争。大陆上诸集团没有它就活不下去，英国人有了它就活不下去。所以当合并工作在汉堡会议上完成的时候，德文本上保存了 *klassenkampf* 法文本上保存了 *lutte des classes*，英文文本上却用一个无法辨认的委婉辞令来代替了。

度,除了出些麻烦,这不见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甚至比让不安分的分子保留在党内还要好些。社会主义诸党,总会有过激派的麻烦。^① 这些“左翼”集团之在战后的麻烦时期内赢得地盘,以及他们之抓住机会取得一个迥然不同的党的身分,并不比他们的袭用古典用语称自己为“共产党”,或者显出比本来的党当时表示的强烈得多的国际主义倾向更令人惊讶。

我们还得记住,这一切是和这个事例中的俄罗斯局势完全无关的。如果沙皇仍旧统治着俄国,还是会有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但是既然俄罗斯分子在决定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方面——事实是,在决定我们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方面——成为一个因素,重述它怎样发展起来,并估计它的性质和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它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2. 最初——就是说,到布尔什维克 1917 年夺取政权为止——共产主义诸集团的发展,除掉那个最坚强的人碰巧是一个俄罗斯人,以及一种蒙古专制主义的气味呈现在他的思想体制之内而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俄罗斯的东西。当战争爆发,第二国际事实上自行停止活动的时候,以及当列宁宣布第二国际已经死亡,采取更有效方法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凡是和他具有同样感觉的人之集合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瑞士开的两次会议,即齐墨瓦尔得(1915)和昆塔尔(1916)会议上,这种集合的机会出现了。既然

^① 英国和德国因战争的争论而发生的分裂,当然是另外一件事,而且只有暂时的重要性。甚至德国 1916 年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建立的斯巴达克斯同盟,虽然在反对战争方面比独立党分子所认可的走得更远,要发展到明确的敌对态度还是费去了一些时间,即使在那时候,也至少没有公开地超乎坚持旧有的埃尔富特纲领文字之上。就我所知,李卜克内西也好,卢森堡也好,从未完全和党割断接触。卢森堡是布尔什维克行动的最无情的批评者之一。

实际上所有袒护他们国家的事业的人概未到会，到会的斗士们对于——或多或少地——集合到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纲领下来就没有感到什么困难。这件事情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表白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弥赛亚式的约许的信仰。有些到会的人也已经清楚觉察到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当然绝对看不见的真理，即资产阶级社会结构是受不了持久的“总体”战的紧张的压力，以及至少在几个国家之内会发生崩溃。可是，此外，列宁的领导没有被接受。大多数到会者的想法，与其说是要摧毁现存的各社会主义政党，还不如说是要说服它们，威吓它们，利用它们。他们还认为——这点列宁是赞成的——世界革命应通过各国无产阶级的各个行动，首先是“先进”各国内的行动来实现的。

第二个阶段的起讫日期，我定为1917至1927年，这就是说，从布尔什维克之在俄国上升为执政党到托洛茨基之被逐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1927年10月）为止。这十年，目击了共产主义诸党和共产（“第三”）国际的出现。它也目击了（暂时的）和社会主义诸党及工党的断然的破裂，在德国，破裂因执政中的社会民主党在1918至1919年这个冬天所采取的严酷的镇压措施而加深到无可挽救的程度。最后，它还目击了俄罗斯铁链的锻制。

但是整个这十年中，铁链既没有被擦破也没有被扭歪。必须记住，布尔什维克之赢得统治这个一切大国中最落后的国家，完全是侥幸。^①在某种程度上，列宁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再三再四地说，最后胜利只能经过更先进的国家内的革命力量的行动而赢得，他说这种行动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当然，他和以前一样向共产主

^① 布尔什维主义的侥幸成功可能要感谢德国总参谋部，列宁正是在它的命令下被运送到俄国的。如果人们认为这种说法夸张了他在1917年事变中的个人作用，那么局势中的其他偶然因素也足以使我们懂得这段历史的珍奇性。

义者下命令，他坚持严格中央集权的共产国际的组织——它的执行局有权指挥各个党的每一个动作——但他是以他的共产主义领袖的资格，而不是以俄罗斯专制君主的资格这样做的。这种差别关系极大。国际的总部是在莫斯科，实际的领袖是俄国人，但是指导政策的精神是彻底国际主义的，并无丝毫特殊关心俄国国家利益之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实质上一致同意的。虽然当时国际的执行局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局^①的人事关系比后来要密切得多，两者仍然更象是截然不同的机构，因此，国际本身和各国党的行为：假使和不存在和俄国的关系时他们所会有来的行为作比较，是没有不同之处的。

、所以，在这十年中，俄国的关系的重要性虽然是大的，却没有较此更多的意义。首先，存在着这样有分量的事实，即不论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在其成员的质量和数量上如何无足轻重，又不论它怎样不配被认真地对待，它一样能沐恩于已经征服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共产党的荣光之下，它能从这样的后援得到鼓励。第二，尽管有那样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现实——恐怖、贫困、喀琅施塔得叛变以后采用新经济政策一事所隐含的自认失败——从此以后，总可以指出，这是一个“实行过的”社会主义体系。布尔什维克党人证明他们自己是利用如下的事实的艺术大师：英国和美国的舆论会囫圇吞下只要是穿着熟悉的口号的外衣而被端上来的任何东西。这对其他共产党当然也有好处。第三，只要各国共产主义者（列宁本人也包括在内）一天相信世界革命迫在眉睫，俄国军队对他们来

^① 在列宁的时代，行政权力是由列宁本人领导的政治局，托洛茨基统治的军事委员会和当时由捷尔任斯基管理的契卡〔全俄非常委员会〕三者行使的。所有这三个团体都是苏维埃国家的宪法所不知道的，宪法把这种权力授给了“人民委员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也许它们在理论上应该称为党的机构。但是党就是国家。

说就具有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对诸反动集团所具有的意义。^①在1919年,这样的希望,与现在人们准备相信的同样合理,且更有实现的可能。的确,共产主义共和国实际上只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②建立过。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结构已危险地近乎倾圮,如果托洛茨基的战争机器这时候已经可以运用,又如果它不在国内和波兰作战的话,天晓得这些国家内,说不上更西面的国家内会发生些什么事情。^③不应该忘掉共产国际正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生死斗争的气氛中成立起来的。在此后取得了迥然不同的意义的许多事情——诸如具有指挥各国党的无限权力并剥夺了各国党一切行动自由的集权化管理——从这个方面看来,在那时候也许是十分合理的。

第三个阶段,我把它定为从托洛茨基的放逐(1927)开始,因为这是斯大林上升到绝对权力的方便的界标。自此以后,每一个政策问题的实际决定看来都是他作出的决定,虽然在加米涅夫和季

① 应该注意,共产主义者已经和他们轻易地丢掉民主主义一样,也轻易地丢掉了反军国主义和不干涉主义。

② 匈牙利的事例(贝拉·孔的政府)是颇有启发性的。上层阶级的瘫痪和农民的不关心,使一个知识分子小集团有可能没有碰到什么重要抵抗而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一群怪人——其中有些人表现出(巴伐利亚也一样)准确无误的病态征象——完全不胜任这种或其他任何严肃的任务。但是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信条具有无限的自信,对恐怖方法毫无反对。事实证明,这些方法是十分充足的。他们被容许上演他们的歌剧,假使不是协约国同意(或命令)罗马尼亚军队撵走他们,这场歌剧大概是要无定期地继续演下去的。

③ 所以,说西方强国在半心半意地支持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特别是支持邓尼金和乌兰格尔的冒险事业中做得既愚蠢又无效率,究竟是否正确是可疑的。在我看来,不管是由于机械地估计了形势,还是由于运气,他们恰恰做成了他们所能希望做成功的事情。他们在严峻的时刻里麻痹了苏维埃政权,这样就挡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前进。少于此会危及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多于此,就会陷入一场可能会轻易地摧毁自己的目的持久而靡费的,也许无利可图的战争之中。

诺维也夫的“审讯”(1936)或者甚至叶卓夫的恐怖统治(1937)以前,他在政治局里或在其他地方依然碰到了某些反对意见。在我们看来,这就意味着,嗣后每一次决策都是一个俄罗斯国务活动家从流线型的专制主义的立场出发,代表俄罗斯民族利益所作的决策。如果这么说是正确的,这又经规定了他对“国际”(Comintern)(共产国际)和对外国共产党的态度。它们变成了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它们被列入庞大兵工厂中这类工具的同等地位,并被按照环境现实主义地、加以比较评价。直到这次战争为止,世界革命成了一项冻结资产,也许这次战争又复活了它。国际共产主义的幸存的老战士也好,新参加进来的教徒也好,也许都是不足挂齿的。但是他们还有些用处。他们可以宣扬俄罗斯政制的光荣。他们可以用来作扎刺敌对政府的针子。他们增大了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力量。所以,费些事化几个钱来使他们继续服从,让秘密警察人员监视他们,弄些绝对顺从他拍他马屁的工人来担任第三国际各局的委员是值得的。

3. 斯大林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以及在关于这类事情的谣言)中不过仿效了这个时代的既定的作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做法和他是一样的,所以对他这个案的问题表示特别的愤怒,纯粹是伪善,袒护某种宗教信条的政府的做法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只要这种信条的生命力还足以推动行动,这些政府就要经常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信奉这种信条的外国集团。但是,1793—181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做法比这些例子所说明的远为普遍。受到这类做法影响的政府的——辞藻上的或其他的——反应也同样地合乎标准:一切类型一切阶级的政治家,都乐于抓住机会把反对派称做卖国贼。

但是对俄罗斯国外的共产党来说,从一个现代化沙皇手中的

一具僵尸那里接受命令，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卑鄙的奴颜婢膝引起了两个疑问，第一是原因何在，第二是它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未来性质和未来命运的可能的关系如何。

回答第一个疑问也许比粗看起来容易一些。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放在共产主义者的椅子上，以实事求是精神来考虑他的风格，对待他的处境。他不会根据人道主义的考虑来反对斯大林政制。也许他甚至会赞美屠杀——有些神经衰弱的堕落分子，还有一些从失败和愤怒中来的共产主义者确实在牺牲者的苦难中体会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之感。何况，他为什么要对这种并未彻底阻止资产阶级的人民盲目崇拜政体的残暴行为感到愤慨？当坎特布雷大主教并不谴责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①，他为什么应该根据这个理由来谴责它？真的，为什么？

其次，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根据热月主义的理由来反对这种做法。热月主义的说法最初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派使用的，但是后来托洛茨基把它用来给斯大林的统治加上“反动的”烙印，所取的意思就是1794年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的人的行动是“反动的”。但这是毫无意义的。使农业集体化并“清算了”富农，转变了新经济政策的毕竟是斯大林。事实上，他正象一个高明的谋略家一样，镇压了反对派，实质上却执行了反对派的纲领。

最后，对别国共产主义者来说，只要这个保护他们的政权还是光明正大地对待他们，那么它在俄国国内干些什么，就不是什么头等重要的事。再说，纵令它不以光明正大的行动对待他们，他们又

^① 这位教士所写的书中所表达的感情，不能根据这样的理由来辩护，即“俄罗斯实验”的诸原则是一回事，而执行原则时的方法是另一回事。因为斯大林统治的真正可怖之处不在于他对百万牺牲者的所作所为，而在于谁若想活下去，谁就得做这件事。换句话说，原则和实践是不可分离的。

能怎样？锁链被拉得很紧，也被擦伤了。但是它也管吃管喝。社会主义诸党不会要他。头脑健康的正常的工人已经叽叽咕咕地掉转身来离开了他。他也会象托洛茨基那样惶然不知所措的。没有这根链条，他就什么事也不能做，^①接受了他的奴隶身分，他也许还能指望——也许现在他还在指望——在这次世界大战之后会出现转机，他也许能够从中脱颖而出……

最后那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俄罗斯专制主义将在整个欧洲文明的废墟上传播开来——或者甚至超过这个范围——在这种情形下，遍布全世界的共产党将转为俄罗斯的守备队。但是也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政制将在这过程中沉陷下去，或者在扩大到其他国家时，取得更适合于各个国家土壤的特征。这种特殊的情况将是，结局，俄罗斯成分在革命社会主义的未来性质方面**什么变化也没有**。押这一宝无疑是冒险的。但是，这不见得比这样的希望更为愚蠢，即希望我们的文明将毫无损伤地从这场大火中挣脱出来——当然除非这场大火比我们可以指望的熄灭得更快。

IV.管理资本主义？

1. 说了这些，我们还没有找出什么可信的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1918年以后社会主义诸党在担负政治责任方面所作的实验

^① 这当然特别适用于美国的共产主义集团或诸集团。美国的政治条件不利于一个正式的共产党的成长——少数郡内的地方组织，大抵不过汲汲于征募新党员而已。但是共产主义要素的重要性，却决不能以正式的共产党党员数量来衡量。那些率直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同路人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参加党的动机。他们总想留在党外，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带上肩章，他们可以更好地为共产党效劳。他们在形成舆论的委员会行政机构等等内争取地位，同时仍可以不折不扣的真实性否认他们是政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这类看不见的集团，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领导是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的。

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重复说一次，在有些国家——例如在瑞典——社会主义者仅仅继续巩固他们前此取得了的权力；在另一些国家，曾无须用革命行动去夺取权力，权力是自然来到的；在一切国家内，他们似乎比其他任何政党更能设法解决当代重大问题。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看来他们几乎垄断了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一切主要条件。其次，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任何当政的经验，他们却已经取得了某种更有用处的组织、谈判和行政管理的丰富经验。事实上我们应该立刻指出，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一件真正的蠢事。最后，对他们来说，一个比他们更左的新政党的不可避免的出现也好，这个新政党和莫斯科的联系也好，两者都不象他们的对手。试图说成的那样严重。

但是，尽管这样，不论在那一个国家内，他们的处境都是危险的。对真诚的信仰者来说，他们的处境很可以能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所有这些策略上的有利之处，掩盖了一种他们无力排除的主要困难。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动乱使社会主义者登上了当政的地位；但是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过程的外袍虽然破破烂烂了，这些破片底下的东西却原封未动。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必得在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中进行统治。

马克思把夺取政权看做应该立即实行的社会化的先决条件。可是，这意味着，正如事实上马克思的论点到处所意味着的那样，这种夺取政权的机会将发生于资本主义走完了它的路程的时候，或者，再用我们的话来说，将发生于事情和灵魂都成熟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崩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动机由于它的内在原因而导致的崩溃。^①资产阶级世界的政治崩溃，应该只是随经济崩溃以俱来

^① 这一点，部分说明了，旨在表明资本主义在事实上正因内部原因而崩溃的理论在美国所得到的支持。见第10章。

的东西。但是，现在政治崩溃——或者类似政治崩溃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政治上的机会已经有了，可是还没有一个地方的经济过程已经近乎成熟。“上层建筑”比推进的机制运动得更快。这是一种最非马克思的局势。

关在书斋里的学者，也许会推测，如果认清事态的社会主义诸党拒绝当政的特洛伊木马，继续处在反对党地位，让资产阶级去跟战争与和平留下来的破烂摊子打交道，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这样做对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全世界也许要更好些——很可能如此。但是对于那时已经知道必须与自己的国家共命运，并采取负责的观点的人们说来，选择的余地是没有的。他们毅然决然地面对了根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社会和经济体系除非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就无法行使它的职能。社会主义者可以根据劳工的利益控制它，管理它，勒索它到损伤它的效率的地步——但是他们无力做出任何明确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情。如果他们要让它运转，就得让它按照它的逻辑运转。他们必得去“管理资本主义”。这也正是他们做了的。有些事情是为了用社会主义词句打扮他们的政策、法令而作的，他们还相当成功地在他们的政策和他们想象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之间的一切区别上用上了放大镜；可是实质上他们必须做的是自由党或保守党在同样环境下也会做的事情。但是，这虽然是社会主义诸党唯一可能的途径^①，对他们来说，这却是最危险的一条途径。

这也并不是完全绝望的，或者，按照社会主义信仰立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辩护不了的。二十年代初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很可以希望，如果他们好运气，加上谨慎小心的掌舵，他们会在政权

^① 我不打算按照俄国的路线来讨论某种根本改造的尝试作为另一种可能性。因在我看来，任何这样的尝试之会迅速地以混乱和反革命告终是再明显不过的。

中心处或靠近政权中心的地方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使他们能够躲开任何“反动”的危险，撑持无产阶级的地位，直到有朝一日可以不经暴力破坏而使这个社会社会化；他们将主持资产阶级社会无疾而终的典礼，同时料定这个死亡过程进行得万事妥贴，受难者不会卷土重来。如果除了列入社会主义者或劳动者的社会图画的因素以外不存在其他因素的话，这种希望可能真会实现。

站在信仰立场所作的辩护，也许就是以上述命题为基础的，即这种局势是新奇的，是马克思所未预见的。资产阶级受难者转向社会主义者请求庇护——这种情况显然是他的图式里所找不出来的。人们可能已经说过，在这种环境甚至仅仅“管理资本主义”，也是向前跨了一大步。而且这又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来管理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只是在社会改良的领域内做老老实实的工作的问题，和建立一个根据工人的利益办事的国家的問題。无论如何，这是选取民主主义的道路时唯一要做的事情，因为恰恰由于没有应该有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数人，才显出局势是不成熟的。无怪决心要在这种环境下接受官职的社会主义诸党高声宣布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忠诚！

因此，政客的渴求官职按照教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理由来说就是正当的了。读者不难设想，这种令人快慰的一致，必曾给激进的批评家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既然后来的事变诱使那么多人谈到这种政策的失败，并教训这个时代的领袖们说，他们本该怎么办，我倒也希望强调一下他们观点的理论根据，和他们须在其中行动的社会模式的不得不然的性质。如果确曾有过失败，原因必须在愚蠢或背叛之外去找。为了使我们能深信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德国和英国的事例就行了。

2. 随战争的结束以俱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狂潮一平息，一种

真正的革命形势便在英国发展起来，群众的愤激之情便在譬如说政治罢工之中表现出来。负责的社会主义者和负责的劳工运动者完全由于这些事变——也由于有这样的危险，即全民正在被推进某种真正反动的心情中去——而被驱迫得结合在一起，以致他们后来接受了一个共同的领导。至少在议会策略方面是如此。合并起来的力量的最大份额落到劳工利益集团手中，在劳工利益集团方面又落到几个大工会手中，因此一个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几乎马上就发展形成了。这些知识分子反对同盟所具有的工党党员的性格，他们说看不见这里面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工党党员的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主义给这种看法以某些口实，但我们若宁愿着重事实而不考虑口号，我们仍然应该将接受了麦唐纳领导以后的整个政治上的劳工力量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看成相等。

党在这种革命形势中成功地诞生之后，稳步地改进它的地位，直到麦唐纳1924年的执政。他和他的人作出了那么可以信赖的表现，以致即使不满的知识分子也暂时平服了。在外交政策和殖民政策问题上，这个政府能够发表它自己的意见，——尤其在对俄政策方面。在国内事务方面，事情比较不那么容易做，主要因为财政上的激进主义早已（也继续）由保守党政府依靠一部分劳工投票尽可能地做到了。在立法上，工党政府所做的虽然不外是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它还证明它有资格管理国家事务。斯诺登在财政大臣任内的卓越表现，足以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劳工是适宜于治理一个国家的。这件事本身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服务。^①

工党政府处于少数，它不但必须依赖自由党的合作——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他们的自由贸易观点——而且在某种程

① 此外，从政党策略立场来说，这件事情使保守党办起事情来遇到的困难比顽强的激进主义者所遇到的要大得多。

度上也得依靠保守党的宽大，这件事，大大促成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成就，但使其他的成就发生了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他们的处境，很象 1850 年代和 1860 年代的保守党短期执政时的处境。他们不容易采取好象处于多数地位时的那种负责态度。但是，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正因为他们并不处于多数，所以，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法庭上也可以证明采取更有力行动的时机还未到来，——至少，实行能够满足民主主义的必要条件的任何计划的时机还未到来。

可是党员群众并不赞赏这一切。群众更不能体会，下面这一点，即不仅工党本身完成了的事应该归功于工党，就是保守党为争取劳工投票而做成的事，一部分也应该归功于工党。他们没看到眩人眼目的重建性质的建议，没有看到眼前利益的约许，他们不懂得，他们天真地质问：“为什么社会主义者现在当政了，却不为我们做些事情？”是多么不公平。不甘心于被降到从属地位的知识分子，当然利用了这种心情所提供的机会来攻击工党分子的支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指挥棒，并且把日常的不满发展成为专横的工会官僚淡然加以忽视的可怕的罪过。在他们的影响下面，独立工党在此后处于反对地位的几年中，尤其当麦唐纳不会理会他们要求有一个更激进的纲领^①的主张的时候，变得愈来愈倔强不驯了。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胜利看来更象失败，负责任的态度看来更象是懦怯。

可是这是无法避免的。麦唐纳第二次执政的历史更好地说明

① 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是银行和某些关键工业的社会化，从而它并不是真正正统社会主义路线的纲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面，人们大吹大擂地说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麦唐纳的纲领则被称为“改良主义的”纲领——，按照古典的用法，改良主义这个词同样可以适用于独立工党纲领本身。

了社会主义诸党的政策(包括在不成熟条件下执政)中所固有的困难和危险^①。历史家已经学会了公正地来评判庇尔爵士^②的政治家风度。我相信他们也会学会公正地来评判麦唐纳的政治家风度。他的格外的不幸是上台于世界萧条的开始时期,何况这次萧条又是体现于国际联盟中的国际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原因。

少数人也许会认为——事实上少数人确实认为——根本重建的机会已经到来。这会把国家分裂为二,其结果如何是绝无怀疑余地的。可是,除了根本改造之外,却广泛地推荐了和次于根本改造的社会改良——例如个别的国有化法案和额外的〔社会〕保障立法——结合在一起的通货膨胀政策,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采用重商主义政策。但是这个纲领的一部分无疑加深了萧条,其余部分——废弃镑的金平价和重商主义——意味着和这个国家的传

① 读者也许会发觉这里漏掉了对于 1926 年的总罢工的评论。虽然把这次总罢工的预兆上的重要性减到最低限度同样符合于两个党的利益,虽然罢工的官方理论已经照这种要求被制订出来,这次罢工的意义却远超过了,工会大会必得“恐吓”,保守党必得“称之为恐吓”的某种局势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策略错误之上。为了体会到这次罢工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历史事变,我们只要问问我们自己,倘若这次罢工成功了,它对政府的权力和民主政治会发生一些什么后果。假使这种武器证明是有效的,工会会成为英国的绝对的主人,其他政治、司法或经济的权力,除非得到工会的默许,都将无法生存在它们的旁边。工会处在这种地位上,就不能够还保持原来的样子。不管领袖们怎样不愿意,他们将不得不把扔给他们的绝对权力使用起来。

为了我们的目的,只要指出两点就够了。第一,上面描述的局势,尤其是散播在党员群众中的,并为许多不负责任的分子所孜孜不倦地培养着的不满情绪,对罢工的形成起了不少作用。第二,罢工并未象本来可以做到的那样损伤党的权力。正相反,看来罢工的失败造成了群众的激进化,而群众的激进化正是党在 1929 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② 这个比拟,可以从两个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的某些特色(虽然庇尔执政是在 1836—1839 年危机之后,这是他的有利之处)一直扩展到若干政治细节问题。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有党的分裂,两者都勇敢地甘冒分裂的危险,最后勇敢地接受了这种分裂;在两个案例中,领袖都被认为是“叛徒”。

统，并和工党自身的传统彻底决裂，因而使社会主义者几乎不能实行这个纲领，更说不上行之有效了；要安全而有效地实行它，就得互相同意后才实行，这就是说，要有一个联合政府。

所以，联合政府一天建立不起来，麦唐纳和他的一伙只好自己投身于使他们自己创立的体系运转起来的任务之中。按照当时的情形，这是他们所可能承担的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当谁都在吵吵嚷嚷说应该立刻做某些事情，当各种类型的不负责任的人都有发言权，当群众在叽咕，实业家绝望，知识分子咆哮的时候，他们镇定地为他们的尺寸土地而战。在国内，他们在金融上保持秩序，维持镑价，约束自己不去加速立法机器的转动。在国外，他们尽一切努力使日内瓦体系发挥作用——也得到了可观的成功——并减低周围左右的危险和紧张。当时机来到，国家利益看来已经抵得过党的风险的时候，他们毅然改弦易辙，帮助了国民政府的组成。

回顾到在许多重要事例中，一种政策愈是贤明，势必愈是在公众中，在知识分子的批评家中不得人望，不免令人有忧郁之感。而这正是一个适例。对于看不出这种政策和英国萧条的比较缓和以及随后的恢复的稳定性之间有什么联系的激进的批评家来说，其间除了软弱、无能、偏隘的传统主义——如果不是叛逆式的背弃社会主义事业——而外，是什么关系也没有的。这个也许是民主政治历史中最好的表现之一，也是根据对经济及社会形势的正确认识而负责地决定下来的行动的最好例子之一，却被批评家看作是“可耻和令人作呕”的。至多，他把麦唐纳看作是个把马弄到失蹄倒下的蹩脚骑师。但是最投合他心意的说法是，麦唐纳政府在英国银行家的耳边密语（或者更坏）下面，或者在英国银行家的美国后台老板的压力下面屈服了。

不幸，这种胡扯是极重要性的一个因素，在作预测时，必须估计到的一个因素。它也许会严重地伤害社会主义诸党在我们生活其间的过渡时期中为文明事业服务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撇下这个要素，也丢开任何为国家利益作出了牺牲的政党，将在短期内为之而吃苦头的那种陈腐的滥调，我们就不难认清，长时期中，工党势力很可能是因麦唐纳第二次当政而得加强的，把它同庇尔爵士的第二次当政相比拟也有助于证明这一点。庇尔的保守党的多数，因谷物法的废除问题而分裂了。庇尔的一派，虽比麦唐纳个人的追随者人数更多更为重要，立刻就瓦解了。保守党残废了，并证明是无力取得政权的——虽然它曾三次执政——直到1873年狄斯累利的伟大胜利为止。但在此以后，一直到坎贝尔·班纳曼爵士1905年的胜利为止，它当政的时间占了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政治上说英国的贵族和乡绅，在这全部时间内，比之高价粮食这个污名没有洗刷掉时更好地坚守了自己的阵地。

事实上，工党迅速地恢复了过来，且在分裂以后的岁月中，巩固了它在全国的地位。完全有把握说，即在正常的进程下——就是说不考虑战争——社会主义者不久就会以增大了的力量和较好的成功机会重行执政，并将有力量比以前采取更强有力的路线。可是同样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论在纲领方面和他们将纲领付之实施的能力方面，他们的政策和麦唐纳的政策都只会有程度上的差别——差别主要在于某些个别的社会化法案上面。

3. 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的经历，在很多细节上当然不同于英国工党。但当留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政府职务，并下决心向共产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就和他们的英国同僚一样走向了“管理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前提，并且考虑到他们当时无论在联邦议会或普鲁士议会或总人口中都没有，也

不能指望在可以计及的未来取得多数，那末，其他一切事情就都是必然要随之而来的。1925年时，总人口约有六千二百万人。无产阶级（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我把家庭仆人包括在内）不足二千八百万人，这个阶级有一部分人是投其他政党的票的。“独立”的人口并不比无产阶级少多少——约有二千四百万人，并且大部分不理睬社会主义的劝导。如果我们不算上层阶层——比如说一百万人——并且只考虑可以算进票数里的诸集团——农民，工匠，小商人——则不仅在目前，即在最近的将来能从这些“独立”人口中争取到的选票也不会很多。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白领雇员，包括他们的家庭在内，人数不下于一千万。社会民主党当然懂得这个阶级掌握了关键地位，因而作了极大的努力去争取他们。但是，尽管也得了可观的成功，他们的努力只表明了，白领阶层是一个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推想出来的要严重得多的障碍。^①

因此，纵令共产主义者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死对头而是他们的同盟者，党还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确，并不是非社会主义的多数的一切派别都是采取积极的敌对态度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民主人民党）人材多，人数少，是一向愿意合作的（在一定范围内）。可是同样确实的是，多数派分裂为许多集团，这些集团完全不能和谐一致地行动，它的成员和支持者决不象社会民主党人本人那么有纪律。但是既不能又不愿走冒险道路的通情达理的人们，仍然觉得

① 社会主义者们当面对这个事实时，通常以这样的论点自慰：非社会主义的雇员不过是有罪的绵羊，到这时候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真正的政治位置，但是结局他们一定会找到它的，或者认为他们是由于受到他们雇主的无情压力而未能参加到党里来的。第一种说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以外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知道，社会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链条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第二种说法之为虚妄，是清清楚楚的事实。不管在其他时代这种说法含有多少真理成分，二十年代的德国雇主，除了极少数例外，完全不足以影响他们雇员的投票。

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民主主义的路——而这条路就是联合政府的道路。

最宜于作为同盟者的是天主教中央党。它是强有力的。在希特勒出现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动摇这个党的支持者的忠诚。它的组织是卓越的。只要教会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它愿意在即刻可以付之实行的那种社会改良措施方面和社会主义者本身走得差不多一样远，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远。它对逊位的皇朝并不抱有什么热情，它规规矩矩地支持魏玛宪法。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欢迎能保证它的既得职位的分赃安排。这样，就轻易地达成了谅解，轻易到使外国观察家吃惊的程度，社会民主党以绝对的恭敬与圆通对待天主教会。他们毫无困难地和教皇订立了一个协议，协议所给予教士的，比异端的霍亨索伦统治从来给教士的为多。至于在政策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意见分歧之处。

但是虽然这两个党的联盟是根本的，但是所有矢志于魏玛宪法的党，都没有排除在内阁之外。民主党，民族自由党，民族党（等于保守党）都容纳进来了，有的甚至得了极重要的部。联合作为普遍原则，就是妥协作普遍原则的意思。各种法案方面的必要让步，事实上很容易地做到了。军队是不去触动的，实际上它处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导机关管理之下，并且得到充分的供应。津贴了东普鲁士，整个农业得到了关切的照顾。这件事的某些含义，并不十分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宣言，为要使付这笔钱的无产阶级觉得更合口味一些，于是把这类事情称为**计划**——也许读者会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

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对待产业群众的态度方面，和对待自己纲领的态度方面，把自己工党化了。一开始，通过了一个十分稳当的法案，其间最激进的特色在于插在标题里面的**社会化**这个词

(1919)，这算是旧日社会主义旗号的见证。但是社会主义者立即搁起了这一切，为的是要致力于新政使美国人熟悉了的那种劳工立法。这满足了工会的要求，因为工会的官僚体系已愈来愈甚地成为党的政策制订机构的作业部分。

人们可能认为，这对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在党内理论家中间仍占统治地位）的党来说也许是困难的。但是事情并不如此。除了一定数量共产主义背叛者而外，可能会在党内提出异议的知识分子，都被管得好好的。德国党不象英国党，它在帝国邦和市的行政机构中已经定居下来了。此外，它在出版机关和其他地方，还可提供好多党内职位。这种任命权被有力地加以使用。在文官和学院生涯，无数公营企业等等中，驯顺的就能升迁高位。这种手段，在使激进分子听党的话方面是有效的。

社会民主党在国家行政机构的一切部分中所取得的牢固的控制，不仅有利于严格的纪律，也有助于扩大党员人数，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加有把握的票数。当然，它也用另外一些办法扩大它的权力。例如，社会主义者便在普鲁士自由邦内保证了统治的权力。这使他们控制了警察力量，于是他们很仔细地选拔党员或可靠的追求地位的人做大市镇的警察局长。这样他们撑起他们的营帐，直到按照一切通常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地位似乎已经膨胀到饱和点为止。于是，还是按照一切政治分析的常规看来，甚至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大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在这些壕沟中他们可以十分舒适地安居下去，直到事物本身的长期进程使少数派自然地变成多数派，并揭开掩盖着终极目标的帷幕。引自《共产党宣言》的引文……

不管党的动力工厂内的机械学到底是怎样的机械学，政治组织和总的社会局势看来一样出奇地稳定。何况，尽管有好些反对

个别立法和行政措施的主张，整个说来，联合政府的政策有利于稳定而不是不利于稳定。大部分做成了的事情定能博得我们诚挚的尊敬。没有一件作出的事情可以解释比缺乏威信和魅力的任何一个政权所引起的寻常的不满更坏的事情。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在财政金融方面。这个政府体系的文化和政治成就的一部分是和巨大而急剧增长着的财政开支相联系着的。而且，筹集这些开支的方法，汲干了积累的源泉，虽然其间也有一个高度成功的销售税。只要外国资本继续流入，一切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在它停止前的一年，预算困难甚至现金困难已开始出现。当外国资本的流入真的停止时，众所周知的，会损害最能吸引人心的领袖的地位的局势突然出现了。可是，最最要紧的究竟是，评论党和它当政期间的指导方针的社会主义评论家，将有权利自夸那不算蹩脚的政绩，有权吹嘘假如他们再度被安置在当政地位的时候，他们满可以干得一样漂亮。

V. 当前的战争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

当前的战争将怎样影响现存的社会主义诸集团的命运，当然取决于战争的持久性和战局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出可以推测它的任何重要之点。可是，让我们用举例方法，在许多可能情况中考虑两种情况。

直到现在，（1942年七月）许多观察家看来还在预料俄国将赢得巨大的权力和威望从战争中挣脱出来，总之斯大林将作为真正的胜利者而出现。如果情形确实这样，也不一定可以作出结论说，继起的将是一次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或者甚至是欧洲大陆的俄罗斯化，加上上层阶层的连根铲除，以及对于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诸集团的总清算。因为纵令不考虑可能有的

英美对俄罗斯权力扩张的抵抗，也不能肯定俄罗斯专制政体的自我利益寄托在这个方向。但是可以肯定，这样一次的圆满的解决——列宁纲领的完全实现——的机会，将不可计量地增大。尽管这种世界革命大概会不同于马克思的观念，对于愿意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代用品而接受下来的人来说，它无疑不再是白日梦了。而且；这不仅限于欧洲。

在这种情形下，正统社会主义及其为之而奋斗的一切的命运就会被决定。在欧洲大陆上这时候事情就会和法西斯政权继续掌权的时候一样。可是，如果我们再次假定，英-美-俄同盟得到完全胜利——这就是说，强制实施无条件投降的胜利，但是一切荣誉归于英国和美国——那时候我们将不难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或者更工党化的类型的正统社会主义将在欧洲大陆上得到更好的存在下去的机会，至少可以存在一个相当时间。相信这点的理由之一是，人民如果发现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条路都堵塞住了，当做剩下来的最明显的选择，他们将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但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工党式的社会主义将得到胜利者的宠幸。因为象我们现在设想的那么完全的一次胜利的后果，将是英美对世界事务的管理——这种英美的统治，按照我们所见的，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塑成的观念来说，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帝国主义**。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在其间，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野心只当为英国和美国所谅解和认可的时候才能算数的，只能借军事力量确立起来，也只能由于长期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才能维持下去。也许用不着说明，为什么在我们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条件下，这样的局势对这二个国家来说将意味着某种被称为**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但是，十分清楚，控制和统治全世界的任务，将一方面由于在欧洲重建和新建一些小而无效率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安

上一批工党型和社会民主党型的政府而大为便利。尤其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破片将成为可以组成这种政府的唯一的政治材料，这样的政府，可能要比毫无精神上的保留地屈从于世界护民官并和世界护民官的代理人合作的局面更能长期地接受这种世界秩序。不管它的价值如何，这是**自由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

可是按照本书主题的立场而言（虽然不是从其他的立场），所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不管个别社会主义**集团**的命运如何，当前这场大火无疑——不可避免地，到处皆然地，不论战争结果如何——意味着另一次向社会主义**秩序**的大进展。诉诸我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结构的影响的经验，就足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测。而且，这一次，〔社会主义的〕大进展也将出现于美国。

但是这种经验虽然是有价值的指南，却是不充分的。四分之一个的世纪已经过去了。即使对有利于本书第二篇所说明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诸力量而言，这也不是可以忽视的一段时间。不考虑其他一切事情，我们将在战争终结时局面面临一种基本上不同于1918年的经济局势、社会气氛、和政治力量的分布状态。无论如何这二十五年中已发生了许多决不能单独根据长期趋势来预言的事情。特别是，出现过冲击了一个美妙的局势、从根本上震动了社会结构（尤以我国为最甚）的一次大萧条。破坏这些结构的更有效的手段是对付萧条的各种政策。这一点，又多半必须归之于部分是偶然的政治力量的配置。后果是明显的。特别应该指出，庞大的官僚体系已发展起来，现时已强大到足以守住他们的阵地，并作为根本重建政策的工具。

战时企业捐税和实业阶段的捐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按照1919年以后的比例减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以永久瘫痪资本主义发动机，因而为主张由政府来管理的人提供另一种理由。通货

膨胀,即使不会比,譬如美国现时政治模式下所不可避免的走得更远,也很可以直接地,并且通过被剥夺的债券持有人和保险单持有人的激进化间接地做完剩下来的一切事情。此外,战时控制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被废除 1918 年后的经验所昭示的程度。它们可移作其他用途。在美国,早已采取了各种步骤,为战后调整中的政府管理,并且为把资产阶级的战后调整路线打入冷宫作舆论上的准备。最后,没有理由可以相信,政府会放松他们已经取得的,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过程的控制。这些东西的总和诚然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主义将作为停滞和不断磨擦的唯一实际可行的代替品,而硬塞给人们。

细节和词令,在不同国家当然是会不同的。政治策略和经济结论也是如此。英国的发展,比较易于预见。工党人士响应紧急事态的号召参加了丘吉尔政府。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不管有没有紧急状态,他们那时候正顺利地走上宦途并取得政权。所以他们当然能够单独地处理战后重建的工作,或者——这也许是最有效的办法——在他们控制的联合政府中处理这项工作。战时经济将实现几项当下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要保持他们早已得到的东西就行了。如果留下来可以让资本家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不多,那末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可望比较容易些。而且,事实也许会证明,有可能十分坦率地谈到社会化,清醒地、有秩序地、而且多半通过一致同意来实现社会化。但是在美国,由于许多理由,主要由于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薄弱,预测工作较不容易进行。但是最后结果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同,虽然口号几乎肯定是会不同的——福利上和文化价值上的成本也不一样。

再说一次,只有本书规定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才是可以这样预言的。除此以外,什么也不能这样说。特别是,很少理由可以相

信，这种社会主义将意味着正统社会主义所梦想的那种文化的降临。它更象会显出某些法西斯的特色。这是对于向马克思祷告的人们的奇怪的答复。但是历史有时候喜欢开古怪的玩笑。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统治世界的是很少的一点儿智慧(Mundus

regitur parva sapientia)

现在(1946年7月)可以另外再谈谈前节所说的战争对我们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它对正统(即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诸集团的地位和前途的影响了。在1942年7月，已经看得很明显，不论某些社会主义集团的命运如何，总会出现另一次走向社会主义秩序的大进展，而这时美国也会出现这种大进展。同样看得清楚的是，现有的各社会主义集团的命运取决于战争持续时间的久暂和战局的结果。最后，也曾提出过，这样的说法，即战局若以英美俄同盟的完全胜利(即敌人的无条件投降)告终，正统社会主义所能得到的结果将视斯大林是否作为真正的胜利者出现，或全部荣誉是否归于英国和美国而定。在后一种情形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型的工党主义，将在欧洲大陆上得到改进他们地位的大好机会。

斯大林已经成了东欧的主人。英国和美国正为在中欧和西欧保持某种势力范围而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诸党的命运反映了这些情况。但是还有另一种可以在实质上影响全世界社会形势的要素，即也许能够保证有利于资本主义秩序的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章将首先讨论正统社会主义和工党主义的地位，特别是英国的局势；第二，讨论美国产业的显著成就的可能影响；第三，俄

国的政治成就的可能影响。这样，我们的论述自然划分为三部分，即：

I. 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II. 美国的经济潜力

III. 俄罗斯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I. 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许多事实表明，尽管这一回存在着俄国这个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情况的影响十分类似于第一次大战，不过更强烈一些吧了。这就是说，我们能够目击，现存的走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本书所规定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趋势的加速行进。

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工党的成功。正如前章所已指明的，这次成功本在意料之中，所以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成功也不比我们所预料的更为圆满。由于英国的选举制度，议席的实际重分配容易描绘出一幅夸张的图画。工党得票约一千二百万票，而保守党约得一千万票。自由党的好日子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甚至幸存的十二个自由党议席比随便挑出来的七十二个工党议席代表更多的票数。换句话说，工党在这种比例代表制下不会赢得超过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力量的多数，虽然工党和自由党的联合能够得到令人安心的差额。英国选举制度的理论根据正在于产生强有力的政府和避免政务的停滞。这正是这个事例中所做到了的事情。但是在估计哪些事情可以办哪些事情不可以办的时候，仍然不能不考虑不同于议会局势的全国局势。这个明显的结论因下述一些事实而加强，即在正式工党左边的诸集团显然没有能够改进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独立工党正好保持了它原有的三

席，共和党加共产党丧失了原有的四分之一席位。考虑到有许多理由可望“激进化”，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也是英国政治上的成熟的一个动人的证据。

这种形势必然会有所表现。事实上，这种形势早已在内阁的面貌和它已经通过或预示要通过的法案中表现出来了。希望读者重新读一下本书论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一部分（第24章第4节）。他会注意到，第一，工党政府做了的，或打算要做的一切事情，正是符合于那里撮要说明了的纲领的精神和原则的；第二，就实际行动而言，迄今为止还赶不上那个纲领。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尤其是一个意义十分重要的表征，因此这件事也许会成为突出的历史界标。但是它的实际重要性很可以说是等于零：自1914年以来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已经成为财政部的一个部门，这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一个中央银行本来都不能不如此的。至于象煤业法案和充分就业法案之类的东西，在英国本来是很难有什么争论余地的。工党政府所采取的或大概要采取的处理这些事情的办法，大概会得到几乎普遍的同意。根本原则问题上的模拟战争无疑会使这项严肃的任务活跃起来；但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或者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歧那么重要，而是因为政府和议会没有它们是活不下去的。这一切都是应有之举。当然这又是一次管理资本主义的案例，但是因为经过了一次战争，因为过去了一段时间，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目标比从前清楚了，办事人的手更坚定了，私有财产的最后清算这一点也更心中有数了。可是，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分明正是这种政治行动和它的社会、经济形势根据的几乎理想的一致性，是如此重要，从私有财产社会立场来说，又是如此危险的事情。不管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者会说些什么话——工

党政府的态度当然给他们准备了活动的机会——正因为这一次英国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进展中胡闹成分绝少，所以它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具有重要性。那么负责地采取了的步骤，决不需要折回重做。除了外来的颠覆之外，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灾难也许都可以成功地避免。如果政府能做到保持它的路线不变，它将能恰恰完成介乎麦唐纳那样的无权力的工党政府（见第 27 章第 4 节）的任务，和未来的拥有议会中的多数同时也拥有选民中的多数的工党政府的任务之间的那种任务。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欧洲大陆上这样的希望是有的，这种希望当然会因英国的范例而多多少少得到加强。

第二，在前章中我们指出过，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从来没有预见过，也不可能指望他们预见，政权会扔给劳工，资产阶级受难者会转向工人请求保护的这种局势。我们也指出过另一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预见的事情，即在形式上无须毁坏资本主义秩序的合法体制，而使用捐税和工资政策之类的不革命的方法来征用资产阶级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战时捐税和战时统制诚然不能原样维持下去。但是后退可以在社会主义纲领中一些最得人望的项目可以自动地实现的一条线上停止下来。纳税后收入的平均化早已实施到足以损害俄国人所说的如医生和工程师等“专家们”的效率的程度。这件事确实是通过一个臃肿而靡费的机构做成的，也许不久人们会想到，把付给各个人的报酬限制到减去直接税后的余额，而不是付出一笔此后还得取回的数目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可是无论如何，挤汁的橘子，以及许多激进的修词，总是容易挤干的。

第三，假定在下次大选中工党政府改进了它现在的地位，赢得了选民的大多数的支持，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可以向收入的

平等化略微前进一步，他们可以按照贝佛里奇计划或其他路线改进社会服务，并且比任何一个政府做得略为超过一些；他们可以在产业的社会化方面跨出几大步。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知道，在现代英国条件下，对于一个重大的社会化法案的纯粹经济的反对论是不会有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见得会成为严重的障碍；英国现在依靠它的产业家的工作的地方，比1917年的俄国多得多，但是除非不必要地激起他们的对抗，他们的合作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最后，我们也用不着把下面这种十分投合热情的社会化信徒心意的，认为内阁制度不适于实行社会化计划的主张看得很重要：沉迷于独裁方法的幻想中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怀疑它的效率；但是这是可以用来民主地实行社会化的唯一制度——社会化了了的产业的实际管理当然会需要半自治的机构，内阁必须象现在和军队的总参谋部合作那样和这些机构合作。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劳工问题。除非实行社会化就意味着经济崩溃，实施社会化的政府不可能容忍现在的工会的做法。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在这种情形下也得解决只有俄国已经解决了的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工业纪律问题。一个有意实行相当程度的社会化的政府不得不使工会社会化。可是，事实表明，劳工是一切事物中最难社会化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在英国，用民主这种政治方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地方为多。但是解决的道路也许是曲折而漫长的。

除俄国以外，欧洲大陆上的政治形势基本上是类似的。我们注意到，凡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地方，群众中都有某种保持或转变到拥护社会民主党或天主教党的强烈倾向。最显著的例子是斯塔的纳维亚诸国。但是，即使在德国，也看得出类似的倾向，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德国是自由而不受外来影响的话，某种很象魏玛共

和国那样的东西会从现在的苦难境地中产生出来。虽然英美当局对社会民主党表示的好感使这种证据部分变为无效，可是俄国当局也允许在其占领区内重建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件事却也加强了这种证据。不合理地把行不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强加于德国人民头上当然会使劳工政府信誉扫地，并消灭现在还存在的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但是，假如为了心理实验起见我们愿意把俄国这个要素略去不计，又假如我们还愿意假设，英美按照普通的礼仪和普通的常识所指示的那种方式来对待德国，这仍然是应该采取的一般的诊断和预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预测，虽然要附加各式各样的条件：工党政权——在天主教国家里工党往往会和天主教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它的左面有国内成长并且不太重要的共产主义集团，它所采取的是比二十年代更进一步的，但仍旧遵循着二十年代全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路线的政策。奥地利这个小小的例子是很有启发性的。基督教社会党（保守分子组成的天主教党）打了个漂亮仗，共产党干得很蹩脚，社会民主党差不多重新取得了他们的原有地位，它的还活着的老领袖们大部分都牢牢地盘据在党的最高指挥部里。就一般原则而言甚至纲领也没有很大的改变。最近的一些走向社会化的步骤都不是根据选择作出的。其他小国的情形，只要是不受俄国势力影响的属于同一类型，意大利也一样。法国则由于共产党的强大（见下第三节），因而不同于这种类型。西班牙的事例，实在是最不成问题的事例，不过因为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模式而外，没有本领了解此外的任何模式，才使我们不能去了解它。^①

^① 佛朗哥政权不过是一种由于不难理解的必要性已在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变得很牢靠的制度模式的再生产而已。佛朗哥过去和现在所做的都是在他以前由那尔伐兹，奥当耐尔，爱斯派推罗，塞朗诺所做过的事情。不幸的西班牙现在已成了国际强权

II. 美国的经济潜力

1. 通过捐税实行的收入重分配
2. 巨大的潜力
3. 实现的条件
4. 过渡问题
5. 停滞主义者的命题
6. 结论

1. 在讨论英国事例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现代条件下有可能用捐税政策和工资政策从资本家阶层抽取马克思主义术语所称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①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所梦想不到的。这种看法也适用于美国。新政甚至远在战前就能剥夺高收入阶层到一般人不能赞赏的程度。指出一个指标就够了,这个指标仅仅说明1936年以前个人所得税和附加税增加的结果。在1929年,当时实际支付的个人收入估计为806亿元,超过50,000元的收入(应课税收入)在交付所得税和附加税后留下的总数为52亿元;1936年,当时实际支付的个人收入估计为642亿元,50,000元以上收入纳税后留下的不足12亿元^②。100,000元

政治的足球赛中的一枚足球,在这场球赛中她自己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把十分简单的事态弄得朦胧莫辨的宣传的内容。

① 读者当然会注意到,这个命题没有明确说出这样一种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它的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它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长期内,工人实际收入的总数,当收入完全平等化的时候,可能比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完全归于“资本家”阶层时为少。

② 见德·梵的极有启发性的论文《储蓄、投资和消费》,载《美国经济评论》(第五十三届年会的论文及记录,1941,2月,第237页及其后)。论文中说明,计算纳税后收入总数所根据的各项数据,包括资本所得在内,但不包括完全免税的政府债券。又这些总数和实际付出的总收入(商业部估计数)当然不能作严格的比较,但后者可视为比较

以上的应纳税收入,如果把遗产税也计算进去的话,当时甚至全部被捐税吸收完了。按照天真的激进主义立场,这些没收手段和嗣后的没收手段的唯一麻烦之处是走得还不够远。但是这并不改变我们当前所关心的事实,即,与战争无关的惊人的财富转移确实完成了,这种转移在数量上是可以和列宁所完成的相比拟的。现在的可处理收入的分布状态完全可以和俄国实际实行的分配相比拟,考虑到下面这样的进一步的事实时更为如此:高收入阶层的支出预算中,人身服务和包含较多劳动的商品所占比重较大,因此高收入者每元收入的购买力,在美国,比低收入者每元收入的购买力跌落得更厉害。^①此外,我们也可以重复一下前面对英国所作的另一个考察。高收入者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不限于“五万元和五万元以上者”。它以递减的程度下及于五千元的收入者。无可怀疑,这种措施,尤其是对职业上的成功达到中等水平的医生,有时候会

中诸数值的指标。为什么我没有干脆采用后者(《国民收入统计》)原因是不必说明的,但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特别挑选1929和1936两年做比较。1929年是50,000元以上收入纳税后保留数达到绝对最高额的一年;选用1936年则因为:第一,这一年未受1937—38年衰退的影响;第二,这一年完全未受战争的影响,战争影响是从1936年开始的。

① 要在不同国家间作比较当然是困难的,也许决不是十分有说服力的。但是俄国1940年4月4日关于所得税的法令,说明了年收入低至1812卢布的也要交所得税。它也说明了300,000卢布以上的收入的存在,当时对它课税50%。现在让我们完全略去对最低的收入的课税,并把1812—2400卢布的收入群的标准收入数定为2,080卢布;还让我们把最高收入群纳税后保有的收入的标准数定为不高于150,000卢布(虽然纳税前的300,000卢布是一个较低的限额)。于是我们发现,高级收入标准数是低级收入标准数的七十五倍。即使我们把1940年美国的低收入标准数(当然不是按购买力说的,而是在收入表上处于相同地位的意思)列为低至1000美元,那么用俄国的范例来观察美国的纳税后保有的收入的分布状态(即使不计算由战时财政的要求特别促成的扣除)时,找不出更多的证据足以支持流行的关于万恶的不平等,由收入的集中来衡量的“权力的集中”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了。比恩斯托克、施瓦兹和于哥夫合著的关于俄国《工业管理》的这本名著提供的证据,倾向于支持这种看法。许多其他的细节,也指向相同的方向,例如,在美国,有些类别的专门职业人士,从前雇得起家庭仆人现在

造成了迫切需要的效率的丧失。

所以，迄今为止战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加上作为战争自然后果的劳工纠纷，看来和英国的情形颇为一致。美国没有组织得很好的全国性的工党，这件事可能使我们想到沿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路线而不是沿着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发展的可能性。否则的话，这一事实只会加强本书详加评论了的预测，因为压力集团和政党同样有力量，责任感却比政党为少，从而它们是更为有效的攻城槌。

2. 但是美国社会形势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世界上别的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也许可以设想至少在五十年左右这样的短期间内，它会影响我们关于私营企业制度机会的诊断，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击着的它的产业上的异常的成就。某些观察家似乎认为这种产业上的成就既然赢得了战争，此外还保障了美国劳工使其免于匮乏，它也定将支配战后的局势，而且就支持社会主义的全部理由纯粹是经济性质的理由而言，甚至它能粉碎这些理由。让我们以最乐观的形式来表达这种论点。

暂时不理睬错综复杂的〔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的〕过渡问题，定1950年为第一个“正常”年头——这是预测者十分通用的做法——我们将用劳工统计局以1928年为基年的价格指数来计算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毛值（即全部货物和劳务的价值，未扣除折旧和

却雇不起，但在俄国他们还享受着这种特权，而这种特权是值到一吨电动家用设备的。所有这一切，都还无法计算不列入收入帐内的各种好处。产业经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高收入之所以有价值，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如果他们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党部的领袖的话，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业家。

有趣的现象——这种观念上的落后！我国许多好心肠的人现在对社会的平等明白表示极端厌恶或愤怒，这种不平等在五十年前确曾存在，现在却早已不存在了。事情变了，但口号依旧。

折耗)，并假定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毛值是二千亿元。当然，这不是对这一年可以指望的实际生产总量的预测。甚至这也不是对接近“充分”就业的高就业水平下的可能的生产总量的估计数。这是对假定某些条件能被满足时这个可能的生产总量的估计数（这些条件下面就要说明）。因此，数字是高的，但是这个数字既不是异常的——有人还提到过更高的数字——也不是不合理的。它符合于这个体系长期平均成就的过去经验：如果应用我们的“每年3.7%的正常成长率”（见上面第五章）于1928年的国民生产毛值数——约为900亿元——算到1950年，所得结果略低于2,000亿元。当然不应该给这种计算以过分的重要性。但是我仍然要重复指出，认为**因为**总产量在三十年代没有按照这个比率增加，所以这种统计上的外推法是无意义的那种反对意见，是弄错了问题的要点，不过证明了反对者没有本领掌握它而已。可是，就潜在生产力而言，战争期间这个体系的实际成就所提供的指数是更有说服力的：如果战时统计还是可以用作根据的话，1943年的国民生产毛值，按1928年价格水准调整之后，比为了达到1950年的二千亿元的目标所需的要大得多。

现在假定这个可能真的实现了。^①还让他们给更新和新投资

① 我假定，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每星期要工作四十小时，紧要关头还要做加班工作。但是我没有假定有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各种定义和能满足任何一个充分就业定义的对就业人数的各种估计都有很大的出入，且不仅涉及统计上的争论问题，也涉及若干相当伤脑筋的理论上的争论问题。我必须以指出下面这一点为满足，即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又假定1950年的总劳动力约为六千一百万人（武装部队二三百万人已计算在内），那么我看不出统计上的失业男女工人人数，这一年会低于五至六百万人，这个数字包括真正的非自愿的失业者（即按照任何定义都是非自愿失业的非自愿失业者），也包括给半不自愿的失业和纯粹是统计上的失业留下的一个很大的扣除额，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看不见的”失业在内。我相信这和那一年的二千亿元的目标并不矛盾。这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没有什么关系，但和资本主义制度送给劳动

(包括住宅建筑)留下一个足够的扣除额四百亿元(20%，等于库兹涅茨教授的1879—1929年间的每十年平均数^①)，剩下来的一千六百亿对我们的题目的重要之处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如果没有十分严重的处置失当，这个数量所代表的庞大的可利用的商品和劳务(这里还是没有包括新住宅在内)，保证了某种甚至可以满足社会上最可怜的成员(包括老年人、失业者、病人在内)的经济需要的生产水平，这样的生产水平(同时需要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能消灭任何可能被人们描述为苦难或匮乏的情况。本书曾经强调过，支持社会主义的理由决不完全是经济上的，也曾强调过递增的实际收入现在已经完全不足以抚慰群众或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者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约言不仅是眩人眼目的，而且是可以当场兑现的：为要实现这个约言，有了战时已经证实了它的力量的、把生产从为战争而生产——包括向同盟国输出消费品在内——转变到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才干和资源，此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东西了；1950年以后，有更强的理由适用这样的论点。第二——仍然如果没有十分严重的处置失当——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实现而不致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机构的诸条件，包括对产业成就的高额奖金，以及为了使资本主义发动机按照计划运转所需要的收入方面的其他不平等情况。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内，才无须在现代社会

者的自由倒有不少关系。甚至在贝佛里奇爵士关于充分就业的那本书里，也有关于指导和强制的这类暗示，不过是蒙着童贞女面幕的暗示。可是还得加上一点，我把1950年看做周期繁荣的一年。如果不，那么我们的讨论，应该了解为指下一个繁荣年头。按照好年头和坏年头的平均数(统计上的)，失业应该高于五至六百万人，——也许是七至八百万人。这是用不着害怕的，因为，正如我们就要说明的，会给失业者以适当的津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是超过“正常”失业的任何超额失业的主要原因。

① 每年折旧约10—12%，对一个以那么高的生产水平的进行生产的体系来说，并不是过高的。留出8—10%给“新”投资确实很充裕了，按照多数预测者的意见是太多了。见下面第五小节。

改良计划背后，潜伏着经济进步和群众实际收入的立即增加之间带根本性的矛盾；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会使负责人的意志瘫痪下来的。

此外，有了二千亿国民生产毛值，征集四百亿财政收入而不损害经济发动机是不会有困难的。有了按1928年价格计算的三百亿元，就足以联邦、州、地方政府在1939年实际完成的任务，加上大大扩大的军事设施，加上公债利息和1939年后以发生的其他长期债务的利息提供资金了。^①这将在1950年大约留下一百亿——按1928年的价格计算。如果价格水平提高了，这笔数字也会相应增大^②——在下一个十年还会大大多于此数，可以用来为新的社会事业或改进现有的社会事业提供资金。

3. 正是在财政和行政领域内，我们会痛切地感觉到我们的但书——没有十分严重的错误管理——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确实曾经失当地处置过我们的资源，而且错误确实十分严重。按照现在的原则和现在的做法，要说可以从二千亿国民生产毛值中征集四百亿而不致损害经济发动机是不正确的。同时，要说三百亿——或不是按照1928年水平计算的随便哪一个相应的数字——能够满足所指出的各种需要也是不正确的，只有当整个公共行政在消灭双轨制或三轨制的目的下被通盘加以合理化之后，这么说才是正确的。让我们只举一个双轨制或三轨制的例子，即所得税征收的例子。所得税征收工作在各联邦机关之间有

① 为了当前的目的，没有必要把用于货物和劳务的开支的财政支出和用于“转移”的财政支出区分开来。但这里粗略地假定，三百亿元中二百五十亿用于前者，五十亿用于后者。必须注意，这里没有算上(1950年的)退伍军人恤金和其他救济费，这个问题将另行处理。

② 财政收入一般是不能假定按价格水平作同比例变化的。可是，我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个粗略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种简化的假定。

重叠的情况，在联邦、州、和地方机关之间也有重叠的情况，有效的协调和严格规定的个人责任是缺乏的；联邦机关的重叠主要由于没有组织得很结实的“主管部”，却有一大批半独立的“专门机关”和“委员会”。成为浪费和阻碍效率的根源的事情还很多，最重要的是那种喜欢在花一亿就能够办好事情的地方花上十亿的那种浪费精神。现时的这种事态只预示了金融和产业的公共管理上的凶兆，事实上，这种事态本身，对并非“经济保王党人”^{*}的许多人来说，是良好而又充分的反对它的理由。

这还没有完。节约——这个字现在已经变得多么不得人望——按某种意义说，在富裕的国家也许比在贫困的国家内较少必要，这就是说，在后一种国家里，浪费就会形成匮乏，而在前一种国家里则否。但是按另外一种意义说，节约——即是真正的节约而不是官僚机关或国会的省下几个小钱却毫不顾惜地挥霍成十亿的那种假节约——在富裕的国家内是有效使用它的财富所必需的，恰如在贫困的国家内之为保证勉勉强强的生存所必需的一样。^①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公共行政的费用，也适用于各种救济金的支付。标准的例子当然是直接支付给个人的失业救济金。除非就业的和失业的工人的行为象俄国那样严格地处于公众监督之下，用于维持失业者的资金的节约使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失业者实质上得到的好处必须低于他能够希望赚到的工资。美国劳动力流动的统计说明了，这个国家经常有一大批半属自愿半属不自愿的失业者，由于失业救济管理上的松弛，或由于相对于工资率而言的过高的救济金，对这批失业者的负担势必增加，从而毁掉达成二千亿目标的可能性。

* 指新政拥护者，参看第八章注六。——译注

① 和这恰相反对的理论将在下面加以讨论，见第五小节。

为了使这个可能性成为现实，还必需满足另外一个条件：“政治”和官僚机构体系决不能阻挠我们达成这个目标。这是明显不过的事，如果营业机关的最重要的“行动参数”——工资、价格、利息、——转到了政治领域，而且那里是根据政治竞赛的需要，或者，有时更严重一些，按照某些计划人员的主观观念去处理事情的话，营业机关就不可能按照原来计划行使它的职能。要下面三个例子一定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当前的劳工形势。这种形势如果照样继续下去，它本身就足以阻碍达到二千亿国民生产毛值的那种进展，更会阻碍超过这个目标的进展。唯一的原因是由这种形势所形成的工资率；企业家计划的脱节，以及，甚至就业中的工人的无组织也是同等重要的。这些情形妨碍了本来可能的产量的扩张，此外，又因为以不正常的奖金鼓励每个人尽可能少雇用一些人，因而也使就业人数减低到本来可能的水平之下——它们鼓励了某种“劳动力〔雇用〕的逃避”。①

① 应该注意，产量的增加和就业的增加不能视为同义语。事实上，减少就业人数而不减少产量，或增加产量而不增加就业人数，在某种限度内是可能的。为什么在当代的文献中产量和就业常被视为依同比例变动，理由应从凯恩斯体系的根本特色之一中去找。这个体系由于它认为工业设备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常数，因此生产诸要素组合方式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它所处理的对象就被局限于十分短的一个时期内的一系列因果联系。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在最短期中事情也几乎确实如此），它们就会同时变动，虽然一般地并不成比例。

还应该注意，我们的论点隐含着货币工资率的变化会惹起就业人数向相反方向的变化。我相信，美国工资率的高水平，事实上一直是，尤其在三十年代，是美国失业的一个重大原因，我也相信，高工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后果。这个命题，它和凯恩斯主义正统派的学说相矛盾，正如它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相矛盾一样，因此，在这里不能加以证实。因此，很幸运，就当前讨论的目的来说，又仅就1950年而不就任何较晚的发展而言，一个较弱的，该能博得故凯恩斯勋爵同意的命题就够了：在今后四年内可能会在我国占优势的条件下，又除非价格的额外提高能够起补偿的作用，高工资率对产量和就业两者都将造成不利的后果，而后者又甚于前者。

第二,不管读者相信它有多少好处,迄今实施着的价格控制是生产扩张的另一种障碍。我曾经听说,斯大林主义政权鼓励人们对它的官僚主义进行批评。很明显,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愿意谨遵现在盛行的礼节,完全承认许多能干的人在价格管理局内作了卓越的服务;还有许多人,虽不那么能干,还是尽其所能地做了他们的工作;我也愿意抑制我心头可能有的,对它到现在为止的成就的怀疑,特别因为价格管理局对有些事情并没有加以控制,由此形成了它的极显著的失败。但是,至少就现在和未来而言,我们实在应该承认,如果不是意图迫使私营企业屈服,那么鼓励增加工资又加上这种价格控制政策,对于促进生产扩张来说是既不合理而且有害的;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管理机关可以“盯住”某些价格——政治势力较小的生产者的价格——对其他价格(政治势力较大的生产者的价格)管理得较松,结果,扰乱了相对价格的体系,降低了价格体系的经济效率;我们还应该承认,公定价格本身不能明确说明它所造成的全部损害,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它“津贴”了高成本的生产者,“勒索”了低成本的生产者,所以它对无效率颁发了奖金。^①

象现在这样得到舆论强烈支持的官僚机构体系对产业自治——自行组织,自行规划,相互合作——的顽固敌意,是有秩序的

^① 我不想知道,第一个价格控制法被总统否决并在一个月后通过了一项迅速撤销控制的法案以后造成的混乱最后将产生什么结果。可是既然我认为价格管理局按其实际作用而论势必要堵住走向一个有效率的和平经济的道路,又既然上述混乱局面的可能后果确可视为必须把价格控制继续保持下去的正面证据,我必须请求读者考虑下述二事。第一,主张废除价格控制,并不是主张在谁都没有指望要废除它或看来想要废除它的时候,毫无准备地或在没有过渡的代替办法的情形下废除它。第二,价格管理局若为了回答它的失败,怀着报复之心向着那些由于不得人望而不是由于任何可以辩护的理由而中选的靶子猛攻猛打,那末就会造成一种和撤销价格控制本身完全无关的后果。至于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见后面第四小节。

进步的第三个障碍，从而也是对于可能解决商业周期政策中许多问题，最后也能解决向社会主义政体过渡的问题的发展的障碍。官僚体系的发言人，老是认为这种看法毫无根据，他们所持理由不过是这种自治隐含着“共谋的限制”，所以实业家的联合行动是非法的，应该受到检举。但是，即使对于现下盛行的某种做法的这种法律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关于构成共谋限制的官方理论，或者一般地说，关于构成反社会行动的官方理论也是可以接受的话^①——下面几点还是正确的：（甲）“限制”这一概念，包括许多打算在价格政策和产量政策方面进行产业合作的企图在内（如果这种合作确能完成某种迫切需要的任务的话）；（乙）不能保证，许多不够熟悉商业问题的性质的人，和某些猛烈反对他们准备加以调节的体系或者至少反对这个体系中的“大企业”部门的人，能以公正的态度来考虑那些两可的问题以及有限制成分但不会构成协议的主要条款的那些问题；（丙）永远存在着的违法控告——营业上的违法与否并不总是容易区别清楚的——的威胁，对于企业的业务领导也许会发生一些谁也不愿意有的后果。

最后一点，说明了从来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劳工纠纷、价格管理局纠纷、“反托辣斯”纠纷的一个侧面，即企业家和管理人的精力

^① 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是无法接受的。它们诚然包括许多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会把它列为法外行为的做法。但除此而外，还有其他许多做法，对此，有法律头脑的人仅仅采取了公众的意见所指示的态度。这些实例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识别力。甚至最有本领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某个事例的全部长期影响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很大的困难。如果正义只根据一般的法律口号或通俗口号，或者只通过示威“运动”来实施，那么包含在反差别价格态度内的健全的辨别力就会消失无余。而那种存心要容忍那些形式上不合法的歧视有利于一切有关方面的案件的善意的有选择的诉讼方法——曾学过经济学初步的人都懂得，也应该懂得这样的案件——，那时也许只能用来助长最令人生气的专横作风。这里不过顺便说说，补救的办法是有的，我们满可以指出不少这样的方法来。

耗竭的后果。从事实际业务的人们，不仅要面对天天变样的法制资料，还得“应召出席”这个那个“委员会”，他就只为不断地不务正业，剩不下多少精力来对付他的技术问题和商业问题了。十个经济学家中不会有一个承认这一个别的“人类一分子”毕竟是一个人的血肉之躯，虽然没有一个敏感的人不会（举例说）把 1945 年工业生产实物产量指数的相当可怜的表现和这个分子联系起来，视为它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一点，大大暴露了经济学家们的机械态度和他们的远离“实际生活”。事情还不止此。在现时条件下，成功地领导一个企业，更多地取决于和劳工领袖、政治家、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本领，业务才能——按这个词的正当意义解释的业务才能倒变成次要的了。因此，除了聘请得起各式各样专家的最大企业而外，领导职务与其由“生产人员”来担任，不如由“说情行贿的专家”或“处理麻烦事儿的老手”来担任的好。

读者也许会觉得，根据这一切所指示的路线决定下来的政策是不足道的——它势必要在正义的愤怒的风暴中崩溃下去，或者会触上怠工和其他形式抵抗的暗礁而沉入海底，因此，二千亿的目标也就不过是白日梦而已。但是事情并不必然如此。一方面，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动机是强固到经得起某些浪费和不合理——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某些原可避免的失业，和为个人自由而支付的代价在内。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众近来表现出某种“醒过来”的样子。我们也决不可忘掉，本书曾十分强调过的（可特别参看第 18 章第 1 节）人性的可展性。新政和战时的实验也许是无结果的，因为产业资产阶级从未指望那些情况会延续下去。但是，它们或者已经起了某种教育作用。所以，现有税务制度的相当微小的调整，也许就是如果不是为达到最大限度的效率，至少也是为达到适当程度的效率所需要的一切。^① 另一方面，法律保障的相对微小的增加——

也许工业法规的适当的法典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概也会拔掉经营实际业务的人们工作日中的毒刺，除去由于专横而引起的懊恼的威胁，其余的问题，大概可以经过管制机构经验的不

① 举例来说——这不过是从一系列可能方法中举的一个例子，我的意图也不外乎此——下列一些办法实质上就足够了：

(甲) 取消公司组织用以支付股利的那部分利润的双重课税；鉴于英国现行办法，这很难为什么“正义的愤怒的风暴”辩护；我们的办法是德国办法，支持它的完全合法的论点来自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1835—1917)。

(乙) 允许从应税收入中减除个人收入中用以投资的部分。就我个人来说，我同意费希尔教授这样的意见，即储蓄的部分应该扣除(特别鉴于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是为了免得凯恩斯主义者的怀疑，我把我的话限制于投资的部分。技术上的困难并不严重，至少不是不可克服的。

(丙) 采取一种或几种可用的办法，以便让各种加班加点的损失作全额的扣除；

(丁) 销售税或周转税的国有化、系统化及其扩展。这一定会投合俄罗斯崇拜者之所好，而不致引起他们的赫然震怒。事实上采用俄国那样的税率(每磅最好的小麦粉三角一分美元[1940 莫斯科的税率]或者，因为卢布折换成美元是一件可疑的事，那么马铃薯按零售价征 62%，糖征 73%，盐征 80%，参看亨塞尔，《苏联财政》，《财政杂志》，1946 年第一期)而在象俄国那样非常贫困的人口中，销售税可能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天罚；但征以适度的税率，又在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内，这是一种出色而完全无害的财政工具，尤其当专门使用于加惠于低收入集团的财政目的的时候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它征收到五十或六十亿元，而任何人不会感到是一种负担。但是，既然州和地方政府因销售税的国有化受到的损失必须加以补偿——当然，说实行这种税制是“引入”一种新税制，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又因为现有消费税必须作某种调整，联邦财政部的净收入不能估计为超过二十亿至三十亿元，所以销售税和特种消费税在一起总共可得数额，大约在九十至一百亿左右。

(戊) 遗产税的国有化，和税率的有利于妻子和孩子的急剧的降低，理由是现有的立法制，由于对超过十分妥当的数字的部分，实行的没收，因而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基本要素之一。从他的立场看来，谁根据非经济的理由赞成这种没收，就有充分的理由主张为此而修改宪法；谁要是根据可以从故凯恩斯勋爵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73页上找到的经济论点——或者根据这种论点的派生物——赞成这种没收，那就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并不关心政治上受到影响的诸利益集团怎样得到满足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迄今为止，来自实业界的各种组织的大多数关于税务改革的建议显然都出奇地谨慎，即使否则和我们的论点无关，看来这也表明了实业家阶级已经怎样有效地受到了“教育”。

断增加和它们职员训练的改善而得到解决。^①何况这个国家不久以前已经证明了它自愿接受象全国复兴法那样的立法。至于说到劳工形势,那么从下面的事实中也许可以得到某些安慰,这就是根据预先计划好的路线制订的政策不仅用不到放弃多数人看做是新政的社会改革的主要成就中任何一个项目,而且还会为比新政更进一步的措施提供经济基础。特别应该指出,年工资制度对于达成我们的目标而言是一种威胁,可是只当它是用那种足以造成极大害的那些方法来引入、执行和措施资金时才成为威胁。它本身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命题。^②

即使这样,要指望这些必要的调整都能付诸实施——甚至指望在我国政治条件下能够产生出从事如此严肃、无私,已为各式各样的口号所丑化的,细节上有许多困难,且显然无人感谢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分的乐观精神的。人民群众会喜欢可能从就业挣钱的机会中浮现出来的美国,但是他们却会憎恨实现这些机会的

① 我这里要谈到一点,它对当前讨论的问题以外的其他许多问题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良好的官僚机构体系是缓慢成长的,是不能任意创制出来的。美国的官僚机构显出了急剧生长的病症,以致不仅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且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得采取收蓬政策。尤其是华盛顿的官僚机构,迄今还不懂得自己的身分。一次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机关里的个别成员奉行自己的纲领,自认为改革者,不通过他们自己的首长而直接和国会议员、参议员及其他机关的人员商谈。有些想法可能突然获得谁也不知道它的起源的推动力。这样做法是不免要招来失败和混乱的。

② 为了说明这个论点,让我们回忆当代历史的一个片断。三十年代初期的新政人物,嘲笑“改革反对恢复”这个口号。嘲笑证明了他们完全警觉到这个口号内所包含的真理成分。事实上,这个口号正如许多政治口号一样是完全公平的。但是应该了解,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公平的,是指实行“改革”时的粗率和不负责任情况而言,不是指它所宣告的任何目的而言。我们现在处在同样的一种地位上,不幸的是,对某些人来说,伤害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正是他们喜欢到极点的改革的特色。对他们说来,没有这类伤害的改革几乎是毫无吸引力的。改革而又辅之以足以保证资本主义成功的政策,却是落到他们头上的最不幸的事情。

人。

4. 我们还没有提到**过渡问题**。事实上过渡问题只在下述方面才是和我们的题目有关的：过渡的困难也许会产生出某些局势，诱导出某些足以准永久性地阻碍产量的扩张，并使我们“对可能性的估计”完全落空。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的危险。1920年的批发物价指数大约是1914年的2.3倍。这是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经历的那次战争在货物和劳务的支出上不仅比最近这次战争数目上小得多、时间上短得多，那时候每单位货物和劳务的支付也比这次战争审慎得多。现在的需求量之大是无可比拟的。战时公债的免税特权大大推动了投资人永久保存大量战时公债。即使事实上是如此，“调整后的存款总额”（定期及活期存款，已除去银行间存款及政府存款及在途未收项目）和“不包括银行库存的通货流通额”，本年四月底总数为1740亿（1929年1月为551.7亿，1939年6月为609亿），还不说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中有多少会转成现金用于**偿还债务以外的用途**。任何通情达理的人不难由此得出在一定环境下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的看法，尤其从政府的鼓励或默许轻率的却是普遍的对更高货币工资的要求方面看来是如此——因为通货膨胀总是通过工资包而出现的^①。同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当他注意到宣扬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的作家^②，或者注意到认为猛烈的通货膨胀可以减轻转折时期困难的作家们的时候，应该不难确定自己的看法。为了提出一个切合我们论题的论点，

① 请读者注意，这样的说法是为凯恩斯主义，因此它该能博得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的同意。

② 应该把某些战后需求的预测者包括在这类作家之内。他们断言，在政府大部分战时需求停止以后，要求对此作进一步赤字开支的突然的和广泛的失业确实就会随之而来。关于这些（短期）判断，见斯契夫在即将发行的《经济统计评论》上的论文。相应的长期的判断将在下面第五小节加以讨论。

又因为在这里充分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为了明确说明问题，提出我个人的意见如下：在我看来，把1950年的价格水平保持为不超过1928年的150%（同时在今后这段时间中有时要超过这个水平）是可能——可能——的；在我看来，在这个限度内利用价格水平的运动作为适应的工具是合理的；在我看来，对于今后几年中一般价格水平的这一增涨率的恐惧也好，害怕跌到这个水平以下的恐惧也好，两者都被大大夸张了。但是为了把价格的不可避免的增涨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必须有一大批办法，它全是不得人心的，可是又全是必要的，为了产生这样的结果，需要我还没有发现的经验和才干，而且这些办法中有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减低产量增涨的速度的；谁都不能抵抗通货膨胀的威胁却又不致于妨碍生产。如果不此之图，除了设置另一个价格管理局而外，对于确实不受通货膨胀威胁的收入——即使按照我们的激进分子所持的学说——课以重税，不计后果地提高工资率，那就很可能会产生出某种形势，华盛顿在绝望之余又会依靠各种笨拙而恼人的方法，例如通货贬值，“冻结”存款，采取“直接控制”，惩罚“奸商”，“垄断者”或其他替罪羊的办法，同时小心谨慎地把农场主保持在清白无辜的地位。这会把事情搞糟到这种程度，以致不会把我们带到历历在望的二千亿美元的目标，却会把我们带到半生半熟的社会主义那里去。**这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有其他可能性。

5. 剩下来应加注意的问题对许多经济学家说来是战后头等重要的问题：怎样保证适当的消费。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已经看见了许多理由，可以据以怀疑我们前面所说的目标——1928年价格水准的二千亿美元国民生产毛值——能不能在1950年达成。但是所有这些理由都以外在于营业过程的，一些障碍大概会挡住前进道路这种可能性和似真性为其基础的。可是，营业过程本身产生

这种结果的动力如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极成问题，其中大部分人——并非全部——还把这种看法当做政治信念的某些条目，正如他们也把它看做科学真理的某些条目一样。我们将用一个多少已经流行的名词称呼他们：停滞主义者。^①

停滞主义理论的重要典范是由故凯恩斯勋爵发展出来的。这种理论如何应用于当前的事例，读者如果研究过去二三年中发表的关于战后需求的估计^②的一种或几种，就能很熟悉它了。这些估计数的作者在估计1950年的潜在生产时所得数字的实际内容和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所以，为简化起见，此后我们还将说二千亿的国民生产毛值。他们甚至比我们更为乐观，这表现在他们并不坚持有利于资本主义成就的环境条件的必要性^③，但根据现在的政治、行政、劳工的做法是不变的这个缄默的假定进行推理。此外，我将放弃我对他们对不可避免的最低失业人数所作的估计的异议，或者放弃对于他们的统计方法的确实性的异议，我也将接受他们在得出“净国民收入”及“可处理收入”（纳税及支付强迫性的非税支出后的个人收入总和）数字时所作的各种各样假定。为了明确起见，让我们假定这个可处理收入数大约为1500亿，公司未分配利润大约为60亿。^④

① 停滞主义者的命题的某几项的一般内容，见前面第10章。

② 最重要的战后需求的估计，哈特在其论文《模型构成及财政政策》（《美国经济评论》1945年9月号）中已作了批判的分析。进一步的参考读物所以是不必要的了。

③ 我自承，我有时候确实奇怪，到底他们是不是感觉到这种说法含有对私营企业恭维的意思。

④ 这些数字近似于一位战后需求的估计者的数字。这些数字不是我的。它们和我们在第二小节中据以推论的经验数字也是矛盾的。至于这个推算中，用以计算过去时期各项数字的程序——在这种计算中，假定当然应代之以实际数字——可参看《联邦储备局公报》1946年第436页。可是应该注意，第一，这些数字是按现下美元价值计算的，第二，“个人净储蓄”的庞大数额，证明不了“正常”时期的储蓄百分率，甚至1937，1938，1939，1940诸年的数倍，也不可不加批判地接受，尤其是，不可以不参照商业部采用的储蓄定义而加以接受。

战后的需求,也就是说,预期各个家庭(新家庭除外)将花费在消费者货物方面的总和,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根据战前时期,譬如说,1923—1940年的资料,计算每个人花费在消费者货物上的开支和每个人的可处理收入,两个数字都按生活费指数调整,然后计算这两者的关系,把它应用到1500亿可处理收入上去。^①如果这个计算程序得到,譬如说1300亿,余数200亿就看作储蓄,或者再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润,共260亿。这种论点通常再继续发展一步探索这个总和的有效出路即投资机会(新住宅的建筑,存货、工厂和设备的增加,国外投资),于是作出结论,或者暗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出路可能还不足以完全吸收1950年充分就业水平下国民收入中人们要储蓄的那部分数额,至少没有政府的帮助是不可能完全吸收的。从而,政府的国内开支,或者强制“国外投资”的政府行动是必要的。可是,近来大家似乎又喜欢另一种劝告了。既然在现时条件下,谁要鼓吹赤字财政谁就会把自己弄得变成荒谬可笑,所以华盛顿的经济学家掉转头来推荐平衡的预算了,但是平衡预算要借助于十分高昂的税收,税率应该高额累进到足以消灭高收入,而高收入正是这种储蓄的威胁的主要来源。这和(由于高收入者所作的储蓄)“现代社会中,失业的终极原因是收入的不平等”这个口号是互相契合的。

这样一来,我们指望用来解决一大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高水平国民收入本身倒反面变成一切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了。既然高

^① 实际上计算程序比这里所说的多少要复杂一些。所用的回归方程式也包括一个趋势因素在内,就是说要考虑这一段期间中这种关系的可能变动。此外,延时需求和流动资金*的积累这二者的影响也须加以考虑。但为了集中注意于突出之点,我们不一一研究这些细节了。

* 原文为Liquid means,指现款,存款,即时可以变现的票据、债券等而言。——译注

收入意味着高储蓄,既然这些储蓄决不能完全被投资支出所抵消,那么如果这种高收入水平完全能够达到的话,经济就不可能继续保持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除非财政政策出来维持这个水平。应该注意,这个理论至少部分会博得舆论的支持,尤其会博得实业界的支持。没有一种观点比下列观点更平凡的了,即只要我们能够诱导人们“全部用掉他们的收入”,或只要我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消费者需求”一切事情就会妥顺进行。为什么和任何一种涉及到政府开支或收入平均化的政治纲领确实毫无利害关系的有识之士,却会对这一点感到关心,这倒是一个相当有兴趣的问题。推销员心理,加以战前二十年的经验,是我对这种理论未被一笑置之这种令人惊愕的事实所能作出的唯一解释。

这种理论的某些反对者试图争辩说,估计者在估计国民生产毛值、从而估计国民收入时十分乐观,而估计投资机会时则十分悲观,因而认为前者将比他们的估计数为小,后者将比他们的估计数为大。他们没有抓住要点,虽然按照这样的路线或类似的路线作出的论点中也许包含着不少真理。特别是,人们也许可以强调,在1830年时,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见铁路时代的资本需要,或再五十年后电气时代的资本需要。但是决定性的论点比这一切简单得多。这种理论所依据的公设是,个人储蓄是按照一个恒常不变的心理学规律^①,即和投资机会存在与否无关的一个心理学规律进

^① 这个心理学规律说,社会共同体化在消费方面的开支 C 是(从而它愿意储蓄的数量 S 也是)这样取决于国民收入 Y 的,即当 Y 有一个增量 ΔY 时, C 的加量为 $\Delta C < \Delta Y$,或 $\frac{\Delta C}{\Delta Y} < 1$,这是凯恩斯的原本的关于众所周知的消费函数的假设。但是凯恩斯本人偶然使用,他的追随者时常使用这样一个更强的假定,即当收入增加时,储蓄的百分率也增加。我们只管那原本的假设。可是必须注意,称之为心理学规律,是名词的误用。心理学规律,在经济学上充其量不过是可疑的顾主。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命题,甚至比下面的命题更少权利称为心理学规律:我们有得到更多几片面包的欲望,当我们一片又一片吃下面包的时候,这种欲望的强度是递减的。

行的。显然这不是正常情形。在正常情形下，人们储蓄，是指望获得某种货币形态的或者“投资货物”形态的报酬的。不仅大部分个人储蓄是——实际上，构成总储蓄的大部分的企业储蓄当然也是——在心目中有了特定投资目标才储蓄起来的，而且，投资的决定照例先于储蓄的决定，投资的行动常常先于储蓄的行动。甚至当一个人没有特定投资目的而储蓄的时候，他在作出某个投资决定中的任何拖延都会受到在这段时间内丧失收入的惩罚。看来可以由此推定，第一，除非人们见到投资的机会，通常他们就不会储蓄，以及，投资机会消失的局势大概也就是储蓄消失的局势；第二，每当我们看到人们表现出“灵活性”偏好时，这就是说，表现出一种不带来投资愿望的储蓄愿望——窖藏的愿望——的时候，我们必须用特别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现象，而不能诉之于独特设定的心理学规律。

可是，在周期萧条的最低点——粗略地平均说来，每十年中有一年——这样的理由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其中有一个理由是相当重要的。当事情看起来一团漆黑，人们从他们计划要做的任何事情中所能指望的只有损失，这时候他们当然要拒绝把他们日常的储蓄拿来投资（甚至不愿把结束先前办的事业因而收回来的钱拿去重投资），或者他们会推迟投资，为的是想从价格的进一步跌落中得到好处。在这个时候，储蓄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因为有许多人感觉到由营业失败或失业所引起的收入的减少已经迫在眉睫。这是萧条机制的一个重要要素，这时候，赤字财政开支确实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最明显的手段。可是不能以此为基础来为“储蓄过度”理论辩护，因为这不过是萧条的一种后果，因此它说明不了理论本身。但它产生出了对凯恩斯的心理学规律的某种心理学的解释。1929—1932年的大萧条和其后的缓慢恢复，仍在每个

人的记忆之中。以此为基础的心理学规律和窖藏理论不过是这种经验的简单的概括而已。^①

所以，萧条时期的窖藏，不是我们下述总命题的真正例外；储蓄的决定取决于投资的决定，并且以投资的决定为其必要条件。上述命题的逆命题是不正确的，因为用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的资金需要显然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谈不到什么储蓄的问题。^②这个命题有一些表面上的例外，但也有一些并不重要的真正的例外。真正的例外可以举出众所周知的，盛行于印度、中国和埃及，以积累一批财宝为目的的窖藏为例；以及，习惯成自然的暂时时间的储蓄，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会和许多其他习惯一样，比它由以产生的理论根据活得更长久。^③和我们所举的萧条时期的窖藏相

① 我相信，把上面的论点修改一下，再加上某些战时因素，就可以用来说明战时的流动资金的积累，用不到依靠人性中固有的无法满足的窖藏的渴望这个假定。

② 可是，我们的命题，并不象不熟悉凯恩斯勋爵的《通论》发表（1936年）以来进行着的讨论的读者所认为的那么简单。与其说，它在重复“古典理论”（杜伦、斯密、约翰·穆勒）的一个老定理，毋宁说它很象那个老定理。可是，曾经满足了古典理论的推理，还不足以支持这个命题。为了圆满地证明它，需要有一次冗长而乏味的论证，但因为这种论证除了可以得出极少数几个新而有趣的结论之外，只会毁坏人们在三十年代费了大劲才建立起来的东西，所以我完全没有勇气苦心作出这个论证。篇幅的限制也妨碍了我这样做。但是为了避免一种既自然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又不胜遗憾的误解，有一点一定要在这里指明。虽然我们的命题表明了，停滞论不能以储蓄这个要素为基础，同时这一点可以用并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的储蓄的问题这样一句话来加以说明，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也没有在其他意义上的储蓄的问题。问题是有的。大多数这类问题集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个人储蓄通过购买证券，被用来偿还企业在扩充它们的工厂和设备时所见的银行债务的时候。但这是另一回事了。

③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尤其是清教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根深蒂固的储蓄习惯的顽强性看来也许不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会使这种习惯成为不合理的投资机会的消失，在不存在外部因素的条件下，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有机会，也会有时间来改正这种习惯。因此，仍然认为已经成为不合理的东西的顽固的储蓄习惯是经济局势中的一个因素的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因此就面临了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二者择一的处境：他们要么承认，三十年代的形势是萧条时期的窖藏的形势——而这就是

类似的表面上的例外，可以举出一种可能有的，但显然不是重要的情况，例如为了满足一笔数量巨大的投资的资金需要而作的积累；或者为了准备或有的不测、老年、和诸如此类的事情而作的储蓄，这种储蓄是即使除了某种保障感面外没有取得任何报酬的机会也还是会进行的。^①

因此，如果停滞主义者的悲哀是唯一苦恼我们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担心能否达到那二千亿的国民生产毛值。同时，如果已经证明二百亿这个数目确实超过了可按照能满足边际储蓄者的收益率投放的新投资额的话，那么，人们满可以高高兴兴地消费掉那个超额部分。我们将既不必费心设法让他们“完全用掉他们的收入”，也不必考虑什么公司储蓄或个人储蓄的出路。尤其是，我们不应该认为有必要去强制什么国外投资，在现代条件下鼓吹国外投资，不过是企图把实际上等于强加在国家身上的一笔战争赔款的负担使国家承担起来觉得可口些而已。^②

对长期停滞论的投降——要么承认，投资的吸引力会由于受到只能是他们自己所支持的政策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相当突然地减弱。如果他们采取后面那种观点，我当然是毫无异议的。

① 这类因素之所以无关重要，主要因为下列两点：第一，这些积累是不断在耗用的（虽然总人口中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年龄分布的状况，使增加数和减少数一般不会恰相平衡）；第二，只要储蓄中到底也有一部分以获得货币报酬为其动机，储蓄的总“供给额”中存在着某种不以货币报酬为其动机的成分，不能证明任何过度储蓄的趋势。这种情形不必强调。但是确实应该注意，现代条件下的保险大大减低了为准备或有事故而作的下述各类储蓄的必要性：老年准备，为妻儿所作的通常意味着“财产”的积累的那种准备（虽然这些准备当然并不是留着不投资的）；现在这部分准备是经过“从消费中扣除”归入保险费的形式来实行的了。所以，过去二十五年间保险的增加，指出了和停滞主义者的著作中所指示的恰相反对的方面。

② 我完全无意于说，或者隐含这样的意思，即无法证明美国人民根据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理由应该在某种情形下作出重大的牺牲。问题在于，如果有理由这样做，必须根据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理由坦率地加以证明，不应该以可疑的经济学为基础，用否认这种牺牲的现实来加以证明。这样的建议，即认为可以把超额储蓄的一部分有

另一方面，我们将在这样的范围内赞同政府赤字财政开支的鼓吹者：当发生某种来自商业循环机制所固有的原因或其他任何原因的“累进的下降过程”危险的时候，这就是说，当看来会出现一种局势，其间甲的生产限制诱使乙也限制生产，就这样一直蔓延下去遍及整个经济，又在这种局势下价格跌落是因为价格已经跌落了，失业助长了失业，在这时候，政府的赤字财政开支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因此，如果我们愿意忽略其他一切考虑，可以公正地把政府的赤字财政开支称为有效的救治之方。^①真正的反对论不是反对一旦出现紧急状态时政府的可以发生收入的开支，而是反对那种制造出这类开支可以发生影响的紧急状态的政策。

6. 可是，很不幸，如果当前的问题是要断定实际上将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的结论正和读者预期的一样，同停滞主义者的结论不会有重大的出入。虽然人民的储蓄倾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之处，可是其他因素倒是有许多可以害怕的地方。劳工骚动，价格管制，恼人的行政，不合理的税制都很足以为收入和就业产生出一些看来正象征停滞主义理论的结果，而且也许确实会产生出使赤字财政开支成为不可免的各种局势。我们甚至也许会目击看来象是储蓄过度的局面，说清楚一些，就是人们在其间没有勇气作出投

用地引导到显然没有偿还希望的，且不说什么报酬的渠道中去的建议，是一种最阴险的建议，因为本来以反对这种政策为己任的阶级将要踊跃地接受它，因为在政府担保一切的制度下，个别实业家的风险极小，甚至全无风险可言。他将把国家的损失看得毫不重要——尤其如果人们告诉他说，这种损失，由于保障了就业，实在是一种国民利得。

① 这就是原来形式的默莱法案（不仅是它被制定时的形式），就纯粹经济考虑方面而言是无可指摘的原因。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作可以发生收入的政府开支进行全盘谴责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认为这种工具的使用一旦得到承认，就将为各式各样立法和行政上的不负责任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的人们看来，这种谴责也许是正当的。但根据纯粹的经济理由，它不能得到支持。

资决定的局面。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固有于营业过程的原因足以阻碍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我们也见到了，可以阻碍它实现的外在于营业过程的原因是存在着的。除此而外，我不想知道实际结果将是什么样子。不管结果如何，它将不仅是美国的也将是全世界社会形势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这所说的，不过指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事。本书中慎重作出的长期预测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III. 俄罗斯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另一个密切有关于我们的诊断的因素是俄国对它的盟国的胜利。俄国的胜利不象美国的经济成就，它不仅是一种可能性，暂时，它是一件已经实现了的事实。从一个决不是很强固的地位出发——在这种地位上面，按照政治竞赛的通常规则，俄国大概是不得不接受它的盟国认为宜于强加于它的任何事情，并在国际新秩序中处于后座——它把自己提升到远超过沙皇时代所保持过的强国地位，不管英国和美国有过怎样的打算，怎样为这些打算奋斗过。而且——超等的业绩！——它的统治体系所特有的方法已使它有可能扩张它的实际权力于它正式征服的地区之外，同时使它的征服地区看来比这要小得多——所以在危险关头曾经满足了逃跑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的它的虚伪的让步，决不是必然要作出什么真正的牺牲的，即使这种让步不象有些时候那样反面使它实际有所收获的话。^① 如果读者回忆一下 1939 年以来美国政府据以推行其政策的那些目标即民主、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① 举一个例，给予完全控制下的国家如波兰（我们坚持要把她看做一个独立国家）以虚伪的独立这件事，增加了俄国在国际机构中可以支配的票数，也增加了俄国所能收到的贡款和贷款；俄国如果彻底并吞了整个波兰它会比现在弱些。

民族独立等等，他就必然会领悟，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等于是并不亚于俄国在军事上战胜了它的两个主要盟国时所能指望的完全投降。

何以造成这种结果，首先要求作出解释。我想只承认非人身因素——也许还得加上机会的成分——的历史分析家未必能够胜任这一工作。非人身的或客观的因素是完全不利于俄国的。甚至它的庞大的军队也并不仅仅是众多的人口和富裕的经济的产物，而是能使全国人民安于卑贱的贫困和驯伏状态、集中不发达而又残缺的产业结构的全部力量于军事目的的一个铁腕人物的工作的产物。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不理解运气和天才怎样纠缠在一起的人们，当然将只注意到以伟大胜利告终的一连串事变中的那些幸运的机会。但是这一连串的事变包含了同样多的或更多的绝望处境，在其间，布尔什维克政体随时有灭亡的机会。政治上的天才，正在于这样一种才能，它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可能性，而使不利的可能性完全失效，以致在事情过去之后肤浅的观察家只能看到前者。顺着以和德国取得“谅解”这艺术大师的第一笔杰构开始的一系列事变的发展，加以观察，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巨匠的精心杰作。诚然，斯大林从未遇到过一个才能可以与他匹敌的对手。但这只不过加强了那种为领导集团的品质——在这一特例中，为领导者个人的品质——留下了充分的余地的历史哲学的理由而已。现实的分析所能对“非人身理论”作出的唯一的让步是：一个独裁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是不受那些往往会分散一个民主领袖的注意力的问题的束缚的。^①

^① 有些读者会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历史社会学家之间也是史学家之间争论的老问题。所以，我必须说明，我并不是在宣扬“英雄崇拜”，我也不想采用“历史是〔个别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一口号。在本书的论点中所包含的方法论仪

但是,第二,虽然细致地注意发展经过,我们也许可以了解这种无法置信的情势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但它还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怎样忍受得了我们现在处身其中的局面。问题归结到美国的态度。因为大陆欧洲诸国现在饥疲交加,容易受到俄国的报复,当然不能指望它们作出什么重要的抵抗。唯一真正独立于俄国之外的大陆国家是西班牙——这是俄国对它的政策最近使我们多数人深切感到的一件事情。在几乎是同样独立的法国内部,却有以它的共产党的形态出现的最强大的俄罗斯警备队。^①至于说到美国,许多征兆表明,如果过去能照自己的意思办事,1941年以

仅达到了这一步。在说明某一段历史事变进程时我们使用了大量有系统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各地方的气候,土壤的丰度,幅员的大小等等,也有短期内不变的它们的人口品质。又因为人口的品质并不独特地决定政治人物的品质,从而也不独特地决定领导者的品质,所以这两者必须列为不同的东西。换句话说,在某个一定的局势下面,掌握人物的大脑和神经,和国家的铁矿的含铁量,有没有铝或钨,同样都是客观事实。

① 这件事是极端有趣味的。或许有些美国人会相信法国人民将以心荡神移的快乐和感恩之情欢呼他们的解放,相信他们立刻会安定下来重建一个民主的法兰西。事实上我们发现了莱翁·布伦用委婉语调所说的 *Concoalescence fatiguée* (病后复元时期——译者),或者用平易的英语来说,对于运用民主方法的普遍厌烦。法国有三个数量上大体相同,却同样不能根据民主路线产生有效的政府的政党:共和人民运动(天主教的和戴高乐主义的党),正规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对我们来说,只有下列三点是有关系的:第一,“自由主义”集团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第二,没有一个集团是美国政治家可以全心全意和它合作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共产党的强大。共产党的强大显然决不是能够用大量法国人改宗共产主义这一点来说明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按教义的意义来说完全不是共产党员。凡不是的,都是为了做共产党员才成为共产党员的,这就是说,是由于他们关于国家处境的概念而成为共产党员的。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干脆是亲俄的。他们把俄国不做“我们时代的伟人事实”,看做真正和法国利害相关(为重建所需的美元是另一回事)的强国,是法国必须攀缘的强国,在未来任何对英美的斗争中法国必定要和这个强国靠在一起才能获得再生——说得确切一些,这就是要转向某种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东西上去。在这个论点,上,展现出了多大一堆魅人的问题哪!我很遗憾不能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可是由于我确信我的读者会拒绝了解这种论点,所以我的遗憾之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缓和。

后的全部事变进程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同时，现在在政治上算上一份的整个英国，正在以厌恶和危惧的心情注视着当前的局势。如果说它现在仍然没有采取强硬的路线，这只能是由于这样一件事实，即如果它那么做，它就要担当一种可怕的单独对俄作战的风险。因为虽然美国很象会参加进来，**但这是不确定的**。为什么？

对于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观察家说来，根据荣誉和利益的每种考虑，美国决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局面，在那里，一大部分人类被剥夺了我们认为是基本人权的東西，在那里，残忍和不法行为更甚于战争所要加以制止的，在那里，巨大的权力和威望集中于体现了对美国大多数人民所珍爱的原则的否定的一个政府手中。让那么些人忍受牺牲，进行一次会把数不清的恐怖横加于千百万无辜妇孺头上的战争，而战争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解救被两支军队禁闭起来的一切独裁者中最有权力的独裁者，这确是不值得的。这确实象俗语所说，半途而废，比不做更坏。何况那没有做的一半工作不但是可能做的，而且是相当容易做的，因为日本投降以后美国的军事威力和军事技术（且不说它在经济上的操纵力量）保证了它的无可争论的优越地位。

但是如果这位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观察家对上面这几句话争辩的话，我们就要回答他说，他不懂得政治社会学。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外交政策还是沙皇治下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就是国内政治。美国确实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忠告的传统。但它本质上是孤立主义的传统。除此而外，就没有玩任何其他外交政策复杂把戏的传统和机构了。当这个国家受到宣传的激烈刺激时，它也许会投入，或接受干预海外事务的积极主义的道路。但是很快它会厌倦，而现在它已经厌倦了——厌倦现代战争的恐怖，厌倦牺牲、税捐、军事服役、官僚机构的规章条例、战争口号、世界政府的

理想——十分渴望回到它惯常的生活方式中去。强迫它作更进一步的紧张努力——当不存在任何直接受到攻击的危险时——对于愿意承揽这样一笔买卖的任何政党或压力集团来说是一笔蹩脚的政治买卖。而且，也没有哪个政党或集团看来曾怀抱这种愿望。那些痛恨德国或国社党统治的人现在满足了。他们现在用他们过去诬蔑为逃跑主义论点的那种论点来支持现在的对俄政策，而这种对俄政策正是他们过去诬蔑为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的。如果我们从头到尾检查一下组成了美国政治模式的各个利益集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一致赞成（虽然理由不同）绥靖政策的。农场主们不大管那些事。有组织的劳工，也许受到也许没有受到某个真正亲俄派的重大影响，而说所有的工会或有些工会会积极阻止任何一种对俄战争，也许是对的，也许是不对的。我们用不着研究这个问题——通常是以鲁莽的否定或鲁莽的肯定来讨论的——因为眼前在政治家们看来，同局势有关的，是这一谁也不会怀疑的事实，即1940年并不拥护战争的劳工，现在是明确地反战的。可是，最有趣的看法是这样一种看法，即上面这句话对实业阶级也是适用的，实业阶级的态度虽然在感情上或意向上当然不是亲俄的，实际上却确实是亲俄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喜欢把想要扑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咽喉的意图归之于资产阶级。他们确实会把一场对俄战争描写成为大实业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再没有比这更不现实的了。实业阶级也厌倦战争口号，税捐和管制。对俄战争会违反当前有利于商业利益集团的潮流，会意味着更重的税和更严格的管制。它将使劳工处于更强固的地位上。何况，它不仅会扰乱国内商业，并且会扼杀一笔极诱人的有希望的买卖。苏维埃俄罗斯也许会成为极大的顾主。它从来没有不能痛快地付过钱。好大批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信念正在被这种论据所破坏。这正是资产阶级

思想活动的路线——即使在望得见绞刑架上的套索的时候也还是这样想的。但是把这种不愉快的光景合理化掉也是不难的。让俄国吞掉一二个国家，这有什么关系？让它舒舒服服地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它就不会再皱眉头了。二十年后，俄国人将会和我们一样地民主和爱好和平——也会象我们一样地思想，一样地感受。何况，斯大林在那时候该已死了。^①

再说一次，本书目的并不是引导读者去取得明确而实际的结论，只是提出一些他们在得出自己的实际结论时，可能有用的分析。此外，在如此容易受到机会和新闻闯入的预料所不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的问题中，断言，决不会比先知的预言高明，因此不会有什么科学的地位。相信读者已能彻底理解这一点，但我现在仍然要在总结这部分论点时采取一种看来是合理的推论，但目的只是为了确定我们的看法。换言之：我们现在打算要做的，和本书在社会

^① 最后几句话全是摘引来的。它们之所以那么具有启示性，那么贵重，是因为这并非某次访问中被访问者的答复中那么承认的。它们是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言词，说话的人没有发觉，这正好透露了他们的心理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透露了他的合乎逻辑的半自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他正在为自己设法加以合理化的。除第三句以其天真烂漫独树一帜而外，这类说法，或与此极为类似的说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了。几乎每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都对说话的人指出了他的态度中的不合理性（包括它和1939—1941年的态度的首尾不一贯性），每一次都得不到丝毫逻辑上象样的答复或反应，除了（甲）表现出一种好脾气的为难的神情。（乙）一种绝望的姿势，看来接受了批评，但是加上了某种附加语，例如“那怎么办？”

可是，鉴于本节头上所提的一个论点，我必得加上一句话：在第四次现实逃避中，事实上是有些东西的。如果，象俄国领袖那样的才干在任何民族中都是极难得出现的这种看法，象我认为的那样，是正确的话，实际上，看来大自然的行动将以正当的方法解决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看法，那末也得说，也许可以从中了解许多东西。在某些方面，一个具有超等才干的敌人，比一个才干较差的敌人还容易对付一些——这么说，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自相矛盾之论。何况，在建成一个，例如说，美孚油公司时，虽然确实需要第一流的天才，可是一经建成以后，管理它是不需要什么天才的。俄罗斯世纪一旦开步走了，它几乎自己就会走自己的路的。

主义一般这个大题目上一贯做的完全一样：根据已知资料，用外插花插入一些可以观察得到的趋势。

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一些事实说明，除非斯大林犯他生平第一个错误，未来几年中不会有战争，俄国可以不受干扰地发展它的资源，重建它的经济，大大地建设无论绝对说来或相对说来都是世界上从未见到过的，最大的战争机器。上面插入的那句附句，限制了，但是我认为并未绝灭了它所能作出的下面这个结论的实际价值：一次触目的侵略行动——这么一种触目的侵略行动，甚至同路人都会难于把它解释为完全正当的“自卫”——无疑会在任何瞬间触发战争。但是，下列事实必然是反对这种可能性的，第一，斯大林政权的外交政策中，再也没有它的小心谨慎的忍耐更惊人的了；第二，这个政权必须通过忍耐才能取得一切东西；第三，当它达到了帝国主义成就的顶点而继续行动时，只要出现某种实实在在的危险的讯号，或只要它面临“更强硬的态度”时，它就会象它最近不得不然的那样忍耐并放弃前哨阵地。^①可是这种前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重建时期之后，就会发生实质上的变化。那时战争机器行将准备就绪，不用它将变得愈来愈困难。此外，除非英国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还要加上放弃它的全部传统地位，仅仅这个独立的岛屿的存在，也许对俄罗斯专制政权说来是不能忍受的，恰如它对拿破仑专制政权说来是不能忍受的一样——反过来也一样。察觉这件

^① 为了证明上述论点的力量，必须注意，在1939年当时的德国的情形下这三件事是一件也不存在的。有些读者会在第三件事上否认这一点，至少对慕尼黑以后的局势是如此。但这不过因为我们对德国野心的态度是和我们现在对俄国野心的态度完全不同之故。从政治角度上看来，决定之点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它的国土，而斯大林政权所必须做的妥协，如果也算是妥协的话，不过是关于在外围领土上所占的阵地的妥协，这种妥协要容易得多。何况，迄今人们之所以要采取本书中提到“更强硬的态度”，不过为了击退进一步的侵略而已。

事，当然正是丘吉尔警告的精义所在，也是已经开步走了的军备竞赛的理论根据。

但是为了体会这一切，还必须记住另一件事。在和平时期，在可能的未来战争中，尤其在战争威胁占统治地位却并非战争的这种尴尬局势下面，遍布全球的共产主义集团和共产党对俄国的外交政策自然具有最大的重要性。^①因此，官方的斯大林主义近来恢复它的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迫近——世界革命迫在眉睫——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永久和平就不可能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口号虽然从俄国立场看来是有用的或必要的，却歪曲了究竟哪一个俄罗斯帝国主义^②这个现实问题，并且除了第五纵队问题而外，这种口号和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关系。俄国问题的麻烦之处不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于它是俄罗斯。斯大林政权本质上是一

① 很幸运，按论证本身所能得到的推论而言，美国的共产党第五纵队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倒是不必深究的。无论如何它比统计上所表现的，或比劳工集团发言人的任何正式宣告中所说的要强大得多，并且确实不可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以及讨论假如发生战争的话，亲俄态度对战争努力的效率可能有的后果如何，我认为是几乎没有价值的，这不仅因为讨论中总免不了偏心的过甚其词或缩小其词，也因为参加讨论的人无法把争论点规定得一清二楚。正如前面已看到的，一个人的态度可能是事实上的亲俄派，却不是心情上和意向上的亲俄派。也可能有并不真正亲俄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些变则——如果确实宣战了，某些变则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又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仔细地区分开来。

② 帝国主义这个词，是通俗政治理论仓库中最被误用的名词之一，因此，规定我们在这里想要使用它的意义何在是必要的。可是按我们当前有限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象我在约三十年前发表的一篇专论那样分析帝国主义的现象，也用不到采取一个适合于精密分析之用的定义。下述定义，是我虽然肯定地认为不充分的（可是它和我们在本书第4章第11章的这个名词的用法，是不矛盾的），但还是觉得是能够满足当前需要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它以违背并非同民族的诸民族集团的意志而扩大一个政府的统治及于这些民族集团为目的。这就是俄国战前在外蒙古和芬兰这些事例中，战后在一切事例中所做的。要点在于，这种政策不知道有什么固有的限度。关于动机方面的各种词藻是无关重要的。

个军事专制政权，这是事实，而且因为它依靠一个单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党实行统治，不允许出版自由，所以具有法西斯主义^①的明确规定的诸特征之一，并在剥削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剥削群众。我们也许可以谅解或者悼惜由于其处境使然而必得称它为民主社会主义——至少将来是如此——的美国知识分子，虽然我们也可以因为他们期望我们相信它就含有侮辱我们的智慧的意思而感到愤慨。但是这样一个政权要把它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欧洲和亚洲这种望得见的趋势，决不能简单地把它和社会主义的任何一种散播的趋势等同起来。甚至不能由此推论说，俄罗斯统治的扩张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按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任何较为通用的意义来说的社会主义。究竟它会不会扩张，完全取决于俄罗斯独裁政权的实际利益或想象中的利益而定（见前章末节）。斯大林主义的宗教政策的类似的事例也许可以作为例证：当事情合乎独裁者心意的时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它领会到天主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地方可能是比共产国际或世界工联（1945年）更为有用的外交政策的工具时，俄国就被宣布为一个“爱基督的国家”，并且在沙皇的“圣教会议首席执行官”的老地位上出现了一个“天主教教会事务委员会”的共产党人的主席，在他旁边还有一个新的大主教——他立刻证明自己是一个东方国家的热诚的观光者。的确有很强的理由可以预料俄国会在它可以自由行动不感到外交政策的考虑束缚了它手脚的一切国家内使这些国家的产业国有化。因为对一个

① 这是另一个因广泛误用而失却了一切确切意义的名词。美国一般说话中这个名词的使用方法暗示了这样的定义：法西斯是使用这个词的说话的人或作家所不喜欢的任何政策、集团和国家。可是，在本书内它的意义，根据本书提出的政治理论（第22章），是相对于竞争的领导的垄断的领导的政治方法。我们将看到，这并不等于说，斯大林主义在任何方面，或除这一点面外的一切方面和希特勒主义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

征服者来说，国有化的产业容易管理，容易剥削，而且不致成为反对的中心。但是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理由了。而且究竟这种动机会不会战胜其他可能的动机是很难说的。^①甚至可以设想，俄国势力的继续前进，结局会成为大多数人说到**社会主义**这个词时所想到所感觉的那种发展方向上的障碍。

所以把俄国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混淆在一起——如果这不是为俄国效劳的人的阴谋诡计的话——就是误解了这个世界的社会形势。俄国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关系的地方只有两点。第一，共产主义集团和非共产主义集团中亲共派的出现由于他们的处境使然会使劳工政治激进化。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的——例如，法国共产党人曾投票反对两个重要的社会化法案。但整个说来，而且如果仅仅为了瓦解资本主义国家这个目的，他们处境的不得不然的性质总是要表现出来的。第二，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就会得到现代条件下任何战争都会得到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至于这次战争是某个假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个假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点对于战争后果是毫无关系的。

① 请读者注意，上面论证中所陈述的或隐含的一切事实，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和官方的俄国资料对证。事实上，所有这些对我们的论证，尤其对我们关于俄国政权性质的诊断极为重要的材料根据都是可靠的，无须对可能受到挑战的事实作任何说明。我故意避免提到那些可能会引起对事实的疑问的任何资料，不管它们对进一步证明这个政权的性质如何有价值，例如在被征服或被控制的国内发生的谋杀乔治亚的用锁链系成一串的囚犯，集中营等。如果可以称为暴行的事情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评战后的未来发展

英国第三版(1949年)序言

这个新版本给了我按照本书的观点评论最近二年来英国发展情况的机会——，把这种发展情况插入我力图构成的分析总体制中去的机会。按照我能支配的时间和篇幅而言，我所能贡献的不过是些断肢残骸。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我希望读者一开头就能清楚地了解它，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莫如批判别的国家的政策，或者提供什么忠告。我认为这简直是失礼的。如果某些词句的口气读起来仍然好象我有这样的存心，请读者体谅，这仅仅是文字极端简略所造成的许多讨厌的后果之一。

读者在读下文之前，请先细读一下第19章第4节和第28章第1节，这两节和本章其余部分一样，我都保持原样，未加更动。

1. 无论按本书的观点，或者按照其他观点看来，英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它的主要特色由于下列事实而被弄得模糊不清了，这事实是：一个社会转变过程妨碍了另一个转变过程，而前者又被另一个转变过程所妨碍，这另一个转变过程因为按照当前的国际关系说来，很难说是从战时经济到和平经济的转变，所以最好称之为在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调整过程。这两种过程虽然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却密切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别处理。但是我们还是要快刀斩乱麻似地把它们分拆开来。我们在良心上可以相当安闲地这么做，因为一个现代的保守党政府（假如下次选举会产生这样一个政府的话）也得在一个一定的局势下，在劳工利益占支配地

位、自由企业的“烽火熄灭得只剩青烟”的社会中来进行重新调整的工作。换一句话说：如果工党政府被保守党政府所取代的话——这是我没有资格答复的一个问题——除了国有化不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外，变化大概比热烈的党人公开认为的要少得多。

2. 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过去二年来英国经济政策中应该解释为“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按第19章第4节指定给这句话的意义——的那个成分。读者会注意到，工党政府迄今一直没有越出国有化纲领范围一步，同时对于这个纲领中最有争论之点——即第六点，钢铁工业的社会化——，工党政府已以出奇的稳健把明确的行动推迟到下届选举之后。我欣然承认，到底这种社会化或国有化纲领应不应该称做社会主义纲领，还有供不同的意见讨论的余地。但是我断然地认为，再也没有象已经做成的那些事情配称做社会主义的了。因为在大多数实际已完成的或已提出的“计划”之中，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在内，除非我们采取一个过分广泛以致在分析上没有任何用处的社会主义定义。某些计划图式，尤其是某些为供给计划以工具而做的研究工作，当然是指向社会主义方向的，但在国民收入会计和投入产出分析——两者在美国都比在英国更为进步——可望结出可以吃的社会主义果实之前，还得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局势的另一个方面。过去二年中英国发生的一切事情中给我那么鲜明印象的，莫如循社会主义路线前进途中所遇抵抗的微弱了。议会反对党的保守党，严格遵循寻常议会惯例的约束，社会重建问题争论中发出来的热量，还比过去若干比较次要的争论问题，例如自由贸易，爱尔兰，国家预算等问题发出来的热量为少。无论在议会内或全国范围内，保守党内以十分沉静的态度对待社会重建问题的一派已经占了优势。保守党的报

纸和刊物当然已提出了批评；和以前各次一样，它们议论，劝告，讥笑，但也仅此而已。正如先前当讨论重大问题时一样，倾注出来了一批书籍和小册子之类的批评文献，但如果一个有统计头脑的观察家想用投反对票的人写出来的卷数或页数来衡量争论的问题的重要性的话，他不可能把社会主义这个争论问题的重要性标得很高。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民族遇到它坚定不移地执着不放的原则受到攻击时所会有反应的样子。我由此推定，自由企业的原则已经不再活在他们心里了。社会主义已经不再被人们以道德热情来抵抗了。它已经变成可用功利主义的论点来讨论的问题了。当然，个人主义的死硬派是有的，但是看来他们不足以唤起足够的支持以取得政治地位。**这正好**是危机的榜示——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证据。

3. 在我看来，这种局势支持了我在1942年所作的诊断，并且，如果在这类问题上证实是可能的话，它也证实了我的诊断所依据的那个论点。我曾以尊敬和钦佩的心情读过我的卓越的同僚裘克斯教授的辉煌著作^①，但是我必得自承，我的被劝改宗的诚恳愿望迄未实现。裘克斯教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与其说这是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办法，不如说它更切合于解决随重新调整政策以俱来的懊恼问题——甚至可以加到有利于本书主题的愈积愈多的证据中去的。

是否通过议会民主这个工具来实行社会化，这个问题的解决

^① 约翰·裘克斯：《通过计划工作来考验》，1948年版。我当然很感谢他对我议论的亲切的批评，但是我必得自承，我未能在一切论点上承认被批判的观点就是我自己的观点。举一个例，我宁肯喜欢说，由于可计算项目的稳定扩大，企业家职能势必要变得陈废，我却不喜欢说，总而言之企业家职能现在实在已经陈废了。我也没有想要否认军事上的领袖才能还有活动余地。我的意思不过是，这种领袖才能的意义，已经和拿破仑在弹雨横飞中站在阿柯尔桥上那种领袖才能十分不一样了。

的可能性已经被证实了,适合这种政治制度的特殊的社会化方法,即零打碎敲的社会化的方法也已被证实了。已经作出的开端,其意义也许并不超过这一点,也许这些开端不过指示了一种长期趋势。但是看来它们不仅通过民主的社会化,而且也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清楚地指出了我们所要了解的东西,它们指出,如果是象本书第 21 章那样定义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互不相容的。在第 23 章内,我们指出过,政治的民主的原则——即政府应该从争取票数的竞争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确能保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除此而外,民主就和“自由”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关于经济学家所关心的“自由”,即投资自由,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择业自由,现在在我们面前有有趣的实验材料,它们表明这些自由完全可以按社会主义政府在正常条件下大概需要的程度予以限制,而在某些方面,限制还可以超过这种程度。在现代税制条件下的私人投资自由,至少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中较好的方面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投资可以怎样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中去——不管作为个人的我们认为它的结果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内,正常条件下的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可以比现在大得多;但除此而外,我们知道,口味的可展性比观察家通常相信的要大些,因为,即令在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限制的实际必要性的时候,人们对限制也不会愤恨到要起来积极抵抗的程度。同样,除少数事例而外,正常情形下择业的限制不一定等于“强迫”,尤其如果可以容许的选择机会合理地配上报酬的差别规定的話;我们知道,有很好的条件接受政府“领导”的人对这种指导并不是很不高兴的。

让我再重复一次,虽然这样重复大概是不必要的;这些是从完全可以确定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决不是我个人爱好的表现。就

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别种文化模式。

4.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对于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着它的对“在抑制了的通货膨胀条件下的重新调整过程”处理方法的。政府和官僚机构体系,由于一连串的、诸如新鲜洋葱头的周径该多大之类的详细规章,由于考虑不周的行政决定,由于易遭嘲笑的官方声明,确实提供了用来攻击他们自己的大量弹药。他们压制了许多可能会改进国家经济形势的企业活动和其他活动。但是他们也避免了经过灾变来实行战后调整,他们率领劳工渡过了几个危急的年头,没有失业,却不断提高了实际收入水平。如果这就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经济政策上唯一认可的目标,那么这既可以说是成功,也可以从其他几种立场上把它说成是失败。应该补充的是,如果按照完全不考虑未来的观点来看,它并没有把应该做成功的事情做完:已经执行了的巨额公共投资就个别项目而言也许是免不了批评的;但是使国民经济装置返老还童的必要性并没有被忽略,虽然许多人,特别是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超额投资提出了抗议。可是,我们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在马歇尔计划援助时期内,局势中维持不了的特色的逐渐消失,会怎样影响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预测?或者换句话说,既然走直路的社会主义可能一定会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显然不是实际的政治,从而,解决方案只能求之于相反的方向,那么,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社会主义是不是会受到一次挫折,私人企业制度会不会再延寿几年?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如果没有另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会有一次挫折,但不会是严重或者持续时期很长的挫折。私人企业会重新赢得一些它已经丧失的地盘,但不会太多。社会局势基本上将照现在的样子维持不变,同时私人企业身上的

镣铐不象有什么除去以致允许它按原设计工作下去的可能。导致这个结论的论点，将在这个序言的其余两节中简要提出。这个论点只适用于英国。读者一定明白，对美国的诊断和预测是不同的。某些欧洲的经济学家似乎抱有这种虔诚的希望，即美国将会有一次惊人的崩溃——并非重新调整中的危机——并且这次崩溃会是对资本主义的、免得它病体缠绵的慈悲的一击，可是不论美国政治会怎样对待将正确无误地浮现于最近将来的形形色色的可能性，这样的希望似乎是不会实现的。

5. 在英国的局势的维持不了的诸特色中，我不把限额配给和对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详细规章包括在内。这些不过是压制通货膨胀的影响的方法，而当它们完成了它们的任务之后就会消失的，在某些地方它已在消失了。但是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状态本身，是更根本性的诸困难的结果，而如果没有这些困难，可能早已用著名的传统补救方法，例如得到旨在压缩过剩购买力的特别课税的后援的预算盈余，和适当的信用政策来对付的了。这些手段现在正在实际使用之中——并非毫无成就——虽然在既定诸环境下它们不能使用得充分有效，因为只要食品补助金还象现在那样维持不变，就不可能有巨额预算盈余，因为特别课税的可能性就高收入阶层而论已经耗竭——在英国，已不再有“纳税后还富裕”的人——也因为高利率会碰到显然不可克服的抵抗。但是基本的困难是消费过度，这就是，实际工资加上社会服务的实际成本，一方面是和处于现在生产力水平的英国经济的其他条件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是阻碍它提高到更高水平的障碍物。通常，这个问题是用另一种较不令人讨厌的方式来表述的。正是英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正在成为它的经济局势图画中的一个维持不住的特色，所以在马歇尔计划援助计划时期内达到的目标看来，应有一笔出口

盈余使它重新插入世界经济中去，并保证英镑和美元之间的自由兑换。这种提出问题的方法并不是错误的。错误在于相信这就是和我们的诊断不同的诊断。因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并且要既无须国外援助，又不必有国内的紧张而能维持这样的局面，就必须使英国的国内局势正常化，这一点，只要稍为想一想，而且只要十分初步的经济学知识就足以证明。某些东西的确可以通过多少有些重商主义作风的办法利用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强固之点，并实行管制性的进出口政策而获得。最后，当目标已经望得见的时候，英镑贬值也许可以助成达到目标的最后一个步骤。但是取得持久成就的根本条件却是这样调整它的经济过程，使它再次能够除生产供国内消费的和支付它的进口所需的货物和劳务外，还能生产一笔为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所需的真正净盈余。但如果不暂时减低消费，如果生产上没有永续的增加，这是无法完成的；而上述两点，如果公共开支不作不得人望的减低，税捐负担不作更不得人望的转移，又是无法实现的。

6. 读者在衡量这种做法的涵义时，将不难领会其间涉及的政治问题的重要程度。应该完成的事情，必得在无限多的问题上作艰苦的运筹调度才能完成。似乎有理由预料任何地方都不能成功地越过绝对最低限度，因为只要事情象现在这种样子，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解释为劳工的某种既得权益的无可补偿的牺牲。可是，为了重建自由企业的社会，并允许它证明它能做出些什么事来，绝对的最低限度是不够的。这么说，如果需要证明这一点的证根，1920年的经验就足以提供这种证据。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已经存在的〕社会趋势会中断。不象不会有自由企业喘息的间隙时间，不仅在保守党政府下会有，在工党政府下也会有。但是如果到底有了，那么与其说这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政策本身的嫌恶——不管逻辑上

是否辩护得了——不如说是因为把社会主义政策和战后的变迁非逻辑地结合起来了。

马萨诸塞州剑桥

1949年4月

长驱直入社会主义^①

I

为了使发生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曾经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论题时发生过）减少到最低限度，我首先要在开讲我的题目：**按美国经济的将来而言，现在状态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归结如何之前，解决几个初步论点。**

1. 为了这篇论文的目的，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有的或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所以，我们所说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其意思，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事务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请注意，虽然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各有自己的观念，但很难设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没有一个庞大的官僚

① 约瑟夫·熊彼特 1949 年 12 月 30 日在纽约美国经济学会上作“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讲演时所根据的是草稿，不是准备好的手稿。他在逝世前夕，着手为年报把这篇讲稿改写为论文，并已几乎完成。他原来打算在第二天（1950 年一月八日）去芝加哥华尔格林基金会讲学前完成这篇论文。现在发表在这里的论文是他的初稿，但他亲手写成的这分初稿和他的一切写作一样写得很仔细；他没有机会由他自己来改正一些微小的错误，或写出结尾的几段文字。我们所作校改工作，多半在于补上一些标点，偶然也补上一些漏字，对原文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简短的结尾的几段，是由他的妻子根据草稿和回忆补上的。

机构来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而这个官僚机构体系又可以不受象我们今天所有的那种政治民主机构——一个议会或国会，一套其地位取决于争取选票的竞争的斗争的政治官员——的控制。所以，我们可以把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和由国家来征服私人工商业等同起来。但古典社会主义学说把这种过程描述为“国家的消亡”。这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之处，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政府的学说，就不难消除。进一步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并不排除在作出行政决定方面可以实行分权——恰如一支军队的中央集权管理，并不全部否定所属单位司令官的主动性一样。最后，考察一下，我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说，由于逻辑上的必然——排除我们从、比如说兰格-勒纳模型中见到的竞争性机制的使用。消费者选择自由和择业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也许会受到限制，但并不一定会受到限制。

2. 我并不拥护社会主义。我也丝毫不想讨论它是否值得想望，不论这种讨论有什么意义。可是，更重要的是，要说明白，我对此决不作什么先知的预言，也不作什么预告。任何预告，如果企图除了诊断可以看得见的诸趋势，除了指陈这些趋势如果按照自己的逻辑努力贯彻自己的话将产生什么结果而外还要做出更多的事来，那末这种预告就是超科学的先知的预言。这种诊断或陈述本身并不等于预测或预告，因为外在于所选择的观察范围的诸因素，也许会介入局势之内，妨碍这类趋势的完成；因为，社会现象决不是象天文学家有好运气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加以观察的那种现象，所以，纵观社会现象中可以看得到的趋势得以贯彻它们自己，得到一个以上的结果也不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又因为和各种抵抗力量相抗争的现存诸趋势，也许会无法完整地贯彻自己，结局也许会搁浅在半道上。现在让我们逐点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任何一个观察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的有能力的——当然也是充分超然的——观察家都预料不到会出现趋向于完全象列宁体系那样体系的趋势，或者，具体地说，预料不到会有急剧的经济进化和制度迟迟不能和这种进化的结果相适应的情况的。产生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是战争和随战争而来的军事上和行政上的崩溃，对于这样的事实，非科学的决定论是全然不适用的。第二，为了简单起见，我只是因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讨论中处于上座，才谈到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他的可能性是不应该忽视的。我们自己的工会实践中大家所熟悉的事实，说明走向某种形态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实说明了，可以看得到的各种趋势，或其中的一部分，也许和完全非社会主义——至少不是按这篇论文所采用的意义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重组诸形式不是不相容的。例如，按教皇通谕《四旬斋的一年》的路线重新组织社会，虽然大概只有在天主教社会，或在天主教会的地位十分强大的社会才是可能的，无疑能提供一种可以避免“全能国家”前途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方案。第三，大多数任何性质的可以看得到的趋势往往会使完全的实现突然停止。因此，这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居然想要触动农场主的领津贴的独立性，就不能不说是十分勇敢的。甚至“小商工业者”的地位也可能是强固到官僚体系无法征服的程度，所以，一大片边沿地带也许要用妥协的安排来不明确地加以控制。

可是，更重要的是此外的一些事情。当经济管理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时，许多驱策这种转移的力量全部或部分满足以后，这种趋势也许就会失去它的势头。某些经济学家会补充说，任何走向中央计划经济的渐进运动，使我们有机会经历某种也许可以起制动闸作用的不利发展。我没有时间来说明，为什么我不把

其间任何一种可能性估计得很高,尤其是,为什么十分重要性的集团感到不利的结果,与其说会发挥限制的影响,不如说会发挥推进的影响——这就是说,事势所趋,不成功的社会化的补救之方是更多的社会化而不是更少的社会化。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注意这样一件事情是紧要的,即大多数为了得出有利于私人企业经济继续活下去的结论而构成的议论,实在并不否认走向我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趋势的存在,所否认的不过是,这种趋势不会由它自己完整地贯彻到底。既然谁都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这一争论就有陷入言词之争的危险,尤其在那么重视言词的美国,在这个除一些相对微小而不重要的集团而外, **社会主义** 这个名词并不博得人望,许多人喜欢这件事却不喜欢这个词,并偏爱用 **自由主义** ^① 这个词来代替它的国家内,〔事情更将如此〕。因此,作出简略的分类,似乎是必要的。

3. 相信资本主义秩序趋向于毁灭自己,相信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是——在上面指出过的限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秩序的有希望的第一继承人的理由,我已在别处说明过。简略地,肤浅地说,这些理由可以总括为四项。第一,实业阶级在发展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方面的成就,以及这种成就已经为一切阶级创造出新的生活水准这一事实本身,自相矛盾地挖毁了实业阶级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实业阶级的经济职能虽然还没有陈废,却倾向于陈废,并使它容易官僚化。第二,本质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活动,倾向于传播合理的思想习惯,倾向于毁灭仍然是生产工厂中制度化了的领导权的有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上下之间的从属关系和矢忠的习惯:没有一个完全建筑在(法律上)平等的缔约当事人间

^①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用 **共产主义** 这个词的场合更多一些。除俄罗斯的角度不予考虑而外,共产主义这个词应该用作 **社会主义** 这个词的同义语。

的自由契约这种基础上的，其每一成员据说都是只以自己的（短期的）功利主义目的为行动指南的社会制度能够行得通的。第三，实业阶级把精力专注于工厂和公事房，有助于创造一种政治体系和一个知识分子阶级，这个阶级的结构和利益发展成为对大企业利益集团的独立态度，最后还会发展成为对它的敌对态度。大企业利益集团在那些在短期内对其他阶级十分有利的对它的攻击面前，变得日益无力保卫自己。第四，作为以上诸点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层价值的等级，虽然必然是和它的经济上的成功联系着的，但正不仅在公众心目中，且还在“资本家”阶层本身中丧失它的阵地。用不着多少时间——虽然比我能有的时间要多——就足以表明，要求安全、平等和调节（经济工程学）的现代运动是可以按照这些路线加以解释的。

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解体过程到底已经走得多远，最好的方法是观察实业阶级本身，和认为自己（百分之一百）和社会主义不两立，并惯于否认任何走向社会主义趋势的存在的大批经济学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把它的含义作为当然之事接受下来。仅就后者而论，他们不仅毫无疑问地而且赞许地接受了：（1）用以防止衰退，或至少防止萧条的各种各样稳定政策，也就是，即使不以充分就业原则为基础，至少也是政府对于企业情况的大量管理；（2）“扩大收入的平等是可取的”，但几乎没有规定究竟准备接近绝对平均到多大程度，以及和这相关联的再分配性课税原则；（3）常常被反托辣斯口号所合理化了，物价规制的一套应有尽有的办法；（4）国家对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控制，虽然还保留了一个广阔的变化范围；（5）欲望领域的无限制的扩张，这些欲望在现在或最后得由公共企业予以满足，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按照某种邮政局原则的；（6）当然还有一切类型的社会保障立法。我相信，对

这类事情的全部或大部表示非难的经济学家们，曾经在瑞士的一座高山上开过大会。但是这类诅咒甚至没有激起过什么攻击。

如果你们认为我“非难”或想要批判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是对我的论点的完全误解。**我也不是在这全部政策上面或在其中某些上面贴社会主义标签的人中的一个。其中某些条目，甚至在十八世纪时已被保守主义者，甚至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采纳过；还有一些曾列在保守主义政党的政纲上面，并在新政期间以前曾付之实施。我想要强调的不过是，我们确实已经远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原则了，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这样来发展和调节资本主义诸制度，使它适合于私人企业得以稍异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方式运行的条件。我挂念着的经济学家们，无疑强调了他们认为好象会长期持续下去的各种差别。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趋势会搁浅在那一点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领会了马克思未能领会的一件事：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动机的浩瀚的生产力的可能性，约许了无限度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辅之以免费的服务，却用不到完全“剥夺剥夺者”；另一方面，甚至资本家的利益实际上可以加以剥夺而不致于把经济发动机弄得停顿下来，以及甚至可以使这个发动机为劳工的利益继续运转下去。他们发现了这种**劳工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之后，进而作出结论说，至少在某些有利条件之下，这种资本主义可以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事情也许如此，但这并不等于否认我的命题。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主妇们可以通过她在豌豆和大豆之间所作的选择来影响生产；或者年青人可以选择到底在工厂做工还是在农场做工；或者工厂经理在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上有某些发言权；它意味着一张列着各种价值等级的表，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不平等和家庭富裕的文化。可是这种文化正在急剧消逝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随

自己的高兴为这件事而欢欣鼓舞或者悲叹号泣吧；但是不要让我们对这件事闭起眼来。

剩下来一个真正的问题。支持有利于劳工主义存续下去各种复杂关系的诊断，全部重量都依托在社会生产力的现在的惊人发展向未来的延长之上。但是这里面还存在着一种谬误的推理的因素。过去的成就是多少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的成就。不作进一步考察就不能假定劳工主义会继续得到这样的成绩。我们用不着接受现在那样的停滞主义命题，就可以因为这样一种可能性而烦恼：如果私人企业体系超过它的忍受能力，永久地被课以重荷、多方加以“规制”的话，停滞主义命题也许归根到底会成为一个正确的命题。在这种情形下面，一种毫不客气的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甚至会作为较轻的祸害硬塞给社会主义的敌人的。

II

从一种社会秩序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过程，是一个不停止的，本质上又是很缓慢的过程。研究了一段不长的“平静”时间的观察家，很可能觉得他所见到的社会体制好象是根本不会变化的。此外，这个过程时常受到挫折，观察挫折本身的时候，观察家也许会觉得这种挫折暗示了相反的倾向。但是我们也时时观察到运动的加速发展，并观察到其最明显的原因之一是大战。在过去，胜利战争可以增大统治阶层的威望，并加强统治阶层与之有关系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在现代条件下，事情已不再是这样的了。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少影响美国的社会形势，因为战争的精力既没有消耗得足够，战争时期又没有延长得足以留下一个永久的标志。但是在欧洲事情就不一样了。在社会框架着了火的各战败国内，潜在的社会主义重建的倾向浮现到表层上来

了，在一个短时期内它是所向披靡的，由此证实了它自己的存在。更意味深长的是，在各战胜国内，虽然规模确实小得多，同样的事也发生了。在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再象 1914 年前那样行使它的职能。在英国，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受到党内社会主义派别影响的工党确实没有跃进到当政的地位，但至少进入了内阁。在这二个国家内，政治部门对私人企业的态度静悄悄地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一种预先存在着的走向社会主义目标的趋势是已知的，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虽然要求继续战时确立了的政策的呼声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虽然有一个时候公众对战时规制的怨恨阻止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步伐，可是，回到战前政策上去是不可能的，甚至试图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英国的金本位政策和它的最后失败惊人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再是自由企业世界的世界上，金本位——这个仍在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理的顽皮孩子——拒绝了工作。

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加的“加速器”，这一回，它们在美国也出头露面了。它们创造出这样的局势，使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觉得，本来会自我推荐给自由企业时代的人的救治方法现在不中用了。实业阶级本身，害怕应用这种救治之方时需要的各种“调整”，接受了——当然从头到尾一直是喃喃不平的——可能阻止 1929—1933 年经验重现的繁文缛节的规制办法，嗣后还接受了可能阻止 1921 年那样的一次战后危机的另一些规制办法。实业阶级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已经学会了许多，却还有更多的东西没有学会。他们也接受了新的财政负担，五十年前这样的负担的一部分就是受不了的——顺便说说，那时候一切主要的经济学家也一样会觉得这是受不了的。而且，究竟实业

阶级是不是接受这种新局势是无关紧要的事。劳工力量本身几乎强大到足以——和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言词上)背弃了对私营利润经济价值图式的忠诚的其他集团结成联盟后就更强大了——阻止任何超过对粗糙处所的修整的回复。

让我重复说一次：我丝毫不认为，任何单纯的“事变”，甚至是象“总体战”那样的重要事变，或者由此形成的各种政治局势，或者各个个人和各个集团对这种局势所怀抱的任何态度或心情，支配着社会历史的长期形势——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力量对比问题。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些事变和由事变所创造出来的局势，可以排除更根本性趋势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可以排除否则会使社会进化的速度降低的障碍物。请注意，这并不必然构成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欢迎这些事变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些事变，向社会主义的进化会缓慢一些，但也会稳定一些。如果没有这些事变，挫折和控制不住的局势似乎也会少出现一些。国民生活各部分的发展的相互协调会更为圆满。因为，正如一个有效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民主政府有秩序地行使其职能的必要条件，抵抗制度变化的诸经济力量的存在，也许是使变动的速度保持在安全限度之内所必要的。

但是，使社会变动加速前进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是通货膨胀。既然那么多的权威告诉我们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象通货膨胀那样能挖毁社会体制的基础，我们就没有必要稽留在这个命题上面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命题，那末就可以从方才我们所说的话推定，根据一切可以想象的立场——只有不负责任的革命的立场在外——来说，调整一个国家的经济过程使之不会产生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是战后首要之举。但是同时可以看得清楚，在都谁害怕这种政策的短期后果，而某些需要的调整——尤其是提高许多先前所控制的物价，而不提高货币工资——又完全不是“政治上可能

的”事情的世界内，这是一件极端难办的事情。^①在1945年的环境下显然应该走而确实也走了的道路——在互相埋怨声中实行但仍然取得了许多一致的同意——是用一剂有控制的和平时期的通货膨胀来缓和过渡时期的困难，由于高水平的军费开支的继续和援欧政策，这一工作做得比较有效。所有这一切实质上达到了目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十分明白（虽然不是一切经济学家都有同样的看法），一个精力旺盛的、必然会惹起大量投资需要的经济发展时期马上就要来到，而希望避免重大的扰乱，希望美国经济能在缓慢上升的物价水平上扩张的那种希望，在一个时期内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只要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不管海外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若把一件兆头不好的事情列入考虑之内，这种类型的想法就会失效。在高度就业水平之下（看来我们好容易才算是在放弃充分就业的口号了）不管是在“自然”的或是由高度就业政策强迫实施的高度就业水平之下，足以提高雇佣劳动的货币成本的工资要求或其他要求会变得不可避免，并能引起通货膨胀。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高水平就业除去了不提高雇佣劳动的货币成本的唯一原因。其所以足以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当资源作高度利用的时候，银行借款和价格的上升调整提供了一种完全容易满足它们的办法。虽然讨价还价还是和个别工会进行的，提高工资的运动却是普遍性质的，于是我们就淌到凯恩斯主义的局面上去，在那里货币工资率不再影响产量和就业，却被影响货币单位的价值。只要工会的领导和政府的处境跟现在一样，就没有什么东西足以煞住这种机制，而这种机制——除特定企业的特殊局面所形成的例外——就等于于是永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对国库的不断增

① 代替这种办法的另一种办法，即压低未经控制的物价同时减低货币工资，不仅更少“政治上的可能”，而且要实行它而不惹起一次严重的萧条也困难得多。

胀的要求和我们的超等的累进制课税方法当然恶化了这种状况，但是它们并没有创造这种状况。

没有必要指陈，已经发生过的和还要发生的物价的一时暴跌，不足以证明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存在。甚至除战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其他意义自明的事例而外，这种物价暴跌的发生，还是每一次通货膨胀过程中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可以为例。受到“打击”的人于是就高声非难通货收缩，存心要取消通货收缩而作通货收缩预测的、以及除通货收缩而外似乎总是无力预见任何其他事情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同僚们也高声非难通货收缩。但是这是对美国产业生产力的一种恭维，因为对美国社会来说，怀疑它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威胁或者受到了通货收缩的威胁两皆完全可能。这种恭维正因为其是无意识的，所以愈加显得诚恳。

III

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状态，在质方面说，将会有削弱社会的社会体制和加强各种破坏倾向（不管怎样仔细地重重包裹在“自由的”词句中的）一切后果，这种后果是每一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习惯地归之于更为触目的通货膨胀的。但是事情还不止此。此外，还有某些对这种局势的标准的救治方法不能缓和现在的情况，甚至还会恶化现在的情况。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所以让我们在极端的简略中，讨论这类救治方法的三种类型。

1. 控制通货膨胀的全部手段中最正统的办法是通过利率或信用限额之类来影响贷款的数量。我当然充分理解，**如果所要达到的是自由企业经济意义上的正常状态**，货币利率必须从低利政策的支配下摆脱出来，而对每一个渴望回到这样的正常状态去的

人来说，自由金融市场的解放——或重建——必然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变更这样的事实，即信用限制政策会在现在产生出，和古老的信用政策理论会使我们去指望的结果迥不相同的结果。如果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为了论证的方便——接受古老的理论，我们不禁要说，它适用于一个万事伸缩可变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并不害怕我可以名之为救济性衰退的那种情况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利率的提高据说是为了减低开工率、货币工资和**就业人数**。现时这些效果是肯定不会实现的，如果实现了，也会马上惹起政府的中和这些效果的行动。换句话说，现在的信用限制除增大企业的困难而外不会有什么成就。甚至对消费者信用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虽然在这方面无疑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2. 通过加重赋税来控制通货膨胀——差不多同样是正统的补救办法，但是它使反对信用限制的现代经济学家享到了盛名——这一办法有同样的困难。说提高消费税大概会做成功一些事情是十分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局势下这甚至是好的凯恩斯主义。但如果所要增加的是公司税和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它对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充其量也是不大的，甚至还可能是相反的。因为，如果现在的产业发展速度还要继续下去，因而现在的设备陈废率也还要继续下去，当现成可用的非通货膨胀的资金减少的时候，只能依靠日益增大的通货膨胀性质的银行信用来加以弥补。不这样办，而来减低产业发展速度和设备陈废率，暂时确实会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长期间内却会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①

^①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种主张并不能打动我们的激进派朋友。但是我自承，我觉得难以了解某些卓越的经济学家的立场，他们完全不致于被怀疑为欢迎我们的经济发动机不能成功地工作下去，虽然他们仍然在美国和英国把产业投资的缩减列在反通货

3. 第三种常用的补救办法是直接控制——公定价格、优先权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包括补助金制度)。为什么这些办法在某些公共舆论领域如此享有盛名,是不需要在这里详论的疑问,特别是对官僚机构体系说来,重新采用这类控制办法等于再度征服已经丧失的地盘;对于工会说来,这意味着在争夺有利可图的项目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利益;对企业说来,这就意味着退路的丧失,而这条退路,只要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对它的打击能部分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通过价格调整来加以避免的话,原是对他畅开着的。或者,至少它会使这种退却取决于政府的是否许可,可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会为了保证改进生产发动机用的资金而给予许可。换句话说,价格控制的结果也许是私人企业向公共权力投降,就是说向完全的计划经济跨出的一大步。

[到这里,约瑟夫·熊彼特停止了把讲演稿改写成书的工作。听到他这次讲演的人会记得,讲演的末尾所占时间很少,他作的总结十分简略,适当地回顾了一下他的开场白,谈了一下美国的经济前途,也谈了一下在现有政治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现状。某些他“极端简略”地接触到了的论点,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美国第二版或英国第三版,或在1948年六月《全国商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还有时间来制止通货膨胀》中,看到详细的发挥。

下面几段是根据记忆和他讲演时用的草稿整理出来的]

我并不想作先知式的预言,我仅仅确认事实,仅仅指出这些事实表明的趋势。

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官僚机构体系最后征服私人企业体

膨胀的可接受的手段之列。附带说说,必须注意某些保守主义的忠实同志的下列意见不一定应该象通常那样加以嘲笑,这种意见是:高额的和高度累进的捐税可以促进通货膨胀危险,而减税(在正确的场合)则会减少通货膨胀的危险。

系时可以起重要的作用——作为征服过程结果的磨擦和停顿现象被归因于私人企业，并被用来作为进一步限制和规制的论据。我并不说任何集团有意识地追随这条路线，但是所有的目的从来不是完全有意识的。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中大多数人会认为完全的计划是一切可能的祸害中最小的祸害。他们当然不会称它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们大概会为农场主，零售商，小生产者作出某些例外；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和文化，也许我们就不值得为之操心了。

美国的大量生产的天才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所抱的乐观情绪正是寄托在他们过去的工作成绩上的）究竟能不能经得起这种考验，我不敢肯定；我也不敢肯定说，造成这种局势的政策可能被颠倒过来。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崩溃方式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预言资本主义终将崩溃这一点却没有错。**停滞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过程停滞原因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所作出的资本主义过程（即使在公共部门的充分帮助下）会停滞这一诊断也许结果证明仍然是正确的。^①

1949年十二月三十日

① 这篇论文是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论文和会议录》（1949年十二月）而写的，得学会同意重印于此。

译名对照表

人 名

A

阿里蒂诺, 比特罗 Aretino, Pietro
 艾希利 Ashley
 艾威林 Avcling, E.
 艾德勒, 马克斯 Adler, Max
 艾德勒, 弗里茨 Adler, Fritz
 艾德勒, 维克托 Adler, Victor
 埃耳伯提 Alberti
 埃季沃思 Edgeworth
 爱斯派推罗 Espartero
 爱斯葵士 Asquith
 爱德华 Edward, A. C.
 安娜 Anne
 奥当耐尔 O'Donnell
 奥克尼 Orkney
 奥杰尔, 乔治 Odger, George

B

巴尔福尔 Balfour
 巴贝夫 Babeuf
 巴枯宁 Bakunin, M.
 巴栖奥里, 卢卡 Pacioli, Luca
 巴隆纳 Barone, E.
 比肯斐尔德 Beaconsfield
 比恩斯托克 Bienstock
 布伦, 莱翁 Blun, Léon
 布朗基 Blanqui
 布德 Bute

布赖斯 Bryce
 边沁 Bentham
 包特莱 Powderly
 包萨道夫斯基 Posadowsky
 毕加索 Picasso
 贝利 Bailey, S.
 贝佛里奇 Beveridge, W.
 贝勒普希, 冯 Berlepsch, von
 贝塞麦 Bessemer
 伯恩斯 Burns, A. F.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勃兰汀 Branting
 勃伦斯泰因 Bronstein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柏克, 埃德蒙 Burke, Edmund
 柏拉图 Plato
 柏格森 Bergson
 珀森斯 Persons, W. M.
 班纳曼, 坎贝尔 Bannerman, Campbell
 彪罗 Bülow
 俾斯麦 Bismarck
 鲍尔, 奥托 Bauer, Otto
 鲍尔特凯维兹, 冯 Bortkiewicz, L. von
 鲍莱 Bowley, A.
 鲍斯, 弗兰兹 Boese, Franz

C

查尔斯 Charles, E.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查理五世 Charles V
查森豪斯 Zassenhaus, H.

D

邓尼金 Denikin
邓波尔 Temple
多布 Dobb, M.
杜干-巴兰诺夫斯基 Tugan-Baranow-
sky
杜林-欧根 Dürrings, Eugen
杜阁 Turgot
杜勒 Dürer
狄斯累利 Disraeli
都铎 Tudor
道威斯 Dawes
德罗马尔 Dromard, G.
德·梵 De Vegh
戴伊-珀森斯 Day-Persons
戴高乐 de Gaulle, Charles
戴维斯, 彼得 Davies, Peter

F

凡·哥 Van Gogh
凡勃伦 Veblen
弗里希 Frisch, R.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伏尔马·冯 Vollmar, von
伏尔泰 Voltaire
冯特, 威廉 Wundt, Wilhelm
佛朗哥 Franco
法比优斯 Fabius
芬奇 Vinci
范拉拉, 弗兰西斯科 Ferrara, Francesco
菲力普, 路易 Philippe, Louis
费尔默, 罗伯特 Filmer, Robert
费希尔, 欧文 Fisher, Irving

傅立叶 Fourier
福格尔, 雅各布 Fugger, Jacob
福斯特 Foster

G

古尔诺, 奥古斯丁 Cournot, Augustin
哥白尼 Copernicus
哥宾诺 Gobineau
格林维尔 Grenville
格雷科 Greco
高多芬 Godolphin
高茨 Gautsch
龚古尔 Goncourt
龚珀尔, 塞缪尔 Compers, Samuel
盖德 Guesde
葛底斯堡 Gettysburg
葛莱斯东 Gladstone
凯撒 Caesar

H

汉尼拔 Hannibal
汉弗莱 Humphrey, D. D.
华尔波尔, 罗伯特 Walpole, Robert
华尔格林 Walgreen
亨塞尔 Haensel
哈尔维 Harvey
哈耶克 Hayek
哈特 Hart, A. G.
哈第, 凯尔 Hardie, Keir
哈莱 Harley
胡斯曼 Huysmans
海尔维 Hervé
海伍德 Haywood
海斯 Haase
黑格尔 Hegel
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s

J

加尔文 Calvin
 加米涅夫 Kamenev
 加利弗 Gallifer, M. de
 加里克士司二世 Calixtus II
 伽利略 Galilio
 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杰斐逊 Jefferson
 基奥多 Giotto
 捷尔仁斯基 Dzerzhinsky

K

孔, 贝拉 Kun, Bela
 孔德 Comte
 卡内奇 Carnegie
 卡贝 Cabet
 卡透累 Carteret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克伦斯基 Kerensky
 克劳福德 Crawford
 克拉克, 约翰·贝茨 Clark, John Bates
 克拉克, 科林 Clark, Colin
 克罗采 Croce, B.
 克洛克, 约翰·威尔逊 Croker, John Wilson
 克腊姆 Crum, W. L.
 坎特布雷 Canterbury
 肯特 Kent
 柯尔 Cole, G. D. H.
 科布登, 理查德 Cobden, Richard
 库尼兹 Kunitz
 库兹涅茨 Kuznets
 康恩 Kahn, R. F.
 康德 Kant, I.
 康德拉节夫 Kandratieff, N. D.
 凯恩斯 Keynes, J. M.

魁奈 Quesnay

L

兰格, 奥斯卡 Lange, Oskar
 卢梭 Rousseau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列文 Levin, M.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李维-勃罗尔 Lévy-Bruhl
 李嘉图 Ricardo
 劳合-乔治 Lloyd-George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罗奇德尔 Rochdale
 罗宾逊, 乔安 Robinson, Joan
 罗宾斯 Robbins
 罗得斯, 塞西尔 Rhodes, Cecil
 罗斯 Roos
 里昂, 丹尼尔 Leon, Daniel De
 里勃 Ribot, T.
 里德, 约翰 Reed, John
 利奥十世 Leo X
 林肯 Lincoln
 拉法格 Lafarge
 拉斯基 Laski
 拉萨尔 Lassalle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洛贝尔图 Rodbertus, K.
 梁赞诺夫 Ryazanov
 累克西斯 Lexis
 勒纳 Lerner, A. P.
 勒·蓬, 古斯塔夫 Le Bon, Gustave
 路易十四 Louis XIV
 黎希留 Richelieu
 赖特 Wright, H.

鲁斯 Roos

M

马尔托夫 Martov, L.
 马尔萨斯 Malthus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马查林 Mazarin
 马歇尔 Marshall
 马蒂斯 Matisse
 马萨栖奥 Masaccio
 麦考莱 Macaulay
 麦唐纳, 腊姆齐 MacDonald, Ramsey
 美迪奇 Medici
 密尔 Mill, F. C.
 密开兰基罗 Michelangelo
 密勒兰 Milleriand, M.
 密塞斯, 冯 Mises, L. von
 莫尔顿 Moulton, H. G.
 梅林 Mehring
 梅逊 Mason, E. S.
 梅莱狄斯 Meredith, C. M.
 曼海姆, 卡尔 Mannheim, Karl
 摩尔, 托马斯 More, Thomas
 摩西 Moses
 摩根 Morgan
 摩莱 Morley
 穆尔 Moore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詹姆斯 Mill, James

N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尼采 Nietzsche
 尼禄 Nero
 那尔伐兹 Narvaez
 拿破仑 Napoleon

纽喀塞尔 Newcastle

O

欧几里德 Euclid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欧根 Eugen

P

丕尔汉, 亨利 Pelham, Henry
 庇古 Pigou, A. C.
 庇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庇特 Pitt
 帕麦斯顿 Palmerston
 帕累托 Pareto
 波哈耐, 欧根 Beauharnais, Eugène
 塔拉米 Bellamy
 培培尔 Bebel
 普列哈诺夫 Plekhanov
 普林基波, 嘉德 Prinkipo, K. G.
 普恩加莱, 雷蒙德 Poincaré, Raymond
 普雷斯, 弗朗西斯 Place, Francis
 普鲁东 Proudhon

Q

乔里蒂 Giolitti
 乔治, 亨利 George, Henry
 乔治亚 Georgia
 齐墨瓦尔得 Zimmerwald
 邱吉尔 Churchill, W.
 契其, 阿古斯梯诺 Chigi, Agostino
 裘克斯, 约翰 Jewkes, John

R

若累斯 Jaurès, J.

S

苏拉 Sulla

桑巴特 Sombart, W.
 索列尔, 乔治 Sorel, George
 斯东, 华伦·桑福德 Stone, Warren
 Sanford
 斯当宁 Stauning
 斯托雷平 Stolypin
 斯图尔格 Stürgh, C.
 斯坦普 Stamp
 斯契夫 Schiff, E.
 斯特拉斯曼 Streseman
 斯特拉福 Strafford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斯蒂芬, 莱斯利 Stephen, Leslie
 斯蒂芬斯, 尤里安 Stephens, Uriah S.
 斯诺登 Snowden
 斯洛 Sloan
 塞当纽斯 Suetonius
 塞尚耐 Cézanne
 塞朗诺 Serrano
 萨伊 Say
 萨波里 Saporì, A.
 圣西门 St. Simon
 圣·斯蒂芬 St. Stephen
 尚巴 Sembat
 舍累尔, 马克斯 Scheller, Max
 施瓦兹 Schwarz
 施特恩贝格, 弗里茨 Sternberg, Fritz
 施穆勒 Schmoller

T

台勃斯, 欧根 Debs, Eugene V.
 托马斯, 诺尔曼 Thomas, Norman
 托洛茨基 Trotsky
 廷柏根 Tinbergen
 涂尔干 Durkheim
 特拉克罗 Delacroix
 特劳特曼 Trautmann

泰勒, 弗雷德 Taylor, Fred M.
 陶西格 Taussig, F. W.
 汤普逊, 威廉 Thompson, William
 铁里萨, 玛丽亚 Theresa, Maria
 蒂希 Tisch, K.

W

韦伯, 马克斯 Weber, Max
 王德凡尔德 Vandervelde
 王德比尔特 Vanderbilt
 瓦尔得克-卢梭 Waldeck-Rousseau
 瓦拉, 累昂 Walras, Léon
 瓦拉斯, 格雷姆 Wallas, Graham
 瓦格纳, 阿道夫 Wagner, Adolf
 沃伯顿 Warburton, C. A.
 威尔克斯, 约翰 Wilkes, John
 威灵顿 Wellington
 威廉二世 William II
 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乌兰格尔 Wrangel
 乌里扬诺夫 Ulyanov
 温斯坦莱 Winstanley
 维多利亚 Victoria
 维希 Vichy
 维塞耳, 冯 Wieser, F. von
 魏克赛尔, 纳特 Wicksell, Knut
 魏玛 Weimer

X

西尼尔, 纳索 Senior, Nassau W.
 西斯蒙第 Sismondi
 兴德曼 Hyndman
 希尔门 Hermens, F. A.
 希克斯 Hicks, J. R.
 希法亭, 鲁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希特勒 Hitler
 栖林尼 Cellini

歇尔本 Shelburne
 萧伯纳 Bernard Shaw
 熊彼特, 约瑟夫 Schumpeter, Joseph
 A.

Y

于哥夫 Yugov
 叶卓夫 Yezhov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伊丽莎白 Elizabeth

伊斯脱曼 Eastman, M.
 英格雷斯 Ingres
 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Z

朱格拉, 克雷蒙 Juglar, Clément
 张伯伦 Chamberlain, E. S.
 张伯伦 Chamberlain, J.
 詹宁斯 Jennings, L. J.
 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詹姆斯, 威廉 James, William

地名

A

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柯尔桥 Arcole, Bridge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埃尔富特 Erfurt

B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塞尔 Basel
 不来梅 Bremen
 布尔 Boer
 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D

邓贝 Danby
 德累斯顿 Dresden

E

俄亥俄河 Ohio, River
 俄罗斯 Russia

F

芬兰 Finland
 法兰克 Franks
 法兰克福 Frankfurt
 费城 Philadelphia

G

高立斯 Gorlice
 哥达 Gotha

H

汉堡 Hamburg
 汉诺威 Hanover
 海因费尔德 Hainfield

J

加丹加 Katanga
 交趾支那 Indo-China
 剑桥 Cambridge

K

克里米亚 Crimea
 昆塔尔 Kienthal

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喀琅施塔得 Kronstadt

L

莱因兰 Rhineland
罗马尼亚 Rumania
罗加诺 Locarno
拉普拉塔 La Plata
鲁尔 Ruhr

M

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
迈因 Main
米德洛锡安 Midlothian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莫斯科 Moscow
摩洛哥 Morocco
慕尼黑 Munich

N

牛津 Oxford
尼德兰 Netherlands

P

波托西 Potosi
普鲁士 Prussia

Q

齐默瓦尔德 Zimmerwald

R

日内瓦 Geneva

热那亚 Genoa

S

斯巴达 Sparta
斯塔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塞尔维亚 Serbia
塞浦路斯 Cyprus

T

托斯卡纳 Toscana
帖尔-艾尔-凯比尔 Tel-El-Kebir
突尼斯 Tunisia
特洛伊 Troy
塔科尼克 Taconic

W

威尼斯 Venice
维也纳 Vienna

X

西西里岛 Sicily
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Y

牙买加 Jamaica
雅典 Athens

Z

芝加哥 Chicago

书 刊 名

B

《不朽的上帝》(教皇通谕) "Immortale Dei" (The doctrines of the encyclical)

比恩斯托克、施瓦兹和于哥夫合著:《工业管理》 Bienstock, Schwarz and Yugov, "Industrial Management"

巴隆纳:《集产主义国家的生产部》,载《经济学杂志》 E. Barone, "Il Ministro della Produzione nello Stato Collettivista"

贝利:《关于价值的性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 S. Bailey, "A Critical Dis course on the Nature, Measure and Causes of Value"

伯恩斯:《1870 年以来美国的生产趋势》 F. Burns, "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 E.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珀森斯:《商业周期预测》 W. M. Persons, "Forecasting Business cycles"

鲍尔:《民族问题》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鲍尔特凯维兹:《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载《社会科学及社会政策文汇》 Z. von Bortkiewicz, "Wertrechnung und Preisrechnung im Marxschen System"

鲍莱:《工业生产的分配》 A. Bowley,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t of Industry"

鲍斯:《社会政策协会史》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C

《财政杂志》 "Openbare Financiën"

查尔斯:《伦敦及剑桥经济服务所第四十号特别报告》 E. Charles, "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 Memo. No. 40"

查森豪斯:《计划经济理论》,载《国民经济学杂志》 H. Zassenhaus, "Theorie der Planwirtschaft"

D

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M.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杜干-巴兰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Tugan-Baranowsky,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德莫林》报 Desmoulins

德·梵:《储蓄、投资和消费》,载《美国经济评论》I. de Vegh, "Savings,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E

《俄国革命》"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

弗洛伊德:《图腾及禁忌》S. Freud, "Totem und Tabu"

伏尔泰:《关于英吉利民族的信》Voltair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费尔默:《君权论》Robert Filmer, "Patriarcha"

G

古尔诺:《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A. A. Cournot, "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

《国民经济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国民收入统计》"Statistics of Income"

H

亨塞尔:《苏联财政》,载《财政杂志》P. Haensel, "Soviet Finances"

哈耶克编:《集产主义的经济计划工作》F. A. von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哈特:《模型构成及财政政策》,载《美国经济评论》A. G. Hart, "Model Building and Fiscal Policy"

J

《经济》季刊 "Economic Journal"

《经济杂志》"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K

克拉克:《国民收入和支出》C. Clark, "National Income and Outlay"

克罗采:《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Benedetto Croce, "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a"

克腊姆:《公司控制的集中》,载《营业杂志》W. L. Crum, "Concentr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肯特:《哲学上的激进派》Kent, "The Philosophical Radical"

康恩:《关于理想产量的一些意见》,载《经济季刊》R. F. Kahn, "Some Notes on Ideal Output"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载《经济研究评论》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卢梭:《社会契约论》J.-J. Bousseau, "Le Contrat Social"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李维-勃罗尔:《低级社会中心理机能》Lucien Lévy-Bruhl,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

李维-勃罗尔:《原始人的心灵》Lucien Lévy-Bruhl, "L'ame primitive"

李维-勃罗尔:《原始人的心理》Lucien Lévy-Bruhl, "Mentalité primitive"

李维-勃罗尔:《原始人心理中的超自然和自然》Lucien Lévy-Bruhl, "Le surnaturel et la nature dans la mentalité primitive"

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Ry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联邦储备局公报》"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论文和会议录》"Papers and Proceedings"

M

《马拉》报 "Marat"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莫尔顿、列文和沃伯顿:《美国的消费能力》H. G. Molton, M. Levin and C. A. Warburton, "America's Capacity to Consume"

密尔:《美国的经济趋势》F. C. Mill, "Economic Tend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密塞斯:《共同经济》,英译本题为《社会主义》L. von Mises, "Gemeinwirtschaft", English Translation under the title "Socialism"

摩尔:《乌托邦》T. More, "Utopia"

穆勒:《逻辑学》Mill, "Logic"

N

《牛津英文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P

庇古:《工业变动论》A. 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帕累托:《心灵与社会》Pareto, "Mind and Society"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概要》Pareto,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普鲁东:《贫困的哲学》Proudhon,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Q

乔安·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全国商业》"Nation's Business"

《全国产业会议局研究丛书》"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Studies"

桑克斯:《通过计划工作来考验》John Jewkes, "Ordeal by Planning"

S

《四旬斋的一年》(教皇通谕) "Quadragesimo anno" (The doctrines of the encyclical)

索列尔:《进步的幻想》Georges Sorel, "Illusions du Progrès"

索列尔:《暴力论》Georges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W. Sombart, "Theori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斯坦普:《财富与纳税能力》Stamp, "Wealth and Taxable Capacity"

斯蒂芬:《英国的功利主义者》L. Stephn,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塞当纽斯:《尼禄传》Suetonius, "Biography of Nero"

塞当纽斯:《凯撒传》Suetonius, "De vita Caesarum"

《虽然犹太人》(教皇通谕) "Etsi Judaeis" (The doctrines of the encyclical)

《社会学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文汇》"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社会科学及社会政策文汇》"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

politik”

《社会研究季刊》“Social Research”

T

《托斯卡纳历史丛书》“Biblioteca Storica Toscana”

泰勒:《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针》,载《美国经济评论》Fred M. Taylor,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蒂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内的经济计算和分配》K. Tisch, “Wirtschaftsrechnung und Verteilung im...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W

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瓦拉斯:《弗朗西斯·普雷斯的生平》Graham Wallas, “The Live of Francis Place”

瓦拉斯:《政治中人的本性》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威尔克斯:《北不列颠》John Wilkes, “North Briton”

维塞尔:《自然价值》F. von Wieser, “Natural Value”

魏克赛尔:《讲义》Wicksell, “Lectures”

X

西尼尔:《论工厂法的信》N. W. Senior,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希尔门:《民主政治的特洛伊木马》,载《社会研究》F. A. Hermens, “The Trojan Horse of Democracy”

希法亭:《金融资本论》Rudolf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新时代》New Zeit”

《新事物》(教皇通谕) “Rerum Novarum” (The doctrines of the encyclical)

萧伯纳:《医生的两难处境》Bernard Shaw: “The Doctor's Dilemma”

熊彼特:《在单一民族环境下的社会阶级理论》,载《社会科学及社会政策文汇》Joseph A. Schumpeter, “Theorie der sozialen Klassen im ethnisch homogenen Milieu”

熊彼特:《商业周期》Joseph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熊彼特:《还有时间来制止通货膨胀》,载《全国商业》Joseph A. Schumpeter, “There is Still Time to Stop Inflation”

Y

《英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商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Z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E. S. Chamberlin,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詹宁斯编:《克洛克文集》L. J. Jennings, ed., “The Croker Papers”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美〕熊彼特著

绛枫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美〕熊彼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评熊彼特的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年), 美籍奥地利人, 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是熊彼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综合地表现了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反动观点; 暴露了他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诬蔑社会主义、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反动面貌。

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Moravia, 今捷境内)特利希镇(Triesch)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 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 攻读法律和经济, 是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 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修正主义分子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随后两年, 熊彼特游学伦敦, 向另一庸俗经济学家马歇尔登门求教。他还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等人。1909—1918年, 他先后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兹(Czernowitz)大学和格拉兹(Graz)大学任教授, 中途曾以互换教授名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短期讲学, 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1918年, 他以

党外“经济专家”身份，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的顾问，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考茨基、希法亭之流。1919年2月，由于奥托·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共和国的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年10月，因亲英、法并反对工业国有化等等，与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不合而去职。1921年他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4年银行破产。1925—1932年，他又从官场仕途回到资产阶级学术界，先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不久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从那时到1950年1月逝世，一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37—1941年，他担任过“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年起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9年，当代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一致同意由熊彼特担任第一届会长。

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一生中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他的主要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三个大本头专著：《经济发展的理论》，1912年以德文出版，1934年译成英文，还译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商业循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出版（两卷）；《经济分析史》，生前未完成，1954年由他的妻子伊丽萨伯编辑出版。此外，还有《从马克思恩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系根据作者从1910年到1950年所写的一些传记评论编辑而成，于1952年出版，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

从熊彼特的出身、学历、工作经历和著作来看，我们可以明了，熊彼特一方面直接承袭了庸俗经济学“大师”庞巴维克、瓦尔拉、马歇尔等人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老修正主义分子、右翼社会党人有过密切关系。这些是我们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

济学说的渊源的重要依据。前一方面的渊源,决定了熊彼特是庸俗经济学的真传嫡系,使他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忠诚辩护士,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重要席位;后一方面的渊源,又使熊彼特在辩护的学说和手法上产生了一些迷惑人的色彩,以致有人把他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熊彼特的观点、“理论”和辩护手法,更加适应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从而也就起着更加蛊惑人心的毒害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于1942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是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据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宣称,这部著作是他“差不多四十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思考、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全书分为五篇:《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社会主义与民主》,《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1947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一章;1950年的第三版又增加了著者死前不久(1949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的一篇论文:《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此书出版后,曾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热烈捧场,几乎和著者的另一代表作《经济发展的理论》一样,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1946年译成了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在著者死后又译成了法、意、日文出版。正由于此书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广为流行,特别是著者用资本主义将为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口号,来迷惑人心,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毒素,因此,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供批判研究之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二)

在本书的第一篇里,熊彼特集中地、恶毒地歪曲和攻击了马克

思主义。^①他采用了表面赞扬、实际反对,小处推崇、大处贬抑的手法,攻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一开头,熊彼特就恶意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本书第11页),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为它的信徒,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的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本书第11页)。他进而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说它好象宗教一样,许诺人们以“人世天堂”。他还恶毒地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为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所谓“宗教性质”,说什么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正象对任何一个信教者说来一样,反对者不仅有错,而且有罪。”(本书第11页注^①)

首先,熊彼特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竭力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常被称作唯物史观”,“但这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唯物主义一些,他的历史理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自由运用经验科学解释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唯物主义一些。”(本书第18页)这真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本不是那种被资产阶级学者偷梁换柱、故意加以歪曲的所谓“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史观”。我们更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937年就指出过的,“德国著名哲学家

^① 第一篇《马克思的学说》,后来被收集在熊彼特的论文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

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一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①熊彼特连黑格尔的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还没有弄清楚,就胡诌什么“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唯物主义一些”,这就暴露了这位被当代资产阶级学界誉为“博学多才”、“名列茅前的经济学家”,不仅在这方面浅薄无知,而且是有意颠倒是非。熊彼特还引用了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话,即所谓“人有头脑”,因而“能随心所欲地行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见本书第20页)他又说:在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军事领导“也影响了包括社会需要和技术状况在内的生产条件”,“这并不完全适合马克思的公式,并且很容易被解释得指向不同的方向。”(本书第20页)显然,熊彼特在这里是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曲解和诬蔑为“机械唯物论”,根本不懂得或者有意抹杀马克思主义所阐明了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熊彼特之所以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目的在于以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②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和著名“大师”的熊彼特,为要反对马克思,攻击马克思主义,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熊彼特集中力量,全面地攻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292页。

②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在口头上“奉承”马克思是“学识渊博的经济理论家”之后，就采用了庸俗经济学者的惯技，开始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提出两条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理由：“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而且一切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本书第34页)基于这两条理由，熊彼特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已经“代替了”并且“在许多方面要胜过”劳动价值论，因为边际效用价值论，“一方面它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除劳动以外有其他生产因素存在以及同时有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存的情况”。(本书第34页)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熊彼特对于师父的“衣钵”——边际效用价值论，当然是奉为传家宝而紧紧抓住不放的。

接着，熊彼特从这个主观唯心的价值论出发，利用他的“创新学说”为武器，攻击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早在1912年，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便提出了所谓“创新学说”(Innovation Theory)。根据这种学说，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the 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社会上只有在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企业组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创新”或“革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Entrepreneur)和利润，才存在资本和利息；否则，在所谓“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情况下，这一切都不存在。^①熊彼特把企业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企图，说成是“为了取得技术进步”；把企业家的职能说成是“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

^① 熊彼特：《经济发展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英文版。可参阅第二章《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第三章《信用与资本》；第四章《企业家的利润》；第五章《资本的利息》。

件的新组合”(to carry out new combinations)。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职能”下了这样的定义:“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用过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本书164页)在熊彼特看来,利润只是个别企业资本家由于采取了这种“创新”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他认为这不是剥削,而是企业资本家应得的报酬。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利润的基本形式的平均利润和垄断利润一概都不存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完全抹杀了。熊彼特吹嘘他的“创新学说”是动态的经济理论,诬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适用于完全均衡状态下的静态经济过程。(参阅本书第39页)可是他又攻击说:在静态经济过程中,“剩余价值学说是站不住脚的”(本书第39页);“在完全均衡状态下,剩余价值也许是不可能产生的”(本书第39—40页)。

随后,熊彼特又攻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的理论等等。熊彼特还无耻地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完成他的社会学体系方面”,并“没有成功”。(本书第60页)但是,正如蚍蜉妄图撼大树一样,熊彼特的种种诬蔑和攻击,丝毫也减损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科学分析的日益增长的光辉。

最后,熊彼特以恶劣的手法,歪曲和攻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方面,他把老修正主义者

①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第132页。

考茨基、希法亭之流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说什么他们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本书第66页)；另一方面，他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却只字不提。接着熊彼特又放肆地攻击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诡称当今更多的情况是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参阅本书第71页)他故意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大事宣扬阶级调和，胡说什么“提高利润的运动，同样也是提高工资的运动，面在长时期内，它之加惠于无产阶级，确实比加惠于资本家为多。”(本书第71页)

在本篇之末，熊彼特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并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仅仅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够的。”(本书第78页注①)这一段自白，不仅暴露了熊彼特本人的真面目和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原形；而且也可以作为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现代修正主义者等等在内)的共同写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段话又是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者”的不打自招的“供状”。

(三)

从本书第二篇到第四篇，熊彼特提出了并且回答和解释了三个命题：

第一，“资本主义能活下去吗？”熊彼特回答说：“不。我不认为它能活下去。”(本书第79页)

第二，“社会主义行得通吗？”熊彼特回答说：“当然行得通。”(本书第207页)

第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熊彼特回答说：“在我们

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本书第 355 页)

乍看起来，似乎熊彼特也承认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点正是熊彼特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人的地方。这也表明，熊彼特的说法和手法，同某些右翼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相同之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一脉相通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揭开熊彼特的这层薄薄的外衣，就不难从他的各种学说的形形色色的假象中，看清他所主张的真实货色，看清他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什么，他所说的要代替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万变不离其宗”，熊彼特所预期到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只是变相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是“同民主不相容的”，而只有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才是“同民主相容的”。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剖析一番，看看熊彼特对于这三道命题的答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他是如何为资本主义辩护，如何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如何美化资本主义民主，而诬蔑社会主义民主的。

第一个命题：关于“资本主义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熊彼特也说“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但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这种“资本主义”又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本书第 104 页)他说，“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进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

织的新形式。”(本书第104页)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作“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并说“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本书第104页)他还比喻说,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果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本质要素,就会象一出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剧”。(本书第108页)很清楚,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他所谓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或“产业突变”,也只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在熊彼特的分析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看不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也完全被掩盖了。如果要用上述比喻的话,这些被他掩盖起来的東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熊彼特显然是故意抹杀了这种真正的本质要素。

熊彼特还无耻地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利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辩护。他说,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根本上是和平主义者”,而“现代和平主义和现代国际道德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本书第160—161页)他又诬蔑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化最后阶段的理论,即使完全不问纯粹经济学上的反对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本书第162页)

关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熊彼特认为这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说,象前面所提到的“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地丧失下去……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本书第165页)“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

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本书第166页)“于是跟着就会发生一种多多少少静止的状态。本质上是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要萎缩下去。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还有亦步亦趋的利率,将收敛到趋于零。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本书第161页)最后熊彼特归结说:“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终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终将被贬为日常管理工作的工资。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作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门,卡内奇们和洛克菲勒们。”(本书第168页)

这就是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的分析和说明。他的这种论调,是以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特别是其中的“创新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他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是以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不断进行“创造性的毁灭”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职能的。按照他的说法,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投资机会”也就没有了,“企业家”也就用不着了,“资本主义”也就活不下去,而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更荒谬的是,在他的笔下,当代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如范德比尔特、卡内奇、洛克菲勒之流居然成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因为照熊彼特看来,正是他们这些“企业家”,“不断革新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自动化”,以至不得不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他把这些“剥削大王”,说成既是“资本主义

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这样来吹捧垄断资本巨头，真是无耻到极点。

熊彼特竟厚颜地宣称：他的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的“最终结论”，“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不同”；只不过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是由于它在经济上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它的成就本身损伤了维护它的社会制度。”他说：“要接受这个结论，不一定需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人可以憎恨社会主义”，而仍然“可以预见它的降临。”（本书第80页）熊彼特还利用资本主义“投资机会日渐消失”的问题，歪曲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之间确实不存在象马克思和马歇尔或魏克塞尔之间那种鸿沟。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两者，都可以用我们将要用的，投资机会日益消失这一不言而喻的理论来很好地说明。”（本书第140页）这显然是故意“鱼目混珠”。

·（四）

第二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我们先要明了，熊彼特所说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相去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是一回事。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本书第208页）在1950年补充到本书里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一文中，熊彼特又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有或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本书第515页）我们要判断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

色,关键问题是要看他所说的“中央政权”或“公共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很清楚,熊彼特所说的“中央当局”或“公共权力机关”,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因而他所说的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国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熊彼特的以这种“公有化”和“国营”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既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它在实质上就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熊彼特百般地诬蔑社会主义。他胡说什么“具有深刻信念的社会主义者会仅仅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感到满足。他们觉得社会主义的面包仅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所以吃起来比资本主义的面包香,即使发现里面有老鼠也是如此。”(本书第238页)他采用两面手法,先在表面上赞扬一句,说:“可以设想得到,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将自己证明优于大企业资本主义”;但接着他笔锋一转,又说:这一点,“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许是全然不能实现的。”(本书第245页)他还诬蔑说,这种“可能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可能变成实际的低劣性,这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的。”(本书第246—247页)

熊彼特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也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抵抗将是微弱的,合作将来自一切阶级的大部分人——其征兆之一,恰好是通过宪法修正案采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通过某种无须破坏法统的和平途径。”(本书第277页)“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这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尚无准备”。(本书第280页)“这种局势的征兆之一就是必须使用暴力来

反对集团和阶级，而不是反对孤立的个人，……另一种征兆是，不可能通过修改宪法的途径，也就是说不能不破坏法统来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新秩序必须通过革命，尤其可能是必须通过血腥的革命来建立。”(本书第 282 页)关于“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熊彼特以英国实行银行、保险、运输、采矿、电力、钢铁、建筑等业的国有化为例，作为采用“社会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说明。

在三种形式中，熊彼特极力赞扬并主张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采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竭力诋毁和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可能的卓越成就”(本书第 280 页)，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负担。(参看本书第 288 页)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本书第 285 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主张通过“议会道路”、“结构改革”来实行和平过渡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论据和思想观点上，确实是同包括熊彼特之流在内的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一脉相通的。不论是熊彼特所主张的“在成熟状态下通过修改宪法”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或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议会道路”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都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论是熊彼特所赞扬的在英国实行的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或是“结构改革论者”所标榜的在意大利实行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有化政策，在实质上也都不过是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国家政权进一步攫取高额利润的一些措施罢了。

(五)

第三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

首先，熊彼特故意抽掉和掩盖民主的阶级性，以“全民民主”为幌子，来宣扬和维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少数人的民主。他宣称：“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本书第302页）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把‘作出决定’的意思和‘统治’的意思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把民主的定义规定为由人民来统治。”（本书第303页）他在另一个地方又给“民主”下定义说：“民主的方法”就是“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的方法。（本书第337页）他还解释说，“民主原则仅仅意味着，政府的统制手段应交给获得了比任何一个竞争的个人或集团更多的支持的那些人。”（本书第341页）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熊彼特的所谓“由人民作出决定”或“由人民来统治”的民主，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方法称作“民主方法”，但是，这种竞选只不过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经济上的联合或竞争反映在政治上的联合或竞争罢了，是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操纵选举来统治和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方法。这种所谓“民主”，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

其次，熊彼特恶意诬蔑当时在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而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他说“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的理想。但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那么讲究使它实现的方法的。革命和专政这些字眼屹然呈现在圣书的纸面上使我们感到刺目。”（本书第293页）他又说：“当我们检查一下社会主义

各党的记录时,对于他们所说的他们始终拥护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本书第295页)他还攻击当时的苏联,说什么“存在着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由一个居于少数地位且不给任何政党以任何机会的党统治着。”(本书第295页)他更诬蔑说:“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经营管理,意味着在工厂内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不是在工厂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会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虚伪的东西。”(本书第378页)他为资本主义民主吹嘘说:“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本书第371页);又吹嘘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极盛时期完全能够成功地实现民主。”对于象熊彼特这样的为资产阶级民主辩护的陈腔滥调,列宁早就加以彻底驳斥过,他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①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熊彼特得出荒谬的结论说:“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同时,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本书第355页)从熊彼特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我们知道他所界说的社会主义有三种过渡形式,实际上他是指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当时已在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不成熟的状态下”用暴力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加以改良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成熟的状态下”通过修改宪法而和平过渡的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5页。

“社会主义”，或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政策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熊彼特竭力诋毁前一种社会主义；而极力主张和颂扬后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即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面说过，熊彼特所界说的民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现在我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他要说在他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他所界说的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在熊彼特看来，前一种社会主义，即当时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同民主没有联系的；而只有后一种“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逐步改良的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他所美化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是“民主的”，也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是同民主有联系的。熊彼特所说的“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指的也是这种所谓“社会主义”。这完全是用“鱼目混珠”的手法，来颠倒黑白，迷惑人心。到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熊彼特在理论上和手法上，是如何施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惯技了。

总之，熊彼特以当代垄断资本代言人的身份，采用了一系列的老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的两面派手法，在本书中极力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美化资本帝国主义，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熊彼特向来是以“不成学派的大师”著称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哈伯勒曾经大肆吹捧熊彼特并解释“熊彼特学派”为什么没有形成，说：“熊彼特的博学、虚怀，以及他的体系的复杂性，使得难于形成一个熊彼特学派。”^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不成学派的大师”却是

^① 哈伯勒：《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1883—1950》，美国《经济学季刊》1950年第3期，第307页。

属于当代庸俗经济学这一大派,而且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熊彼特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比如自封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原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保罗·萨缪尔逊,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保罗·斯威齐,以及当前位居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前列的中山伊智郎、东畑精一、都留重人等,莫不出自熊彼特的门下,受过他的熏陶,并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传播和宣扬熊彼特的学说和学风。据说熊彼特在讲学和讨论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也正因为这样,他通过潜移默化,对和他接触过的青年学子的影响就更大。熊彼特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论点和手法上更加直接地同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气脉相通,互相承袭和模仿。

张培刚

1964年7月原稿,

1978年11月修改。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内 部 发 行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美〕熊彼特著

绛 枫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5 毫米 1/32 17 3/4 印张 393 千字
1979 年 4 月第 1 版 197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0 册

统一书号：3017·235 定价：1.65 元